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SVORA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ISSN 3079-4552

eISSN 3079-4560

编辑出版: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1卷9期
2025年10月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办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出版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编辑部
编辑部邮箱 xk@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
中国国际中文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建设期刊
国际中文学术期刊数据库ICAJD 收录期刊

总编辑 陈科存
副总编辑 梅见华 孙文杰

编辑委员会

李兆祺	林鑫	苏天	穆艾伟	熊森浩
刘伟伟	吕憬岩	黄少安	刘宇	叶明裕
陈曦	景瑞宾	崔健	王正威	李泽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吴钰双	穆尚海	曹一君
陈立立				

青年编委

舒波 袁臣辉

版权声明

文章版权由文章作者与维思沃尔出版社(WISVORA Publishing)所有。单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 所刊载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进行许可。根据该许可协议, 任何第三方在明确署名原作者与出处的前提下, 均可对本刊内容进行复制、传播、演绎使用, 无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个别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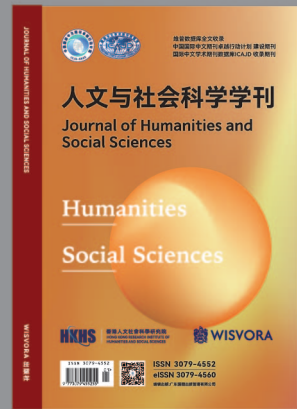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已获得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许可



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HONG K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专注于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旨在为学者提供研究支持, 并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应用。研究院通过出版学术期刊、举办学术会议及提供政策建议, 推动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与合作。

网址: www.hks.ac.cn 邮箱: info@hks.ac.c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维思沃尔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蒲岗景福街99号启德工
业大厦8楼D07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国大陆引进
北京中科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大陆运营
广东国图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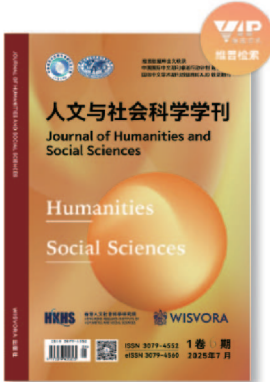
维思沃尔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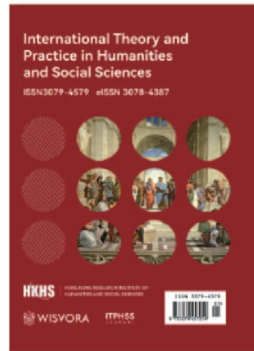
WISVORA

学术无界，普惠可及

快速审稿 开放获取 普惠包容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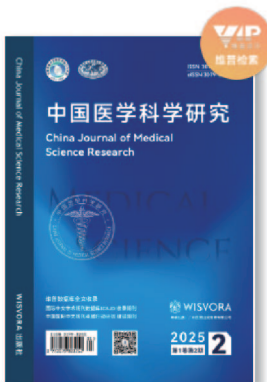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TPHSS)



经济与管理学刊



中国现代教育学报



中国医学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与技术学报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Insights



Journal of Emerging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of Medical and Health Sciences Research

www.wisvora.com
wisvora-publishing@wisvora.com



目 录 TABLE OF CONTENTS

文化与文学研究

- 中国动画电影跨文化传播效果研究——基于《哪吒 2 之魔童闹海》国际预告片的用户评论分析 - 王菁菁 - 1-5
- 客家音乐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地化比较研究——以闽赣粤三地为例 - 徐高瀚 - 6-8
- 清代雅集绘画中的女性形象视觉呈现 - 张如心, 池海营 - 9-13
- 邓散木书学思想探赜 - 雷鼎 - 14-16
- 渡边金一的拜占庭研究 - 唐剑文 - 17-21
- 时局与战略: 石韞玉从征白莲教起义研究 - 孙铭泽, 董粉和 - 22-26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德语本科高年级阶段的美育路径探索——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为例 - 罗威 - 27-32

教育理论与实践

- “三全育人”理念下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研究 - 张佩琳, 易秀华 - 33-37
- 基于 OBE 理念的“课证融合”应用型高校软件工程专业课程改革与实践探索 - 余丰 - 38-43
- 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探析 - 陈明厚, 王淑娴, 庞芳芳 - 44-48
- “人工智能辅助形成性评价应用于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的研究——以外研社必修 3 Unit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为例” - 金岚, 刘峻利 - 49-54
- 以课程思政为导向的高中物理教学设计——以“运动的合成与分解”为例 - 李东泽, 譙飞, 高红 - 55-60
- 群文阅读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杨晴, 段灿 - 61-63
- 问题式教学法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 段灿, 杨晴 - 64-67
- 多维视角下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机制分析与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 谷渊博, 郝澳茹, 徐想, 马茹梦 - 68-72
- 健康中国背景下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研究——以雅安市雨城区为例 - 杨渊, 黄津容, 唐觅 - 73-76

社会与治理

- 民为邦本: 苏轼廉政思想的社会治理意义 - 刘欣琛 - 77-82
- 愈炸愈坚: 重庆大轰炸之下渝中半岛的城市建设 (1939-1941) - 杨哲 - 83-89
- 高校本研人数“倒挂”的网络舆情分析 - 王慧 - 90-95
-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的医学生廉洁教育研究 - 武超, 邵蕾蕾 - 96-99
- 体育浸润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理论逻辑研究 - 但懿, 杨晨飞, 刀波波, 钟月萍 - 100-104
- 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 李中华 - 105-108
- 城乡共治视角下的生活垃圾分类困境与路径探索: 以中国四川会东县为例 - 蔡华珍, 王棚, 邓景, 林静, 李渊 - 109-114
- 四川省昭觉县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研究 - 约其作体, 邓景, 王棚, 吕你色, 李渊 - 115-121

边缘治理的制度挑战与路径重构：基于中国四川盐源县市场监管问题的质性研究 - 李超, 王棚, 邓景, 吕你色, 李渊 - 122-128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四川德昌县政府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行为探究 - 丰雷, 邓景, 王棚, 吕你色, 李渊 - 129-136

中国四川省青年结构性失业问题与就业转型趋势研究 - 玛海补都莫, 黄里坡, 吕你色, 钟艳廷, 李渊 - 137-145

从“文化展示”到“发展引擎”：国门文化驱动边疆发展的新范式与协同 - 吕世林, 李虹瑾 - 146-15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 周旭 - 151-156

经济与管理研究

从“北人南迁”的视角探析南宋泉州港的兴盛 - 杨哲, 肖雅婷 - 157-162

沉浸式体验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 胡琦 - 163-169

桂西北居民低碳体育旅游需求与参与行为特征研究 - 张迪, 关正, 黄震霆, 赖炳辉 - 170-174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青海省旅游产业分析 - 王彩虹 - 175-178

影响黄金价格预测的关键经济指标及作用机制研究 - 牛雪儿 - 179-182

论数字劳动中的劳动异化问题 - 张美娟 - 183-187

金融市场对资源环境效率的影响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 - 郭杨, 罗奔, 董佳宜, 王雨洁 - 188-191

去人类中心化视域下：AI 智能体奇点分析与 AI 智能体治理理论重构研究 - 熊宇博 - 192-198

传媒与艺术研究

环境传播视角下微博“日本核废水”议题的传播机制研究 - 张芷莹 - 199-203

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工业文旅发展策略研究——以衡阳市为例 - 胡颖, 王路宁, 邹开利 - 204-208

从角色共情到票房奇迹：《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情感叙事与观众认同 - 付招娣, 黄伊丹 - 209-214

赛博朋克视域下的反乌托邦建构——《北京折叠》的技术幻想与社会现实表征 - 郭泰然 - 215-219

AIGC 设计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探析 - 欧阳澜 - 220-225

钢琴演奏中肢体语言与艺术表达关系研究 - 袁小龙, 全涛 - 226-229

多民族艺术交融的共同体叙事实践——以《刘海砍樵》音乐与服饰的文化互鉴为例 - 全涛, 袁小龙 - 230-235

“互联网+”赋能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承研究——打造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品牌 - 刘磊, 易秀华 - 236-239

打破算法壁垒：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形成机制与应对路径 - 周兴萍 - 240-245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创作分析与演唱研究——以三首作品为例 - 万美彤 - 246-251

《直到找到你》中音乐媒介中的情感认知 - 向君如 - 252-258

简析山水画留白意境 - 吴以晗 - 259-261

中国动画电影跨文化传播效果研究—— 基于《哪吒 2 之魔童闹海》国际预告片的用户评论分析

王菁菁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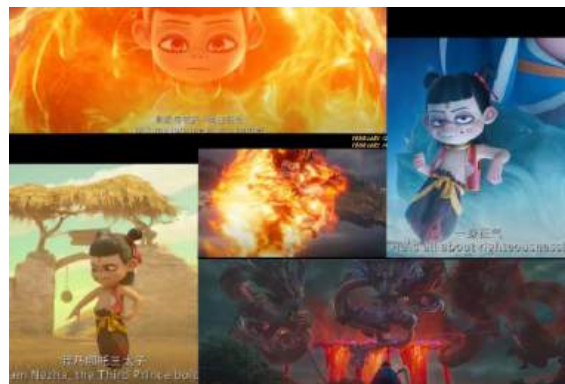
摘要: 近年来, 随着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与文化“出海”战略的推进, 国产动画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逐渐提升。本文以《哪吒 2 之魔童闹海》为研究对象, 基于 Youtube 平台国际预告片的英文用户评论, 运用 Python 数据挖掘与 RostCM6 情感分析工具, 从认知、情感、行为三维度系统考察其国际传播效果。研究发现: (1) 在认知层面, 海外观众对中国动画的刻板印象逐渐转变, 更多观众开始认可中国动画的技术水平和艺术表现; (2) 在情感层面, 评论情绪普遍积极, 反映出观众对影片制作质量与文化表达的高度评价; (3) 在行为层面, 观众表现出较强的互动参与感、传播意愿与观看倾向。通过技术创新、叙事结构的调整和多元化的观众互动, 国产动画电影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国际传播力。

关键词: 中国动画电影; 跨文化传播; 《哪吒 2》; 传播效果; 文本分析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37

一、《哪吒 2》动画电影概述

《哪吒 2》作为中国动画电影的重要代表作, 继承并超越了其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 年) 的成功, 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影片基于中国传统神话进行了创新性改编, 并运用先进的动画技术, 进一步在视觉效果、故事构建及文化传承方面实现了突破。自 2025 年春节档上映以来, 《哪吒 2》凭借其精湛的画面制作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迅速在国内外市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房和口碑双重成功。截至 2025 年 3 月 24 日, 影片总票房已突破 153 亿人民币, 海外票房突破 3 亿人民币, 并在全球票房榜单中暂列第五名^[1], 创作了多个影史记录。然而, 《哪吒 2》的成功远不止票房收入的增长, 更在于其显著的全球文化传播效果。影片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再造, 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和精神内涵巧妙地融入到电影叙事中, 使其能够跨越文化鸿沟, 赢得了不同地区观众的共鸣。其全球影响力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展露头角, 同时也为全球观众提供了更为多元和深刻的文化体验。因此, 《哪吒 2》不仅是一部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之作, 更是一部成功的文化传播典范。



作者简介: 王菁菁 (1999—),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

通讯作者: 王菁菁

前对中国动画的印象较为模糊，甚至持有“难以与好莱坞、日本动画竞争”的刻板印象。然而，在观影后，他们对中国动画的技术水准和视觉表现力大为惊叹。如一则高点赞量评论写到：“我从没想过中国动画能做到这个水平！视觉效果太震撼了！”这表明，《哪吒》不仅刷新了海外观众对中国动画质量的认知，还使其在全球动画市场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估。其次，部分用户提及奥斯卡奖项，认为影片具备国际竞争力，如“它太精彩了！！！！我想说，视觉效果值得在明年的奥斯卡上获得公平的竞争。”这说明，《哪吒》在视觉艺术和电影工业水平上已获得国际观众的认可，并促使他们重新思考中国动画的全球价值。最后，电影重塑了海外观众对中国神话及文化的认知。评论中高频出现“哪吒”“神话”等关键词，反映出观众对影片所承载的文化元素产生了浓厚兴趣。如一位观众写到：“这部电影打破了我对哪吒的所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一评价表明，哪吒的形象在电影中经过现代化改编，使其超越了传统认知，塑造出更具普世价值的角色特征。与此同时，电影通过丰富的叙事方式，使海外观众能够理解并接受哪吒的成长经历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进而产生情感共鸣，实现文化的跨国传播与认知深化。

（二）情感层面：以正面积积极情绪为主

情感态度层面是指在信息传播认知层面的基础上，信息通过对受众主观观念或价值体系的影响而引起情绪或情感的变化。根据学者的网络信息传播效果评价模型，传播效果可以依据信息受众对于信息的知晓度、理解度和赞同度等指标进行评估，其中理解度和赞同度是用于衡量受众对接收信息所产生的情感态度效果的重要指标，主要体现在受众的评论中所反映的支持与反对数据中[iii]。通过对 580 条文本的情感分析（见表一）发现，评论中的积极情绪（情感倾向值>5）占 59.9%，中性情绪（情感倾向值=5）占 30.8%，消极情绪（情感倾向值<5）占 9.3%。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占据评论数据的绝大部分，消极情绪占比较少，由此可知《哪吒 2》在海外市场的认可度较高。除此之外，爬梳评论文本中的态度类形容词也是探寻网友情感倾向的一个有效手段[iv]。通过对高频形容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排名前五的形容词为精彩的（amazing）、最好的（best）、伟大的（great）、史诗般的（epic）以及优质的（good）。在进行高频词溯源后可以发现，整体而言，众多评论表达的是对《哪吒 2》电影的高度认可和赞赏。可见，大部分海外受众对《哪吒 2》电影表现出积极、正面的接受态度。然而，在预告片的评论文本中，也存在少部分带有消极情绪的评论，占据总数据的 9.3%。这些消极情绪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宣传论、阴谋论以及无依据的恶意差评上。例如，有评论认为有关《哪吒 2》的赞美言论都是炒作，或将电影解读为政治局，将哪吒形象类比为中国，认为中国正在改变规则。此类评论的产生，显然与西方媒体长期渲染的对中国的怀疑和信任不无关系。因此，深入分析海外受众的情感反应，有助于抵制部分西方媒体主导的舆论，并通过采用西方更易接受的创作模式，使中国文化更好地“走进”西方世界。

表 2 评论情绪分布表

情绪种类	数量	占比	情感强度	数量	占比
积极情绪	347	59.9%	一般 (5,15]	45	7.8%
			中度 (15, 25]	85	14.7%
			高度 (25,+∞)	217	37.4%
中级情绪	179	30.8%	/	/	/
消极情绪	54	9.3%	一般 [-15,5)	40	6.9%
			中度 [-25,-15)	8	1.4%
			高度 [-∞,-25)	6	1%

（三）行为层面

从认知到情感，再到行为的产生，往往被认为是国际传播效果逐渐累积、深化和扩大的过程。受众行为是指受众与传媒机构及其媒介产品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情况，可被量化的受众行为包括浏览、转发、评论和点赞等[v]。经过研究，该宣传片的受众行为大致分为三种。

1.文化互动参与

在文化互动参与层面, 受众的观影行为不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接受过程, 更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具体而言, 观众在感知影片内容后, 通过情感共鸣与文化内涵的再解读, 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电影的主题相结合, 进而对电影进行多纬度的文化反思与传播。在这一过程中, 观众不仅是文化信息的接受者, 更文化意义构建者。许多海外观众在评论中提到, 《哪吒2》中的命运、自由意志以及父母对子女无条件爱的主题, 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情感共鸣表明, 观众与电影内容之间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连接, 并且揭示了影片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巨大潜力。更为关键的是, 这种情感共鸣引发的互动, 对电影的传播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 观众不仅在个人层面上经历了文化认同的过程, 还通过社交平台、评论区等渠道将他们的理解与他人分享, 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对话。

2. 推荐其他人观看

观众文化认同对口碑传播意愿的根本是感知价值和观影满意度[vi]。在《哪吒2》宣传片中所获的评论中, 许多观众表达了对电影质量的高度认可, 特别是对影片的视觉效果、动画技术、剧情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给予的高度评价。如一位网友在评论中表示: “这部电影的特效太震撼了, 场面宏大, 真是中国动画的巅峰之作, 强烈推荐给朋友!” 这中推荐行为源于观众对电影的总体满意度, 特别是在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 观众更倾向于将自己满意的观影体验与他人分享, 从而推荐其他人观看。口碑传播不仅反映了观众的高认同感和情感参与, 也有助于电影在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获得更大影响力。

3. 呼吁本国上映

更有不少网友在观看宣传片后提到希望影片能够在更多国家和地区上映, 尤其是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例如, 有评论者提到希望电影能够在印度、巴西、菲律宾、墨西哥等地区上映。观众的呼吁一方面反映了全球受众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度和兴趣, 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电影技术结合的独特魅力的期待, 另一方面, 这也表明了这部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潜力, 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间架起桥梁, 触及更广泛的观众群体。

总体而言, 《哪吒2》国际预告片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并促进了国际受众在讨论中主动传播和分享有关中国电影及其文化的积极评价。这一现象表明, 中国电影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亟需创新话语体系, 以便更好地与海外观众建立联系。通过这种创新的传播策略, 中国电影能够帮助国际受众深入了解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 从而激发观众产生观看、推荐以及参与电影相关讨论等行为, 进而推动电影的全球传播与文化交流。

四、启示

研究显示, 在认知层面, 国际受众对中国动画电影的认知逐渐发生转变, 开始重新评估中国电影作品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和艺术风格, 意识到其在全球电影市场中的重要性。在情感态度方面, 海外观众对该宣传片总体呈现出正面积积极的情感倾向, 在行为方面, 海外观众表现出了积极的互动行为, 参与评论、分享观影体验, 并且呼吁在本国上映, 可见他们对作品的认可和对动画电影的兴趣。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该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巨大的突破, 不仅从内容和形式上丰富了全球动画电影的多样性, 而且在文化交流中也架起了一座理解与认同的桥梁。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本文总结了优化中国电影国际传播效果的三点启示。

(一) 整合技术赋能, 深化艺术创新, 重构视觉表达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 实现文化建设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 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vii]。这一战略思想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哪吒2》的成功也正是依托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实践。影片通过将先进的科学结束与艺术创作相结合, 在视觉效果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例如影片中的“青铜结界兽”这一角色设计, 融合了三星堆青铜面具的传统文化元素特征, 并通过动态捕捉技术与粒子渲染技术, 赋予其独特的视觉表现[viii]。这种技术与文化的深入融合, 不仅在国内市场引发了强烈的文化共鸣, 通过对上述宣传片的评论分析也可得知, 还在国际受众中获得了高度评价。

(二) 转变叙事方式, 创新故事结构, 深化全球情感共鸣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文化产品的国际传播不仅依赖于技术创新, 更取决于其叙事方式的创新与文化表达的全球适配。《哪吒2》在叙事方式上的创新为其成功融入国际市场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在影片中不仅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 还结合当代观众的情感需求和文化心理, 在叙事结构上进行了现代化的重构, 超越了传统“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ix]。这种转变使得人物关系、情感冲突等方面打破了传统的善恶、对错界限, 展现了更为复杂且多维的情感结构。角色塑造不再是单纯的英雄化人物, 而是通过对其成长、内心挣扎及自我认同的深刻刻画,

展现出的更加立体和人性化的形象，使海外观众能够从更为多元和共情的角度理解和接纳影片中的人物和故事。

(三) 激活受众参与，构建互动生态，推动文化再生产

在数字化传播时代，受众已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转变为具有主动性的传播节点与意义生产者。《哪吒2》在全球的传播实践表明，通过激活受众参与，构建双向互动的传播生态，能够有效推动文化意义的再生产，形成“内容传播——受众反馈——文化增值”的良性循环。这种由观众推动的文化再生产，不仅增强了电影在全球市场的传播，也加深了全球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此外，社交媒体本身也为这种互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 Youtube、Tiktok 等平台，观众通过点赞、评论和分享行为形成了广泛的传播网络，使得电影的讨论与文化传播在全球范围内呈指数级的扩展。平台通过推送与推荐机制，使得受众的反馈迅速传播给更多潜在观众，形成了一个双向传播的生态。

参考文献:

- [1]猫眼票房.哪吒之魔童闹海[EB/OL].[2025-03-25]. <https://piaofang.maoyan.com/dashboard>
- [2] 彭聃龄,丁国盛. 心理学纵横谈[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08).
- [3] 罗莹、刘冰:《网络信息传播效果研究》,载《情报科学》,2009年第10期。
- [4] 辛静、叶倩倩:《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的分析与反思——以 YouTube 李子柒的视频评论为例》,载《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3期。
- [5] 刘燕南、刘双:《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构:框架、方法与问题》,载《现代传播》,2018年第8期。
- [6] 付方达.(2023). 观众文化认同对新主流电影口碑传播的影响研究. 当代电影, (05), 86-91.
- [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2024-10-29(1).
- [8] 李蓉.新华时评:从《哪吒2》看“中国风”的全球表达[EB/OL](2025-02-10)[2025-03-02].
- [9] 张明浩&吴岚清.(2025).《哪吒之魔童闹海》:“神话-现代”叙事及其情绪动力学.电影评介,(04),33-39.

Research on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Chinese Animated Films: An Analysis of User Com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iler of Ne Zha

WANGJINGJING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nimation industr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cultural "going global" strategy,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ally produced anima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This paper takes Ne Zha 2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English user comments on its international trailer on the YouTube platform, employs Python data mining and RostCM6 sentiment analysis tools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i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cognition, emotion, and behavior.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At the cognitive level, overseas audiences' stereotypes about Chinese animation are gradually changing, with more viewers beginning to recognize the technical proficiency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of Chinese animation; (2) At the emotional level, the sentiment expressed in the comments is generally positive, reflecting audiences' high regard for the film's production quality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3) At the behavioral level, audiences demonstrate strong interactive engagement, a willingness to spread the word, and an inclination to watch the film.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djustments in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diversified audience interaction, domestically produced animated films can, to a certain extent,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ower.

Keywords: Chinese animated film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 Zha 2; communication effects; text analysis

客家音乐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地化比较研究——以闽赣粤三地为例

徐高瀚¹

(1. 洛阳理工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3)

摘要: 洛阳作为河洛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客家的祖根地, 其历史文化、民俗文化、音乐文化等, 通过多次移民南迁传播至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区, 成为客家文化的重要源头。客家音乐作为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长期迁徙与地域融合中形成了丰富的地域变体, 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本文先从历史溯源入手, 探讨河洛音乐文化的传承及与闽地、岭南、赣鄱文化的融合; 再剖析闽赣粤地区客家音乐的特色及在地化差异。旨在揭示三地客家音乐的独特性及其形成机制, 为客家音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河洛音乐; 客家音乐; 历史渊源; 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 洛阳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 2025B43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1

一、历史溯源

1. 河洛音乐文化的传承

河洛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是具有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河洛音乐, 它不仅包含具体的音乐形式, 更体现了精神层面上价值观的延续。河洛音乐中的宗法礼教、伦理观念、家国情怀通过歌词内容、演唱等方式, 随多次移民南迁传播至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区, 成为客家音乐的重要源头。客家音乐中祖先崇拜、家族团结等歌唱内容, 传承着河洛文化中的家族意识, 同时, 客家音乐多用于各类节庆仪式中, 在社会功能上是对河洛传统音乐的一种继承。另外, 客家音乐中融入的勤勤恳恳、思念乡情的情绪情感, 与河洛文化中艰苦奋斗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客家音乐对河洛音乐元素的继承体现在其多种形态上, 从旋律的形态、节奏的风格、乐器的使用中多有体现。旋律上常见的五声调式音阶、旋律走向与河洛传统音乐有着十分明确的亲缘性, 是对古代中原音乐调式系统的继承性表现。节奏上平缓的节拍及强调叙事性的节奏处理风格, 都有河洛民间音乐强调语言韵律的痕迹。在乐器使用上, 一些中原地域历史悠久的乐器改良之后, 在客家乡土中仍占统治地位并沿袭传统演奏技法。

2. 在地化发展

2.1 与闽地文化交融

客家音乐受到福建地区地理环境、民风民俗以及本土音乐的多重影响, 在闽地音乐与客家音乐的交融中, 彰显出具有客家风情与闽地音乐相结合的音乐特征。闽地具有的海洋性音乐文化特质与客家山区的地域性音乐文化特质相冲突, 促使福建客家音乐一方面具山区音乐的特点沉稳而内敛, 另一方面也有沿海音乐的灵动与细腻。闽地丰富的民间信仰和民间民俗为客家音乐提供了新的展示音乐舞台的空间, 音乐的功能也从原有的乡村劳作、祭祀等新的功能延伸出来, 词曲也增添了与闽地民俗相关的民俗意象。在曲调方面也吸取了闽地民歌的旋律性装饰与乐器的配器手法, 使客家人音乐的语言更具闽地民族特征, 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地方客家音乐所具有的特征。

2.2 与岭南文化融合

客家音乐在岭南文化的发展, 受到了岭南地区中包容的文化性格、粤语语言背景和海上贸易等多方面的影响, 形成了客家音乐的“岭南化”。岭南文化务实创新的文化精神, 决定了广东客家音乐既要体现客家人的乡土传统, 又有较大的侧重点在现实生活的连接与互动上, 音乐内容方面涉及到的生产劳动和经贸文化的现象较多。同时, 粤语的声韵调属性, 影响着广东客家音乐的旋律和节奏, “一腔一调”的音乐唱腔营造了独特的起伏跌宕之感。

作者简介: 徐高瀚(1997—), 男, 音乐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 讲师, 研究方向为音乐学、文艺学。

2.3 与赣鄱文化结合

江西客家音乐的产生受赣南地区的农耕文化、赣江流域的水路文化、赣鄱地区的儒家文化等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既有文化厚度又饱含乡土气息的音乐特质。赣鄱文化重视农耕生产及宗族传统，决定了该地区形成的音乐多是关于农耕作业、家族事务等。其旋律节奏与农耕生产高度融合，节奏上体现出一定的生活实用价值。另外，赣江流域水运则带动了不同音乐文化的沟通交流，江西客家音乐在与其他民间音乐的交流中，提升了自身音乐的艺术表现力。



图1 客家各个时期迁徙路线图（出自：锦绣人文地理）

二、闽赣粤三地客家音乐特色及在地化差异

1. 福建客家音乐形态特征

在音阶与调式上，福建客家音乐音阶与调式在保留河洛传统五声音阶的基础上，融入了福建山区的特殊唱腔，形成了稳定与灵活并存的调式。其音阶主要由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在其基础上通过添加偏音，使音阶具有一定的离调倾向。调式选用方面以徵调式为主，因徵调式表达出来的明朗色彩与山里的开阔特征相契合。音程上主要以四、五度跳进为主，因四、五度的跳进既不失中原的古朴性又由于山地特征而产生音腔相吻合。在旋律与节奏上，福建客家地区的音乐在旋律线条上以起伏、波浪型为主，上行是短促的前进，像上山的小路，下行是长线式的流动，像山溪缓缓流动，旋律的发展与福建多山多水的地理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旋律发展过程中多采用倚音、滑音等装饰音，使音乐更具口语化；节奏上多表现为复合型节奏，在叙述性的音乐上多采用均分节奏，而抒发性强的音乐上则采用散板节奏，并非完全无节奏。在祭祀音乐上，节奏较为严肃，在固定节拍循环进行的音乐中充满肃穆感。

2. 广东客家音乐风格特点

在歌曲的旋律上，广东客家音乐的曲调具有鲜明的岭南地域特色，在旋律方面和其他客家人音乐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整体曲调比较明快流畅，跳进和级进交替进行是其显著的特点，这也符合岭南地区温和湿润、商业活动频繁的特点。同时，借鉴了广东方言歌曲的旋律，并大量采用衬词，所选用的衬词不同于普通语气，而是选择与主题旋律自然结合的歌词内容，这更加强了歌曲的音乐表现力。音乐的感情表现更加直白畅快，不会像其他地方歌曲存在较多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喜怒哀乐感情强烈，这也符合岭南人民务实尚用的特点以及商业社会对快速交流情感的追求。在演奏风格上，广东客家音乐演奏的风格体现在乐器选择、演奏手法上。其乐器组合在保留客家传统乐器的基础上，融入了岭南民间流行的丝竹乐器，这一组合摆脱了传统乐器使用的固有模式，增强了器乐演奏的表现音色。在演奏上，注意强弱对比和音色变化，来表达更丰富的情感，也会即兴按照现场的气氛来调整节奏，音乐更能具有互动性与现场感，这一特征也与广东商业社会有很大的联系。乐器演奏不偏重某一种乐器的单独演奏，而是强调乐器之间对话式演奏，进行不同声部的协作。在不同的场合，其音乐风格也不同，民间自娱自乐的场合中更为自由随意，在正式的演奏中更为严格规范，这一灵活的演奏风格很好地适应了社会需要。

3. 江西客家音乐文化特征

江西客家音乐与赣南文化的关联体现在音乐内容及形式上，其对赣南地域文化的接纳和改造，使得音乐与当

地人民生活习惯相契合。江西客家音乐中的大量题材都与农事劳作相关,音乐节奏与旋律也往往与劳作时的手脚动作节律相合,成为农耕生活的记录与再现。赣南地区的宗族文化在当地民众中具有较高的认同度,祭祀活动中以严肃、庄重的音乐氛围为背景,歌词的内容多表达自家家世来源、赞美祖先美德等内容,成为连接族人的桥梁。赣南地区各民族杂居相处的历史,使客家音乐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民歌,如畚族民歌等。在音乐旋律与乐器的运用上出现多元同化的格局,但这种吸收不是无差别的,而是经过了改造再利用,转而形成具有鲜明客家民族特殊的音乐形态。另外,江西客家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革命文化的影响,其音乐的表现内容、文化功能以及精神层面都具有鲜明的红色基因,江西客家音乐在革命战争时期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发动群众的重要工具。在传统乐曲曲调上填上革命歌词,在确保音乐易于传唱的同时,又赋予其革命意识形态,以传统音乐连接革命。这使得江西客家音乐内容得到了扩展:从记录传统农耕、爱情故事,到歌颂革命、描绘斗争,从原本温柔敦厚到激昂慷慨,通过紧促有力的音乐节奏,高昂动人的音乐旋律,表现出革命乐观精神。革命文化的加入使得江西客家音乐的音乐文化远远超脱出艺术范畴,成为革命记忆、红色精神的承载者。

三、结语

河洛音乐是客家音乐的重要源流之一,其在闽赣粤地区的传承发展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闽赣粤地方文化对河洛音乐的吸收与改造体现了音乐的地方化特征,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风格。河洛音乐的传播与变迁不仅是音乐文化的互动过程,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缩影,对于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演进具有重要价值。在千百年的传承和积淀中,客家文化中的每一个元素与符号,都已深深地印在了客家儿女的心灵深处。作为客家文化的特征之一,地域性的文化交融现象是三地客家音乐呈现差异性的前提,也是河洛音乐基因与地方文化历时交融的体现。从本原性的解构到多重性的比照,都证明三地客家音乐的形态、风格都与其地域环境呈现出极大的相关性。在当下文化多元性发展的背景下,更应当抓住时代机遇,通过数字化与智慧文旅深度融合、非遗活态传承与产业协同等方式整合文化资源,深化客家音乐文化建设,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杨靖.客家音乐的艺术特色与现状发展研究[J].中国民族博览,2021,(08):122-124.
- [2]张思逸,冯亚琴.客家民歌的发展[J].艺术品鉴,2021,(02):53-54.
- [3]王晓我.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客家仪式音乐研究[J].戏剧之家,2023,(24):60-62.
- [4]赖晓芬.文化自信视域下非物质客家音乐文化发展研究[J].艺术品鉴,2022,(36):52-55.
- [5]陈捷.福建地方音乐的文化建构与旅游发展路径[J].黑河学院学报,2024,15(11):74-76+80.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Localization of Hakka Music:

Taking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as Examples

Xu Gaohan¹

¹*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Henan 471023,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birthplace of the River-Luo culture and the ancestral home of the Hakka people, Luoyang's historical culture, folk culture, music culture and other aspects were spread to regions such as Fujian, Jiangxi and Guangdong through multiple southward migrations, becoming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akka culture. Hakka music,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Hakka culture, has formed rich regional variations during long-term migr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ducting comparative studies on it holds significant cultural value.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racing the historical origin to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music culture of the River Luo region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cultures of Fujian, Lingnan and Ganpo. Further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differences of Hakka music in the Fujian, Jiangxi and Guangdong regions. The aim is to reveal the uniqueness of Hakka music in the three regions and its formation mechanism,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akka music.

Keywords: River-Luo culture; Hakka music; Historical origin; Comparative study

清代雅集绘画中的女性形象视觉呈现

张如心¹ 池海营¹

(1. 淮北师范大学,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 传统雅集题材绘画多以文人雅士的活动为表现对象与主题。明末清初, 描绘女子闺阁活动的题材绘画开始出现并逐渐兴盛, 这一类作品的图像多表现当时皇室或者大家闺秀聚集一起吟诗作赋、观画鉴古与游园赏花等活动。不仅是古代女性活动记录的重要载体, 更是以图像的形式直观地再现清代女性的生活状态、艺术追求以及社会审美意趣的趋向。

关键词: 雅集; 女性; 图像

基金项目: 2024 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清代雅集题材绘画研究” 项目编号: AHSKYY2023D04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5

明清商品经济繁荣促进了城市文化生活的兴盛, 生活的富足带动了园林活动的兴起。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集中代表, 由建筑、山水、草木等组合而成的综合性审美场域, 不同于大自然的野趣之美, 中国古典园林中自然风景的构建, 主要是以筑山、理水和布置草木来实现, 即通过有意识地加工、裁剪、调整和改造来呈现一个高度概括化、浓缩化的自然^[2]。清代时期出现大量的文人园林正是清代隐逸文化与专制制度之间妥协于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3]。文人士大夫们的隐逸情怀源于对世俗纷扰的厌倦和对自然本真的向往, 于是纷纷热衷园林雅集、吟诗品茗等雅集活动。同时, 女性也逐渐参与到这一类的文化艺术活动中, 她们或诗画鉴赏, 或游园赏花等文化活动, 相关绘画作品成为记录女性生活、艺术追求与审美趣味的重要载体, 生动展现了清代女性的文化参与和艺术风貌。

一、清代雅集题材绘画时代背景

(一) 雅集题材绘画图式

明清时期文人雅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休闲与社交形式, 其活动之兴盛催生了以图像叙事为载体的雅集图绘画创作活动。这类题材绘画对于画家本身有着极高的文化与艺术修养要求, 不仅需在有限画面空间内平衡各个文人动态与外貌特征, 更要通过形貌刻画传达出不同历史时期雅集的文化活动特征与其内在的精神内涵, 明代画家谢环(1346 年—1430 年)的《香山九老图》(图 1) 绢本, 设色, 长卷, 纵: 29.8 厘米, 横: 148.2 厘米。画中九位老者呈环形布局, 通过树木建筑分隔空间, 人物错落其间。全卷以石径串联厅堂假山等景物, 构成有机整体, 人物聚散有致、形态各异。群像式的写照成了清代雅集题材绘画创作较为固定的图式结构。



图 1 香山九老图

作者简介: 张如心(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绘画技法与创作语言;
池海营(1981—),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绘画创作与理论。

（二）文化艺术发展需求

雅集作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经典的文化艺术活动，在传统文化艺术传承与接受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积极融入汉文化，鼓励宫廷贵族也参与其中，同时将文人雅集符号转化为文化态度与权力展示。如清代乾隆皇帝就多次命宫廷画院创作此类题材的作品。如命意大利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年—1766年）与中国宫廷画家共同创作绘制《弘历观画图》（图2），纸本设色，纵：136.4厘米，横：6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利用经典的图中图的构图方式，表现乾隆皇帝弘历欣赏《洗象图》的情景。作品中乾隆皇帝形象由郎世宁绘制，采用西方写实手法，松柏翠竹、坡石杂草，中国绘画笔墨之皴勾点染。中国传统笔墨调和与西洋技法融会贯通，将东、西方绘画艺术风格呈现在同一幅作品中，丰富了绘画创作的表现形式，艺术与市场的互动催生了雅集图创作的商品化倾向，在市场驱动下，雅集绘画逐渐程式化与世俗化。



图2 弘历观画图

二、文人雅集与“闺阁”聚会

（一）晚明闺秀文学团体的兴起

明末清初女性群体开始挣脱传统束缚的枷锁，为清代女诗人群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她们以诗抒怀，并使所作之诗走出闺阁之外。起初还是家族内部的文学交流，最后发展到出现跨区域的文学诗社。家庭内部文学交流活动空间选在私家园林，如祁彪佳（1603年—1645年），绍兴府山阴县梅墅村人，他的妻子商景兰（1605年—1676年），字媚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时期她被记载的园林活动只有小酌于降雪居，晚悬灯山中，或者坐小亭看落日晚霞等^[4]。清中期女性诗社的发展呈现出异地结合乃至跨省的趋势。北京女诗人顾太清（1799年—1876年），名春，字梅仙与杭州的沈善宝（1808年—1862年），字湘佩，号西湖散人，等人创立了“秋红吟社”，从其成员来看该诗社无疑具有全国性的色彩。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得女性的创作与交流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或邻近的闺友之间。

（二）闺秀雅集活动

从传统仕女画或美人画题材来看，女性雅集活动的盛行也更新了绘画中女性活动的范围。清初陈枚（约1694年—1745年）《月曼清游图》册，绢本，设色，每开纵：37厘米、横：31.8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陈枚以每月的气候变化为背景，描绘了宫女们随其女主人在庭院内外的游赏活动，图3、4就可看出闺秀们有秋千这一娱乐项目。明清时期游赏之风的盛行，以及女性文学结社的涌现，相较于传统园林活动则是较少有秋千的出现，随之增加的是女性读写形象。



图 3、4 《月曼清游图》册

（三）《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的图像呈现

早期雅集图中的女性形象多为画面的辅助元素出现，排除于雅集文化活动之外的次要地位。明朝开始，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一些女性已开始参与到具体的文人社交活动之中。如明代画家尤求《西园雅集图》，纸本，立轴，水墨，纵：106.7 厘米、横：31.8 厘米，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元男性所组成的圈子已被打破，画面（图 5）中一名观书者坐在桌角边，身体朝向外侧，已远离这一男性圈，只是头转向内侧，保持着与圈内联系。与元画不同的是，明画中的苏轼不是坐在离另一观书者近的一边，而是坐在了离女奴近的一边。在宋至明漫长的历史中，画中女性经历了艰难的磨砺终于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至清代她们又从局内走向局外自成一局，实现了历史的转变。



图 5 西园雅集图

明清文化史中对于女弟子的概念，特别是以袁枚“随园女弟子”为代表的现象，确实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呈现出女性参与文学创作的活跃态势。《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卷》纸本设色、纵：41.0 厘米，横：308.4 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是展现清代江南诗学理论家袁枚（1716 年—1798 年）招收、提携女弟子的群体肖像，这是一次女性真正独立意义上的雅集画卷。从画后的题跋中（图 7）我们可以得知，此图记录的是两次湖楼诗会。第一次湖楼诗会后袁枚请尤诏和汪恭二人合写了此图前半部分，并亲笔题跋，详尽记录女弟子的姓名、身份和姿态，第二次诗会后又请其好友崔君补画三位女弟子。画中的女弟子生于名门世家，一门之内，自相诗友，嫁佳偶良婿，尽闺房之乐，伉俪之笃，德才兼备，身守闺范，操行贤明，博学多闻^[6]。

湖楼请业画卷（图 6、7）以右端的远山和湖面起始，两位女子相携前来赴会。一列石阶将她们引向花园内，

那里三位女子正在梧桐树下奏琴、听琴。再往前展卷就到了构图的中心部分，几位女子现身于硕大的湖石和芭蕉之间，或举笔在蕉叶上题字，或围案阅书画。一座小桥和两位女子把观者引向画卷的最后一段，以山坡前的亭阁结尾，袁枚本人坐于阁中桌后，一位女弟子在旁边观看。根据与会者之一孙云凤（1764年—1814年），浙江仁和人，字碧梧，号春岩女，袁枚女弟子，在《湖楼送别序》中的描述，女弟子们携诗画赴会，在宝石山庄之湖楼拜袁枚为师，并请其授业诗文。她们的诗作由袁枚集成《湖楼闺秀十三人送行诗》册。题跋处则为补画的三位女史。此幅画的构图与《西苑雅集图》《杏园雅集图》等男性雅集类的绘画作品构图安排极为相似，这种视觉方式的记录，让我们有幸见到清朝盛世之中女子集会的盛景，青山秀水、闲情逸致。



图 6、7 湖楼请业画卷

三、清代闺秀雅集题材独特的审美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展现生活诗意

闺秀雅集题材绘画主要展现了女性独特的文化社交活动，通过品茗、赏花、观画与鉴古等场景，呈现出与传统雅集不同的审美风格。两者活动内容表面上相似，甚至有模仿之嫌，但相较于传统雅集绘画背后隐喻的文化与政治背景，有本质区别。如《兰亭雅集》中体现的文人士大夫的抱负，或《西园雅集》暗含的士人政治理想。闺秀雅集题材绘画则更倾向于对女性日常生活与审美意趣的诗意化表达，展现了传统深居闺阁的文化女性生活的精致与温情。在古代封建传统的视角下，这一类独特题材的绘画，既是对女性闺阁生活与文化意趣的描绘与真实再现，亦是对传统政治文化与世俗认知框架的某种冲击。女性作为活动主体出现在绘画作品中时候，她们的形象已在象征层面争取着文化话语权。闺秀雅集题材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的艺术语言，揭示了清代女性如何在规训与自我表达之间寻找平衡，既顺应社会框架，又拓展了文化领域的女性存在。

（二）促进女性社交与意识觉醒

明清以来文人雅集唱和或者结为文学团体的行为非常普遍，不仅在文人之中蔚然成风，甚至江浙等富足地区的一些知识女性也逐渐迈出了由个体吟咏到群体唱和的重要一步，催生了女性文学艺术活动的繁荣，甚至出现男性收授女弟子的现象。相较于前朝，明清时期的女性画家也开始崛起，明清女性在绘画作品中逐渐有了独立成像的权利，而在此之前女性肖像大多出现在群像之中，或者作为陪衬出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画像之中。这个时期虽无法摆脱完全男性的审美框架，女性艺术的发展和社交范围较前朝来说是一大进步。这使清代女性画家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作品数量上，都超过历代女性画家及作品的总和。笔墨丹青就像一面镜子，她们通过绘画映照出自然万物，也映照出自己的情感世界。闺秀雅集题材的绘画中女性或品茗论艺，或吟诗作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与社交活力。

中国古代女性画家确实是一个并不被重视的群体，但这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那个漫长的对女性禁锢的时代问题。

（三）为古代女性生活史研究提供新视角

雅集题材绘画,为研究清代女性心理和社会角色提供了更加直观的图像材料和视角。历史多以文字记载,而绘画作品以图像的形式出现,不仅能够为文字进行佐证,作为视觉史料更能详细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雅集中,女性通过创作诗词、参与讨论,展现了独立思考和自我意识,可以说雅集是才女们扩展交际圈、愉悦心智情感的重要活动。蕉园诗社的女性成员通过诗歌抒发自由、平等的向往。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清代女性在思想层面的进步,传统历史文献中,女性活动多由男性书写,往往呈现程式化的道德叙事,而雅集绘画则通过图像细节,直观展现了女性的真实生活场景与文化实践。闺秀雅集题材作品不仅丰富了古代生活史的史料类型,更推动研究者从性别、空间、物质文化等多维度,重构更为真实的女性历史经验。同时,也为当代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结语

清代雅集绘画中女性题材与元素的大量涌现,既是对传统文人审美的延续,也是社会性别秩序与艺术表达交织的产物。在一部分女性图像构成的美人史中我们见到古代女性身上无形枷锁,也见到冲破束缚的先驱力量。通过对这些视觉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窥见清代女性在艺术中的多重面向,她们既是文人雅集的风雅点缀,也是有限度参与文化创造的个体。在男性主导的雅集绘画中,女性往往被塑造成符合士大夫审美的“才女”形象。这样的表达,一方面肯定了女性的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却将其限制在男性凝视的框架内,使她们成为文人理想中的点缀,而非真正平等的参与者。园林在画面中既是物理场所,也是象征系统它既代表了女性被规训的内闱边界,又因其精巧的造景布局而成为她们拓展精神世界的载体。这种“微观山水”的营造,与男性文人“寄情天下”的山水画形成有趣对照,彰显了性别化的空间认知差异

参考文献:

- [1] 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2] 付林鹏.古代游园会的风趣[J].人民论坛,2024,(19):110-112.
- [3] 刘燕.清代画论中的园林观研究[D].天津大学,2014.
- [4] 宗琮.林下风致晚明至清中后期闺秀雅集的发展及园林文化[J].紫禁城,2023,(05):89-115+88.
- [5] 胡雯婕.明清传奇性别空间书写研究[D].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24.
- [6] 王怡.《湖楼请业图》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15.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Images in Qing Dynasty Gathering Paintings

Zhang Ruxin¹, Chi Haiying¹

¹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paintings themed on elegant gatherings predominantly centered on the activities of scholars and literati as their objects and themes of expression.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paintings featuring the activities within women's boudoirs started to emerge and gradually gained popularity. The imagery in such works mostly portrayed activities such as imperial women or ladies from prominent families gathering to compose poems, appraise paintings and antiques, and take strolls in gardens to admire flowers. These artworks not only functioned as crucial records of the activities of ancient women but also directly reproduced, in pictorial form,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tistic aspirations, and the inclinations of social aesthetic interests of Qing Dynasty women.

Keywords: Yaji; Female; image

邓散木书学思想探赜

雷鼎¹

(1.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 邓散木(1898-1963)作为中国近现代书坛巨擘,其艺术实践与理论建构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书法篆刻发展轨迹。本文以其诗词创作、独特审美情怀与美学思想为核心,结合其广泛而深入的书家交游,力图多维度还原其艺术精神全貌。研究表明,邓散木诗词是其艺术心灵的直接映照,承载着“大俗大雅”“胆敢独造”的审美追求;其美学思想以“书印同源”为基础,强调“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辩证发展观,崇尚自然天趣与雄浑奇崛的融合;而与齐白石、白蕉、钱瘦铁等艺术家的深度互动,则深刻塑造了其“北骨南韵”的独特艺术品格。邓散木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技法层面的融会贯通,更在于其以独立人格与开放视野为现代书学注入的精神活力。

关键词: 邓散木; 书学思想; 诗词美学; 审美情怀; 书家交游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5

一、 绪论

被文艺界赞为“北齐南邓”的邓散木先生,在书法、篆刻、诗文等领域的全面才能与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他原本就叫菊初,他的别号是芦中人、无恙、粪翁,其出生地为上海,其艺术生涯从民国的动荡岁月跨越至新中国初期,在真书、行书、草书、篆书各书法字体及篆刻方面皆达化境,风格独特繁复,影响深远。实施对邓散木的研究,长期以来多把关注点放在其精湛的技法表现与形式剖析上,又或者去梳理他的生平事迹,支撑其绚烂艺术创造力的深层精神构造——寄寓于其诗词创作中的审美意绪、系统性的美学认知,以及其跟同时代重要艺术家互动融合而形成的思想场域,依旧有待深入探究。

本研究试图打破单一技法研究的局限,把邓散木的诗词文本当成心灵解码的密钥,深入分析其特有的审美情怀;系统诠释其以“书印同源”为核心、奉行自然与雄浑并举的美学思想;整理其与齐白石、白蕉、钱瘦铁等关键人物的交际网络,研究这些互动对其艺术观念形成与风格塑造方面的深远意义。从这三个维度入手开展研究,立体化呈现邓散木艺术精神的完整样貌,揭示其在传承传统精华的同时怎样开展,靠着强烈的个性与时代认知,为现代书学开辟全新路径,进而更清晰地把握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其艺术精神”的现实意义。

二、 诗为心画：邓散木诗词中的审美情怀

邓散木的诗词创作并非文人非核心的余事,而是其艺术精神与生命体验的直接流露,于其《三长两短斋印话》和大量题画、论艺诗之中,清楚地展现出他独特的审美追求与狷傲人格。

邓散木把“粪翁”当作自己的斋号,实际上是他审美情怀的极致彰显,这并非仅仅是表面化的恶俗趣味,而是对传统雅俗观念展开激烈挑战与深度反思,其诗云:“解秽还凭真力量,扫除齷齪见清虚。”这句直接点明了“粪”表象背后的精神实质——打着最“俗”的名号,做最“真”的事,追求清除陈腐、回归本真的艺术理念。他大胆地将市井俚语、日常俗物融入诗与印里,仿若咏赞“夜壶”、题款“厕筒楼”,正是践行了其“大俗即大雅,至丑近至美”这一审美辩证法,这种对“俗”的积极接纳与升华,是对传统文人画那种随意挥洒、脱离现实趣味的一种纠正,含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以及对艺术生命力的执着追觅,是其“胆敢独造”精神在审美格调里的体现。

“胆敢独造”的四个文字,可认定为邓散木艺术精神的核心宣言,其《论印绝句》里面说道:“六书缪篆费经营,金薤琳琅布白匀,可奈时流好奇尚,胆敢独造始通神。”这不只是对篆刻创新的一种主张,更是其整个艺术探索历程的写照,他反对那种亦步亦趋的模仿做法,着重在深耕传统,基于“费经营”“布白匀”的基础所做的独造。“胆敢”这两字眼,拥有着看低流俗的勇气与自信,“独造”展现出其艺术创造的独立意义,这种精神在他的诗词里面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洒脱不羁的个性:“我自有我在,古人何为者”,其诗词的风格恰似他的书印风格,偶尔雄浑纵放,或辛辣戏谑,或朴实深沉,几乎不见陈词滥调,携带着鲜活生命力及批判精神。

作者简介:雷鼎(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

处于国家民族的危急关头，邓散木的诗词绝非只局限于艺术的特定范围，其作品内弥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朴实的家国情怀，他亲眼看到山河破碎，愤而作诗：“忍看舆图换稿，泪洒新亭。”他借咏物来倾吐心中情怀：“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扫却中山兔…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豪迈的话语里蕴含着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与变革的迫切渴望。就算在新中国成立的这个阶段，其诗作同样有关心民生、赞颂新气象的篇章，反映出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精神的继续传承，这份深沉的入世情意，是其艺术雄浑气势的关键精神源头，让他的作品跳出了单纯的技艺范畴，展现出历史的厚重质感。

邓散木产出的诗词，是其人格精神的艺术化表露，是其审美理想的诗意陈说，从这里我们清晰地发觉一位在雅俗辩证当中寻求突破、以“胆敢独造”为旗帜凸显个性、心系家国满怀忧患意识的艺术家形象，这为其别具一格的书风印格打下了坚实的精神根基。

三、书印同源：邓散木的美学思想

邓散木的艺术实践以对书法与篆刻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为根基，形成了既系统又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其核心可以归纳为“书印同源，艺道相通”，“书画同源”的概念早就存在了，邓散木更着重宣扬“书印同源”，且亲身去实行，达到极高的水准境界。他认为书法乃篆刻的基础，篆刻是对书法的升华与凝练，其美学思想的核心聚焦于，笔体现的意即刀体现的意：篆刻应朝着“笔情墨趣”去追求，刻刀要像毛笔一样，表现出书写时的提按顿挫、轻重缓急、干湿浓淡，其印章的边款一般以行草书刻成，全面展现了毛笔书写的艺术神韵，是“书印同源”最直观的例证。

印从书出，书以印验：他倡导篆刻的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需扎根于深厚的书法功底，尤其要有篆书的功力，他觉得去探究古玺汉印的章法、线条、气息，又能够反向滋养书法，提升其空间构成感与金石韵味，其篆书作品结构既严谨又生动，线条雄劲且饱含弹性，既包含书写性又含金石感，刚好是“书印交融”的典型。“金石味”跟“书卷气”实现统一，邓散木力求在印章里展现书法的流动美感，使书法蕴含印章那种古朴浑厚，尤其是大字类作品，像对联、招牌大字，点画宛如斧凿刀削，带有明显的金石力度；而其精工打造的元朱文印，线条显得圆润又顺滑，呈现书写的韵律魅力，这种相互的渗透跟交融，冲破了书与印的界限束缚。

邓散木艺术思想里满是辩证色彩，他极其看重传统，针对古文字学、历代碑帖、古玺汉印下过一番苦功夫，觉得“传统堪称为源头活水”，其《篆刻学》对印史、印论以及技法展开了系统梳理，足见其基础十分扎实，但他坚决反对拘泥于古代模式不知改进，给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知名论断：学习古人的核心要点，但不能背离时代精神内涵，要给传统赋予新的生机。其篆刻技艺虽借鉴秦汉之法，但章法一般大胆开合，疏密对比极大，文字处理灵活呈多变，带有显著的现代构成之感，当下杜绝相同流弊：追求创新，但切不可陷入时风流弊的陷阱，他的创新是在深厚传统功力之上自然衍生的，其“胆敢独造”并非胡乱瞎搞一通，既带有二王、张旭、怀素的风格影子，又把北碑的雄浑气势以及篆隶的古拙风格融入，构建起别具一格的面貌，恰为这一理念的完美说明。

于邓散木的审美理想里面，包含着看似对立实则统一的两个维度：自然天趣：他赞同艺术创作应类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反对矫情造作、刻意摆弄，这体现出其行草书的洒脱挥洒，篆刻里线条展现的“写意”属性，以及布局的随机拓展，他认为所谓最高境界就是“无意于佳乃佳”，令情感跟功力自然地表达。雄浑奇崛：另一方面，邓散木的艺术体现出很强的视觉张力和别样的个性锋芒，谋求达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样的雄浑气势，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崛成效，他留下的大字书法，结构险峻却又平衡；线条实重苍凉，章法开合雄浑，呈现出强烈的震撼力度。

他把“自然”视为内在产生的本源，把“雄浑奇崛”看成个性与力量的外展，其佳作一般在看似随意的挥洒状态中蕴含着精心架构的张力，在强劲的视觉冲击里流淌着自然的韵律，进入“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层次，邓散木的审美思想，以“书印同源”为基本依托，把“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当作方法论，以“自然天趣”与“雄浑奇崛”辩证统一的关系为审美理想，造就了一个包含内在逻辑的完整整体，给其艺术创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明确的方向指引。

四、嚶其鸣矣：邓散木的交游

邓散木艺术创新凭借群体智慧之力，其艺术交际既宽泛又深入。齐白石和邓散木艺术主张高度一致，分别提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和“胆敢独造”，皆把创新当成创作的核心内容。北齐南邓”依地域得名，既因为二人艺术活动分属京津与沪上，也反映出艺术精神内核相互呼应、特色彼此补充。邓散木坚持“俗雅通融”艺术思想，把民间俗语刻入印章，赋诗赞美夜壶；齐白石画白菜、虾蟹散发生活韵味，二人艺术创作都从民间和生活中挖掘素材，共同提升了“俗”在艺术领域的审美价值，他们个性鲜明，积极突破世俗认知的界限。

邓书印以丰富的学识打造雄强奇巧的印风，既具金石之苍劲又含文墨的典雅，倾心于“极致刻画后回归自然”的深沉意境；齐画印展现出天真随性的特质，笔法凝练且有光彩，带有幼儿视角与泥土本色，反映齐氏美学“似与差异”的辩证理念，这种差异实际上呈现出“北骨南韵”的辩证关联，也可总结成“北朴南奇”的协调联系，给现代中国艺术增添了多样化的表现力。虽然双方直接交流的记载留存较少，但在艺术理念上相互呼应，且对彼此的创作成果极为赞赏，使“北齐南邓”成为艺术界的时代典范。

作为近代艺术要地的上海，邓散木和几位杰出艺术家关系紧密，彼此借鉴十分到位，白蕉书法源自二王帖学体系，行草书写起来洒脱自然，呈现出超逸简洁的艺术风貌，被叫做当代二王，邓散木和白蕉交往频繁，常交流书法方面的感悟，邓散木的艺术有雄浑的气势，却非常推崇白蕉书法中的晋人韵味，这种交流使得邓散木既追求雄浑奇崛，又注重线条的精细刻画和神采表达，他笔下充满活力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设计，体现出对帖学核心技法的学习和掌握，两位书家刚柔相济，一个苍劲挺拔一个柔美温婉，充分展现海派书法的多样水平。

钱瘦铁：邓散木跟钱瘦铁艺术偏好高度一致，都偏爱雄强刚劲的风格，都有着“突破常规”的创作魄力，钱瘦铁是书法、绘画、篆刻全能大家，尤其精于篆刻与山水画，运笔刚健老到，他们的篆刻创作均源自吴昌硕艺术体系，却又各自走出新方向，钱印呈现出充满野趣、苍茫质朴的模样，邓印以雄浑示人，奇特中藏章法。两人艺术理念高度契合，交流既直接又具内涵，相互认可成为艺术创新的推动力，他们与来楚生、马公愚、潘天寿等海上名家往来密切，携手促使海派篆刻“写意雄强”流派成熟，打造出富有活力的艺术交流圈。

吴昌硕：作为海派艺术的标志性领袖，吴昌硕“金石气”满满的艺术风格对邓散木影响十分巨大，邓散木十分敬重吴昌硕，深入剖析其书画印艺术内涵，吴氏以石鼓文笔法融入书、画、印创作里，引领了一代新的风格走向，邓散木接续并强化了此般“金石气”，其书法凸显苍劲厚重样，篆刻线条的古拙浑实，皆可看出缶翁遗风。但邓散木的气息更凸显“奇崛”与“生辣”的特质，少了一点儿缶翁的圆融含蓄，更多了些显露锋芒的个人特质，在精神实质里更靠近其“胆敢独造”的主张。

邓散木在和好友的交游期间，通过交流、学习、比拼与反省，得以一直汲取营养，最终聚合百家亮点，独具特色的“北骨南韵”风格，正是这种广泛沟通与深度借鉴的成果。

五、结论

邓散木先生以其短暂而辉煌的艺术生涯，在中国近现代书法篆刻史上矗立起一座孤峰。通过对邓散木诗词、美学思想及其广泛交游的深入探讨，其艺术精神的立体图景得以清晰呈现。

参考文献：

- [1] 高维婧. 邓散木创新求变的篆刻艺术特色[J]. 艺术大观, 2024, (20): 101-103.
- [2] 沈忱. 民国时期篆刻教材研究[D]. 南京艺术学院, 2024. DOI: 10.27250/d.cnki.gnjyc.2024.000160.
- [3] 张艳芳. 邓散木书法教育思想研究[D]. 山西师范大学, 2020. DOI: 10.27287/d.cnki.gsxsu.2020.000264.
- [4] 闫恩双. 浅析邓散木的篆刻[J]. 书法赏评, 2021, (02): 78-80.
- [5] 罗柳廷. 邓散木书法研究[D]. 曲阜师范大学, 2019. DOI: 10.27267/d.cnki.gqfsu.2019.000055.
- [6] 谭金丽. 邓散木书法艺术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18.
- [7] 梁鸿. 二十世纪京津文人书画家研究[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07: 328.
- [8] 林立. 论邓散木篆刻风格的生成[D]. 中国美术学院, 2018.

An Exploration of Deng Sanmu's Thought on Calligraphy

Lei Ding¹

¹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Abstract: Deng Sanmu (1898-1963), as a gia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calligraphy worl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alligraphy and seal carving in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his artistic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is poetry creation, unique aesthetic feelings, and aesthetic ideas, combined with his extensive and in-depth literary connections, striving to restore the full picture of his artistic spiri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Deng Sanmu's poetry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his artistic soul, carrying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great vulgarity and elegance" and "daring to create independently"; Its aesthetic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ooks and seals share the same origin", emphasizing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concept of "different problem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advoc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al charm and grandeur; The deep interaction with artists such as Qi Baishi, Bai Jiao, Qian Shoutie, etc. has profoundly shaped their unique artistic character of "Northern Bone and Southern Charm". Deng Sanmu's artistic achievement lies not only i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iques, but also in the spiritual vitality injected into modern calligraphy through hi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open vision.

Keywords: Deng Sanmu; Book learning ideology; Poetry aesthetics; Aesthetic sentiment; Bookish friendships;

渡边金一的拜占庭研究

唐剑文¹

(经济学研究科, 一桥大学, 东京都 日本 186-8601)

摘要: 日本拜占庭史学家渡边金一是日本拜占庭学的先驱者之一, 虽然与斯人活跃的时间相比, 中国、日本以及世界拜占庭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渡边氏对该史学领域的探索以及史学方法的建立, 在今日仍具参考价值。本论将从三个方面介绍渡边的史学思想。第一个部分里, 我们将分析渡边视角下国际学界拜占庭封建论争的状况, 并介绍他在日本国内参加的立论和论争; 随后, 我们将探究渡边对苏联拜占庭研究的译介情况; 最后, 我们将关注他在中晚期提及的比较史的看法, 结合周边学者的观点探讨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比较可能性。通过渡边金一的拜占庭研究及其周边的关注, 其史学实践也可为我国罗马和拜占庭史学提供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 渡边金一; 日本拜占庭研究; 拜占庭史学史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7

渡边金一 (1924-2011) 是日本拜占庭史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在整理和吸收欧语先行研究的同时, 清晰地整理了 20 世纪前半的拜占庭封建制论, 提出了独到的比较史学的观点, 并有许多重要译著传世。笔者将以下面的顺序, 分别讨论社会经济史视角下渡边氏的中世纪罗马帝国论的三个特征。第一个部分里, 我们将回顾封建制这一用于的史学史背景, 分析渡边氏视角下国际学界拜占庭封建论争的状况, 并介绍他在日本国内参加的立论和论争; 随后, 我们将结合俄文文本, 探究前苏联的拜占庭史学对于渡边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译介情况; 最后, 我们将关注他在中晚期提及的比较史的看法, 结合周边学者的观点探讨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比较可能性。虽然与斯人活跃的时间相比, 世界拜占庭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 但渡边氏对该史学领域的探索以及史学方法的建立, 在今日仍具参考价值。笔者希望, 通过对渡边金一的文本的史学史和思想史的诠释, 不仅引起中文学界对这位史家的思想方法的关注, 同时也能为国内拜占庭研究乃至中世纪史学研究起到对照参考的作用。

1: 渡边参加的拜占庭封建制论争: 国际学界和日本学界

封建 (feodality) 或者封建制度 (feodalism) 可以说是 20 世纪的中世纪史学界最泛用, 同时也最有争议的词汇之一了。作为同受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明影响, 与西欧社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相类的东罗马帝国, 关于其社会经济类型的讨论在上个世纪也曾是一个热点问题。在上述一桥大学中世纪欧洲史学的学术背景下, 渡边金一作为日本第一代拜占庭学者, 其所处时代不仅让他亲历了这场论争, 进行了辛勤的写作和翻译工作; 同时与日本学者也磨错砥砺, 进行了关于拜占庭的很多讨论。本章将从这个角度切入渡边氏的史学书写, 试图向中文读者介绍渡边所见的世界和日本学界的拜占庭封建制论争。

1.1: 渡边对世界拜占庭学界的论争的评述

渡边介绍封建制的两篇重要文章, 即为收录在主著《拜占庭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一部分“拜占庭封建史论”中的两篇论文《拜占庭封建制诸问题: 论争的展望》(初发表于 1965) 《于拜占庭帝国的封建制问题: 一个试论》(初发表于 1960)。渡边采择法语、德语和俄语学界诸说, 为我们详细呈现了上世纪拜占庭封建制论争的学术思想像; 并关注拜占庭村落共同体的实际面貌, 讨论了大土地所有、不输不入特权 (immunitas) 和普罗尼亚制 (pronoia) 等问题。以下, 笔者将结合渡边的其他相关论著、所引文献以及当代已有的拜占庭经济史研究成果, 介绍并重新审视渡边的拜占庭封建制的讨论。

作者简介: 唐剑文(1997—), 男, 一桥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拜占庭经济史和中世纪经济思想史。

拜占庭封建制论有两个基本问题是绕不开的：其一是“精神面”上，与“西洋封建理念”相对的拜占庭“皇帝理念”的问题；其二则是“物质面”上，拜占庭自身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根据渡边的介绍，20世纪的封建制论争中，法国学者勒梅勒（Paul Lemerle, 1903-1989）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德尔格（Franz Dölger, 1891-1968），前南斯拉夫的奥斯特洛格斯基各自从这两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勒梅勒虽然不排斥拜占庭的大土地所有现象，但毋宁更强调国家统治主义或者财政至上主义（fiscalité）的优势地位。根据渡边的理解，勒梅勒从多个方面拒绝将拜占庭一概地归入封建制的范畴。后者根据11世纪的Strategikon认为，政治上存在处于拜占庭皇帝和哈里发之间的国境地区的独立土地所有者，他们与拜占庭皇帝之间显然不是我们理解的双向契约（zweiseitiger Vertrag）下的封建制；从社会经济的实态来看，普罗尼亚制（pronoia）和忒拜的土地台账各自证明了军事封土制和自由共同体的存在，并非典型的西欧封建制。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德尔格（Franz Dölger, 1891-1968）强调拜占庭不同于封建的皇帝理念，也就是说一切土地所有皆出自皇帝的恩宠。不过他认为随着如伯希蒙德等诺曼人与拜占庭帝国的交流，促使拜占庭皇帝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他们的习惯而与他们缔结了类似的契约。同时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基础意义上的大土地所有制带来的导入封建制度的可能性，也绝不能过小评价。南斯拉夫的奥斯特洛格斯基则更倾向于接受一个广义上的封建概念。他认为在西欧之外的拜占庭也存在基于大土地所有以及，在这种土地上居住和耕作的隶属农民。他倾向于缝合渡边提到的封建理念和皇帝理念的间隙，提出这样的佃农一定程度上是隶属于国家的农民（demosiarioi paroikoi）。此外，渡边的两篇论文中介绍的苏联史家的问题，我们留待本文第2章介绍。

渡边也着手剖析了拜占庭的土地所有、免税和普罗尼亚制度等问题。根据渡边所说，拜占庭不仅有我们熟知的封建构型式的大土地所有者，还有自由农民形成的村落共同体。国家有一种保护小农而限制大地产所有者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外包税（epibole）和承认自由农民村落共同体的自我征收权利等。渡边运用法令、征税纲要和修道院保存的文献等实证性材料，详细讨论了和所谓封建制度最相关的免税和普罗尼亚制度两个问题。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拜占庭的修道院接受国家给予的定额年给（solemnia），同时需要缴纳土地税金，而这些税金即使有时候会被免除，也没有明文规定税吏不能踏入修道院的领地，与西欧的不输不入权（immunitas）不尽相同。普罗尼亚是11世纪一般来说因军功而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和征税权等的制度，而渡边认为，其中体现了等级秩序的重建和屯田兵（stratiorgoi），佃农（paroikoi）各自成为类似领主和佃农式角色的兵农分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推动了所谓的封建化。

1.2: 日本拜占庭学界的论争

由于封建制一词在上个世纪的广泛使用，封建制论争不仅像上面介绍的渡边论文的内容一样，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讨论；其相关诸问题在随后的日本的拜占庭学界也掀起了比较激烈的学界争论。上世纪70-80年代，渡边和日本的其他学者以书评和对书评的回应等形式，对于拜占庭史的诸学术问题进行了论争。其中包括渡边金一对米田治泰《拜占庭帝国》的书评、对井上浩一《拜占庭帝国》的书评以及井上对渡边书评的回应等。米田治泰（1938-1974）《拜占庭帝国》（米田）中不仅探讨了社会经济意义上作为当时潮流的封建制诸多问题，还对拜占庭官职制度和城市等做了深度研究。渡边在1978年为这本著作写的书评论文中在表达悼念之意的同时，也从学者的角度对于几个观点保留了自己的意见。比如，米田在讨论拜占庭的皇帝理念时，强调其作为君主的绝对性；而渡边认为虽然拜占庭的皇帝具有现世神（numen）的属性，但罗马法及公共事务（res publica）的理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关于米田举的一个13世纪的例子，即Moschopoulos所写的一本小册子Speculum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国民的忠诚义务（horkos politikos），同类似封建主从契约关系的对皇帝的忠诚义务（horkos basilikos）的对立；而渡边则认为两者毋宁说是相互调和的。此外米田在讨论他所称的拜占庭封建制中的有条件的土地保有的时候，列举了三种制度，即arithmos, charistikia和pronoia。不过渡边认为，要做到尽善尽美，应该加上更详尽的引用文献和相关法律的对照。

拜占庭学家井上浩一（1947-）对中文拜占庭学界而言并不算陌生的名字。例如，他提出的拜占庭断代观点等已被我国学者引用。渡边对于井上所著《拜占庭帝国》进行了四个角度的反论，即七世纪变革说，马其顿王朝专制国家和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十一世纪的所谓市民斗争，以及向封建国家的变化与皇帝理念等。井上的七世纪变革说认为，在七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而拜占庭建立，与此同时之前统一的地中海地区分成了希腊、罗马和东方三个文明圈。渡边则坚持认为，三者应该归于共同的古代末期。井上的文明圈思想上承汤因比的文明论，并与同时代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渡边显然更像在用一种布罗代尔式的整体视角观照整个地中海世界。质言之，二者体现了英美和欧陆两个史学流派在日本的一个缩影。二人有关这四个方面的论争

情况如下：井上认为，马其顿王朝实现了专制国家的确立，而渡边则认为皇权由于篡位者的缘故，社会阶层具有流动性不能用专制国家一言以蔽之。井上的反论中一方面认为社会流动性和专制主义没有关系，另一方面则承认自己的研究更加偏向静态。另外，关于市民斗争问题，即井上把 11 世纪发生的内乱定义为市民斗争的观点，渡边认为证据不足。最后，渡边和井上对于封建议题下的皇帝理念的观点不同。和上边的对米田书评一样，渡边认为理念上皇帝是上帝的代理人的同时，现实上罗马皇帝则需要由元老院、市民和军队三方选举承认；而井上则倾向于相信理念和现实二者毋宁说是不仅相互对立，还是相互妥协的。

从上边我们可以看到，渡边对法国、德国和南斯拉夫的诸多学者的封建制论做了精到的总括，并与同时期日本的拜占庭历史学者也进行了建设性的学术讨论。渡边对当时的拜占庭封建制这个话题的讨论有因循的一面，但他继承了一桥历史学方法，把拜占庭封建制当作一种理论的可能性，而非一种绝对的历史阶段；同时他对欧洲诸国研究的介绍，无疑在日本的拜占庭史学界乃至西洋史学界有开创之功。

2: 第十二届拜占庭学会和苏联拜占庭史学的介绍

中文学界最早系统介绍拜占庭通史的一本著作，应当是列夫臣柯的《拜占庭》。著者列夫臣柯（1890-1955）是彼得堡大学的拜占庭学教授，他在前言中直言，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从没有研究过拜占庭历史。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比他稍晚的一些苏联拜占庭史家开始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对广义意义上的 4-12 世纪的拜占庭史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学术贡献。作为他们研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1961 年在当时南斯拉夫的古城奥赫里德（Охрид或 Ochrid，今属北马其顿）召开的第十二届拜占庭大会上的联合报告《拜占庭的城市和农村》，也由渡边译为日语，并对渡边的史学观点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四位学者皮格雷夫斯卡娅（Н. В. Пигылевская）、利普希茨（Е. Э. Липшиц）、修究莫夫（М. Я. Сюзюмов）和卡日丹（А. П. Каждан）共同主报告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从奴隶所有者的社会构成到封建的社会构成的变化问题，拜占庭农民共同体问题，九到十世纪的（农民共同体）的变质和中央集权的封建地租问题以及十一世纪以后拜占庭社会的封建化问题。渡边第一论文中对这个主题报告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讲解。根据渡边的介绍，利普希茨认为 3 世纪是由奴隶所有者的社会到封建的社会的“真正的革命期”，4 至 6 世纪可以说是奴隶制的最后阶段，而到 7 世纪的内外动乱时，旧有的奴隶制秩序被清扫干净。利普希茨认为隶农（*colonus*）已经是封建的生产经营者，与后世的佃农 *paroikoi* 同列；而修究莫夫则仍将（*colonus*）归于奴隶制的序列。对于四世纪到九世纪的农民共同体，利普希茨认为四到六世纪大地所有者比起自由农民共同体来说占优势，六世纪以后则逆转过来；卡日丹认为七世纪是分水岭，之前有奴隶制残留，而七世纪之后的共同体内一成员对其他成员土地的权利和家族的土地所有制是两个重要特征；修究莫夫则认为七世纪以后的农民共同体伴随着更加明确的私有产权。9 到 10 世纪，上述的农村共同体变质，利普希茨认为这是拥有官僚和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制；卡日丹认为其向附属于国家的农民征收具有地租属性，应该称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地租；而修究莫夫则称拜占庭十世纪之前与日耳曼的马尔克共同体相类，应该称为“前封建制”，10 世纪之后的对国家义务应该属于国税而非封建地租。在 11 世纪之后，拜占庭的中央权力变得分裂，但关于此时的封建制的形式应当被认为是拥有西欧式不输不入权的，还是有拜占庭独自的特征，在苏联史学家中也众说纷纭。不过卡日丹的观点比较折衷，他认为由于拜占庭的国土均为皇帝所有，所以只有加入特权阶级的被免税者所持有的土地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领地。

上述苏联学者的主报告围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构成体论（*Gesellschaftsformation*）展开，而这次大会的副报告，虽然渡边没有一一译出，但也做了如下的介绍：本文第 1 章中介绍过的勒梅勒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补充，关注拜占庭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动力学，认为国家统治强化（*étatisation*）一词更能概括古代末期的情况，同时认为也不能简单将六世纪以后拜占庭和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性质简单类比。卡拉尼斯（Charanis）提出 7-8 世纪斯拉夫人在拜占庭境内的大量移民有可能是拜占庭境内的殖民政策。保加利亚学者安根洛夫（Ангелов）则补充了 13-15 世纪的封建化过程。渡边翻译了主报告中苏联学者对于都市乡村的社会经济的研究思路，与其他学者的副报告相对照，我们可以从这场会议中窥见上世纪拜占庭封建制的讨论。通过我们对渡边翻译业绩的介绍，也可以为参照俄语学界研究的拜占庭学者和史学史学者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3: 渡边论其他前近代社会经济：比较史的可能性

从上面渡边所绘制的拜占庭封建制论争的学术地图来看，虽然拜占庭和西欧因为共同的文化脉络而并非迥异，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皇帝理念和社会经济组织方面，拜占庭和西欧也有诸多不同。其实，认识到这一点，渡边金

一也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尝试扩大视野，对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比较也有涉猎。下面，笔者将从渡边的著作和译著中，寻找他所提及的更广泛的比较史学的可能性。

3.1: 拜占庭与中国的比较可能性

在1980年初版的岩波新书《中世罗马帝国：重新看世界史》中，渡边这样写道：

“以上我们在中世初期的地中海周边地域移动和定住的民族中，选择了日耳曼、阿拉伯两民族做了细致的比较……但……不考虑本章冒头部分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两种比较方法的第一种，也就是‘互相影响和共同起源’都无法想象的在中世初期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世界帝国：罗马—拜占庭帝国和隋—唐帝国之间的比较。”

我们很难否认中国和拜占庭之间绵延数个世纪的货币、商品乃至技术的往来；但这种往来交流多大程度上可以符合是布洛赫所说的第二种相互临近来往密切的情况，也很难妄下结论。不过，如果我们跳出布洛赫的方法论，比较史也不断被赋予更灵活的可能性。正如渡边所说渡边下边说的：

“……从古代继承的世界帝国理念、官僚机构的构造和运用、中央政府与地方行政组织的关系、文武官的对立、政治中宦官的重要作用、作为皇帝权力和大土地所有者之间争夺的对象的小农的命运等等，这些是另外应该探究的比较史的课题。”

这里渡边为后学提出的拜占庭同中国的比较领域，不局限于某个王朝，可谓是二者具有类似性的方面。对于我国读者来言，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在近代之前的社会经济一类的探讨，已有很多译介。例如增渊龙夫和西岛定生等。其中增渊为渡边在一桥大学的同僚，我们知道他一定程度继承和批评了顾炎武“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等观点，认为在社会意义上继承自春秋战国的“任侠”等因素，使得即使是秦汉郡县的下层组织也不能简单看作官僚机构。虽然我们在这里似乎也能看到封建制论争的回响。不过撰写《中世罗马帝国》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渡边似乎已经基本超越了只在上述史学概念范畴下讨论的中世史。

3.2: 拜占庭与阿拉伯世界的比较史

1988年，渡边和中东史学者加藤博共译的克劳德·卡昂《比较社会经济史：伊斯兰，拜占庭，西欧》出版。该书是卡昂的三篇论文，即《就封建制一词的使用的若干考察》《关于封建制论争》和《九到十三世纪伊科塔(iqtā')的发展》的合本。伊斯兰世界同样具有分封土地的制度伊科塔制，并有多种不同形式如税收伊科塔(iqtā' al-istighlāl)、所有伊科塔(iqtā' al-tamlīk)和行政区伊科塔(iqtā' wilāya)。但是如卡昂所言，阿拉伯世界的领主制度由于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征服等原因，伊科塔系统并不稳定，其封建世袭贵族也相对不发达。

在渡边的译后序《收敛的诸社会的比较史研究》中，渡边把经验地把握具体问题的中世史称作唯实论的立场，而把试图用封建这样的模型构造称为唯名论的立场。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卡昂对封建一词极其谨慎的使用在渡边看来也并非绝对安全。但渡边复述了卡昂有关“罗马帝国诸社会的后继国家群”“收敛”向一些共同的特征的观点，即在土地制度、人与人的关系、公权力的私的分割，以及军人阶层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共通性。随后，渡边认为卡昂用的将不同地方的历史进行比较作业的手法，即韦伯所说的基于客观的可能性(die objective Möglichkeit)中，通过改变一些历史事件中的条件而进行的结果比较。通过这样的方法，最后看来即使有很多的不同点，西欧、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可以说是“收敛”向了同一个坐标轴。但渡边此时也认为关于这个坐标轴是否可以称为是封建制度，还值得进一步的讨论。

上世纪末叶，渡边和加藤的译文可谓是从西欧之外的地中海经济社会的角度做了一个总结。尤其是渡边在书后的解说文，从日本学者熟知的韦伯理论的角度的给出了比较史的理论补充的同时同时，为上个世纪取得长足进步的日本的阿拉伯研究增加了来自拜占庭学者的视点。

结语

本文从渡边参加的世界和日本的封建制论争、苏联史学的影响和他对比较史的观点等三个方面，介绍了渡边的史学思想。他活用欧语文献，在译介中形成自己的社会经济史方法，并对跨文明的比较研究开放的态度。时至今日，渡边的弟子大月康弘仍以修道院文献为微观例证，解释拜占庭国家在帝国“慈善”理念下发展起来的再分配功能，拜占庭的社会经济史传统被传承下来，作为“西洋经济史”一部分的拜占庭社会经济史学科在日本也逐渐确立。对于渡边的史学成果和后继者的更深入的介绍，将成为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渡辺金一.ビザンツ社会経済史研究[M]. 岩波書店, 1968.
- [2] Watanabe, Kinichi. Problèmes de la féodalité byzantine. Une mise au point sur les diverses discussions[J].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 1965, Vol.5, No.1, Jan.; Vol. 6, No.1, Sept.
- [3] 大月康弘.渡辺金一名誉教授著作目録[J].『一橋論叢』第 100 卷第 6 号, 1988.:869-874.
- [4] Kazhdan, Alexander P. ed.. (1992).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 (=ODB)[M], Oxford. Volume 1-3.
- [5] 尹忠海.权贵与土地:马其顿王朝社会解析[M].人民出版社, 2010.
- [6] 李强.瓦西里二世 996 年新律译注[J].古代文明,第 10 卷第 4 期,2016 年 10 月:25-32.
- [7] 博客文章: ビザンツ史学史関連 PDF (3) 論争史, <http://shahr.secsaa.net/article/474027545.html>
- [8] 米田治泰. ビザンツ帝国[M]. 角川書店, 1977.
- [9] 井上浩一. ビザンツ帝国[M]. 岩波書店, 1982.
- [10] 渡辺金一. 米田治泰著『ビザンツ帝国』[J].『史学雑誌』1978 年 87 卷 4 号 : 506.
- [11] 井上浩一. ビザンツ史研究の課題 : 渡辺金一氏の書評によせて[J].『史学雑誌』1983 年 92 卷 7 号: 1215 (109).
- [12] 渡辺金一. 井上浩一著『ビザンツ帝国』[J]. 1983 年 92 卷 2 号 : 228 (92).
- [13] 陈志强. 拜占庭帝国史[M]. 商务印书馆, 2003: 7.
- [14] 列夫臣柯著, 葆煦译. 拜占庭[M]. 北京:三联书店, 1962.
- [15]ピグレフスカヤ他著, 渡辺金一訳. ビザンツ帝国の都市と農村— 4~12 世紀—[C]. 創文社, 1968.
- [16]渡辺金一著. 中世ローマ帝国[M]. 岩波新書, 1985: 142.
- [17]张绪山.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M]. 中华书局, 2012.
- [18] Detienne, Marcel. Comparing the Incomparable[M].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Stanford, California, 2008.
- [19][美]许天波著, 徐进译. 战争与国家形成: 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20]增渊龙夫, 吕静译.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译者序 pp.8-9.
- [21]Cl. カーエン著, 渡辺金一編訳, 加藤博共訳. 比較社会経済史—イスラム、ビザンツ、西ヨーロッパ[M]. 創文社, 1988: 68.
- [22] Wolfgang Schwentker. Max Weber in Japan[M].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8.
- [23]中村广治郎著,王立秋译.伊斯兰研究在日本[J].中国穆斯林,2020 年 10 月:84-86.
- [24]大月康弘. 帝国と慈善 ビザンツ[M]. 創文社, 2005.

Watanabe Kinichi and his Byzantine Studies

Tang Jianwen¹

¹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Japan

Abstract: Watanabe Kinichi is a pioneer of Byzantine studies in Japan. Although Byzantine studies in China, Japan, and worldwide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since his active period, Watanabe's exploration of this 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historical methodology remain valuable today. This article will introduce Watanabe's historiograph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In the first section, we will analyze the debate of Byzantine feudalism from Watanabe's perspective and describe the relating arguments in Japan. In the second section, we will explore Watanabe's translations of Byzantine studies in USSR. Finally, we will focus on his views on comparative history in his middle and late historiographic practice,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comparing Byzantium with the Chinese and Arabic world while in reference with the perspectives of surrounding scholar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atanabe Kinichi's research on Byzantium and relating fields, his historiographic practice may also provide certain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our 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

Keywords: Watanabe Kinichi; Byzantine Studies in Japan; History of Byzantine Historiography

时局与战略：石韞玉从征白莲教起义研究

孙铭泽 董粉和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乾嘉时期川陕楚地区的白莲教起义，给清王朝造成了重大打击。在平叛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清王朝暴露出在吏治、军队、民心、财政等多方面的问题，清剿屡战屡败。最终，在复杂的局势中，清王朝制定了有效的战略方针，完成了对白莲教的清剿和对王朝统治的维护。本文以清代苏州状元石韞玉在嘉庆三年（1798）至嘉庆九年（1804）的为官经历为研究中心，通过梳理石韞玉从征白莲教的始末，探究白莲教起义发展壮大、清军剿匪不力、清王朝战略摇摆不定的原因。同时，通过对石韞玉从征白莲教起义经历的分析，分析清王朝平叛战略的合理性，以及这一战略战术是如何被沿用到几十年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当中的。

关键词：石韞玉；白莲教起义；征邪教疏；坚壁清野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33

石韞玉（1756-1837），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举，五十五年（1790）考中进士，在殿试中被特拔置第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至嘉庆十二年（1807）告病归田，石韞玉历任翰林院修撰、福建乡试正考官、提督湖南学正、日讲起居注官、四川重庆府知府兼护川东道、陕西潼商道、山东按察使署布政使。嘉庆十二年（1807），部议革职。仁宗念其军功，赏给翰林院编修、国史馆行走。旋以足疾请辞归田。卒于清宣宗道光十七年（1837），享年八十二岁。

一、川陕楚白莲教起义

清乾嘉时期，在移民聚集的川陕楚毗邻地带爆发了长达数年的白莲教起义，“借宗教迷信之力号召徒众，潜蓄势力，为反抗清廷之运动，如白莲、红阳等教为数无虑十余。而白莲教会为尤盛，乾、嘉之际一再发难，风动五省，竭海内之兵力，逾十年而后定。”^[1]给清王朝造成沉重打击。

白莲教在川陕楚地区的流行是有原因的。首先，清中期以后，川楚地区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清代，是“湖广填四川”运动的高潮时期。根据学者曹树基建立的从顺治十年（1653）至1953年四川人口的变动统计表，四川人口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大约有231.6万口，在嘉庆十七年（1812）有2071万口。^[2]在一个世纪中，地区人口增长了近十倍。人口密度随之增长，人浮于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其次，清廷对于西南地区的控制较为薄弱，中央威慑力不足。另外，清廷吏治的腐败也造成了民心的流失。从地方到中央，官吏贪腐之事比比皆是。百姓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就是州县中的吏治情况。官员之间，节礼、生日礼、升迁调补私相勾兑之费，名目众多，都要从州县百姓身上搜刮而来。“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3]百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朝廷却无所作为。

四川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官逼民反的典型案列。据史料记载，四川官场的吏治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官吏对民众敲诈勒索的手段极其恶劣。尤其是以查拿邪教为口实，诬良为盗、颠倒黑白，乘机敲诈勒索、大肆搜刮。^[4]如达州知州戴如煌，私设衙役五千余名，并将这些衙役分发各地查拿白莲教，贪赃枉法、敛怨启衅以致民怨沸腾。当地白莲教教首徐天德、王学礼等，都曾被他拘押，刑讯逼供，直到勒索白银数千两，才得保释。

白莲教的教义和宣传迎合了移民们想要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故愚民陷焉。其伪造经咒犹未也。”^[5]白莲教的传教手段也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需求。“白莲教托弥勒佛降世，既持斋咒，兼用符篆，或天行疾疫，治以符篆，偶尔痊可，信从渐多。”^[6]普通民众，既在精神世界里需要信仰的支撑，也在现实世界里需要求生存的道路。白莲教的教义宣传很顺利地底层民众间铺陈开来。

作者简介：孙铭泽(1999—)，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董粉和(1964—)，男，学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科技史；

二、石韞玉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石韞玉熟读兵书,对军事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征邪教疏》中,对兵法的理解和运用十分熟练。嘉庆三年(1798),朝廷大考詹翰,题目为“征邪教疏”,即是为了广纳贤言,集思广益,更大范围地讨论白莲教的平叛一事。这次大考中,石韞玉所作文章如下:

臣闻陶唐御宇,征及有苗,蚩后兴师,战于甘野。自古帝王之治,不废师旅之谋者,盖以天生五材,金有从革之用;国重八政,兵佐司寇之刑。邦禁所垂,古今一揆。

近者六寓阜宁,四民安谧,生齿既庶,良莠不齐。楚、豫之间,遂有奸匪,倡为邪教,煽惑群愚。我皇上命将出师,屡加殄戮。而一二余孽,尚复偷生者,良以奸徒生长草泽,凭险负隅,出没无常,鸟聚兽散。我兵之攻守有常,而彼贼之窜逃无定始也。官兵在楚则贼窜于豫,官兵至豫则贼窜于秦,官兵至秦则贼又窜于蜀。近日,黔、楚二省苗逆荡平,官兵可以并力于蜀,而贼又有窜还豫、楚之势。所以剿之不能尽,追之而不能穷者,职此故也。臣闻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旷日持久,昔贤所戒。况今道里辽远,兵勇众多。刍米金钱,皆资转运。兵有拙速,不闻迟巧。诚宜设布方略,立加扑灭者也。方今贼匪聚秦、蜀之间,一闻官兵之至,则穷窜入山。稍有间隙,窥伺乡村,肆其焚掠。若就其所至而为之防堵,贼众东奔西逸,我兵赴之,是贼逸而兵劳也。所宜探其出没之踪,察其往来之巡。彼遏其前,此截其后。四路期约并进,务为一鼓而擒之计。兵法曰“胜兵先胜而后战”者,此也。再者,贼氛煽动,已经两载,乌合之众,岂无胁从?解散其党,亦非难事。诸将诚能割切著明,诱以自新之路,谕其从逆之非。豚鱼可孚,何况人类?若党羽既散,则渠魁自得。兵法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也。又,今贼目已有数人,奸徒争利,易生嫌隙。诸将若能相其机会,加之诱掖,诸贼必有起而相噬者,此亦以贼攻贼之计。因其相噬,我兵乘之,兵法乘瑕,此之谓也。至于山林相阻,宜用火攻,原野相遭,利于炮击。广设侦候,以求贼踪。慎选向导,以穷贼藪。贼若入山,则设伏以邀之。贼若薄城,则清野以待之。慎赏以劝勤,严罚以惩惰。诸将当能仰遵睿算,和衷集事,迅奏肤功,捷书之至,必在旦夕矣。臣谨疏。^[7]

石韞玉的《征邪教疏》大概强调说明了以下几点信息:

首先,白莲教是被朝廷官方定义为邪教的,且信徒众多,具有一定的团结力和煽动性。

针对白莲教的平叛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总是剿灭不净,如同野草春风,吹之又生。

白莲教在与清兵的对抗中,发展出了避其锋芒的战略。凭借当地有利地形,保存力量,在川陕楚多地实行战略转移。清军很难一击即中,也很难将其一网打尽。往往贼走并至,行军迟缓。造成朝廷财政的重大损耗。

白莲教匪徒并非良善之辈,“窥伺乡村,肆其焚掠”,对百姓同样残暴。

石韞玉针对白莲教叛乱的现状,谏言有五:

重视军情的探查,掌握敌踪,遏其前,截其后,做好排兵布阵,争取一网打尽。

针对白莲教煽动人心的特质,采取劝导和教化的方式,使人改过自新,从普通信众入手,从基层瓦解党羽。

从白莲教上层组织入手,挑拨离间,促使其内斗,引起内讧。清兵乘机剿灭,坐收渔翁之利。

因地制宜,灵活选择武器和战术,及时掌握敌人动向,“贼若入山,则设伏以邀之。贼若薄城,则清野以待之。”

严格管理军队,做到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上下一心。

石韞玉的军事建议,从军队建设、武器运用到兵法实践、实际战略一应俱全。其中,石韞玉的战略主张之一“坚壁清野”尤为微妙。这一条,可谓是抗击白莲教的基础战略方针。恰是因为石韞玉的谏言切中了朝廷之忧虑,石韞玉才会在翰詹大考中被定为大考一等,又授重庆知府,参与进白莲教平叛一事中。同时参与大考、写《征邪教疏》的洪亮吉被定为三等。石与洪二人文章不同,政见不同,立场不同。朝廷对二人文章的态度,直接反映了当时清廷对剿白莲教匪的态度。

洪亮吉在文章中,表现出了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达州,其明效大验也。”^[3]但此时,朝廷需要的不是对百姓的具体关切和探讨民生疾苦,而是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够快速平定叛乱的战略方针。石韞玉文章,则是从清剿白莲教、瓦解白莲教的方向出发,给出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切中了朝廷的忧虑。

对于清剿白莲教,朝廷的决策是有变化的。起初,朝廷不打算采取坚壁清野、修筑堡垒的策略。嘉庆二年(1797),都统德楞泰、将军明亮上奏称,官军在川陕诸省清剿白莲教军时发现,村庄居民无城隘保护,容易成为白莲教军劫掠的目标。村庄的粮草物资,甚至人口,都会成为白莲教补充实力的来源。“是以自用兵来所杀无虑千万,而贼不加少。”^[8]面对复杂胶着的平叛情况,二人提议,“为今之计,欲困贼必须卫民,莫若飭近贼州县,于大镇市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或数十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如此以逸待劳,贼匪所至,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加以大兵乘压其后,杀一贼即少一贼,灭一路即清一路。”^[8]同时,二人还列举了实际案例,证明守堡之法的可行性。“近日襄阳绅士梁有毅等筑堡困守,贼屡攻不能犯,此保障之成效。至川东各属多有险峻山寨,只须令乡民临时移守其中,一如守堡之法。于以御贼安民,必可刻期扑灭。”^[8]明亮、德楞泰二人的建议是修筑土堡,采取守堡之法,平贼安民。

坚壁清野之议就是指堡垒法。但是朝廷对于守堡之法并不满意。此二人奏折递上后,“虽奉旨以‘筑堡烦民,不如专禽首逆’,而坚壁清野之议实始此。”^[8]朝廷认为,修筑堡垒之法劳民伤财,不如集中力量抓匪首,在最短的时间内扑灭叛乱。“明亮、德楞泰请广修民堡,以削贼势。诏斥其迂缓。”^[3]但是,坚壁清野的提议,是从明亮、德楞泰的上奏开始的。

前线作战人员提出坚壁清野、修筑堡垒的建议是有来由的。有白莲教匪患之地地形复杂,地势险要,贼匪流窜。“川、陕、楚三省,犬牙相错,数千里崇山峻岭,处处有险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择隘堵御,贼又向无兵

处滋扰。致有贼之地无兵，有兵之地无贼，并有贼过而兵未来，兵到而贼已去者。东剿西窜，南击北驰。以言兜剿，即数十路难以圈围。”^[9]清军在这样的战斗中显得兵力不足，而战斗力屡屡减损。仅仅凭围追堵截，追贼擒贼，往往被贼匪逃窜去。

西南战况之艰，使得北京的讨论一直在持续。随着前线战况的变化，朝廷的战略方针逐渐偏向于坚壁清野、屯田守堡。嘉庆五年（1800），廷试平定川、楚、陕三省方略策，湖南淑浦严如煜对几万言，仁宗亲擢第一。其折略曰：“投诚之贼，无地安置，则已降复乱；流离之民，生活无资，则良亦从乱。乡勇戍卒，多游手募充。虑一旦兵撤饷停，则反思延乱。如此，则乱何由弭？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10]严如煜重新强调了筑堡屯田之法的实用性，并强调了训练乡勇的意义。“三省自遭蹂躏，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举流民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团练捍卫，计可养胜兵数十万。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计无逾此。”^[11]

其实，训练乡勇这一想法，石韞玉早在守卫重庆之时便已然具体实践过。石韞玉保卫重庆之时，在城中重编保甲，设团练之法。“于是申明保甲之法，设十家牌，每夜输一家守夜，城中禁夜行。”^[12]石韞玉曾上《办理团练折》，详细地说明了如何招练乡勇，以及如何运用乡勇力量。他指出，乡勇能够很好地协助清军对抗白莲教，“督率团勇寨民，同心协力，共扫余氛。”^[13]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平叛白莲教过程中得到实践的团练之法还为后来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参考。曾国藩幕僚徐子苓就曾在《庐州再陷记》中言道：“夫团练良法也，嘉庆初，楚中白莲教之变，尝议行之。其大指官与民相协，民与兵相卫，故自安恤难民之说行，而后民之从贼者始少；自坚壁清野之说行，而后贼之成擒也益易。”^[14]团练乡勇，辅助官军和坚壁清野的战略，几十年后仍被清军使用。

在与白莲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斗后，朝廷最终采取了“坚壁清野、守堡屯田”这一策略，并在前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纵观全局，清廷的政策之所以在“坚壁清野、守堡屯田”和“速战速决，擒拿贼首”之间摇摆，都是因为白莲教难以清剿，朝廷财政消耗巨大，所取得的成效时好时坏。故而在长达数年的白莲教叛乱期间，清廷的军事政策是在不断变化的。

此外，石韞玉还了解火器的使用方法，支持军队使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石韞玉十分重视火炮的应用和铸造，“将来攻城、攻寨，其势必出于此。”^[15]他曾在致湖南巡抚姜晟的《与姜中丞第二书》中，就对清军火炮的应用和铸造给出了两千余言的建议，还作《铸炮说》一则附呈。

石韞玉对兵法与实际结合的应用也颇有见解。他在《与姜中丞书》中，就曾详结合讨伐苗民叛乱的方略，指出地理设施建设对军事安全的重要性。或改建旧城，或新设石桥，治疾于腠理，防患于未然。

石韞玉还具有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他建议姜晟提前在门户险要之地排兵布阵。“多分汛兵，移一将备领之，以为桃源、武陵一路门户之固。此在今日似无关轻重，而绸缪未雨，必有得力之时。”^[16]

石韞玉是坚壁清野战略的坚定支持者。他作《守寨方略》十二则，檄行川东北。极大地打击了白莲教的势力。“坚壁清野，中田无资盗之粮；筑堡防江，下民有同仇之义。”^[17]

石韞玉的战略主张和后勤保障都极大地支持和影响了白莲教平叛的进程。清人陶澍在文集中记载，“公谓勒公曰：‘今官兵仅经略、参赞及公三路耳，而贼至数十股。若专剿一股，余无兵掩捕，势且益炽。为今计，莫若分兵，有一股贼即有一路官兵迎捕，使贼无暇劫掠。贼不得食，当自溃。’勒公曰善，即属草一疏陈之。壬戌三月，始定分兵策，兼用坚壁清野法。”^[18]石韞玉根据前线实际情况，为勒保定分兵策，兼用坚壁清野法，为清廷打击白莲教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此贼渐解，贼首次第就擒。是冬，即勘定大局，至癸亥秋，而三省廓清矣。”^[19]可以说，石韞玉的战略主张加速和推进了白莲教最后的覆亡。

三、石韞玉的川东军功

在经略大臣兼西安将军勒保幕中，石韞玉深受赏识，受命主理川东军务。在此期间，他保卫重庆、处理军队后勤事务及善后工作。

嘉庆五年（1800）春，白莲教军进犯重庆。石韞玉率部依据嘉陵江等有利地形，防守重庆，终使白莲教军败溃退走。《守渝记》载：“嘉庆己未，余出守重庆。时白莲教妖人作乱，余奉经略大臣檄，总理川东军务……其渝城有兵二千，余尽令出城，创二营于浮图关，扼贼北来之路。”^[20]石韞玉调军队，又调乡勇，将城中居民编保甲，复行团练之法，共同拒守重庆，又与总兵许文谟协作防守嘉陵江。“历十旬而至夏，官兵大集，冉天元被擒，贼始退回川北。”^[21]嘉庆五年，因防守重庆有功，加道员衔。

在重庆任知府期间，因为战乱，许多百姓避难逃家到重庆。重庆产生了疫情。石韞玉从宋人的医方中取得一方，制成药丸，发放给百姓，预防了城内的大疫。

此外，石韞玉还与县令余钰共同商讨构筑长寿新城。因白莲教乱以及战争的损毁，长寿旧城满目疮痍。“三年冬，贼氛入境，公私靡舍，一时俱烬。”^[22]石韞玉出守重庆后，考察地形，辨识地貌，请来余钰，以此事相嘱。“四年十二月，武进余君钰来宰是邦，谒府之日，余首以此事相属。”^[23]长寿新城于嘉庆五年七月始建，嘉庆七年三月完工。

川陕楚白莲教势力基本肃清后，军队凯旋，有离乱妇女数千人。有人提议将妇女分给兵丁，石韞玉坚决反对，全部将她们问清籍贯，遣返归家。“大兵凯旋，有难妇数千无所归。众议欲分给兵丁。公力持不可，遍询原籍，有父母兄弟及夫若子者，檄各州县尽来省相认，识以归之。咸感泣膜拜而去。”^[24]石韞玉还关心离乱百姓的亲人团聚之事，用心良苦。

石韞玉在川，尽心兵事，多有劳累。在云阳道中，石韞玉所乘舟触礁石而败，几乎溺亡，幸被他舟所救；在川北白沙河坠马受伤，但因牵挂军务，仍坚持随营。他还因连年从军山谷，受山中潮湿之气的侵扰，患上十分严重的足疾。

嘉庆九年（1804），四川大计群吏，石韞玉名列一等。^[12]

四、石韞玉从征白莲教过程中的心态变化

从征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石韞玉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奏折、谏言、书信。这其中，诗词是最能够体现其本人的心境变化，抒发本人所思所想的。前往四川途中以及驻守蜀地期间，石韞玉写下很多诗文，从诗文中可看出其态度变化。

嘉庆三年（1798），石韞玉奉旨补授四川知府。起初，石韞玉对自己在前线建功是有期待的。他踌躇满志，设想自己勒石簪缨的戎马生涯：“书生岂有勒铭才，漫请长缨蜀道来。杨柳绿依戎帐近，樱桃红傍戍楼开。回溪转石喧如雨，飞骑穿林疾若雷。但愿及时洗兵马，敢求颜色上云台。”^[7]

外放的任命下来后，京中许多好友为石韞玉践行，纷纷写诗送别。此时，石韞玉对自己的前途是期待的，对于平叛教匪一事是颇有信心的。嘉庆四年春，石韞玉将渡黄河，作《将渡黄河寄简都门亲友》诗云：“行尽蒲东路百盘，一封书寄报平安。清时不觉秦关险，世论多云蜀道难。节过上元风渐软，地经太华雪初残。前途日与青天近，十万峰峦足下看。”^[7]一行人意气风发，期待建功立业。

但很快，他就看到了白莲教叛乱中的另一面。因为官场腐败，州县官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民生疾苦。同时，军队的腐败和残暴也造成了许多不幸的事件。在石韞玉赴蜀地上任期间，他就亲眼目睹了夹在白莲教和官府之间挣扎求生的百姓之艰难。石韞玉路过七盘岭时，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下了《七盘岭记事》：

“夜宿宁羌州，朝登七盘岭。峻板崎岖高入云，过关卅里无人影。昨宵驿吏向我言，官兵半千关屯。如何今日驱车去，匹马只轮无觅处。鬍头童子草间出，戟手指天向余说：连日关头曾列营，旌旗蔽日刀枪鸣。朝来忽闻有贼信，顷刻仓皇拔营遁。我闻国家设兵以卫民，如何贼犹未至兵先奔？道旁一叟向余泣，但怨官兵不怨贼。官兵避贼如避雷，贼去百里兵始来。贼来焚掠有余烬，官兵所过扫地净。佩刀不斩贼人头，但入村舍屠猪牛。战马无刍又无豈，中田群行麦苗秀。村居十室九无人，绣户文窗摧作薪。承平将吏工谐笑，不习戎韬习文貌。忽闻贼去心肠宽，整顿弓刀迎上官。上官问贼曰小丑，小丑至时大兵走。”^[7]

白莲教不灭，匪患不绝。贼匪之祸尚且未平，官兵不思保卫民众，而是欺压乡里，劫掠百姓的钱财，损坏百姓的房产，破坏百姓庄稼，屠杀牲畜，欺上瞒下，阿谀奉承，百姓困苦无助，求救无门。兵之祸甚于贼。“官兵所过扫地净”颇具讽刺意味。官府的军队，作风之恶劣、搜刮百姓之彻底、吏治之腐败，都让石韞玉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但是，他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局面，平定叛乱，打白莲教，并维持朝廷的形象。这是石韞玉要处理的现实，也是清政府要面对的现实。

嘉庆皇帝并非对白莲教平叛事件中的勾兑和黑暗一无所知。据九月癸巳上谕：“闻近日贼匪每至一村庄，先将年壮平民逼令入伙，一遇官兵，辄令入伙之人当先抗拒，贼匪随后接应。若当先者被兵剿败，贼匪即乘闲先窜，官兵则随后杀掠报功，节次折内所称杀贼无数者，大抵皆系逼胁平民，而真正教匪早已远扬，所以日久不能成功。”^[13]许多百姓加入白莲教，沦为教匪，未必没有官逼民反，求生所迫的道理。官兵和教匪作战，首当其冲的却是夹在其间的普通百姓。“惟是教匪迫胁良民，及遇官兵，又驱为前行，以膺锋镝，甚至翦发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进退皆死，朕日夜痛之。”^[8]进亦难，退亦难。这是清末川陕楚等地普通百姓所遭受的现实。军队战斗力低下、军纪败坏也是清廷政治腐败的延伸表现。

最终，石韞玉在重庆任上渐渐生出了倦官退隐之意。他的许多诗文中，都表现出了那种对官场仕途的心灰意冷。“何似拂衣归去，江湖放浪余生。杞菊一庐偕隐，鸥波万里同盟。”^[7]石韞玉写诗以明心迹，表示自己欲法古人，拂衣归隐，辞官隐退。

五、石韞玉的为官之道

清剿白莲教后，石韞玉回朝奏对。《勤政殿召对记》记载：

上问：“汝在勒保军营办事，所办何事？”臣奏：“凡勒保答奏及一切文武文移，皆是臣办。又擒获贼匪，亦由臣审问供词。”上问：“贼匪也是你审，究竟他们因何造反？”臣奏：“贼以邪教煽惑愚民，蓄志已久，意在聚众抢掠。”上云：“有人言官逼民反，果否？”臣奏：“皇上圣明鉴察，贼匪蔓延五省，即如四川一省，扰及四十州县，岂有如许州县无一好官之理？实在多是好作乱之人。”上云：“两者都有，贼也可恶，官也有不好的。”……臣奏：“大臣们全仗圣明训示。”上微笑颌之。臣遂叩头辞出。^[12]

石韞玉在四川为官勤勉，并非高高在上，不问俗事，相反，他处理过大大小小的事务，对百姓的生活情况有很深的了解。他也清楚，官兵对百姓欺压如雷的事实。“佩刀不斩贼人头，但入村舍屠猪牛。战马无刍又无豈，中田群行麦苗秀。”^[7]他亲眼目睹，也亲耳听到了官兵破坏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媚上欺下，瞒报邀功的恶行。他也会义愤填膺，感慨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写出长诗讽刺。但在皇帝面前，石韞玉依然谨守“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做不到对统治者直言谏，也做不到站在百姓的角度，陈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现实。

而洪亮吉的为官之道就与石韞玉大为不同。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洪亮吉与石韞玉为同科好友，二人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共同在翰林院供职。洪亮吉会在奏疏中直陈利弊，谏言直谏：“在内部院诸臣，事本不多，而常若猝猝不暇，汲汲顾影，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外督抚诸臣，其贤者斤斤自守，不肖者亟亟营私。”^[3]他痛斥众官员不思进取，罔顾生民之计，尸位素餐者众，有意革新者寥。“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士大夫渐不顾

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然此不当责之百姓，仍当责之士大夫也。”^[1]洪亮吉选择为普通百姓说话，认为百姓并没有过多的罪责，朝廷应当更多地约束士大夫和官员群体，推行改革，整顿民生。

但洪亮吉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嘉庆初年，朝政混乱。清高宗驾崩后，嘉庆皇帝迅速向和珅及其党羽发难，借机整顿朝堂，并下旨广开言路。一时之间，朝臣欢欣。时任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对嘉庆新政提出了数条改进的建议。成亲王永理将洪亮吉的谏议呈送皇帝，皇帝阅后大怒，当即经内閣发下谕旨问罪洪亮吉，将洪亮吉革职，交刑部，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最终戍发伊犁。

洪亮吉的言行，更偏向于一个为民请命的直臣形象。反观石韞玉的为官之道，则代表了大多数官员：圆滑，谨慎，明哲保身。

石韞玉选择了明哲保身的为官之道。故而他对洪亮吉颇为敬佩。嘉庆十四年，洪亮吉在常州病逝。石韞玉还写下了《更生居士挽辞》，表达了自己对洪亮吉的钦佩和同情：“臚列众公卿，一一寓风刺。剖心志无他，批鳞视如戏。圣明日方中，处士敢横议？”^[7]但石韞玉并没有选择和洪亮吉走在一条路上。

与因进谏获罪，戍发伊犁的洪亮吉不同。石韞玉因在川省有功，嘉庆十年（1805）冬，石韞玉晋为陕西潼关道，掌管潼关税务。

总结

石韞玉所处清乾嘉时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在这一时期，朝廷的很多积弊开始凸显出来，导致民变四起。苗民叛乱、白莲教起义几乎同时发生。在石韞玉从征白莲教一事中可以看到：清廷对待叛乱采取的是征讨方略，而不去关心百姓缘何叛乱；朝廷倾向于肃清地方反抗，而非整肃朝政；清朝地方军队军纪败坏，战力低下；清朝的地方官无所作为者甚众，欺压百姓者亦不在少数，很多地方存在官逼民反的现象。

平叛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清军总结了大量的战略经验，包括坚壁清野、团练乡勇、筑堡守寨，等。这些战略方针在几十年后平定太平天国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汉族地主官僚都参考了平定白莲教起义的战略实践经验。

石韞玉是古代封建王朝官员群体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行为符合封建社会官员行为处事的基本逻辑，代表了部分忧心天下，能看到民生疾苦，愿意造福百姓，但不敢直言劝谏，粉饰太平的封建官员。他们面对民生疾苦，并非心无波澜，但是碍于皇权压制、仕途功名、自身利益等，会选择明哲保身，不作为或少作为，甚至欺瞒皇帝。这是官员群体对自身利益的保护，也是封建专制体制对士大夫群体的压迫。历代王朝经历盛衰转折期时通常都存在上述问题。

参考文献：

- [1] 印鸾章：清鉴纲目[M].长沙：岳麓书社，1987：472
- [2]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84
- [3] [清]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571-11391
- [4] 贾大泉，陈世松：四川通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119
- [5] 蒋维明：川湖陕白莲教起义资料辑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233
- [6] [清]严如煜：严如煜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3：1105
- [7] [清]石韞玉：独学庐文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220-836
- [8] [清]魏源：魏源全集[M].岳麓书社，2004：380-394
- [9] 孟森：清史讲义[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324
- [10]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太平天国史料汇编[M].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8：5797
- [11] [清]陶澍：陶澍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7：450
- [12] 睦骏：石韞玉年谱[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79-80
- [13] 赵之恒，牛耕，巴图：大清十朝圣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5161-5162

Situation of the Times and Strategy: A Research on Shi Yunyu's Participation in the Suppression of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Sunmingze, Dongfenhe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China)

Abstract: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in the Sichuan, Shaanxi and Hubei regions during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dealt a heavy blow to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suppressing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the Qing Dynasty exposed problems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official governance, military, public sentiment and finance, and suffered repeated defeats in the suppression. Eventually, in the complex situation, the Qing Dynasty formulated an effective strategic guideline, complete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White Lotus and maintained the rule of the dynast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official experience of Shi Yunyu, the top scholar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Suzhou, from the third year of Jiaqing (1798) to the ninth year of Jiaqing (1804) as the research center. By sorting out Shi Yunyu's entire experience of suppressing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it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the Qing army's failure to suppress the rebellion effectively, and the Qing Dynasty's wavering strategic 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hi Yunyu's experience in suppressing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it examine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Qing Dynasty's suppression strategy and how this strategy and tactics were appli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decades later.

Keywords: Shi Yunyu;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The strategy for the White Lotus Rebellion; Jianbiqingye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德语本科高年级阶段的美育路径探索 ——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为例

罗威¹

(1.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31)

摘要: 文章首先对美育与美育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介绍, 随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本科专业美育的必要性进行了说明。在此基础上, 文章以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开设的专业特色课程“中西方思想经典选读”为例,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本科高年级阶段美育的路径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美育; 德语本科高年级阶段

基金项目: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2 年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Y2296259)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03

1. 美育与美育理论

“美育就是运用人类实践所创造的美, 反过来对人自身进行审美教育, 以全面改善人的精神面貌, 因此美育也就是人类美化自身的教育。”^[1]我国很早就出现了美育的思想, 美育实践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蔡元培曾在《美育》一文中指出, “吾国古代教育, 用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乐为纯粹美育[.....]盖自数以外, 无不含有美育成分者。”^[2]“六艺”就是西周时期官学的主要教学科目, 孔子也曾以此教导弟子。《论语·述而篇》中记载的“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3]中的“艺”便是指六艺。在西方, 美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柏拉图非常重视美育对于人格塑造与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 他在《理想国》的第二卷中就提出了“用体操来训练身体, 用音乐来陶冶心灵”^[4]的观点, 在《法律篇——论文艺教育》中又强调“让我们来像猎犬一样循着气味追寻下去, 来找出形象, 曲调, 歌唱和舞蹈中的美; 如果找不到, 谈起教育(无论是希腊的还是蛮夷的)就没有用处。”^[5]

尽管美育的思想与实践源远流长, 但是作为专业术语的美育以及系统的美育理论却是到了 18 世纪末才出现的。1795 年, 德国古典诗人席勒将自己创作的《审美教育书简》陆续发表在了文艺杂志《季节女神》(Horen) 上。这部书信集由二十七封信件组成, 是席勒内容最为丰富的理论著作。在这些信中, 席勒首次提出了审美教育的概念, 并从理论层面对其功能与现实意义进行了系统地阐释。美育一词便是审美教育的简称。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 美育理论是在 1900 年前后传入我国的。我国近代最早的美育理论研究著作出自王国维之手。在 1903 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中, 这位国学大师立足于培养“完全之人物”^[6]的教育宗旨, 不仅提出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而且还对德育、智育与美育之间的关系以及美育的独特价值进行了阐释。在王国维看来, “社会之罪恶”与“人心之苦痛”皆源自人的欲望, 而“美之为物, 不关于吾人之利害者也。吾人观美时, 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7]因此, 王国维从审美无关利害得失的特点出发, 认为美育具有减轻人的私欲、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重要作用。和王国维一样, 蔡元培也非常重视美育。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了军国民教育(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智育)、公民道德教育(德育)、美育与世界观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8], 将美育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此后, 他不仅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9], 而且还多次撰文对美育的特征、价值与具体方法进行说明, 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近代美育理论与美育实践的发展。对于自己大力提倡美育的缘由,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作出了解释: “提出美育, 因为美育是普遍性, 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 美感

作者简介: 罗威(1991—), 男, 博士, 研究方向为 1800 年前后的德语文学。

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10]由此可见，虽然蔡元培与王国维的社会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们对于美育的看法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审美的本质特征是无利害性，所以美育能够消解国民计较利害得失的功利心，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类似的观点在朱光潜的美学著作中也能找到。朱光潜在1932年成文的《谈美》中写道，“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人心之坏，由于‘未能免俗’^[11]，所以很多人会过于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置家国大义于不顾。在朱光潜看来，“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术时，人都是从有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到绝无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所为而为’的。”^[12]因此，朱光潜选择在当时谈论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借助审美活动来净化人心，进而解决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

总体而言，美育理论在近代引入我国以后，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中国美育先行者们把美育纳入了民族复兴、文明传承的大格局”^[13]，他们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美育观念仍然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美育越来越受重视，“‘美育’还经常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中，实施美育成为国家意志。”^[14]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15]在回信中，总书记肯定了加强美育工作的必要性，同时还对做好美育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为做好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本科专业美育的必要性

2019年4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高校美育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主要举措与组织保障进行了详细说明。《意见》在“基本原则”中明确要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一项中又指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学校美育培根铸魂的基础，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要在传统文化艺术的提炼、转化、融合上下功夫，让收藏在馆所里的文物、陈列在大地上的文化艺术遗产成为学校美育的丰厚资源，让广大青年学生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中华文化变迁，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汲取中华文化艺术的精髓。”^[16]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美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国德语本科专业历来重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专业教学之中。早在2006年，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编写的《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的培养目标中就明确地指出，“能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17]是学生拥有良好素质的一项重要体现。2020年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也将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掌握“中国语言文化知识”与具备“跨文化能力”^[18]纳入到了德语专业的培养规格之中。对于德语专业的学生而言，要想切实地提升跨文化能力，不仅需要学习对象国的语言、历史与文化，而且需要对中国文化有着非常深入的理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文化与对象国文化的差异，并对这些差异进行合理的分析与阐释。

在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专业教学的实践中，目前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新世纪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中，已经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国文化简明教程》（2015）的德语教材。此外，近年来国内还出版了不少汉德对照或者用德语介绍中国文化的读本，例如《中国文化常识（中德对照）》（2007）、《中国文化欣赏读本上、下：汉德对照》（2014）与《中国文化读本（德文版）》（2014）等等。在《大中华文库》的框架内，我国古代的很多经典著作也有了汉德对照的版本出版，例如《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孙子兵法》等。这些读本与经典译著不仅有助于中国文化在德语国家的进一步传播，让德语国家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而且也能为德语专业的学生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学习专题词汇与表达以及从事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总体而言，在德语专业本科的教学中，积极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已成为一项共识，并且拥有了一定的教学研究基础，但是从目前的文献材料来看，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美育结合起来的专题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因此，鉴于新时代高校美育工作的要求以及当前德语专业本科的教学情况与培养目标，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域下进一步探索德语本科专业教学的美育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本科高年级阶段美育的路径探索

德语专业本科的学制一般为四年，可以分为基础阶段（一、二年级）与高年级阶段（三、四年级）。不同阶段的专业学习重点、教学任务与课程设置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以笔者所在的四川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我校）

德语学院（以下简称我院）为例，根据最新版的《德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在一、二年级需要学习综合德语、德语视听说、德语基础口语等专业基础课程，系统地训练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功，以具备基本的语言交际能力并初步了解德语国家国情与德语专业应用前沿。到了高年级阶段，学生需要在巩固与加强德语基本功、提高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与拓展专业知识面，为今后的就业与升学打下基础。为此，学生不仅需要学习高级德语、德语高级听力、德语高级写作等专业发展课程，而且需要系统地学习德语文学、翻译学、跨文化交际等专业方向的知识。从课程设置来看，基础阶段的课程多为必修课，教学内容相对固定，而高年级阶段则较为灵活，除了专业限选课以外，学生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与未来规划选修不同的专业特色课程，专任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可以更加多样。因此，鉴于德语本科不同阶段的学习特点，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方式也应该分阶段进行讨论。受本文的篇幅所限，下文主要以我院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中西方思想经典选读”（以下简称选读）为例，对高年级专业教学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并以此作为基础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路径进行探索。

3.1 课程设置

选读是为我校德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开课学期为第七学期。这门课程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上，综合训练他们用德语推介中国文化的的能力，同时也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在中德交流史中的重要意义。目前，选读主要以叶朗和朱良志所著的《中国文化读本》的德文版作为基础读本，同时根据教学需要，补充阅读材料供师生在课上讨论与课下阅读，例如汉德对照版本的《论语》、《老子》与《孙子兵法》等经典著作的节选，以及歌德的《中德岁时诗》、席勒的《孔夫子的箴言》与布莱希特的《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德语经典作品。从目前的教学内容来看，学生在课上主要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了解德语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情况以及阅读中德两国的一些经典著作为主。因此，与高年级的其它课程相比，选读的课程内容已经包含了较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笔者曾就传统文化在德语高年级阶段美育中的融入情况，对我校德语专业本科生进行过问卷调查。从回收的 113 份有效问卷来看，笔者发现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有必要在专业课程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如图 1 所示），并且认为这样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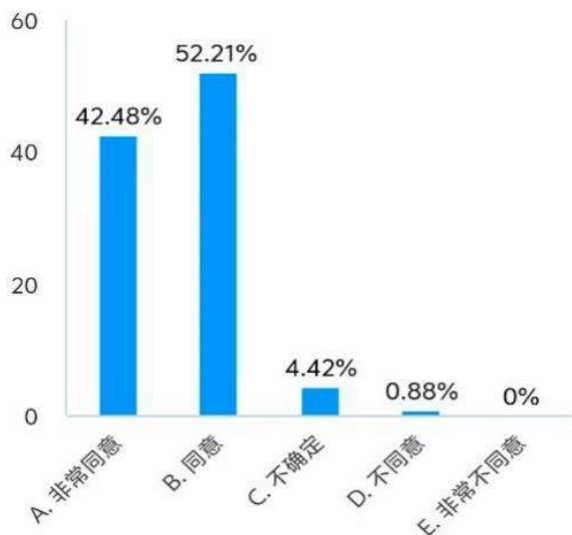


图 1 我认为，在德语专业课程中，有必要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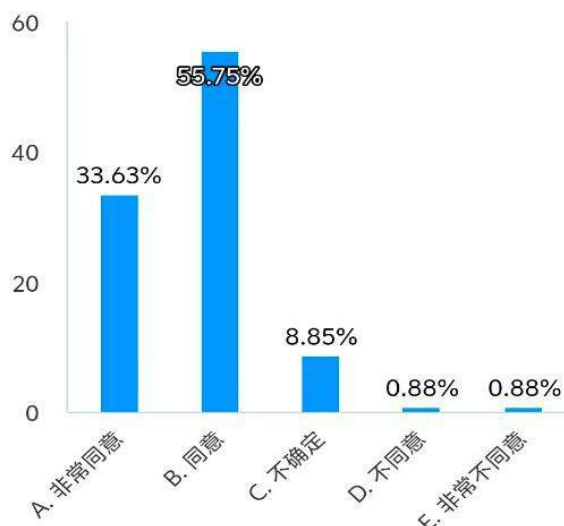


图 2 我认为，在课程学习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能够提高我的审美鉴赏能力

由此可见，学生对于在专业课程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持积极的态度。然而，从近两年选读这门课程的教学情况来看，不少学生存在未按要求阅读材料、课堂讨论不够积极、未完成课后作业与出勤率较低等问题。笔者通过与部分学生交流发现，他们的课堂参与度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入第四学年以后，很多学生面对就业与升学的压力，需要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准备各类考试，例如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考试与德福考试，以及

去工作单位实习等等。受此影响,有不少学生只是出于获取学分等现实因素的考量,才会在第七学期仍在选修专业课程。因此,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考虑对高年级的课程设置进行调整与优化。根据我院最新版的《德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除了学术论文写作以外,高年级的专业课程全都集中在第五和第六学期开设,选读的开课时间也已经调整为第六学期。此外,在第五学期还新增了一门名为“中国文化传播”的融合型课程,这也为高年级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知识提供了平台与机会。此次调整不仅能够减轻学生在大四学年的学业压力,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就业与升学,而且让高年级专业课程的开课时间更为集中,学习重点也更加突出,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各门课程的内容。

3.2 教学改革

我国著名的美育研究专家杜卫在谈到美育的方法论时指出,“中国传统美育讲究的是一个人自觉自为地接受诗乐的熏染,在情感体验中怡情养性、体悟人生,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美育方法。在这里,‘润物细无声’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思是以长期浸润、熏陶的方法来施教,使学生在审美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渐进地提升审美素养。”^[19]而想要在美育教学中真正地做到润物细无声,“关键就是让学生内心有感”,为此,教师“首先要考虑如何使教学内容容易被学生接受,也就是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兴趣。”^[20]目前,德语高年级阶段的很多研讨课主要是以教师讲授、课堂讨论与学生报告为主,在教学的过程中,授课教师往往处于主导地位。以选读为例,虽然学生在课上也会根据阅读材料进行讨论,并按照课程安排准备小组报告,但是在整个教学实践的过程中,大部分内容仍然是由授课教师进行讲授,阅读材料的选择也由教师决定。因此,如果要在现有的课程框架内进一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育价值,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在兼顾教学要求与学生兴趣的基础之上,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以选读为例,授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接受程度,充分考虑美育自身所具有的“情感性、形象性、趣味性、丰富性”^[21]特点,适当地增减部分教学内容,以进一步突出课程的美育功能,例如:在“Konfuzianisches Denken über Himmel und Menschlichkeit”(孔子的天人之学)教学章节中,除了讲解“天”、“仁”、“礼”等重要知识点以外,还可以对《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22]这部分内容进行研读,引导学生对不同的人生境界进行思考,以感受国学之美;在“Fliegender Pinselstrich der Kalligraphie”(飞舞的线条:书法)中,除了讲解书法的发展历史、当代价值与文房四宝等内容以外,还可以介绍书法的欣赏方法,并以不同时期的书法名作为例,让学生感受书法艺术的“笔墨之美”、“结构之美”、“章法之美”与“形式之美”^[23];在讨论“歌德与中国文化”这部分时,除了讲解与分析《中德岁时诗》的创作背景与诗文内容以外,还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索诗歌中的中国文学元素,赏析诗中蕴含着的“诗中有画”的优美意境。

除了教学内容以外,教学方法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更加贴近学生。杜卫认为,“要把美育课程的教学设计成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美感体验。美育活动是指学生身心参与的积极的审美创造、审美欣赏以及有关的知识学习和技巧训练等过程,具身性与体验性的有机融合是美育活动的突出特征。”^[24]目前,德语高年级的很多课程都会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但是学生的学习方式主要还是以阅读、翻译、写作等常见的外语学习方式为主。在本文3.1章节中提及的问卷中,笔者对学生对于融入传统文化的教学期待进行过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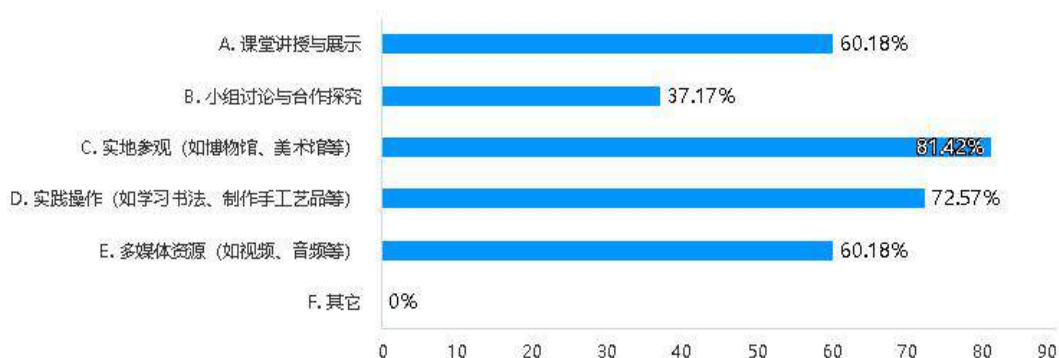


图3 您更喜欢哪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形式(多选)

由此可见,相较于课堂讲授与展示,学生也更加倾向于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因此,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与探索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提升课程的美育效果,除了需要在课堂展示环节综合运用多媒体资源,让课堂更加生动、有趣以外,还应该更加注重美育活动的开展与第二课堂的延伸,让学生在实践中积累审美经验,逐步提高审美鉴赏能力。以下为笔者的一些思考:

第一,授课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向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供他们在课下自主学习,例如在上文提及的“孔子的天人之学”教学章节中,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论语》的完整版本,引导他们从“乐”、“恕”、“和”、“仁”^[25]四个方面出发,对《论语》进行审美的解读。此外,授课教师还应该积极关注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慕课、专题讲座与现场活动,例如文化节与艺术展等,及时向学生传达相关信息,并鼓励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各类艺术实践活动。

第二,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可以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前往博物馆、艺术馆、纪念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地进行研学,以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与探索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此外,每年的暑期社会实践也是学生接触与了解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机会,所以在实践地点的选择方面,可以将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考虑的范畴,让学生在志愿服务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感受传统文化之美。笔者曾作为带队老师,与几名学生一同前往重庆秀山县隘口镇屯堡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当地的茶叶种植基地就为学生学习与了解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第三,专业竞赛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校每个学期都会在实践中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活动,德语配音比赛、朗诵比赛、翻译比赛、演讲比赛是我院经常举办的专业性赛事。在这些比赛中,可以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例如在配音片段、演讲主题、朗诵主题与翻译内容这些方面,可以提供相关的文本和视频资源供学生选择,让学生在专业实践中进一步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第四,授课教师应该建立合理的评估与反馈机制,对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学习情况与实践活动的效果进行实时跟进,以便不断优化美育教学的内容与方式。

4. 结语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语专业课程的教学之中,并以此作为基础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而且能够引领他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让他们在不断积累审美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高雅的审美情趣。除此以外,在德语专业教学中加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还能够加深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让他们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跨文化能力,在对外交流中更好地用德语讲好中国故事。因此,在德语专业的教学中,应该持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域下的美育实践路径,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外语人才贡献更多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钟仕伦,李天道.高校美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
- [2] 蔡元培.美育[C]//蔡元培.蔡元培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55.
- [3] 论语:汉德对照[M].杨伯峻,今译,卫礼贤,德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70.
- [4] 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明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0.
- [5] 柏拉图.法律篇——论艺术教育[C]//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76-277.
- [6] 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C]//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103.
- [7] 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C]//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76.
- [8] 参见: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C]//蔡元培.蔡元培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95-104.
- [9] 蔡元培.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C]//蔡元培.蔡元培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149.
- [10]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C]//蔡元培.蔡元培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242.
- [11] 朱光潜.谈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19-120.
- [12] 朱光潜.谈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119-120.
- [13] 胡琦,杨艳琼,赵威等.高校美育新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3:2.
- [14] 杜卫.美育三义[J].文艺研究,2016(11):9.

- [15] 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 [EB/OL].(2018-08-30)[2025-08-05].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30/content_5317814.htm
- [16]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EB/OL].(2019-04-02)[2025-08-0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794/moe_624/201904/t20190411_377523.html
- [17]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组.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2.
- [18]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35.
- [19] 杜卫.谈美育[M].北京:北京师范读大学出版社, 2025:191.
- [20] 杜卫.谈美育[M].北京:北京师范读大学出版社, 2025:193.
- [21] 钟仕伦,李天道.高校美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
- [22] 论语:汉德对照[M].杨伯峻今译,卫礼贤德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32.
- [23] 胡琦,杨艳琼,赵威等.高校美育新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3:160.
- [24] 杜卫.谈美育[M].北京:北京师范读大学出版社, 2025:197.
- [25] 胡琦,杨艳琼,赵威等.高校美育新论[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3:165.

Exploring the Pathway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Based o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Advanced German Undergraduate Program: A Case Study of the German Program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Luo Wei¹

¹*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then explain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the German undergraduate program. Building on this, it conducts a case study of the specialized course “Selected Reading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 Classics” in the School of German Studies a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o explore the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the advanced German undergraduate program.

Keyword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esthetic education; Advanced German undergraduate program

“三全育人”理念下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研究

张佩琳¹ 易秀华^{1*}

(1.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 “三全育人”是新时代我国教育领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理念, 其强调打破育人壁垒、整合育人资源, 实现育人过程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中学音乐教育作为美育的核心载体, 不仅承担着培养学生音乐素养的任务, 更肩负着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德育使命。本文以“三全育人”理念为理论框架, 首先阐释“三全育人”与中学音乐教师能力的内涵, 进而剖析“三全育人”对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的新要求, 梳理当前中学音乐教师在落实该理念时存在的能力困境, 最终提出针对性的教学能力提升路径, 为中学音乐教师践行“三全育人”、实现美育与德育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三全育人; 中学音乐教师; 教学能力; 教育改革

课题项目: 湖北师范大学创新科研项目《中学音乐课“三全育人”美育浸润模式研究》(编号 2024Y134); 湖北师范大学教研重点课题《OBE 视域下职前音乐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升课程开发》(编号 202301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61

一、“三全育人”理念与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的理论基础

(一) “三全育人”理念的内涵

“三全育人”的内涵包含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理念、教育原则和教育机制。强调学校在育人过程中, 要以人员、环境、过程等要素为依托, 实现提高学生的素养、思想境界等目标。^[1]其核心内涵从以下三个维度切入:

1. 全员育人

“全员育人”对应的是新时代高校育人主体, 即谁负责培育学生。育人的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全员指的是学校、家庭、社会、学生在内的四类主体形成的育人共同体。狭义的全员指的是学校内部的教育主体, 包括教职工、学校管理者及学生自身。^[2]因为本文是对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研究, 所以采取狭义的“全员育人”基本内涵, 全员育人打破了教育主体的单一性, 构建以教师、学工、学生为核心, 形成协调联动, 实现高质量育人目标。

2. 全程育人

“全程育人”的基本内涵是对育人的时间维度进行限定。要求学校开展以育人为目的的思想教育活动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之中。其中包括从课堂到课外、从学期到假期、从开学到毕业。将日常学习、假期实践、课外活动、课堂学习等诸多时间有效利用起来, 渗透到学生学习的始末。^[3]所以“全程育人”的思想主要关注于学校教育的持续性和育人的长期性, 在教育的时间上形成集中, 来保证高效育人目标的实现。

3. 全方位育人

方位是空间单位, “全方位育人”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教育。“全方位育人”是高校十分重要的育人视角和机制, 要求学校利用各种空间、环境资源, 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的教化。使学生从周边的人、事、环境中感受到正确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 从而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素养。从校园生活的物理环境, 到虚拟网络的空间, 都是“全方位育人”的空间要素, 实现育人的全面性。^[4]

所以, 对学校来说, “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者缺一不可, “全员育人”是首要的,

作者简介: 张佩琳(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易秀华(1980—),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 易秀华

育人的主体是最为重要的,其次“全程”、“全方位”是时间和空间二者相结合。因此,“三全育人”的基本内涵可以理解为,由全员组织协调活动的展开,再利用空间和时间有效结合,形成全过程化、全面化的育人机制。

(二) 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的内涵

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为顺利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所表现的一种心理特征。教学能力是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一般包括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一般能力指教学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认识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特殊能力指教师职业所具备的专业能力,如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组织教育和教学的能力、自我调控和自我反思能力(较高的教育机智)、教育科研能力、创新能力、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能力等等。教师教学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优劣。^[5]

二、“三全育人”理念对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的新要求

基于“三全育人”是育人目标,为达到教学要求,教师能力主要集中于综合育人、协同育人、全程渗透以及跨学科整合这四个维度的能力。

(一) 综合育人能力

综合育人能力是“三全育人”四维能力模型中的核心能力之一,聚焦音乐课应与美育和德育相融合,强调从审美和道德双重层面培育学生素养。

美育:音乐学科本身就是美育的重要载体,中学音乐教师要具备引导学生感受音乐之美、鉴赏音乐作品的力量,通过对不同风格音乐作品的教学,培养学生的审美感知,提升学生对美的鉴赏和创造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这与《2022年艺术课程标准》的美育要求高度契合。

德育:音乐作品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内涵,音乐教师可以通过对作品的讲解和分析,挖掘其中的德育元素,如爱国主义、团结友爱、坚韧不拔等精神品质,引导学生在欣赏和演唱音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道德教育,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落实综合育人能力中的德育目标。

最后,在育人实效上,强调通过音乐体验塑造学生健全人格,让学生在音乐审美与情感共鸣中,实现品德修养与人文素养的同步提升,最终达成“综合育人”的效果。

(二) 协同育人能力

协同育人能力是“三全育人”四维能力模型中的重要一环,核心在于通过沟通与协作打破不同育人主体间的壁垒,凝聚多方力量形成育人合力。“三全育人”理念中的“全员育人”明确提出将教师、学工、学生三者作为音乐课的主体,在音乐课中,教师活动、学工活动与学生活动紧密联合,因此,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上,音乐教师需要与学工以及其他学科教师合作讨论教学过程中的每个教学环节,来实现协同育人。

沟通:音乐教师需要与其他学科教师进行沟通,例如与语文教师合作,将古诗词与音乐相结合,既加深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又丰富音乐教学内容;与班主任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班级情况,更好地将音乐教学与班级管理、学生个体发展相结合;与家长沟通,反馈学生在音乐学习中的表现,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

协作:在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如校园文化节、文艺汇演等活动中,音乐教师要与其他学科教师、行政人员、后勤人员等协作,从活动的策划、节目编排到现场组织,都需要音乐教师发挥协作能力,共同完成育人任务。

(三) 全程渗透能力

全程渗透能力是“三全育人”四维能力模型中的重要维度,核心是通过组织、策划与创新,将育人元素融入教育教学的全流程。对中学音乐教师而言,这意味着要在课堂教学(如设计教学环节时渗透美育、德育)、课外活动(如策划合唱比赛、音乐主题实践)等各个环节中,以创新形式持续发力,让育人目标贯穿于学生音乐学习的全过程,而非局限于单一课堂或活动,从而实现育人效果的连贯性和持久性。

组织:音乐教师要具备组织音乐教学活动的力量,包括课堂教学组织,如合理安排教学环节,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音乐教师还可以与学工合作组织课外音乐活动,如校园歌手大赛、音乐知识竞赛、校园文化节等,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

策划:教师根据学校的育人目标和教学计划,策划具有特色的音乐教学方案和活动方案。例如,教师结合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主题,策划一场以传统音乐为主题的教学活动,从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设计到活动的宣传推广,都需要音乐教师进行精心策划。

创新:在音乐教学中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在教学方法上采取项目驱动法,使学生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性;在课堂中,教师还可以设计小组合作探究的方法来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并提高学习效率。或利用AI教学资源,引入音乐游戏、音乐创作等新颖的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创造力;在评价方式上,教师可以采用教师评价、生生互评、自评等方式来进行,使音乐教学在全程育人中更具活力和吸引力。

(四) 跨学科整合能力

跨学科整合能力是指打破单一学科边界，将不同学科的知识、方法、思维模式等进行有机融合，形成协同效应的能力。这种能力强调在具体场景中，音乐教师通过关联不同学科的内容，挖掘其内在联系，以更全面、系统的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例如，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将音乐与历史（作品创作背景）、文学（歌词意境）、地理（民族音乐与地域文化）等学科知识结合，既能丰富教学内容，又能帮助学生从多维度理解音乐，实现知识与育人目标的融合。它不仅是知识的简单叠加，更注重学科间逻辑的贯通与应用的创新，从而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效能。

学科：音乐与历史、地理、文学等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音乐教师要具备跨学科整合的能力，在教学中可以引入音乐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等知识，帮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音乐作品。例如，在教授民族音乐时，介绍该民族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使学生更好地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

德育：在音乐教学中融入德育内容，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将音乐与品德教育相结合。例如，教师在教唱爱国歌曲时，可以讲述歌曲背后的历史故事，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实现跨学科整合能力中德育与音乐学科的融合。

班会：利用班会时间开展音乐主题活动，如音乐分享会、音乐欣赏课等，既丰富了班会的形式和内容，又能通过音乐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情感熏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体现了跨学科整合能力在班级育人中的应用。

中学音乐课的“三全育人”（如图1），不是将育人作为附加任务，而是以“音乐”为纽带，让“全员”（教师、学生、学工）在“全过程”（课前预习、课中学习、课后延伸）中，通过“全方位”（情感、文化、责任、价值观）的互动，实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最终目标是让学生成长为有审美素养、有责任担当的全面发展的人。



图1 “三全育人” 四维能力模型图

三、当前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 育人理念认知不足,教学目标单一化

部分中学音乐教师对“三全育人”理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将教学目标局限于“完成教材内容”“应对学业测试”，忽视音乐教育的育人价值。例如，教学中过度强调乐理知识与技能训练，对音乐作品中的人文内涵、情感价值挖掘不足；缺乏将音乐教学与德育、美育结合的意识，如在讲解外国音乐作品时，未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与民族自信。这种“重技能、轻育人”的倾向，导致音乐教育的育人功能被弱化，与“三全育人”理念的要求相脱节。

(二) 协同合作能力薄弱,育人合力未形成

在“全员育人”背景下，中学音乐教师与学工及其他学科教师的协同合作能力存在明显不足。课堂教学中，音乐教师跨学科合作意识淡薄，多数音乐教师习惯于独立开展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师的交流仅限于“课时协调”，缺乏跨学科教学育人目标的深度合作；音乐教师与学工联系不够密切，校园音乐活动举办次数过少，更多是与节日相关的活动，与音乐课教学内容相结合的音乐活动占极少数，缺乏长效机制。这种“孤立化”的教学状态，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制约了“全员育人”的实现。

（三）教学局限于课堂,全程育人实施不足

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中学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多集中于“课堂教学”,对课前准备不够充分,没有明确学生的预习任务,对课后场景的延伸不足。课后音乐活动形式单一,多为作业布置,学生完成度低、兴趣不高;教师缺乏利用校园环境、社会实践等场景开展音乐教育的能力,如未能将校园广播、走廊文化与音乐育人相结合。这一问题使得音乐教育难以实现“全程渗透”。

（四）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全方位育人缺乏支撑

“全方位育人”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资源整合能力,但当前中学音乐教师在这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教师对教材资源的开发不足,习惯于照本宣科,未能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如地方戏曲、民歌)拓展教学内容;其次,教师对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局限于“播放音频视频”,未能通过在线平台、虚拟仿真等技术创新教学形式;最后,教师对社会资源利用率低,如未能有效利用博物馆、音乐厅等公共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教师的资源整合能力的不足,导致音乐教学内容与形式单一,最终难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四、“三全育人”理念下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策略

（一）强化“全员协同”能力,构建育人共同体

“三全育人”的核心在于“全员参与”,音乐教师需联动学工、其他学科教师等主体的能力,形成育人合力。

1.提升跨主体沟通协作能力

音乐教师主动与班主任定期沟通(如每月1次教研对接),明确音乐课与班级育人的结合点——如班主任计划开展“感恩主题班会”,音乐教师可同步设计“感恩歌曲学唱+亲子音乐互动”课,提前共享教学方案,确保育人目标一致;音乐教师与学工沟通合作时,将每次的音乐课程活动设计整理一份寄予学工处,学工将安排相应主题的校园音乐活动,达到全员合作的目标。

2.提升资源整合能力

音乐教师安排学生学习使用在线协作平台(如线上学习资源及课前测评),收集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其次教师挖掘多元育人资源,建立“资源库”,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主动走访社区文化站、非遗工作室,收集中学音乐课的相关资源(如邀请非遗传承人录制“茉莉花演奏教学片段”、收集社区公益活动中的音乐表演案例),按“红色教育”、“民族文化”、“感恩成长”等主题分类归档,方便学生自主学习观看;同时,指导学生和家长参与资源收集(如让学生拍摄“生活中的民族音乐场景”,家长协助整理),让资源库成为全员共建的育人载体。

（二）完善培养机制,提升协同合作与资源整合能力

搭建协同育人平台跨学科合作平台:学校可成立“艺术教育教研组”,组织音乐教师与语文、历史、美术等学科教师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如“传统节日中的艺术元素”),设计跨学科教学方案。

家校社协同平台:建立“家长艺术课堂”,邀请音乐教师为家长讲解家庭音乐教育方法;与当地文化馆、音乐厅合作,共建校外艺术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与演出、鉴赏活动。

加强资源整合能力培训,开展地方音乐资源开发培训,邀请民间艺术家、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指导教师挖掘本地音乐文化(如民歌、戏曲),开发校本课程;组织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提升教师运用在线教学平台、音乐制作软件、虚拟仿真技术 etc 能力,丰富教学形式。

（三）创新教学模式,拓展全程育人的实践场景

构建“课前+课中+课后”的一体化教学模式。

课前:师活动以任务驱动法来引导学生自主预习,在任务驱动下激发学生自主思考、探求答案和相关知识的强烈愿望,形成自主思考的行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这一过程是为达到挖掘提炼美育元素并找到美育融入课程的方法的浸润目标。教师准备线上教学资源,发放展示与本节课堂主题相关的资料、视频、材料等,学生结合教师指明的任务,利用相关的资料进行学习后,自主完成线上测验,教师通过测试检验学生上课前对美育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最后,教师针对测试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形成教学专题相关的问题并设计美育课程。

课中:课中教师采用情境教学法、项目式学习等方法,并创设美育情境,让学生明确问题主动思考,教师引导学生感知美育情境,以问题驱动开启学生的美育视角。如在“音乐剧创作”单元,引导学生分组完成剧本编写、音乐创作、表演等任务,培养合作能力与创造力。教师先发布小组合作任务,学生明确问题进行任务分工,同学间合作交流、学习讨论,形成团队合作意识与交流能力,全面参与学习。学生探寻问题的答案时要基于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对美育基础知识要有更深入的理解。教师的角色,在学生讨论交流的时候,适当的引导学生向正确的概念靠拢,形成高效的教学活动。在小组讨论之后,学生充分发挥学习性和主动性,最终有效建构知识结构,从而促进对本节教学主题相关的美育基础知识理解。在合作讨论后,利用不同形式,每组可选择情景表演或绘画制作来进行展示交流,学生获得更多的课堂参与感,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力,提升审美素养。最后教师进行美

育知识整理归纳, 学生进行美育知识总结, 从而达到自我认同感及美育素养塑造的美育浸润目标。

课后: 学工与教师联合组建多样化音乐社团(如阿卡贝拉社、民族器乐社), 定期举办校园艺术节、音乐比赛等活动。在经过前面两个环节后, 课后的学工活动进行组织音乐会活动, 让学生积极参与, 还可开展校园文化角, 让学生自主布置设计, 布置于校园内的每个角落, 比如在食堂、校园宣传栏、黑板报等。教师可在线上开展创设音乐情绪包, 学生自主投放各类符合情绪的音乐, 比如开心、悲伤、痛苦、愤怒等情绪, 每个音乐包投放符合该情绪的音乐, 大家可以自主聆听欣赏。通过课前的教师任务驱动, 课中的问题驱动形成小组合作学习交流, 最后课后的学工组织美育浸润课外活动, 以此达到学生的美育素养内化迁移, 形成美育课程的育人成效。

五、结论与展望

“三全育人”理念为中学音乐教育改革提供了全新方向, 其核心在于将音乐教育从“技能传授”转向“综合育人”。在此背景下, 中学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需实现从“单一教学”到“协同育人”、从“课堂封闭”到“全程渗透”的转型。当前, 中学音乐教师在育人理念认知、协同合作、资源整合等方面仍存在不足, 需通过强化理念学习、完善培养机制、创新教学模式、优化评价体系等途径加以提升。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实证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等方式, 量化分析“三全育人”理念下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的现状与提升路径, 为实践提供更具体的指导。同时,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 如何利用新技术提升音乐教师的教学能力与育人实效, 也将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总之, 在“三全育人”理念指引下, 提升中学音乐教师教学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 唯有如此, 才能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 [Z]. 2018.
- [2] 郑永廷. 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若干思考——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 (01): 4-9.
- [3] 李沐曦. 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理论与实践研究[D]. 吉林大学, 2022.
- [4]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J]. 教育文化论坛, 2016, 8(06): 144.
- [5] 程秋凤. 新课标引领下音乐教师综合教学能力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23.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Middle School Music Teachers under the Concept of "Holistic Education"

Zhang Peilin¹, Yi Xiuhua^{1*}

¹ Affiliation,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0, China

Abstract: "Three-Wholeness Education" is the core concept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 character in China's education field in the new era. It emphasizes breaking down barriers in education,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achieving systematicness and integrity in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As the core carrier of aesthetic education, middle school music education not only undertakes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usic literacy but also shoulders the moral education mission of educating people through beauty and beautifying peopl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ree-Wholeness Education", this paper first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s of "Three-Wholeness Education" and the abilities of middle school music teachers. Then, it analy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ree-Wholeness Education" for the teaching abilities of middle school music teachers, sorts out the current ability dilemmas faced by middle school music teachers in implementing this concept, and finally proposes targeted paths for improving teaching abilities. This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middle school music teachers to practice "Three-Wholeness Education" and achiev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Keywords: Holistic education; Middle school music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Educational reform

基于 OBE 理念的“课证融合”应用型高校软件工程专业课程 改革与实践探索

余 丰¹

(1. 南宁学院, 广西 南宁 521000)

摘 要: 应用型本科软件工程专业教学存在的学生就业市场竞争力弱、学生学习的目标不明确、课程对就业的支撑度低等问题。因此, 提出采用基于 OBE 的理念, 并以通过职业资格认证与水平考试为目标, 使学生学习目标更加明确。通过“课证融合”的方式, 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优化课程内容, 改进授课方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就业竞争力。通过实践检验, 大幅提高了学生通过认证考试的数量。

关键词: 成果导向教育; 职业资格认证; 课证融合; 软件工程

基金项目: 南宁学院 2022 年实践教学示范课程项目 (2022XJYYS0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21

随着毕业生就业市场要求的不断提高, 软件工程教学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向更为动态的能力培养, 以增强在就业市场的竞争能力。采用基于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教育理念, 以“通过职业资格认证考试”为目标, 采用“课证融合”的方式, 不断改进教学, 可以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 OBE 的教育概念

成果导向教育 (简称 OBE) 自 1981 年由斯派迪创设以来, 受到国内外教育学界的追捧^[1]。OBE (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 教育理念, 又称为成果导向教育、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育。OBE 理念是一种以学生学习成果为中心的教育模式, 强调教育活动应围绕学生在完成学习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来设计和实施^[2-4]。OBE 理念是一种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理念, 该理念认为课程设计和实施的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过程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5]。其核心思想是以学习结果为导向, 强调教育的最终成果而非教学过程或输入。传统的教育模式更多关注于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教学内容的覆盖程度, 而 OBE 则转变为重视学生的学习成果, 即学生通过学习能够达到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方面的具体表现。这种教育模式要求教育者首先明确教育的预期结果, 然后围绕这些预期结果设计课程、教学活动和评价方式。所有的教学计划、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系统都是为了帮助学生达成既定的学习成果而设计。

2. 应用型高校本科软件工程专业课面临的问题与现状

应用型高校与研究生型高校不同, 相比研究性大学, 应用型本科软件工程专业学生有以下特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学生就业市场竞争力弱

应用型本科学校相比研究性与综合性大学而言, 首先是基础较弱, 同时学生学习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要弱。在当前大环境下, 学生就业压力较大。特别是民办学校学费较大, 家庭支出较大, 学生及其家庭对就业更加重视。目前软件工程专业用人单位最注重的实际能力。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具体表现形式为学生已有项目经验。二是学生的理论知识, 具体表现形式为学生的毕业证书与资格证书。其中学生所拥有的证书, 特别是“含金量”高的证书, 在就业市场作用更加明显, 市场认可度较高的三类: 一是大

作者简介: 余丰(1979—), 男, 硕士, 讲师、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教育教学。

学学习“必备”的证书。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证书，二是各类大型竞赛的获奖证书，如数学建模竞赛获奖书。三是各类职业资格与水平证书，如全国计算机与软件资格水平考试证书（以下简称“软考”）、华为认证、思科认证。因此，提高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应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提高学生的市场竞争能力。

2.2 学生学习的目标不明确

应用型本科往往建校历史较短，学生之间学业交流及学风传承较差，部分学生从高中的应试的被动式学习难以转向主动式学习。特别是软件工程专业广阔的就业领域，往往没有明确的学习方向，虽然大多数学校开设了职业规划的课程，但大多数应用型本科学校开设的课程针对性不强，往往从性格与职业、简历的制作等方面给学生指导，但具体专业的具体方向则指导性不强。从而使学生的学习缺乏明确的目的。

2.3 课程对就业的支撑度低

当前，部分专业采用了工程认证，评价相比以往更加科学，但部分评价有的过于强调远期的能力。导致学生在学习时，目标模糊，学习缺乏动力。但对于应用型本科学生而言，最紧要的任务是就业问题。特别是在当前应用型本科学校招生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就业质量对学校的招生状况有较大的影响。

3 基于 OBE 理念的课证融合的方法

3.1 根据学生学情，确定合适的学习成果

在 OBE 教育理念指引下的软件工程课程改革中，首先应明确“成果”，成果应是明确的，可测量的，可评价的。“成果”也就是目标，应是适合学生学情的。在确定成果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在成果在难度上，对不同学情的学生，确定不同的目标，但最终的目标是服务于学生的发展与就业。例如，对于“双一流”高校的学生而言，可能是研究成果。而对于应用型或职业本科而言，目标则不能选在研究成果，而是对就业有帮助的资格证书或技能。同时目标不应定的太高，也不应太低，目标应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定得过高、难度太大，学生难以完成，会打击学习的积极性。但目标定得过低，对学生的就业及发展没有帮助，则缺乏挑战与吸引力。因此要使“够一够”才能达到，才能帮助学生提高就业质量，使学生有成就感。

二是在经济上，目标的选取还要符合所属区域的经济特征，使其符合大多数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有些成果的获得，不仅需要学生投入时间，而且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比如部分证书的报名费。以 IT 市场含金量高的思科、华为证书为例，中级的报名费约在 4000 元左右。更有一部分职业资格证书，需要原厂培训，培训费高的在一万元左右，对于经济发达的省份而言，学生的在经济上的投入可能压力不大，但对于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对于没有收入的学生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此目标的选取还要符合区域的经济特征。

三是在学习之初，应向学生明确学习的目标。学生的学习分为课堂与课外之分，只有得到学生认可学习的目标，才能让学生主动在课外学习，从而使学生与老师能合力向目标奋斗，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可利用职业规划课程，或主题班会的形式，讲清当前的就业市场形势，面临的压力，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对就业的帮助。

四是应以学生“成果”来检验教学的成果，而不仅仅教师的成果。在实际教学中课程建设与改革过程中，许多用以证明课程建设的成果往往是教师的成果，例如论文发表、项目立项，但学生自身，“看得见”的成果较少。如果学生长期投入，却没有回报，积极性往往受挫。

在实际选取目标的过程中，充分结合应用型本科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全国计算机与软件资格水平考试（以下简称“软考”）中级。传统的计算机二级、三级考试难度与“软考”难度差距较大，且对提升就业竞争力没有太大的帮助，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而“软考”中级，例如“软件设计师”相对 ACM 或全国计算机程序大赛而言，难度较低，且目标易达成。一是从报考率来看，参加全国计算机与软件资格水平考试中级的同学参考率达到 85% 以上。考试由学生主动报名，学校未做硬性要求，说明该目标符合学生的期望。二是市场的接受程度，经过市场调查和就业信息反馈，相对于应用型本科学生，“软考”中级证书市场认可度高，“含金量”高，应用型本科学生需要努力才能考取。在前期的初步改革实践中，结合学情选取“软考”中级证书，主要选取《软件设计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软件评测师》、《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等证书。且对于计算机与软件相关专业的应用型本科学生而言，用人单位较认可的是“软考”证书，例如《软件设计师》，由于该证书具有“以考代评”的作用，部分企业在评标过程中，需要证明企业的技术实力，而具有软考中高级证书的人员相应具有工程师与高级工程师的资质，因此较受欢迎。三是在前期的就业反馈信息就业数据来看，具有“软考”中级证书的同学，在就业市场竞争力大幅提高，就业专业对口率达 94%，就业率达 100%。说明社会层面认可职业资格证书。因此以“软考”中级考试为“成果”目标。符合学生的学情。本文在进行调查研究后，选取了符合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的目标——全国计算机与软件资格水平考试（以下简称“软考”）中级。后文以此为例进行说明。

3.2 采用 OBE 理念，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树立 OBE 的整体理念，在设置人才培养方案时，可参考职业资格与水平证书的能力要求。市场接受程度高的证书，其要求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市场的需求。进而根据培养目标设置学生的毕业要求，在确定课程体系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与兴趣，开设有针对性的课程。比如对于应用型本科软件工程专业学生而言，大部分学生就业倾向于软件开发，则在课程体系中开设《软件建模技术》、《软件工程》等课程，便于学生考取《软件设计师》证书。另外也有少部分学生就业倾向于软件测试岗，产品经理岗，则开设《软件测试技术》、《软件项目管理》等课程。开设时间上将相关课程的尽可能靠前安排，便于学生尽早通过相应科目的考试，为后期的进一步学习与考研预留时间。在课程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可充分吸收《软件设计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软件评测师》等试题的原题。

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考取证书所要求的能力与知识的深度。最后是课程的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不仅仅考虑传统的期末考试与过程性考核。最重要的时参考学生参加证书考试的成绩，证书的考试由第三方命题，因此成绩更真实。排除了传统期末考试中“划重点”的因素。因此成绩更真实。根据考试情况，可得出参考率，得分率。便于真实掌握学生的知识水平与教学过程中的不足，更好的为修改毕业要求、课程建设、课程实施中的问题提供依据。

3.3 教学目标融入考取证书所需的重难点知识。

在 OBE 理念的指导下，“成果”确定后，师生有了共同的目标。教学起主导作用，坚持 OBE 的教育理念，结合学校学生的基础和社会对证书及能力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在制定培养目标中吸收证书的能力要求。在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应考虑到学生考取证书的需求，即需考虑证书所要求的能力。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对于证书所要求的重要能力，可适当增加学时，使学生达到证书所要求的能力，即使对于证书中考察但课程未覆盖的能力，也可提高告诉学生，学生可通过自学，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在时间安排上，可适度调整课程的顺序，方便增加学生的参加考试。例如，《软件设计师》证书考察了大量软件分析与设计的内容，包括此类知识内容的课程为《软件建模技术》，为了便于学生增加考试机会，在不影响前置课程与后续课程的情况下，将课程由大三上学期调整至大二下学期，这样可为学生增加一次参考机会。考虑到《软件设计师》中关于设计模式的内容相对应用型本科生而言难度较大，《软件建模技术》中增加该内容的实践课时或单独开设《设计模式》等课程，从而提高学生在此类知识内容上能力。

3.4 重构课程内容，课程内容融入证书考试重点难点。

按照 OBE 的理念，培养目标修订后，相应的对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程内容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前期的实践探索中，课程内容变动较大，需要重构课程内容。为了便于学生在考取证书有多个选择，课程的内容的重难点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个证书，而兼顾“证书群”，如图 3 所示。例如，《软件建模技术》可收集《软件设计师》、《软件评测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等多个证书中相关内容的知识点，经过分析后确实课程重难点。《软件设计师》考试相关的知识点分布在近 10 余课程中，包括数据结构、数据库、计算机网络、算法分析与设计、软件工程、软件建模技术等。其中占比重较大，难度较高的知识点分布在《软件建模技术》课程中，而《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考试相关的知识点、考试的重难点则与《软件设计师》有所不同，主要在数据库相关课程中。因此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构时，课程应充分考虑学生考取不同证书所需要的知识点及知识难度，对课程的内容进行重构，同时进一步明确重难点，为学生考取证书提供支撑。

3.5 改进教学方式，使课程难度达到证书考试知识难度。

对教学中的理论部分，主要采取 BOPPPS 模式，在测试等环节，融入考试试题，使课程达到考证所需要的难度。而实践部分，学生能力离“证书”要求差距较大。以《软件建模技术》例，目前对应用型本科软件工程专业学生而言，在涉及编程类课程进行实验时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学生理解不透彻，难以达到一定的难度。其二是课堂效率较低，特别是实践教学部分。一是学生理解不透彻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设计模式”相关知识点方面。该课程主要包含两个部分的知识，UML 与设计模式。而在学习过程中，“设计模式”内容尤其难以理解，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更多采用三个步骤，一是理论讲解，二是代码演示，同时学生跟随练习，三是知识理解提升。但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对知识的理解难以达到一定的难度。以一名 2021 届毕业生为例，在面试过程中遇“编写《观察者模式》的试题”。虽然学习该模式，但理解程度较浅，无法熟练的利用该模式编写代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课堂时间利用效率较低。在代码演示，学习跟随练习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但学生进行跟随练习时，多注重编写代码，对知识理解不透彻，所以难以达到一定的理解深度。二是课堂效率较低，老师进行代

码演示的过程中, 学生跟随练习。但学生在跟随练习的过程中, 部分学生基础较差, 在编程过程中, 出现错误, 虽采取小组互助的练习, 但仍然耗费大量的时间。部分完成编码的学生没有任务, 无事可做。另一部分学生, 老师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帮助学生排错。课堂时间的整体利用率较低。而如果放弃“学生跟随练习”步骤, 学生理解更不透彻。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 改革课堂教学方式, 对课程的实践部分以“混合式”课程思想指导改革。课前, 要求学生通过线上视频学习第一部分“理论讲解”与第二部分“代码演示”内容。为保证课前学习质量, 要求学生将课前跟随练习的代码以成果的形式带入课堂, 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扩展, 加深学生的理解。课中, 一是指导学生扩展在课前编写的程序功能, 帮助学习排除课前编程的错误。二是发布《软件设计师》原题, 要求学生完成习题, 增强理解。三是发布代码编写习题, 要求学生熟练利用所学的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为今后的面试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3.6 课程评价融入“软考”考试结果, 使评价能更加真实及时的反馈教学情况

传统的评价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一种是学生在毕业后通过第三方或用人单位进行评价。其弊端是反馈时间长, 不能及时支撑教学各个环节中的问题修订。另一种是通过平时表现或期末考试, 但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 教考分离的实现有一定难度, 或考试的出题者一般来自于本校, 其视野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考试题目受行政要求影响, 如考试及格率, 毕业通过率等, 未能真实反映教学情况。而“软考”由国家工信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 试题更加全面, 与实际社会需求结合更紧, 其成绩能更真实的反映教学中的问题, 同时排除了行政因素的干扰。因此, “软考”考试结束后, 及时组织学生回顾考试答题得分情况并参照学生的考试通过率, 能更客观的反映教学中的问题。

3.7 其它措施

一是充分利用学生社团, 加大学风建设。对于应用型本科学校而言, 学风的建设非常重要。一方面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融入职业规划的元素, 引导学习考取证书。另一方面, 通过学生社团, 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能更好引导学生考取证书。

二是建立针对考证的常态化答疑机制。学生在学的过程中, 往往有一些问题难以解决, 一方面可以采取线上交流的方法, 通过建立微信群或 QQ 群, 便于学生在线交流, 另一方面采取线下交流的方式, 定期组织专题答疑课, 集中回答学生的问题。

三是收集在线资源学习课程, 为学生自学课程打好基础。部分学生, 积极学习, 希望通过提前学习, 尽早通过考取证书的考试, 会提前学习部分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 收录中国大学 MOOC 中的课程或培训机构的相关课程。并推荐给学, 便于学生自学。另一方面认证考试的知识内容, 通过好课程的体系规划, 大部分内容可被覆盖, 但极少部分内容可能不在教材中, 比如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 可能正式的课堂教学很少涉及。因此通过教学资源库收集的方式, 便于学生自学的同时, 也为课堂教学做好了补充。

四是通过开放实验室促进学生学习。在做好理论学习的同时, 实践教学也不能放松。在“软考”考试过程中, 考察理论的同时, 也考察程序设计及算法等。因此可采用开放实验室的方式, 定期专题指导学生试验, 从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是做好宣传工作与成果展示工作, 激励更多学生主动学习, 积极报考。在推荐学生参加“软考”考试的过程中, 最主要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学生不知道考试相关的信息, 包括报名的时间, 考试的时间, 考试的内容, 如何准备。二是学生不知道考试的难度及通过考试的收益。部分学生在准备考试之前, 会有顾虑。一是考试会不会太难, 担心自己的水平不够, 花费较长时间仍无法通过。二是通过认证, 拿到证书之后, 对就业有没有帮助。因此在宣传的过程中, 重要解答以上几个问题。特别是考试难度与对就业帮助的问题。可以讲清前几届学生的通过率, 因为同一学校的学生基础相近, 授课内容也相近, 具有较好的参照性。二是对就业的帮助, 可以通过数据对比的方式, 列举获得认证与未获得认证的就业率, 专业对口率在说明参考认证的必要性。

4. 基于 OBE 理念的“课证融合”的实践

在实践中, 选取应用型本科高校——南宁学院为研究对象。该校学生大部分来自广西。学生就业主要在广西区域, 部分优秀学生前往珠三角就业。学生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软件工程专业学生在高考录取时分数线时在国家本科分数线 40 分以上左右, 但与公办本科分数线有较大差距。

主要选取了报考率, 通过人数, 通过不同科目的人数来进行统计分析。选择统计样本时, 选取同一届学生来进行统计分析, 每一届软件专业的学生大约在 100 名左右, 主要考虑学生在不同时期的兴趣不同, 所以未选取一次报考率或一次通过率为统计样本。

4.1 报考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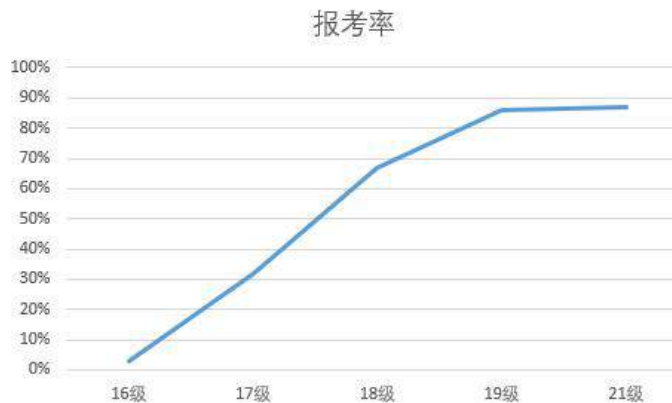


图 1 报考率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16 级仅有不足 5% 的学生报考，从 17 级开始老师利用职业规划课程或主题班会对职业资格认证与水平考试进行了专题讲座，让学生了解了考试的内容，时间，作用等。该认证由学生自愿参加，报名费在 150 元左右。从图 1 数据得出报考率大幅上升，说明该职业资格认证与水平考试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在一种程度上也反应了，职业规划课程的必要性。

4.2 通过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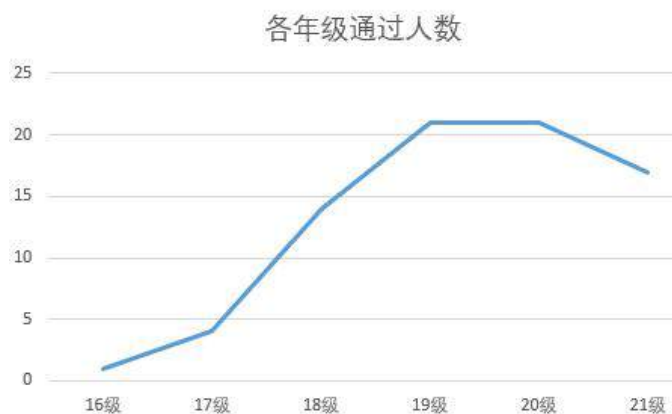


图 2 各年级通过人数

图 2 为各级学生通过“软考”中级的人数，从图中通过人数前期缓步上升，从 17 级开始老师介入指导，经过 17 级，18 级后，学生通过的数量稳步上升，主要原因是老师根据学生的考试情况，认真分析了教学方面的不足，修改了课程体系，完善了教学资源。19 级后学生通过的数量逐渐稳定，在 20 名左右。

4.3 各科目通过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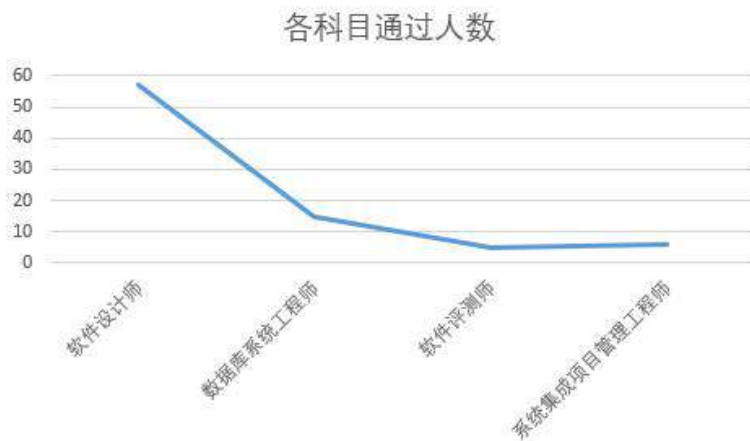


图 3 各科目通过人数

从各科目通过的人数来看《软件设计师》占多数,主要原因在于,一是16级、17级学生主要就业方向为软件开发方向,所以报考《软件设计师》的人占多数。二是部分学生发现自身在编程方向发展较困难后,选择就业方向为软件测试,项目管理等。依据《软件设计师》的学习方法,选择考取《软件测评师》,《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考试。老师在发现学生有报考意向后,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授课的重难点等内容。从上述数据,也说明学生考取“软考”中级有一定的传播示范效应。

5.总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基于OBE理念,选取符合学生学情的目标,然后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在教学目标中融入考取证书所需的重难点知识,重构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式,并在课程评价中融入认证考试成绩,使评价更加真实的反映教学效果。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报考率,提高学习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企业大幅裁员,企业招聘的人员数量减少。同时要求也有了相应的提高,比如程序员的门槛逐步提高,往往需要211学校以上学历或硕士研究生。由于部分公司在项目投标过程中,需要证明公司的实习,所以拥有“软考”中级以上证书的同学相对没有的学生仍然受市场欢迎。但应用型本科学生就业相对以往更加困难,因此需要进一步探索,在选择市场认可度高的职业资格证书的同时,不断提高学生实践工作能力,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参考文献:

- [1]申天恩,斯蒂文·洛克.论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J].高校教育管理,2016,10(05):47-51.
- [2]何坤欢,黄学仁,李家明,等.OBE理念下化工专业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践与探讨[J].高教学刊,2024,10(19):157-160.
- [3]李磊.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OBE理念[J].中国高校科技,2021(8):70-74.
- [4]周显鹏,俞佳君,黄翠萍.成果导向教育的理论渊源与发展应用[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1,37(3):83-90,113.
- [5]吕帅,朱泓,赵磊.基于成果导向理念的教育改革实践与探索:以英国邓迪大学为例[J].重庆高教研究,2017,5(02):101-106.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urse Certificate Integration"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Major Curriculum Reform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Based on OBE

Yu Feng¹

¹Nanning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software engineering majors has problems such as weak competitiveness in the job market, unclear learning goals for students, and low support for employment through courses.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adopt OBE, with the goal of passing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proficiency exams, make students' learning objectives more clear.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urses and certificates, continuously improve talent cultivation plans, optimize course content,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tudents'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practical testing,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ssing certification exams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Keywords: OBE; vocational qualified certification; integration of courses and certificates; software engineering

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探析

陈明厚¹ 王淑娴¹ 庞芳芳^{1*}

(1.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 北京 102202)

摘要:消防救援人员在高压工作环境中面临许多心理应激因素,其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高于普通群体。消防救援院校大学生作为这一领域的储备人才,需要注重心理健康教育,以应对未来灭火救灾和抢险救援中可能遇到的心理问题。本文阐述了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以及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了目前该课程体系建设现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从构建科学明确的课程体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的逻辑层次和增强课程教学的深度体验感三个层面论述了课程体系的构建路径,从而实现消防救援后备力量心理健康水平的促进和提升。

关键词:消防救援;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教育改革

基金项目: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 2024 年面上课题(MS2024416)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22

一、引言

消防救援人员长期处于高压的工作环境,面临诸多应激因素,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要远高于普通群体。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应突出“消防大学生的消防救援队伍储备人才”角色,课程体系建设必须针对学生关注的心理健康话题,明晰教学目标,精选教学内容,切实做到有效维护消防后备人才的心理健康水平,进一步健全其人格,提高其心理素质以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救援任务。因此,无论从新时期消防稳定发展的强基固本层面,还是从落实国家政策角度而言,在消防救援院校构建并不断完善具有消防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成为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工作。

二、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内涵

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持续进行改革,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改革受到越来越多关注,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高校应按照本纲要确定的原则、内容,因校制宜制定健康教育教学计划”。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了“应当切实把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教师、教材、课程、学科、专业等建设,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建设,全方位强化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方面,不少学者也做了较多研究与论述。王雪燕等学者研究提出了该课程体系是在心理健康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发展规律、特点以及需求,以培养心理素质良好,身心全面发展的大学生为目标,设置多层次、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和课程群,在教学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实践体验,提高学生的适应和调控能力^[1]。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教育体系,旨在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水平。课程体系建设涵盖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形式、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一是在课程体系

作者简介:陈明厚(1977—),男,在职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消防救援心理学;

王淑娴(1983—),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心理学;

庞芳芳(1987—),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心理学。

通讯作者:庞芳芳

建设目标上突出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发展健全的人格,增进心理健康水平。二是在课程内容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应当包括心理学通识课程、心理健康应用课程和综合应用课程等课程群。三是在课程实施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通过课堂教学、教育活动、咨询服务及危机干预等多种形式实施,组织和引导大学生开展内容灵活、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四是在课程评价与反馈方面包括了对课程设计的合理性、实施效果的评价,以及对学生在课程中的表现和进步的评价。消防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应在此基础上增强消防大学生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保持心理健康状态,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习和救援工作任务。

三、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现状

与普通高等院校相比,消防救援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长期以来,消防救援院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比较轻视,多数与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政策文件不能被及时有效地实施,致使心理健康教育沦为一种口号和装饰物^[2]。

自2018年消防改革改制以来,作为应急救援的主力军和国家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职能范围从过去的防火灭火,逐步向全灾种、大应急救援转型,还新成立了地震、山岳和水域等专业队伍。救援职能的大幅拓展,遂行任务的成倍增加,使得消防救援人员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当前,消防救援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 课程目标与队伍需求结合不足

对于基层消防救援队伍来说,心理素质较弱的消防员在经历重大灾害事故救援后,更易出现诸如紧张、焦虑和恐惧等心理反应。另外,由于消防员长期处于身心高度警觉的应激状态,心理压力较大,而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保障消防员快速恢复状态,保持充足的战斗力^[3]。如何在学生时期培养消防员良好的心理素质,为将来的救援任务储能,是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

目前,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通识教育出发,辅以消防救援过程中的专业心理知识,以及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心理学知识,如上心理健康课程体系虽已经初步具备职业化心理健康教育的特点,然而课程目标并不明晰和完善,针对基层消防救援人员心理状况作出有针对性的指导、对于不同专业学生的心理教育工作能力作出具体分层要求、指引基层消防人员塑造积极心理品质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通过量化调查确定。

(二) 课程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层次性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课程模式的设计还是课程实施的内容和方法,都应该从系统发展的角度出发,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各种心理困惑。目前,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主要是单一的学科课程教学模式,按健康心理学的知识逻辑来组织课程体系,很少能兼顾大学生的心理需求,课程模式比较单一,缺乏灵活性。

如何将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根据学生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和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心理健康教育配套课程,是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地基”,实现心理健康问题从被动干预到主动预防,提升心理素质,实现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关键问题^[4]。

(三) 课程教学形式过于单一

一项全国范围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调研显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授课形式上,92.6%的高校采用讲授为主或讲授与活动结合的方式,极少数高校以活动为主^[5]。

目前,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也存在着教学方式过于偏重知识传授,教学内容偏重于实现知识维度的目标,当前的授课多采用大班教学,教师很难详细了解到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要,无法更好实现差异化教学。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明确指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是集知识传授、心理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的公共课程。其中,体验式教学是指在教师合理创设特定的情境下,通过各种有效教学方法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自我经历、亲自感知、体验所要学习的知识,使学生在亲身体验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发展能力、运用知识的一种多向传递互动教学模式^[6]。然而,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还处于实现沉浸体验式教学的初级阶段。

四、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路径

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应顺应新时代发展的方向,遵循消防救援院校大学生的职业特点和心理、生理发展规律,聚焦激发消防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反应,开发更贴近基层消防救援工作与队伍管理的心理学课程群,精准课程教学目标,全方位优化课程内容,采用多样化教学方式和现代化科技教学手段增效教学,提升消防储备人才的心理健康水平。

根据《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政策要求,基于以上分析,本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改革突破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 构建精准的课程体系目标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促进全体指战员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提高消防救援队伍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基层建设纲要》要求,新形势下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心理健康工作必须从队伍特点与指战员的心理实际出发,注重运用心理学的一般知识和方法,把握消防救援队伍心理健康工作的特殊要求与内在规律。

心理健康课程体系的构建目标本质上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才,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因此,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课程建设的总目标应该遵循心理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心理发展原则,凸显消防特色,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消防十六字”方针,不断塑造其积极的心理品质,开发其心理潜能,促使学生生成心理健康管理能力。

围绕着总目标,具体分设以下三个分层次目标:课程体系构建目标应循序渐进实现“心理理论知识建构——心理疏导能力生成——心理素质提升”三维度目标的螺旋上升。在知识层面强化消防大学生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体系;在能力层面,掌握心理疏导技巧、情绪管理、环境适应、消防职业生涯规划、应激与心理危机应对、救援任务环境下的心理调控等综合心理能力;在心理素质层面,通过精选教学活动加强沉浸体验,持续提升消防大学生的坚强意志品质,提高其在恶劣救援环境任务中的压力、挫折耐受度,以阳光乐观心态不断积淀积极心理品质。

(二) 完善课程体系的逻辑层次

通过对基层消防救援队伍的心理健康现状与人员需求进行调研,结合消防救援的职业特点,分层次、多批次开设一批特色课程,例如消防救援心理学、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学、心理与行为训练等。

一是立足学情需求,增设心理健康体系课程。对不同年级学生的阶段性任务和心理困扰,增设相应的公共选修、必修课程,使消防大学生在大学四年学习生涯中感受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心理健康教育的滋养。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需要根据学生的主体需求,结合时代特点,开设诸如《健康人格心理学》、《积极心理学》、《人际交往心理学》、《恋爱心理学》、《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学在消防队伍中的应用》、《基层心理工作》等公共选修课程。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阶段的心理困惑和心理成长需求。

二是遵循心理规律,强化体系课程群的层次衔接。关于心理学公共选修课程的开设,可以通过对不同年级学生开展调查研究来确定。不同阶段的学生所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很大差异,对于教育内容有不同的需求。例如,对刚入校的大一新生而言,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了解通识性的心理健康理论知识,快速适应大学校园生活。大二、大三年级的学生则主要关注人际关系、情绪与压力管理、性与恋爱心理、人格发展、如何应对心理危机等方面[7]。此外,消防救援院校的政工类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突出“学以致用”的理念,因此应为大三、大四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消防基层心理工作方法、技巧,基层心理工作能力提升等心理技能培训类课程,从而活化心理健康教育理念从内化到“致用”的实践。

(三) 增强课程教学的深度体验感

研究表明,运用体验式教学模式可以显著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减少抑郁、焦虑和其他消极心理的产生^[8]。并且,与专题讲座相比,体验式教学在优化大学生心理素质和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上有更好的效果,教学效果也更佳^[9]。与传统的知识传授式教学相比,体验式教学在教学情境中可以唤醒学生对知识的直接感受,激发学生情感体验和学习动机,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成为主体,增强其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并且学生主动进行知识内化,通过心理体验,联结课堂学习和实际生活,进一步提高学生在人际交往、情绪调节等方面的调适能力,提升心理

健康素质^[10]。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中也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增强学生对课程教学的体验感。

一是注重实效，采用多样化教学形式与方法。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课程中更强调参与和体验。可以运用心理游戏、情景体验模拟、角色扮演、团体心理辅导、案例分析、小组研讨、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的运用，增强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丰富性和思维的深刻性的深度体验和理解。

二是瞄准焦点，定期开展专题讲座。聘请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消防救援院校大学生的职业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开展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如恋爱与性、人际关系、情绪与压力管理、职业生涯规划等，把专题学术讲座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中来，塑造一个具有浓厚学术氛围的心理健康教育外部环境，让学生充分体会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三是强调机动，开设心理网络课程。网络是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消防救援院校也可以充分运用网络资源，以网络为心理健康辅导和知识宣传的辅助“战场”。学生通过在线课程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调适的技巧，形成课内与课外联动，线上和线下协同，体验与学习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见缝插针帮助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调适的技巧，预防和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

综上所述，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路径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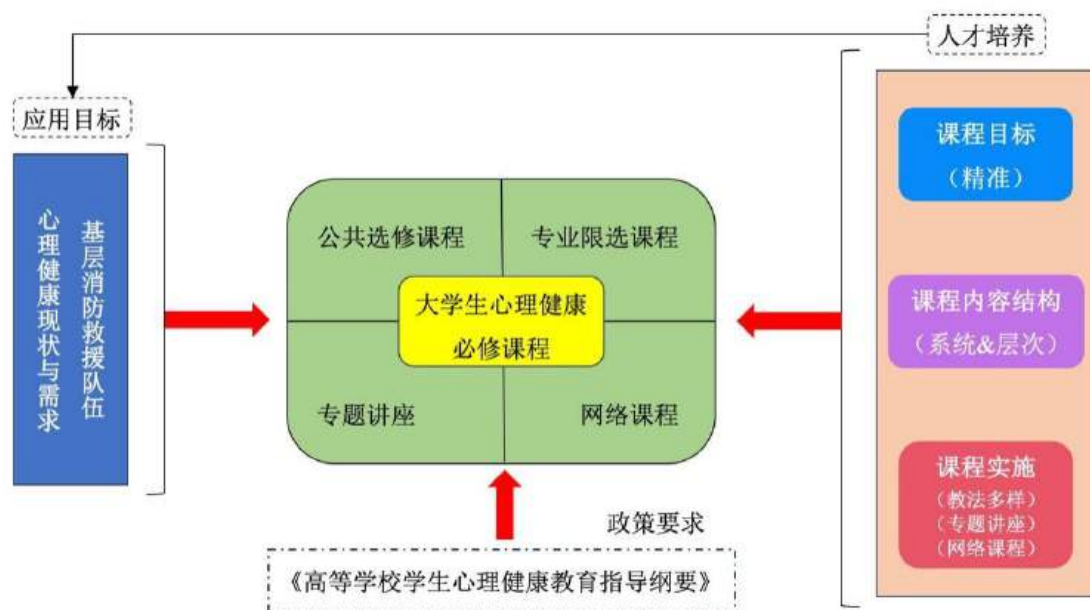


图 1 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路径

四、结语

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化工、商业、居民区等火灾发生的危险越来越大，对消防救援队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各地消防救援人员面临着财政收入差距大、应急救援任务繁重、现代化消防设备与紧张战斗的对比，心理压力无形之中增加^[11]。符合消防职业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对于作为消防后备人才的消防救援院校大学生，乃至整体消防指战员而言，学习日常心理健康维护、任务中的心理调控以及任务后的心理规建与干预都有着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从基层消防救援队伍对心理健康的整体需求出发，按照《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政策要求，完善消防救援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提升消防救援院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心防”建设。从广义上讲，这关系到整个消防队伍的安全稳定，是保持救援战斗力的有力而基础性保障。

参考文献：

- [1] 王雪燕, 张强. 疫情之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存在问题及应对举措[J]. 福建茶叶, 2020, 4: 266-267.
- [2] 陈庆. 消防救援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现存问题分析[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6(05): 63-66.

- [3] 李秀. 公安消防救援队伍士官学员心理健康现状调查研究[J]. 卫生职业教育, 2018, 17: 118-120.
- [4] 胡邓, 张晓京, 文书锋. 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通识课的理念和实践[J]. 中国高等教育, 2010, 21: 23-24.
- [5] 俞国良, 赵凤青, 罗晓路. 心理健康教育:高等学校学生的认知与评价[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7, 9: 110.
- [6] 杨四耕. 体验教学[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5: 78.
- [7] 夏纪林. 构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系的思考[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06, 6: 70-72.
- [8] 高飞. 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体验式教学[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4(1): 95.
- [9] 邱小艳, 宋宏福.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体验式教学的实验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3, 12(1): 98.
- [10] 于成文, 史立伟, 王艳. 体验式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探索与应用[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8, 5: 137.
- [11] 王超宇. 浅析消防改革对消防员心理健康的影响及检测方法研究[C]. 中国消防协会科学技术年会论文集, 2018.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Fire Rescue Colleges

Chen Minghou¹, Wang Shuxian¹, Pang Fangfang^{1*}

¹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102202, China

Abstract: Firefighters face many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in high-pressure work environments, and they are at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tha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s students in fire and rescue colleges serve as reserve talents in this field,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ey may encounter in firefighting and rescue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fire and rescue colleges and its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es, we have identified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of this curriculum, and 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from three levels including constructing scientific and clear objectives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perfecting the logical levels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depth of experience of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chieve the promo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reserve firefighters.

Key words: fire and rescu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education reform

人工智能辅助形成性评价应用于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的研究

—以外研社必修 3 Unit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为例

金岚¹ 刘峻利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

摘要: 随着 AI 技术发展, 其在教育领域应用渐广, 尤其为解决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记忆效果差、评价单一、反馈滞后等问题提供了可能。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理论探讨法, 聚焦 AI 辅助形成性评价在该教学场景的应用, 剖析教学现存问题与形成性评价理论基础, 阐述 AI 与形成性评价的契合点, 并从设计原则、应用模式、实施步骤提出可行策略, 以期为一线教师提供新思路与可操作方案。研究表明, 该模式可增强词汇学习的个性化、及时性与可持续性, 但推广受技术、师资、观念等挑战制约, 需在实践中持续优化。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形成性评价; 高中英语; 词汇教学; 教学创新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24

一、引言

随着 AI 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 智能测评、个性化推荐等功能为破解高中英语词汇教学痛点提供了新路径^[1]。高中英语词汇教学既需满足《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掌握 3500 个左右核心词汇并灵活运用”的要求, 还需依托“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题语境实现意义建构, 但当前教学中, 学生机械背诵导致记忆碎片化、评价侧重终结性测试忽视过程、教师反馈滞后等问题突出^[2]。例如外研社必修 3 Unit4“Science and technology”单元, 学生虽能拼写“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词汇, 却难在“科技发展利弊”语境中准确应用, 传统评价亦无法捕捉此类深层问题。

本研究聚焦该单元“innovation, algorithm”等主题词汇群, 采用文献分析与理论探讨法, 梳理 AI 与形成性评价的融合路径, 构建“主题导向的 AI 评价模式”, 旨在解决主题词汇应用评价缺失等痛点, 为一线教师提供“技术+主题”融合的教学方案, 同时丰富 AI 教育应用的学科适配理论, 推动词汇教学从“孤立记忆”转向“主题关联的深度应用”, 助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二、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 核心概念界定

本研究聚焦教育场景中与词汇教学评价、个性化指导直接相关的 AI 技术, 具体包括: 智能测评系统 (自动生成词汇试题、批改并统计错误类型)、个性化推荐技术 (依据学生答题数据推送词根词缀讲解、例句练习等资源)、数据追踪技术 (实时记录词汇记忆量、复习频率等轨迹, 为形成性评价提供动态支撑), 核心是实现“数据采集-分析-反馈-优化”的智能化评价闭环。

本研究中, 形成性评价^[3]是贯穿高中英语词汇教学全流程 (课前、课中、课后)、以促进词汇能力发展为核心的动态评价, 区别于传统终结性测试: 课前通过小测评定位基础, 课中实时反馈调整教学节奏, 课后错题复盘跟踪进步。评价不仅关注记忆准确率, 更分析错误原因 (拼写混淆、语境误用等) 并提供改进建议, 最终实现“以

作者简介: 金 岚 (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学科教学 (英语);

刘峻利 (2000-) 女, 硕士 研究方向学科教学 (英语);

通讯作者: 金岚

评促学、以评促教”。以《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为导向，教学内容涵盖课标 3500 个核心词汇及语境应用、搭配规则、文化内涵等，目标分三维度：认知维度（掌握音形义）、应用维度（读写说中正确使用）、素养维度（通过词汇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词汇教学需与听、说、读、写技能训练结合，形成性评价指标亦需围绕此综合目标设计。

（二）理论支撑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4]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受个体经验与情境影响，这为形成性评价提供核心依据^[5]：一是评价需关注词汇学习“建构过程”（如理解生词、关联旧词的思维轨迹），而非仅统计正确率；二是主张个性化支持，为 AI 定制差异化评价方案提供支撑。实践中体现为两场景：①知识建构：AI 针对“Science and technology”单元推“主题词汇联想任务”（如从“environment”延伸“pollution, protect”，关联“科技助环保”主题），引导构建词汇网络。②个性化支持：AI 通过初始测评识别短板（如薄弱“科技过程类词汇”），推送差异化资源（实验步骤短视频）。

自适应学习理论^[6]核心是“依学习者特征动态调整学习内容与路径”，与 AI 特性高度契合^[7]，为 AI 辅助评价提供逻辑框架：AI 先通过初始测评将学生分基础层、提高层、精通层，再推适配任务，且实时分析数据动态调整难度。实践中体现为：基础层推“词汇认知任务”（如匹配“algorithm-算法”），提高层推“句型应用任务”（如用“invent”补全句子），精通层推“短文写作任务”（如写“AI 助环保”短文）。基础层连续 3 次正确率达 90%自动升级，精通层出错则推语境资料，实现“评价-学习-再评价”循环。

间隔重复记忆理论^[8]核心是“依遗忘速度动态调整复习间隔”，新学词汇间隔短、掌握词汇间隔长，为 AI 评价内容设计提供科学依据。实践中体现为：AI 针对“Science and technology”单元词汇，结合记忆数据算“最佳复习间隔”——如“biotechnology”首次正确率 60%→1 天后推短文检测，二次 85%→3 天后推词义匹配，三次 95%→7 天后推口语练习，强化记忆持久性。

三、AI 与高中英语词汇形成性评价的契合性

形成性评价以“过程性、个性化、可持续性”为核心特征，AI 在数据处理、动态调整、长期追踪等方面的优势，可精准满足这些需求，二者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深度契合。

（一）满足过程性需求：实时追踪与即时反馈

从满足过程性需求来看，形成性评价的核心诉求是打破“终结性测试”的局限，聚焦词汇学习的动态过程，AI 技术通过实时数据追踪与即时反馈构建了过程性评价的技术闭环。传统词汇教学中，教师仅能通过课堂提问、课后作业了解局部情况，难以捕捉“词汇记忆频率”“错题思考时长”等细节数据，而 AI 可依托数据采集技术，精准记录学生词汇学习全轨迹，比如学生练习“accommodate”时多次漏写中间的“m”，AI 会自动标记该拼写薄弱点并关联后续评价重点，让评价直接基于过程数据生成结论。同时，传统评价中教师批改需 1-2 天，反馈滞后易强化错误记忆，AI 则能在学生完成测试后 10 秒内生成结果，还会针对错误类型推送解析，如因词义理解偏差出错时展示多语境例句、因搭配模糊出错时列出常见搭配，契合形成性评价“及时干预”的需求，帮助学生在遗忘临界点前修正错误。

（二）满足个性化需求：定制方案与指导

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高中学生的词汇基础、学习风格存在显著差异，形成性评价需针对个体差异提供个性化方案，AI 的自适应与数据建模能力恰好能实现这一目标。评价方案定制上，AI 通过初始测评构建学生“词汇能力画像”，为基础薄弱学生设计侧重拼写、词义匹配的基础认知类评价，题目难度控制在课标核心词范围，为基础较好学生设计侧重词汇填空、短文写作应用的评价，引入课标拓展词与复杂语境，还会根据学习风格调整形式，如为视觉型学习者推送图文结合的测试、为听觉型学习者提供听力辨词任务，解决传统评价“一刀切”的问题。学习指导个性化上，传统评价中教师反馈多为“加强词汇记忆”等笼统建议，AI 则能结合评价数据定位具体问题并关联资源，比如学生时态相关词汇应用频繁出错时推送语法微课、对文化相关词汇理解有偏差时推荐中西方文化对比材料，让形成性评价真正成为“促进学习”的工具。

（三）满足可持续需求：档案建立与模型迭代

从满足可持续需求来讲，形成性评价需伴随学生词汇学习全过程，实现长期监测与持续优化，AI 的档案管理 with 模型迭代能力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持。学习档案建立上，传统教学中学生的词汇学习记录分散在作业本、试卷中，难以系统留存分析，AI 可构建动态更新的“学生词汇成长档案”，整合“每月测试正确率变化”“薄弱词汇类型

演变”等数据，既为教师提供学情分析依据，也让学生直观看到自身成长，增强学习动力。评价模型迭代上，AI 会通过积累的教学数据优化评价体系，分析评价任务的区分度与效度，比如调整表述歧义的题目、优化难精准衡量的评价指标，还能根据课标更新纳入新增主题词汇，形成“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效果提升”的循环，确保形成性评价始终与教学目标、学生需求保持同步。

四、AI 辅助形成性评价的应用策略

在高中英语词汇教学中应用 AI 辅助形成性评价，需以科学的设计原则为指引，构建覆盖教学全流程的应用模式，并遵循清晰的实施步骤，才能充分发挥 AI 技术优势，切实提升词汇教学效果。不同学生背景（年龄、性别、水平）在 AI 辅助词汇学习中的表现可能不同，例如 Oman 的一项研究发现这些变量对效果有显著影响^[9]。

（一）应用设计原则：为策略落地划定核心准则

遵守目标导向原则，紧扣“Science and technology”单元主题词汇教学目标，将“掌握主题词汇的音形义”“能在科技语境中灵活应用”“理解科技词汇的文化内涵（如‘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全球共识）”拆解为具体评价指标（如表 1），确保 AI 评价任务围绕指标展开。

表 1 评价指标

评价维度	具体指标	AI 评价任务示例
词汇认知	主题词汇拼写正确率、词义匹配准确率	拼写“nanotechnology”；匹配“algorithm”与“算法” 用“experiment”完成“Students _____ in the lab yesterday.”
词汇应用	主题词汇在句型、短文中的应用正确率	在“科技环保”短文中补充“data analysis helps _____ pollution.”
文化理解	对“sustainable development”等词汇的文化内涵解读准确性	判断“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ly refer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的正误，并说明理由

任务设计上，AI 系统提供多样化选择：学生可按学习节奏选“5-10 题碎片化短测试”或“20-30 题系统性长测试”，也可自主选择文字答题、听力辨词、图片联想等评价形式。结果呈现上，AI 以学生易懂方式展示数据（如折线图呈现词汇正确率变化、标签化标注薄弱点，并开放自主查看错题解析、调整复习计划功能，推动学生从“被动接评”转向“主动参与评价与改进”。

遵守数据安全原则，针对 AI 评价涉及的学生学习数据，需建立严格安全机制：工具选择优先合规平台，仅采集词汇学习相关数据（答题记录、记忆轨迹），不收集无关个人信息。数据采用加密存储，设置分级访问权限（如教师仅查看本班数据），且仅用于词汇学习分析与评价优化，不向第三方泄露。需明确告知学生与家长数据用途及保障措施，获取知情同意以消除隐私顾虑。

遵守实用性原则，AI 评价需贴合教学实际，降低师生负担。工具选择界面简洁、操作便捷的系统：教师端支持“一键布置任务”“自动生成学情报告”，学生端通过微信小程序、轻量化 APP 参与，无需复杂下载。评价频率与时长适配课堂节奏，课前测评≤5 分钟，课中每 15-20 分钟穿插 3-5 题实时检测，课后复习灵活安排，避免占用过多教学或学习时间，保障策略长期落地。

（二）应用模式：构建覆盖教学全流程的评价体系

在课前预习阶段，教师通过科大讯飞智学网提前 2 天推送“科技主题基础测评”（10 题/5 分钟），AI 实时生成班级报告（如“65% 学生未掌握‘robot’动词用法”）与个人诊断（如“薄弱点：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词义”）。教师依报告调整课堂重点，学生针对性预习薄弱词汇。

在课中学习阶段，教师通过智学网小程序分时段推送任务：新词汇讲解后推 3 道巩固题（5 分钟），AI 反馈正确率（< 70% 重讲，≥ 90% 进下一环节）。课堂练习推应用型任务，AI 标记典型错误、生成答题热力图，教师集中纠错并对耗时超 2 分钟学生一对一指导。

在课后复习阶段, AI 生成个性化方案: 已掌握词汇 (如 computer) 按间隔推送对话/短文检测, 薄弱词汇 (如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推目标匹配、造句等任务。每周生成学情报告 (如 7 天前词汇留存率 82%), 教师提醒薄弱词汇复习, 学生调整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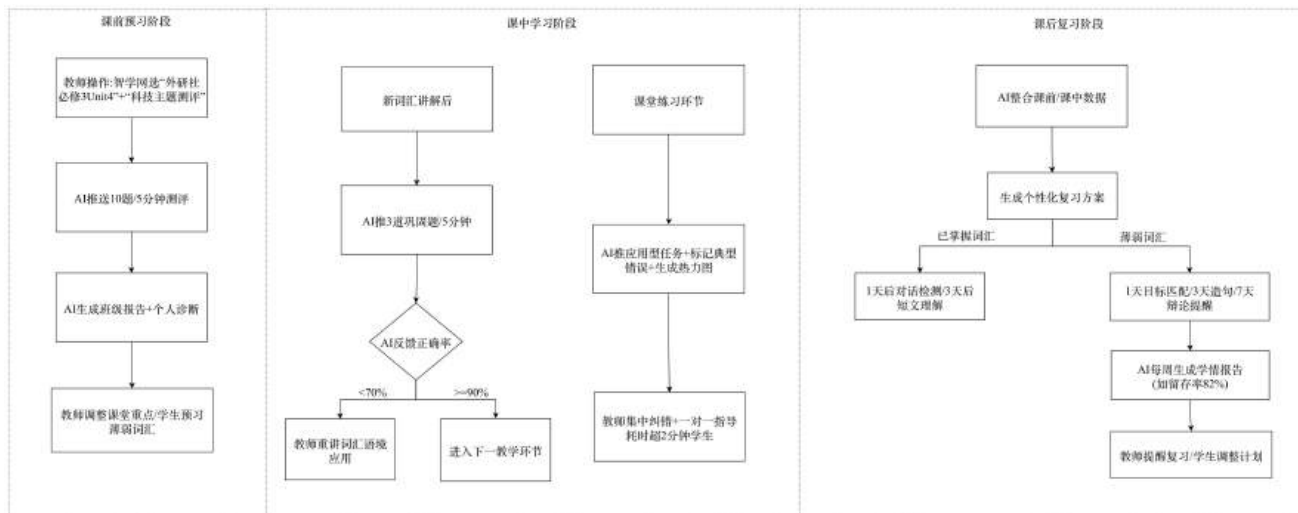


图 1 应用模式

(三) 实施步骤: 确保策略有序落地与优化

在前期准备阶段, 需要夯实基础, 为后续应用做好铺垫。AI 工具的选型应优先考虑与外研社教材同步的科大讯飞智学网。该平台内置“必修 3 Unit 主题词汇库”, 支持“自定义评价指标”和“生成主题词汇学情报告”, 且操作简洁高效, 教师端仅需三步即可完成任务布置, 学生端则可通过微信扫码参与。为确保顺利实施, 教师需接受两次培训: 第一次重点讲解工具的基础操作, 包括导入主题词汇库和查看学情报告, 并通过实操演示如何在一分钟内推送课前测评; 第二次则侧重数据解读与教学调整, 结合“班级主题词汇正确率 80% 但应用率仅 50%”的案例, 指导教师如何优化教学策略, 如增加应用类任务。同时, 还需对学生开展一次培训, 演示“扫码参与评价—查看错题解析—接收复习任务”的完整流程, 帮助其熟练掌握工具使用方法。

中期实施阶段采用“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方式, 避免一次性全面推广带来的适应难题。第一阶段 (1-2 周) 主要在课后复习中应用 AI 评价, 让师生初步熟悉操作与模式; 第二阶段 (3-4 周) 逐步增加课堂中的实时检测应用, 重点实践“实时检测—动态调整”的教学配合; 第三阶段 (5 周及以后) 全面应用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评价模式, 形成完整的教学闭环。在实施过程中, 教师需每周收集师生反馈, 例如“AI 任务难度是否合适”“操作是否便捷”, 并及时解决应用中的问题, 如调整任务难度、简化操作步骤, 从而保证实施的顺畅推进。

后期优化的核心是“以数据反馈为依据, 不断改进应用策略”。教师应分析 AI 生成的教学数据, 例如班级整体词汇学习效果 (学期初与学期末词汇测试平均分对比、各阶段任务正确率变化)、AI 评价对教学效率的提升情况 (如教师批改作业时间减少比例)。若数据显示某一阶段评价效果不佳 (如课后复习评价的词汇留存率未提升), 则需分析原因 (如任务难度过高或复习间隔不合理), 并相应调整策略 (如降低难度、优化复习间隔)。同时, 应结合师生的长期反馈, 全面了解 AI 辅助形成性评价的优势与不足。例如, 学生可能认为 AI 反馈详细但希望增加更多互动形式, 教师则可能认为学情报告有价值但期待更多个性化教学建议。基于这些反馈, 可以推动工具功能优化 (如增加词汇游戏化评价形式), 并在学情报告中附带教学建议, 以确保 AI 辅助形成性评价持续适配教学需求, 发挥最大效用。

五、应用挑战与展望

(一) 主要挑战: 多维度制约 AI 辅助评价落地

在技术层面, AI 对词汇应用能力评价易“机械判断”, 仅能检测拼写、语法错误, 难识别“词汇搭配生硬”“语境适配不当”等深层问题。多数 AI 工具词汇库更新滞后, 未纳入新课标新增主题词汇 (如“碳中和”“元宇宙”相关英文词汇), 与教学实际脱节。

在师资层面, 教师面临双重短板: 一是操作局限于“布置任务、看分数”, 无法熟练使用“自定义评价指标”等进阶功能; 二是难解读海量数据 (如词汇错误占比、复习间隔与留存率关联数据), 无法将“学生高频错动词短语”等数据转化为教学调整策略, AI 数据未发挥实效。

在社会与心理因素层面,教师支持、家长支持和学生的学习韧性在 AI 辅助词汇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10]。此外,游戏化形成性评价被证明能够显著提升 EFL 学习者的动机与参与度^[11]。

(二) 优化方向与未来展望

在技术升级上,需推动 AI 工具向“深度评价”与“精准适配”发展。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迭代,提升 AI 对词汇应用能力的评价深度,例如引入“词汇搭配库”“语境适配模型”,让 AI 能识别词汇使用的灵活性与恰当性。另一方面,加强 AI 工具与教材、课标的协同开发,鼓励企业与教育部门合作,推出“教材同步版”AI 评价工具,确保评价内容与教学进度、课标要求高度契合。

在师资培训上,构建“技术+数据”双维度培训体系。学校可联合 AI 企业开展分层培训,基础层培训聚焦工具操作技巧,提升教师使用熟练度。进阶层培训侧重数据解读能力,通过案例教学(如“如何根据 AI 数据调整词汇复习计划”),引导教师将数据转化为教学策略,同时建立“教师技术互助小组”,让技术熟练的教师带动同伴共同提升。

在观念引导上,以“成果示范”打破认知误区。学校可选取部分班级开展 AI 辅助评价试点,定期展示试点班级的教学成果(如词汇测试平均分提升、学生复习效率提高),用实际效果消除教师的技术焦虑。同时,通过“AI 反馈与教师反馈对比”活动,让学生直观感受 AI 反馈的即时性、针对性优势,逐步建立对 AI 评价的信任,转变学习观念。

未来 AI 辅助高中英语词汇形成性评价可向“多技术融合”方向突破,其中 AI 与 VR(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前景广阔。借助 VR 技术,可构建“沉浸式词汇学习场景”,例如在“购物场景”VR 环境中,学生通过与虚拟店员对话使用英语词汇,AI 实时评价学生词汇发音、搭配、语境应用的准确性,并即时推送纠错提示与拓展词汇。此外,AI 与大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可实现“跨学科词汇关联评价”,例如在科学课英语词汇学习中,AI 通过分析学生数学、物理学科的英语词汇掌握情况,构建“学科词汇能力图谱”,为学生推荐跨学科词汇学习资源,推动词汇教学从“单一学科”向“综合素养”延伸。

六、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外研社必修 3 Unit4 Science and technology”单元为载体,探索 AI 辅助形成性评价在高中英语主题词汇教学中的应用,核心价值有三:一是主题关联的个性化,AI 依单元主题词汇群定制评价方案(如“科技环保”子主题中,为基础层推认知任务、精通层推应用任务),破解传统评价“一刀切”问题,助力学生建立词汇与主题的深度关联;二是语境适配的及时性,AI 实时追踪学习数据,10 秒内生成反馈并推送语境资料,避免错误记忆强化,同时帮助教师即时调整教学节奏;三是素养导向的可持续性,AI 建立“主题词汇成长档案”(如学生“科技词汇”应用正确率从 50%升至 85%)实现长期监测,且评价融入“科技伦理”等内容,兼顾词汇能力提升与文化意识、社会责任感培养,推动学科育人。

(二) 实践建议

教育管理部门应加大“主题适配型 AI 词汇评价工具”投入,联合企业开发“教材同步版”工具(如外研社全册主题词汇库),编写《AI 辅助高中英语主题词汇评价指南》,明确多主题评价指标设计、AI 数据解读方法。高中学校应构建“AI+主题词汇教学”常态化机制,将 AI 评价应用频率、学生词汇掌握提升率纳入教师考核,定期开展 AI 主题教学案例评选,完善数据安全制度(仅采教学相关数据、加密存储、分级授权)。一线英语教师应提升“主题-技术”融合能力,从“被动用 AI”转向“主动设计评价方案”(如“文化交流”主题中设计跨文化词汇对比任务),每两周开展 AI 评价反馈座谈会,依学生意见调整策略,形成“教师主导、AI 辅助、学生主动”闭环。

(三) 研究不足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在实证范围窄,仅以“Science and technology”单元为案例,未验证多主题适用性。此外,技术应用浅,AI 仅能评价词汇拼写、基础应用,难识别搭配恰当性、情感色彩,未充分结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未来将开展多主题实证研究,选 3-5 个典型主题单元,对比实验班与对照班差异,量化策略普适性。二是深化技术融合,探索 AI 与 VR 结合(如“科技博物馆”VR 场景,实时评价词汇应用)^[12]。三是聚焦教师能力提升,设计“AI+教师指导”协同培训方案,强化“主题-技术”融合应用能力。

参考文献:

- [1] Alazemi A F T.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artificial integrated instruction: delving into the effect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progress, online academic enjoyment, personal best goals, and academic mindfulness[J]. *Language Testing in Asia*, 2024, 14(1): 44.
- [2] Zhang H, Ge S, Saad M R B M.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K-12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J]. *Heliyon*, 2024, 10(10).
- [3] 高凌飏. 过程性评价的理念和功能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06): 102-106+113-160.
- [4] Hein G E.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J]. Institute for Inquiry, 1991, 14.
- [5] Gao R. The vocabulary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21, 11(4): 442-446.
- [6] Rachmad Y E. *Adaptive Learning Theory*[J]. 2022.
- [7] Tran K Q.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learning academic vocabulary among masters in English studies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I in Language Education*, 2024, 1(1): 1-19.
- [8] Hintzman D L. Repetition and memory[J].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1976, 10: 47-91.
- [9] Jomaa N, Attamimi R, Al Mahri M. Utili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vocabulary learning by EFL Omani students: The effect of age, gender, and level of study[C]//*Forum for Linguistic Studies*. 2024, 6(5): 171-186.
- [10] Khan M A, Kurbonova O, Abdullaev D, et al. Is AI-assisted assessment liable to evaluate young learners? Parents support, teacher support, immunity, and resilience are in focus in testing vocabulary learning[J]. *Language Testing in Asia*, 2024, 14(1): 48.
- [11] Zhang Z, Crawford J. EFL learners' motivation in a gamified formative assessment: The case of Quizizz[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24, 29(5): 6217-6239.
- [12] Tang L, Shen K, Le H. Facilitating learners' self-assessment during formative writing tasks using writing analytics toolkit[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Learning*, 2024, 40(6): 2822-2839.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high school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A Case Analysis of FLTRP Book 3 Unit 4“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n Jin¹, Junli Liu²

¹ *Tai 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 zh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I technology, its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offering potential solutions to problems such as poor retention, limited evaluation, and delayed feedback in high school English vocabulary instruction. This article, drawing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AI-assisted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this context. It analyzes existing teaching issues an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elaborating on the intersection of AI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proposes feasible strategies based on design principles, application models, and implementation steps, aiming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actionable solutions for frontline teacher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is model can enhance the personalization, timeli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vocabulary learning. However, its widespread adoption is hampered by challenges such as technology, teacher resources, and conceptualization, requiring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in practic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mative assessment; high school English; vocabulary teaching; teaching innovation

以课程思政为导向的高中物理教学设计 ——以“运动的合成与分解”为例

李东泽¹ 谯飞¹ 高红^{1*}

(1.鞍山师范学院 物理学院, 辽宁 鞍山 114007)

摘要: 本文基于核心素养与课程思政视角, 构建以问题导向、实验探究、合作学习、反馈评估为核心的高中物理教学模式。该模式旨在提升学生物理知识理解、实验探究及合作沟通能力, 同步渗透思政价值引领。实践中通过实际问题引趣、实验验证理论、小组互通协作、反馈反思固知, 并融入思政元素, 形成能有效促进学生物理核心素养提升与思政认知内化的“学科知识+思政元素”融合架构。

关键词: 课程思政; 高中物理; 教学模式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02

在新时代教育发展格局中, 课程思政占据着举足轻重之位。2025 年 1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明确提出: 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 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 把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1]。课程思政作为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 于党和国家落实立德树人工程而言, 是关键要素; 于未来教育改革进程来说, 是重要趋向。因此, 思政教育不应局限于思政课堂, 而是所有学科课程的根本任务^[2]。

1 课程思政的内涵与价值

学生是教育的核心。高中阶段作为学生个体身心发展关键转型期, 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成型并趋于稳固的重要阶段。课程思政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 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3]。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去, 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形成指导, 从而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4]。因此, 课程思政无疑是教师实现对学生价值引领之有效工具。

课标作为基于学生的教育指引, 不仅将学科知识与技能的教学目标予以清晰界定, 更着重强调了价值塑造与思想引领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种理论革新从课程目标设计到教学内容布局, 全方位、多层次凸显了实施课程思政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要性与战略性意义^[5]。

高考作为基于课标的选拔, 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不仅考查知识能力, 更考察情感态度价值观。高考要为高等学校选拔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学生, 必须强化德育考查, 让具备较高政治觉悟、高尚道德情操和优秀意志品质的学生脱颖而出^[6]。

依课程思政塑三观, 据课程标准明价值, 借高考选拔德才佳。实施课程思政任重道远。

2 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原则

2.1 自然融合 避免生硬

作者简介: 李东泽(2007—),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学物理课程与教学;

谯飞(2004—),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学物理课程与教学;

高红(1971—), 女, 博士, 鞍山师范学院物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物理课程与教学论。

通讯作者: 高红

课程思政是一种隐性教育，它并非独立设置一门思政课程，而是创新性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与学科知识深度融合。其核心意涵并非向学生机械灌输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知识，而在于将学科知识和课程思政相融合，促使学生达成情感与价值观层面深度共鸣，规避枯燥的理论说教。其隐性育人需依托学科逻辑挖掘思政元素，避免思政与教学割裂。在课程设计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真实、生动的教学情境，为思政元素提供自然载体，这一做法与课程思政的理念高度契合，能让思政教育更自然地融入学科教学中。

教师在选取思政元素时，需以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为根本遵循。这要求教师首先深入剖析学科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与逻辑脉络，精准把握知识节点的本质属性与延伸维度，在此基础上筛选与之具有内在契合点的思政元素。这种选取过程并非简单的内容叠加，而是通过对学科知识的深度解构，找到其与思政价值理念在逻辑层面的共通之处，使思政元素成为学科知识体系的自然延伸。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让思政教育在知识传授过程中自然渗透，达成“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避免因逻辑割裂导致的生硬说教。

2.2 学生主体 情感共鸣

贴合学生认知特点，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原则。高中生的认知焦点往往偏向具象化、生活化内容，奥运赛事的竞技激情、历史故事的人文厚重等与他们的兴趣图谱相契合。课程思政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将思政内涵嵌入这些学生关注的载体。如奥运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可呼应学科中的坚持理念，历史故事里的家国情怀能衔接知识体系中的责任意识。当思政元素依托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自然铺展，便能跳出单向灌输的窠臼，通过情感共鸣驱动主动感知，让价值引领真正融入学生认知过程。

匹配学生认知水平，是课程思政的核心前提。高中生虽已具备基础抽象思维能力，但对思政内涵的理解仍需以自身知识储备为依托。若情境超出认知范畴，如涉及过深理论或复杂背景，会形成理解障碍；若内容过于浅显，则难以触发深度思考，削弱价值塑造效能。因此，课程思政需依据学生认知梯度选取素材，让他们能凭借已有知识解码思政内涵，在循序渐进中深化认知，确保育人目标落地生根。

2.3 认知差异 分层设计

高中物理课程思政需依学生认知差异精准适配，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核心支撑。学习是学生基于已有经验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7]，思政传递需贴合学生认知场景。地域维度上，学生若要学习伯努利原理，东部学生可借高铁、地铁的站台安全黄线等情境，将“流体压强”知识与“规则意识”关联；而中西部学生需用“小溪流水”“农田水管”等本土化情境，避免认知断层。同一集体中，学生物理基础与思政理解有别，需依建构主义“因材施教”。在设计万有引力与航天课程时，可以通过课前诊断分层：基础薄弱者先夯实物理概念（如“万有引力”公式应用），再渗透基础思政；认知较高者同步深化内涵（如从“万有引力发现”延伸“人类命运共同体”），避免“一刀切”导致的“跟不上、学不深”的现象。

课程思政分层设计需以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为框架，该理论将认知分为“现有”与“潜在”发展区^[8]。学习阶段上，必修模块的基础概念对应“现有发展区”，思政聚焦“价值启蒙”（如“摩擦力”教学传递“劳动智慧”）；选修模块的规律应用对应“潜在发展区”，思政升级“价值升华”（如“电磁感应”教学引出“科技自立”），且需结合学生认知进阶节奏调整思政渗透密度，避免过浅流于形式或过深脱离理解。同一知识点也需梯度设计：基础层借实验渗“科学态度”，提高层延伸“实验与创新辩证关系”，确保思政与知识同频，避免相互脱离。

3 高中物理课程思政融合路径

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高中物理课程知识体系过程中，精准筛选契合的案例或情境至关重要。恰当的情境要能具备与课程知识深度融合的切入点，确保课程知识得以凭借所创设情境自然流畅、完整无缺的呈现。要能承载物理核心素养培养目标，为学生探究能力与科学思维发展搭建实践载体。要能精准匹配高中学生的认知水平，确保学生能够快速融入情境，实现情感层面深度共鸣。要能确保所创设的情境与思政元素相关联，使学生在物理知识进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熏陶。

笔者通过深度研读大量资料并进行梳理，发现恰当的情境应从高考试题、教材情境、时事热点、科技前沿以及日常生活等维度挖掘。这一挖掘路径的形成，源于对学科教学中知识建构、能力发展与价值引领内在统一关系的精准把握，同时衔接知识应用场景与思政价值引领方向，兼顾学科逻辑与学生认知规律，有效强化情境与素养关联，还需注重情境的真实性与探究性，为学生搭建知识迁移与思维进阶的桥梁，以此确保所选取的情境具备典型性、基础性、时代性、创新性与生活性，更能契合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质，更能紧密贴合教材内容架构与课程标准要求，更能精准契合高考选拔制度的导向需求（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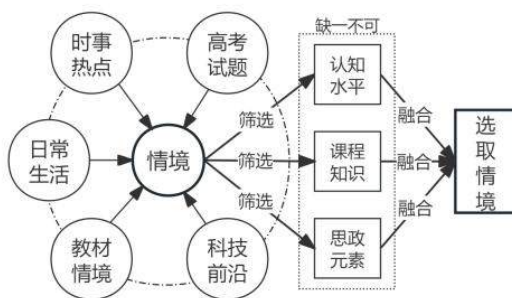


图1 情境遴选流程图

高中物理课堂融入思政元素，要避免“机械的植入”和“硬性的升华”，应依托恰当且合理的路径来交织思政元素，才能实现二者有效融合。情境融合课程路径，要以物理学科核心概念作为着眼点，构建子概念网络，找出子概念对应课标中的思政元素，参照课标要求依据教材提炼出教学内容，基于教学内容构建框架，结合思政元素，建立“学科知识+思政元素”融合架构，利用情境载体，将教学内容、思政元素、情境融合注入教学设计，应用于教学实践。教学后及时了解教学反馈，制定优化方案，反思情境设计与思政元素交融方式并加以改进，使教学设计形成自我完善的循环优化机制，符合课标倡导的“教学评一致性”原则(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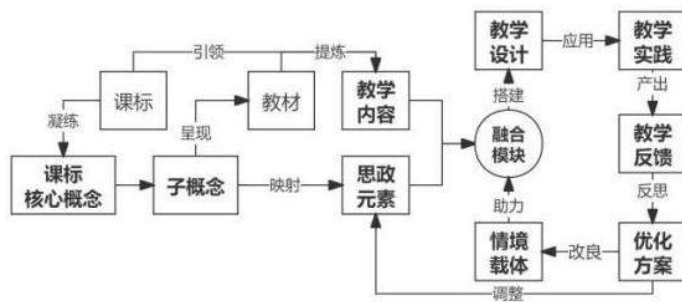


图2 依托情境载体融合高中物理课程与课程思政路径

在依托情境载体构建教学过程设计中，设计方案的审慎选择至关重要。从课程思政与学科教学深度交融模式来看，在同一教学环节内，通常以呈现单一情境为主。单一情境更有利于学生集中注意力，深入理解知识与思政元素的交融。鉴于此，在教学过程设计中，可采用以一个大情境为核心，辐射出多个相关子情境的方式，来阐释复杂知识体系。也可以让不同子情境层层“递进”，由浅入深，设置梯度分明的新问题，激发学生探索欲望，引导其深入思考，逐步提升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在实际教学过程设计中，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以及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认知水平等因素，灵活选择辐射式或递进式的情境设计，也可将二者有机结合，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4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教学设计

4.1 总体思路

以2019年人教版普通高中物理教科书（以下简称教材）必修第二册第五章第2节运动的合成与分解为例，该课隶属课标核心概念“运动与相互作用”下的子概念“抛体运动和圆周运动”范畴，聚焦于“理解合运动与分运动”学习，“民族与时代精神”思政元素与该课程内容存在着紧密融合点。通过广泛深入调查发现，2021年辽宁省普通高考物理学科试卷第一题通过创设“红军强渡大渡河”情境，对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概念与性质进行考查，这一情境与“运动的合成与分解”课程内容在知识层面高度契合。同时，情境的复杂度与深度符合高中学生认知发展水平，“红军强渡大渡河”这一历史事件承载着丰富的“民族与时代精神”内涵，因此具备成为连接课程思政与学科知识之间桥梁的潜力。经细致研读课标与教材，归纳出该课学习目标为：理解合运动与分运动的概念、建立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观念。这些学习目标具有一定的逻辑层次，是逐步深入的过程。基于此，该课适用递进式情境设计，即以“红军强渡大渡河”大情境为核心，创设渡河时不同情况作为子情境，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地设置梯度分明的问题，用以对应阐释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设计中，通过课前导入“红军强渡大渡河”情境，让学生化身“参谋”迅速进入情境，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在层层引导下加深对问题的思考，培养科学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最后再回扣到思政主题上，形成教学闭环（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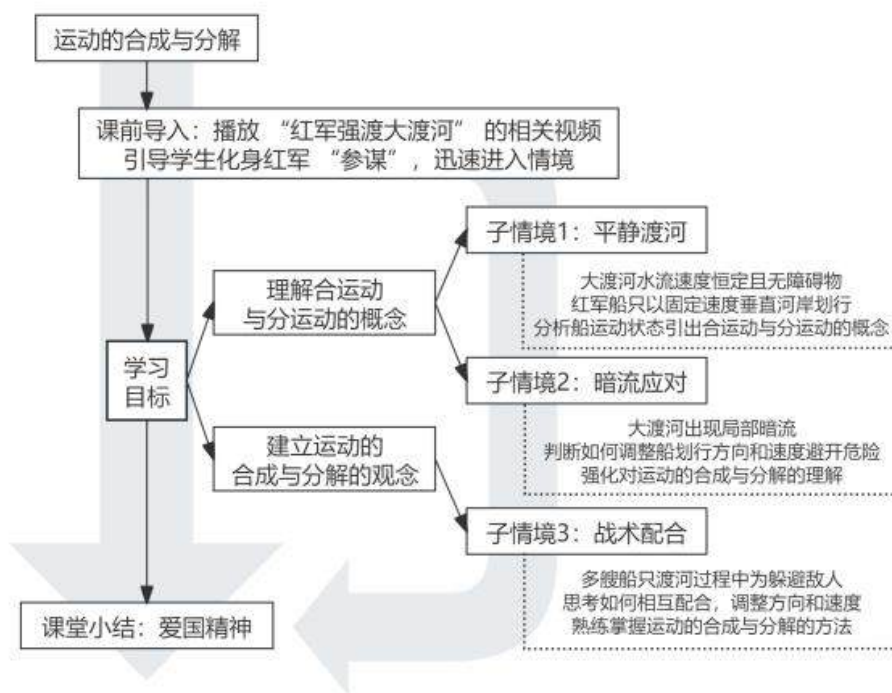


图3 “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教学过程设计路径

4.2 具体方案

在高中物理课程标准中，“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是运动学板块的重要内容，要求学生能够理解合运动与分运动的关系，掌握运动合成与分解的方法，并能运用其解决实际问题，旨在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与建模能力。从教材体系来看，它是在学生掌握直线运动基本规律后的延伸，也是后续学习抛体运动、圆周运动等复杂曲线运动的基石。

本课的课程思政设计以“红军强渡大渡河”为情境，通过设置多个子情境实现知识传授。“平静渡河”情境通过简化的物理模型，帮助学生直观理解合运动与分运动的概念，构建起运动合成与分解基本认知框架；“暗流应对”情境增加了运动的复杂性与干扰因素，促使学生深入探究运动合成与分解的规律，提升知识应用能力；“战术配合”情境则将知识拓展至多物体运动场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在能力培养方面，通过各种方式解决不同情境下的问题，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科学探究以及团队协作等能力。在价值引领层面，以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英勇事迹为背景，将爱国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达成“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维发展。

表1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具体内容
学情分析	学生已掌握直线运动规律和矢量合成基础，但对“实际运动拆解为分运动”的建模能力较弱，对历史情境的物理关联敏感度不足
关键能力	1. 运用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规律来解决小船过河的实际问题。 2. 形成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观念。
学科素养	经历探究小船过河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进一步学会应用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的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核心价值	体验学以致用乐趣，感受物理与生活、社会的相关性。通过“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情境式教学，加深爱国情怀。通过对小船过河问题的各种情形的由浅入深的探究过程，逐步形成对科学本质的认识。

4.2.1 课前导入

教师播放精心剪辑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录片片段，播放结束后，教师向学生表达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凶险与不易，同时说明渡河过程中也蕴含着深刻的运动学原理。从物理视角看，船只的运动涉及到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合运动与分运动。教师引导学生化身‘军事参谋’，运用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知识，为红军制定科学的渡河方案，帮助他们顺利渡河。

设计意图：教师创设的情境，既要具象的表现出相关物理现象，使得学生获得探索物理规律所必要的感性知识，又要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和问题意识。在情境导入环节，借助震撼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真实历史影像，打造真实情境，具象呈现合运动与分运动现象，让学生直观获得感性知识。同时，将课程思政元素自然融入，激发学生探究兴趣，为随后抛出一系列与渡河实际相关的问题，巧妙引出“运动的合成与分解”核心知识做好铺垫，契合情境教学法通过真实情境促进知识建构的原理。

4.2.2 子情境 1 平静渡河

教师介绍“平静渡河”情境，说明此时大渡河水流速度 $v_{水}$ 恒定，河面无障碍物，红军船只以恒定速度 $v_{船}$ 垂直河岸划行。提问：“船从一岸到另一岸的实际运动过程中，包含了哪些分运动？如何计算渡河最短时间？合位移又该如何确定？”

教师引导：根据运动的合成与分解知识，船的实际运动是合运动，它同时参与了垂直河岸方向的划行运动（速度为 $v_{船}$ ）和沿河岸方向的水流运动（速度为 $v_{水}$ ）。这两个分运动相互独立且具有等时性，我们可以分别分析这两个方向的运动，再利用平行四边形定则合成求解合运动。

学生分组讨论，围绕渡河时间和位移的计算展开分析。教师巡视指导，引导学生思考：哪个分运动决定渡河时间？合速度方向如何确定？

小组代表发言后，教师结合示意图推导：由于垂直河岸方向的位移 d （河宽）固定，且该方向速度 $v_{船}$ 不变，根据 $t = \frac{d}{v_{船}}$ ，此时渡河时间最短。而船的合速度 $v_{合} = \sqrt{v_{船}^2 + v_{水}^2}$ ，方向与河岸夹角 θ 满足 $\tan\theta = \frac{v_{船}}{v_{水}}$ ，根据合速度与时间可计算出实际位移 $x = v_{合}t$ 。

教师追问：若改变 $v_{船}$ 或 $v_{水}$ 的大小，渡河时间和位移会如何变化？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分运动对合运动的影响，强化对运动合成与分解规律的掌握。

4.2.3 子情境 2 暗流应对

教师介绍“暗流应对”情境：大渡河某段有暗流，此处水流速度从2m/s变成3m/s，河面有礁石；船自身划行速度为4m/s，河宽100m，敌人的深水炸弹群在下游，离船初始位置沿河岸水平距离80m，串联两岸。提问：“水流变快后，船实际怎么动？怎么调整方向避开礁石？”

教师引导：船实际运动是合运动，同时有两个独立分运动——自己划行（速度4m/s，方向能调）和水流带动的沿河岸运动（速度3m/s，向下游）。先分析两个方向的运动，再合起来看合运动。

学生分组讨论如何调方向避礁石。教师引导：水流变快后，船沿河岸的位移会变大，怎么调方向让这个水平位移小于80m？

小组发言后，教师讲解：若船垂直河岸划，根据情境1公式可知，船25秒能到对岸，这段时间水流会带船向下游75m，刚好避开礁石但安全余量小。想更安全，可让船斜向上游划，比如和垂直河岸成 30° 角，这样到对岸要28.9秒。水流会带船向下游86.7m，但船自己划会向上游57.8m，最终合起来只向下游28.9m，远避开礁石。

教师追问：若水流变4m/s，之前的方向还能用吗？要怎么改？让学生理解分运动对合运动的影响。

4.2.4 子情境 3 战术配合

教师介绍“战术配合”情境：甲、乙两船一起渡河，河宽120m，水流速度2m/s；甲船划行速度5m/s，乙船4m/s。要求甲船30秒内先到，乙船35秒内后到，两船到对岸时沿河岸距离至少8m。提问：“两船怎么调方向，既满足时间要求又保安全间距？”

教师引导：每艘船的合运动，都来自自己划行（甲5m/s、乙4m/s，方向可以调整）和水流带动（都2m/s向下游）。调方向要控制两个关键：垂直河岸的划行速度（决定渡河时间）、沿河岸的划行速度（决定最终沿河岸位置）。

学生讨论如何调方向。教师引导：渡河时间由垂直方向运动决定，怎么调方向让两船时间达标，且沿河岸位置差够8m？

小组发言后，教师讲解：甲船要30秒到，垂直河岸的划行速度至少4m/s，只要斜向下游划，和垂直河岸成 37° 角，最终会向下游150m处靠岸。乙船要35秒到，垂直河岸的划行速度至少3.43m/s，斜向下游划，和垂直河

岸成 30°角, 最终向下游 140m 处靠岸。两船间距 10m, 满足要求。

教师追问: 若要两船 32 秒同时到, 甲到 145m 处、乙到 130m 处, 方向怎么调? 深化学生对分合运动的理解。

4.2.5 课堂小结

课程尾声, 教师引导学生回顾强渡大渡河历史与运动合成规律的关联, 梳理先烈凭经验用规律破险的逻辑; 再引导学生提炼规律从革命到现代科技的传承内核。通过此过程, 使学生明确物理学习需传承先烈精神, 以科学服务国家, 深化爱国认知与学科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N].人民日报,2025-01-20(006).
- [2] 许欢.融合思政元素的初中科学项目化学习实践研究——以“物体的沉浮条件”为例[J].中学物理,2025,43(04):33-37.
- [3] 王学俭,石岩.新时代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难点及应对策略[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2):50-58.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191125.001.
- [4] 刘红娟.课程思政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作用——以培养学生“科学态度与责任”为例[J].中学物理,2021,39(19):19-22.
- [5] 教育部.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S].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 [6] 姜钢.论高考“立德树人、服务选才、引导教学”的核心功能[J].中国高等教育,2018,(11):31-35.
- [7] 温彭年,贾国英.建构主义理论与教学改革——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综述[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05):17-22.
- [8] 徐美娜.“最近发展区”理论及对教育的影响与启示[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24(05):14-16+23.DOI:10.13627/j.cnki.cdjy.2010.05.012.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Guided Senior High School Physics Instructional Design——A Case of "Composi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Motion"

Li Dongze¹, Qiao Fei¹, Gao Hong^{1*}

¹*School of Physics, 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Anshan, Liaoning 114007,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ies an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enior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model centered on problem orientation, experimental inquiry,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feedback-based assessment. The model aims to improve students' physics knowledge comprehension, experimental inquiry and collaborative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while synchronously infiltrating the guid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s. In practice, it stimulates interest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verifies theories through experiments, promotes group mutual collaboration, consolidates knowledge via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and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thus forming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at effectively enhances students' physics core competencies and internalizes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Keyword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nior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ing Mode

群文阅读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杨晴¹ 段灿¹

(1.喀什大学, 新疆 喀什 844000)

摘要: 阅读是初中英语教学的重要输入手段。但传统单篇阅读存在主题碎片化、文本类型单一、阅读量不足等问题, 难以满足《课标》要求与核心素养培育需求。本文通过界定群文阅读的概念, 明确群文阅读的操作流程, 从课前、课中、课后三方面阐述群文阅读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促使学生语篇意识与语言知识体系化建构、驱动高阶思维发展、拓展跨文化视野与协作能力, 为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注入活力。

关键词: 群文阅读; 初中英语; 阅读教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05

引言

阅读在英语教学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是学生获取知识、积累词汇和语法结构的重要输入手段。这种输入方式有助于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 激发学生的思维, 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and 创新能力。阅读单篇文章、通读整本书籍以及阅读多个文本构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采用的三种阅读模式, 其中后两种阅读模式在当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关键^[1]。然而, 传统的英语阅读教学采用单篇阅读教学方式, 存在阅读主题碎片化、文本类型单一、阅读量少、学习效率低下等局面, 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提升其阅读效率^[2]。对于初中高年级学生而言无法达到《课标》针对初中生语篇数量与词汇量设定的要求。并且, 学生所遇语篇种类、话题范畴以及文化背景知识较为狭隘, 对其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形成阻碍。基础教学的核心在于精读, 而泛读则作为其扩展和补充。精读着重于教授技巧和策略, 泛读则着重于应用和迁移^[3]。因此,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不仅要采用精读, 还应当融入泛读教学。群文阅读体现了泛读教学的应用与实践。群文阅读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文本, 能够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 丰富他们的语篇经验。它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接触不同的文体、话题和文化背景, 而且能够促进学生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 基于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将群文阅读教学运用到初中英语课堂, 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1. 群文阅读概念界定

赵镜中教授在 2008 年第七届全国阅读教学观摩会上的演讲中首次引入了“群文”这一概念。他强调了在阅读教学中, 通过围绕特定的一个或者多个议题, 选择和组织与议题相关的多篇文本,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和学习, 从而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赵教授提出了“群文”的概念、初步教学模式及大致特征: 同一个议题、多个文本、探索性教学。继赵镜中教授之后, 大陆学者和教师们也纷纷展开对群文阅读的研究和探索。于泽元教授指出群文阅读是教师与学生共同聚焦于一个或多个核心议题, 据此选择一系列文章作为教学资源, 在这一系列议题的引导下, 师生共同开展阅读活动, 并通过集体讨论与知识建构的过程, 逐步达成对议题深入理解和共识^[4]。它促使阅读教学从思想层面的相对封闭状态迈向更加开放与多元的思考路径, 由个体独立学习转向集体协作的知识建构, 教学方法转变为基于共识达成的探究性学习。这一转变对于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激发阅读兴趣以及增强教师的教学效能均有重要的意义。随后, 刘大伟等人对群文阅读的概念进行了补充。群文阅读是指在单位时间内, 围绕一个议题, 选择多个文本进行教与学的活动^[5]。他指出群文阅读除了有文本、议题、教与学之外, 还提出单位时间是群文阅读教学有效性的时间保障。只有强调了单位时间这一概念, 才能体现出群文阅读教学革的基本特性。随着群文阅读教学的不断深入, 于泽元再次强调群文阅读是一个探究性的过程, 是围绕一组文章展开整体性阅读, 而非单篇文本的叠加。也就是说, 必须是能够在整体上进行理解的一组文本, 才能够称得上“群文”^[6]。

综上所述, 在本研究中, 群文阅读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的单位时间内, 选择一个议题或者多个议题的多组文本。进行文本对比、分析以及集体建构活动, 最后达成共识, 从而提升阅读能力。这一定义是明确的操作定义, 明确了实施的流程: 确定议题、选择文本、对比阅读、集体建构、达成共识。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着引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 他们需要设计合适的教学活动,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学生通过群文阅读, 学生

作者简介: 杨晴(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不区分;

段灿(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不区分。

能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文本, 拓宽知识视野, 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此外, 群文阅读还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

2. 群文阅读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根据前文操作性定义, 实施的流程为: 确定议题、选择文本、对比阅读、集体建构、达成共识。结合实际的教学情况, 将教学模式分为: 课前、课中、课后; 课前主要为确定议题和选择文本; 课中为主题导入、对比阅读、集体建构、达成共识。

2.1 课前

该教学环节主要由教师完成, 主要包括两个教学步骤: 议题确定和文本选择。

首先是议题的确定。议题的确定在群文阅读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统领多文本阅读材料、引导学生深度探究的核心枢纽, 直接决定了群文阅读教学的方向、深度与效度。常见的议题确定有如下方式: 以单元主题为议题、以表达方式为议题、以作者为议题、以体裁为议题。以单元主题为议题可以参照新课标在课程内容方面提出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主题语境话题。教师能够挑选具有讨论价值和开放性的主题, 依据核心线索来确定议题。同时, 教师要确保议题为教学目标服务, 同时, 教师要确保议题为教学目标服务, 使议题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生活经验及学科核心素养发展需求相契合。例如在“人与自我”主题语境下, 可围绕“成长中的自我认知与价值追寻”这一核心线索, 确定“青春成长中的挫折与突围”等具有思辨性的议题, 引导学生通过多文本对比阅读, 深化对自我成长规律的认知。

其次是为文本的选择。教师要选择关于同一话题、同一作者或同一体裁等具备同一特征的文本, 要紧扣材料的相关性和相似性。在组合阅读文本的过程中, 教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教师需考虑学生的当前认知水平和阅读能力, 以确保文本的适宜性。教师既可以挑选课内的阅读材料, 也可以将课外的材料结合起来进行选择。这种做法有助于确保阅读活动的顺畅进行, 让学生在阅读中进行鉴赏和比较, 从而相互增进理解, 提升阅读量, 并丰富他们的阅读体验。

2.2 课中

该教学环节主要由师生共同完成, 主要包括四个教学步骤: 主题导入、对比阅读、集体建构、达成共识。

首先是主题导入环节。在此环节中, 教师可以运用互联网资源及多媒体工具, 构建相关情境,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唤醒他们的背景知识, 并引入主题。学生将对主题进行深入的头脑风暴, 从而激发他们参与比较阅读和集体构建。同时, 教师需设计情境, 例如通过一篇简短的范文来展示阅读策略, 并示范其应用, 帮助学生掌握理解。

接下来是对比阅读。在这个环节中, 学生们首先需要快速阅读, 以便对文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把握每篇文章的基本结构和总体主题, 并为后续议题的深入和构建打下基础。随后, 学生们将对选定的几篇文章进行细致的对比阅读和鉴赏, 以识别它们在结构和内容上的相似之处和差异。同时, 教师应设计与议题相关的活动, 旨在引导学生对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并能够将之前学到的阅读技巧付诸实践。

接下来是集体构建阶段。不预先设定议题的答案, 而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分享智慧。在智慧共享过程中, 文本的意义逐渐被构建, 教师、学生和文本的视角融合, 达成共识。集体建构建立在学生不同观点之上, 正是这些“差异”为新视角和新理解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而这些“差异”所引发的则是集体创新动力的源泉。在这一过程中, 必须要克服传统的教师传授知识或学生接受知识的观念, 将课堂教学视为师生共同构建知识的过程。同时, 在小组讨论环节, 将学生分为 A、B、C 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的学生人数比例为 1:2:1。A 级为英语成绩优秀且态度积极的学生。B 级为水平中等, 能够逐步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C 级为基础较差的学生。随着学生的进步, 他们的等级也会发生变化。

最后是达成共识。教师在这一环节要进行整理、概括、总结、拓展, 在学生讨论交流的基础上, 师生要共同总结、提炼文章中的共同点。这种共识建立在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之上, 通过倾听、理解、协商和妥协的步骤去实现对知识或理解的共同认同。学生在完成比较阅读和集体构建之后, 教师再次提出议题, 鼓励学生在阅读之后对这个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交流。随后, 教师通过对比和剖析各种不同的见解, 帮助学生在已有的认知体系中构建新的认知框架, 达成对文本和知识的共识。

2.3 课后

这一教学阶段是课后的知识迁移与创新。教师会在课堂上安排扩展阅读任务, 学生则利用在课堂上学到的阅读技巧进行课后拓展阅读, 从而将课堂学习与课外阅读有效结合。这一过程旨在增加学生的阅读量, 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 并拓宽他们的阅读视野。同时, 教师要求学生还会对自己的阅读情况进行评估和总结, 并对阅读策略进行反思和调整, 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习方法体系, 为将来高效自主学习打下基础。通过课中的学习, 学生在掌握了一种阅读策略后, 能够与其他策略相结合, 逐渐构建起结构化的策略知识体系, 能够依据不同的语境找到解决阅读难题的新方法。

3. 群文阅读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优势

群文阅读作为契合英语核心素养培育要求的教学模式, 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展现出显著优势,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 强化语篇意识与多元输入, 助力语言知识体系化建构。传统单篇阅读易导致学生语篇认知碎片化, 而群文阅读以议题为纽带整合多文本, 使学生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不同语篇的结构特征与语言风格差异。同时, 多文本涵盖的丰富

话题与词汇语法现象,能突破单篇文本的输入局限,为学生提供海量、多元的语言输入。这种输入并非零散信息的堆砌,而是围绕议题形成的“语篇集群”,有助于学生在语境中感知语言规律,将孤立的词汇、语法知识转化为具有关联性的语言网络,提升语言知识的迁移与运用能力,契合《课标》对初中生语篇积累与词汇量的要求。

其二,驱动高阶思维发展,培育批判性与创新性思维品质。群文阅读的对比阅读与集体建构环节,打破了单篇阅读中“文本中心”的被动接受模式,要求学生在多文本间建立关联、辨析异同、提炼共性。这一过程需学生运用分析、比较、归纳、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例如在“科技对生活的影响”议题下,学生需对比不同文本对科技的积极与消极论述,辩证看待科技价值。同时,集体建构中的“观点差异”为思维碰撞提供契机,学生需在倾听与表达中反思自身认知,形成个性化见解,而非盲从单一文本观点。这种探究性阅读过程,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其独立思考与创新表达的能力,符合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中“思维品质”的培育目标。

其三,拓展跨文化视野,促进文化意识与协作能力的协同提升。群文阅读所选文本常涵盖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如围绕“节日习俗”议题整合中西方节日介绍文本,学生可在对比中理解文化多样性,破除文化偏见,形成跨文化同理心。此外,课中的小组讨论、集体建构等环节,以“异质分组”为组织形式,要求学生在协作中分享阅读成果、解决认知冲突。这一过程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与沟通能力,还能培养其团队协作意识、责任担当与沟通协商能力,实现“文化意识”与“学习能力”两大核心素养的协同发展,为学生成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球化人才奠定基础。

结论

综上所述,群文阅读作为对传统单篇阅读教学的革新与超越,为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其以议题为核心的多文本整合模式,既破解了传统教学中阅读量不足、语篇类型单一、思维培养浅表化等现实困境,又精准契合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对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与学习能力的综合培育要求。在教学实践中,通过课前科学确定议题与筛选文本、课中引导对比阅读与集体建构,群文阅读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语言知识的体系化建构、高阶思维的深度发展以及跨文化素养与协作能力的协同提升。未来,初中英语教师应进一步深化对群文阅读教学理念的理解,在文本选择上兼顾经典性与时代性,在活动设计上注重探究性与层次性,在评价方式上实现过程性与发展性的统一。同时,还需加强对群文阅读与信息技术融合的探索,借助数字化资源拓展文本获取渠道,丰富教学互动形式。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群文阅读的教学价值,推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的深度转型,为学生终身学习与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语言基础。

参考文献:

- [1] 何立新,王雁玲. 基于问题解决的群文阅读教学实践尝试 [J]. 语文建设, 2017, (04): 27-30.
- [2] 邓慧君. 指向深度学习的高中英语群文阅读教学实践 [J]. 中小学课堂教学研究, 2023, (12): 52-55.
- [3] 张世钦. 英语分级群文阅读教学模式探析[J]. 教学月刊·中学版(外语教学), 2021, (05): 44-47.
- [4] 于泽元,王雁玲,黄利梅. 群文阅读:从形式变化到理念变革[J]. 中国教育学刊, 2013, (06): 62-66.
- [5] 刘大伟,蒋军晶. 群文阅读教学:概念、价值及实践路径[J].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6, 32(01): 33-37+123.
- [6] 于泽元,袁伶俐. 群文阅读的内涵、精髓与核心价值[J]. 基础教育课程, 2016, (21): 30-34.

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Text Read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Yang Qing¹, Duan Can¹

¹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Kashi university, Kashi, Xinjiang 844000, China

Abstract: Reading serves as a crucial input method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However, traditional single-text reading is plagued by issues such as fragmented themes, a lack of diversity in text types, and insufficient reading volum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core competencies. By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Group Text Reading and clarifying its operational procedur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p Text Read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This approach promotes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awareness and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broadens their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collaborative abilities, thereby injecting vitality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Keywords: Group Text Reading;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问题式教学法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段 灿¹ 杨 晴¹

(1.喀什大学, 新疆 喀什 844000)

摘 要: 当前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仍存在: 教学内容碎片化、学生学习浅层化、素养培养割裂化; 部分教师沿用“讲解-翻译-背诵”传统模式, 导致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丧失主动思考动力。本研究旨在探讨问题式教学法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破解上述问题, 为英语阅读教学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提出阶梯式问题设计、情境化教学创设、协作式学习组织、思维型活动设计及多元化过程评价等策略。实践表明, 该方法能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思维品质及语言运用能力。研究同时提出动态分组、灵活调整教学计划及完善评价体系等优化建议, 为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策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 问题式教学法; 初中英语; 英语阅读教学策略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06

1. 问题式教学法的理论内涵与核心特征

1.1 理论渊源

问题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植根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该理论认为“知识并非通过教师传授获得, 而是学习者在特定情境中, 借助他人帮助, 利用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方式获得”。杜威的“做中学”教育思想进一步强调, 学习必须与实际相结合, 通过解决真实问题实现经验的改组与改造。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 克拉申的输入假说指出, 当语言输入处于“i+1”水平(略高于学习者现有水平)时, 习得效果最佳, 而问题式教学通过阶梯式问题设计恰好能实现这一输入效果。

1.2 核心定义

问题式教学法是以问题为逻辑主线, 通过创设具有认知挑战的学习情境, 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与合作交流中解决问题, 从而实现知识建构与能力发展的教学模式(周丽莉, 2024)。其核心要素包括: 具有探究价值的问题设计、真实或拟真的问题情境、以学生为主体的协作探究、教师的引导性干预以及基于过程的多元评价。赵晶丽, 吴帮平等(2024)将PBL教学法分为教师设置问题, 学生分析问题; 教师给予过程指导, 让学生动手实践之后展示成果; 教师提供评价工具, 学生评价反馈。因此, 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语境中, 该方法体现为: 将阅读文本转化为问题载体, 围绕主题意义设计由浅入深的问题, 引导学生通过文本解码、信息整合、意义重构等思维活动, 实现从语言知识到语用能力的转化, 同时培养文化意识与思维品质。

1.3 与传统教学的本质区别

传统阅读教学以“文本解析”为核心, 教师主导信息传递过程, 学生的任务是记忆和复现, 这种填鸭式传统教学已越来越无法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 对学生来说, 通过PBL教学, 可逐步培养其主动分析情况、提出问题、分工协作、全面考虑、查找相关信息并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沈建新, 王海燕, 王海江, 2001)。而问题式教学以“问题解决”为导向, 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建构意义, 教师作为学习环境的设计者和认知引导者存在。二者在教学目标(知识传递 vs 能力建构)、师生关系(权威-服从 vs 协作-对话)、评价方式(结果取向 vs 过程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2. 问题式教学法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2.1 阶梯式问题设计: 构建认知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 段 灿(2000—),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不区分;

杨 晴(1999—),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不区分。

通讯作者: 段灿

问题设计质量直接决定教学效果,所设置的问题首先应能产生经验共鸣,激发学习兴趣,挑战学生思考(陈佩佩,2016)。需遵循“认知梯度”原则,构建从低阶到高阶的问题。根据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可分为以下层次:

第一,基础性问题(记忆与理解)主要针对文本表层信息设计,其核心功能是帮助学生掌握文章的基本事实要素,为后续的深度阅读奠定基础。在 Unit 1 Animal Friends 的教学中,阅读前可设计 "What animals are mentioned in the title?" "Where does the story happen?" 等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有效激活学生头脑中与动物主题相关的词汇储备, "tiger" "elephant" "forest" 等,同时引导学生对文本内容进行初步预测。阅读过程中,针对文本的文体特征设计问题尤为重要,例如提问 "What's the genre of the text? How do you know?", 可引导学生关注文本的格式特征(如邮件中的 "Dear..." "Yours sincerely" 等)和语言风格(如口语化的表达),从而判断文本为邮件体裁。这种基于文体特征的提问方式,不仅能帮助学生快速把握文本的基本框架,还能促使他们联系已有的文体知识,在分析和判断的过程中发展逻辑思维能力。此外,还可设计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email?" "Who is the receiver of the email?" 等问题,进一步强化学生对邮件核心要素的理解,培养其从文本细节中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第二,分析性问题(应用与分析)的设计目的是引导学生对文本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和重组,实现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认知跨越。在 Unit 3 Keep Fit 的教学中,可设计多层次的分析性问题:首先通过 "What are the ways of keeping fit mentioned in the passage?" 引导学生从文本中提取分散的信息点,如 "doing exercise" "having a balanced diet" "getting enough sleep" 等;接着以 "How do they exercise? How often do they do them?" 促使学生对这些信息进行分类整理,明确不同健身方式的具体实施方法和频率;最后通过 "Why is it good for them?" 引导学生探究各种健身方式与健康效益之间的内在联系,如 "Running can strengthen the heart"。这种问题设计遵循“现象—特征—本质”的认知逻辑,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掌握文章的逻辑结构,理解作者的写作思路。在分析性问题的设计中,还应关注文本的修辞手法和篇章结构,例如提问 "How does the author use comparison to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exercise?"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paragraph 2 in the whole text?", 引导学生从语言形式和篇章组织的角度深化对文本的理解,提升其语篇分析能力。第三,评价性问题(评价与创造)是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关键,这类问题超越了文本本身的信息范畴,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经验和知识储备进行价值判断和创新思考。在 Unit 4 Eat Well 的教学中,针对作者提出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一观点,可设计 "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s view? Why or why not?" 的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辩证思考。学生可能会从“健康饮食对身体机能的影响”角度表示赞同,也可能从“个体体质差异对饮食需求的影响”角度提出不同见解。此外,设计 "How would you revise the diet plan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的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促使他们在吸收文本信息的基础上,结合中学生的生理特点(如生长发育迅速、活动量大)和实际情况(如学校食堂的供餐条件、学生的饮食习惯)进行方案重构。在评价性问题的设计中,需注意为学生提供表达观点的语言支架,如 "From my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However, in reality..." 等句式模板,降低语言表达的门槛,确保思维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问题设计需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开放性原则,避免使用“是/否”类封闭性问题,多采用 "why" "how" "what if" 等能够激发深度思考的提问方式,给学生留下足够的思维空间;二是遵循适切性原则,问题的语言难度需与学生的语言水平相匹配,对于超出学生现有水平的词汇或句式结构,应提供必要的解释或同义词替换,如 "Do you think the author's suggestion is feasible? In other words, can we really put it into practice?";三是体现关联性原则,所有问题都应围绕文本的核心价值展开,避免设计偏离主题的无关问题,确保问题能够引导学生逐步逼近文本的深层意义。

2.2 情境化教学创设:搭建意义建构平台

潘联联(2022)认为高中英语教学中仍然存在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学习的问题。郭树杰(2024)指出通过创设一系列生活情景或故事情景,再依托于情景设计问题,在情景的作用下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其思维,达到沉浸式阅读的效果。因此,有效的问题情境应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和挑战性三大特征,通过多重感官刺激激活学生的经验储备。第一,视觉情境:利用图像、视频等可视化资源创设情境。教学 Unit 2 No Rules, No Order 时,播放校园规则动画短片(含图书馆安静学习、走廊追逐打闹等对比场景),随后提问: "What consequences might result from the wrong behaviors?" "How would you feel in such an environment?", 使抽象的规则概念具象化。

第二,生活情境:链接学生现实生活经验。在环境保护主题阅读前,展示本地河流污染前后的对比照片,引导学生观察: "What changes have happened to the river?" "How do these changes affect your life?", 通过真实体验增强问题的代入感。

第三,任务情境:设计具有真实意义的语言运用任务。学习 Unit 5 Here and Now 中关于国际节日的内容后,创设“跨文化交流博览会”情境,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展板,回答参观者提出的问题: "Why is this festival important to the local people?" "How does globalization influence traditional festivals?", 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深化文本理解。

情境创设需避免形式化倾向:情境应服务于教学目标,而非单纯追求趣味性;情境复杂度需循序渐进,从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逐步过渡到新的文化语境;需预留足够的探究空间,避免过早给出标准答案。

2.3 协作式学习组织:优化认知资源配置

合作学习作为问题式教学的关键环节,需构建科学组织机制以实现认知互补:首先,采用异质分组策略,每

组4-6人,兼顾英语水平、性格特点、学习风格等因素,如在Unit 3 Keep Fit的小组任务中,将擅长提取信息、逻辑清晰、表达能力强的学生合理搭配,分别负责信息筛选、框架构建、成果展示,实现“各展所长,互补共进”;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机制设计分工协作性学习任务,像“健康饮食方案设计”活动中,小组需完成从文本提取健康饮食原则(信息提取)、分析中学生饮食现状(问题诊断)、制定一周营养食谱(方案构建)三项子任务,以明确角色分配确保每位成员深度参与;最后,教师需进行深度互动引导以促进实质性讨论,当小组讨论表面化时,可追问“Do you have evidence from the passage to support this idea?”“Can you think of another way to explain this point?”,出现观点冲突时引导学生思考“What common ground do these two opinions share?”“How can we combine the strengths of both ideas?”。

合作学习评价应关注过程表现,涵盖任务贡献度(如信息提供者、观点组织者等角色履行情况)、沟通有效性(如是否倾听他人观点、能否清晰表达想法)、问题解决能力(如是否提出建设性建议)等维度。

2.4 思维型活动设计:促进认知能力进阶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活动中需要着重关注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孙娜,2025)。通过多样化的合作情境设计可推动学生思维从低阶向高阶发展:首先,在逻辑思维训练方面,Unit 4 Eat Well的“美食推荐官”活动中,要求学生按“营养成分-食用方法-适宜人群”的逻辑框架组织信息,用思维导图呈现推理过程并回答“Why is this fruit more suitable for teenagers than adults?”的质疑,以培养结构化思维能力;其次,在批判性思维培养上,针对“中学生使用智能手机”这一争议话题组织正反方辩论,正方需从文本中寻找“智能手机作为学习工具的优势”等论据,反方则论证“过度使用的负面影响”并以“The data you cited doesn't distinguish between learning and entertainment use”驳斥对方观点,在思辨中发展批判性思维;最后,在创新思维激发上,阅读Unit 1 Animal Friends后设计“动物保护创新方案”活动,引导学生思考“How can we use technology to protect endangered animals?”“What new ideas can you propose beyond the passage?”,鼓励提出“建立动物保护APP”“开展虚拟现实领养活动”等创新构想。

思维活动设计需注意:紧扣文本内容,避免脱离阅读进行思维训练;提供思维导图、论证框架等必要思维工具;给予充分思考时间,避免思维活动流于形式。

2.5 多元化过程评价:完善学习支持系统

过程评价应贯穿教学全程,以实现诊断、反馈、激励的多重功能,其实施需借助观察记录表(记录学生在小组讨论中“能主动提出问题”“善于整合不同观点”等具体行为)、学习档案袋(收集阅读笔记、问题清单、成果报告等以反映学习进步轨迹)、同伴互评表(设计含参与度、贡献值、合作精神等维度的结构化量表引导客观评价同伴表现)等形成性评价工具;同时采用即时反馈(如对学生回答给予“You've correctly identified the main idea, and if you can provide more details from paragraph 4, your analysis will be more convincing”等具体回应)、阶梯式指导(针对不同水平学生提供差异化反馈,对基础薄弱学生采用“Let's first find the key sentence in this paragraph”,对能力较强学生采用“Can you connect this point to your previous knowledge?”)、成长性评价(强调进步幅度,如“Compared with last week, you're now better at supporting your opinions with evidence”)等评价反馈策略。

评价实施需避免两个极端:既不能仅关注语言准确性而忽视思维发展,也不能脱离语言学习空谈能力评价;应平衡定量与定性评价,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3. 问题式教学法应用的实践反思

3.1 实施成效

通过在七年级英语阅读教学中系统应用问题式教学法,观察到以下积极变化:

学习参与度提升:课堂主动发言学生比例从32%增至68%,小组讨论中沉默成员减少。思维品质发展:学生在分析问题时能引用文本证据的比例从41%提高到75%,提出创新性观点的频次显著增加。语言运用能力:期末阅读测试中,推理判断题的正确率提升23个百分点,书面表达的逻辑连贯性明显改善。

3.2 现存挑战

问题式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几方面现实挑战:在班级规模上,45人以上的大班教学中,教师难以兼顾所有小组的讨论质量,导致个别学生存在“搭便车”现象,无法充分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在时间分配上,深度探究活动往往会占用较多课堂时间,容易造成教学进度滞后,需要在探究深度与教学进度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在评价体系上,现行以标准化测试为主的评价方式,与问题式教学所倡导的多元能力评价存在一定冲突,难以全面反映学生在思维能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3.3 优化路径

优化路径包括三方面:在分组策略上,采用“2+2”动态分组模式(2名基础较好学生搭配2名基础薄弱学生),并定期轮换组长以确保责任均衡分担;在教学计划上,预设核心目标与拓展目标,根据课堂生成灵活调整教学内

容, 优先保障核心目标的达成; 在评价体系上, 将过程性评价结果纳入期末总评 (建议占比 30%-40%), 同时开发涵盖思维能力、合作能力等维度的评价工具。

4. 结论与展望

问题式教学法通过问题驱动、情境建构、协作探究等方式, 有效破解了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浅层化、碎片化问题, 为实现从 "知识传授" 到 "素养培育" 的转型提供了可行路径。研究表明, 该方法在激发学习兴趣、发展思维能力、提升语言素养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 一是探索不同文体 (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 阅读中问题设计的差异化策略; 二是开发适配问题式教学的数字化学习资源; 三是构建问题式教学与跨学科学习的融合模式。在教学实践中, 教师需不断提升自身的问题设计能力、情境创设能力和课堂调控能力,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教学策略, 使问题式教学法真正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工具。问题式教学法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升英语阅读效果, 更在于培养学生面对复杂问题时的探究精神与解决能力 —— 这正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核心素养所在。

参考文献:

- [1] 周丽莉. 问题式教学法在高中地理课堂中的应用[J]. 百科知识, 2024, (24): 80-81.
- [2] 赵晶丽, 吴帮平, 陈静. PBL 模式在高职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J]. 安徽建筑, 2024, 31(12): 117-118.
- [3] 沈建新, 王海燕, 王海江. PBL: 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J]. 国外医学(医学教育分册), 2001, (02): 36-38.
- [4] 陈佩佩. 基于问题学习的英语报刊阅读课教学研究[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6, 25(04): 163-165+177.
- [5] 潘联联. 基于“对话理论”的问题探究式教学在高中英语阅读中的应用研究[J]. 中学生英语, 2022, (38): 25-26.
- [6] 郭树杰. 基于问题导向的初中英语阅读情景式教学研究[J]. 中学生英语, 2024, (40): 37-38.
- [7] 孙娜.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初中英语阅读活动设计[J]. 中学课程辅导, 2025, (19): 69-71.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in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Duancan¹, Yangqing²

¹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Kashi university, Kashi, Xinjiang, 8440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three prominent issues in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fragmented teaching content, superficial student learning, and disconnected cultiv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Some teachers still adhere to the traditional "explanation-translation-recitation" model, which results in students passively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losing motivation for active thinking.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n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ddress the aforementioned problems,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for English reading instruction. The study proposes several strategies, including hierarchical problem design, contextualized teaching creati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rganization, thinking-oriented activity design, and diversified process evaluation.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this method can enhance students'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improve their thinking quality, and strengthen their language application abilities. Meanwhile, the study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such as dynamic grouping, flexible adjustment of teaching plan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多维视角下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机制分析与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谷渊博 郝澳茹 徐想 马茹梦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22)

摘要: 本研究系统审视河南省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现状及其多维影响因素, 从个体、工作与家庭三个层面剖析其心理压力源与机制, 发现幼师群体普遍存在情绪衰竭、职业倦怠及焦虑抑郁等问题。在此基础上, 构建包含“积极教育、心理测评、心理咨询、服务评价与研究子系统”的“五位一体”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突出预防与发展并重、技术赋能与多主体协同的特点。研究进一步从政策保障、资源整合、精准服务与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实施建议, 以提升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与职业幸福感, 为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

关键词: 幼儿教师; 心理健康; 服务体系;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27

一、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多维审视与影响机制剖析

(一) 心理健康问题的多元表征与研究结论异质性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围绕“生存标准”与“发展标准”两个维度展开。从现实压力源角度, 学者多视角分析了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高锦嘉 (2020) 认为, 幼儿教师正面临着一系列复合型压力, 这些压力源于其专业能力、封闭的工作场所以及个体与社会因素的交织影响。根据沈凯丽 (2018) 的观点, 过重的工作负荷、个人成长机会的缺失、角色自带的压力、以及来自家长和人际方面的期望, 共同构成了幼儿教师的核心压力来源。靳娟娟和俞国良 (2021) 立足角色理论, 主张通过澄清角色认知、明确角色规范、调适角色期待及化解角色冲突来应对教师角色矛盾, 从而保障其心理健康。

(二) 心理健康水平的群体分化与职业特征

幼儿教师作为幼儿心理发展的关键影响者, 其心理状态具有显著的教育传导性。由于我国幼教队伍以女性为主体, 她们往往需要同时承担职业与家庭的双重责任, 这种压力极易转化为心理倦怠 (李永占, 2016)。安其梅与辛均庚 (2019) 的研究指出, 情绪上的易怒、身体上的疲劳感以及睡眠障碍 (如失眠) 是常见心理问题的集中体现。国际研究显示, 幼儿教师心理问题较为普遍。研究表明, 教师群体中存在显著的心理风险。Seibt 等 (2013) 发现, 有 18% 的教师表现出精神障碍迹象; 更有甚者, Borrelli 等 (2014) 的报告指出, 高达 49% 的教师具有抑郁倾向, 且 11% 的教师存在明显焦虑症状。国内追踪研究进一步揭示, 汪海彬等 (2013) 的研究表明,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呈恶化趋势, 该问题集中体现于躯体不适、强迫症状、抑郁、焦虑及敌对情绪等多个维度。现有研究多聚焦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等外部因素, 而对认知特征、人格特质等内在心理机制的探讨相对不足。

(三) 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是综合性多方面的, 可从个体、工作与家庭三个维度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幼儿教师个体而言, 包括压力感知、自我调节与社会支持等。李凤梧 (2020) 的研究表明, 工作的高负荷压力、薪

作者简介: 谷渊博 (1986—), 男, 汉族,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教师及幼儿心理学
郝澳茹 (2000—), 女, 汉族,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教师心理学
徐 想 (1998—), 女, 汉族,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儿童心理学
马茹梦 (1999—), 女, 汉族,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教师心理学

通讯作者: 郝澳茹

酬待遇偏低以及社会认同度不足，共同构成了民办教师心理问题高发的主要成因。在影响因素层面，陈春梅和谢斌等（2019）发现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是重要外部因素，而高建平（2020）则证实心理授权水平（与 SCL-90 得分负相关）是关键内在资源。在作用机制上，职业认同感被证实是核心中介变量。高丽萍（2020）指出，行业竞争、高自我期望及家长认知不足会削弱这种认同；而李南（2014）的研究表明，低职业认同的教师更易产生心理适应问题。此外，把余婷（2019）补充指出，个体压力疏导能力的不足也会直接导致教师陷入心理困境。

研究表明，幼儿教师的工作环境是其心理状态的关键决定因素。宏观上，职业稳定性与工作支持是基础性保障（Corr et al., 2015），但过长工时、高责任与低薪酬的矛盾使其长期身心耗竭（强帆，2020）。微观组织层面，机械化的刚性管理、团队内部认知冲突及人文关怀的缺失，构成了引发负面情绪的内部诱因（宋智佳，2019）；而外部互动中，超出承受范围的家长高期望则直接催化了职业倦怠（张平利，2019）。

家庭环境作为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微观系统，其影响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压力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微薄收入难以支撑住房、医疗及子女教育等高额开支，这种物质匮乏状态与心理健康水平呈现显著关联（徐群，2004）。另一方面，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冲突亦十分普遍，双重角色带来的压力不仅容易引发情绪衰竭（陆花，2020），还会对睡眠质量造成负面影响（杨邦林，林媛媛，2018）。在此过程中，配偶的情感支持被发现具有重要的压力缓冲作用（何凯文，2024）；反之，若家庭支持系统薄弱，则容易导致个体产生自我否定倾向与社会适应能力下降（郑林飞，2024）。可见，家庭作为重要的心理后盾，能否提供充分的情感理解和支持，直接影响教师的心理调适能力（宋寒，2015）。

二、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幼儿教师作为引导幼儿发展的重要他人，心理健康素质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幼儿园数量的下降幼儿教师面临更多的生存压力和困境，幼儿教师存在较强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面对这一现实背景，如何构建基于河南省幼儿教师需求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成为当前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领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致力于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心理健康服务机制，构建一个涵盖预防预警、教育培训、咨询服务、危机干预等多维功能的 O2O（线上线下融合）心理健康支持系统。该体系通过动态响应河南省幼儿教师的差异化心理需求，旨在为其心理健康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保障。具体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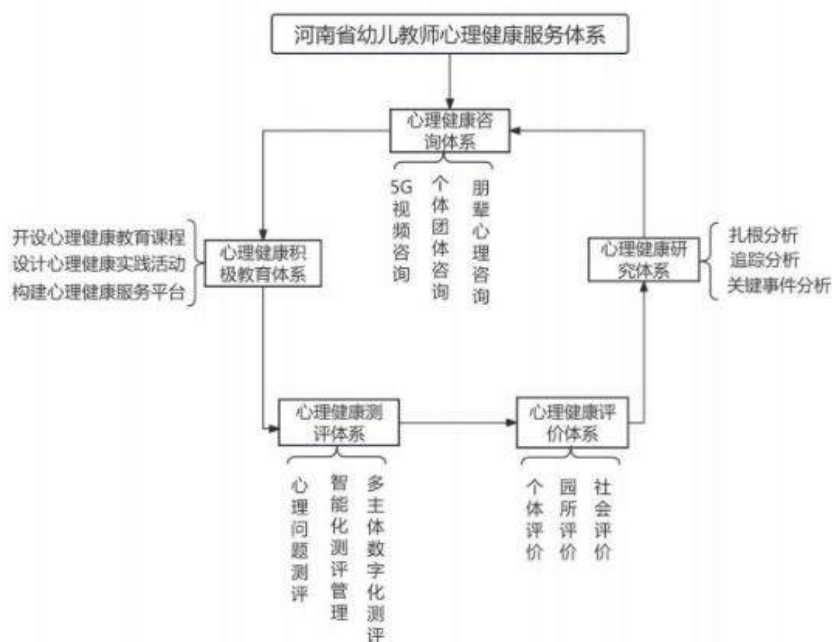


图 1 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图

（一）心理健康积极教育子系统

为系统提升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应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积极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开设融合情景活动、

心理测验、案例研讨及心理剧等形式的心理健康课程与专题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并传授调适方法；设计丰富的实践活动，如心理剧、沙盘游戏、正念训练及中医五音疗法、太极拳等传统养生方式，增强体验性与参与感；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平台，整合资源库、微信公众号、微课堂等线上资源与线下必修课程及环境营造，提供便捷、系统的学习与支持途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短视频、音频、宣传手册等多渠道传播心理健康知识，营造全员关注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

（二）心理测评子系统

在心理测评方面，应科学选用涵盖职业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焦虑抑郁水平、工作压力、社会支持及工作家庭平衡等多维度的标准化量表，结合观察法与现代化仪器进行综合评估，并实施分阶段动态测评，依据结果建立分级预警与干预机制。同时，构建“家-园-社”多主体协同的数字化测评系统，整合园所设备与专业队伍建设、家庭情感支持与社区评估服务，并引入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及自助匿名测评平台，实现数据驱动的动态监测与风险识别。此外，需建立智能化测评管理系统，推行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融合多平台数据构建“一师一档”电子档案，利用 AI 技术加强档案的动态更新、闭环反馈与分级保密，并通过跨时段档案传输机制实现心理健康信息的持续追踪与体系优化。

（三）心理咨询子系统

为构建全面有效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咨询与支持体系，应整合线上线下资源，提供灵活、高效的服务方式。线上咨询（如 5G 视频咨询）可突破时空限制，提供高清实时互动，并依托心理健康网站与 APP 提供匿名倾诉、资源推送及智能匹配服务，系统可根据用户行为自动推荐咨询资源或自助方案。咨询服务形式应多元化，包括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及朋辈支持，充分利用专业设备与共情优势，帮助教师缓解压力、改善人际关系。同时，应广泛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聊天机器人，实现个性化服务推荐与智能初步疏导。依托数据驱动的精准策略，基于测评档案动态调整干预强度与方式，实现从高频咨询到自助资源的平滑过渡。最后，通过园内管理培训、同事支持网络建设，以及与医院、高校的合作联动，构建“发现-干预-转介-康复”的全流程支持机制，全面提升幼儿教师心理服务的可及性、专业性与系统性。

（四）服务评价子系统

为全面、科学地评估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应构建涵盖个体、园所与社会的三级评价框架。在个体层面，教师可借助《SCL-90 症状自评量表》《职业幸福感量表》及《家庭工作平衡量表》等进行定期自评与纵向比对，并结合可穿戴设备监测心率、睡眠等生理指标，以及皮质醇检测等手段客观评估压力水平。在园所层面，通过督导观察、同事匿名评价等方式，重点考察教师在带班、沟通及课程设计中的情绪与行为表现，追踪突发事件与家园矛盾带来的心理负荷。在家庭与社会层面，依托家属月报、家庭成员满意度反馈、幼儿情感回应等多源信息，系统识别工作-家庭冲突及人际压力来源。该多主体、多方法参与的评价机制，既涵盖心理症状识别，也关注抗压能力与幸福感等积极指标，从而实现从服务实施到效果验证的闭环管理，为持续优化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支持体系提供依据。

（五）研究子系统

为系统推进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研究与实践，应构建多方法融合、资源协同的研究生态。以扎根理论为核心，结合关键事件分析与动态追踪，通过质性编码识别如“非在编教师职业安全感缺失”“资深教师职业倦怠与意义冲突”等深层需求，建立“需求-压力-干预”模型，并将研究发现转化为“职业稳定性保障计划”等实际服务优化措施。关键事件技术（CIT）用于聚焦具体压力源（如公开课失败），分析其短期与长期心理影响，并开发《压力事件应对手册》及弹性工作坊等实践工具。依托心理健康档案追踪焦虑、幸福感等指标的动态变化，实现“数据-分析-决策-验证”的闭环反馈，持续优化干预策略。同时，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社区的合作，通过资源共享、数据平台构建与人才共育，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支持和实践应用联动的可持续心理健康研究体系。

三、讨论

本研究基于对河南省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现状的系统调查与影响因素的多维度分析，构建了一套以“五位一体”

为核心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机制。以下从研究意义、体系构建的合理性、实践可行性及未来挑战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首先，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将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置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框架下，突破了以往仅关注个体或工作单一层面的局限，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次整合。研究不仅揭示了幼儿教师在职业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情感耗竭等方面的复杂表现，还识别了工作-家庭冲突、低薪酬、编制缺失、职场不文明行为等关键压力源，为后续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其次，所构建的“五位一体”服务体系（积极教育、心理测评、心理咨询、服务评价、研究子系统）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该体系不仅涵盖了从预防到干预、从评估到反馈的全流程，还融入了现代技术手段（如AI、可穿戴设备、大数据分析），体现了“数据驱动、动态调整、个性服务”的现代心理健康服务理念。特别是将“积极教育”置于首位，突出了从“问题干预”向“发展促进”的转型导向，符合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然而，该体系在实践推广中仍面临若干挑战。一是资源整合难度大，尤其是跨部门（园所、家庭、社区、医院、高校）协同机制尚未成熟，需进一步明确权责分工与资源共享路径。二是技术应用的普及性与接受度存在差异，部分教师可能对数字化工具存在使用障碍或隐私顾虑。三是不同教师群体（如在编与非在编、不同教龄与职称）的需求差异显著，如何实现精准化、差异化服务仍需深入探索。

此外，本研究虽提出了制度、资源与技术三大保障机制，但其具体实施仍依赖政策支持与财政投入。特别是在非在编教师待遇公平性、心理健康服务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仍需政府层面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细则。

四、建议与展望

（一）建议

基于对河南省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的深入分析，为构建科学有效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出以下建议：政府应完善政策与制度保障，加大对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投入，优化编制、薪酬与职称评审机制，尤其注重非在编教师待遇公平性；构建“预防-发展-干预”三位一体的多层次服务体系，涵盖心理教育、动态测评、精准咨询与效果评估等子系统；整合园所、家庭、社区及医疗资源，借助大数据与AI技术提升服务可及性与效率；针对不同教龄、职称和编制状态的教师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从安全归属到自我实现的多层次需求；同时加强心理健康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产学研合作，提升专业服务能力。

（二）展望

展望未来，应进一步探索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动态机制与长期干预效果，深化跨学科融合与国际比较研究，推动服务体系从“问题干预”向“发展促进”转型，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不仅有效提升幼儿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水平，更为我国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参考文献：

- 安其梅,辛均庚.我国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现状研究及对策[J].教育现代化,2019,6(81):353-354.
- 把余婷.农村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现状分析及应对策略[J].青少年日记(教育教学研究),2019,(11):11.
- 陈春梅,谢斌,卞茜.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中学女教师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预防医学,2019,31(04):393-396.
- 高建平.幼儿教师心理授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0,36(05):72-77.
- 高锦嘉.浅析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的现状与措施[J].当代家庭教育,2020,(31):43-44.
- 高丽萍.幼儿教师常见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应对策略[C]//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智能学习与创新研究工作委员会.2020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技术创新学术研讨会年会论文集(三).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渊泉第二幼儿园,2020:1476-1480.
- 何凯文.教师工作自主性对配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心理健康、工作-家庭冲突和配偶感知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D].广州大学,2024.
- 靳娟娟,俞国良.教师心理健康问题与调适：角色理论视角的考量[J].教师教育研究,2021,33(06):45-51
- 李凤梧.民办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存在的原因及策略[J].河南教育(幼教),2020,(11):6-8.
- 李南.幼儿教师职业态度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研究[J].济宁学院学报,2014,35(02):56-59.

- 李永占.工作家庭冲突视角下幼儿教师情感耗竭的心理机制:情绪智力的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6,14(04):492-500.
- 陆花.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J].山西青年,2020,(09):256+258.
- 强帆.浅谈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现状及调整策略[J].天天爱科学(教学研究),2020,(09):179.[8]高建平.幼儿教师心理授权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0,36(05):72-77.
- 沈凯丽.论幼儿教师心理问题的成因与自我调节策略[J].才智,2018,(14):29.
- 宋寒.农村幼儿教师心理健康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 宋智佳.幼儿教师情绪劳动现状及对策探析[J].成才之路,2019,(01):36.
- 汪海彬,陈海燕,桑青松.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比较[J].学前教育研究,2013,(05):42-48.
- 徐群.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及其维护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4.
- 杨邦林,林媛媛.工作家庭冲突视角下影响幼儿教师睡眠质量的心理机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基础教育,2018,15(05):90-97.
- 张平利.幼儿教师的心理健康现状及对策[J].西部素质教育,2019,5(14):98-99.
- 郑林飞.幼儿教师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D].洛阳师范学院,2024.
- Borrelli I, Benevene P, Fiorilli C et al.(2014). Working conditions and mental health in teachers: a preliminary study[J]. Occupational medicine. 64(7):530-532.
- Coor L., Cook K., Lamontagne A. D. et al(2015). Associations between Australian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mental health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J]. Aust J Early Child. 40(3):69-78.
- Seibt R, Spitzer S, Druschke D et al.(2013). Predictors of mental health in female teach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medicine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26:856-869.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alysis and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Mental Health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GU Yuanbo , HAO Aoru , Xu Xiang , MA Rumeng

(Depart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an 47193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among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in Henan Province and its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ing factors. It analyzes psychological stressors and mechanisms from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and familial dimensions, revealing prevalent issues such as emotional exhaustion, occupational burnou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mong this group.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a comprehensive "five-in-one"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encompassing "positive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servic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subsystems." This system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prevention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Furthermore, the study proposes implementation recommendations in terms of policy support, resource integration, targeted services, and team building to enhance the mental health and professional well-being of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thereby suppor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early childhood teachers; ment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健康中国背景下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研究 ——以雅安市雨城区为例

杨渊¹ 黄津容¹ 唐觅^{2*}

(1.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6; 2.西华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39)

摘要: 在“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双重背景下, 提升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水平对满足老年人健康需求、促进积极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为典型案例, 深入探究该地区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存在的不足, 提出配建体育场地和健身设施、强化体育信息宣传、构建多元协同供给机制、建设专业指导团队等改进措施, 可有效提升社区公共体育供给能力, 为老年人体育健身提供更多便利, 助力健康中国的实现。

关键词: 健康中国; 社区; 老年人; 公共体育服务; 需求; 供给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4

引言

民政部披露资料表明, 截至 2024 年 12 月末, 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规模达 3.1 亿, 占总人口的 22%, 中国是全球唯一 60 岁以上人口破 3 亿的国家, 老年群体规模加速扩张, 预计 2050 年前后, 65 岁以上人口将增长到 4 亿, 占比超过三成。此现实表明老年抚养压力不断上升, 对医疗保障系统冲击显著, 系统开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工作, 加强对老年人身心关怀, 对社会进步意义非凡, 有大把空闲时间的退休老人, 普遍怀着强身健体、延长寿命的想法, 参与运动的积极性持续提高, 基于出行受限或者没有恰当交通工具等情形, 老年群体日常健身活动多在居住地附近区域展开, 这种切实的需求, 要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具备相应的供给实力, 本研究以雅安市作为调查目标, 深入剖析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优化途径, 以契合老年群体的健身诉求。

1. 健康中国背景下雅安市雨城区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现状

雅安市是一个拥有 140 多万人口的五线城市,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 雅安市常住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30.7 万人, 占全市人口比重的 21.45%。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 对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能力是一种考验。

1.1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不足, 社会资源整合力度薄弱

顺应健康中国战略体系, 雅安社区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表现为“政府强主导、市场不参与、社会少介入”的单一模式, 社会力量中企业、非政府组织、体育协会和志愿者组织参与占比不超 15%, 对服务长期维持和创新有不良影响, 基层政府部门(街道/社区)服务供给比例达 90%。教育、民政、卫健等部门联动机制未建立, 针对老年群体的体育场馆、教育机构和社区医疗服务资源开放率不足五分之一, 资源协调存在缺陷, 社区体育建设受市级资源短缺制约, 雨城区老年体协社区渗透率为 30%, 面临资金和人力的缺口, 基层体育活动组织难度大。供给结构单一化让财政困境和服务不足的矛盾更尖锐, 限制服务的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 导致老年群体难以获得普及又专业的体育公共服务, 背离“健康中国”的普惠性目标。

作者简介: 杨渊(2000—),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

黄津容(1999—),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运动训练;

唐觅(1981—), 女, 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运动干预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 唐觅

1.2 老年人体育组织数量有限，管理体制松散

雅安市针对老年群体的社区体育组织（如健身协会之类）数量不够，难以充分辐射社区和老年人群，在年代久远的居住区和城郊结合区域更为突出，甚至没有老年体育活动的基础组织，出现“组织缺失现象”，大量想参与的老年群体缺乏有效的组织依托和活动渠道，缺少规范的体育锻炼指导和配套资源，服务资源下沉卡在最后一步骤。街道、社区居委会、老年体协体系、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以及物业公司共同构成管理主体网络，然而普遍存在管理分工不清或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状况，缺乏有力的归口管理部门或整合办法，致使职能界定存在模糊区域，多重管理模式下常常出现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甚至会因管理缺失造成无序蔓延的结果。

面临“资源有限”与“体系混乱”的双重阻碍，雅安社区组织老年人进行有持续、有计划的公共体育活动时力不从心，系统性的体育锻炼参与途径未能充分服务社区老年群体，老人只能个体活动或不再参与体育活动，有限的体育资源因管理疏漏无法充分发挥功效，服务供给模式出现割裂、低效问题，造成公共体育服务对社区老年人群健康的整体帮助明显减少。

1.3 体育基础设施配置不足，公共资源利用率低下

雅安市社区为老年人配备的体育设施数量，和《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规定差得远，根本赶不上老年人口增长速度，现有的设施大多按通用标准建造，安全防护（像地面防滑、无障碍设计、呼救系统）、适合老年人体能的器械（轻量训练设备）以及辅助功能（休息座椅、遮阳棚）都没达到老年人使用要求，出现“有器材却没人想用”的尴尬情况。社区健身器材产权归街道办、物业公司和体育主管部门等所有，各方在维护分工上模棱两可，常陷入“建而不治”的恶性循环，器械坏了无法维修，安全隐患长久留存；校园和工作单位的体育场地本可填补社区设施缺口，却因安全风险和运营成本长期空着，开放资源的说法成了虚言。

1.4 专业体育指导人才匮乏

该市具备老年健身专项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未达 200 人，社区老年人的指导员配置率仅为 0.3 名每千人，和《全民健身计划》明确的 1.8 名每千人的配置要求相差悬殊，现有指导员持有的专业证书大多是竞技体育领域的，像篮球、田径等，对老年人生理机制、慢病运动调养、防摔倒措施及康复护理缺乏专业认识，针对老年人常发的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病症，不具备运动干预能力。薪酬待遇差（未缴纳社保补贴、时薪未到 30 元标准）以及职业晋升难，让专业青年群体对社区指导服务领域敬而远之，导致人员结构青黄不接现象突出，超过 80% 的社区指导服务由志愿者和退休教师等非专职人员提供，服务密度不高（月均最多 1 次）且具有随机性，难以构建可预期的服务周期。

1.5 老年人健身信息传播渠道有限，宣传覆盖面和有效性不足

社区信息发布高度依赖宣传栏、纸质通知、广播喇叭等单向传播方式，虽建立“雅安体育”APP 及微信公众号，但界面交互复杂、功能冗余，老年用户注册率不足 12%，活跃度趋近于零。很多老年人虽然有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愿望，但是由于宣传力度不足，使其不了解该如何参与到相关活动中来，再加上老年人缺乏必要的体育健身知识，导致部分老年人出现了不科学的体育健身行为，损害了身体的健康。由于体育信息宣传的覆盖面十分有限，大部分老年人无法获取相关信息，导致体育健身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1.6 体质监测机制实施力度不足，监测服务覆盖范围有限

在雅安市社区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中，体质监测的制度性敷衍与执行性溃散，导致健康干预丧失科学依据，使“预防为主”的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沦为空谈。市级财政配发的体质监测设备（如体成分仪、骨密度仪、心肺功能测试机）集中投放于 3 个示范社区，但 86% 的社区仅配备身高体重秤、握力计等基础器材，无法获取核心健康指标。体质监测实行力度不够，服务供给不足，大部分老年人为未接受过监测服务，宣传力度不够，监测普及范围较小，监测内容较少。

2. 健康中国背景下雅安市雨城区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建议

2.1 构建多元协同供给机制，强化资源整合效能

针对雅安市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暴露的“政出多门、资源割裂、效能低下”等结构性矛盾，需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赋能-社会参与-技术支撑”的三维协同机制，通过制度创新激活资源整合乘数效应。合并体育局、卫健委、民政局相关科室职能，赋予其跨部门协调权、资金统筹权、考核问责权，终结“九龙治水”困局。在街道层面设立“老年健康服务综合枢纽站”，整合社区医院、养老中心、文体站资源，实现“一站式需求响应”。为每个

老年体育社团配备 1 名专业教练（政府聘）+1 名社工（社会组织派），解决“有人玩、没人教”痛点。打通体育、卫健、医保、民政 4 大系统数据接口，构建“一人一档”健康数字孪生体，动态生成运动风险预警，为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提供健康保障。

2.2 扶持基层体育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运行机制

针对雅安市老年体育组织覆盖率低（城市 38%/农村 9%）的结构性短板，实施分类孵化策略。

在街道层面建立老年体育联合会，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和场地，承担辖区资源调配、标准制定职能。按慢性病类型组建专项小组，由卫健部门按服务人次购买服务，2025 年目标新增 50 个专业小组。推行“楼门微组织”计划，对 8 人以上兴趣队备案即认可，发放 2000 元器材补贴，简化注册流程至 7 个工作日。建立“组织孵化器”提供财务托管、法律咨询等支持，2024 年已在雨城区培育羌族锅庄舞队等 17 个特色组织。

出台《社区老年体育组织权责清单》，明确街道联合会负责业务指导与质量评估，社区居委会承担场地协调与安全监督，专业机构提供技术培训的三方责任边界。推广民主选举模板（三年换届、财务委员独立），开通组织对公账户，政府补贴直拨（规避居委会截留），强制投保团体意外险（政府补贴 70% 保费），覆盖跌倒骨折等 12 类风险。修订《雅安市社区治理条例》，新建社区须预留 200 m² 组织活动空间，每个社区培育≥3 个老年体育组织纳入政府采购目录。采用动态监管机制，对连续 6 个月无活动记录的僵尸组织进行清理，对挪用资金超 5000 元或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组织永久注销并将责任人列入黑名单。通过培育基层体育组织这一“毛细血管”，真正打通老年体育服务“最后一米”。

2.3 推进适老化设施建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考虑到雅安市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大规模建设体育场地有难度，社区需结合老年人身体状况和实际需要，合理设计运动场地及设施体系，可根据当地体育特色和发展阶段，遵循“见机行事、形式多样”的原则开展健身活动，推动老年群体形成普遍、规律的运动习惯，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场地提供，倡导经营性场馆对老年人分时段实行免费或低收费服务，通过空间整合，依托厂房改造和公园闲置地块开发打造综合健身圈，切实改善老年人运动的可达性。

在土地供应政策范畴内，新供应土地若满足划拨目录的条件，可采用划拨手段供给；若用地主体乐意参与，支持采取出让和租赁相搭配的土地供应方式，推进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的试点项目，联合民营资本投资建设运动场馆，健身场地建设适合采用双轨驱动的模式，社区运动设备的采购能够申请政府专项补贴，应当配套落实培训方案，利用专业指导避免运动损伤、提升锻炼水平。

2.4 建设专业指导团队，提高健身指导水平

基于老年人普遍缺少专业健身方面的认知，其健身行动需要专业人士做系统性的引导，社区应当集合政府和社会的资源，组建针对老年群体的专业健身指导班子，为老年人构建科学的运动辅助系统，团队需要掌握跨专业核心技能，包括训练内容规划、营养补充建议、康复干预手段、急救处理方式等要点，从人员补充维度，可综合吸纳体育医学专业实习生、医师群体、体育工作者及健身达人等复合型人才，经资格审核有专业资质者，纳入人才管理库，达成稳定支持模式。

2.5 重视老年人体育信息宣传，改进信息宣传手段

为有效保障老年人的锻炼诉求，推动老年体育事业的健康前行，助力老年人树立科学锻炼的思想，在全社会形成倡导老年体育参与的良好导向，雅安市各社区能够构建多形式的信息传播渠道，利用微信公众号公告、小程序预约等移动平台，搭建高效的信息传递平台，同时在各单元公共告示栏定时张贴老年活动的消息，引导老人合理进行体能锻炼。社区要找寻政策宣传新方式，在主题宣传活动阶段，用中老年人容易懂的方式解释政策规划实施关键，开展互动式专题讲座，让运动员和体育教育人员驻点答疑，实体与数字化结合的双渠道传播体系能对中老年健身活动全程指导，把专业知识变成简易操作指引，适应老人身心状况，提高锻炼成效。

2.6 完善常态化监测体系

体质监测作为衡量个体健身成效与体育参与水平的关键科学手段，其系统化开展需依照多维度推进渠道，首要方面是强化认知疏导，借助开展面向老年群体的专项科普宣讲，完整阐述体质监测的核心意义与健康干预的目标，大幅提高老年群体参与的遵从水平。其次要搭建分级管理体系，搭建覆盖市、区、社区的三级监测网络，实现档案数字化收集及动态报送，借助循证医学的方式对监测数据实施聚类分析，做出个性化体质健康评估报告，为老年人研究中心设立风险预测模型给予数据支持，最后把监测频次提升至按季度监测的标准，把监测维度拓展

到包含血压、体成分的代谢指标,构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动态风险评估体系,全面实施“体医融合”战略,最终构建起“评估-预警-干预-反馈”的闭环式健康治理模式,真正增强老年群体健康水平,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目标助力。

3. 结语

以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地方社会协同发展,全民健身战略实施少不了老年群体参与,铁岭市老年人口基数大,构成有特殊医疗保健需求的人群,对当地老年人健身需求与社区体育服务供给进行实证考察,分析供需匹配的核心逻辑和优化方式,要实施精准干预举措,精准完善老年体育服务增强体质健康,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程度,打造推动积极老龄化的社会支持平台。

参考文献:

- [1]文静,韦颂,吴琴.城市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研究——以宜宾市为例[J].当代体育科技,2025,15(08):79-83.
- [2]崔雅慧.上海市智慧社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4.
- [3]王慧,张庆.武汉市社区老年人体育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研究[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墙报交流(体育管理分会).苏州大学体育学院,2023:429-430.
- [4]史嘉欣.健康中国战略下怀仁市城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策略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23.
- [5]于海燕.基于老年人体育健身需求的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研究——以铁岭市为例[J].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24(04):87-89+95.
- [6]沈天瑞.南通市崇川区社区老年人体育需求与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22,12(24):63-66.
- [7]晁园园.健康南京背景下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研究[D].南京体育学院,2022.
- [8]刘善会.老龄化背景下濮阳市社区老年人体育需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研究[D].河南农业大学,2022.
- [9]吴飘.健康中国背景下城区老年人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与供给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21.

Research o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Commun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 A Case Study of Yucheng District, Ya'an City

Yang Yuan¹, Huang Jinrong¹, Tang Mi^{2*}

¹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106, China

²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9,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the in-dep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the accelerated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eeting the health needs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ing active aging. Taking Yucheng District of Ya'an City, Sichuan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this study deeply explore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sports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communities in this area. It proposes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allocating and constructing sports venues and fitness facilities,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sports information, building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supply mechanism, and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guidance teams. These measure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supply capacity of community public sports, provide more convenience for the elderly to engage in physical fitness activiti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ealthy China.

Keywords: Healthy China; community; the elderly; public sports services; demand; supply

民为邦本：苏轼廉政思想的社会治理意义

刘欣琛¹

(1.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技师教育学院,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要: 苏轼廉政思想主要包括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去谀务实和抑苛恤民。在清正廉洁方面, 苏轼认为官员应拒绝贪污腐败; 在崇俭黜奢方面, 主张节俭生活、反对奢侈, 提倡“寓物而不留物”; 在去谀务实方面, 批判官员谄媚上级的行为; 在抑苛恤民方面, 反对朝廷和官吏剥削百姓, 主张减轻他们负担。在这四方面中, 清正廉洁是崇俭黜奢、去谀务实的思想根基, 崇俭黜奢是清正廉洁在生活作风上的具体表现, 去谀务实是清正廉洁和崇俭黜奢在政治实践上的体现, 三者最终又落脚于抑苛恤民, 以民为本。苏轼廉政思想对构建高效官僚体系、匡正官场奢侈之风、合理落实朝廷政策及减轻民众负担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从而促进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 苏轼; 廉政思想; 社会治理

基金项目: 2024 年西华师范大学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中心项目“社会治理视角下的苏轼廉政思想研究”(编号 DAWXC2404) 成果; 2025 年眉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高校专项课题“东坡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研究与实践——基于生成式 AI 的东坡诗词研学盲盒设计与开发”(眉社联发 [2025] 10 号) 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8

“为政之要, 惟在得人。用非其才, 必难致治”。^[1]在宋代社会治理中, 地方官吏是主体, 因此他们的政治素养, 特别是廉政素养成为影响治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 宋代地方官吏却存在着贪污腐败、生活奢侈、迎合朝廷需求、讨好上级官员和压榨百姓等问题, 并且成为“宋代地方政治的主流和常态”。^[2]

苏轼是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政治家。他既在朝廷担任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 也曾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出任地方长官, 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形成了自己的廉政思想。²目前, 学界有关苏轼政治思想的研究已硕果累累, 但关注廉政方面的却不多。相关成果主要是阐述了苏轼廉政思想的内容、形成因素及其当代价值等³, 而较少从社会治理视角进行分析。因此, 本文从社会治理视角⁴出发, 结合儒家“义利之辩”、“节俭”、“理欲之辨”和“士志于道”等思想, 从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去谀务实和抑苛恤民四方面阐述苏轼廉政思想及其对于北宋地方社会治理的意义, 从而在视角上推进苏轼廉政思想研究, 并为理解北宋地方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一种新路径。

一、清正廉洁: 高效行政体系的廉政基石

苏轼重视官员的廉洁, 认为这关系着国家长治久安, 主张严惩贪腐官员。这是苏轼廉政思想的根基。清正廉洁是政府高效行政体系形成的廉政基石, 有利于官员有效履行职责, 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而促进地方社会稳定。

苏轼在入仕前便已认识到廉洁是官员应具备的重要政治素质, 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嘉祐六年 (1061), 苏轼

作者简介: 刘欣琛 (1990—), 男,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东坡文化。

² “廉政”主要指官员等权力行使主体在履职过程中做到清正廉洁、公正无私, 在政治上形成清明良好、不贪腐的风气。“廉政思想”内容则十分丰富, 包括官德修养、勤政为民、任人唯贤、吏治之道等。参见陈平《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 2004 年硕士论文。本文所提的正清廉洁、崇俭黜奢、去谀务实属于官德修养范畴, 抑苛恤民属于勤政为民范畴。

³ 参见饶晓明、饶学刚《泉清靠自洁, 人正靠自廉——苏东坡的廉政思想与实践扫描》,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第 1-6 页; 饶学刚《苏东坡廉政思想与实践及其应时意义》,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1 期, 第 1-10 页; 周奎生《苏轼的廉政实践及其内在自觉因素分析》,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23 年第 3 期, 第 1-19 页; 周裕锴《浅谈苏轼的廉政思想》, 《苏海观澜》,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4 年版, 第 10-16 页; 等等。

⁴ 本文的“社会治理”是指以州县地方政府为主导, 对其辖区内的社会秩序、民众生活等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

指出：“每中年辄下明诏，使两制各举所闻。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3]4950}在身居高位后，苏轼也不忘这一点。元祐初年，已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作《六事廉为本赋》强调“廉”的重要性：“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官继条分，虽等差而立制；吏功旌别，皆清慎以居先。”^{[3]131-132}六事，即《周礼》中所载的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和廉辨，都以“廉”为首。官吏们应明白“功废于贪，行成于廉”^{[3]132}，要做到“举其要兮，廉一贯之”。^{[3]132}古人治理国家以官员廉洁为基础，而这也使国家治理变得简明，“先责其立操，然后褒其善理。是以古者之治，必简而明，其术由此”。^{[3]132}

苏轼对廉洁官员多有赞赏，而对于贪腐官员则主张严惩。张田在给他妹妹的信中提到，广州有许多真珠、香药，也有闲钱，但他作为市舶使，不想效仿前人自污。张田感慨，在唐代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只有宋璟、卢奂和李朝隐在治理广州时以廉洁著称，但如今还没有这类人，而他现在正在建钦贤堂，把古代清廉刺史绘在堂上，日夜思慕敬仰他们。《宋史》记载，张田“临政以清”，他的妹夫马军帅王凯想在广州贩卖珠犀，但遭到张田拒绝。他说南海地区物产丰富，但自己身为市舶使“不欲自汙尔”^{[4]10707}，可见其廉洁。苏轼由此感慨“洁廉，哲人之细事也，而古今边患常生于贪。守边得廉吏，则夷夏人安”。^{[3]7435}反之，苏轼十分痛恨贪腐之人。元祐元年（1086）四月，苏轼上奏弹劾陈绎，陈述其贪腐罪行：其一，擅自索取市舶库乳香“斤两至多”^{[3]3044}；其二，“外买生羊寄屠行，令供肉”^{[3]3044}，共计亏损了三十七贯钱；其三，私自将州宅的一尊檀木观音“绎别造杉木胎者，货易入己”^{[3]3044}，共亏损官钱二贯文，“系自盗赃一匹二丈”。^{[3]3044}陈绎后被降职知建昌军。苏轼对此不满，认为“绎资性倾险，士行鄙恶，当时所犯，自合除名”^{[3]3044}，这一任命已引起公议，现在朝廷还要重用他，“非惟必致人言，亦恐奸邪复用，其渐可畏”^{[3]3044}，“既以贷其除名，今复与之大郡，将使贪墨无耻，复蠹究民；非朝廷为民设官、慎选守长之意”^{[3]3045}，体现了他对贪官的痛恨。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时发现了军中贪腐问题。甲仗库子军人张全在一年之间先后盗取铜锣十二面，“监官明知，并不申举”^{[3]3595}；帐设什物库子军人田平等在两年之间盗取八百余件帐设什物，二百五十余两银，“恣意典卖”。^{[3]3595}苏轼对此大力整顿，将贪污军人张全、田平等“皆以付狱按治”。^{[3]3596}苏轼又发现诸营点检营房损坏，“诸营军号，例皆暗蔽，妻子冻馁，十有五六”^{[3]3596}，原因在于“将校不法，乞取敛掠，坐放债负。身既不正，难以戢下，是致诸军公然饮博逾滥”。^{[3]3596}这导致禁军们无不贫困，“轻生犯法，靡所不至”。^{[3]3596}苏轼认为，“若不按发其太甚者，无以警众革弊”^{[3]3596}，最后查处了云翼指挥使孙贵。^{[3]3596}

苏轼清正廉洁思想源于儒家思想中的“义利之辨”。就“利”而言，儒家肯定了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但同时强调富贵应该是以正当途径所获得，人不应接受与道义不符的富贵。《论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5]70}，“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97}就“义”而言，儒家反对见利忘义，强调义先于利。《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5]73}《荀子》：“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6]32}苏轼重视廉洁且认为这关乎着国家长治久安便是“义利之辨”的一种具体表现，即主张官员应优先重视“义”，即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接受不义之财，做到清正廉洁，使国家得到有效治理、百姓安稳。

北宋时期地方官员贪腐问题严重。如包拯指出，“逐路转运使，累有体量到州县长吏等，其间不才贪猥之尤甚者……况幅员至广，官吏至众，黠货暴政，十有六七”。^[7]哲宗时“廉吏十一，贪吏十九”。^[8]从社会治理角度而言，地方官吏贪腐不仅会导致公权力滥用、社会不公，还会因资源分配不合理等问题而使官僚履职效能低下，不利于地方社会治理。反之，官员廉洁则能减少腐败现象，提高官员履职效率，促进社会公平，进而增强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减少百姓与官府之间矛盾，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和谐局面的出现。

宋代官吏贪腐问题的产生与朝廷重文抑武、优待士大夫的政策有关。一方面，这使士大夫逐渐形成了重节义的道德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苏轼重视廉洁便是这种风气的一个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帝王对士大夫的优待、宽容也逐渐变成了对官员腐败的纵容。正如贾芳芳所言：“就宋代而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的治国原则，优待官员、士人，官员贪污后处罚不严，更是地方官场贪官众多的原因。”^{[2]105}

二、崇俭黜奢：官场风气的廉政匡正

苏轼反对奢侈生活，认为应寓物而不留物、生活节俭，具体表现在对朋友王诜和姻亲蒲传正的劝告上。这正是清正廉洁在个人生活修养层面上的具体表现。这对官场的奢侈之风形成了匡正，有利于减少官员贪腐、盘剥民众等问题，促进官民关系的协调，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苏轼的好友王诜热衷于书画，为此专门建了宝绘堂，将自己所获得的法书名画贮藏其中。苏轼知道后作《宝绘堂记》劝告他：“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3]1122}为了说服王诜，苏轼举了四个例子：“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3]1122}钟繇曾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和关枇杷等人讨论笔法，“因见蔡邕笔法于诞，苦求不与，痛恨呕血”，被曹操救起，后“诞死，繇令人发其墓，遂得蔡氏法”。^[9]王僧虔是南朝著名书法家，因宋孝武帝“欲擅书名”而不敢显露自己高超的书法水平，“常用掘笔书，

以此见容”。^[10]东晋桓玄造一艘船来装载他的衣服、书画等物品，他在面对别人的劝告时说：“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11]2592}，可见其轻重不分，过分看重身外之物。唐文宗时，王涯之已年过七十，仍贪恋权位，与李训等人为伍，结果不能审时度势而导致家族覆灭，其收藏的大量书画最终为人丢弃。因为过分贪恋外物，钟繇、王僧虔、桓玄和王涯之都“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3]1122}苏轼还以自己为例，告诉王诜要看轻物才能避免病态地沉溺其中。“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3]1122}，害怕失去家里所拥有的名家书画；担心他人不把他所拥有的书画给我。然而，轻富贵而重书法、轻生死而重画作，这难道不是颠倒错乱，失去了本心了吗？此后，自己看到喜欢的书画会积蓄起来，但被人取走了也不会再感到可惜。“于是乎二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3]1122-1123}宋人李治对此评论：“若东坡所论，真所谓寓物而不留物者也。然《乌台诗案》所载款状，与晋卿往还者，多以书画为累，是岂真能忘情者哉？”^[12]可见苏轼虽在劝诫王诜“寓物而不留物”，然而自己却也不能完全做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至少说明苏轼在内心上认同“不可以留意于物”观念，因此才对朋友真诚地加以勉励。

苏轼劝告蒲宗孟不要奢侈生活。蒲宗孟，字传正，其姐为苏轼堂兄苏不欺之妻。《宋史》载：“宗孟趣尚严整而性侈汰”^{[4]10572}，每天要剖十只羊、十头猪，放三百支燃烛到郡舍。有人请求减少一些，他竟说你想让我坐在昏暗的室内忍饥挨饿吗？蒲宗孟的日常盥洁分为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和小大洗浴，“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4]10572}，生活之奢侈可见一斑。苏轼劝他应慈、俭：首先，从利害角度出发，认为蒲宗孟应在今天及早准备“归老之计”，毕竟在退居之后决不能粗衣淡食、闭门谢客，还需应对贫苦亲友，对这些事岂能没有准备；其次，从个人角度出发，说近年来自己将书画奇物视作粪土；最后，从亲情角度出发，“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3]6582-6583}由上可见苏轼的用心良苦和反对奢靡生活的态度。

苏轼这一思想源于儒家“节俭”和“理欲之辨”等观念。就“节俭”而言，在儒家看来，“俭”是一种个人美德。《论语》：“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5]51}孔子及其弟子重节俭而轻奢侈。《论语》：“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5]102}“礼，与其奢也，宁俭”。^{[5]62}此外，“俭”还与君王治理国家关系密切，这是贤君的一种良好品质，能使之有节制地向民众征税。《孟子》：“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5]257}就“理欲之辨”而言，儒家对此所持观点是“以欲从理”、“以理导欲”。^[13]一方面，孔子、孟子、荀子等一方面不反对人的欲望，如《论语》中提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5]70}，“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5]96}《孟子》认为“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5]308}《荀子》指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6]35}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要节制欲望。《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5]382}《荀子》提出“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6]295}

北宋时期，官场盛行奢侈之风。如欧阳澈指出，一些官员“收拾金帛，制造器皿，已拟豪右。酣酒嗜音，夜以继日，惟恨腹隘而不能恣口于饮，力惫而不能肆情于色。至于听讼理民，则偃蹇而不暇”。^[14]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官员们为维持这种生活会进一步中饱私囊、盘剥百姓，导致政府资金流失和官民矛盾加深。就此而言，苏轼崇俭黜奢的廉政思想，对北宋官场上盛行的奢侈之风构成了抵制，从而有助于遏制官吏贪腐和压榨民众的行为，维护官民关系，从而促使社会稳定。

三、去谄务实：政策执行的廉政保障

清正廉洁能使官员不贪图钱财，崇俭黜奢则使官员不会为追求政绩而不顾一切。这两种思想的结合能使官员在政治实践中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惑，也不会因此而极力讨好朝廷、上级，从百姓利益出发来合理执行朝廷政策，从而实现去谄务实。苏轼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认为官吏应从民众利益出发来治理地方，而不应该趋炎附势、攀附权贵，不顾地方实际情况来迎合朝廷或上级官员的需求。这一思想有助于避免朝廷政令的扭曲而使百姓受害。

苏轼任地方官时，对官员为迎合朝廷要求而不顾百姓死活问题有着深刻认识。元祐四年（1089），杭州遭遇旱灾、水灾，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积极抗击灾害、救济灾民。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一些官员为了免遭朝廷指责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行为，如催缴赋税，“转运司来年合发上供额斛及补填旧欠共一百六十余万石。本路钱物，大抵空匮，划刷变转不行，官吏急于趁办，务在免责，催迫赋租，督促欠负，钤束私酒漏税之类，必倍于平日”^{[3]3264}；为确保上供米而余米，“又缘上供额斛数日至广，都无有备。见今逐州广行收余，指挥严紧，官吏不免遮拦，米谷添价贵余”^{[3]3264}，导致“以此斛斗涌贵，小民乏食”。^{[3]3264}北宋时期，向中央上供钱物是地方政府的任务之一。官员们为完成任务、讨好朝廷，即便是在荒年也强行向民众征收粮食和赋税，结果给他们带来沉重灾难。如皇祐三年（1051），包拯指出，江、淮六路连年大旱，百姓困苦，而州县却仍在余粮，结果“父子惶惶，相顾不救，老弱者死于沟壑，少壮者聚为强盗，不幸奸雄乘间而起，则不可制矣”。^{[15]4119}苏轼批判了这些官吏为谋取政绩而不顾民生的行为。

苏轼在史评文章中，以谄媚权势与否作为标准来评判历史人物，从而表达自己反对官员趋炎附势的观点。如他感慨“西汉风俗谄媚”，不受此风气影响的人只有汲黯。苏轼赞扬司马迁“至伉”，但认为他“然作《卫青传》，不名青，但谓之大将军……此等语甚可鄙”。^{[3]7217}在苏轼看来，司马迁不应该将卫青这样的趋炎附势之徒尊称为大将军。同样，他也认为贾谊也不该说出“爱幸于河南太守吴公”^{[3]7217}的话。这些情况都是“习俗使然也”。^{[3]7217}苏轼对司马相如也持恶评，认为他“开创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3]7220}；其《谕蜀父老》本来是用于劝谏天子的，但如今看来，这篇文章不仅没有起到劝谏的作用，反而是在引导君王犯错，“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3]7222}类似的史评文章还有不少。如苏轼谈裴頠：“晋武帝探策，当亦如签也耶？惠帝探策得一，盖神以实告。裴頠谄对，士君子耻之，而史以为美谈，鄙哉！惠、怀、愍皆不终，牛系马后，岂及二王乎？”^{[3]7267-7268}苏轼所提的裴頠应为裴楷。晋武帝登基后，以探策来占卜世数，结果“得一”。

这导致皇帝不高兴，群臣也不敢说话。在此情况下，裴楷说：“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正。”^{[11]1048}结果“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11]1048}，裴楷也得到升官。在苏轼看来，晋武帝探策得一，意味着国家存在覆亡的危机，但裴楷没有为皇帝提出治国良策，而是谄媚他，没有尽到一个大臣敢于谏言的职责。此外，《褚遂良以飞雉入宫为祥》、《王韩论兵》等文章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有人认为，“苏轼对武将的评价观念是深受自宋以来朝廷重文轻武的政策和观念影响，而且这种评价观点也不符史实”，“苏轼评述历史人物只看到人品的劣根性而对人物的功绩一概抹杀，且论述人物多以臆测为主，没有史实依据”。^[16]尽管如此，这些评论反映出了苏轼对于士大夫理想品质要求——拒绝谄媚上级和趋炎附势。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苏轼对士风的现实关怀，“本朝太宗时，士大夫亦有此风，至今未衰”。^{[3]17217}在北宋太祖、太宗和真宗时期，北宋士风在整体上比较低沉、颓废，趋炎附势的人不少。苏轼的史评正是他对当前官场上谄媚之风不满的体现。

苏轼这一思想源自儒家“士志于道”精神。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之际，孔子便为他们注入了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即能超越自己与群体的利害得失，深切关怀社会。《论语》强调，“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5]171}，“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104}“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5]168}不仅如此，儒家还认为“道”尊于“势”，“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5]1358}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仅不该依附权贵，还应根据“道”的标准来批判政治社会。

北宋时期官吏迎合朝廷、讨好上级的风气盛行。如熙宁变法时，“为守令者奉命唯恐后”^{[4]12713}，程珦独自对此抗议，“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归”。^{[4]12713}二浙地区发生旱灾时，负责查看灾情的官吏“承监司风旨，不敢多除税”。^{[4]10941}时任润州推官的王觐接到官文后再次核查，发现灾情严重，于是将百姓税赋全部免除，结果“监司怒，捃摭百出”。^{[4]1094}由此可见，地方官吏极力迎合上级要求，若非如此便会遭到报复。司马光指出，尽管国家遭遇旱灾，“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17]969}，但州县官吏们却仍在“督迫青苗助役钱，不敢少缓”^{[17]969}，结果“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17]970}司马光批判了那些为迎合朝廷政令而不顾百姓死活的州县官吏，同时也认为“彼阿谀之人附会执政者，皆缘新法以得富贵”。^{[17]971}

就社会治理而言，地方官员为向朝廷或上级邀功，会不顾地方具体情况来执行朝廷政令，或不顾百姓生活满足上级需求。这容易使中央政策在地方上执行时被扭曲，加重百姓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苏轼反对官员抵制政治投机的思想有助于构建一个健康、讲求实效的官僚体系，使官员们能实事求是，站在百姓而非个人利益的立场上行动，从而使朝廷政策穿透官僚主义的层层扭曲直达基层，维护百姓的利益。

四、抑苛恤民：社会稳定的廉政基石

苏轼认为民众是天下的根本。同时，民众是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官府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苏轼反对朝廷和地方政府剥削百姓、与民争利，主张应体恤他们。这有助于减少官民矛盾，增加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同时，这也是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和去谄务实思想的旨归。

在入仕前，苏轼便注意到了官吏搜刮民众的现象。他在《策别安万民一》中指出，朝廷要让民知信义，应该“务实其言”、“去其贫”。但如今是朝廷不讲信义，而且官吏贪婪：“今鸡鸣而起，百工杂作，匹夫入市，操挟尺寸，吏且随之而税之，扼吭拊背，以收丝毫之利……今之设官者，求以胜民”。^{[3]835-836}朝廷为求利，将天地之间凡是可搜刮的东西都设立了禁令，结果“民日趋于贫”。^{[3]836}北宋朝廷为缓解财政压力，实行专卖制度，对盐、茶、酒、矿等实行榷禁，甚至强制百姓购买榷禁商品，逼得百姓悲叹不已，不得不放弃家产转移，甚至成为盗贼。苏轼看到了百姓疾苦，反对官吏搜刮他们，认为官府贵在不与民争利，“夫所贵乎县官之尊者，为其恃于四海之富，而不争于锥刀之末也。其与民也优，其取利也缓”。^{[3]836}苏轼强调，朝廷应“可取之利，当有所不取”，即减少对百姓的掠夺。这样才能“以教民信，而示之义”^{[3]836}，“若曰‘国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则臣恐其失之多于得也”。^{[3]836}

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通过改革衙前役和酒税，减轻百姓负担，增加他们的收入。他发现民众最畏惧衙前役。衙前役是差役的一种，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职役，“在全国范围内的衙前役，所担承的职责也有所不同”。^[18]凤翔地区民众衙前役的内容主要是将砍下的南山之木编为木筏，装上货物并放进渭水，使之经三门峡运至开封，如有损失，负责押运的差户就要赔偿。苏轼发现问题主要在于“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19]215}，于是修改规定，“使衙前得自择水工，械行无虞”^{[19]215}，此后“衙前之害减半”。^{[19]215}苏轼还请求朝廷改革酒税，官榷与民。他在奏折中指出，在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3]5231}，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3]5231}元昊之变即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并于当年七月攻破庆州的事件。此后，在康定元年（1040）、庆历元年（1041）、庆历二年（1042），西夏在陕西地区发起了三次进攻，大败宋军。西夏的进攻给北宋民众带来了巨大损失。如庆历元年（1041）八月，西夏攻破宁远寨。“纵兵四掠，刈禾稼，发窟藏”。^{[15]3163}而巨大的军费支出也给百姓带来灾难，“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15]3633}因此，“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3]5231}苏轼认为，要对付西夏应让百姓平时休养生息，以防战乱。苏轼的见解很合理，因为百姓的穷困引发了农民起义。“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不能抚存，遂使为盗”。^{[15]3450}若不减轻百姓负担，使之得到恢复，恐怕外患未平内患又起。因此，苏轼希望朝廷能改革酒税，“官榷与民”，并算了一笔账：每年因放弃酒课而损失的二万贯钱可以通过税收弥补，即便是这些钱都损失了，朝廷也可以通过转运使实现均多补少，“要以共足”。反之，若民众日益贫困且得不到诉说，突然发起变乱，那么即便朝廷每年能得钱千万也无法解决好这个问题。^{[3]5231}苏轼通过计算利弊得失，希望能说服朝廷。苏轼最后说：“方今山陵事起，日费千金，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3]5232}嘉祐八年（1063）三月，

宋仁宗驾崩。宰相韩琦出任山陵使，负责修筑陵墓，命令苏轼将凤翔地区的贵重木材送往陵地。在朝廷急需用钱的时候，苏轼却提出“官榷与民”确实显得“迂阔”，但也体现了他心系民众，急于为他们减轻负担的态度。

苏轼知扬州时，发现当地每年举办的万花会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3]8206}，于是苏轼将其罢去。他认为：“万花会本洛阳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乐为穷民之害。意洛阳之会，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3]8206}关于洛阳和扬州花会，宋人笔记载，洛阳牡丹名闻天下，太守在花盛开时举办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20]239}蔡京知扬州时也举办万花会，此后“岁岁循习而为，人颇病之”。^{[20]239}苏轼取消花会后，“人皆鼓舞欣悦”。^{[20]239}赏花是北宋时期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一种稳定、习惯的休闲方式。苏轼也有此喜好，并写了《牡丹记叙》、《吉祥寺赏牡丹》、《吉祥寺花将落而述古不至》等作品。但在苏轼心中，牡丹花再美也比不过减轻百姓负担。

苏轼思想与儒家“民本”和“仁政”理念有关。儒家高度重视民众，如《孟子》指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5]1379}君王要称王天下，便应乐民、忧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219}想要得天下便要先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5]285-286}儒家主张行“仁政”，认为统治者应该使民众富裕，《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5]1136}要做到这一点，统治者就应该轻徭薄赋。《孟子》：“省刑罚、薄税敛”^{[5]206}，“取于民有制”。^{[5]257}反对统治者苛待民众。《孟子》：“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5]205}

有宋一代，财政紧张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朝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持续压榨地方，而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又只能搜刮百姓，“鱼肉百姓成为了当时比比皆是的地方官府常态”。^{[2]180}如地方政府为满足朝廷的财政需求而争向朝廷进献羡余。羡余，即地方政府在额定上供之外向中央上缴的财物，其本质实为“非重征则横敛，是民之膏血也”。^{[4]11820}皇祐三年（1051）八月，江南西路转运使、司勋郎中刘纬因被台谏弹劾“庸懦不职，方饥而剥下以收羡余”^{[15]4150}而被徙为庐州知州。王质任湖北路转运使时，正值朝廷对西夏用兵，急需钱财，而他“独不进羡余，其赋敛近宽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胜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2]1}，可见进献羡余是地方政府的普遍行为，体恤百姓的官员是少数。此外，民众还要承受各种名目的赋役，官吏的各种巧取豪夺，官吏帮助地主转移的赋税等。^{[2]180-198}地方政府的过度压榨使民众生计维艰，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盗匪横行、民变，导致地方社会治理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进而使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最终不利于地方社会的建设。就此而言，苏轼抑苛恤民的思想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生活安定，减轻地方政府维护社会秩序负担，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结语

苏轼廉政思想主要包括四点：一是清正廉洁，反对官员贪污腐败。二是崇俭黜奢，主张寓物而不留物和节俭生活，反对官员奢侈生活。三是去谏务实，批评官员谄媚上级、迎合朝廷需求的行为，主张从百姓利益出发来执行朝廷政策。四是抑苛恤民，反对朝廷和地方官员剥削百姓，认为应减轻他们的负担。这四个方面相互支撑、互为表里，其中清正廉洁是崇俭黜奢、去谏务实和抑苛恤民的思想根基；清正廉洁使官员在生活上崇俭黜奢；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则有助于培养官员淡泊名利的道德品格，从而减少他们因私利而迎合上级的动机；清正廉洁、崇俭黜奢和去谏务实有利于地方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减轻民众负担，最终实现抑苛恤民。这些思想有助于建立一个高效的行政体系，匡正官僚体系中的奢侈风气，使朝廷政策合理执行，减轻百姓负担，从而实现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

贾芳芳认为，在宋朝，“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官员选任与管理的首要目的，是维护皇权加强中央集权。在此前提下选任的各级地方官，或一心媚上，或一意谋私，完全不顾百姓的感受……尽管有少量清官，他们身体力行儒家的教育，以清廉形象施政，却根本不可能扭转官场昏天黑地的大气候……地方政治的黑暗与暴虐，正是根源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具有必然性。”^{[2]223-225}尽管如此，我们也能从苏轼廉政思想中看到他对皇权的依附，超越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影响。而这种超越既源自儒家“义利之辩”、“民本”、“仁政”“士志于道”等精神，也是北宋时期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觉醒，形成“以天下为己任”集体意识的历史产物。虽然苏轼等士大夫虽无力从根本上改变专制集权体制带来的腐败生态，但他们对这种败坏风气的对抗彰显了士大夫精神的可贵，也为后世提供了如何在腐败环境中坚守廉洁的生动范本。

参考文献：

- [1]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19.
- [2]贾芳芳.宋代地方政治[D].保定：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9.
- [3]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 [4]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3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0:311.
- [8]陆心源.宋史翼[M].北京：中华书局，1991：68.
- [9]邓安生.蔡邕集编年校注（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78.

- [10]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 中华书局, 2017:656.
[11]房玄龄.晋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12]周必大.玉堂杂记校笺[M].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9.
[13]任松峰.儒家廉德思想研究[D].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15:48.
[14]黄淮撰, 杨士奇辑.历代名臣奏议, 明永乐十四年内府刻本.
[1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 上中华书局, 1985.
[16]韦正春.苏轼史评论[J].惠州学院学报, 2020 (1) :81.
[17]司马光.司马光集[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8]漆侠.漆侠全集 (第 8 卷) [M].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145).
[19]曾枣庄, 舒大刚.三苏全书 (第 18 册) [M].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1.
[20]张邦基.墨庄漫录[M].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21]欧阳修.欧阳修集编年笺注 2[M].成都: 巴蜀书社, 2007:205.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The social governance significance of Su Shi's thoughts on clean government

Liu Xinchen¹

¹ School of Technician Education, Mei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eishan, Sichuan

Abstract:Su Shi's thoughts on clean and honest government mainly include being honest and honest, advoca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eliminating flattery and pragmatism, and restraining harsh people. In terms of integrity and integrity, Su Shi believed that officials should refuse corruption; in terms of advoca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he advocated frugal living and opposed extravagance, and advocated "retaining things without leaving things"; in terms of de-flattery and pragmatism, he criticized officials for flattery and flattery; in terms of curbing harsh and caring for the people, he opposed the court and management exploiting the people and advocated reducing their burden. Among these four aspects, integrity and integrity are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advoca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and eliminating flattery and pragmatism. Promo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integrity and integrity in life style. Eliminating flattery and pragmatism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and advocating frugality and removing extravagance in political practice. The three ultimately settled on suppressing harsh and caring for the people and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Su Shi's thoughts on clean government have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building an efficient bureaucratic system, rectifying the extravagant style of officialdom, rationally implementing court policies, and reducing the burden on the people, thereby promot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local society.

Keywords:Su Shi; clean government thought; social governance

愈炸愈坚：重庆大轰炸之下渝中半岛的城市建设（1939-1941）

杨哲¹

(1.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10691)

摘要：1938—1943 年间，日军对战时首都重庆展开了近六年的战略大轰炸，给处在渝中半岛的母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上下城区屡遭炸毁，城市基础设施遭到空前严重的打击，给城市与人民造成了极其惨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使得城市的正常演进中断。但在客观意义上，大轰炸使得重庆母城获得了彻底改造重建的机会。在艰苦奋斗下，重庆母城的城市布局与城市形态得到改善，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得到提速，为之后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重庆大轰炸；城市史；城市建设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6

引言

重庆大轰炸是抗日战争史中重要的历史事件，是苦难沉重的民族历史记忆，更是中国人民不畏日军淫威奋勇抗战的真实写照。重庆大轰炸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轰炸范围包含了以战时首都重庆地域为中心的核心区，重庆防空司令部对空监视的监视区，以及作为重庆战略防御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围区^[1]；同时，重庆大轰炸也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以 1938 年 2 月 18 日日军飞机空袭巴县广阳坝机场为起点，以 1944 年 12 月 19 日日机轰炸梁山、万县、开县为终点，持续时间长达 6 年零 10 个月^[2]，时间跨度几乎涵盖了全面抗战，是研究西南大后方抗战的重要切入点。三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关于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学者们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共同构筑了重庆大轰炸研究的基本内容框架，使之逐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

若从城市史的角度出发，以城市建设的视角来看重庆大轰炸，就会发现这是重庆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关键时期。大轰炸虽然严重破坏了重庆主城的城市建筑，使重庆旧城遭到严重破坏，但也在客观上打破了旧有城市格局对城市良性发展的桎梏，解决了军政府时期未能解决的市政工程遗留问题，对今天渝中区的城市格局都有着重要影响。

本文将时间范围选定在 1938-1941 年，这是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无差别、疲劳式轰炸最集中的时期，也是重庆旧城改造、重建的关键时期，以此为切入点，更能从中了解重庆城市更生过程中基础性的措施，找到重庆现代化的历史演进脉络。本文将从重庆近代以来的重庆建设及破坏情况、大轰炸中的抢修、重建状况，以及这一时期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影响。

一、重庆近代以来的建设状况以及大轰炸造成的城市破坏情况

（一）开埠以来渝中半岛的城市建设情况

从悠久的建城史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段中，重庆的城市职能主要以政治为主，且更加强调军事上的功能。重庆城市的建设也主要服务于此，历史上几次以军事防御与稳定政权为目的主城空间扩展，使之逐渐形成了“周二千六百六十七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3]”。由山脊分上下半城的基本城市格局。至清朝前中期，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重庆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获得了发展的新机，商品经济走向繁荣，地区贸易得到增加，重庆逐渐成为了一个辐射“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一隅”的重要区域性市场网络节点。商业人口的涌入、农副商品的汇集，促进了重庆由“城”到“城市”的转型。

作者简介：杨哲(2003—)，男，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通讯作者：杨哲

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始于开埠。1890年3月31日,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正式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1891年3月英国控制的重庆海关成立开关,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此后,西方商品、资本以及生产方式进入重庆,促使川东地区农村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对传统城市的各方面都形成冲击^[4]。开埠通商为重庆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城市建筑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以教会学校、医院为代表的宗教建筑快速增加;在五福宫一带由西方列强设立领事馆而逐渐形成的带有西式风格的领事巷;朝天门至南纪门下半城白象街一带商业金融区涌现了许多新建筑,汪全泰商号、大清邮政局、海关等商业和官方机构相继出现在临江的传统行政贸易区。这些变化正反映了重庆城市近代化初期土样混杂的特点。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人口压力带来了城市对外扩张和调整内部结构的动力,突破“九开八闭”旧城墙对城市空间扩展的束缚和改进城市内部基础设施、改善民众居住环境的需要与日俱增。在军政府时期,城市新区的开拓和旧区的改造提上了日程^[5]。

民国十六年(1927)至民国二十五(1936)年,九年间的军政府统治,是重庆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督办公署成立前的重庆,基础设施薄弱,交通、自来水、电力、下水道等公共事业亟需建设;房屋“如云而凌乱似丛”,街道“新市街迂曲狭隘,难于举步”,且交通极为堵塞。针对市政的诸多弊病,时任督办公署署长的潘文华开始了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建设,提出了开辟新市场和整理旧街道两项基本政策,并采取渐进方略确立四大原则:“1、积极开辟新市场,以为旧城内小商业及住宅此地推移之场合;2、先整理旧城街市,酌量推展宽度,以谋整齐市容,便利交流;3、公用事业以扶助民营发展为目的,就有基础者,建都其内容,对症施方,徐谋匡济。”由此开始了城区的改造。

在新市场的开辟中,市政厅通过对通远门外“由临江门沿嘉陵江达牛角沱,由南纪门沿扬子江达兜子背,袤广近三十方里”的“四十三万七千数百余冢”的坟地进行迁移,时坟地分为三区:“自通远门起,经观音岩、上下罗家湾以及两路口为第一区;自南纪门,经雷家坡、石板坡、燕喜洞、菜园坝、徐家坝以至冤子背右,与第一区相属为第二区;又自临江门,经双溪沟、宰房沟、大溪沟、张家花园、上清寺、曾家岩左,与第一区相属为第三区。”由于迁坟区域广阔,加之由迁坟工作而引发的官民利益冲突,历经六年之久完成此工作,为扩建腾出大于旧城区一倍的空间。在迁坟的同时,新市区交通干线的建设也提上日程,市政府拟定了新市区“一由通远门经两路口至曾家岩,约长六里;一由南纪门经菜园坝并科上接两路口,约长五里许;一由临江门双溪沟经孤儿院至曾家岩,亦长五里许”的三大干线,使其与旧城区交通延伸连接,以达到带动旧城和新区的协同改造发展的目的。

在旧市区的改造中,市政府将城墙拆除的工作放在了优先的位置,由朝天门开始,太平门、南纪门等次第拆除:“华洋杂处,来往人繁,而各城门类皆狭窄,以至行人进出,时形拥挤,对于交通,深为不便,敝署为便利交通起见,拟将各道城门逐一拆卸整理,以利通行,特先从朝天门着手,定于三月六号动工开拆。”由此封闭城墙的格局被打破,重庆的拥有了更多的城市空间与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市政府又先后“整理旧街道,使市场展宽,市面清洁,创修中央公园,使市民于工作之暇,得有休憩之所,又以本埠三面临江,水道交通,颇关重要,乃从事建修嘉陵码头、朝天门码头,以利商货之转输”,除此之外,重庆市政厅还计划筹备设立自来水公司,整顿电灯、电话设施,新修马路十道。以上措施使得重日市区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为后续作为战时陪都奠定了基础。

(二) 大轰炸的破坏情况

为了摧毁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日军航空部队对中国大后方开展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受到的破坏尤甚。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轰炸,自1938年2月18日首次空袭巴县广阳坝(今南岸区广阳坝)机场起,至1944年12月19日最后一次对梁山(今梁平)、万县(今万州)、开县进行轰炸止,轰炸时间长达6年零10个月^[1]。而其过程大致可划分为1938年2月至1939年1月的试探性轰炸阶段;1939年5月至1941年8月的日军大规模轰炸阶段;1941年9月至1944年12月的日军零星轰炸阶段三个阶段^[6]。长时间的轰炸使得城市遭到巨大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其中以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和1940年的“八一九”大轰炸集中体现了轰炸的破坏性。

5月3日,日军出动第一空袭部队45架(中方调查为36架)狂炸重庆上午9时,日本海军45架96式中型攻击机从汉口机场起飞,以密集队形突袭重庆。轰炸历时1小时50分钟,明显带有以摧毁城市建筑、设施,轰炸平民,扰乱城市金融和商业,达到造成更严重的社会恐慌为目的。轰炸重点目标是重庆商业、住宅集中,人口密度最大之一的老城区下半城,以朝天门—陕西街—望龙门—太平门—储奇门一带为中心。日机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在对重庆市区的轰炸中首次使用燃烧弹。中弹地点达36处,下半城有19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41条街道被炸起火。此次轰炸共造成人员伤亡1023人,其中死亡673人、重伤350人。炸、焚毁房屋846栋222间,直接损失达国币42万余元。5月4日傍晚,日军第一航空部队27架再度狂炸重庆市区。轰炸目标转移到重庆老城区上半城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共投弹126枚,其中爆炸弹78枚、燃烧弹48枚。又有36处地方中弹,有38条街道被炸,都邮街、柴家巷等10条主要街道全毁尽毁。轰炸造成人员伤亡5291人,其中

死亡 3318 人、重伤 1973 人,炸、焚毁房屋 2840 栋 963 间,被炸后的市区“七处由轰炸引起的大火很快蔓延开来,全市陷入火焰的包围中”。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熊熊大火燃烧了近三天才被扑灭。上半城有 38 条街道被炸,丧心病狂的日军还在投弹时,“除抛掷星月牌毒质纸烟数十包外,并掷有白色棉花,在紫金门外,被一无知小孩拾得,手指顿时红肿,疼痛难忍。敌人之用毒物,残害我无事民众,已经证据确实。”该区商业集中,物资损失严重,仅都邮街一带被烧毁的绸缎布庄就达 15 家、绸缎 16 万多匹;全市 37 家私营银行、钱庄中的 14 家被烧毁。驻重庆的英法德使领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一次轰炸死伤 5000 人以上,这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整个重庆大轰炸中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并未达到“使重庆政府屈服”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目的,相反,惨烈的轰炸激起了激发了重庆人民无限的愤怒和仇恨,增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而日军则展开了规模更大、次数更频繁且破坏力更为惊人的 101 作战计划。

101 作战计划实施是从 1940 年 5 月 18 日到 9 月 4 日,一共进行了连续 112 天大轰炸,共轰炸重庆市内 75 次,日陆军出动 21 批、904 架次,海军出动 54 批、3651 架次,共投弹 27107 枚,重 2957 吨。其中对重庆市区的空袭飞机达到 2023 架次,投炸弹 10021 枚,共计 1405 吨。5 月 26 日到 8 月 23 日的 90 天里,轰炸了 32 天,大约平均每 3 天就有一轮。8 月 19 日当天更是受灾严重。

8 月 19 日,日军出动第一联队 36 架、第二联队 53 架、陆空 35 架、战斗队(包括零式机)14 架、侦察 5 架共 143 架(中方调查为 135 架)两次共 4 批次狂轰滥炸重庆市,日军还没有完成制式化的零式战斗机首次担任轰炸护卫任务。据防空司令部调查,第一次 9 架在市区枣子岚垭、罗家湾、国府路、飞来寺等地投爆炸弹 41 枚、燃烧弹 10 枚,造成 11 人受伤,损毁房屋 57 栋 91 间。第二次日军出动 119 架(内有驱逐机 9 架)分 3 批轰炸市区,此次轰炸日机共投掷爆炸弹 262 枚、燃烧弹 52 枚,两府路、大田湾、两路口、中二路、中华路、通远门、学田湾、都邮街、大梁子、初期门、瓷器街、较场口等地遭到毁灭性破坏,苏联大使馆再次中弹,《新民报》社被炸停刊;日军投掷新型汽油凝固弹 36 枚,引起巨大火灾,从较场口、都邮街、演武厅、大梁子向东一直烧到苍坪街,西边一直烧到十八梯以下,市区最主要的几条繁华大街被烧成焦土。轰炸造成 181 人死亡、132 人受伤,房屋损毁 643 栋 1180 间。八·一九大轰炸集中体现了日本陆、海飞行队“协同作战”后,轰炸规模与轰炸烈度的显著提升。日军在这一时间段中采取“无差别的、连续的、反复的、地毯式的、不分昼夜”的疲劳轰炸策略,并针对重庆城市建筑多为木质结构的特点,大量使用破坏力极大的新型凝固汽油弹和燃烧弹,重庆主城区多次化为焦土。

二、大轰炸时期重庆的城市建设

大轰炸使得渝中半岛的主城区遭到极大的破坏,居住区、商业区被炸毁的房屋不计其数,城区最繁荣的街道多次化为焦土。但重庆人民并未向日本侵略者的淫威屈服,在经历轰炸后,迅速组织起了应对轰炸的各种措施,并开启了修理和重建被炸毁的房屋及公共设施的各项工

(一)废墟上房屋的重建

重庆地狭人稠,传统民居多为吊脚楼、合院等。在成为战时首都后,大量人口的涌入加剧了这一现象,住房问题日益紧张,除少数人拥有宽敞的住宅外,市民很大部分人居住在被称为“国难房”的简易房屋中。这类房子十分简陋,多数是捆绑式的临时房屋,材料一般都是用泥土竹木,支架而成,采用箍桶的捆绑方式制作而成。建材为竹木结构,破败凄惨,摇摇欲坠,具有相当的临时性^[7]。

日军轰炸的对象不仅是重要工厂、物资仓库、首脑机关和军事设施等军事性场所,还将其范围扩展至城市的商业区、文化区、居住区等非军事场所,实行无差别轰炸,给城市建筑以毁灭性的打击,市民的居所损害尤甚,且历经多次炸毁,“敌机的毁灭路线是从曾家岩起,经过国民政府、大溪沟、张家花园、观音岩、七星冈,以至城内的。在这一条路线内的房屋差不多都毁灭净尽了。立在高处一望,但见五六处的大火,满眼破瓦颓垣,罩上一层灰土,通行大道变成了巨坑或小丘。”但重庆并未因此屈服,展开了官方政策、经济支持与民间自救两个层面的城市重建活动^[8]。

在宏观层面,国民政府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首先,国民政府颁布了系列法案在微观上支持民众的房屋重建工作。政治上,行政院颁布了《内地房屋救济办法》,规定奖励民众建筑私营住宅:一、由地方政府尽先完成通街道路及公用设备;二、三年为限的房租减半征收;三、建筑经费不足者予以介绍押款。《重庆市政府疏散区建筑房屋奖励贷款办法》也对居民自行建房奖励政策也进行了规定,若在建者自筹房屋建造款项不足,可由住户自行筹款 30% 的费用基础上,政府给予最高可达 70% 贷款支持建房。针对日军轰炸造成的房屋损毁,重庆市政府放松了对违章建筑的管控,以抗战实际需要为先,制定了《被炸灾区暂准搭棚办法》,准许民众在被炸地点就近搭盖临时席棚居住。经济上,国民政府制定了《空袭紧急救济办法》,规定了关于房屋被炸救济具体措施,贫

苦难民房屋全毁者，每户发给救济费三十元；炸毁一部分者，救济二十元；震踏房屋，补助十元；对于住房被炸无栖身者，应予以收容，并于一星期内妥善安置。这为民间的自救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支持。

其次，国民政府在制定宏观的城市规划方案上做出了一定的尝试。1940年4月1日，重庆临时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重庆建设方案》提交会议审议。其内容包含建设前提、交通建设、经济建设等内容，并非单纯的城市建设，提出了“由立体发展而向平面发展”、“由以往一个中心之繁荣，而变为许多区之卫星式之繁荣”的设想。1941年2月18日，陪都建设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与同年4月提交了陪都分区建设计划初稿，提出将重庆分为商业、工业、文化、住宅、风景等五个较为松散的功能区。但由于抗战在军事上对资源大量消耗、日军持续轰炸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等因素，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进展缓慢，对民间自救的指导作用也十分有限^[9]。

在微观方面，民间的自救行动是房屋重建的实际执行者与主要参与者。面对日军的猛烈轰炸，重庆人民不畏强敌，积极开展轰炸后的重建工作。“每一次空袭之后，人们就会从在岩石上凿出来的防空洞里走出来，立即开始清理被炸的现场，修补那些受损较轻的房屋，甚至重建那些已被完全炸毁的房屋。从那些完全被炸毁的房屋中，人们会捡出木材，拔出并敲直每一根钉子，并将它们仔细地储存起来，以便能够再次使用。每一个人都在工作，在繁忙的街道上可以听见经久不息的叮当敲榔头声和嗡嗡的拉锯声。”在共同遭受的轰炸之下，人们团结一心，互帮互助，许多救济服务团体积极行动，协助受灾人民进行“清理街道、挖掘掩埋、救伤...设临时收容所”等善后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每年秋季到第二年春季，重庆多大雾，日军轰炸视线受阻，重庆便有了短暂的喘息之机，并会开始集中性的重建与改造，“从春天到夏天，日本人的飞机几乎把整座城市都炸成废墟。可秋天一起雾，日军轰炸一停歇，他们马上就在废墟里重建房子。这些房子第二年又被炸掉，可秋天一到他们又把他们重建起来。”重庆人民在废墟中一次次重建家园，在轰炸集中时抢修，在大雾锁城的时候利用天气条件补修与改造城市，不仅使重庆主城在轰炸中屹立不倒，还在精神上极大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日决心。

（二）火巷的开辟与建设

迁都以来，日军对重庆长期实行“无差别轰炸”、饱和式轰炸，上下半城城区几乎被完全摧毁。高烈度的战争往往会引起大规模的火灾，加之日军针对重庆建筑多为木质结构的特点大量投掷燃烧弹，重庆主城多次化为火海，给城市居民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因此，如何有效控制火势蔓延、如何最大程度减轻火灾对城市的破坏，成为了战时城市重建与改造的重点。国民政府借鉴宋代以来的防火经验，在炸毁的废墟中开辟火巷，以提高城市整体防火水平与能力。

1939年4月4日，行政院第48次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开辟火巷办法》对火巷的建设时序与标准提出要求，“甲.火巷应先由房屋稠密之区拆起，并应尽可能利用原有街道，务期与马路衔接；乙.防空隧道出入口附近妨碍交通之房屋，应尽量拆迁火巷宽度为十公尺及十五公尺两种。”开始了火巷建设的尝试。1939年4月15日，工程组首先选择旧市区神仙口至三牌坊以及长安寺至县庙街两线，将其辟为六公尺宽的火巷，并在4月29日完工。不久，“五三”“五四”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发生，主城区第一次遭到严重炸毁，城区原有布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国难之下，重庆市民的抗战意志大大提升，严重的火灾也让他们意识到，开辟火巷的重要性，火巷建设工作由此加速。5月5日，蒋介石立即召集在重庆的党政军各部采取措施，紧急处理，从速执行开辟火巷措施，增派工匠，调增火巷数量，经过日夜赶工，旧城区“共开辟的15公尺宽火巷马路14线，计6262公尺；10公尺宽之火巷69线，计14831公尺。拆卸房屋面积达103200余方丈，共拆除大小平房、楼房9600余户”

火巷的开辟加强了重庆的抗火灾能力，抑制了火势的蔓延。但这一举措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极大改变了重庆街市道路的面貌，使原先狭窄拥挤的路面得到拓宽“密集的蜂窝一般的山城慢慢地变得疏朗起来”。火巷的建设也为新建马路奠定了基础。由于应急的特性，火巷最开始不过6米宽，仅用作战时防御的通道。但随着其功能的日益凸显，火巷越来越被视作是新公路的雏形，其宽度也不断增加，出现了“10米和15米两种形式”，“15米火巷更是“成为旧市区的主要交通马路。”凯旋路可视为典型代表，这一在大梁子山脊上完成的螺旋式火巷贯通了重庆上下半城，实现了不同高差区域之间的联系，方便了防灾救灾与交通往来，至今仍在城市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火巷公路的建设还直接推动了城市管理层面的改变。由于拆除火巷导致一些街道名不副实，为方便管理以及提升城市整体形象，重庆市政府对城市街道进行了重新命名，“在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商讨新开辟火巷命名事宜当场决定原则：一、化零为整；二、凡新辟火巷之宽度为十五公尺者称为路，十公尺者为街；三、凡称路之命名以新颖及含有抗战建国之意义为准则，凡称街之命名，可酌量运用旧有名称。”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等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三）防空洞的建设

日军对中国本土的轰炸，几乎与其全面侵华的步调相一致。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用飞机对上海地区进

行第一次大规模狂轰滥炸，炸死平民 1742 人、炸伤 1873 人。此后，日军攻势不断加强，日军飞机在我国领土肆虐，对不设防城市狂轰滥炸。鉴于抗战前线日机的猛烈轰炸与自身防空力量的不足，重庆的防空工作很早便开始筹备。1937 年 9 月 1 日，重庆防空司令部成立，着手于防空情报网与情报战的建设。当月，蒋介石发电要求重庆防空司令部负责指导、协助民众挖筑简易防空壕沟，并明确规定防空壕须深 6 尺、宽 2 尺，上盖木板并厚加土层。11 月 21 日，重庆行营下令重庆市开建防空洞限两月完成。

随着抗战局势的日益严峻，重庆市加紧了防空洞的建设。1938 年 8 月 2 日，重庆防空大隧道破土动工，据规划这条隧道“由朝天门至通远门，临江门至南纪门，横贯老城区的南北东西。隧道共分 7 段，共有 13 处出口，可容 4 万余人”，这标志着重庆大规模修建防空设备开始。到 1938 年 9 月，重庆市区的防空避难设备状况是：“公家所设，有防空壕 512 个，可容难民 63765 人；私家所设，有防空壕 504 个，可容难民 67250 人。且公私两方面，现均继续建筑，其容量当亦日有增加。此外，宪军警及防护工作人员之掩蔽，另有地上防空壕 33 个，岗需防空洞 154 个。至于现正开挖之防空大隧道，第约四公里，出口 20 处，完成后可容七八万人。”

但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上述准备仍是杯水车薪。“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惨烈伤亡使得政府当局和广大市民都从血与火的教训中清醒过来，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救性建设。政府当局“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人口众多、机关稠密的地区开凿公共防空避难设备，并加快了原大隧道工程的施工进度”同时又在市民中进行普遍又广泛的宣传动员，“鼓励那些不必留在市区的机关、学校、团体和个人尽量向近郊和周边各县疏散”。并且还颁布了一些列政策，鼓励民间自行修筑防空洞以辅助整体防空，“建筑防空洞所使用之土地如系公地，一律免纳租金，如系人民私有土地，其地上占有之面积，建筑人应缴纳租金，其壕洞占用地下面积，业主一律不得收取租金。”到 1941 年底，重庆市建成公共防空洞、私有防空洞、隧道等工程，合计 1413 项，可供同时容纳 368503 人^[10]。

防空洞的建设，不仅极大保障了重庆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也为人类积累了丰富的防空反轰炸斗争经验。还为军工生产提供了安全场所。虽出现过“六五大隧道惨案”，但其积极意义仍是不可否定的。

（四）城市广场与“精神堡垒”

作为一座山城，重庆的旧城区限于重庆半岛，三面临江，市区呈狭长三角形。旧城区分为上半城与下半城。下半城自朝天门至南纪门沿南城一带，为繁华商业区；上半城自通远门向东，沿嘉陵江一带，面积是下半城的三倍。上半城与下半城的连接之处为小什字。重庆下半城是重庆城市的发祥地。在古代，官署区、商业区、会馆等城市重要建筑均聚集在下半城朝天门至东水门、陕西街一带，沿长江呈带状线型水平分布，而上半城只是普通的商业和居住区域。开埠以来，下半城较早得到开发，重庆主城的商业中心便在主要此处，但其“处处现出凸凹，转折形状，街市斜曲与城垣同”的狭窄空间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人口，限制了城市的公共活动。

日军的轰炸使得城市空间布局发生了极大改变，重庆的上下半城在轰炸中几乎被完全炸毁。鉴于以往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严重匮乏，在重新规划建设的过程中，更为宽阔的上半城被重视起来，而作为上半场交通枢纽的都邮街成为了改建的重点。为建设都邮广场及加宽天官街、柴家巷，重庆政府“征用土地面积 434.7 平方丈（约 4830 平方米），拆迁民房 128.31 平方丈（约 1426 平方米）”将都邮街和柴家巷“进一步扩宽为 22 米，天官街隧道、人行道从原来的 3 米拓宽为 4 米。”将都邮街广场原定的直径由的 55 米，拓宽为 63 米。这一些列举措使得都邮街成为战时重庆第一繁华大街，在重庆城市商业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并逐渐形成了以都邮广场为核心的新城市中心。

都邮广场的建成为城市公共活动提供重要场所，政治性集会活动日益频繁。为进一步推进抗战精神动员与对民众思想文化的政治引导，在国民精神动员活动不断推进中，“精神堡垒”在都邮广场作为精神象征被建立了起来。精神堡垒于 1940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落成。为木质结构，外涂水泥。底座为八角式，分别写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中部呈圆柱形，面临民族路一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其余三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上面为五角状，临民族路一面绘有一大盾形标记，中间是蓝底红边，内有一指南针（即“新生活运动”会徽）。其余四方，分写礼、义、廉、耻四字。顶端周围为城堞式，中央设有一大深蓝色磁缸，内贮酒精棉花，举行“落成典礼”那天，缸内火焰四起，用壮声威。当时，正是日本飞机“五三”、“五四”轰炸重庆之后，因为防空关系，“堡垒”一律刷成黑色^[11]。

都邮广场和“精神堡垒”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国民政府主导的政治活动，是为国民政府用以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抗战士气的政治空间。国民政府领导人在此举办庆典、民众检阅、升旗仪式等系列活动，对于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培养国家观念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战时重庆乃至中国城市的抗战形象。

三、大轰炸时期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

（一）促进了旧城的彻底改建，为后续城市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1938年—1941年，日军三年的集中猛烈轰炸使得重庆主城多次变为废墟，城市建筑、公共设施、工业设备、交通工具、车辆船只、公园等市政财产损失巨大，具体数额难以估计；城市人民伤亡惨重，据潘洵对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的最低数据估计，抗战时期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7年轰炸应“总计造成死亡19446人，受伤22427人，伤亡总数41873人”。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是极为巨大的，但它既是毁灭，也是新生。“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把我们原想在若干岁月逐渐拆除的建筑新都市的障碍物，经敌机在短期内一扫而空，恢复我们的重新计划的自由，倒给我们彻底改造的机会。”大轰炸将彻底改变了重庆主城城市建筑不甚合理的格局，改善了城市欠缺规划、肆意发展的局面，为城市整体规划提供了可能；轰炸还清除了人们心理层面的障碍，激起了人们的抗战情绪。“宗教的热忱-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切美德平时蕴藏着的-借轰炸而全盘的烘托出来！同生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共同的敌人、不共戴天的血仇、家国的危亡，这使得民族凝聚力大大提高，国家利益逐渐被发在个人利益之上，民众积极配合政府工作，为城市的重建积极出力，扫清了主观上了迟滞城市快速发展的阻碍，开辟了重庆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二）以战时抢修的形式磨砺了政府的城市规划能力，为后续的城市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重庆大轰炸中，国民政府在城市规划方面做了有益尝试。1939年国民政府立法院公布《都市计划法》，其中规定了计划区域划分，计划按住宅、商业、工业、行政、文化等类型发展不同的计划区域，同时加强道路系统、水陆交通建设，开展公用事业和上下水道，土地分区使用等，并进一步确定文化教育、体育卫生、防空消防等用地设置，加强自然环境生态保护等，内容比较全面。1940年，4月1日，重庆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通过《重庆建设法案》提出了“由立体发展而向平面发展”、“由以往一个中心之繁荣，而变为许多区之卫星式之繁荣”的设想。战时建设的经验不断积累，大轰炸影响下的城市建设和所形成的城市发展状态，为战后城市制定建设政策提供了经验和依据。1947年4月28日《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制定完成，主要包括总论、人口分布、工商分析、土地重划、绿地系统、卫星城镇、交通系统、港务设备、公共建筑、居室规划、卫生设施、公用设备、市容整理、教育文化、社会事业、计划实施等18章节。提出了疏散市区人口，降低人口密度，发展卫星城镇等设想，折射出重庆乃至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和城市建设走向近现代的演变历程和实践轨迹，这对其后以至今天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产生影响和提供借鉴。

国民政府根据大轰炸中抗争的经验，制定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城市建设法案，对战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城市的政策未能形成成熟的总体规划，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效果也较为有限。《市政感言》的社评，可能就是对那一时期重庆城市规划状况的生动描述“重庆是一个周身伤疤的都市，而市政的设施，永远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这样一个一百多万人口的都市，身为国际观瞻所系的战时首都，水不灵，灯不亮，路不平，终年闹着偷电抢水的风潮，公共汽车站行列常常拖到半里多长。重庆是一个千疮百孔的都市，它需要彻底的诊治，不要再头疼医头，更不要搽搽红药水就算完事。因此，我们才联想到这‘医生’的制度与职责等问题。”

（三）增强了重庆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日后塑造巴渝文化奠定了精神根基

重庆大轰炸是一代人的共同的公共记忆，对城市的毁灭性航空打击和普通市民的无差别轰炸使他们不容忘却。当作为历史事件的重庆大轰炸逐渐消散后，作为历史记忆的重庆大轰炸被群体牢牢保留了下来，形成了群体记忆。这段沉重的历史记忆在学术研究开展、新闻媒体广泛传播、影视与文艺作品诠释、轰炸受害者民间诉讼追问等多类社会群体的力量的合力之下，对重庆文化及其体系的形成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大轰炸中的抗争记忆，凝聚起了重庆人民对于眼下这座英雄之城的认可与自豪，在历史化的建构中形成了重庆文化体系之中的“抗日文化”，奠定了重庆文化革命性的底色。

结语

重庆大轰炸是重庆城市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长达六年的轰炸使的重庆原有的城市发展进程受到严重阻碍，发展速度影响严重。猛烈的轰炸使得城市多次化作废墟，严重损害了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彻底的破坏也意味着原先积弊重重的城市建设问题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意味着原先混乱无序的城市发展有了整体规划的可能性，更意味着重庆的现代化建设迎来了重要的时期。居民的房屋在轰炸中不断重建；火巷的开辟提高了城市的抗火灾能力，奠定了之后乃至现在的城区道路雏形；城市广场的修建奠定了重庆主城的政治空间格局。总之，重庆大轰炸既是毁灭，也是重生，重庆主城与重庆人民在血与火之中成长了起来。

参考文献:

- [1]潘洵.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对重庆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6): 4.
- [2]周勇.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5(1): 104-111.
- [3]向楚. 巴县志选注 [M]. 巴县志选注, 1989.
- [4]隗瀛涛. 近代重庆城市史 [M]. 近代重庆城市史, 1991.
- [5]舒莺. 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 [M]. 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 2018.
- [6]扶小兰. 论重庆大轰炸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J].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2(4): 6.
- [7]何一民.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M].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城市发展变迁研究, 2015.
- [8]孙仁中. 101 作战计划与重庆大轰炸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2(3): 82-85.
- [9]陈方正. 陈克文日记 [M]. 陈克文日记, 2014.
-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M]. 重庆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1982.
- [11]谭刚. 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以都邮街"精神堡垒"广场为中心(1937—1945) [J]. 抗日战争研究, 2018, (1): 12.

Steadfast Amidst Bombings: Urban Construction of the Yuzhong Peninsula in Chongqing Under the Bombardment (1939-1941)

Yang Zhe¹

¹*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10691, China*

Abstract: From 1938 to 1943,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a nearly six-year strategic bombing campaign against Chongqing, the wartime capital. This inflicted devastating damage on the mother city located on the Yuzhong Peninsula: both the upper and lower urban areas were repeatedly bombed, urban infrastructure suffered unprecedentedly severe blows, and extremely heavy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were caused to the city and its people, interrupting the normal evolution of the city. However, in an objective sense, the massive bombings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a thorough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ongqing's mother city. Through arduous efforts, the urban layout and form of Chongqing's mother city were improved, and the process of the city's modernization was accelerated. Thi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ubsequent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hongqing Bombings; Urban History; Urban Construction

高校本研人数“倒挂”的网络舆情分析

王 慧¹

(1.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 网络已成为社会舆情的主要发源地。本研究聚焦于“本研人数倒挂”现象, 即研究生数量超过本科生的新趋势。通过深入分析微博与抖音平台上的用户评论, 本研究探讨了公众对“本研人数倒挂”现象的看法与担忧。研究发现, 公众普遍认为该现象主要归因于就业压力、市场需求以及高校发展需求。同时, 公众也担忧这一趋势可能导致学历贬值、教育质量下降、经济负担增加以及社会竞争加剧。为应对这些问题, 本研究建议加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推进产教融合, 并加强就业指导服务, 以缓解公众的担忧, 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本研“倒挂”; 网络舆情; 就业; 学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6

一、问题的提出

“舆情是社会情绪的‘晴雨表’, 而眼下, 网络成为社会舆情主要发生地。^[1]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 民众只需点点键盘, 便能轻松发表对各类社会热点与焦点事件的见解。8月29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24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10.9967亿人), 较2023年12月增长742万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78.0%。^[2]上网已然发展成为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关键方式。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和政务网站, 更是成为了民众畅所欲言、表达个人立场与观点的重要聚集地。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制高点, 高质量人才是教育强国发展的重要支撑。^[3]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其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尤为突出。从教育层次而言, 研究生教育代表着高层次的学历教育, 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尺。从教育目标的角度审视, 研究生教育在孕育创新人才、激发创新能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 对“本研人数倒挂”相关舆情进行分析能够更为深入地揭示公众对于研究生数量不断增长所持有的看法和担忧, 从而更好地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之后, 我国研究生数量不断增长, 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大。2024年9月, 词条#研究生数量超本科生高校招生引争议#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热议, 可见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广泛关注。事件起因是兰州大学宣布2024年在校研究生总数首次超过本科生, 通过媒体转载之后, 这一消息迅速在网络上发酵, 成为舆论焦点。抖音是我国头部短视频软件, 新浪微博在我国社交媒体网站中位居榜首。^[4]因此, 本研究将选取微博和抖音两个平台展开研究。通过将该词条在微博和抖音上进行搜索并横向对比, 本文选取微博热度最高即点赞数4.2万的新京报所发布的博文以及抖音热度最高即点赞数2.4万的成都市《深夜快递》栏目发布的视频, 使用Python采集评论区的直接评论, 其中回复评论(即对直接评论进行回复的评论)未纳入分析数据。截至2024年10月

作者简介: 王 慧(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

15日，该条博文和抖音视频的直接评论有9004条，剔除表情包、标点符号、数字、无效评论后，最终获得有效评论4295条。

(二) 分析方法

本研究将采集的有效评论数据导入至NVivo 12这一质性分析软件中，以开展深入的内容分析工作。NVivo 12作为一款功能强大的质性分析工具，擅长于对非结构化数据（如评论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揭示其内在含义。通过利用主题词提取功能，该软件能够精准捕捉评论数据中潜藏的公众舆情热点。这一步骤不仅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分析框架，还为后续的文本编码工作提供了编码参考点，从而确保了本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三) 分析框架

本研究利用NVivo 12软件对有效评论进行了词频查询操作，并基于查询结果生成了直观的词语云图。鉴于本研究的核心议题是公众对于本研人数“倒挂”的争议，我们在词频查询过程中特别留意，将诸如“一个”、“以前”、“现在”等与主题不直接相关的词汇加入了停用词列表，以排除它们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经过精细处理后的最终查询结果显示，工作，就业，学历，贬值、压力等词汇成为了社会公众在评价研究生数量超本科生这一现象最为关注的焦点词汇（具体见图1）。



图1 社会公众对研究生数量超本科生评论的词语云

通过对有效评论进行研读并结合图1我们可以发现公众讨论的焦点在于研究生人数增多背后的原因以及担忧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两个方面。基于此，确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见表1）

表1 分析框架

维度	核心要素
原因	就业压力
	市场需求
	高校发展
	学历贬值
影响	教育质量
	经济负担
	竞争加剧

三、统计分析

利用NVivo软件对有效评论进行了自动化的主题编码以及细致的手工编码后（见表2），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民众普遍认为，研究生数量增长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就业压力、市场需求以及高校自身的发展需求。具体而言，在就业压力层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到，攻读研究生学位成为了他们规避就业难题的一种策略，即因为难以直接

就业而选择继续深造。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观察，部分公众认为，当前众多职位对求职者的学历要求已提升至研究生层次，本科毕业生在寻求优质就业机会时面临较大困难。至于高校发展的维度，虽然占比较少，但仍有一部分民众认同，研究型大学为了自身的发展确实有必要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表2 关于本研人数“倒挂”原因的讨论

维度	要素	编码点	论据举例
原因	就业压力	197	1.倒挂并不是因为本科生减少了，而是找不到工作去考研的人多了。 2.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只能读研读博了，反映出了很大的就业问题。 3.本科生要是毕业就能找到好工作，谁会想去读研啊？ 4.以前读四年可以就业赚钱，现在得读八年。
	市场需求	108	1.很多学校辅导员都要求博士了。 2.我现在找工作都是研究生优先。 3.招聘条件大多数是研究生以上学历，本科生不配拥有工作
	高校发展	14	1.研究型高校就是这样的啊。 2.高校需要研究生。

除了探讨研究生数量增长的原因，公众更加聚焦于这一趋势所带来的影响（见表3）。多数人表达了对于学历贬值的深切忧虑，正如某些评论所言，“研究生可能只能拿到本科生原本的工资，而本科生则面临与专科生相同的薪酬水平”。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忧研究生数量的激增会对教育质量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注意到了研究生人数增加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竞争加剧问题。

表3 关于本研人数“倒挂”影响的讨论

维度	要素	编码点	论据举例
影响	学历贬值	195	1.是时候推出研究生 plus，研究生 pro，研究生 Max，和研究生 pro Max。 2.但是长远来看，不仅增长就业压力，还加速了学历贬值。 3.学历贬值，马上本科生拿专科生的工资，研究生拿本科生的工资。 4.用人单位发现我用本科的价格也能招到研究生。 5.目前情况是学历贬值，物价飞涨，上大学穿耐克，工作后穿莆田。
	教育质量	117	1.这么多读研究生的到底研究出什么呢。 2.只看第一学历就对了，研究生太水了。 3.大学硕士估计也没啥用。
	经济负担	10	1.只是苦了父母，花钱培养孩子的时间越来越长。父母垂老了，孩子还在读书，还需要经济支撑。 2.研究生的学费是本科的几倍。
	竞争加剧	97	1.这样下去只会让人越来越卷，卷成牛马不如。 2.这样下去研究生也会多到找不到工作，越来越卷最后卷到自已了。 3.以后开始卷博士了。

四、讨论与建议

（一）保障教育质量

通过分析公众的评论，可以明显感知到大众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不满情绪，并对教育质量未来的发展趋势抱有悲观预期。鉴于此，确保和提升教育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首要措施是强化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导师体系，国家需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提升导师的综合素质。在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应坚持立德树人,将师德师风作为导师选聘、考核及激励的首要考量,确保导师在研究生价值观塑造和品格提升中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国家应优化相关标准,对导师的能力提出明确要求,致力于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高水平导师队伍。此外,还需完善导师培训体系,建立导师交流机制,搭建研究生教育教学交流平台,促进经验型导师与新手导师之间的交流,从而提升导师的育人能力。在人才培养机制中,应充分利用多种手段评估改革政策的有效性,以全面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国家输送优质的高层次人才。

其次,加强对研究生教育的督导与监管至关重要。国家应构建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导,研究生培养单位、社会学术组织及行业产业部门等多方参与的研究生质量监督体系,优化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监管机制,对招生、培养及毕业等各个环节实施持续监管。同时,引入外部资源协助监督,实现教育部门监督与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为教育部门提供更全面的评价标准。此外,加强学术诚信建设,对研究生培养单位进行常态化监管,完善学术不端行为的督导机制,强化国家、地方及培养单位的三级联动,为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

再者,当前研究生教育存在若干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培养目标的同质化导致培养缺乏针对性。部分学校未能对学术学位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明确区分和因材施教,培养方案缺乏针对性。不同层次的本科院校、双一流高校及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目标趋于一致,未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及学校定位及时调整,导致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需求。二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存在失衡。实践育人与理论教育同样重要,研究生除需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外,还需具备动手及应用能力。只有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磨炼意志、成就才华并为社会做出贡献,才能真正成长为适应行业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 and 复合型人才。三是专业知识传授与研究生综合素质教育培养之间的衔接有待加强。市场真正需要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卓越人才。然而,高校教学往往过于强调研究生专业性知识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品德素质、法规素质、劳动素质及审美素质等方面的培养。同时,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及道德修养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为确保和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需从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强化督导与监管以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入手,共同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二) 推进产教融合

为了推动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的产教融合体系成为必然选择,其中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扮演着核心角色。以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首先,利用科技企业家的资源和影响力,加速产业教授的选拔进程。我们应探索并实施一种校企联合、双向选择、灵活调整的产业教授选聘模式,旨在加速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这一机制将科技企业家的实践智慧与高校的学术优势相结合,共同推动知识的创新与应用的落地。其次,强化研究生工作站的建设力度,遵循政府引领、市场驱动、合作共赢的原则。我们应以服务地方经济和行业需求为指引,依托优势学科和重点领域,建立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工作站或中心实验室。这些平台将成为研究生实践学习、科研创新的重要基地,有助于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再者,推进高校与知名企业的研究生联合培养计划。我们将充分利用高校在学科建设方面的独特优势,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通过与地方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的紧密合作,我们计划引进一批高水平的科研人才,以项目驱动的方式建立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这将有助于提升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机整合。最后,深入挖掘校友资源的育人潜力,建立校内外的联系机制,加强校企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贡献力量。一方面,许多校友企业渴望与高校展开科研合作,以获得前沿的科技知识和技术,推动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高校也能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践机会,使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更加贴近实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此外,通过举办学术交流活动,我们还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 加强就业指导

当前,公众普遍视就业为一大挑战,因此,加强就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高校在此方面应扮演关键角色,具体措施如下:

1. 构建全面的就业指导体系

高校应设立就业指导工作小组，定期在每学期的开始、中期及结束阶段召开就业指导会议。通过动员教师利用自身资源和专业见解，帮助学生正确认知就业市场趋势和需求，鼓励他们主动寻求与热门企业的联系，探索就业机会，或利用校友网络建立稳固的实习实训基地，以拓宽就业途径。为确保就业指导工作的有序进行，高校需基于学生的就业意向，制定符合实际的就业规划，并利用报告厅、多媒体会议室等设施，分享典型就业案例，进行就业教育。

2. 实施全程跟踪就业指导模式

高校应建立学生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就业桥梁。一方面，通过职业测评工具帮助学生了解自身特质，规划职业生涯，建立生涯档案，以便跟踪学生的就业进展。同时，将专业教学计划、学科前景与就业指导相结合，从新生入学起就为他们提供行业、岗位认知的教学指导。通过邀请就业典型进行经验分享，为学生制定针对性的就业规划，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调整专业课程结构，融入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内容，利用假期开设社会实践、生产实习等必修课程，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和职业技能。高校还需提供专业的就业市场分析，通过保研、深造、招聘、考研指导等服务，帮助学生积累实践经验。

3. 开展就业训练营，培养职场精英

为使学生成为“有准备”的职场人才，高校在就业教育中应邀请就业典型，举办就业训练营等指导活动。通过职业生涯规划讲座、简历制作指导、面试技巧培训、职场礼仪教育及招聘模拟等多元化形式，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就业培训，助力他们顺利步入职场。公众普遍反映就业成了一个难题，因此就业方面需要下功夫。高校应成立就业指导工作小组，于每学期的期初、期中、期末召开就业指导工作会议，动员院校教师利用资源优势和专业判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就业形势和就业需求，主动参与联系热门用人单位、寻找就业岗位、与用人单位互动、或借助历届优质校友资源建立稳定实习实训基地，拓宽就业渠道。为平稳有序完成就业指导工作的任务，高校需要根据就业工作侧重点，在充分了解学生就业意向的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学生就业工作规划。同时，运用报告厅、多媒体会议室等硬件基础设施进行典型就业案例的宣导教育。

（四）关注经济负担

高校作为研究生的直接培养单位要统筹好资助资金，通过扩大资助范围、增加资助力度等方式来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面临的问题。一是扩大资助范围，从经济方面的资助扩展到学业、科研、培训、实习、创业等方面资助，提升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综合实力及社会竞争力；二是加大资助力度，整合学校提取的部分学费、社会力量的资助经费，通过设立专项资助金等形式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资助力度；三是充分利用好研究生“三助”，提供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三助岗位，适当提高“三助”薪酬额度，使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在提升科研能力、锻炼工作能力的同时，也能获得报酬缓解经济方面的压力。

国家层面持续致力于优化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财政部携手相关部门，计划从奖励优秀学生和帮助困难学生两大维度出发，分阶段推进政策调整与完善。具体措施涵盖：首先，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将实现倍增。具体而言，本专科生的国家奖学金名额将从原先的每年6万名大幅增加到12万名；硕士生的名额则由每年3.5万名提升至7万名；博士生的名额亦从每年1万名扩增至2万名。其次，本专科生的奖学金奖励标准将得到显著提升。国家奖学金的奖励标准将从每生每年8000元上调至10000元，而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也将从每生每年5000元提高至6000元。再者，本专科生的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亦有所上调。自2024年秋季学期起，平均资助标准将从每生每年3300元增加至3700元。此外，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力度也将进一步加大。一方面，贷款额度有所提升，本专科生的最高贷款额度将从每生每年1.6万元提高至2万元，研究生的贷款额度则从2万元增加至2.5万元；另一方面，贷款利率将有所降低，按照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少70个基点执行。综上所述，随着这些资助政策的调整与完善，公众对于研究生数量增加可能带来的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的担忧，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五）引导公众理解

通过上文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公众的负面情绪较多，针对社会上对研究生数量超本科生的疑虑和担忧，高校

和政府应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引导公众正确理解这一现象。在高教专家看来,研究生规模的扩张,尤其是高水平大学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是教育强国战略下的必然选择。^[5]研究型高校硕士生规模超过本科生,并非我国独有。放眼全球,这是共同趋势。为了消除公众的误解与担忧,高校与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发布权威数据,深入解读相关政策,使公众能够充分认识到研究生教育的独特价值及其对社会进步和创新发展的作用。同时,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互动,倾听各方意见,共同构建一个支持并促进研究生教育的良好环境。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有望引导公众形成更加理性、正面的认知,为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 [1]张帆.智媒时代下网络舆情的特征、困境与治理策略[J].新闻前哨,2023(9):31-33.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3]洪大用.扎根中国大地加快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03):1-7.
[4]徐倩仪,邸光飞,起航,等.公平与认同:普职分流政策民众抗拒的舆情分析与教育治理改进[J].成人教育,2024,44(02):69-76.
[5]吴金娇.“本研倒挂”意味着什么?[N].文汇报,2024-10-10(004).

Analysi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version of the Number of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Wang Hui¹

1.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Bei, WuHan

Abstract: With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social public opin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of "inversion of the number of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that is, the new trend where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exceeds that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By conduct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user comments on Weibo and Douyin platform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ublic's views and concerns regarding the phenomenon of "the inversion of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ublic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employment pressure, market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ublic is also concerned that this trend may lead to the devalua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a decline in educational quality, an increase in economic burden and intensified social competi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he quality assuranc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employment guidance services, in order to alleviate public concerns and facilita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Inversion between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studi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Employm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的医学生廉洁教育研究

武超¹ 邵蕾蕾²

(1.湖北医药学院全科医学院, 湖北 十堰 442000, 2.湖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十堰 442000)

摘要: 在“健康中国”战略不断推进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 医疗行业的廉洁建设愈发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行业的中坚力量, 在校期间接受的廉洁教育直接关系到医疗行业的公信力与长远健康发展。本文立足于新时代医德建设视域, 探讨加强医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即有助于推动医学生筑牢职业根基、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塑造医疗环境的廉洁风尚; 分析了当前高校医学廉洁教育存在教育体系不健全、教育方式单一、医学院校与附属医院协同教学配合度低等问题; 并提出了构建系统化廉洁教育体系、创新教育形式与载体、凝聚全社会共同育人合力等对策。

关键词: 医德; 医学生; 廉洁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北医药学院廉洁文化研究中心资助课题“廉洁文化融入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编号: HBYYLJ2517) 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08

在“健康中国”战略纵深推进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 社会对于医疗行业廉洁建设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 “加强干部队伍管理和人才工作, 探索以医德、能力、业绩为重点的人才评价体系, 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严明纪律红线, 提高拒腐防变能力”^[1]。该意见对新时代医学人才培养、加强医德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然而近年来医疗领域频繁出现的商业贿赂、过度医疗等现象, 反映出部分医疗从业者仍存在廉洁意识淡薄的问题。医学生作为未来医疗行业的后备力量, 在校期间接受系统的廉洁教育, 不仅有助于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为未来医疗行业公信力的构建奠定基础, 更能助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 为廉洁文化的建设筑牢根基。

一、加强医学生廉洁教育的意义

1. 筑牢职业根基, 强化医德修养

大学阶段是医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关键奠基期, 这一时期所形成的职业道德观, 将对其日后的医疗工作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对个人而言, 加强廉洁教育有助于扣好职业生涯的“第一粒扣子”, 在完善个人品德的同时, 实现个人理想与职业发展的有机统一。作为未来医疗行业的主力军, 医学生接受廉洁教育, 能帮助其明确职业责任和使命, 在价值多元、诱惑众多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清醒认知, 培养坚守底线、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 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侵蚀, 助力成为兼具精湛专业技能与高尚职业道德的医务工作者。

2. 完善培养体系, 促进德才兼备

现代医学教育强调“德才兼备”, 既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 也注重培养其高尚的职业道德与人文情怀。廉洁教育是高校医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明确职业伦理边界、强化道德自律意识, 引导学生思考“为何行医”“如何行医”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将廉洁理念融入职业认知, 能够丰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人文

作者简介: 武超(1992—), 男,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邵蕾蕾(1993—), 女,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史。

内涵,让人文素养真正成为支撑医学生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缓解目前所存在“重技术、轻人文”的教育失衡问题,共同构建更加科学、全面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3. 塑造廉洁风尚,净化医疗环境

廉洁教育不仅关系到学生个人的未来职业发展,还关系到医院的廉洁风气和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更影响到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甚至全社会的清廉指数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顺利推进。^[2]开展廉洁教育,有助于医疗行业进一步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本质,促使从业者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医疗水平、关怀服务患者等服务中,从而提升医患信任度、改善医患关系、维护医疗行业的公信力,推动医疗行业健康良性发展。从源头上减少医疗腐败,既能保障患者利益,增强患者对于医生的信任,也能使公共医疗资源更加公平地服务人民群众,为风清气正医疗环境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

二、高校医学生廉洁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笔者对所在院校医学生的调研显示:在廉洁教育重要性认知方面,35%的学生认为学习期间开展廉洁教育对自己职业发展非常重要,65%的学生则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更关注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在廉洁教育了解程度方面,28%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经常学习或关注,45%的学生表示偶尔关注学习,27%的学生表示不太了解或从未关注。调研数据反映出当前医学院校廉洁文化教育存在较大不足,存在重专业知识、轻人文素养培养的倾向,导致医学生在校期间容易忽视廉洁理念的培养,为之后的医疗职业生涯埋下了一定的廉洁隐患,这一结果的出现与以下原因有关:

1. 教育体系不健全,缺乏系统性

目前高校的廉洁教育主要依托学校课程进行开展,但是课程存在缺乏系统性、内容深度不足的问题。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虽涵盖遵守道德规范、恪守职业道德的内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讲授党史时也会涉及反腐倡廉案例,但相关内容多为零散穿插,缺乏系统深入的讲解与延伸思考,难以让学生形成深刻的认知。医学专业课程如《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学》,虽也涉及廉洁行医的相关理论知识,但较少引导学生结合工作中的实际场景进行思考。例如面对患者送礼时如何坚守底线,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如何平衡职业操守与现实压力。课程对廉洁理念的人文性与思想性挖掘不足,导致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认知,削弱了学校教育对学生日后职业行为的指导效果。综合来看,廉洁教育采用统一化模式,未充分考虑不同层次(如本科和研究生)和不同年级学生的教育特点,教育内容和方式缺少针对性,各层次衔接不够合理,导致廉洁教育效果不佳。^[3]

2. 廉洁教育方式单一

当前高校廉洁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存在单一化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单向灌输为主,互动参与不足”。课堂教学中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多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难以有效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直接影响了其对廉洁认知的理解深度和接受程度。在教育载体和内容上也存在形式固化的问题,廉洁教育的相关内容多以文字呈现,图片、视频、模拟体验等互动形式占比不高,难以适应医学生对具象化、实践性学习的需求。对外宣传同样存在单向输出的局限,主要依靠学校官网、微信公众号、校园公开墙等单向输出平台,内容多为政策解读、廉洁典型案例通报等,缺乏供学生反馈疑问、实时交流、分享感悟的互动平台,导致学生的疑问无法得到及时回应,难以引导产生深度思考与情感共鸣,教学效果被大幅削弱。

3. 医学院校与附属医院协同教学配合度较低

高校和附属医院共同承担医学生的培养重任,但在廉洁教育中存在协调不一致的问题。一方面,部分临床带教老师教育观念存在偏差,侧重于理论技能传授,对廉洁理念的教育重视不足,很少主动结合案例讲解廉洁行医的要求与应对方法,导致廉洁教育与临床实践产生了脱节。另一方面,大部分医院的实习生考核体系也未将廉洁教育的效果纳入其中,对学生廉洁教育的学习情况、掌握程度均缺乏相应的评判标准与要求,这直接影响到学生对廉洁教育重视不足。此类情况使得实习医院的廉洁教育效果欠佳,难以真正融入实习生的职业认知,可能会为

其未来的医疗职业生涯埋下潜在隐患。

三、加强医学生廉洁教育的方针对策

针对目前高校廉洁教育所存在的不足,应将廉洁教育有机融入医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结合学生不同年级的认知特点,科学构建分层递进的教育体系,创新教育方式与载体,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廉洁从医的理念,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清正廉洁、技艺高超的医务工作者。

1.构建系统化的廉洁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将廉洁教育贯穿医学生在校全过程,以系统化的课程体系作为载体,按照年级分层递进设计课程,将廉洁理念教学从认识到实践逐步深化。可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如《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结合医疗行业廉洁典型案例,讲解个人品德、职业伦理、法律法规与廉洁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可以结合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现代医疗领域反腐情况等内容,阐述廉洁对于医疗行业、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课程内容供给侧改革为切入点,系统地向医学生传授廉洁文化知识,达成知识的初步转化,使学生构建起对廉洁文化的理性认知。^[4]

结合不同年级的学习重点,专业课中也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入廉洁教育相关内容。低年级阶段结合《医学导论》《医学社会学》等课程,增设医生廉洁案例分享环节,帮助学生理解医学廉洁基本理念;大三、大四阶段结合《外科学》《内科学》《诊断学》《医学伦理学》等临床课程,结合具体诊疗场景深入探讨诊疗中的廉洁行为规范,强调拒收红包、拒拿回扣、禁止推销药品等底线要求;大五临近毕业前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加入职业行为准则和廉洁从业教育内容,并邀请杰出校友分享廉洁行医经历,使得学生深刻理解廉洁是为人之本,行医之魂。

除理论教学外,社会实践也是廉洁教育的重要培养环节。可借助暑期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参与社区义诊,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树立不接受馈赠、拒绝过度医疗的职业原则。在实践过程中还可以指导学生学习同服务对象的沟通交流方式,强化对“以患者为中心”医学廉洁内核的理解。

2.创新廉洁教育的形式与载体

医学院校可结合医学专业特色和学生认知规律,丰富廉洁教育的方式方法,推进廉洁文化教育全面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例如可以结合现代VR技术创设廉洁风险模拟场景,增强廉洁教育的沉浸感与体验感;鼓励学生围绕过度医疗、索要红包、违规推销药物等廉洁热点话题,创作并展演情景剧。通过分组扮演医生、患者、家属等角色,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互动演绎,扩大影响力,引导更多医学生深入思考廉洁从医的内涵;开展医学伦理与廉洁主题读书会,组织共读医学人文经典著作、纪实文学作品及相关纪录片,进行深度探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举办专题辩论赛,围绕“科研合作中的利益冲突应对”“医学生廉洁素养主要靠自我道德约束还是制度规范监督”等议题展开辩论,激发学生思辨能力。通过多种方式创新廉洁教育的形式,改变传统“说教式”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使得学生可以进一步培养自主探究的学习能力,并在更多的思考与实践中将廉洁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3.凝聚全社会协同育人合力

廉洁教育需学校与医院、家庭、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承担起对医学生进行廉洁教育的责任。医学院校作为教育主阵地,可加强校园内部廉洁文化设施的建设,如打造“医者廉心”主题的文化展示长廊,通过图文、视频、实物等形式展示古今廉洁行医典范及相关法律法规,将抽象的廉洁理念转化为具象化的内容,建成兼具教育性与感染力的廉洁教育文化展示平台。

附属医院作为廉洁教育的另一个重要主体,也需将廉洁文化教育深度融入医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将廉洁行医作为职业生涯的基石,在未来的医疗工作中始终坚守职业操守,杜绝“微腐败”“小微权力”等的侵蚀,维护医疗行业的纯洁性。^[5]在这一过程中,医院应加强与医学院校的联动,将廉洁教育课堂延伸

至临床。一方面在日常理论课程中可以邀请医院专家结合临床实践解析廉洁风险点；另一方面在实习生岗前培训、科室例会等环节中也可以有机融入廉洁教育内容，并将廉洁表现纳入考核体系。

家庭是医学生廉洁品格形成的重要土壤，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也会对学生廉洁职业观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父母及家庭成员应充分认识到廉洁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坚持诚实守信、公正处事的原则，以实际行动向学生传递廉洁的价值理念，树立廉洁榜样。同时也要及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定期沟通交流，鼓励学生分享学习和实习中的收获与困惑，对其错误理念与不当行为及时进行提醒与纠正，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帮助其及时改正。

社会舆论与大众媒体也应积极营造崇廉尚洁的氛围，大力宣传报道医德高尚、廉洁行医的正面典型事迹，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进行曝光，形成正面的舆论引导，为医学生成长营造风清气正的医疗外部环境。唯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廉洁教育网络，才能使廉洁理念深植学生内心，为其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结论

加强医学生廉洁文化教育是学校医学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也是新医科建设背景下反腐倡廉的关键举措。新时代医学院校需充分认识到廉洁教育在医学生培养成才中的重要性，将廉洁文化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只有学校、医院、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形成教育合力，才能为医学生筑牢廉洁从医的思想根基，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构建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奠定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8, 06, 26.
- [2] 张奕：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医学生廉洁教育模式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9 (17) 18-19.
- [3] 苏晓杰, 马铁东, 黄江帅, 谷振宇：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廉洁教育存在问题与对策 [J]. 高教学刊, 2024 (15) 51-54.
- [4] 刘佳富：廉洁文化融入医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基础、现实挑战、实践路径 [J]. 黔南民族医学学报 . 2025 ,38 (2)237-241.
- [5] 郝敏杰, 孙凤仙, 刘友：新医科背景下加强医学生廉洁文化教育的对策探析 [J]. 文教资料 2025 (10) 111-113.

Research on Integrity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Wu Chao¹, Shao Leilei²

¹ School of General Medicine, Hu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yan, Hubei 442000, china

²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yan, Hubei 442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ening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nd ongoing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reforms, integrity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has drawn increasing societal attention. As the future backbone of the profession, medical students’ integrity education during their academic years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credibility and long-term health of the medical sec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era medical eth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strengthening integrity culture education for medical students—consolidating professional foundations, improving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s, and fostering an integrity-focused medical environment. It also identifies current shortcomings, including fragmented and unsystematic curricula, limited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cal colleges and their affiliated hospital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integrity education framework, innovating teaching formats and platforms, and engaging society at large to cultivate integrity among medical students.

Keywords: Medical Ethics; Medical Students; Integrity Education

体育浸润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理论逻辑研究

但懿¹ 杨晨飞¹ 刀波波² 钟月萍³

(1.玉溪师范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2.勐海县第二中学, 云南 西双版纳 666100, 3.勐腊县第一中学, 云南 西双版纳 666100)

摘要: 本文以“体育浸润”为视角, 探讨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理论逻辑与机制。通过梳理相关文献, 构建体育浸润的逻辑框架, 即文化传播、仪式互动, 及身体参与, 并从文化认同、社会整合与教育治理等方面进行阐释, 在此基础上提出体育浸润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理论路径。研究认为, 体育浸润在激发集体荣誉感、增强民族团结和培育“中华一家亲”意识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为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与路径启示。

关键词: 体育浸润; 民族共同体; 文化认同

基金项目: 玉溪师范学院2024年重大教育教学项目(2014ZD04)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8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和重大命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自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后, 迅速成为学界和政策实践关注的焦点^[1]。这一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民族认同, 强调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和团结一心的认同感^[2]。党的十九大以来, 该理念被写入党章并在各领域大力推进, 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关^[1]。然而,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 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文化、社会发展上存在差异, 如何增进不同民族间的联系融合、构筑共同的国家认同基础, 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方面被寄予厚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体育工作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24年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 通过增强各族群众身心健康、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等, 实现凝心聚气、强基固本的目标。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开展丰富的全民健身活动、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被视为促进各族群众增强“五个认同”、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3]。由此可见, 从体育浸润视角研究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既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也具有现实紧迫性。

“体育浸润”本意指体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教育文化过程, 发挥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教育部近年来实施了“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 通过向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派驻体育教师、开展特色体育课程和活动等举措, 将体育教育资源深入“浸润”到基层, 以促进教育公平和学生全面发展^[4]。这一“浸润”理念超越了传统课堂教学, 将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渗透于学校和社区生活之中。基于此, 本文将“体育浸润”引申为体育以文化载体、交往媒介和身体实践的形式, 深入影响人们观念和行为的过程。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体育通过哪些理论机制和路径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 其内在逻辑如何? 又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更好地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以铸牢共同体意识?

一、文献综述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与形成机理研究

作者简介: 但懿(1989—),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管理;

刀波波(1988—), 男, 本科, 中小学高级教师, 研究方向中学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

钟月萍(1989—), 女, 本科, 中小学高级教师, 研究方向中学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

通讯作者: 杨晨飞(1989—), 男,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体育教育教学。

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三个递进层次:对自身中华儿女身份的认知,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以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认同。这一意识的形成涉及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多重维度^[2]。吴春宝等通过对2014-2019年相关文献的述评指出,学界已构建了历史、政治、文化等立体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并提出政治整合、文化凝聚、经济共享等实践路径^[1]。主流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交往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认同被视为其中最深层、最根本的要素^[5]。因此,不少研究聚焦于如何通过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弘扬共同的历史记忆来铸牢共同体意识。此外,情感纽带和价值共识也是重要方面,一些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探讨认同的路径,提出从个体认同到国家认同可以经过“记忆-情感-认知”等心理机制的递进^[2]。总体来看,对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体育作用的宏观框架,即需关注文化记忆、情感联结、认知认同三方面在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作用。

(二) 体育的社会功能与国家认同

体育具有超越竞技本身的丰富社会功能,特别是在培养集体意识和增强国家认同的作用,早为国内外研究所关注^[6]。西方学者普遍注意到现代体育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紧密关联。Hobsbawm指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在体育表征中具体化^[7]。Anderson关于“合声”的论述强调,同步吟唱国歌等仪式使彼此陌生的成员在同一时刻产生共同体的在场感^[8]。在大众传媒维度,Dayan和Katz提出的“媒体事件”理论以奥运会等现场直播为例,说明这类经由电视/媒介同步化的国家仪式如何发挥整合社会、强化国家共同体想象的功能^[9]。与此同时,Billig的“日常民族主义”揭示,体育报道与赛场符号如何在日常层面持续再生产国家认同^[10]。在专门研究领域,Bairner系统论证了体育与民族身份的互动及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再生产^[11]。这些经典理论表明,体育赛事和仪式能够作为民族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建构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在中国情境下,体育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寓意。王理万梳理了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的理论脉络,指出应从时间、空间、政治、对象四个维度理解体育强化国家认同的路径,强调体育的社会功能不仅在于强健体魄,更在于凝聚人心、培育认同^[6]。

(三) 体育教育与民族融合的实践研究

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弘扬民族传统体育,体现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研究表明,在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不仅有助于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更具有促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增进民族大团结和爱国热情的现实意义^[12]。在中小学层面,各地正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体育实践。例如,北京联合西藏、新疆等多地中学生进行混合编组的足球赛,被证明有助于消除隔阂、增强学生对“中华一家亲”的深刻体会^[13]。近年来国家推动的“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更是直接旨在通过派遣体育教师、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等方式,提高民族地区学校体育教育水平。研究显示,该计划在江苏、广东、云南等地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农村和边疆学校体育教学的质量,激发了学生参加体育的积极性^[4]。更重要的是,通过体育支教和联谊活动,城市与少数民族地区学校建立起长期交流机制,不同地域、民族的师生在共同运动中加深了情谊,民族交融的氛围更加浓厚。这些探索从实践层面印证了体育教育可以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载体,通过体育课堂、竞赛和课外活动,将不同背景的学生凝聚起来,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二、体育浸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

(一) 文化传播: 唤醒集体记忆, 传承共同文化

体育活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符号和历史记忆,通过传播与熏陶作用于参与者和观众。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许多传统体育项目本身就是各民族交流融合的产物,蕴含着“同源共祖”的集体记忆。例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节庆,如那达慕大会、赛马节、花炮节等,往往起源于各族先民共同的生产生活典礼,以体育比赛和游戏形式纪念祖先、庆祝丰收。这些活动经由代际相传,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遗产,唤醒着人们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共同祖先的记忆。当人们参加或观看此类活动时,会认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根脉相互交织,共同属于中华文明的谱系。这种对同源历史和文化的感知有助于夯实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情感基础,巩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2]。Turner的“阈限”理论表明,在这种典型性的体育场景中,个体暂时脱离日常身份,进入一个共享象征符号和情感的空间,从而实现自我向更大共同体的整合^[14]。通过体育文化的传播浸润,各族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增强,“五十多个民族共写中华文明史”的集体记忆更加深入人心。

(二) 仪式互动: 构筑情感纽带, 强化群体团结

体育赛事和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共同的规则、节奏和情境下互动,容易产生高度的情感同步和共鸣^[2]。Collins的“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当人们共同投入一项充满仪式感的活动,会形成“情感连带”和“情感能量”^[15]。具体到民族关系中,多民族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为各族成员提供了平等交流、合作竞争的平台。在并肩训练、协作比赛或共同为胜利欢呼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彼此建立起信任和友谊,情感上拉近了距离。正如莫冰莉所指出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往往能够“唤起民族成员的情感共鸣”,并通过共同参与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信任构建^[16]。这种通过体育形成的情感纽带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强化了各族成员对自

身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另一方面，更搭建起不同民族之间情感联结的桥梁，使他们在共同体验中产生“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家人”的真切感受。情感联结一旦形成，其影响并不因活动结束后而立刻消散。Collins认为强烈的情感能量可以长久储存在参与者记忆中，成为日后遇到他族同胞时更积极友善相待的心理基础^[15]。因此，体育仪式的互动浸润，有效地增进了群际理解与信任，培育出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感共同体。可以说，情感共鸣是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黏合剂，而体育恰恰提供了创造共鸣的理想场域。

（三）身体参与：深化认知体验，培育国家认同

体育是一种以身体实践为中心的活动，人们在身体参与中所获得的体验对于认同的形成具有直观而深刻的影响。身体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个体载体，更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感知媒介，通过身体的投入，人们才能真切地“感觉”到群体的存在以及自身与群体的关系。在体育浸润的过程中，躯体参与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被视为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认同机制。一方面，体育锻炼和团队运动可以培养规则意识、合作意识和竞争精神，这些都是现代公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学校体育课或军训中的队列练习、团体操表演中，不同民族的学生通过反复一致的身体动作，体会到纪律和协同的价值，从而加强对国家集体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体育活动往往伴随着爱国主义教育和国家符号的展示，参与其中会强化人们的国家认知图式。凌雅燕的研究指出，中国传统体育通过在活动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形塑了共同体成员的国家认同^[2]。现实中，大到奥运会、全运会开幕式上的升旗仪式、唱国歌，小到校园运动会上全体学生整齐列队高呼口号，这些包含国家象征的身体活动都在强化参与者对国家的归属感和使命感。值得注意的是，身体参与带来的认知塑造不是灌输式的，而是体验式的。人们在运动中切身感受到团结协作带来的力量、来自祖国荣誉的激励，自然而然地将个人奋斗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联起来。这种发自内心的认知和情感融合，远比书本说教更为深刻持久^[17]。因此，通过体育浸润，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等观念能够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思想，逐步培育起对中华民族的高度认同和对国家的忠诚热爱。

三、体育浸润的情感机制与社会整合逻辑

（一）文化认同视角：体育浸润的认同构建与张力

在文化认同视角下，体育浸润通过弘扬共同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来构建认同，但也面临保持多样性与强化统一性的张力。首先，体育作为文化表达的一种形式，能将抽象的国家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文化符号，从而拉近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心理距离。例如，56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大联展，能够让不同族群认识到彼此文化的精彩纷呈，同时体悟到各族文化同属中华文化大家庭的事实。这种“双重认同”既有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也有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一些学者指出，铸牢共同体意识要求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文化融合^[17]。体育提供了理想的平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主流赛事和校园课堂，本身就是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的过程，各族人民在共享体育文化盛宴中培育出对中华文化的重叠共识^[18]。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存在认同张力，即如何避免在强调国家共同文化时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傅斌等提出，应当“嵌入民族文化独特性，构建全球文化共识性”，意即一方面通过体育浸润深化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融通性认同，另一方面也要保留和尊重各民族体育文化的独特价值，并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文明对话中加以弘扬^[17]。比如，在推广藏族锅庄舞、蒙古摔跤等项目时，要避免将其过度同质化，而应突出其文化背景和意义，使参与者既感受到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又欣赏到各民族文化之美，从而达到“和而不同”的认同效果。

（二）社会整合视角：体育浸润的交往机制与凝聚效应

从社会整合理论看，体育浸润通过搭建社会交往的平台、营造合作竞争的情境，实现对不同群体的整合凝聚，但也需关注结构性因素带来的限制。体育具有天然的社交属性，一场球赛、一次接力赛就能把素不相识的人联系在一起。尤其在族群关系层面，体育活动提供了一个中性而富有吸引力的交往媒介，各族群众可以抛开彼此身份差异，以运动员或爱好者的平等身份互动交流。这种水平化的交往机制有助于打破日常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族际隔阂。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异质群体间频繁而积极的互动可显著提高群体凝聚力和信任度。体育浸润正是通过增加族际接触、增强互动质量，来实现社会整合目标的。然而，需注意到社会整合并非自发自动实现，还受到一些结构性因素影响。例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体育资源分配不均，一些偏远民族地区群众参与体育的机会有限，会削弱体育作为交往平台的覆盖面。此外，如果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体育带来的短暂融合效应可能难以持续。这就要求我们从治理层面为体育浸润提供支持，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正如国家指导意见所提出的，到2030年要“组织一批体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培育一批体育人才基地”，并使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显著提升^[3]。这意味着需要有意识地利用体育规划社区和学校活动，鼓励各族参与，保障资源投入，以确保体育真正成为常态化的“连心桥”。

（三）教育治理视角：体育浸润的育人功能与政策创新

从教育治理角度审视，体育浸润承载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可作为培育共同体意识的隐性课程和治理工具，但这也需要教育政策和治理方式的创新与支持。我国教育领域历来强调智育与德育，近年来更强调体育、

美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思想品德养成中的作用。体育浸润契合了新时期“体教融合”的理念，即将体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使之与德育、美育融合，发挥协同育人作用。教育治理视角关注的是这种育人功能如何制度化、长效化。一方面，需要在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中明确体育在铸牢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目标要求；另一方面，教师队伍的建设至关重要。正如前文提到的“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通过派遣优秀体育教师支援民族地区学校、开展教师培训等，提升了当地体育教学能力^[4]。在推进共同体意识教育中，也需要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体育教师队伍，使他们既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又能自觉承担民族团结教育者的角色。在边疆多民族地区，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影响很大，体育教师如果能巧妙将团结协作、爱岗敬业的价值观融入日常训练和比赛点评中，将对青少年世界观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从治理创新角度来看，体育浸润体现了一种软性治理思路，即通过文化和活动去影响人心、凝聚共识，相较于简单灌输或行政命令，更容易为师生所接受，其效果也更持久深刻。这种治理方式与现代教育理念契合，也为铸牢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体育浸润将在民族地区教育和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培养“中华民族一家亲”意识的有力抓手。

四、体育浸润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理论路径

（一）完善政策顶层设计，强化体育育人的民族团结导向

建议教育部、国家民委、体育总局等部门协同完善相关政策，把体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明确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可以在国家层面出台专项行动计划或指导纲要，深刻体会《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精神，对各级学校和社会体育组织提出要求。例如，规定每年举办全国或区域性的民族团结主题体育活动，将其纳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考核；对在体育促进民族交融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等。政策层面的明确导向将为体育浸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使这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二）深化体育课程融合，丰富共同体意识培养内容

在课程与教学上，应进一步落实体教融合理念，将民族团结教育目标融入体育课程体系。具体措施包括：修订体育课程标准和教材，在中小学教材中增加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介绍及相关民族文化知识，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了解中华多元文化之美；在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公选课或通识课，系统讲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史、民族体育故事等，提升大学生的理论认知水平。同时，鼓励学校开发校本课程和第二课堂活动，如民族体育节、民族运动会进校园等，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参与中体验团结协作和文化认同。另外，体育教学要注重渗透德育，例如结合体育名人的事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奋发向上、报效国家的志向。通过这些课程与教学改革，构建显性与隐性课程相结合的育人网络，将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学生日常体育学习之中。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提升体育教师民族团结教育能力

教师是体育浸润的关键实施主体，其理念与能力直接影响育人效果。应通过多种途径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体育教师队伍。其一，在教师培养阶段，将民族理论政策、民族体育知识纳入体育师范专业课程，使未来体育教师具备必要的多民族文化素养和政治意识。其二，对在职教师开展培训研修，内容涵盖民族团结教育的方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技能等，提升他们开展相关教学活动的的能力。可以建立“体育+民族团结”名师工作室或示范基地，发挥骨干教师的引领作用。其三，鼓励城市学校体育教师与民族地区学校结对支教或交流挂职，通过“传帮带”提高薄弱地区师资水平。例如，继续实施和扩大“体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选派优秀体育研究生、本科生赴民族地区支教，既解决当地师资短缺，又让青年教师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同时，注重在少数民族教师中培养体育学科带头人，支持他们结合本民族传统体育开展教学研究，形成特色。最后，将教师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成效纳入绩效考核，激励体育教师主动投入这项事业。通过以上举措，打造一支既懂体育专业、又善于做民族团结思想工作的教师队伍，让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体育活动都成为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契机。

（四）构建多层次体育交流平台，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互动

建议建立从学校、社区到全国的多层次、多样化体育交流活动体系，搭建各民族群众共参与、齐互动的桥梁。在校园内，定期举办民族团结主题的体育比赛或游园会，鼓励不同民族学生组队参赛，增进了解。在社区层面，组织邻里运动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等活动，吸引各族居民共同参与，营造“全民健身一家亲”的氛围。在更广范围，可依托节庆假日举办全国性的民族体育交流大会、民族运动嘉年华等，邀请各省各民族代表队切磋技艺、联谊交友。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线上平台分享各地民族体育活动的视频、故事，扩大交流覆盖面，形成线上线下互动的局面。这些平台活动要力求常态化、品牌化，例如将某些赛事打造成具有影响力的传统项目，并创新性地引入新的交流形式，如跨省区的“石榴籽”青少年体育夏令营等。通过持之以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交流，各族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将拥有更多机会迈出交往的第一步，在愉快的共同运动中拉近心理距离。这种润物无声的交往融合，将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吴春宝,才让拉毛,孟祥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述评——基于 CNKI 数据库文献(2014—2019年)的分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4(01):104-112.
- [2] 凌雅燕.中国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推进路径[J].体育学刊,2025,32(03):10-16.
- [3] 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教育部等.体育总局、国家民委、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EB/OL].2024-11-22[2025-08-20].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11/content_6989409.htm.
- [4] 徐月影,刘军.体育浸润行动计划的实施成效研究[J].体育世界,2022,(6):48-0050.
- [5] 倪依克,潘嘉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路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09):47-54.
- [6] 王理万.体育运动与国家认同问题的理论展开和中国语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9,43(03):46-53+60.
- [7] Hobsbawm E J.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8]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The new social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2020: 282-288.
- [9] Dayan D, Katz E. 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0] Billig M. Banal nationalism[J]. 1995.
- [11] Bairner A. Sport, nat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perspectives[M]. Suny Press, 2001.
- [12] 马景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教育价值研究[J].武术研究,2024,9(10):50-52+135.
- [13] 新浪财经.京藏疆青蒙五地中学生混合编组踢比赛[EB/OL].2025-07-18[2025-08-20].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5-07-18/doc-inffvhce4749677.shtml>.
- [14] Turner V, Abrahams R, Harris A.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M]. Routledge, 2017.
- [15] Collins R.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M]//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6] 莫冰莉,杨斌.契机与挑战: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审思[J].体育学刊,2025,32(03):17-23.
- [17] 傅斌,邓坤坤.论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体育文化导刊,2025,(02):8-15.
- [18] 于海渤,王智慧.文化重叠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育学解释——基于《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主题叙事的分析[J].体育与科学,2023,44(01):1-10.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Sports Immer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Yi Dan¹, Chenfei Yang¹, Bobo Dao² Yueping Zhong³

1 Facul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xi Normal University, Yuxi, China

2 Menghai No. 2 Middle School, Xishuangbanna, 666100, China

3 Mengla No. 1 Middle School, Xishuangbanna, 6661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immer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theoretical logic and mechanisms in 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By reviewing relevant literature, the study builds a logical framework of sports immersion, includi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ritual interaction, and bodily participation, and further elaborates on its implications in cultural identity, social integration, and educational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it proposes a theoretical path through which sports immersion promotes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e study argues that sports immersion plays a unique role in stimulating collective honor, strengthening national unity, and fostering the awareness of “all ethnic groups belonging to one Chinese family,”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s in border ethnic regions.

Keywords: Sports Immersion; National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李中华¹

(1.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随着我国户外营地迅速的发展、户外营地数量急剧增长、户外营地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然而,户外营地活动在给人们带来快乐和收获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安全风险。因此加强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迫在眉睫。本研究通过深入探讨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现状,提出构建“全周期-多主体”户外营地安全教育框架、“教育-预防-应急”三位一体的协同管理模型、“人-地-物-事-环”(PLEEE)动态风险评估模型、PDCA 循环的闭环管理系统模型,旨在为我国户外营地的安全管理提供实践指导,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参与者的安全。

关键词: 户外营地; 安全教育; 风险防范机制

基金项目: 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户外营地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25 年度项目 (项目名称: 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 HWYD2025B1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25

1 前言

我国户外运动资源丰富,冰雪、山地、水上、陆地等运动都有条件在东西南北和春夏秋冬开展。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超过 4 亿,户外产业蓬勃发展、潜力巨大^[1]。

营地最初指的是军队驻扎的地方,也指团体或者组织等在野外设置的短期活动、休憩的地方。1998 年美国营地协会 (ACA) 对营地进行了重新定义:“一种在户外以团队生活为形式,并能够达到创造性、娱乐性和教育意义的持续体验”^[2]。户外营地是指在户外环境中,为人们各种户外体育活动和户外体验提供设施与服务的场所。户外营地作为一种集休闲、娱乐、教育、体验于一体的场所。近年来,伴随者“健康中国”战略与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户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国户外营地发展迅速、户外营地数量急剧增长、户外营地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鹁指出,相关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户外运动线上消费人次约 2 亿人次,消费总额超 3000 亿元。截至 2024 年底,全国飞行营地、汽车营地等数量已达 2055 个^[3]。

然而,户外营地活动在给人们带来快乐和收获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安全风险。每一次户外营地安全事故都暴露出安全教育不到位、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管理规范缺失等问题,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制约户外营地行业可持续发展。如 2025 年 8 月 9 日 11 时 43 分许,大理市公安局接到报警,一名 8 岁自闭症男孩在参加名为“明日之光”的夏令营活动时在大理市大理镇阳和茶厂附近走失。8 月 13 日 17 时许,救援人员在大理市大理镇清碧溪北侧山涧发现走失男童,已无生命体征。因此,加强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建设迫在眉睫。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通过构建系统的理论框架,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为我国户外营地的安全管理提供实践指导,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参与者的安全。

2 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现状

2.1 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现状

作者简介: 李中华(1988—),男,硕士,研究方向:休闲体育、体育旅游、户外运动

通讯作者: 李中华

(1) 安全教育碎片化

目前,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尚未形成系统的安全教育体系,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不统一,存在“三缺乏”现象。一是缺乏理论支撑:大部分户外营地安全教育课程基于户外运动理论和项目设计,教育内容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难以有效激发营员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二是缺乏分层课程:大部分户外营地缺乏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参与者的系统化课程,青少年与成人课程同质化严重,没有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水平和技能需求的人群制定针对性的安全教育课程内容。三是缺乏效果评估:大部分户外营地未建立安全教育效果追踪机制,无法及时了解营员对安全教育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急技能的实际运用能力,安全教育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2) 安全教育内容单一

户外营地安全教育内容应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教育维度:基础知识教育、技能培训教育、装备使用教育及团队协作教育。目前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内容主要集中在基本的基础知识教育和简单的技能培训教育方面,如防溺水、创伤包扎、心肺复苏等内容,对于装备使用教育及团队协作教育等内容涉及较少,这种基础的教育内容难以满足户外营地活动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需求,营员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或面对复杂情况时不知所措,缺乏应对能力,从而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

(3) 安全教育形式落后

目前,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主要以课堂讲授和简单的现场演示为主,如在户外营地活动前通过观看营地内的安全标识和进行简单的安全讲解,难以提升营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而通过虚拟现实技术(VR)、模拟演练等现代科技手段、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应用较少,缺乏直观性、互动性和趣味性,难以吸引营员的注意力,导致学习效果不佳。

2.2 我国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机制现状

(1) 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户外营地风险评估多为静态风险,难以应对气候变化、新型活动带来的动态风险。风险评估指标侧重硬件设施建设,忽视人员行为与环境动态,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如《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GB/T31710-2015)》、《森林公园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DB65/T 4252-2019)》、《海岛休闲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DB3309/T 95-2023)》、《旅游露营地建设与服务规范(DB21/T 3884-2023)》、《露营地建设管理与服务规范(DB3205/T 1135-2024)》等国家或地方标准主要关注营地的设施建设和基本安全要求,对于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动态风险。

(2) 应急响应机制不健全

我国户外营地大部分应急预案主要是为了安全检查,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事故发生时难以迅速有效地进行应对,导致在事故发生时,救援人员不知所措,延误救援时机。一些户外营地的应急预案只是形式上的文件,没有根据户外营地的实际情况和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详细制定,没有根据活动类型制定相应的专项应急预案。

(3) 监管力度不足

由于户外营地种类较多、分布广泛,导致监管难度比较大,监管存在较大漏洞,部分户外营地存在违规经营现象。一些户外营地为了降低成本,忽视安全设施建设、风险评估、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培训等环节,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3 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构建

3.1 构建“全周期-多主体”户外营地安全教育框架

针对当前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现状,构建覆盖“学龄前-中小学-成人”的“全周期-多主体”户外营地安全教育框架,设计分阶段、模块化的户外营地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学龄前阶段(3-6岁)主要通过游戏、故事、角色扮演,建立安全基础知识教育认知;中小学阶段(7-18岁)主要通过采用“知识+技能+素养”三维培养模式,重点掌握安全基础知识教育、简单的技能培训和装备使用教育、团队协作教育;成人阶段重点强化风险评估与应急处置能力。

3.2 构建“教育-预防-应急”三位一体的协同管理模型

构建“教育-预防-应急”三位一体的协同管理模型应从教育机制、预防系统和应急预案着手。教育机制作为风险防范的前置防线，需形成覆盖全参与群体的常态化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理论基础涉及户外运动学、教育学、风险管理学、气象学、地质学、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对不同参与群体设计差异化教育方案、对参与者在活动前开展针对性安全教育、对从业人员建立资质认证与定期复训制度，同时建立安全信息共享平台，通过案例库、操作手册等资源库实现经验共享，形成持续改进的教育机制。

预防系统作为风险防范的第二道防线，需要以科学预警和高效应急为核心，通过建立动态化的风险识别体系与规范化的应急响应流程，实现风险防控的前瞻性与系统性。预警系统需整合多维度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技术，形成覆盖天气、地质、营员行为等关键要素的全方位预警监测网络。在数据采集层面，应结合物联网传感器、卫星遥感、气象预警平台等技术手段，实时监测营地周边环境变化及营地内部运营状态。通过多源数据的融合分析，构建风险评估模型，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潜在风险进行概率预测与等级划分，实现风险预警的精准化。预警信息的分级发布机制需与应急响应级别相衔接，明确不同风险等级对应的预警信号、发布渠道、响应时限和医疗救援资源调度，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和应急救援的时效性与覆盖面。

应急预案的制定应遵循“预防为主、分级响应、协同联动”的原则，形成涵盖风险识别、应急处置、事后恢复的全流程管理框架。预案内容需细化至具体场景，明确责任分工、资源调配、疏散路线和医疗救援等具体措施。在组织架构上，需建立由营地管理方、属地应急部门、医疗机构及专业救援团队组成的联动机制，确保应急响应的快速启动与高效协同。针对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应通过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不断优化流程设计，检验应急指挥系统的信息传递效率与救援力量调度能力。同时，需建立应急预案的动态更新机制，根据风险环境变化、技术进步和实际处置经验，定期评估并修订预案内容。

3.3 构建“人-地-物-事-环”（PLEEE）动态风险评估模型

整合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物联网监测数据、遥感技术等构建适用于中国户外营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地-物-事-环”（PLEEE）动态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能够对户外营地的人员风险（People）、场地风险（Location）、物件风险（Equipment）、事项风险（Event）、环境风险（Environment）等数据进行融合分析，实现风险等级与教育内容的自动匹配。通过人工智能（AI）算法，对户外营地的风险进行实时动态评估，为安全教育和应急响应提供科学依据。其中人员风险是指在户外营地中易出现安全问题的个体、群体等，场地风险是指在户外营地中存在危险的位置、区域、场所、场景等，物件风险是指在户外营地中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设备、物品物料、活动工具等，事项风险是指存在户外营地中存在安全隐患的事件、活动、项目、课程、管理制度、操作过程、工作方法等，环境风险是指在户外营地中存在风险的特定时段、周边环境、网络舆论环境及其他自然或社会环境因素等。

3.4 构建 PDCA 循环的闭环管理系统模型

PDCA 循环概念是由美国现代质量管理的奠基者沃特·阿曼德·休哈特率先提出，后经美国全面质量管理专家威廉·爱德华·戴明宣传推广，在多领域普及应用，因此 PDCA 循环也被称为“戴明环”^[4]。

PDCA 循环方法，即持续改进的循环模型，其首先在（P）计划阶段确立目标及实施方案的细节；其次，通过（D）实施阶段发现问题并分析原因；再次，利用（C）检查阶段对问题进行评估并确认解决方案；最后，通过（A）处理阶段解决问题并实现循环运行。通过以上四个步骤，PDCA 循环方法实现了风险控制的目标，现其主要应用于文化、企业生产、教学、医疗等多领域的全面质量管理中^[5]。

在户外营地安全教育与风险防范机制中应用路径为：计划阶段（Plan）制定户外营地风险控制计划，构建户外营地风险数据库与评估矩阵，运用风险评估矩阵对风险数据库的每项因子进行发生概率与危害程度量化评估；执行阶段（Do）实施分级防控策略，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对高风险项目配置双人监护制度、中风险项目实行许可管理制度、低风险项目采用定期巡查制度；检查阶段（Check）采用“三方验证”机制，多重检查确保安全，教练每日填写《活动异常记录表》、营员进行满意度访谈、第三方机构进行突击安全检查；处理阶段（Act）根据检

查结果, 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建立知识管理系统 (KMS), 将成功经验固化为标准操作流程, 未解决问题转入下一个 PDCA 循环去解决。

4 结论

我国户外营地安全教育存在安全教育碎片化、安全教育内容单一、安全教育形式落后的现状, 我国户外营地风险防范机制存在风险评估体系不完善、应急响应机制不健全、监管力度不足的现状, 提出了构建“全周期-多主体”户外营地安全教育框架、“教育-预防-应急”三位一体的协同管理模型、“人-地-物-事-环”(PLEEE) 动态风险评估模型、PDCA 循环的闭环管理系统模型, 旨在为我国户外营地的安全管理提供实践指导,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保障参与者的安全。

参考文献:

- [1] 央视新闻.从“营地”到“目的地”和 4 亿人一起解锁户外运动新场景[EB/OL].(2025-05-11)[2025-08-20].
<https://news.cctv.cn/2025/05/11/ARTIgeOcq2fDEIbL9C04PVtB250511.shtml>
- [2] 刘飞飞.“双减”政策下青少年户外体育营地建设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D].燕山大学,2024.3.
- [3] 周逸斐.去年我国户外运动线上消费超 3000 亿[N].每日经济新闻,2025-08-20(002).
- [4] 万融.商品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52-253.
- [5] 程风刚.基于 PDCA 循环的数字馆藏安全管理模式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4(7):61-64.

Research on Outdoor Camp Safety Educ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in China

LI Zhonghua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Chengdu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tdoor campsites in China, the number of outdoor campsites has surged, and the outdoor campsite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explosive growth. However, while outdoor campsite activities bring joy and benefits to people, they also come with various safety risks.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outdoor campsite safety educ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is an urgent priority.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current state of outdoor camp safety educ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in China, propo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full-cycle, multi-stakeholder’ outdoor camp safety education framework, a ‘education-prevention-emergency response’ integrated management model, a ‘person-place-object-event-environment’ (PLEEE) dynamic risk assessment model, and a PDCA cycle-based closed-loop management system model. These models aim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afety management in China's outdoor camping sector,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participants.

Keywords: outdoor camping; safety education;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城乡共治视角下的生活垃圾分类困境与路径探索： 以中国四川会东县为例

蔡华珍¹，王棚¹，邓景¹，林静¹，李渊^{1,*}

(1.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亦是可持续城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实践。为探讨城乡共治视角下垃圾分类的困境与路径，本研究以中国四川省会东县城乡垃圾分类实践为例，开展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研究发现，会东县垃圾分类存在覆盖面不均、流程脱节、公众参与度低和基础设施保障不足等问题。从制度协同、信息协同、利益相关者协同和资源保障四方面剖析了上述问题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四项对策建议：构建城乡一体化推进机制、健全标准与制度体系、优化公众参与路径和加强基础设施与资源配置。研究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 11 项——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通过优化垃圾分类制度推动社区绿色转型和治理能力提升。

关键词：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县域治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87

一、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生活垃圾治理问题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1]。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国需逐步建立垃圾分类体系，推动形成公众参与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操作的治理局面^[2]。“十四五”时期，垃圾分类管理成为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求^[3]。

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各省市相继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但部分县域地区的实际执行仍面临挑战^[4]。会东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南部城乡交界地带，作为典型县级行政单位，其城乡二元结构显著，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水平直接反映基层生态治理能力。实地考察发现，会东县在垃圾分类推进中存在启动晚、基础设施薄弱、群众认知度低等问题。

1.1.2 研究意义

生活垃圾分类关乎城乡环境质量提升，也是基层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5]。会东县存在部门联动不足、居民参与度低、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制约政策落地效果。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可帮助地方政府明确治理问题及成因，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改进措施，为同类县域（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提供参考，助力构建适配的垃圾

作者简介：蔡华珍（2002—），女，四川会东人，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1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王棚（2005—），女，四川简阳人，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邓景（2005—），女，四川达州人，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林静（2001—），女，四川西昌人，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1 级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

李渊（1983—），男，宁夏银川人，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组织及个人行为研究。

通讯作者：李渊

分类模式，提升地方环境治理能力，推动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张江海研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机制，提出多元主体协同的重要性及优化策略^①；徐中建聚焦城市垃圾分类中政府义务，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进程，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②；陈蒙指出中国垃圾分类治理需坚持“前端简单、后端精细”，做好顶层设计^③；顾丽梅、李欢欢结合行政动员、多元参与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构建垃圾分类参与式治理解释框架^④。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层面，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垃圾分类治理的研究薄弱，尤其缺乏对治理障碍、群众参与不足及基础设施问题的具体剖析。

1.2.2 国外研究现状

Iyer 和 Kashyap^⑤发现垃圾分类政策对居民投放行为具有引导作用，政府需利用政策推动分类；Brown 和 Johnstone 强调政策支持、政治可行性及公众支持对垃圾分类治理的重要性^⑥；Stričík 认为需通过健全法律法规、限制不分类行为、激励积极分类等方式，改善城市垃圾分类管理体系^⑦。国外研究普遍关注政府政策设计、居民行为引导与激励约束机制的互动，强调制度与公众参与的协同，为我国县域垃圾分类治理提供了参考。

1.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的方法：通过中国知网搜集生活垃圾分类与协同治理理论文献，了解国内外动态及理论应用；收集会东县垃圾分类治理文件与报道，形成调研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在会东县主要道路、街巷及居民区发放 130 份问卷，收回 118 份，有效问卷 106 份），了解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参与度和满意度。

1.4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4.1 相关概念界定

生活垃圾：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弃物，包括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废纸、塑料瓶等可循环利用垃圾；厨余垃圾为餐饮残余、植物废弃物等有机垃圾；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化学药剂等对人体或环境有害的废弃物；其他垃圾为一次性纸巾等不可回收物^⑥。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通过政策引领、技术支持、社会参与和制度保障，对生活垃圾进行源头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全过程管理，目标是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⑬。

1.4.2 理论基础

协同治理由 Ansell 和 Gash 提出，强调在政府主导退居次位、利益相关者多元化背景下，公共事务治理转向“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协作^⑦。参与各方通过资源交换、信息共享、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实现治理协同、效能提升与公共价值最大化。

二、四川省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现状

2.1 四川省会东县基本情况

会东县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南端，是攀西资源开发区核心地带和川滇通道，全域面积 3226 平方公里，地形以山地和峡谷为主，金沙江、鲹鱼河贯穿境内，县域设 2 个街道、13 个镇、4 个乡。据 2024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县常住人口 34.61 万人，聚居汉、彝、傈僳等多民族，农村人口占比高，城乡二元结

①张江海.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路径探析——以厦门市为例[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2(06):93-98

②徐中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义务研究[D].导师:颜运秋.广东财经大学,2020

③陈蒙.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1(03):113-122

④顾丽梅,李欢欢.行政动员与多元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基于上海的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02):83-94+170

⑤Iyer E S,Kashyap R K.Consumer Recycling:Role of Incentives,Information and Social Class[J].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2007,6(1):32-47

⑥Brown,Z.S.,Johnstone,N.Better the devil you throw:Experience and support for pay-as-you-throw waste charges[J].Environmental Science&Policy,2014,38:132-142

⑦Stričík Michal,ČonkováMonika.Key Determinants of Municipal Waste Sorting in Slovakia[J].Sustainability,2021,13(24)

构显著^[8]。

会东县自 2019 年起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结合地方实际制定《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实施方案》，以“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为目标，构建全流程分类处理系统^[9]。在推进过程中，采用“政府引导、社区参与、全民行动”模式。政府主导政策制定与监管，社区组织宣传活动，民众养成分类习惯，多方协同下手，截至 2022 年，主城区和部分乡镇已初步实现垃圾分类覆盖，垃圾处理效率与资源回收利用率显著提升。

2.2 生活垃圾产量及组成成分

2.2.1 生活垃圾产生、利用及处理情况

2023 年，会东县全年城乡生活垃圾产出总量为 6.46 万吨，其中城市生活垃圾产量为 2.88 万吨，农村生活垃圾产量为 3.58 万吨^[10]。会东县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 6.46 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其中，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 2.88 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 3.58 万吨，无害化处理率为 100%^①。

2.2.2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情况、分类方式及收运情况

会东县一共有 2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总处理能力为 21.9 万吨/年，其中，焚烧处理能力占比 100%，填埋处理能力占比 0%^②。本县厨余垃圾清运量为 0.26 万吨，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无利用量；可回收物回收量为 4.02 万吨，尚未进行利用；有害垃圾在清运、利用、无害化处理方面相关作用量低；其他垃圾清运量为 2.44 万吨，均完成无害化处理。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会东县 2 座生活垃圾处理设置情况

设施所属单位名称	设施名称及类型	设计处理能力(万/吨年)	实际处理量(万吨)	使用年限/预期关闭时间(填埋场)
会东县城市管理局	小尖山垃圾填埋场	4.06	0	16(2005-2020)年
会东县三峰环保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会东县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1.9	15.79	30 年

2.3 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及收运情况

会东县目前已构建了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12]。在源头投放上，科学布局分类收集点，以标准化垃圾桶覆盖城区主要区域，通过社区宣传、志愿者指导，推行“四分类”^③投放模式，部分示范小区实行定时定点投放，如金江新区实现了管理、类别、体系三个全覆盖。运输环节推行分类收运。厨余垃圾专用车日产日清，可回收物通过“定点+流动”收集机制拓宽网络，有害垃圾暂存后由专业车辆运往危废处置单位，其他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高效收运，避免混装混运。处置时，针对不同垃圾采用对应技术：厨余垃圾生态化处理、堆肥资源化；可回收物分拣后再生或无害化处理；有害垃圾专业安全处置；其他垃圾焚烧或填埋。目前，会东县正持续优化各环节协同，推进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发展。

2.4 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政策

自《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以来，会东县以提升生活垃圾治理效能为目标，积极落实省级政府政策要求，结合会东县实际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配套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推动分类投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11]。相关政策如表 2-2 所示：

三、四川省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现存问题

在国家 and 地方政策推动下会东县 2019 年起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初步构建了“政府引导、社区参与、全民行动”的治理框架，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且主城区试点区域部分实现垃圾分类制度落地。但实地调研显示，会东县在垃圾分类推进期间仍存在分类覆盖失衡、分类流程脱节、居民参与度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

① 引自会东县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schd.gov.cn/ztlm/rdzt/jczwgkzl/gkly/sthj/ggfwsx/wryxxfb/202405/t20240516_2677009.html

② 引自会东县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schd.gov.cn/ztlm/rdzt/jczwgkzl/gkly/sthj/ggfwsx/wryxxfb/202405/t20240516_2677009.html

③ “四分类”指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通过这种分类方式，便于在源头投放、运输及处置等环节进行针对性管理，以实现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表 2-2 会东县关于生活垃圾治理的政策文件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名称
2020 年 4 月	四川省政府	《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
2020 年 12 月	会东县政府	《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
2021 年 6 月	会东县政府	《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2021 年 9 月	会东县城市管理局	《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工作方案》
2022 年 3 月	会东县政府	《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考核办法》
2022 年 8 月	会东县城市管理局	《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规划》
2023 年 5 月	会东县城市管理局	《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创

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省政府网站和会东县政府网站整理得

3.1 分类覆盖失衡，城乡差距大

调研发现，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覆盖情况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突出。县级政府虽制定方案，却仅在主城部分示范点位如金江新区局部小区推行“四分类”定时定点模式，整体推进仍处于初试阶段，覆盖范围较小。农村地区部分居民聚集点与分类垃圾桶间距超 500 米，分类设施布局“远、稀、偏”，且部分乡镇缺乏分类制度框架未配备分类桶，导致群众将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或焚烧。农村人口占全县 70%^①，但相关设施配备与政策建设不完善，呈现“城市主导、农村滞后”的局面。

3.2 分类流程脱节，系统运行不连贯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四个主要的环节，但会东县尚未实现环节衔接与闭环运作，存在流程断裂现象：在 106 份问卷调查中显示 78.3%^②的居民未按照标准分类投放，垃圾混投现象普遍，具体详见图 3-1；尽管部分区域配备了专用分类车辆，但运输容量不足，仍存在“专桶混收”的问题；厨余垃圾虽实行日产日清，但因缺乏专业处理设备和路线规划，导致运输效率低；目前，仅建成一座焚烧处理厂，年处理能力 21.9 万吨，资源化利用体系未建立，可回收物与厨余垃圾回收率较低。以上说明，会东县生活垃圾各分类环节流程脱节，衔接不畅，系统运行不连贯，缺乏系统性。

3.3 居民参与度低，分类推进受阻

尽管多数居民在问卷中表示“理解垃圾分类”，但从实际行动看，居民参与率远低于政策预期。问卷调查中 64.15%^③的居民表示从未参与过垃圾分类相关活动，且主要依赖物业或保洁人员投放，主动分类比例极低，具体详见图 3-2。调研发现部分居民对“四分类”标准理解不清尤其对“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具体界定存在误解，少数居民存在认知理解偏差影响分类意识培养，且因无奖励机制导致居民缺乏分类获得感和社会认同感。

四、构建协同治理导向的生活垃圾分类优化路径

4.1 强化制度统筹，建立“县—乡—村”三级分类推进机制

为解决农村分类推进薄弱、城乡推进失衡的问题，应以制度协同为牵引，构建城乡统筹分类工作机制，重点落实以下三项措施：设立县级垃圾分类的工作小组，由县政府联合住建、城管、农业农村、财政、环保等部门组成了工作小组负责分类制度制定资源统筹与监督考核。推动镇、村建立分类专员机制，在每个乡镇政府指定 1 名

^① 数据来源于会东县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schd.gov.cn/zfxxgk1/fdgnr/tjsj/tjgb/202409/t20240919_2729681.html

^② 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

^③ 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

“分类管理员”，在村（社区）配备1名“分类宣传员”，负责分类知识宣讲、群众动员与桶点管理。实行“差异化分类模式”：城市地区坚持“四分类”标准，农村地区试点“两分类”（可回收物+其他垃圾），降低执行难度，提高覆盖率。同时，将垃圾分类纳入乡镇政府年终绩效考核，每季度开展督查通报，实行“红黄榜”制度，推动属地落实分类责任，确保城乡分类工作同步开展并实现全面覆盖^[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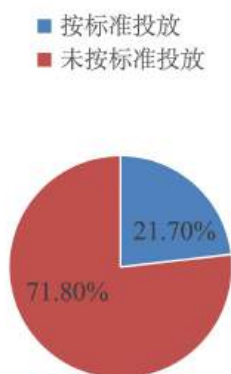


图 3-1 居民垃圾投放情况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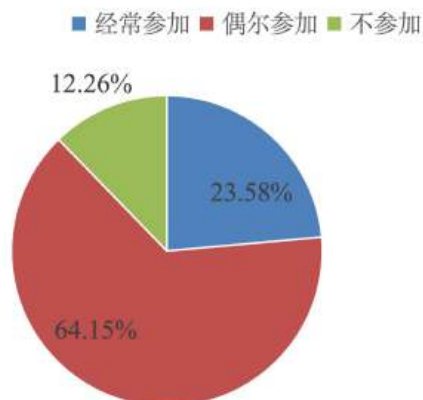


图 3-2 居民参加垃圾分类情况

4.2 紧扣流程闭环，打造“投放—收运—处置”一体化运作链条

为解决分类前端有效、中段混乱、末端失效的流程断裂问题，应围绕分类作业全流程进行统筹优化，着力推进以下工作：根据分类类型配备专用车辆，做到“可回收物专车、厨余垃圾专车、有害垃圾专车、其他垃圾统一运送”，运输过程设立GPS轨迹监管，避免“混装混运”现象。在县城主城区和人口密集乡镇设立分类中转点，分拣、暂存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为再利用与资源化处理创造条件。村（社区）每周汇总分类投放数据并上报乡镇，乡镇向县级平台反馈，全县实现“分类数据—问题发现—过程跟踪—整改闭环”的全过程监管^[15]。推动焚烧厂升级改造，建立厨余垃圾堆肥点，引入资源化企业对回收物进行再利用，形成分类投放有去向、分类运输有监督、分类处理有成效的完整治理链条。

4.3 聚焦公众动员，构建“宣传—激励—自治”三位一体参与机制

居民不愿分、不主动、不坚持，是垃圾分类推进的最大障碍。为此，应构建一套“宣传引导+正向激励+自治协同”的居民参与机制，重点推动以下措施：开展“贴近生活”的宣传活动，通过村组会议、广播喇叭、宣传车流动讲解等方式，开展通俗易懂的“入户式宣传”，编印《生活垃圾分类小手册》、张贴图解式标识海报，使不同年龄段、文化层次群众都能“看得懂、学得会、做得到”。推行“积分制激励+实物兑换”制度，居民正确分类可累计积分，积分可在村（社区）积分超市兑换纸巾、洗洁精等生活物资，设立“分类达人”“文明家庭”荣誉奖牌，提升参与获得感。发挥基层自治力量，依托小区楼栋、村民组，推行“分类志愿小组”，建立居民自管、邻里互督机制，村（居）委定期开展“优秀分类家庭”评比活动，通过口碑传播带动整体参与氛围。此联动，不仅能提升居民分类意识，也能促进分类行为向日常生活渗透、长期稳定转化。

结语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会东县积极推进分类工作，完善设施、开展宣传、建立机制，但仍面临居民意识薄弱、覆盖不足等挑战。未来需持续提升分类治理水平，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林培.精准立法助力居住环境改善[N].中国建设报,2024-12-30(004)

- [2]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J]. 绵阳市人民政府公报,2018,(06):18-22
- [3] 陈发源,成莉,杨茂林.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改革的理想展望与现实进路[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21,38(02):57-65
- [4] 许卫红,胡颖.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模式探索——以白沙县为例[J].中国资源综合利用,2024,42(06):237-240
- [5] 石雨川.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打造文明和谐城市形象[N].雅安日报,2024-04-04(001)
- [6] 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J].浙江人大(公报版),2021,(01):6-11
- [7]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8,18(4):543-571
- [8] “会东县”十四五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初稿)[EB/OL].(2021-11-10)[2025-03-01].http://www.schd.gov.cn/zfxgk1/fdgknr/ghjh/202111/t20211110_2073369.html
- [9] 会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实施方案[EB/OL].会东县人民政府网站,(2021-11-28)[2025-04-11]http://www.schd.gov.cn/zfxgk1/zcwj/zcjd/202111/t20211128_2088704.html
- [10] 会东县人民政府.会东县2023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EB/OL].(2024-05-16)[2025-01-19]http://www.schd.gov.cn/zfxgk1/zcwj/zcjd/202111/t20211128_2088704.html
- [11]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四川省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方案[EB/OL].(2019-11-20)[2025-03-01]<https://www.sc.gov.cn/10462/c103047/2019/11/26/7b63e98867f74632af1a0b9c8f0e51c3.shtml>
- [12] 会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会东县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置工作实施方案[EB/OL].(2024-03-01)[2025-03-17]http://www.schd.gov.cn/zfxgk1/zcwj/xzfbgswj1/202403/t20240301_2639982.html
- [13] 李熠煜,杨旭,汤资岚.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执行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基于政策网络理论视角[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1,(02):20-28
- [14] 张时.云龙区生活垃圾分类协同治理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徐州市:中国矿业大学,2024.
- [15] 韩贇璞.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D].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2023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in Huido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Cai Huazhen¹, Wang Peng¹, Deng Jing¹, Lin Jing¹, Li Yuan^{1,*}

¹College of Tourism & Urban-Rural Planning,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 As China continues to adv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has become a key component of grassroot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recent years, Huido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has actively implemented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response to policy guidance. While initial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field research shows that Huidong County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 coverage, process continu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support. Guided b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and using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waste classification practices in Huidong County, summarizes four major problems: unbalanced coverage, disjointed processes, low resident participation, and insufficient facilities, analyzes the causes from four aspects of institutional, information, subject, and resource collaboration, and finally proposes four countermeasures: establishing a unified urban-rural promo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ng a full-process standard system, optimiz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channels, and strengthening facilities and resource support. This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waste classification governance in Huidong County.

Keywords: Huidong County; Domestic waste classification; Cooperative governance; County governance

四川省昭觉县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研究

约其作体¹ 邓景¹ 王棚¹ 吕你色¹ 李渊^{1*}

(1.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 民族地区县域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达成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点, 昭觉县身为四川省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 在改善人居环境以及资源治理方面虽说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是调查中发现其仍存在治理机制碎片化、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公众参与不够充分等问题。文章依据协同治理理论, 运用田野调查和政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梳理昭觉县治理现状, 识别问题成因, 并提出以“部门协同—资源统筹—多元参与”为核心的协同治理路径, 研究发现, 构建制度联动机制、提升项目科学性、激发社会协作活力, 是推动昭觉县达成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协同发展的关键方向。本研究寄希望为帮助昭觉区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路径。

关键词: 昭觉县; 人居环境; 资源治理; 协同治理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01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改良城乡人居环境以及达成资源治理现代化, 乃是当下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里非常关键的国家战略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清晰地提出: “统筹城乡发展格局,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1], 《“十四五”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着重指出, 需全面提高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水准, 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加强空间治理能力以及生态环境保护^[2]。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昭觉县面临人居环境质量处于较低水平, 资源配置效率欠缺, 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等情况, 依据《昭觉县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 全县常住人口有 25.6 万人,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达 96.7%, 县域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覆盖率不到 40%, 城乡居民饮水安全问题依旧较为突出^[3]。在实际操作中, 依然存在政策碎片化、投入分散以及多元主体协同能力薄弱等问题, 治理效果不佳, 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这对地方生态宜居水平的提升造成了限制, 同时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剖析县域层面怎样达成人居环境改善同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 这对提升昭觉县本地的治理绩效有帮助, 还可以为其他欠发达地区探寻系统化、多元化、协同化的县域治理路径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参考经验。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与资源治理能力的提高, 能呈现出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状况, 还是达成美丽中国、宜居乡村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途径, 县域作为国家政策得以落实的基本治理单元, 是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载体。探索欠发达民族县域怎样在复杂的资源背景以及发展制约条件下实现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 有现实指导意义与学术研究价值。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者简介: 丰雷 (2002—), 男, 四川西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1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邓景 (2005—), 女, 四川达州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王棚 (2005—), 女, 四川简阳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吕你色 (2002—), 男, 四川木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李渊 (1983—), 男, 宁夏银川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创新管理、组织及个人行为研究

通讯作者: 李渊

国内学者宁涛在其发表的《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人居环境的治理——以 G 村为例》这一文献中指出,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并非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保证,其关键之处在于行动者参与以及合作行为有连续性,可凭借强化沟通机制以及进行利益协调,推动各行动者持续合作并积极参与,实现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契合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¹。杜焱强、詹昕颖在《农村人居环境何以实现异质性治理?——基于外部资源和内在动力的解释》文献里提出,依据新内生式发展理论,从“外部资源”与“内在动力”这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简要的分析框架,这对于全国各地依照自身实际情况学习应用“千万工程”经验有着现实参考意义,同时也丰富了中国情景下乡村区域异质性治理的理论内涵²。

国外学者 Bhaskar Ghosh、Md. Zunaid Farouque、Sudipta Das Gupta 选取孟加拉国作为例子,对孟加拉国 9 个主要城市的人居环境适宜性展开评估,依据合理的土地利用指数以及 UHI 指数,指出了快速且无计划的建设用地扩张以及其他土地利用变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19]。Aysan Ahmet Faruk、Bakkar Yassine、Ul-Durar Shajara 等人凭借剖析自然资源与治理冲突之间的关联,同时对治理在自然资源管理里的作用给予评估,提出发展中国家或许需要更多的决策权、财政和人力资源、在关键资源挑战方面的领导力以及冲突解决机制[20]。

1.3 研究方法

正确的方法能使研究过程事半功倍,为探索欠发达民族县域怎样在复杂的资源背景以及发展制约条件下实现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本文将依据协同治理理论,运用实地调研与访谈法、文献研究法、政策分析法等相结合的方式,全面且细致地梳理昭觉县治理的实际状况,精准识别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围绕“部门协同—资源统筹—多元参与”核心的协同治理途径。

实地调研与访谈法是指研究者直接深入实际环境,通过观察、体验、直接参与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法。本文通过深入昭觉县各个乡镇,收集了居民对地方政府关于人居环境治理现状的观点,结合居民切身体验,调查人居环境整治的问题。

文献研究法是指一种收集、分析和解释文献资料,以获取研究对象相关信息,进而解决研究对象或验证研究假设的研究方法。本文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与地方政府推动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发展的相关文献,包括政策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等。通过对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分析,为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背景信息。

政策分析法旨在评估、设计、优化公共政策,以解决治理问题或实现特定目标。结合了多学科的理论工具,通过科学论证和实证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

1.4 概念界定与理论概述

人居环境指的是人类得以生存以及发展所依托的综合性生活空间,其中包含居住条件、基础设施、自然生态以及公共服务等诸多要素^[4],改善人居环境属于达成城乡融合发展以及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环节。

资源治理所指的是针对自然资源,像土地、水、能源等,进行配置、使用、保护以及监督管理的制度体系^[5],资源治理着重于效率和公平,同时也关注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的参与度。

协同发展所指的是在多个主体以及多个系统之间达成目标、过程以及资源的动态协调,并且实现优势互补,依靠这样的方式,最终促使整体系统的运行效率以及治理绩效得到提升^[6]。

协同治理理论主要聚焦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该理论着重关注在这中不同主体间的协作治理情况,这些主体囊括政府、企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等,借助制度化安排,各主体展开协作,其核心机制有共同参与^[7],即各主体都参与到治理活动之中,信息共享,意味着各主体之间可实现信息的互通有无,协商决策,也就是各方共同商议并做出决策,联合执行,即各方携手执行相关决策^[8]。这些机制适用于对治理过程里的互动关系、制度结构以及行动整合等方面进行分析。

国内学者童星等人指出,协同治理注重多元共同治理、机制嵌入以及反馈调整,已经在生态治理、区域协调、公共服务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运用^[9],然而目前多数研究聚焦于城市区域或者省域层面,缺少对民族县域、山区基层治理实践的系统性实证剖析,本文以昭觉县作为典型个案,尝试在协同治理理论角度下,构建适合欠发达县域特点的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路径。

2 昭觉县概况和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现状

¹宁涛.行动者网络视角下乡村人居环境的治理——以 G 村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4,35(13):46-49

²杜焱强,詹昕颖.农村人居环境何以实现异质性治理?——基于外部资源和内在动力的解释[J].公共管理学报,2024,21(04):151-165+176

2.1 昭觉县概况

昭觉县属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它东边与美姑县、雷波县交界，南边和金阳县、布拖县、普格县相接，西边同西昌市、喜德县毗邻，北边跟越西县相连，辖区面积为 2560 平方公里，到 2023 年 9 月时，全县管辖 20 个乡镇，包含 153 个行政村、10 个社区，有 824 个农村村民小组、20 个居民小组，户籍总人口是 33.45 万人，主要分布着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等民族，其中彝族人口所占比例为 98.53%。境内主要是山地丘陵地形，海拔处于 1600 至 3700 米之间，区域落差较大，交通条件相对比较落后¹。

昭觉县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当中的一员，还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在国家以及省级财政给予的支持下，这些年县域于基础设施、生态治理以及资源开发等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发展，只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人口居住较为分散、财政自主能力不强，资源配置以及环境治理基础依旧薄弱，治理面临的压力不小。

2.2 人居环境建设现状

农村生活设施正逐渐走向完善。在“厕所革命”以及“五清五改三建”等行动的带动作用之下，大部分行政村都已经完成了人居环境整治并初步达到了相关要求。

城乡垃圾处理体系已初步构建完成。昭觉县至少建成了 587 余处垃圾收集点，还配置了 90 辆垃圾转运车，县乡村三级垃圾收运体系初步达成了覆盖目标²，不过部分边远山区道路通行险阻，垃圾清运成本较高且频次较低，仍存在垃圾堆积以及露天焚烧等现象。

污水处理能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全县范围内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一共有 6 座，这些设施主要集中在县城以及大中型乡镇区域，其总的处理能力大概是 5500 吨/日，然而昭觉县的村落分布呈现出零散的状态，一直到 2024 年 6 月的时候，农村集中污水处理的覆盖比率只有 38%³。大多数村民生活产生的污水还是凭借排水沟、明渠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当中。

2.3 资源治理现状

昭觉县自然资源的开放现状呈现出多方面特点，其土地总面积为 25.6 万公顷，然而其中耕地面积所占比例仅为 17.3%，草地与林地两者合计的比例超过了 81%⁴，由于受到地形的限制，大量土地难以实现规模化开发，零碎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城镇扩展与土地整治之间出现了冲突，土地利用方面缺乏统筹协调。县域内主要的水系包含昭觉河、青岗坪河等，不过水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均匀，西北部地区水源匮乏，多数农户依靠集雨水窖或者山泉引水系统进行灌溉，依据《昭觉县“十四五”水资源保障规划》，人均可利用的水资源量仅仅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65%^[10]，全县以电力作为主导能源，占比达到了 92.3%，但是高海拔的偏远村落仍然存在季节性用电紧张的问题。光伏、风能等新能源虽然有进行试点建设，不过总体规模较小、覆盖范围有限，还没有形成清洁能源补充系统，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重建设、轻管理”以及“重投入、轻运营”的倾向，部分水利项目建设完成后运行效率不高，缺少科学评估以及后期监管，开发活动与生态红线区管理的衔接并不顺畅，存在潜在的生态风险。

部门治理结构的实际状况。昭觉县目前主要依靠县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来推动人居环境以及资源治理工作，具体涉及住建、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然而各部门的职责界限并不清晰，部门之间缺少信息共享，工作内容出现了交叉和遗漏的情况，虽说昭觉县部分乡镇和村委会设立了“环境治理理事会”或者“资源监督小组”，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参与机制不完善、激励手段较为单一，多数村民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解仅停留在“政府工程”这一层面，缺乏长期参与的意愿，很难有效地组织村民广泛参与其中。

3 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3.1 治理机制碎片化，信息共享不畅通

昭觉县目前于人居环境以及资源治理方面，主要依靠县政府职能部门来加以推进，尽管已经设立了县级层面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领导小组”，然而在实际开展相关操作的时候，部门之间职责出现交叉状况，信息共享并不顺畅，资源整合能力较弱这些问题十分突出。

¹ 数据源自昭觉县政府办 http://www.zhaojue.gov.cn/zjzj_5770/zjgk_5771/202405/t20240516_2677134.html

² 数据源自凉山日报 https://www.lsz.gov.cn/jrls/xsdt/202404/t20240410_2662070.html

³ 数据来源污水处理工程网 <https://www.dowater.com/zhaobiao/2024-12-03/7082483.asp>

⁴ 数据来源昭觉县人民政 http://www.zhaojue.gov.cn/zjzj_5770/zjgk_5771/gk_5772/202501/t20250123_2789286.html

从上表可明显看出,多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的情况,信息平台较为分散,并且缺少统一联动协调机制,致使资源投入呈现碎片化,治理行动效率不高,就拿生活污水治理来说,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是由住建部门来牵头负责的,排水系统的维护则归水务部门管,环保部门承担的是监督职能。

表 1 昭觉县人居环境治理主要职能部门及职责分工示意图¹

部门名称	主要职责	存在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垃圾转运体系	缺乏与排水、环保部门的信息联动
水务局	排水系统、饮水安全管理	与污水处理脱节
生态环境局	污染监测与环境执法监督	与住建、水务协作机制缺失
农业农村局	村庄清洁行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缺乏统一调度,任务重复

因为缺少统一的协调平台以及信息共享机制,使得管网设计和处理能力出现脱节,部分新建的污水处理站由于配套管网滞后,导致建成后却无法投入使用,像东拉某村的污水站建成两年了仍未正式运行,结果使得周边河道污染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增加^[12],从协同治理理论方面来讲,这种信息隔绝以及职能割裂的治理结构,削弱了政府间“联合执行”与“协商决策”的制度基础,很难形成制度化、稳定化的跨部门合作网络,这会导致各部门在对资源进行治理时候,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导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足,进而影响人居环境的治理进度与效果。

3.2 资源配置效率低,项目规划与现实脱节

尽管近些年来昭觉县在人居环境以及基础设施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然而资源配置不均衡、项目分布不太合理、土地利用效率比较低等一系列问题依旧较为突出。

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源配置决策前期缺少协商,对项目的考察也不够充分,无法形成“以用促建、用建结合”这种动态治理逻辑,在 2024 年的时候,全县主要实施了 2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总投资约 5000 万元,然而有大约 23% 的项目在建成之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其中大部分是边远乡村的垃圾收集站以及分散式厕所改造设施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前期缺乏科学的需求评估以及多部门协同决策,使得项目选址和村落实地需求出现脱节,在土地利用方面,县城以及周边乡镇的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较快,而部分可耕地却因为撂荒而被长期闲置,这会导致各部门对资源的开发缺乏科学性,开发过后因缺乏维护和应用而产生浪费,对人居环境可能造成环境、村貌的破坏等不良影响。

3.3 多元协同机制缺位,公众与企业参与不足

在昭觉县开展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工作时,主要采用的模式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以及行政主导,然而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非政府主体的参与程度一般较低,协同治理的基础较为薄弱,从企业层面来看,在 2024 年的时候,通过实地调研得出昭觉县在岗的环保类企业仅仅只有 6 家,从业人员的总数加起来还不足 60 人,这种情况很难契合市场化治理的基本需求。

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存在意愿不足的情况,就拿垃圾处理这一领域来说,在昭觉县,除了县城之外,基本上没有从事市场化垃圾处理运营的企业,农村地区的垃圾清运任务,大多是由乡镇政府雇佣人员来完成的,并且缺乏规范化的管理机制以及市场竞争所应有的效率^[13]。另一方面是公众参与机制形式化的问题较为突出,尽管部分村庄设置了“村民环境理事会”这一机构,然而多数情况下该理事会仅仅是徒具形式,会议召开并无固定规律,村民实际上难以拥有真正的话语权,根据调查结果,在针对 12 个典型村庄

¹ 数据整理自昭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构职能专栏)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dxxgk_34509/rsxx/zfbm_35609/ghjshzfbzj_6738/bmxx_6739/202106/t20210602_1926109.html

凉山州水务局官网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dxxgk_34509/rsxx/zfbm_35609/swj_6753/bmxx_6754/202003/t20200320_1545698.html

凉山州生态环境局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dxxgk_34509/rsxx/zfbm_35609/hbj_6700/bmxx_6701/201906/t20190612_1131685.html

昭觉县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局专栏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dxxgk_34509/rsxx/zfbm_35609/nmj_6747/bmxx_6748/201905/t20190520_997222.html

² 数据来自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https://www.ggzy.gov.cn/information/html/b/510000/0101/202410/31/00513c58b830bca04e9998e4e17ad65acdb1.shtml>

数据来自昭觉县农业农村局 http://www.zhaojue.gov.cn/xxgk/zc/Xzwcwj/202503/t20250310_2804256.html

展开的访谈活动中,高达 78%的村民表示对村内人居环境治理的具体项目以及资金用途并不清楚^[1],这充分反映出公众在治理进程中,无论是信息获取途径还是表达机制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依据协同治理理论来分析,既是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两方面的协同治理,也是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的协同治理,仅靠政府部门,隔绝非政府组织,无论是信息获取上还是有效治理上,都会影响治理效果与治理的高效性。

表 2 村民对人居环境项目参与认知情况调查¹

问题	回答比例
知道村内当前环境治理项目内容	22%
不知道资金从何而来/如何使用	78%
参与过村庄治理相关会议/意见征集活动	19%
认为政府应主导所有治理事务,不需群众参与	63%

4 构建协同治理的县域治理路径

昭觉县在开展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工作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政府内部机制协同不够充分,项目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多元参与结构有所缺失等,而这些问题深层次的根源在于协同治理机制未能有效建立起来,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强调制度联通、多元协作、资源整合以及反馈调节等方面^[14]。应当以协同治理理念作为导向,从组织架构、资源流程、主体动员等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对县域治理体系进行重塑,以此实现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统筹协同发展。

4.1 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推动政府内部高效协同

昭觉县目前所采用的治理模式是以政府部门作为核心的,然而各部门之间却存在着职责交叉的情况,规划方面也多有重复,数据也处于隔阂状态,这些状况成为了治理碎片化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应当优先去完善县级层面那种“纵向统筹加上横向协同”的治理结构,建立起统一且高效同时稳定的协调机制。

构建“县级协同治理联席会议机制”。提议由县政府主导设立“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联席会议制度”,把住建、生态环境、水务、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纳入该制度体系,形成固定的议题制度,借助制度化以及例会化的方式,达成在规划审批之前进行统一协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明确任务分工,在执行之后,同步开展责任追踪与信息反馈。每一个季度举行一次联席会议,并且设立日常秘书处作为协调机构,用常态协作取代临时联合,达成协同治理的制度嵌入。

建设县级数字化的“多维协同治理平台”。这一平台可借助“智慧昭觉”的系统架构,对自然资源利用、工程项目以及污水垃圾设施等治理要素加以整合,搭建起一体化数字平台,该平台有四方面功能,其一,不同部门可共享空间、规划、人口、资源等各类数据,其二,可统一项目信息录入、推进以及验收进度的管理工作,其三,借助数据的动态更新,达成跨部门信息的实时联通,其四,此平台可充当联席会议的“数字中枢”,强化数据支撑决策的能力^[15]。

推行一种以协同绩效为导向的考核机制。昭觉县政府可将跨部门协同所取得的成效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畴,像规划有没有凭借联席会议审议,数据有没有完成共享上传等情况都在考核范围内,并且要设置“协同治理绩效”加分项目,以此建立起治理联动的激励机制。

4.2 提升资源配置科学性与项目统筹效率

依据前文的分析可知道,昭觉县存在着项目“建而不用”、“分散重复”以及“设施闲置”等资源错配的问题,其原因是项目配置缺少科学依据、协商流程以及运营统筹,因此昭觉县政府要从“项目前一中一后”的全链条着手,提高资源配置的系统性和效益性,实施“前期协商+多方论证”的机制。在项目前期,设立三个环节,先是村级民意征集环节,凭借“村民议事会”或者走访调查的方式收集村庄的实际需求,接着是专业技术评估环节,由第三方机构或者规划设计单位评估项目的可行性,最后是跨部门联合审核环节,项目需要经过联席会议统一审核备案,如此可避免脱离实际情况,提升项目的精准性以及公众满意度^[16]。构建“项目+运维”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要同时制定设施后期的运行维护方案,覆盖明确谁负责日常运营、资金怎样持续保障、故障如何快速响应等内容,对于难以由政府独立运维的项目,比如偏远乡镇的垃圾清运项目,可凭借“政府+合作社+村集体”三方机制进行外包运行。优化土地与空间资源统筹机制,建立项目落地“用地审批绿色通道”机制,提高土地使用效率,防止新增项目出现重复用地、冲突开发的情况^[17]。

¹ 数据来源昭觉县发改局 2023 年村级治理满意度访谈内部资料

4.3 构建多元协作格局，激发社会共治活力

昭觉县目前所采用的治理模式对财政以及行政推动存在着高度的依赖情况，村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如此一来很难构建起有可持续性的治理生态，可以尝试从以下一些方面入手，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朝着制度化以及常态化的方向进行建设。

促使村级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制度化。凭借现有的“村民议事会”以及“五户联保”等机制，促使以下方面达成制度化：其一，村庄每隔半年举行一次“公共事务协商大会”，针对村庄建设以及治理重点展开民众协商，其二，村级设置“环境信息公开栏”，用以公示项目预算、建设内容以及责任单位，其三，构建村民代表监督机制，针对项目的推进状况实施动态监督反馈，强化民众对于治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18]。

着手构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参与激励机制。制定《昭觉县鼓励企业参与乡村治理若干意见》，对于参与人居环境提升、资源治理项目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信用加分等方面政策，鼓励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承接村级环境教育、垃圾分类培训、生态监测等相关项目，推动县域企业与村级治理形成“结对共建机制”，构建本地企业反哺机制。

积极促进协同治理能力建设以及文化认同重建工作。有计划地安排乡镇干部、村组长以及群众骨干等人员参与“协同治理能力培训班”，以此提升他们在统筹协调、资源整合、群众动员等治理能力，同时结合彝族文化里的“合寨共建”“议事传统”等内容，塑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文化认同基础，形成治理共同体意识。

表 3 构建昭觉县协同治理路径的总体逻辑

问题对应	协同治理路径	实施主体	理论支撑要素
治理机制碎片化	联席会议+数字平台+绩效联动	县政府及职能部门	制度协同、信息共享
项目脱节与资源浪费	多方协商+运维联动+空间统筹	政府+专家+第三方	协商决策、行动协调
多元参与机制薄弱	村民议事+企业激励+能力建设	村集体+企业+群众	共同参与、互信网络

借助上述路径设计，回应了昭觉县治理实践里较为突出的短板之处，并且把协同治理理论当中的核心机制给予具体化以及地方化，为民族县域治理供给了可推广的路径模板。

结语

本文将四川省昭觉县当作研究对象，依据协同治理理论，全面剖析了其在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协同发展的路径，经过实地调研和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发现昭觉县在人居环境整治以及资源治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基础设施渐渐完善，部分生态治理项目有了初步成效，然而整体治理依旧存在制度碎片化、项目资源错配、公众和企业参与度低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缺少协同治理体系，政府各部门协作欠佳，信息不通畅，项目规划与实际需求不符，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治理合力欠缺，影响了整体成效的可持续性，协同治理理论可为县域复杂治理提供有效的路径，借助搭建“组织统筹—资源整合—多元协作”的治理框架，提出联席会议制度、项目运维联动、公众参与平台等对策，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本项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在未来开展研究工作时，可以拓展到不同类型的县域展开横向对比，并且结合量化模型来对协同机制评估给予优化，以此来丰富协同治理理论在县域环境治理方面的应用深度，达成人居环境与资源治理的协同发展，乃是昭觉县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同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16)[2025-05-05]
-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十四五”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R].北京: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2021
- [3] 昭觉县统计局昭觉县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昭觉:昭觉县人民政府,2023
- [4] 刘先省,李虹.中国人居环境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20

- [5]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 张可云. 协同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新范式 [J]. *经济地理*, 2015, 35(9): 1-6
- [7]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 18(4): 543-571
- [8] Emerson K, Nabatchi T, Balogh 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2, 22(1): 1-29
- [9] 童星, 施建军. 协同治理视角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演化 [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7): 18-24
- [10] 昭觉县水利局. 昭觉县“十四五”水资源保障规划 [R]. 昭觉: 昭觉县人民政府, 2021
- [11] 昭觉县发展改革局. 昭觉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评估与问题台账汇编 [R]. 昭觉: 昭觉县发改局, 2023
- [12] 昭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昭觉县人居环境建设项目运行效果评估报告 [R]. 昭觉: 昭觉县住建局, 2023
- [13] 昭觉县农业农村局. 昭觉县村庄清洁行动第三方绩效评估报告 [R]. 昭觉: 昭觉县农办, 2023
- [14] Emerson K, Nabatchi 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mes* [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5] 李文龙, 王洪涛. 数字技术在县域乡村治理协同中的应用研究 [J]. *农业经济*, 2022(11): 45-48
- [16] 罗灿, 李晶.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路径优化研究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1, 42(8): 200-207
- [17] 昭觉县自然资源局. 昭觉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成果汇编 [R]. 昭觉: 昭觉县自然资源局, 2022
- [18] 张志学, 吴涛.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公共事务多元参与机制构建 [J]. *行政管理改革*, 2021(6): 83-89
- [19] Ghosh B, Farouque Z M, Gupta D S. Human settlement suitability in major cities of Bangladesh: A remote sensing-base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2025, 156(5): 248-248
- [20] Faruk A A, Yassine B, Shajara U, et al. Natural resources governance and conflict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J]. *Resources Policy*, 2023, 85(PA)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s and Resource Governance in Zhaojue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Yueqi Zuoti¹, Jing Deng¹, Peng Wang¹, Lu Yise¹, Li Yuan^{1*}

¹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ongoing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nhancing county-level governance capacity in ethnic regions has become essential for achieving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ojue County, a representative ethnic minority area in Sichuan Province, has made preliminary progress in improving living environments and managing resources. However, field research reveals persistent issues such as fragmented governance mechanisms, low efficienc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Guided b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study adopts a mixed approach combining fieldwork and policy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current governance status of Zhaojue County, identify root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propose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thway centered on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multi-actor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al linkage mechanisms,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projects, and stimulating social collaboration are key to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human settlements and resource governance.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Zhaojue County.

Keywords: Zhaojue County; Human Settlements; Resource Governa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边缘治理的制度挑战与路径重构：基于中国四川盐源县市场监管问题的质性研究

李超¹ 王棚¹ 邓景¹ 吕你色¹ 李渊^{1,*}

(1.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 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背景下, 制度透明、权责明确与公平治理成为边缘地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文以中国四川省盐源县为研究对象, 运用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方法, 聚焦民族地区在市场监管实践中面临的深层困境。研究发现, 盐源县当前存在监管人手不足、设施基础薄弱、机制碎片化与信用体系滞后等现象, 其背后是监管队伍结构失衡、财政投入有限、跨部门协同不畅及公众参与机制薄弱等制度性障碍。针对以上问题, 研究提出: 一是强化基层队伍建设, 提升制度执行力; 二是加大财政与技术支持, 夯实监管基础; 三是构建高效协同机制, 推动责任整合; 四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激发公众共治意识。研究呼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构建和平、包容、公正的社会制度与有效治理”的核心诉求, 旨在为边缘民族地区公共治理体系建设提供实践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市场监管; 公共治理; 盐源县; 智慧监管; 信用监管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86

一、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市场监管在保障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对推进我国市场监管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 提出构建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 全面提高市场综合监管效能^[1]。国家层面出台了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政策文件, 指出“创新和完善市场监管, 推进市场监管现代化, 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客观需要。”^[2]。

盐源县作为四川西南部典型民族地区, 同时也是欠发达县域, 地理区位、资源结构、产业类型都有自身特点。随着快速发展的生态旅游、电商平台等新业态, 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变得逐渐复杂, 市场监管任务也变得更加繁杂, 提高治理要求成了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盐源县市场监管中存在人员短缺、设施条件差、信用体系不健全、部门间协调不顺畅等问题, 传统的监管模式难以适应新兴的市场监管形态, 产生的矛盾逐渐增大。现今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分析, 不仅可以增强监管的准确性和及时性, 还可以为地方市场监管能力的提升提供新的路径^[3]。因此, 深入研究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不仅符合实际需要, 而且对推进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4]。

1.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结合盐源县市场监管的实际运行情况, 通过调查分析, 找出制约市场监管有效性的关键问题, 并提出

作者简介: 李超(2002—), 男, 四川西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1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王棚(2005—), 女, 四川简阳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邓景(2005—), 女, 四川达州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吕你色(2002—), 男, 四川木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李渊(1983—), 男, 宁夏银川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创新管理, 组织及个人行为研究

通讯作者: 李渊

切实可行的治理改进方案, 研究结果可以为盐源县政府和市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参考, 有助于提升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等, 还可以提高公众对市场秩序的满意度和安全感。研究中提出的"多方协作+智能赋能"^[5]的监管路径, 还可以为其他类似民族地区或基层县开展市场治理工作提供借鉴。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围绕市场监管各领域展开深入研究, 为地方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郝果^①研究发现, 基层检验检测机构在质量基础设施、人才建设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需通过完善激励机制、明确发展定位加以改善;林青荣^②着重探讨执法队伍建设与法规体系完善对提升基层执法能力的关键作用;袁芬^③指出智慧监管推进过程中存在机制性障碍, 亟待系统性优化;廖荷田^④以眉山市为例, 揭示网络交易市场监管机制的缺失, 建议构建"大监管"体制;冯春雁^⑤等提出, 市场监管应秉持"放管结合"理念, 在强化监管效能的同时,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以实现监管力度与市场活力的动态平衡。国内研究主要围绕机制建设、法律规范完善、智慧监管技术应用、基层监管能力提升等方面展开研究, 为盐源县优化市场监管体系提供多方面的研究基础和政策参考。

1.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市场监管研究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理论体系与实践经验。OzdemirS^⑥指出数据驱动决策、智能服务、个性化管理等, 可应用于市场的"智慧监管";ShaoB^⑦等注重通过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方式, 提升监管的效率, 他的经验可为县域市场监管主体多元化协同提供借鉴;WangS^⑧等构建了统一的数字化市场监管平台, 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协同监管, 强调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保障数据安全与监管透明, 这对我国县域市场监管数字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国外研究围绕技术赋能、跨国协同等方面展开, 重点在于打造风险感知敏锐、适应性强、技术特征显著的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 深入分析盐源县市场监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 系统的梳理国内外市场监管的理论成果和政策文件, 重点研究《凉山州市场调控"十四五"规划》、《盐源县营商环境报告》等政策文本。本文结合了"民族地区市场监管"、"基层执法困境"等关键词, 分析了相关学术文献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典型案列, 将案列与实际进行比较参考, 采用了现场调研法进行实地调研, 对食品安全监管、旅游市场秩序、电子商务新业态等领域进行重点关注, 通过参与式观察、部门走访、企业和商户访谈等方式, 收集第一手资料和数据, 明确政策执行中的重点难题和监管方面存在的缺口, 确保了研究提出的问题和对策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

1.4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4.1 概念界定

市场监管:指政府部门依据法律法规, 对市场主体及经营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以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和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行政行为总和。内容包括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商品和服务质量监督、价格监管、竞争

① 郝果,李璐,杨小娜.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检验检测机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实验室检测,2024,2(04):116-120.

② 林青荣.浅议当前时期基层市场监管执法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对策[N].山西科技报,2023-10-12(B07).

③ 袁芬.关于市场监管部门推进智慧监管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意见建议的思考[C].2023年度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理论与实践研究优秀成果.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督管理处,2023:244-251.

④ 廖荷田.眉山市网络交易市场监管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四川大学,2023.

⑤ 冯春雁,曾滢虹.浅析新时期市场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0,(04):49-51.

⑥ Ozdemir S .Unveiling environmental resilience: A data-driven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J].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24,108107607-107607.

⑦ Shao B .Reflections on the Use of Big Data Analysi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Grassroots Supervision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ustoms -- Research on Supervision Scenario Innovation in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J].Forum 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2024,2(2):

⑧ Wang S ,Yang Y ,Wu J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digital platform monopoly and market super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dynamics[C].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2023:

行为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均属于市场监管内容。本研究中市场监管,指盐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下属机构于当地开展的综合性监管工作。

智慧监管:指数字政府环境下,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增强风险感知能力,提高监管响应效率,提升事中事后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提高监管效能,实现精准、高效、透明的现代市场监管模式。智慧监管的核心是技术应用,改变传统的监管模式,推动治理从以经验为主导转变为数据驱动、平台协作、智能处置。

信用监管:指监管机构基于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实施差异化、动态化监管,通过信用信息归集、评估与共享,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体系,提升监管效率和市场运行质量。

公共治理:指在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制度安排等方式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与实施的过程。公共治理具有协同合作、组织网络化、机制制度化、责任共担等特点。

1.4.2 理论基础

公共治理理论(Public Governance Theory)源于对传统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反思,强调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同与合作机制。该理论核心在于推动治理权力从政府向社会广泛延伸,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合作治理”的新型治理结构。

兰俪俪璇等主张推进法律政策统筹协调、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执法发展、完善司法协同治理模式,李珍珍等强调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共同体、协同共建的合作共同体、全民受益的利益共同体。理论适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市场监管中存在的“能力不足”“协同不畅”“社会参与薄弱”等问题,为盐源县市场监管治理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逻辑。

二、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现状

2.1 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的演进历程

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随着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发生变化。早期,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导市场监管,职能大多集中在市场主体登记和基础执法,体系比较单一,执法更多依靠传统经验,监管重心放在维护商业秩序。2014年起,随着国家机构改革推动下,盐源县整合质监、食药监、物价等部门职能,构建“大市场、大监管”综合格局,监管范围扩展到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价格调控、网络交易等领域。近年来,盐源县着力推进市场监管规范化、法治化、信息化等,通过探索智慧监管模式提升监管效能和服务质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打造有利环境。

2.2 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的运行现状

盐源县市场监管体系完成了机构整合和功能拓展,但也面临着运行压力和挑战。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市场主体同时也大幅增加,2024年,新增主体2466户,其中个体工商户转企72户,监管的对象结构复杂,商户分布广泛,对监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监管人员和技术设施的没有及时更新,乡镇市场监管机构存在人员短缺、专业能力不足、设备老化等问题,也制约了监管效率的提高。一些基层单位配备了基本的执法装置,但智能监管平台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数据更新和共享机制,难以实现动态监管和精准执法,技术还相对落后;同时跨部门协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信息的共享存在缺失,责任过多重叠也会影响执法效率,在食品安全、电子商务、旅游消费等新兴领域,监管体系没有与实际需求相结合,部门之间存在协调不充分的现象。部分企业法治信用意识淡薄,没有良好的自律机制,出现频繁的违规行为,盐源县还缺乏统一的信用信息整合平台,奖惩制度还不全面,没有形成市场监管与社会监督的协同作用,急需推进企业诚信体系的建设。

2.3 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的主要职能

盐源县市场监管部门在“大市场、大监管”体制下履行多项职能。承担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变更和退出管理,确保市场主体合法经营有序。开展商品服务质量监测抽检,聚焦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保障公共安全和消费者权益。实施价格监管,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推进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归集应用信用信息,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加强行政执法规范,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制度,提升执法透明度。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有制度基础和实践经验,不过人员配备、设施条件、部门协同和社会参与等方面还需改进。

三、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盐源县推进市场监管工作,在“大市监”体制整合、智慧监管探索、基层监管能力提升等方面展开实践。

实际运行中存在现实困境,需重点关注解决。主要问题有以下四方面表现:

3.1 监管人员配备不足,专业能力有待提升

盐源县市场主体数量持续增长,市场监管工作压力显著增大,但监管人员配备未同步增加,基层监管力量薄弱问题突出。在卫城镇仅有5名专职市场监管人员,却需监管超800家市场主体,同时兼顾安全生产等多项任务,导致食品流通、特种设备巡查频次不足;另外,梅雨镇还抽调文化站兼职人员参与监管过程中的辅助人员,在超市商品抽检时,因业务不熟,对数据的记录出现错误,导致抽检结果的失去了真实性^①。总体来说盐源县监管队伍专业水平整体不高,部分人员缺少食品安全、电子商务、价格监管等方面的系统知识,平时培训少、学习资料也有限,遇到新兴市场形式和复杂监管任务^②,既存在知识空白,执法也不够规范,导致执法效果不佳,公众对监管工作信任度降低。

3.2 基础设施薄弱,智慧监管推进缓慢

盐源县存在基础设施较差和智慧监管落后等方面的问题。在白乌镇市场监管所,现有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多为2015年配置,因缺乏维护经费,3台农药残留检测仪中2台已无法正常使用,面对乡镇集市农产品抽检需求,只能依赖人工感官判断,监管设备的老化,导致监管过程中工作效率变低。智慧监管平台未覆盖全县,目前全县仅覆盖6个中心乡镇,泸沽湖镇因未接入平台,商户信息仍依靠纸质台账登记,这导致数据采集、汇总、分析能力不足,难以满足风险预警、动态监控等现代监管需求,阻碍市场监管科学化、信息化发展^②。

3.3 协同机制不健全,监管效能未充分释放

盐源县市场监管包含多领域多部门,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尚未健全。《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登记注册、行政审批、行业主管相互衔接的协同监管机制。”但盐源县未出台配套细则,部门协作仍依赖临时性会议协调,效率低下。食品药品安全、旅游市场秩序、电商平台监管等多部门共管领域,虽然有职责划分,但协同机制并未建设,处理流程不顺畅,影响了监管统一性和时效性。市监局负责网络交易执法,但涉及虚假广告(市监局)、支付纠纷(金融办)、数据安全(网信办)时,各部门各自为政,未建立联合约谈、信息共享等机制。2023年盐源县XX农贸市场抽检发现农药超标蔬菜,但因市监局与农业农村局检测标准不统一,导致处置延迟3天,可以看出各部门间任然存在信息壁垒,数据共享不够全面,沟通问题还不流畅,造成了重复检查与监管盲区等情况,难以凝聚监管合力,整体监管效率不高。

3.4 市场主体自律性不强,信用监管执行乏力

部分企业与个体经营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实施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不正当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盐源县以农业,个体工商业为主,市场主体数量13250家,国有、集体及其控股企业345家,私营企业1680家,个体工商户1115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125家,市场中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80%,大多存在规模小、文化水平有限、管理粗放的特点。例如,农贸市场摊贩、乡镇小商铺等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明码标价等对法规缺少认识,存在台账记录不全、过期商品未及时下架等问题,部分企业为追求短期利益,出现虚假宣传(如特产销售)、计量作弊(如农产品收购)等行为,影响了“盐源苹果”“花椒”等地方特色产品的良好形象;2022年全县纳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仅占市场主体总量的1.4%,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反映出盐源县的信用筛查覆盖面的不足,尽管已建立“失信联合惩戒备忘录”,但实际执行中部门协同性较差,例如,某企业因食品安全问题被市监局处罚后,仍能正常参与政府采购投标,反映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⁹的信用约束未落地。

四、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中问题产生的原因

市场监管的关键部分是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其工作成果既展现政府履职能力,同时也体现多元主体协作、资源整合程度及制度建设水平。根据公共治理理论,盐源县市场监管现存问题主要在于治理资源短缺、制度设计缺陷、主体协同不畅、社会参与不足等,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展开分析。

4.1 地域及编制限制,培训教育落后

盐源县市场监管系统较为突出的问题是人才短缺,专业结构失衡。盐源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地形以山地、

① 引自盐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内部资料

② 引自盐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内部资料

高原为主,山高谷深,地势起伏大,这种地形使得交通建设难度大,对外联系相对不便,由于受地理环境影响,盐源县在吸引高素质监管人才方面缺乏竞争力,同时在编制限制下,市场监管岗位空缺难以填补,现有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部分基层所仅1-2名执法人员,却要承担食品、药品、价格、广告等多个领域监管任务,呈现出"人少事多"的状况,新技术、新法规系统培训和继续教育等较为落后,面对网络交易、智慧监管等新兴领域也存在欠缺[11],影响了提升基层治理能效。从公共治理角度,能力资源是治理体系良好运行的基础,盐源县市场监管人才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整体监管质量的关键因素。

4.2 财政投入有限,技术装备与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盐源县作为欠发达的县区,财政预算上有限,市场监管在财政预算中占比较低。有限的资金只能保障市场监管基本运转和办公开支,在设施设备专项投入上面严重缺乏。部分乡镇市场监管所还在使用十几年前的老旧检测设备,这些设备检测效率低下、准确性差,由于缺少维护资金和专业技术人员,部分设备甚至报废。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进度缓慢,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部分区域无法实现执法数据实时上传和业务系统协同²,限制了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监管现场执法时,移动终端、执法记录仪等便携设备不足,增加执法成本,也影响监管透明度和规范性。根据公共治理理论,治理工具现代化是治理转型的前提,盐源县当前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市场治理需求。

4.3 专业监管与综合监管的冲突,数据壁垒

在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中,专业监管与综合监管冲突及数据壁垒严重阻碍了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行。在监管职责上,不同部门常因界限不明产生矛盾。例如在2023年4月省经信厅对盐源县食盐市场督查时,发现某某超市存在食盐销售不合规问题,要求县经济信息和科学技术局与市场监管局加强联合检查^①。但在实际落实中,由于两部门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对违规行为的后续监管出现推诿现象,导致整改落实效率低下,影响市场规范。同时,还存在监管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在食品安全领域,农业部门对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标准,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食品成品的检测标准存在差异,使得综合监管难以统一执法,在对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流程监管时,容易出现监管漏洞;数据壁垒也成为盐源县市场监管协同的一大难题。比如在处理某电商企业涉嫌销售假冒盐源苹果的案件中,市场监管部门需结合税务数据判断其销售规模,联合农业部门追溯苹果产地信息,却因数据无法实时共享,需经过繁琐流程申请协调,等数据到手时,该企业早已转移关键证据,错失最佳调查时机,导致监管效能大打折扣,无法对跨区域、跨行业的违法违规行形成有效打击。

4.4 社会参与机制薄弱,企业自律与信用监管体系缺失

盐源县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存在显著短板。目前,各部门信用信息系统相对独立,缺乏统一的信息归集与查询入口,市场监管、税务、金融等部门掌握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数据处于分散存储状态,无法实现跨部门、跨领域的有效整合与共享,形成信息孤岛。信用评价体系也呈现零散化特征,不同部门依据各自标准进行信用评价,评价结果缺乏通用性和权威性。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合力,对失信行为的认定、处罚标准不统一,执行力度较弱,难以对失信主体形成有效约束。同时,守信激励措施严重缺失,对守信主体缺乏实质性的政策优惠和社会认可,难以激发市场主体主动守信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健康发展^[14],造成了企业维护信用的内在动力不足。公共治理理论认为社会协同参与是治理合法性和效能的重要保障,而盐源县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等第三方参与监管程度低,市场主体缺少有效的行业自律平台和标准指引,盐源县市场治理尚未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企业自治"的良性互动模式^[15],急需加强建设信用治理和公众监督体系。

五、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的对策建议

针对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中存在的监管力量薄弱、设施技术滞后、协同机制缺失、企业自律意识淡薄等问题,亟需在新时代公共治理理念指引下,推动市场监管体系现代化改革。应立足"多元参与、制度完善、资源统筹、协同高效"的治理理念,统筹推进治理能力、技术工具、机制建设与社会共治,构建符合本地实际的市场监管新格局。

5.1 加强人才引进与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市场监管成效取决于监管队伍能力素质,盐源县需要解决人才引进难、留用难问题,打造专业适配、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基层市场监管人才队伍,制定本土化人才引进机制,县级政府联合组织、人社部门,设立基层市场监管专项编制,重点引进食品安全、电子商务、法律、信息技术专业人才,采用"定向培养+基层服务"模式,与省内高校合作建立人才输送渠道,构建常态化培训体系。依据岗位需求制定分级分类年度培训计划,涵盖行政

执法、市场信用评价、网络交易监管、法规更新等内容,推动执法从经验主导转向依法规范;最后优化考核激励制度,改革绩效考核体系,将任务完成质量、群众满意度、案件处理效率等纳入量化指标,对表现优异者在评优评先、职级晋升中予以倾斜,提升队伍凝聚力和岗位吸引力。

5.2 加大财政投入与技术支持,完善监管设施体系

现代市场监管体系依赖健全的设施装备和技术支撑。盐源县应将监管基础能力建设纳入财政规划,提升监管硬件、信息化平台和数据治理水平。将市场监管设备的更新和智慧平台的建设纳入县财政"十四五"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保障食品、药品抽检设备、执法记录仪、远程视频监控等关键设备的采购、更新和维护;同时整合工商登记、投诉举报、抽查执法等业务系统,打造全县统一的"市场主体监管信息系统",实现企业从注册、日常监管到信用评定全流程数字化、一体化管理,增强监管实时性与精准度;设立专门技术岗位,负责设备日常运行维护和操作培训,避免因技术操作问题导致数据误差和设备闲置,保证监管设备实用、易用、常用。

5.3 推动协同机制建设,提升监管综合效能

市场监管涵盖多部门、多领域、多层次,需要构建高效协同机制,提升治理系统整体效能。建立县政府牵头的市场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召开协调会议,明确食药、商务、农业、公安等部门市场监管职责边界,解决多头执法、职责交叉的问题,形成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监管体系;推进信息互通共享,搭建县级市场监管数据共享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实现执法、信用、抽查等数据互联互通,依托"互联网+监管",做到数据一次录入、多个部门共享信息,提高行政资源利用效率;基层执法响应水平,构建"网格化监管+片区协同"机制,将监管任务细化融入乡镇监管所和执法人员日常巡查,对高频风险领域落实每日覆盖、每周走访、每月排查,增强监管时效性和敏感度。

5.4 完善信用治理体系,推动企业守信共治

良好市场信用环境关乎公平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障,盐源县需要建立"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市场信用治理机制,推动企业自律与社会共同治理。构建统一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平台,归集整合企业注册、年报、执法检查、投诉举报、处罚记录等数据,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实现信用数据的联动;实施差异化监管机制,根据企业信用等级从而实现分类监管,降低守信企业的检查频次、简化办事流程,重点监管失信企业,实施高频检查与联合惩戒;推动行业自律与第三方监督,支持重点行业协会制定标准和自律公约,开展创建信用、评选示范单位等活动,引导消费者协会、社区组织参与市场监督,设立举报平台,拓宽公众参与途径;加强信用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月、专题讲座、案例分析等方式,提升市场主体信用意识和公众维权意识,营造全社会诚信守规、履行责任的良好氛围。

结语

市场监管的作用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等。本文通过研究盐源县市场监管工作的现状、问题及成因,从队伍建设、技术支持、协同机制完善及信用治理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这些建议结合了盐源县作为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回应了当前基层市场监管存在的普遍性挑战,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可为民族地区县级市场监管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但由于研究的条件受限,对某些问题的探讨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化。未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数字政府的建设,盐源县市场监管局应把握机遇,在优化监管体系的同时,探索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治理模式,以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梦雨.国务院:构建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信用监管长效机制[J].中国信用,2022,(02):52.
- [2] 严欣哲,朱永军,葛琳琳.基于"互联网+"的智慧监管机制研究-以椒江区"药省心"药事服务应用平台为例[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24,(03):72-77.
- [3] 陈润羊.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内涵、特性与限度辨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3):28-36.
- [4] 石淼淼.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区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墙报交流(体育管理分会).宁波大学体育学院,2023:406-408.
- [5]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课题组.健全市场监管领域新型监管机制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1,(07):45-48.
- [6] 李瑞瑞.湖南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动态监控与预警研究[D].湖南大学,2021.

- [7] 郝利荣,王红伟,王震华,等.基于主动防御的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监控预警系统设计[J].铁路计算机应用,2024,33(05):63-67.
- [8] 国务院办公厅,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EB/OL],(2015),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967211.htm.
- [9] 云璐.失信行政惩戒相对人权利保障研究[D].内蒙古大学,2024.
- [10] 揭光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视域下社区教育资源优化整合实现路径探究[J].福建开放大学学报,2024,(02):32-35.
- [11] 于雯彬."三合一"背景下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策略研究[D].南京理工大学,2023.
- [12] 毕敏娜.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推进信息网络新型基础设施完善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工程技术标准[J].工程建设标准化,2023,(10):84-88.
- [13] 尹小剑,李世财,李双双,等.营商环境优化背景下赣州市数据壁垒破解的对策研究[J].科技广场,2023,(05):41-48.
- [14] 谢勇,李五志.便利与约束: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制的功能定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160-169.
- [15] 姚雨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下应急物资协同供应策略研究[D].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24.

A Study on the Issu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arket Regulation in Yanyuan County,Sichuan Province

Li Chao¹, Wang Peng¹, Deng Jing¹, Lv Nise¹, Li yuan^{1*}

¹ College of Tourism & Urban-Rural Planning,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 Market regulation is a fundamental means of maintaining market order and ensuring fair and competitive conditions. It also serves as a critical line of defense for safeguarding consumer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well as promoting public welfare. This paper takes the market regulation work in Yanyuan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It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gulatory personnel, weak infrastructure, an incomplete regulatory mechanism, and a lagging credit system. These issues stem from an unreasonable structure of regulatory talent, limited fiscal investment, a lack of 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weak mechanisms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Yanyuan County.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first, strengthen talent recruitment and team building to enhance grassroo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second, increase fiscal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support to improve regulatory infrastructure systems; thir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o enhance overall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fourth, improve the credit governance system to promote corporate integrity and co-governance. These proposals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path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Yanyuan County'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Keywords: Market regulation; Public governance; Yanyuan County; Smart regulation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四川德昌县政府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行为探究

丰雷¹ 邓景¹ 王棚¹ 吕你色¹ 李渊^{1*}

(1.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 城乡社区融合治理是实现“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关键路径。然而在民族地区, 此类治理面临制度整合与文化适应等多重挑战。本文以四川省德昌县为例, 采用田野访谈、参与观察、文献分析等方法, 并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框架下对地方政府治理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当地城乡社区融合治理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资源配置不均衡、技术治理存在“移植化”倾向以及文化整合不足等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加强基层协商机制建设、优化资源供给结构、推动技术治理本土化、融合民族传统治理智慧等对策建议。本研究旨在通过推进民族地区城乡社区融合治理实践, 提升社区韧性与治理可持续性。

关键词: 城乡社区治理; 多中心治理; 政府行为; 民族地区; 德昌县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95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推进, 基层治理的抓手逐渐下沉到城乡社区治理层面, 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探索的有益切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 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十四五”国家城乡社区服务体系规划》中提出要加强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健全社区公共服务制度, 推动社区治理规范化、专业化、协同化发展^[2]。

四川作为我国西部地区最为贫困、民族最为集中的省份之一, 城乡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问题诸多。尤其是在凉山州等地, 资源禀赋、治理水平、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城乡社区治理结构分化、供需失衡、群众参与不足等问题仍存在^[3]。如何在保证国家制度统一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成为西部民族地区治理困境破解的必然要求。

德昌县作为四川民族地区的县份之一, 其城乡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实践性特征较为明显。一方面, 城乡社区治理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吸纳、资源下派、技术赋能等渠道推进城乡社区治理; 另一方面, 非政府组织介入不足、村民主位制不健全、治理技术与民族文化衔接不紧密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1.1.2 研究意义

本文以德昌县为参考, 呈现出城乡社区治理缺乏协同性、失衡性、技术悬浮性、文化冲突性等社区治理问题。基于问题, 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成果期望为地方政府优化社区治理路径, 改进社区资源配置方式, 推进社区治理方式本土化, 在西部民族地区为实现民族大团结、实现民族大治理、为基层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者简介: 丰雷 (2002—), 男, 四川西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1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邓景 (2005—), 女, 四川达州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王棚 (2005—), 女, 四川简阳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吕你色 (2002—), 男, 四川木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李渊 (1983—), 男, 宁夏银川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创新管理、组织及个人行为研究

通讯作者: 李渊

1.2.1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成为学界重点关注议题。已有研究从制度建设、服务协同与居民参与等维度提出诸多理论与实践探索。唐晓琦、汪华²(2022)强调要构建多元参与的社区治理体系,推动社区协同共治;兰璐、王虎³(2025)则指出,基层治理应从管理型向协商型、参与型转变。王兴伦⁴(2005)结合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理解,联系中国社区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多中心是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制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孔繁斌⁵(2008)在介绍和认识多中心治理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编写的《公共性的再生产中指出: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规则、场域、角色”为主要观测点,建构了一个多中心治理的系统分析框架。

但目前针对民族地区县级政府在城乡社区治理中行为特征、制度选择与传统机制整合等问题的实证研究仍显不足。本文以德昌县为例,寄希望为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建设提供经验参考。

1.2.2 国外研究现状

罗西瑙(James Rosenau)⁶(1995)的《没有政府的治理》的文章中做出了正式界定。他指出:治理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管理活动。这些管理活动未必获得正式授权,主体也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却能有效发挥作用。

Ostrom(1961)等多位学者认为,分权、多中心的治理环境比集权式的治理环境更加有效、更有弹性。McGinnis(2011)也指出,包容性的制度设计、开放信息交流平台和信任是多中心治理环境良好运转的必要条件。

对于城乡社区治理问题,国外学者主要研究在网络治理中如何实现政府、非营利组织与居民的协作共治问题。Healey(2006)认为,社区规划不能局限于专业主义官僚制规划,而是公众参与以及地方本土知识集聚的协作共治。此外,多中心治理模式对于多族群、中心性较弱的国家抑或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效的问题,也有较多的研究,印度、南非等国家的研究认为传统的组织信任、语言信任与制度信任对多中心治理模式成效有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国外多中心治理的研究为我们构建多主体合作关系的框架提供了整体性,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县级政府在治理中的角色扮演,在传统文化建设等方面缺乏微观上的针对性。

1.3 研究方法

1.3.1 访谈法

对德昌县部分城乡社区进行实地访谈法,以获取深入、细致和真实的数据。这种方法强调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深入了解其日常生活、行为、信仰、文化等方面,从而揭示德昌县在城乡社区治理所存在的问题。访谈记录见附录。

1.3.2 文献分析法

通过中国知网搜集并阅读学术界内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相关文献以及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运用。同时收集关于德昌县社区治理的文献资料并进行研究,对德昌县社区治理中的不足提出建议。

1.4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1.4.1 概念界定

城乡社区治理:指以城乡社区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社会秩序为对象,城乡社区内居民、社会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城乡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是既包括既有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及制度的执行,也包括居民参与、城乡社区公共资源的配置等在内的社会机制、社会合作。需合理分配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健全党建引领的动员机制^[4]。

政府行为:政府治理行为,本文的政府治理行为是指县以上的城乡社区政府为推动城乡社区治理而制定的、组织城乡社区治理、协调城乡社区治理、动员城乡社区治理、实施城乡社区治理、组织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等政策、资金、组织、人员、协调、技术的行为方式与具体路径,是代表多中心治理的领导力量与制度选择^[5]。

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是指民族人口聚集和民族文化多样性共存的地区,在国家制度共性、民族文化差异下开展的基层治理实践。民族地区社区治理需要同时兼顾国家制度共性、民族文化差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多元文化下的展开^[6]。

²唐晓琦,汪华.找回社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关键议题[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24(04):87-95.

³兰璐,王虎.抱团发展连片示范[N].十堰日报,2025-05-21(004).

⁴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2):96-100.

⁵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88-90.

⁶[美]詹姆斯·罗西瑙,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7.

1.4.2 理论基础

多中心治理理论 (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及其研究团队提出, 强调公共事务管理应由多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各自发挥功能, 而非由单一中心控制^[7]。其核心理念包括权力多元、制度嵌套、协同合作与信息共享。它强调由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制束治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具体表现为一是空间上的多中心, 即打破政府和市场二分的传统格局, 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多维格局; 二是管理主体的多中心; 不管是私人机构还是公共机构, 只要它们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 都可能成为各个层面上的管理主体和权力中心, 多中心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多个生产者, 公共事务的多个处理主体^[8]。

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 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等不同主体通过制度安排与协商机制, 共同承担治理职责。Ostrom 指出, 多中心结构具有更强的适应性、灵活性与问题响应能力, 特别适用于解决复杂、动态、地域差异性大的公共问题^[9]。

在本文中, 多中心治理理论不仅是分析框架, 更是解释德昌县城乡社区治理中政府如何平衡主导与协同、统一与差异的核心理论依据。

2 德昌县政府城乡社区治理现状

2.1 德昌县基本情况

德昌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地处安宁河谷腹地古称“香城”“凤凰城”“燕子城”, 幅员面积 2284 平方公里, 辖 12 个乡镇 (街道)、73 个村 (社区), 有汉、彝、傈僳等 28 个民族, 户籍人口 22.25 万人, 其中: 少数民族占 29.2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79 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2.1 亿元^[10]。

随着国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德昌县政府在城乡资源结构性差异背景下, 政府积极发挥主导作用, 探索通过政策整合、资源下沉、技术赋能和组织动员等方式提升治理效能, 初步构建起覆盖广泛、条块协同、响应高效的城乡社区治理新格局。

2.2 制度整合与政策协同持续深化

德昌县政府十分重视治理制度的设计谋划, 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城乡社区协同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行动计划 (2022-2025 年)>的通知》, 构建城乡社区治理“统筹规划—分级负责—齐头并进”的基本架构。

把民政、住建、农业、卫生等 12 个部门的资源打通, 变成“1+3+N”治理机制, “1”是领导小组, “3”是社区治理、公共服务、智慧平台 3 个领域的政策包, “N”是具体的细则 23 条, 自上而下一体推进、就地就近灵活治理的方案, 就是这套制度的安排⁷。

如凤凰社区在社区制度框架内, 构建网格责任制 + 事件闭环制, 包片包区 9 大网格、9 个网格员, 全链条管人、管事、管物, 疫情期间排查准确定位重点人群 2700 余人, 形成闭环回应。

2.3 资源统筹与公共服务逐步均衡

在投入方面, 德昌县政府财政导向、设立专项资金引导资源下沉、乡村下沉、弱势下沉。2020—2023 年, 全县已投入城乡治理资金 3.8 亿元, 其中, 乡村社区财政投入占比 65%, “乡村治理专项资金”连续 3 年投入上亿元, 对村卫生室提升改造、自来水工程、道路硬化、文化广场等进行财政投入⁸。

统筹小区治理力量住建、发改、财政等部门, 统筹资金 6240 万元, 申措债券 3600 万元, 完成了 14 个老旧小区道路、水、电、污水管网等硬件改造; 政法、公安等部门, 建设智慧平安小区 14 个, 服务居民 644 万户。持续深化社区亲民化改造, 先后投入专项资金 170 万元, 建成“一站受理”党群服务中心, 创设社区书屋、心理抚慰室等 10 余个功能室, 提供日间照料、幼儿托管等服务; 定期走访孤寡老人, 实行民生事项代办、实物代购, 累计发放便民服务“指南卡”2000 余张, 开展上门服务 60 余次⁹。

2.4 数字治理平台建设逐步完善

面对城乡治理需求多样化、事务复杂化趋势, 德昌县着力推动“科技赋能、数字提效”战略, 依托政法委牵头搭建“德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 整合“雪亮工程”“综治通”“智慧党建”等系统, 实现数据采集—流转—决策—

⁷资料来源精神文明报 https://www.jsymb.cn/article/6813/36413.html?_refluxos=a10

⁸资料来源凉山日报 https://www.jsymb.cn/article/6813/36413.html?_refluxos=a10

⁹资料来源凉山日报 https://www.jsymb.cn/article/6813/36413.html?_refluxos=a10

反馈全链条治理。

麻栗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一站式”调处平台为载体，建立“123”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切实提高解纷质效。自2023年5月成立以来，化解各类纠纷332件，调解成功率100%¹⁰。

在技术应用层面，县城社区全面实现“网格化+数字平台”双融合管理模式，平均事件响应时间由48小时缩短至12小时。彩虹社区构建的“智慧服务大厅”，依托“亲民化党群服务中心+政务云终端”模式，年服务居民超1万人次，群众满意率达到94%。

2.5 党建引领与组织动员机制不断强化

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德昌县持续推进党建引领“触角下沉、组织成网、服务入户”，构建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庭院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治理网络¹¹。全县共划分48个党建网格、设立412个党员服务点，形成“人在格中、事在网中”的治理格局¹²。

“5+3+N”动员机制已成为基层动员常态化工具，其中“5”为基层骨干成员（网格员、民警、村医等），“3”为下沉干部、志愿者、社区居民代表，“N”为根据问题灵活调动的外部资源。党员志愿队常态化开展“民意我来听”活动，征集居民“微心愿”超400项，推动解决道路修补、夜间照明、老旧管道更换等民生事项300余项¹³。

此外，政府推动社区治理工作与基层民主建设相融合，通过修订《居民议事规则》《社区工作手册》，明确居民议事会议、代表大会、自治小组等制度，保障居民有序表达与共同决策的权利。

3 德昌城乡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德昌县在制度设计、配置资源、技术平台、组织动员等方面推进了城乡社区治理行为实践，但从多中心治理视域下的“制度匹配、资源嵌入、多元参与、信息互信”来看，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治理行为尚存在“治理结构失衡、技术匹配、居民参与”的治理结构缺位和“组织动员、文化匹配”的治理文化不融的问题。

3.1 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缺失，社会参与边缘化

当前德昌城乡社区治理还处在“政府唱独角戏”的态势，社会组织、社区团体、居民等非政府治理力量参与有限，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全县登记注册的组织社会力量不足20%，乡村注册组织的社会力量仅占10%；政府购买服务垄断化程度较高，80%以上的社会服务被3家承接，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没有形成基层的多元协作关系网¹⁴。

此外，社区居民通过居民自治渠道形式主义明显，社区议事规则执行不到位。金沙乡“路灯安装项目”召开居民代表大会，但会前预算、方案均已确定，“签字走个过场”，居民“走过场”，居民自治渠道形式化明显。

3.2 资源分配结构失衡，政策执行选择性强

重城倾乡倾向明显，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要素供给差距较大。2022年，德昌县城镇社区公共投入人均1.2万元，乡村社区人均投入0.43万元，规模相差2.8倍，政府力量主要集中于投入城区“智慧社区”建设，投入彩虹社区一站式服务中心建设单体资金800万元，而同等规模的茨达镇基础设施改造资金投入仅为120万元¹⁵。

此外，还政绩挂帅，部分政策存在“选择性执行”的现象，如厕所革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90%，一些村为了考核达标，弄虚作假，不到40%。

3.3 数字化治理“悬浮化”，技术适配性差

“德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等数字治理工具虽然在城区投入大量资源，但在乡村推广中效果有限。乡村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且德昌县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山区，山区信号盲区大，网格员中仅通过平台操作考核，日均有效工单量远远赶不上县城。茨达镇引进的智能安防设备故障率高达42%，部分设备因缺乏维护与培训沦为“摆设”。

同时，居民数字能力不足，许多受访居民表示“从未使用过治理APP”或“只在线下处理事务”，基层数字治理“平台有了，数据没进来，群众没感知”。

¹⁰资料来源凉山长 https://www.liangshanpeace.gov.cn/dtj/20240423/2861966.html?_refluxos=a10

¹¹资料来源 https://www.12371.cn/2023/04/02/ART11680422605826608.shtml?_refluxos=a10

¹²资料来源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23/04/02/ART11680422605826608.shtml?_refluxos=a10

¹³资料来源凉山日报 https://lsrb.ls666.com/html/2023-11/08/content_148037.htm?div=-1&_refluxos=a10

¹⁴来源无忧网 https://m.wydbw.com/show.asp?Id=238970&_refluxos=a10

¹⁵来源凉山日报 https://lsrb.ls666.com/html/2023-04/19/content_133091.htm?div=-1&_refluxos=a10

3.4 民族社区治理文化适配性差，传统机制整合不足

如2023年德昌县政府的殡葬改革政策、火葬归祖政策与部分村彝族社区政策冲突事件，由于政府没有考虑到彝族的火葬归祖政策，强力实施火葬集中政策，遭到部分村民的强烈反对，最终被迫取消火葬集中政策。政府公共政策选择缺乏文化意识或社区协商。

同时，传统治理资源制度吸纳力度不足。所谓“德古调解”是社区调解的一种有效形式和方式，但只有两个试点村聘用了“德古”调解员，且没有报酬、没有制度性安排，其参与积极性不高、不稳定。

4 德昌县城乡社区治理问题的成因分析

按照“多中心治理理论”，造成当前德昌县治理绩效约束的根源在于制度结构的一体化、多元协同的缺失、资源配置制度偏向、技术理路本土化、民族文化制度融合的缺失等，从而治理行为呈现出的更多的是行政性理路，多元治理难以形成。

4.1 制度结构单一，多元协同制度落后

城乡社区治理的制度规范具有较好的政策推力和执行力，制度方面政府应当积极调动让其他主体都参与到城乡社区治理当中去，但现如今仍然遵循政府主导逻辑，导致政府行为参杂过多，抑制了其他主体的制度性参与^[11]。

首先，在现存的社区治理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代表虽然在文本上有提及，却不是制度上的安排和法律上的定位。

其次，居民参与机制“程序化”严重。虽然一些社区成立了议事会、居民代表会等，但都是依托于基层政权的寄居型组织。比如金沙乡某议事会，在“路灯安装”之前，都是镇里制定会议预算、实施方案，无需商议，居民鲜有参与机会。

再次，跨主体协作平台建设缺位。多中心治理要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在治理平台中进行常态化互动，然而德昌县缺少类似“城乡社区治理协调委员会”的制度性平台，导致跨主体的协作“临时化”、难以常态化^[12]。

4.2 资源配置考核导向强，公平分配机制缺失

城乡治理资源受以上考评指标体系的影响出现了以“政绩显绩”为导向的资源分配取向，并没有很好的考虑到具体的一个实效性，应该让居民也参与到决策过程当中去，真正听取群众的意见，否则会导致城乡治理资源出现向城市社区倾斜的倾向，乡村社区保障能力持续降低^[13]。

一方面，县政府治理资源的配置模式是定额式的配置，没有动态化的需求，如建设医疗、教育、文化设施的经费多向县城配置倾斜，部分距离县城较远的彝族村卫生服务站出现多年缺医、缺药、缺人、缺治理资源“空心化”情况。

另一方面是考“建设类、投资类”，不考“过程类、体验类”，造成基层干部做“出成绩快”的项目，即选择城区智慧社区、示范街等“出成绩快”的项目实施，忽略长期治理体系建设和居民获得感建设。

此外，资源配置未充分考虑民族社区、边远山区等治理成本问题，包括双语、空间改造等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民族地区的治理难满足部分群体的特殊需求，政策效果欠佳。

4.3 技术治理“移植化”，与基层适配较差

在数字化治理建设的一个过程中，应当积极考虑对地方的一个是适配性，要考虑地方的各种因素影响。近几年来政府大力推广数字化平台智能装备进社区、进村落，但是无论是平台还是系统建设都按照城区标准进行建设，缺少对乡村治理环境、治理能力的调试。

首先，数字平台“脱实向虚”。像“德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有人脸识别、事件上报、指派网格员等功能，但网格员认为系统复杂，功能冗杂，好多功能在村里根本不好用，反而成了累赘。

其次，基本系统运用能力基础差。全县熟练使用基本系统的网格员寥寥无几，对于平台培训大多也以“一培训了之”，缺少后续指导练习，利用率不高。

再次，技术与硬件及设施不适应治理要求。山区网络覆盖率低，智能安防设备网络不健全、维护不力、失灵现象屡见不鲜，平台治理力量不足。

同时，已有的平台是面向汉语界面，没有中文版本的平台，无法收录不具备普通话功能的各民族群众，没有针对普通话操作界面等专门的适配，“数字鸿沟”现象较为突显。

4.4 民族文化制度整合机制缺失，传统资源制度化难

彝族地区城乡社区治理必然存在现代制度逻辑与传统文化规范的相抵触，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当尊重民族文化差异，推动民族文化包容性治理。政府的城乡社区治理机制没有形成文化整合的制度机制，不能有效发挥文化匹配功能，无法盘活传统文化的治理功能。

首先，没有将传统治理经验进行制度性转化。“德古调解”作为彝族群众权威有效社区治理的重要经验，仅仅被试点村政府聘用，其制度角色不明确、没有明确的权责制度和待遇保障。

其次，政策“没有做文化影响论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2023年殡葬改革不考虑当地彝族传统风俗，强制“集中火葬”与“火葬归祖”仪式发生激烈冲突而最终停止，反映出政府政策制定缺乏少数民族社区的文化风险预警。

最后，彝汉双语服务提供不够，影响信息获取和政务沟通的公平性。全县政务服务窗口，只有少部分窗口工作人员配备着彝汉双语，村民政策咨询和办事申报等多项服务均依靠亲戚代劳，影响政策治理的透明性和公平性^[14]。

5 完善德昌县城乡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根据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多元制度缺失、公平分配制度缺失、基层适应制度缺失、传统资源制度性缺失等治理问题，从制度协同、资源整合、数字赋能、文化共生四方面提出便捷易行、行之有效、简便易操作的社区治理优化策略，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与治理获得感。

5.1 健全多元协同制度机制，扩大社会参与空间

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程度低，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协作机制不健全，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协作：一是在德昌县村镇一级组建群众议事小组。在社区一级组建由5—7名群众代表和村干部组成的群众议事小组，每月固定一天召开“社区议事会”聚焦基础设施维护、集体资产使用等民生议题，推行“议题收集—分类讨论—公开表决—结果公示”闭环流程，给居民反映意见提供渠道；二是搞好村级社会组织登记帮办。由乡（镇）民政办组建“社会组织登记专员”对志愿队、文艺队、互助组等愿意在村社开展服务的组织进行登记，指导合法有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志愿队伍中，虽然德昌县政府以及各中学经常组织学生志愿队伍参与到社区的公共服务当中去，但是学生志愿队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多数的志愿服务只能聚焦于德州镇中，无法涉及到其他的乡镇，所以建议不要把学生主体当作主要的登记对象，以学生为主体的志愿队伍可以学校的名义进行登记；三是建立跨主体协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德昌县民政局牵头，每个季度一次，组织政府部门、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居民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建立“问题清单—责任认领—进度通报”机制。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等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复杂问题，推行“政府出政策、企业出资源、居民出方案”的协同模式，对于企业也要注意避免出现前文中提到的垄断现象，可定期公开招标，邀请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竞争，以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选择最优的合作方。

5.2 优化资源配置逻辑，推动资金使用更精准

城乡社区治理资源在分配上存在“重城轻乡”现象，需建立“需求导向+公平普惠+动态调整”的资源配置机制，强化乡村社区和民族地区的保障力度：一是在乡镇财政中设立“基础服务补短专项”。首先每年初由县政府组织各方主体开展一次城乡社区公共服务需求调研，随后明确将年度城乡社区治理资金的10%用于村级基础项目，并合理分配。如卫生厕所改造、文化广场维护、乡村公厕保洁等，优先保障弱项与急项。同时立民族地区专项补贴，在“乡村治理专项资金”中划出20%作为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专项，用于支持彝族“德古调解”、傈僳族“阔时节”等传统治理资源的制度化建设。如每个彝族居民占比超过50%的乡村每年可申请5万元专项经费，用于聘任“德古”调解员、修缮文化活动场所；二是行“项目制+清单制”精准投放，实施“小项目”自主申报机制：村社可结合实际需求申报50万元以下的小型治理项目，如永郎镇的太阳能路灯安装、村卫生室设备更新等，由乡镇初审、县级部门联合评审，重点支持“短平快+见效实”的民生项目。建立治理资金“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将资金用于形象工程、重复建设项目，杜绝出现数据造假，偷换概念的情况。引入人大代表、居民代表组成资金监督小组，每季度抽查项目进度，发现违规使用情况立即暂停拨款并追究责任；三是构建治理效能评估体系，每年末开展一次，将城乡社区治理成效纳入乡镇政府绩效考核，其中“居民满意度”占40%、“资源使用效率”占30%（第三方审计资金使用率）、“长效机制建设”占30%（制度创新、组织培育等软指标）。其中在调查“居民满意度”的时候可以不再考虑传统的数字治理平台，可以根据微信小程序，QQ小程序，抖音小程序等第三方软件来调查。提高调查过程的便捷性和时效性，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使得调查结果更加精准。同时考虑到部分乡镇地处高山（如黑龙潭镇）网络较差，可以让地方政府组织人员进行入户调查。对连续两年考核优秀的乡镇，下一年度治理

资金额度提高 15%。

5.3 推动数字治理适配乡村实际，提升使用效率

当前“德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在乡村使用率不高，问题出在操作不便、培训不足。建议从以下三方面逐步优化：一是打造“轻量级”数字治理工具。打造“德昌村社通”简易平台，在现有“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基础上，针对城乡社区治理需求开发微信小程序，简化功能至“事件上报（拍照+语音）、政策查询（彝汉双语）、办事指南”三大模块，支持离线报修、语音输入等功能，解决部分山区网络不稳定问题；二是强化数字治理能力建设。实施“数字村官”培育工程，从返乡大学生、驻村工作队中选拔年轻干部，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数字化治理专项培训，考核合格后担任村社“数字管理员”，负责平台维护、数据录入、居民指导等工作。每村至少配备 1 名“数字村官”，财政给予每月 800 元岗位补贴。同时也要考虑特殊情况，部分乡村社区的数字化建设相对落后，甚至还存在部分人群不会用手机的现象。所以可以由“数字村官”带头组织其他公职人员，每季度在村社党群服务中心开设 1—2 次智能手机使用培训，重点讲解如何使用微信小程序来线上缴费、数据填写、银行卡余额查询等常用功能，采用“一对一结对”方式帮助村民，这样做也可以为基层治理的工作减轻负担；三是完善数字治理基础设施。推进网络设施建设工程：争取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确保全德昌县内山区村社 4G 网络全覆盖，重点是黑龙潭镇的马安村，一碗水村，大湾村。在人口密集区域试点 5G 基站建设。针对智能安防设备故障率高问题，建立“县—乡—村”三级运维体系，县级统筹技术团队定期巡检，乡镇配备简易维修工具包，村社明确专人负责日常管护。开发彝汉双语政务系统，在政务服务平台、自助终端机增设彝文界面，重要政策文件同步提供双语版本，确保少数民族居民平等获取信息。在麻栗镇、黑龙潭镇、阿月镇等彝族聚居区试点“双语客服”热线，安排懂彝语的工作人员接线，提升政策咨询和办事效率。

5.4 尊重民族文化差异，提升治理融合度

德昌县为彝族聚居区，部分政策在推行中与民族习俗存在冲突。应从实际出发推动文化包容型治理。一是实施政策文化影响评估制度。在前文提到的殡葬改革等涉及民族习俗的政策出台前，由县民宗局牵头开展文化影响评估，邀请“德古”“苏尼”等传统治理精英、村民代表参与听证，形成《文化适配性评估报告》作为决策依据。例如，在乡村社区改造时，需预留彝族“火塘”等文化空间，避免简单套用城市小区设计标准。同时编制《民族治理文化手册》。系统梳理彝族“德古调解”、傈僳族“自然崇拜”等传统治理资源，提炼其中关于纠纷调解、生态保护、集体议事的有益经验，转化为村规民约条款。如将彝族“德谷”纠纷调解机制与现代法律程序结合^[15]，形成“民间调解+司法确认”的特色纠纷调解模式。二是制度化吸纳传统治理资源建立“德古+网格员”联动调解机制。在彝族村社推行“1 名德古+2 名网格员”的纠纷化解小组，德古负责运用习惯法开展情感疏导、事理分析，网格员负责对接司法程序、政策解释，实现“民间智慧+官方渠道”优势互补。县司法局为在册德古颁发聘书，每年组织 1 次法律知识培训，调解成功案例按每件 200 元给予补贴。同时设立民族文化遗产示范岗，在村社干部中设置“文化协管员”岗位，由熟悉民族习俗的村民担任，负责收集文化保护需求、组织传统节日活动、协调文化事务纠纷。例如，在金沙傈僳族乡、南山傈僳族乡，文化协管员可牵头举办“阔时节”庆祝活动，同步开展政策宣传、邻里互助等治理活动，增强文化凝聚力。三是打造文化浸润式治理场景^[16]。建设“民族文化微阵地”，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级活动场所设立“文化角”，展示彝族刺绣、傈僳族弩箭等非遗技艺，定期举办“火塘夜话”等活动，将政策宣讲融入民族文化场景。推行“双语治理人才计划”，在公务员招录、村社干部选拔中，优先录用懂彝语、傈僳语的本地人才，全县 30% 以上的乡镇干部、50% 以上的民族村村干部需具备双语沟通能力^[17]。建立“双语干部结对帮扶”机制，每名干部联系 10 户少数民族家庭，定期走访宣传政策、收集诉求，打通治理“最后一公里”语言障碍。

结语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四川省德昌县作为西部多民族聚居地区，近年来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面临多重挑战：城乡资源配置失衡、公共服务供给差异化显著、居民参与治理动力不足等问题交织，制约了基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德昌县政府利用多中心治理理论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等多元主体通过制度化协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目前，德昌县的多中心合一平台、网格化治理、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等，已具有多中心治理的雏形。从德昌县治理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不是治理技术和治理技术，更是治理观念；不是制度框架，而是文化传统，愿德昌县在下一步探索中，进一步打破治理主体之间的壁垒，激发多中心的活力，为更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治理案例，让城乡社区真正成为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县域实践的样本，绘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幅生动画卷。治道阻且长。唯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不改，不断探索政府

行为的边界和多元共治的路径，才能让基层治理真正具有“制度张力”和“人情温度”。这或许正是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探索为民族地区城乡社区治理困境寻求破解出路所找到的一丝微光。

参考文献:

- [1] 徐明,陈斯洁.基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向度——基于7省市68个社区的实地调查[J].江西社会科学,2024,44(11):120-130+208.
-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05):69-77.
- [3] 陈序.2020年凉山彝区脱贫攻坚报告[J].新西部,2021,(Z1):27-33.
- [4] 创新创制实验不断提升全省城乡社区治理水平[J].政策,2019,(11):68-71.
- [5] 董方斌.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政府服务行为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8.
- [6] 王若溪.社会资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视角下的民族地区社区治理——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证研究[J].回族研究,2021,31(03):23-29.
- [7] 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 谢玲玲.多中心治理视角下深圳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11.
- [9] McGinnis M D. An Introduction to IAD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Ostrom Workshop: A Simple Guide to a Complex Framework [J].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011, 39(1): 169-183
- [10] 德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德昌县概况[EB/OL].德昌县人民政府网站,(2025-04-03) http://www.lsd.gov.cn/yjdc/zjdc/gkxx/202504/t20250403_2816184.html.
- [11] 赵艺丹.农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问题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4.
- [12] 王逸涵.基于SOA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设计与建构[D].黑龙江大学,2021.
- [13] 汤立斌.推动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思考[J].机关党建研究,2025,(03):42-45.
-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年)》[Z].北京:国家发改委,2021.
- [15] 许林逸.凉山彝族新型德古调解现状与完善路径——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为例[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2,31(04):61-67.
- [16] 龚长宇.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与柔性治理——基于苏州市G区的调研[J].社会建设,2019,6(04):62-72.
- [17] 唐韧.壤塘县:马背党课育新风石榴籽里绽芳华[J].民主法制建设,2025,(04):62-63

A Study on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Decha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Lei Feng¹, Jing Deng¹, Peng Wang¹, Lu Yise¹, Li Yuan^{1*}

¹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ontinues to deepen, the focu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 the level of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As one of the counties in Sichuan's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Dechang County exhibits notable complexity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its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several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Dechang County's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absence of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mbalanc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upply, the "transplanted" nature of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and poor cultural adaptability in ethnic community governance. This paper adopts a multi-center governance perspective,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s the primary method, to explore the administrative manifestations and issues of Dechang County's government governance behavior from four dimensions: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he study identified phenomena such as an immature multi-stakeholder coordination mechanism, excessive bias, a "floating" platform, and inadequate absorption. Therefore, it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strengthen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nsultation, improving resource supply formulas,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localization, and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governance in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se recommendations aim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governance in countries with ethnic minority populations.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Multicenter Governance;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

中国四川省青年结构性失业问题与就业转型趋势研究

玛海补都莫¹ 黄里坡¹ 吕你色¹ 钟艳廷¹ 李渊¹

(1.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00)

摘要: 青年就业质量关乎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中国四川省为例, 基于《2022 年四川统计年鉴》《2020 年四川人口普查年鉴》及第六、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采用文献研究和统计分析。2010—2020 年受生育政策及人口变动影响, 青年人口持续减少, 就业总量趋于平稳; 青年就业呈现学历提升、服务业集中、灵活就业增加的特征, 但也存在高校毕业生供需错配、低学历青年失业率高、区域间就业质量差异大等结构性失业问题。建议深化产教融合、优化职业教育体系、完善区域产业布局, 使青年就业结构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研究回应 SDG8 (体面工作与经济增长), 通过识别与化解青年结构性失业问题, 为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 四川省; 青年就业; 产业结构; 教育水平; 灵活就业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23

在全球人口结构转型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驱动下, 青年就业问题正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在经历“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加速、城市化发展”的人口新常态。四川省作为中国西部人口大省与重要劳动力输出枢纽, 其青年 (14~35 岁) 就业格局呈现“双向流动、结构分化、质量失衡”的复合特征: 一方面,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带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五大万亿级产业集群, 吸引大量高技能青年向核心城市集聚; 另一方面, 乡村振兴战略则激发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形成“中心极化—县域回流”的哑铃型就业空间结构。

然而,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四川省 15—34 岁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 2010 年的 38.2% 下降至 2020 年的 32.7%, 呈现显著下滑趋势。同期, 高校毕业生年均增长率达 4.5%, 而技能错配率高达 33%, 反映出“岗位需求高端化”与“人力资本低端化”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加剧。

从政策层面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2021) 明确提出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群”, 而《四川省“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川府发〔2021〕12 号) 则强调“以产教融合破解结构性失业”。然而, 当前学界对青年就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分析, 缺乏对青年群体就业异质性、流动路径及数字鸿沟的系统剖析。例如, 李含伟等 (2022)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成渝地区青年就业质量存在梯度分化, 但未涉及县域返乡青年的行为决策机制[1]; 张蓓 (2021) 虽分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空间演化特征, 但对新兴产业对技能结构的动态需求缺乏量化研究[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21) 指出, 西部地区青年在数字经济中的参与度不足东部的 60%, 区域数字鸿沟正成为制约青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障碍[5]。

一、四川省青年人口规模及就业率变动趋势

(一) 青年人口规模缩减, 老龄化与代际结构失衡并存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四川省 14~35 岁青年人口占比由 2010 年的 28.6% 下降至 2020 年的 24.3%, 十年内减少约 180 万人, 降幅达 15.5%。这一趋势反映出四川人口发展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 生育率持续低于更

作者简介: 玛海补都莫(2003—), 女, 四川盐源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2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黄里坡(2002—), 男, 四川金阳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2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吕你色(2002—), 男, 四川木里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3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钟艳廷(2000—), 男, 四川宣汉人,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 2021 级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李渊(1983—), 男, 宁夏银川人, 博士,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经济与技术管理, 组织及个人行为研究;

通讯作者: 李渊

替水平，削弱了人口再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年均约 80 万人的跨省净流出加速了青年人口的流失与人口红利的消退。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群体内部的代际结构亦呈现失衡态势。20 岁以下低龄青年占比由 2010 年的 35% 下降至 2020 年的 28%，而 30—34 岁群体占比由 25% 上升至 32%，呈现出“橄榄型”倒置结构。这一“头部老化”现象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尤为明显，反映出高等教育普及、婚育年龄推迟与职业发展周期延长等社会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经济地理视角看，川东北、川南等传统劳务输出地区青年人口流失率超过 30%，而成都都市圈的青年人口占比则逆势上升至 27.8%，显现出明显的“虹吸效应”[1]。这一空间分布失衡加剧了区域间的劳动力错配，造成部分传统产业同时面临“用工荒”与“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2]。

人口结构变化已对社会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制造业面临超过 15% 的劳动力缺口，养老、托育等新兴服务业人才供给不足，青年群体的创业与创新潜能也因人口规模缩减而受到一定抑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人口减少与人口老龄化进程叠加形成“双碰头”效应，2021 年四川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16.9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给养老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带来显著压力[3]。

表 1 四川省人口年龄构成

年龄	人口数	比重 (单位: 人、%)
总计	83674866	100.00
0-14 岁	13471112	16.10
15-59 岁	52039950	62.19
60 岁及以上	14167600	21.71
其中:		
65 岁及以上	14167600	16.93

(二) 教育扩张延缓职业进入，失业率呈“双峰”特征

近年来，四川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10 年的 25% 跃升至 2020 年的 52%，标志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迈入普及化阶段[6]。这一历史性跨越，与“双一流”高校建设、成渝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等战略紧密相关。全省普通高校数量从 106 所增至 134 所，在校大学生规模突破 230 万人。教育周期的延长直接导致青年职业路径后移，平均初职年龄由 22 岁推迟至 24 岁，硕士研究生毕业平均年龄达 26.3 岁，博士毕业年龄突破 30 岁。

教育结构的深刻变革引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16—24 岁青年劳动参与率由 2010 年的 83.7% 下降至 2020 年的 68.7%，其中女性下降更为明显（减少 18.2 个百分点），反映出学历提升与职业准备期延长的双重效应。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与就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2020 年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岗位匹配度仅为 63%[7]，而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人才缺口高达 42 万人。

就业市场呈现明显的“年龄双峰”特征：一方面，16—24 岁低龄青年失业率高达 12.3%，主要受限于技能断层与“慢就业”趋势。该群体中选择“过渡性就业”（如灵活就业、自由职业等）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18% 上升至 2020 年的 34%，反映出青年就业观念的代际演变。另一方面，25—34 岁青年劳动参与率稳定在 89% 左右，但职业稳定性问题日益突出：30—34 岁群体的年均岗位流动率达 28%，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1%[8]。

区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市场矛盾。成都平原经济区聚集了全省 68% 的高等教育资源，其青年失业率（8.2%）远低于川东北（15.3%）与攀西地区（14.1%）。但成都都市圈青年就业亦面临“高学历陷阱”：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起薪年均增幅仅为 3.2%，明显低于房价年均涨幅 5.8%，造成“人才购买力折损”问题。2020 年四川籍高校毕业生中，有 37% 流向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出现“孔雀东南飞”现象[9]。

(三) 就业规模收缩与结构分化交织

根据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统计，2010—2020 年间，全省青年就业人口由 1260 万人降至 1150 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由 34.1% 降至 30.8%，十年净减 110 万人。这一收缩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分化：16—24 岁组就业占比由 10.2% 锐减至 5.8%；而 30—34 岁组则由 12.4% 上升至 14.6%，形成典型的“哑铃型”就业结构。这一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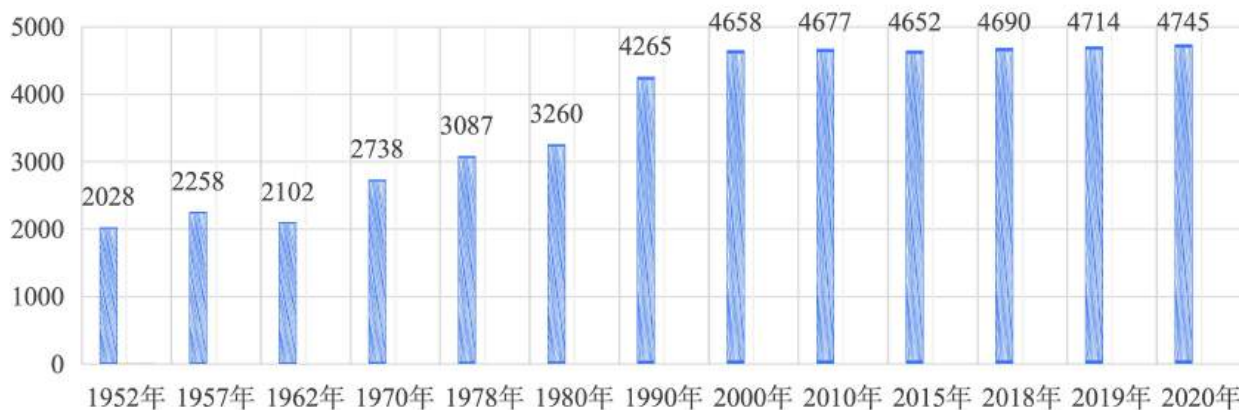
化是人口基数缩减、教育深化和产业升级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青年人口减少 18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 27 个百分点，叠加劳动参与率下降 15 个百分点，共同导致 16—24 岁群体就业人数减少约 63 万人。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错配愈加突出：全省中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仅为 68%，而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已达 28 万人，说明技能供给滞后于产业升级[10]。

产业结构变迁加剧了就业的分化态势。传统制造业受到自动化替代影响显著，自动化替代率年均增长 8%，纺织、机械等行业的就业岗位减少约 12%。而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增就业岗位达 45 万个。就业空间也呈现出“核心—边缘”分化格局：成都平原经济区青年就业占比高达 58%，而制造业集中的川南地区就业收缩率达 18%，表现出“产业空心化”与“人才虹吸”并存的区域性特征[11]。

就业形态深刻变化，青年灵活就业占比从 2015 年的 19% 上升至 2020 年的 31%，其中网约车司机、直播销售等新型职业中青年占比超过 73%。但灵活就业往往伴随社会保障缺失问题，青年养老保险参保率比稳定就业群体低 22 个百分点。30—34 岁群体的年均离职率高达 28%，反映出职业稳定性下降与发展期望提升的双重矛盾。就业收缩还带来经济社会层面的多重影响：青年消费市场规模增速减缓，2020 年全省青年人消费支出增幅比 2015 年下降 4.7 个百分点；青年创业活力下降，青年创业企业数量增速由 15% 降至 8%；失业保险金申领人数年均增长 12%，增加了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的压力[12]。

表 2 四川省 1952-2020 年就业人口统计



二、四川省青年就业结构变动趋势

(一) 学历结构优化与性别差距收窄

2020 年，四川省青年就业人口的学历结构发生历史性跃升，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达到 47%，较 2010 年提升 22 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红利进入集中释放期[13]。这一转变与“强基计划”“卓越工程师计划”及“双一流”建设、高校新增前沿专业 127 个密切相关，同时全省已建成 320 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与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为青年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14]。大专及以上学历青年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就业占比达 68%，平均起薪较初中及以下学历群体高 42%[15]。

从性别维度看，青年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表现优于男性。20—24 岁女性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达 51%，高出男性 9 个百分点，体现出性别平等的积极进展。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该优势逐渐消失：30—34 岁组的学历差距缩小至 3%，并在职业发展中暴露出“玻璃天花板”现象。该年龄段女性管理者占比仅 28%，低于男性 15 个百分点，32% 的二孩女性经历职业中断，生育保险覆盖率也低于男性 18 个百分点，表明婚育责任对女性职业发展仍构成双重压力[16]。

低学历青年则面临显著的结构困境。尽管其占比已从 35% 降至 18%，但失业率高达 15.2%，为全省平均的 2.3 倍[17]。这部分群体具有“三集中”特征：72% 从事传统制造业与建筑业，85% 为农村转移劳动力，63% 缺乏技能等级认证。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传统制造业低技能岗位缩减 18 万个，而其职业培训参与率仅 2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削弱其竞争力[18]。

学历分化加剧了就业市场的分层趋势。高学历青年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41%）、金融科技（32%）等新兴产业，薪资年均增长率达 8.2%；而低学历青年则集中于建筑装修（28%）、餐饮服务（22%）等低附加值行业，

薪资增速仅为 3.1%。这一“学历—收入”关系在区域间表现更为突出：成都平原经济区高学历青年占比高达 58%，而川东北地区低学历青年占比仍达 32%，显现出“知识鸿沟”与“收入鸿沟”的叠加效应[19]。

（二）就业形式多元化：从“稳定雇佣”到“灵活拓新”

随着数字技术革新与产业结构转型，青年就业形式正由传统的“单位制”向“平台制”“项目制”转变，就业形态日益多元化。传统的稳定雇佣模式逐渐被灵活、多元的就业形态所补充甚至替代，反映出新时代青年对职业自由度与个人发展的高度关注。

在教育普及和技能结构优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高学历青年倾向于选择自主性更强、创新性更高的就业方式，如创业、自媒体、电商运营等领域。根据调查数据，四川省青年群体中选择灵活就业的比例自 2015 年的 19% 上升至 2020 年的 31%，其中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直播带货员、自由撰稿人等新职业中，35 岁以下青年占比高达 73%[20]。这类就业模式具有进入门槛低、时间自由度高、对场所依赖性小等优势，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青年群体的重要就业通道。

表 3 四川省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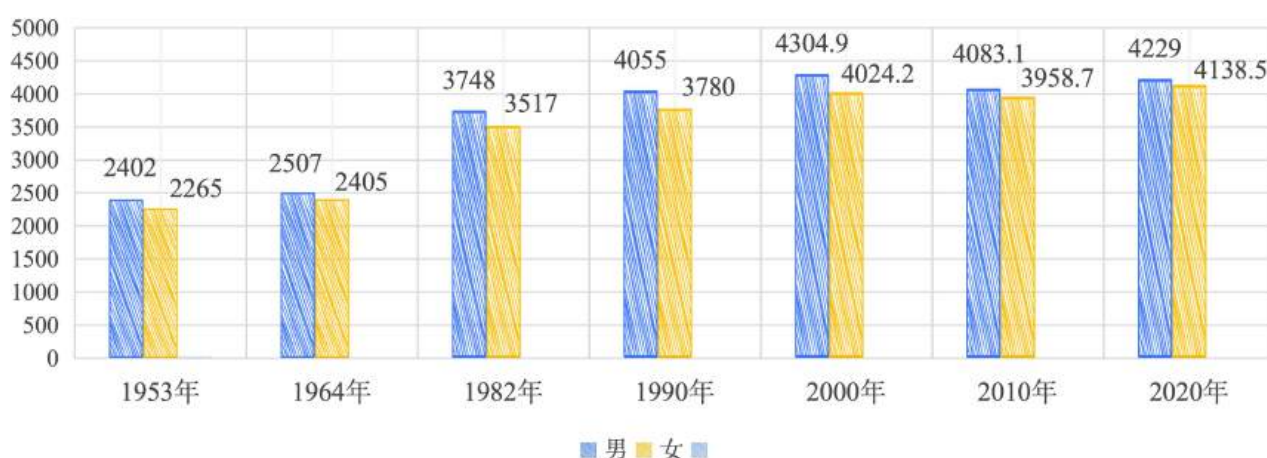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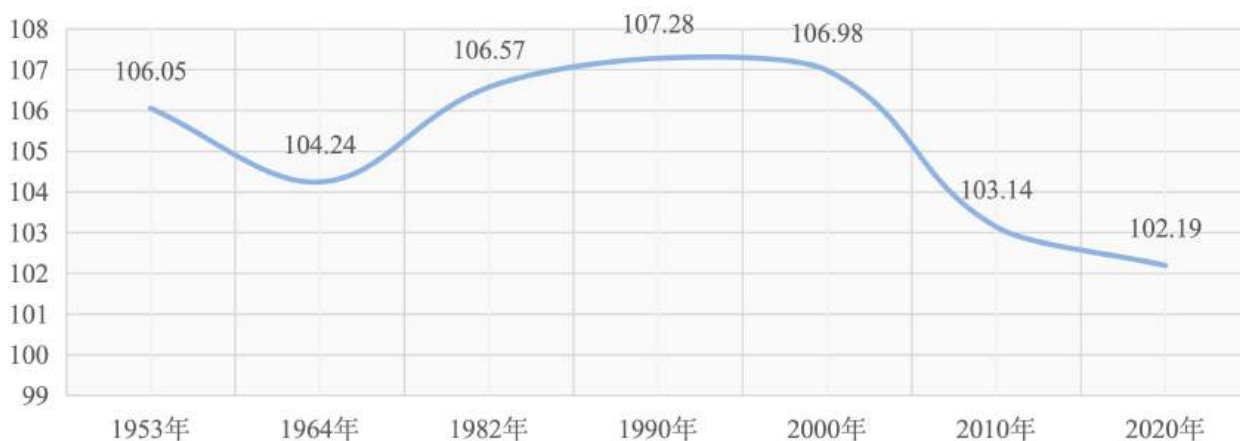


表 4 四川省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性别比



从代际特征来看，Z 世代（出生于 1995 年以后）的就业观念更加强调“兴趣导向”“多元尝试”和“个体价值实现”。他们更愿意接受“先就业、再择业”甚至“边工作边探索”的弹性职业路径。相关研究显示，四川地区 18—25 岁青年中有超过 38% 曾尝试过至少一种灵活就业形态，显著高于上一代青年[21]。

然而，灵活就业在带来自主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保障与权益保护问题。首先，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险参保率普遍偏低。数据显示，该群体在养老保险方面的参保率比传统雇佣群体低 22 个百分点，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覆盖率更低，尤其是个体从业者面临“投保成本高、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的三重难题[22]。其

次，劳动关系不明确导致权益难以维护，如平台算法控制下的“隐性劳动关系”常引发工时失控、收入不稳定、缺乏申诉渠道等问题[23]。

此外，职业稳定性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四川省 30—34 岁青年年均离职率达 28%，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3%）。频繁跳槽虽体现出灵活就业对职业选择的开放性，但也反映出青年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缺乏稳定发展路径与长远规划[24]。

从宏观层面看，灵活就业的快速增长也对现有公共管理体系提出挑战。一方面，现有劳动法律法规与社保制度仍以“单位雇佣”为基本单元，难以全面覆盖新型就业形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灵活就业统计监测能力不足，政策供给滞后于实际就业结构变化，导致部分青年群体处于“制度盲区”[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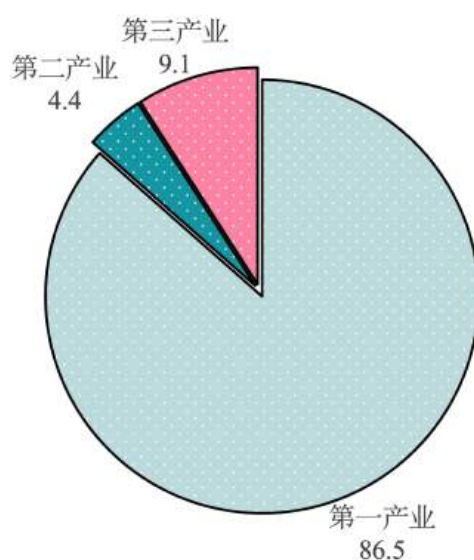


图1 四川省 1952 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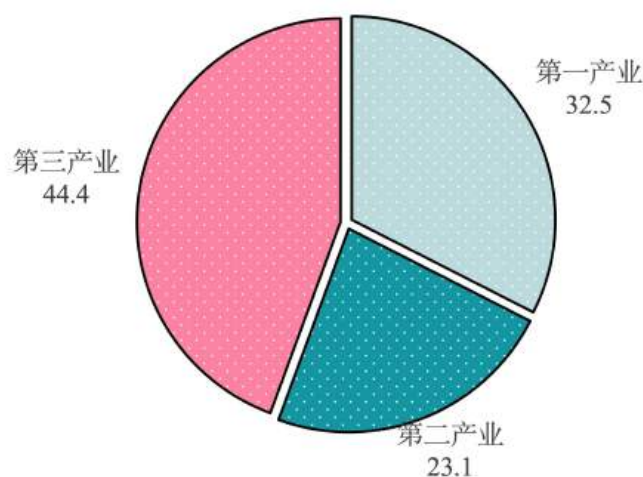


图2 四川省 2020 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

（三）产业分布：服务业主导与制造业韧性并存

四川省青年就业呈现“服务业主导、制造业韧性并存”的双轮驱动格局。2010—2020 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比由 38% 上升至 52%，青年群体贡献其中 65% 的新增动能，体现出“服务业软化”趋势[26]。其中，信息传输（年均增长 14%）、金融（12%）、教育（10%）三大现代服务行业成为青年就业增长的主阵地，吸纳超过 200 万青年就业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青年从业者占比已达 34%，显现出新经济形态对青年人才的显著吸附效应[27]。

尽管服务业迅速扩张，制造业仍在稳定青年就业方面发挥“压舱石”作用。约 22% 的青年就业于制造领域，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迅猛。2020 年青年制造业从业者同比增长 9%，其中集成电路、航空

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人才密度较 2015 年增长 2.3 倍[28]。传统制造业则借助智能化改造实现“腾笼换鸟”式升级, 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青年占比下降 8%, 而智能制造领域青年工程师数量增长达 37%[29]。

性别就业结构亦呈现行业分化: 女性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 (24%)、教育 (18%)、医疗 (15%), 构成“三二一”分布格局; 男性则聚集于建筑 (19%)、交通运输 (12%)、采矿 (9%) 等行业[30]。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 女性从业者占比已突破 35%, 较 2015 年提升 18 个百分点, 体现数字产业中性别结构的积极变化。

区域间产业布局差异显著。成都平原经济区吸纳全省 68% 的现代服务业青年就业, 其中金融科技、软件信息行业青年占比达 42%; 川南经济区依托白酒、化工等传统产业集群, 制造业青年就业占比维持在 31%; 攀西地区清洁能源产业迅速崛起, 新能源领域青年从业者年均增长达 16%[31]。这种“核心区服务业集聚、外围区制造业支撑”的空间分布格局既体现区域比较优势, 也暴露出青年人才资源配置效率的潜在问题。

(四) 职业转型: 从“生产端”向“服务端”迁移

四川省青年职业结构正在经历系统性重构, 整体呈现由“生产端”向“服务端”的结构性迁移趋势。生产运输操作人员比例由 29% 降至 18%, 而商业服务业人员占比则由 34% 提升至 46%, 标志着就业形态向服务经济时代深度演进。这一转型与“服务业强省”战略密切相关, 截至 2020 年, 全省已建成 127 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生活性服务业青年就业增长 38%, 生产性服务业青年从业者超过 150 万人[32]。

职业结构转型凸显技术赋能特征。数字技术催生了网约车司机、直播销售员、短视频运营等新职业, 青年从业者在该类岗位中占比高达 73%。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女性就业比例同步提升, 专业技术岗位 (如教师、医护) 中女性占比由 2015 年的 16% 增至 21%, 展现性别平等的进步[33]。男性则主要集中于 IT 工程师 (15%)、物流管理 (12%)、人工智能技术员 (9%) 等技术岗位, 数字经济核心领域中, 青年男性从业者占比高达 68%。

制造业岗位同步实现升级。虽然传统岗位流失量达 38 万个, 但智能制造相关岗位新增 27 万个, 诸如工业机器人运维、3D 打印、智能检测等新工种快速扩张。绵阳、德阳等制造业高地的产业园区内, 青年技术工人占比达 45%, 成为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支撑群体[34]。

区域职业结构表现出“双核驱动”特征: 成都平原经济区以数字经济岗位为主, 青年占比高达 62%, 其中成都高新区互联网营销类岗位全国领先; 川南依托白酒产业链条延伸, 酒旅服务、包装设计等特色职业青年就业增长 41%; 攀西地区依托光伏、储能等产业, 新能源相关职业青年年均增长 18%[35]。

(五) 就业质量: 工时缩短与区域分化

近年来, 四川青年就业质量呈现“工时缩短与区域分化”的双重特征。全省青年平均周工作时长由 2015 年的 50 小时下降至 2020 年的 45 小时, 劳动强度指数下降 18%, 这得益于《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的实施与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36]。但在 16—24 岁低龄青年中, 仍有 32% 每周工时超过 48 小时, 主要集中于餐饮 (41%)、物流 (34%) 等劳动密集型岗位, 反映新业态与传统用工制度之间的磨合张力。

区域差异明显: 成都、德阳等经济较发达地区, 青年“标准工时” (40 小时) 占比达 58%, 成都高新区互联网行业青年“朝九晚六”制普及率超过 75%; 而甘孜、凉山等民族地区标准工时占比仅 43%, 当地旅游业青年日均工作时长仍达 10.2 小时。这种工时差异深刻反映出不同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37]。

不同行业的工时与劳动保障状况亦高度分化。信息传输行业青年周均工时为 38.6 小时, 带薪休假享受率达 62%; 而建筑业周均工时达 52.3 小时, 43% 的从业者未签订正规劳动合同。与此同时, 直播、电商等数字岗位中, 58% 的青年选择弹性工时, 但社保参保率仅为 31%, 暴露出“灵活就业—保障缺失”悖论[38]。

工时差异对青年发展带来显著影响。超时工作群体的职业满意度较标准工时群体低 27 个百分点, 年均离职率高出 15 个百分点; 区域间工时差异还加剧了人口流动不平衡: 2020 年成都都市圈青年净流入率达 12%, 而甘孜州青年流失率超过 25%, 形成“工时—人才”循环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格局[39]。

三、青年就业变动动因分析

(一) 产业结构升级驱动职业重构

近年来,四川省围绕“5+1”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支柱产业,带动高端制造业岗位年均增长6%。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与文化旅游产业加速融合,催生出数字文旅、智能应用等新兴服务业态,为青年提供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伴随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稳步推进,区域协同效应逐渐释放。数据显示,2020年成德眉资都市圈青年就业密度较2015年提升23%,呈现出就业空间从“单中心集聚”向“多中心联动”的趋势。

(二) 政策赋能:创业扶持与就业服务创新

为缓解青年就业压力,四川省出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办法》,构建集“培训、孵化、融资、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创业扶持体系。个人创业补贴最高标准提升至10万元,带动青年创业主体数量年均增长15%。就业服务领域亦实现数字化跃迁,“互联网+就业”新模式成为灵活就业的重要支撑。2020年,全省灵活就业青年规模突破150万人,其中35%通过“天府微聘”等智慧平台实现岗位精准对接,推动就业服务从“被动撮合”向“智能推荐”转型。

(三) 教育扩张与技能供需矛盾

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推动本专科毕业生规模在十年内增长2.8倍。然而,传统专业(如机械制造、汉语言文学)供给过剩,与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之间存在显著错配。相比之下,职业教育体系则在“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中实现精准发力。例如,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飞集团设立“大飞机工匠班”,为ARJ21、C919项目输送高技能人才,2023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高达92%。全省已建成127个产业学院,并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年均淘汰15个不适应产业发展的专业,有效优化教育供给结构。

(四) 择业观念变迁:从“生存导向”到“发展导向”

青年择业观逐步由“生存优先”转向“发展优先”,呈现出“薪酬竞争力+职业成长性”双重驱动格局。调查显示,72%的青年将薪资作为首要就业考量,65%高度关注职业发展空间,分别较2015年提升18和2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联通亦扩大青年择业半径,“成都—绵阳半小时通勤圈”加速形成,带动青年跨城就业比例提升至40%。2020年“蓉漂”青年人才净流入量突破80万人,其中85后占比达60%。与此同时,“城市生活品质指数”在青年就业决策中的权重提升至35%,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日益成为影响青年职业选择的重要变量。

四、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四川省青年就业数据,发现其就业结构演进呈现以下三大趋势:一是高技能导向增强: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青年从业者占比升至38%,技能型就业成为主流趋势;二是服务化特征明显:现代服务业吸纳青年就业占比已达45%,第三产业成为主要增长极;三是空间分布“双核多极”格局初现:成都平原经济区青年就业集中度达62%,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主中心+副中心”联动结构。

但与此同时,青年就业质量的提升仍面临三方面结构性矛盾:一是教育供需错配:高校专业设置存在“时滞效应”,传统学科毕业生待业率较新兴学科高12个百分点;二是区域就业梯度拉大:非核心区域如川南经济区青年平均薪酬仅为成都的68%,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三是技能代际断层显现:低学历青年数字技能拥有率不足25%,难以满足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要求。

(二) 政策建议

1.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

构建“产业需求—高校培养—职校实训”三元联动体系,建立专业动态“双预警”制度(产业需求预警、就业质量预警)。优先在成都、绵阳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力争2025年前相关专业在校规模实现倍增。

2.实施“金蓝领”技能振兴计划

针对低学历青年,推行“数字技能+职业素养”双提升行动。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订单”机制建设50个产训结合示范基地,到2027年实现初中及以下学历青年培训覆盖率达100%。

3.推进区域就业质量均衡发展

制定《非核心区域产业承接专项规划》,在川南、川东北设立产业转移示范园,对入驻企业提供最长5年的税收优惠。完善跨市人才协作机制,打造“核心城市岗位池+周边城市人才库”资源共享平台。

4.打造智慧化就业服务生态系统

依托“四川公共招聘网”构建省级青年就业大数据平台,开发职业适配度测评工具。建立重点企业用工监测机制,对失业青年开展“1311”服务: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1次技能培训、1次回访评估,实现服务闭环。

参考文献:

- [1] 李含伟,陈晓红.成渝城市群青年就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2,29(3):58-66.
- [2] 张蓓.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空间演化特征与政策响应——基于四川省的实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1,40(2):102-108.
- [3]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2022[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 [4] 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Z].川府发〔2021〕12号.
- [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1: Digital Lives [R]. Beijing: UNDP, 2021.
- [6] 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1[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
- [7]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年度报告2020[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8] 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9] 胡云,赵骁.“孔雀东南飞”:新生代人才跨区域流动的空间逻辑与调控对策[J].地理科学进展,2021,40(4):512-520.
- [10]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职业教育发展年度报告2021[R].成都: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2021.
- [11] 徐旭,王绍光.区域产业转移与就业结构空间演化研究——基于四川省的实证分析[J].区域经济评论,2020(5):68-75.
- [12]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13] 教育部.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1[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1.
- [14] 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高校专业调整与产教融合发展报告[R].成都:四川省人民政府,2021.
- [1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2020[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16]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职业女性婚育影响与发展瓶颈调研报告[R].北京,2021.
- [17]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四川省分报告[R].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18] 四川省人社厅.四川技能型人才发展状况分析报告[R].成都: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2021.
- [19] 徐明,刘勇.西部地区青年就业学历分化与区域收入差异研究[J].西部经济论坛,2022(3):72-81.
- [20] 罗晓燕,王文军.数字平台经济背景下青年灵活就业发展态势与挑战[J].青年研究,2021(5):44-52.
- [21] 新华网智库.Z世代就业观与职业行为调研报告[R].北京:新华社,2022.
-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23] 刘昕,胡春颖.平台劳动的法律边界与制度回应[J].中国劳动,2021(7):27-35.
- [24] 国家统计局.四川省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25] 王文斌,刘沛.灵活就业背景下公共政策的适应性改革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22(2):62-69.
- [26] 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省统计年鉴202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27]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R].北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
- [28] 国家发展改革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0[R].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0.

- [29]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四川智能制造发展年度报告 2021[R]. 成都: 四川省人民政府, 2021.
- [30] 李梦洁, 陈志强. 青年性别分化与就业领域结构演变研究[J]. 西部青年论坛, 2022(3): 44–51.
- [31] 西部区域发展研究院.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青年就业空间分析报告[R]. 重庆: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2.
- [32] 四川省发改委. 服务业强省建设推进情况通报[Z]. 成都: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2021.
- [33] 中国妇女研究会. 女性职业发展年度监测报告 2021[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34] 四川省人社厅. 青年制造业就业结构变动研究[R]. 成都: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1.
- [35] 国家能源局西南监管局. 西南清洁能源产业人才结构变化研究[R]. 成都: 能源出版社, 2022.
- [36]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解读[R]. 成都, 2020.
- [37] 国家统计局. 中国区域就业与工时差异统计报告 2021[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
- [38] 刘冉冉. 数字经济灵活就业中的工时制度与社会保障适配[J]. 劳动保障研究, 2022(4): 39–46.
- [39] 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 2020 年青年发展状况调研报告[R]. 北京, 2021.

A Study on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Transition Trends Among Youth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Mahai Bu-du-mo¹, Huang Li-po¹, Lü Ni-se¹, Zhong Yan-ting¹, Li Yuan¹

1 College of Tourism & Urban-Rural Planning,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615000, Sichuan, China

Abstract: Youth employment quality is closely linked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king it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focuses o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nd is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22 Sichuan Statistical Yearbook, the 2020 Sichuan Population Census Yearbook, and the sixth and seven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es.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he study examines employment scale, structure, and trends among youth aged 14 to 35 from 2010 to 2020.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fluenced by demographic policies and population shifts, the size of the youth popul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cline while overall employment levels have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Youth employment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 concentra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 and an increase in flexible employment. However, significant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mismatches between college graduates and job market demands, high unemployment among low-educated youth, and stark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employment quality. The study recommends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mproving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s, and optimizing regional industrial layouts to align youth employment structures with the goal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addressing structural youth unemployment,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policy insights toward achieving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under SDG 8.

Keywords: Sichuan Province; youth employ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education level; flexible employment.

从“文化展示”到“发展引擎”： 国门文化驱动边疆发展的新范式与协同

吕世林¹ 李虹瑾²

(1.中共红河州委党校,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要:“国门文化”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由云南省于2020年7月1日率先提出的文化建设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耦合粘性,“国门文化”发挥各方游客体验边关文化的新空间通道功能,同时在中外边民交流交往中也扮演着“润滑剂”的重要角色。以西南边疆云南省南部地区红河州为典型案例,通过分析其国门文化建设的实践模式,论证国门文化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和软实力,通过文旅融合、产业升级、民心相通、认同强化等多重路径,有效驱动边疆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与对外开放,探讨“国门文化”建设与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协同建设。研究发现,国门文化不仅是展示国家形象的文化窗口,更是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战略的核心动能,其成功的“滇南经验”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关键词: 国门文化; 民族地区; 乡村治理; 发展

基金项目:红河州委党校系统课题(项目编号:2025zx-05);红河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项目编号2025zx-05)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0

在中国广阔的边境线上,绝大部分分布的是乡村,这些乡村在独特的地理基础和历史背景上,与邻国居民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和频繁的交往,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文化现象。这些乡村所具有的鲜明文化特征,为跨国文化交流提供了天然的平台³。在跨国交流的平台,边疆民族展示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也成为和谐边境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国门文化”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得以衍生,它不仅是展示国家形象的亮丽“文化窗口”,更是促进中外民心相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固“精神纽带”。

一、“国门文化”建设的逻辑动因

国家战略是国门文化建设的核心动力之外部推动。云南省,作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沿阵地及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边境,其“国门文化”建设承载了深远的意义,不仅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提出的“三个定位”重要指示,而且成为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一大举措。毫无疑问,国门不只是地理的标记,还是文化的窗口、友谊的纽带、精神的象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848公里,有汉族、彝族、苗族、傣族、壮族、瑶族、回族、布依族、布朗族、拉祜族11个世居民族⁴,这样的民族自治州集“边境线长、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等特点于一身,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和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前沿,是中国陆路通往东盟的重要通道。既是“一带一路”展示的窗口,也是有效解决边境移民之间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问题的重要载体,是共建共享的开放平台和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示范区。推动国门文化发展是我国边疆地区一项重要的文化战略,它通过挖掘、展示和传播边境地区的独特文化,不仅增强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还促进了文化交流与经济发展。

作者简介: 吕世林(1995—),女,中共红河州委党校,硕士,统战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虹瑾(1990—),女,中共红河州委党校,硕士,文化与科技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³ 李智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与前瞻—以云南为例》,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⁴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https://www.hh.gov.cn/zjhh.htm>,2025,(8)。

边疆民族地区内生发展需求是国门文化建设的核心动力之内部拉力。乘着国家战略部署的“东风”，“何以”将国门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振兴结合，促进跨境地区文化交流合作，维护和巩固国家边疆文化安全，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自下而上”的文化交流，夯实民意，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边疆民族地区对乡村文化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亟待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从区域主体角度看，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家利益边疆的拓展。从脱贫攻坚结束到乡村振兴，云南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得以大幅改善，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省份而言，边疆通常又是与民族因素相交织的地理区域。因此，在新时空背景下，西南边疆民族大省——云南的社会变迁过程也带动边境地区的纵向横向发展，无疑大幅度提高区域内各族民众的物质生活质量，并进一步促进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及与周边国家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流。以红河州为例，历史上即形成了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尤其是跨境民族与境外的同源民族拥有对共同历史文化的认同和记忆及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甚至亲属关系。5文化活动现今，主要由跨境民族构成的边民已然成为“经济走廊”里传统边贸互市或现代国际贸易中的“主角”，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地区的民众对自己的经济“主体性”角色越来越认同，并不断凸显发挥作用。而由此必然带来他们在乡村“文化走廊”的民族文化交流“主体性”涵化。不可否认，他们既是国家利益边疆的重要拓展者，也是发展成果的主要分享者，在很大程度上也激发边疆各族人民的内生发展动力。

二、“国门文化”建设驱动边疆发展的分析：基于红河州的实践

一是文化资源驱动与跨境旅游发展。国门文化作为“经济引擎”，直接驱动产业发展。在云南省的“国门文化”建设中，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显现为一种重要策略，通过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经济资本，各州市实现了文化旅游产业的繁荣和文化产品的市场化。红河州河口县依托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的便捷交通，利用其作为国家一类口岸的地位，开发边境旅游线路，利用河口-老街“两国一城”的独特优势，推出“中越跨国旅游”线路，中国游客可便捷地从河口口岸出境游览越南沙巴、河内等地，越南游客也可入境游览红河州元阳梯田、建水古城等景区。共同打造“红河-老街”旅游圈，联合推广旅游资源，实现客源互送、市场共享，带动周边消费增长，成功地将文化活动作为媒介，推广了跨境旅游。两地建立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协会，实行联席会议制度，实现“共商共享共办”，通过一系列文化旅游品牌活动，如中越跨国春节联欢晚会，“中越边境苗族花山旅游节”等。中越两国苗族同胞会在每年6月聚集在桥头乡老街子村，共同庆祝节日，加强了与越南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以传统花山节为载体，融合民俗、非遗与旅游，设芦笙演奏、爬花杆等沉浸式项目，中越混合组队参赛，双语主持联袂展演，成为中越文化交流知名品牌和云南“国门文化”示范工程，实现文旅融合与跨境文化交融双赢。绿春县在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绿春哈尼十月年长街古宴文化旅游节活动时，邀请越南莱州省勐课县部分党政领导前来参加活动，民族文化和非遗资源，发展文旅融合产业，使其成为边疆地区的新经济增长点，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也为红河州的跨境旅游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是节庆艺术薪火相传与文化遗产保护。红河州在“国门文化”建设实践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尤其重视。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措施，比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条例》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不仅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提升提供了支撑。这些措施的实施，确保了文化遗产得到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使之成为活生生的文化资本，而不是尘封的历史。进一步地，红河州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和传承点，以及扶持各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有效地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这种转化不仅提高了公众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参与度，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和活力。特别是通过组织如哈尼长街宴、彝族火把节、苗族花山节等特色文化节庆活动，这些民族传统节日通过记忆的传承、唤醒和重构，构筑仪式时空、创设仪式情境和进行仪式展演，不仅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⁶。民族成员在共同参与节日仪式这一过程中，个体情感卷入族群情感洪，红河州既活化传统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也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了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有效转换。“红河州边民一家亲·携手共奋进”入选“2025国门文化建设创新项目”；“中越边境苗族花山旅游节”“建水县儒学文化润边境”相继入选（云南）“2025国门文化建设创新项目”。⁷云南省建水县文庙以700余年历史底蕴为基，推动文旅与公共文化深度融合，每年到这里旅游、研学的人员就达10万多人，特别是邻近的越南游客，常年络绎不绝，云南游客和边民们在这里了解孔子文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传播儒家文化精髓，“和为贵”“仁者爱人”等儒家理念已经扎下了文化传播的种子，促进边民跨文化交流。联合教育机构开设国学公益学堂，惠及超千名青少年，将儒学文化融入现代教育，

⁵ 阎德华：《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跨越性》，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⁶ 解丽霞、郭一《仪式·记忆·符号：中华传统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路径》，载《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⁷ 红河州4个案例入选！“2025国门文化建设创新项目”案例发布，<http://www.wenlvnews.com/p/746602.html>。

融入国门文化建设。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地方文化的可见度和影响力，也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展示自身文化身份的平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三是促进开放与深化跨境合作。红河州通过“硬联通”、“软联通”和“心联通”三位一体，深度促进开放与合作。在“硬联通”上，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来夯实合作根基。泛亚铁路东线建设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与越南间的货运与客运能力，为大规模经贸往来提供了物理基础：蒙自至河口的高速公路与越南的高速公路网对接，形成了高效的公路物流通道。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也持续升级河口、金水河口岸的查验设施、货场、仓储等，提升通关效率和货物吞吐能力。在“软联通”上：在机制创新与平台搭建发力，优化合作环境。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重点发展加工及贸易、大健康服务、跨境旅游、跨境电商等产业。并推出一系列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措施，如“边境贸易结算全程电子化”“跨境劳务合作”等，探索破解跨境合作的制度性障碍。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产业，建设保税仓、展示中心，吸引电商企业入驻，打造面向越南及东盟的跨境电商集散地。不仅积极推进中国（河口）—越南（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旨在形成“两国一区、封闭管理、境内关外、自由便利”的特殊监管区域，促进产业深度对接与融合。在“心联通”上：通过系列人文交流活动增加民心相通元素，体现了“国门文化”在开放合作中的润滑剂作用。比如持续多年的品牌项目“边民大联欢”，以组织中越两国边境地区的民众开展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美食节等互动活动，来促进民间友谊。例如，在2025年春节期间，红河州与越南老街省联合举办了盛大的跨国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中越建交75周年“中越人文交流年”的亮点活动。每年在河口举办的“中越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不仅是经贸洽谈的平台，更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展演、旅游推介活动，“兴边富民”工程显有成效，真正做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教育医疗合作方面，红河州的高校与越南高校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双方医疗机构也在传染病防控、应急救援等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口岸出入境人流量持续增长，商贸、旅游、教育、探亲人员往来频繁，口岸经济活力十足。依托自贸试验区平台，吸引了一批加工制造、商贸物流企业落户，促进了当地产业发展和就业。

文旅融合、民族文化遗产与跨境合作不仅提高了红河州文化的外向度，促进文旅产业繁荣，而且实现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有效转换。特别是在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地理和文化的双重优势，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通过缔结边境友好村寨、定期举办跨国文化节庆活动，强化了与越南等邻边国家的文化联系，也为边境地区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认同感注入了新的活力，不断加深与邻边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互鉴和理解，有效地促进边境地区文化和谐，构筑了和平稳定的边境文化环境，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边境合作提供了有力示范。

三、红河州“国门文化”建设的困难与疏解

云南省的“国门文化”建设体现了一种多维策略的实施，红河州也不例外。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激发地方的内生动力，并推动文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策略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空间开发、节庆艺术宣传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驱动与跨境旅游发展以及数字平台开发与人文交流合作。红河州的实践展示了云南如何利用其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优势，通过创新和策略性的方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的新发展路径。这些多维策略不仅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新的样本与范式，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展示了文化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和谐与地区发展中的核心价值 and 重要作用。从实践情况来看，红河州在推进“国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多重挑战，在规划和执行层面存在几个显著的问题，影响了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和深度，也制约了“国门文化”建设的整体效果和影响力。

一是整体规划和系统推进机制不健全，跨界合作机制不完善。各县市在实践过程中多有重复和同质化，资源配置不够科学，活动形式和内容缺乏创新，难以形成特色和亮点，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从建设的内容来看，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交流平台搭建等方面多呈现碎片化特征，这种碎片化减缓了建设的进度，也降低了建设的效率和质量，成为“国门文化”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的桎梏。此外，与周边国家如越南、老挝等的文化交流合作多间断性和项目化，缺乏长效机制的支撑，文化交流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大打折扣。跨界合作的不稳定性体现在合作项目的选择和实施上，缺少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例如，为方便中越跨境两族贸易往来，绿春县没有成熟的“口岸”，仅能依赖每月固定开放的“通道”为越南莱州省勐谟县村寨提供购物便利，但这种文化交流更多依赖于临时项目和活动，不规范且缺乏持久的交流平台和制度安排，在交往中容易出现跨文化冲突，增加了合作往来的不确定性。针对上述问题，首要任务是顶层设计发力，加强系统化规划，确立统一的“国门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和行动框架，出台相关指导性的跨国文化合作的法律、政策法规，解决可能出现的文化冲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和会议机制。同时，应探索建立跨国文化项目的共同资金池，以保证项目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整合文化、旅游以及外事等相关部门的资源力量，避免资源浪费和工作重复，推动建设内容的创新和多样化，提升“国门文化”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

二是文化创新与传播效能协同不足。尽管红河州在与越南、老挝等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取得一定进展,但这些努力同时揭示了其在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和转化上的不足。快速变化的全球文化环境要求传统文化不仅要得到保护和传承,还需通过创新的方式进行重新包装和推广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当前,红河州的文化资产传播和利用主要停留在传统层面,缺乏与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段的有效结合,使得这些文化遗产在文化交流上未能充分发挥其潜在价值。解决这些问题,亟待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新的需求,在“国门文化”建设中,构建一个全面的文化资产管理与创新体系,制定科学的规划和政策,加强对传统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分类,对标各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传承需求,制定更加精准和有效的保护措施。应积极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和创新路径。利用数字化技术重现历史文化场景,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人工智能(AI),让更多边民即使在家也能体验民族文化魅力,结合现代传播手段,如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等,举办在线文化节、虚拟展览等活动,拓宽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和受众范围。此外,加强文化创意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强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通过搭建文化创意孵化平台,支持文化企业和创意工作室的发展,鼓励术家、设计师和手艺人融合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开发符合现代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最后,加强对文化创意和数字技术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提供人才支撑。设置针对性的教育课程和工作坊,鼓励年轻一代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创新的热情和想象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中。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与公共文化服务失衡。跨境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设施建设进展缓慢、规划不合理及管理维护不到位。例如,绿春县的边民“通道”加强了与越南的文化交流,但受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整体投入仍显不足,暂未建成标准化“口岸”,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更新进度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在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存在统筹兼顾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绿春县的交通基础设施、开放程度以及群众思想观念相比河口、金平两个“口岸”县仍然有差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在区域间和群体间发展不均衡。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优先将“国门文化”项目列入重点发展计划,增加专项资金支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统筹用好省级财政资金,整合文化惠民项目资金,确定中央和省级对新建、改造、提升文化口岸交流中心,建设“国门文化”友谊广场、建设“文化睦邻示范区”等项目的补助标准。新建和改造一批图书馆、文化馆、国门书社、文化服务中心等。其次,采取多维度综合策略,建立多元的投融资机制,鼓励和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国门文化”建设及相关领域,通过独资、合资、参股、联营、合作及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产业项目开发、文化产品生产运营和文体赛事运营,提高建设效率,增强私人投资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家给予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促进文化均衡发展。针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均衡问题,需要强化服务内容的设计与规划,特别是扩大对民族边境地区及其他特殊人群的文化服务覆盖范围,开发针对性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活动。利用数字化手段拓展服务范围和深度,如建立在线文化平台,提供虚拟展览、在线演出等服务,突破文化服务的地域限制;同时,推动地方政府之间的文化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通过建立跨区域文化合作机制,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有效用,缩小各地区之间文化服务供给差异。政府部门加强横向联系,协调推进区域间的文化项目合作,共同开发文化活动,分享文化资源,依托边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沿边跨国的文化资源市场,积极支持培育文化企业、文化创意园区和文化旅游融合景区等,发展边境地区的文化旅游产业。再次,重点培育特色文化街区和集市,融入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助力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文化贸易和合作交流,盘活和挖掘边境地区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培育文旅新产品、新品牌和新业态,促进边境州市、县市的协同发展。最后,建立健全监测评估体系,强化文化建策略与措施监管和评估机制,确保文化建设有效性,促进区域内的文化互鉴与和谐共生。

结语

在“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语境下,云南作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各国的陆路通道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既是边疆“战略前沿”,又是具有门户功能的辐射“端口”。“国门文化”通过保护和传承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挖掘和整合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积极探索文化资源的现代化利用,开发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生活,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机会和创收途径。积累地方的文化资本不仅激发了乡村地区的内生动力,还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衍生的文化产业发展也激发了边民内生发展动力和创业热情,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真正践行了“兴边富民”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焕发出边境地区文化的生机与魅力,促进了国内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与深入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独特的文化力量。从文化治理的角度看,“国门文化”建设的实践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例。文化交流平台的建立、文化教育项目的开展,有效提升了边民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也促进了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了乡村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介入现代化文化管理理念和技术不仅提高了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还增强了公众对文化活动的参与度和满意度,通过“国门文化”

建设促进了文化立法和政策创新,建立了一套更为完善的文化保护和发展机制,为其他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展望未来,“国门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战略应聚焦于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国际文化合作,加大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要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宽度,探索更多元化的交流形式和合作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构建开放、包容、互鉴的文化交流体系,为全球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有益的经验,为促进全球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EB/OL]. https://www.yn.gov.cn/ztgg/jdbyyzzsjzydfxfyqj/2025jw/chjmwxx/xxbj/202503/t20250326_310633.html.
- [2] 红河概况[EB/OL].<https://www.hh.gov.cn/zjhh.htm>.
- [3] 李智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困境与前瞻—以云南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大学学报, 2014(2).
- [4] 阎德华.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跨越性[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4(2).
- [5] 解丽霞,郭一.仪式·记忆·符号:中华传统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路径, [J]. 贵州社会科学,2025年(2):76-83.
- [6] 李文军,陈妹.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挑战及其创新[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23(03):23-30.
- [7] 龙玉其,和润铃.兴盛、冲击与调适: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族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基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市S乡B村的调查[J].青海民族研究,2022,33(02):42-52.
- [8] 红河州4个案例入选!“2025 国门文化建设创新项目”案例发布[EB/OL],<http://www.wenlvnews.com/p/746602.html>.

"Cultural Exhibition" to "Development Engine": A New Paradigm and Synergy of Borderland Development Driven by National Gate Culture

Lv Shilin¹ Li Hongjin¹

¹HongHe Prefectural Party Scho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ngzi, Yunnan 661199,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Culture" is a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ncept first proposed by Yunnan Province on July 1, 2020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proposal of this concept is coupled and sticky to effectively connect with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National Gate Culture" plays the role of a new spatial channel for touris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experience border culture, and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lubricant" in exchanges an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border people. Taking Honghe Prefectur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Yunnan Province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s a typical case, by analyzing its practical model of national g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we demonstrate how national gate culture is a special cultural capital and soft power. Through multiple paths such a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people-to-people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strengthening, it effectively drive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stability and opening up in the border areas,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coordinated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gate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border areas. The study found that nat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a cultural window to show the national image, but also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strategy of "promoting the border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stabilizing the border and consolidating the border". Its successful "South Yunnan Experience"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for other border ethnic areas.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e; ethnic areas; rur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周旭¹

(1.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党校,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该思想系统继承并创新性发展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传统生态智慧,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催发了中华文明生态智慧的当代觉醒。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构建了包含价值理念、系统观念、制度保障和全球视野的完整理论体系,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推动了当代中国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同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哈尔滨市党校系统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HD01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99

当今世界,全球气候极端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日益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探寻一条可持续的文明发展道路,是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我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生态问题也逐步凸显,自然资源逐渐紧缩。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可持续道路,是当务之急。时代的课题,实践的呼唤,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引。2021 年 7 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党一百年来奋斗经验,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并首次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在此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运而生,成为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现象是,这一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科学思想,蕴含着极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理念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然而,这些传统的生态理念在历史上多以朴素、直观的形式呈现,如何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与实践课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突出贡献也正在于它完成了对这生态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它并非简单地复古或照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的现实与世界的发展的实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进行提炼、升华和再造,赋予其崭新的科学内涵、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实现了从传统哲学思辨到现代科学理论、从零散观点到系统体系、从理想愿景到实践指南的历史性飞跃。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这一“双创”过程,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路径,实现引领中国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愿景目标。

一、源与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思想,无疑为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和历史镜鉴。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思想诞生并发展于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是处于较低生产力水平下的人类对于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一种原始反映,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机械性和片面性。因此,

作者简介:周旭(199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法学硕士,中共哈尔滨市松北区委党校助教,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它们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蕴含着生态哲学的感悟，对于人与自然关系道德性的劝诫和对自然规律的经验性总结，并非是基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生态科学理论。其内在局限性亦不容忽视：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和被动顺应色彩，多局限于思想层面的道德规劝，不凸显实践性功能，缺乏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层面的制度性保障。对于客观发展规律也缺乏主动性和科学认识，在强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下，这些朴素意识往往显得脆弱。因此，传统生态智慧虽然指明了方向，却难以完整提供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全套方案。它如同珍贵的“种子”，需要适宜的现代“土壤”才能生长为参天大树。这份“唤醒”古老智慧并赋予其当代生命的伟大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卓越创造之中。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石。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它强调二者的和谐统一，而非对立与征服。儒家从道德伦理角度阐释“天人合一”。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体现对自然生命的仁爱和取物有节的节制观。孟子明确提出“仁民爱物”思想，将对人的仁爱扩展至对万物的关爱，并倡导“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揭示了遵循自然规律方能实现永续发展的朴素哲学。《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更是将“中和”视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法则。

道家则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将“天人合一”思想推向极致。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将“自然”视为宇宙的最高法则和终极价值。庄子倡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主张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以平等、齐一的观点看待万物。关于自然规律，道家主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6]，即要顺应自然的本性和规律行事，反对人为地干预和破坏自然秩序。除此之外，佛家作为外来文化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其“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核心观念与我国古代生态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依正不二”的深刻认知，认为众生（正报）与其所依存的环境（依报）是一体不二、休戚与共的关系。

（二）“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观

在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体系中，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照，还衍生出一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准则。这套准则深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清醒认知，以及对永续发展的朴素追求。儒家思想为这一实践观提供了深厚的伦理基础。孟子“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著名论述，绝非简单的生产技巧指南，而是把对自然资源运用的思考纳入“王道仁政”的治理框架中，逐步上升为政治层面应遵循的道德律令。孟子的理念核心在于“时”，即遵循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和季节节律，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等掠夺式的开发模式。荀子进一步从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阐述“节用”的重要性，他在《天论》中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强调只有将发展农业生产（强本）与节约消费（节用）相结合，国家才能抵御自然风险进而保持富裕。这种“节流”与“开源”并重的思想，展现了古人超越单纯节俭、谋求动态平衡的高远智慧。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实践观并未止步于思想家的书斋里，而是深刻地渗透到国家治理、经济政策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可持续特征的实践思想和制度安排。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亦体现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如都江堰水利工程遵循“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的原则，实现了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利用，历经千年仍福泽一方，是“取之有度”的工程典范。在经济思想方面，反对奢侈浪费、倡导俭朴节用一直是主流的价值观念。历代王朝大多在建国初期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让被过度征用的自然系统和民间社会得以恢复生机。这些从哲学思考到制度实践、从精英倡导到民间践行的广泛探索，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实践路径，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古代生态保护的法律与制度雏形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生态保护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着古代统治者的生态治理智慧。早在西周时期，官方就设立了“虞衡”这一官职，专门负责掌管山林川泽，制定相关禁令，保护生物资源。保护自然资源的条款也是屡见不鲜，如《秦律·田律》明确规定，春天二月禁止砍伐山林、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肥、采摘刚发芽的植物，堪称中国最早的“环保法”之一。包括《唐律疏议》《大明律》等在内的历代法典中，也均有对破坏山林、稼穡、水源等行为的惩处条款。这些制度律令虽服务于当时的统治秩序，但客观上对保护生态环境、维持农业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在治理层面的初步体现。

综上所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智慧，它们共同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然而，受制于时代与认知的局限，这些思想大多停留在哲学思辨、道德劝诫和零散实践的层面，未能形成一套应对工业文明时代大规模、高强度生态危机的系统性、科学性方案。历史的重任，交给了能够继承其精神并赋予其新生命的时代思想。

二、破与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观相结合，立足中国当下实际，创造性地实现了当代中国生态思想的发展和飞跃。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根本动力源于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生态实际与党肩负着的宏大历史使命。这一转化绝非简单的概念移植和形而上学式的机械拼接，而是一场基于魂脉契合的深刻重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发挥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先进性，遵循理论和实践发展逻辑，用唯物史观动态考察历史、辨明文化糟粕和精华，同时运用辩证法这一伟大工具，“破”“立”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创新：“破”的是传统思

想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模糊性、被动性和零散性，“立”的是传统生态智慧的核心理念，并为之注入科学的精确性、实践的主动性和系统的整体性。这是一个“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升华过程。例如，它将“天人合一”从哲学理念转化为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科学方略；将“节用”思想转化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范式革命。这一转化的本质，是使传统生态智慧摆脱历史局限性，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获得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

（一）转化之基：立足新时代的生态国情与全球视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首要基础，是对我国当下生态国情的深刻把握与强烈的问题意识，以肩负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使命担当开展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资源消耗强度居高不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大气雾霾笼罩、河流黑臭浑浊、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频频出现，不仅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更演变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民生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消耗自然资源换来的经济发展注定不能长远，这笔“生态账”算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大业。习近平总书记的“欠账”意识和对人民健康福祉的深切关怀，构成了这一思想形成最直接、最迫切的现实动因。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优美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回应这一时代呼唤和人民需要，满足人民对蓝天白云、清水绿岸的迫切期待，成为这一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根本出发点和实践落脚点。

这一转化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立足于全球生态治理的宏大视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当今世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随着技术的迭代更新，地球逐渐演变为一个“地球村”，国家和地区成为“村民”的单元存在，生态危机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历来负责任的大国，基于对全世界各民族命运的体察和关怀，迫切需要探索出一条超越传统工业化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双赢的可持续发展新路，这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也关乎全球生态安全和人类存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着重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的观点，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这种宏大的人类史观和超越民族的历史担当，也侧面要求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既是对内解决自身发展难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外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客观需要，体现了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协调和深刻思考。

（二）转化之径：赋予传统智慧新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在发展和生存的现实需要驱动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进行了深入的扬弃与升华。首先，它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创造性地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我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引领和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一论述摒弃了传统思想中机械的、被动适应的部分，以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为依据，科学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将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节用思想，历史性升华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早在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绿水青山”代表着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金山银山”代表着物质财富和经济发展。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节用”观在约束消费上的局限性，深刻指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优美的生态环境本身就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催生新的业态、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价值论和发展路径上实现了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再次，它将“仁爱万物”“万物一体”的伦理观战略性拓展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生态观。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各个要素是唇齿相依、紧密联系的。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因此，生态治理必须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对传统整体观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最后，它将零散的、依附于封建皇权的环保律令，革命性发展为“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构建了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生态补偿制、河湖长制、林长制等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制度相继建立并持续发挥强大威力，生态文明建设驶入了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实现了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一系列“创造性转化”，传统生态智慧抛却了其历史局限性，被注入了科学的基因、时代的血液和实践的灵魂，从而获得了指导当代中国伟大绿色变革的强大力量。

三、承与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如果说“创造性转化”侧重于对传统要素的现代化改造，那“创新性发展”则实现了全局性的理论超越与体系构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经过转化的传统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了有机融合，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核心目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核心路径与动力，“生命共同体”是根本方法论，最严格的法治是坚实保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全球视野。这五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实践论问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性创新，标志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思想向成熟科学形态的飞跃，不仅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基础，更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难题贡献了兼具东方智慧与现代科学的中国方案。

（一）理论创新：构建系统科学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卓越理论贡献，在于它彻底超越了传统生态智慧的零散性和朴素性，首次构建起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并非各个观点的简单堆砌，而是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核心要义，从价值理念、系统思维、制度保障和全球视野等多个维度展开的有机整体。其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创造性地将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结合起来，破除了“先发展还是先保护”的争论，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同时将自然资源的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统一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延续的千年大计，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向引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立足我国幅员辽阔、地貌多样的地理实际，提供了认识和处理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论，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法治思想，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硬约束和刚性保障，确保了生态文明理念能够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这一理论体系的创新性还体现在具备高度的综合性与开放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非封闭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它深刻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精华，继承并发展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探索成果，同时批判吸收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先进理念。尤为重要的是，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对其中生态智慧进行了科学的升华与再造，使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最终，这一思想体系将生态文明的理念提升到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实践指导力和国际感召力。

（二）实践创新：指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变革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实现了理论上的伟大创新，更引领了中华民族存续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一实践创新首要体现在顶层设计的重塑上，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美丽中国”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之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地位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这一宏伟蓝图指引下，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得以全面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打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高悬，推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到实处，有效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环保不下河”的体制机制障碍。

实践创新的广度与深度还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绿色转型上。在路径选择上，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逐步走向协调。在制度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生态补偿制、环保信用评价制、河湖长制和林长制等创新制度全面实施，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内生动力。放眼全球视野，中国积极承担大国责任，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郑重提出“双碳”目标，成功举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为全球气候治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了强大动力。这些广泛而深刻的伟大变革，充分证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强大的思想武器，更是引领中国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行动指南。

四、价值与启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双创”的历程，其深远价值在于引发了一场发展观、价值观和文明观的伟大革命。在理论上，它首先卓越地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生态领域的重大创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重塑了传统智慧的哲学基础，又用中华文明生态智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成为“两个结合”的典范。其次，它极大地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证明了古老智慧在解决当代难题时的独特价值，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强大支撑。在实践上，它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优美生态环境作为基本民生；必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克服短视行为，坚持久久为功；必须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从根本上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这些从伟大实践中总结的启示，不仅为中国的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范式。

（一）理论价值：融合与超越的智慧之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首要理论价值，在于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深度融合，开辟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学说。这一思想并非简单的理论拼接，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进行科学的提炼、改造和升华。它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哲学基础上对“天人合一”等传统观念进行重塑，从朴素直观体验上升为建立在现代生态学、系统科学基础上的科学理性认识；同时，它又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积淀的生态智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使其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种深度融合，既克服了传统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又避免了西方生态理论脱离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谈保护的弊端，真正实现了“两个结合”在生态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生态理论建构中的主体性和文化自信。

这一思想的理论价值还体现在其对全球生态治理话语体系的超越与贡献。它以其系统性、前瞻性和实践性，超越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界长期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也超越了“深绿”与“浅绿”之争，提出了一条兼顾保护与发展、平衡当代发展与后代需求的辩证道路。特别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根本上破除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对立的传统思维定式，为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坐标和理论范式。同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将全球生态治理提升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思想引领力和理论感召力。

（二）实践启示：迈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更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性、方向性的实践启示。启示首先在于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落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上，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导向，以环境质量的切实改善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深刻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雾霾、黑臭水体、土壤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攻坚克难，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果。

至关重要的另一项实践启示是，必须始终保持持续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定力，探索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现代化新路。生态环境改善是长期努力、久久为功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清醒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绝不能因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就动摇决心、放宽要求、重走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必须咬紧牙关，保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与此同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五、结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学说，是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在新时代结出的丰硕果实。它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全球视野和科学的理论体系，成功实现了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思想形成过程，绝非简单的“复古”或“嫁接”，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的理

论革命和实践创新。

它从传统中走来，却超越了传统；它回应时代之问，又引领未来之路。它使“天人合一”的古老生态智慧获得了科学的时代内涵，使“取之有度”的朴素道理升华为绿色发展的全新路径，使“万物一体”的哲学思辨转化为“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方略，使零散的环保律令发展成为最严格的法治保障体系。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图景正在神州大地徐徐展开。这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也必将对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继续深入学习、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态必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历史责任与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105.

[3][5]方勇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5,31.

[4][6]张景,张松辉译注.道德经[M].北京：中华书局,2021:114,174.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Relation to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Zhou xu¹

¹*Party School of Songbei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28,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shares a profound intrinsic connection with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This thought systematically inherits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such as "the unity of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Dao follows the way of nature." Rooted in the need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it has catalyzed the contemporary awakening of ecological wisdom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ered 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t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ystem encompassing values, systematic concepts,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 This provides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drives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and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从“北人南迁”的视角探析南宋泉州港的兴盛

杨哲¹ 肖雅婷¹

(1.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10691)

摘要: 从北宋末期起, 泉州港迅速发展成中国三大海外交通港口之一。宋廷南迁和大规模的北民入闽对泉州港之发展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首先, 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政府相比于前朝更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 其各种鼓励外贸的政策措施推动泉州港的对外贸易不断向前发展; 再者, 大规模的北方移民正是推动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度过了初期的人地压力之后, 福建的农工商业与泉州港的外贸发展都从移民中受益匪浅。

关键词: 南宋; 泉州港; 海外贸易; 兴盛原因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3

引言

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 在中外关系交流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泉州港是南宋时与广州港、明州港并称的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在隋唐以前, 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并不显著, 直至唐代中期, 泉州才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海内外商人汇集的都会。到北宋时期, 由于统治阶层实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的良好环境, 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南宋时期, 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速度相比于唐朝、北宋时期强劲迅猛了许多, 在南宋初年, 泉州港的对外贸易已获得同两浙路同等的地位, 到了南宋中后期泉州港的地位已经与广州港不分伯仲。直至元朝时期, 泉州港的发展正式超越广州港, 在国内是名副其实的首位对外贸易港口, 在国际市场上也是著名的世界性商贸港口。

纵观泉州港的发展历程, 笔者认为泉州港的发展之所以在元朝能达到顶峰, 这与其在南宋时期的积累密不可分, 泉州港的发展在唐中期到北宋时期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 但在南宋时期的发展速度确是十分强劲迅猛、势如破竹。为何在南宋时期, 泉州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如此强劲迅猛的发展? 南宋时期泉州港海外贸易兴盛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关键原因? 对于泉州港兴盛原因的探讨, 学术界已多有讨论, 成果颇丰, 例如周中坚认为宋代泉州港的兴起是由于当时阿拉伯商人所经营的海外贸易在东南亚需要一个大的港口, 而港口的位置恰好在泉州地区得到了平衡和统一^[1]; 戴显群认为唐宋之际泉州港贸易的发展, 主要是由于唐末五代泉州相对稳定的环境和当时福建经济的发展^[2]; 庄景辉将元代泉州港繁盛的原因归结为蒲寿庚弃宋降元保全泉州城、元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积极态度以及元初泉州所处的特殊政治军事地位^[3]。学界讨论的结果归纳起来主要包括这几点: 泉州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便利的对外交通、政府重视海外贸易、造船与航海技术发达、国内外销售市场广阔、城市商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 在此不一一赘述。

如上所述, 对于泉州港兴盛原因的探讨, 大多数的学者是将宋元两朝并立讨论^[4], 对泉州港的发展做一个较长时段的观察, 或者是只重点讨论最鼎盛的元朝时期, 但却忽略了泉州港发展的冲刺阶段——南宋时期这一特殊阶段的讨论。再者, 学者们讨论的视角多集中于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社会环境、水陆交通等方面, 但笔者认为, 除了上述等原因, 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对外贸易能够取得如此迅速且强劲的发展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即宋室南渡和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经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后, 宋室政权南移至临安, 大规模的北方人口也随之南迁到南方各地, 其中, 由于福建地区久未受战乱影响, 成为了移民争相前往的乐土, 福建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人口增长的高峰, 在此之前闽中从未涌入过如此大规模的北方移民。

作者简介: 杨哲(2003—), 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肖雅婷(2002—),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通讯作者: 杨哲

人口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人口的结构、数量、质量、迁移等内容关乎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便是占传统经济主导地位的农业生产;再者,人口对古代经济的手工业、商业贸易也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于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还需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统治政权也南移至江南一隅,在传统社会里,政治权利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是无孔不入的,宋室南渡对当时整个南方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将尝试梳理这样一个问题:从“北人南迁”这一视角出发,探析南宋时期统治政权南移以及底层群众南迁入闽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二、宋室南渡---推动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主导力量

宋代的海外贸易,是在宋王朝严格控制下进行的。统治阶层的态度及其所实行的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兴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经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后,逃到江南一隅的南宋阶层,面对着赋源比北宋少,但军费等各项开支却与日俱增的情况,紧急的财政问题迫使统治者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增加财政收入,维持其国家财政的运转,这其中也包括重视发展海外贸易,以此获取巨额的市舶收入来缓解其财政问题。

相比于北宋政府,南宋统治者采取了更多的措施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绍兴年间,宋高宗曾下诏:“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出于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南宋统治者大力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来华贸易,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对外贸易的政策,在此列举两条代表性的举措:第一,积极招徕外商,对促进海外贸易有积极贡献的华商和外商予以官职。绍兴六年(1136年),知州连南夫奏云:“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5]。”后来又规定,“闽广舶物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次推赏。”大食商人蒲罗辛和泉州的纲首蔡景芳,都曾经因为贩入各种海外宝货以及招商有功而补官承信郎。第二,宋政府每年设宴犒劳外商,外商有在华居住权和贸易权,外商的财产、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权利也受到保护,并有入学、入仕的机会。南宋统治者对来泉州通商的阿拉伯人,为他们专门设计了居住的“蕃坊”。在这些侨商的聚居区,他们甚至建立了学校,有了所谓的“蕃学”之称。桑原鹭藏在《蒲寿庚考》中说:“有宋一代,阿拉伯人来华互市者多,侨居各港埠,或于城内与华人杂处,或居有宜所,谓之蕃坊,泉州蕃坊在州城之南,即泉南地临晋江,便于出海,故置蕃坊于此。”《方輿胜览》也记载道,泉州“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玢、琉璃、异香、胡椒之属。”当时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在泉州经商定居,现今泉州已经出土了200多方阿拉伯墓碑,这上面的石刻是研究历史时期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

诚然,宋廷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确实对泉州港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除了政策因素的加持,部分南宋皇室迁至泉州也为泉州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宋金战争的不断摩擦,导致建炎初年南宋皇室的一大宗支---南外宗正司迁至泉州躲避战祸,据史料记载:

“(建炎三年)甲午皇叔右监门卫大将军眉州防御使知南外宗正事士樽,言自镇江募海舟载宗子及其妇女三百四十余人至泉州避兵,乞下泉州应副请给,许之。于是秘阁修撰知西外宗正事令广,亦自泰州高邮军迁宗子等百八十人至福州避兵^[6]。”

大批的皇室宗室纷至沓来,宗室子弟不仅干预市舶事务,更有宗室成员担任市舶官员的记载,杨文新在其论文《宋代市舶司研究》中就总结道:“有25位宗室曾经担任过市舶官员……其中广南路7人、两浙路4人、福建路14人。”这些宗人在任期之内,大多遵守且实行南宋政府颁行的鼓励外贸的政策,都为招徕外商和泉州的海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还需注意的一点是,与宗室子弟同时相伴的还有“士大夫避难入福建”。因此,泉州在这一时期聚集了一个颇有规模的消费阶层:他们主要由皇室成员和部分官僚士大夫组成,是最具实力和财力的奢侈品消费者,这为泉州进口的香药犀角、珠宝百货等奢侈品提供了很大的消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

然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宋金战争和宋廷南迁对国内的各个港口造成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各港口的海外贸易也呈现不平衡发展的状态,其中受宋金战争影响较为明显的是两浙路的港口,建炎三年至建炎四年金兵两次进入江浙地区,劫掠两浙诸港,“所过燔灭一空”,杭州、明州等港口遭到严重破坏。金兵北撤后,南宋王朝为防备金兵从海上北来直捣两浙,特地在明州等贸易港口设立水兵屯驻,且经常强征民间海船充当兵船,这使两浙诸港的对外贸易又更加的举步维艰。毋庸置疑,宋金战争和宋廷南迁对两浙诸港口的海外贸易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但是反观泉州港,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宋金战争中成为了南宋统治阶层后方避风港的存在。这样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实际上给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最为直接的影响即是使得泉州港相比北宋时期更加靠近政治中心,这也同时意味着泉州港更加靠近海外进口的香犀珠宝等货物的消费中心。

南宋时期,临安作为都城,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消费能力最强的特大城市了,并且临安聚集了规模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整个南宋皇室、庞大的官僚集体以及众多的富商大贾;临安的大街小巷都有蓄货销售,《梦粱录》里记述有“犀皮铺”、“珍珠市”、“香药社”等商铺,都是经营进口商品的专门店铺和市场。很多商人“于泉、广蕃名下转买已经抽解胡椒、降真香……往临安府市舶务住卖。”因此,泉州港作为这一时期没有受到战争破坏且外贸一直向前发展的对外港口,成为了满足临安市民以及统治阶层对海外舶来品的消费需求的重要商品来源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宋廷南迁对泉州港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南宋统治者实施的一系列鼓励华商和外商对外贸易的政策,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强大的主导作用和助推作用,统治者的鼓励政策就像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操控着外贸发展的方向,推动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不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南宋政权南移至临安以及部分宗室成员南迁至泉州,都为泉州港的进口商品提供了规模颇大的消费群体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

三、北民入闽——推动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动力阶层

(一) 人口增长带来的负担与红利

上文已有谈到,经靖康之乱后,宋室政权南移至临安,大规模的北方人口也随之南迁到南方各地,其中,由于福建地区久未受战乱影响,成为了移民争相前往的乐土,福建地区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人口增长的高峰。短时期内大规模的北方人民涌入福建对当地的影响有利亦有弊,一方面短期内人口的急剧增长会对土地造成极大的负担,尤其是福建境内山多田少,相比于江南,耕地的面积较为有限,移民最初亟待解决的问题即是粮食问题;另一方面人口的急剧增长也为当地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促进了福建地区的开发,对福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都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福建部分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并且推动了当时福建境内最大的港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如上所述,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北民入闽的角度出发,阐述移民初期的人口增长情况,以及大规模北方人民涌入闽中为福建和泉州港带来的负担与红利。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两宋以前由于前朝多次战乱的影响,已经有中原人口陆续地涌进闽中,使福建部分地区的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且促进了福建经济的发展,到了北宋末年,由靖康之难引起的大规模移民入闽,不可避免地对福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更加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宋史·钦宗本纪》记载,“河东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波河南奔,州县皆空。”于是有“士民扶老携幼,适汝、颍、襄、邓避难者莫知其数。”据吴松弟推算,靖康之乱大约导致了500万人口南迁,由此可见移民规模之大^[7]。据宋初《太平寰宇记》载全闽总户数达到46万户,比唐朝元和年间翻了6倍,到了南宋绍兴三十二年,闽中户数为1390566,口数为2808851,分别比北宋元丰初年增长33%和37%。到了嘉定十六年,福建户数和口数分别达到了历史性的1599214和3230578,又比绍兴三十二年增长了15%。这一时期福建人口急剧增加,但同时期内,福建耕地却不可能像人口的增长幅度那样保持相同的比率,尤其是福建境内山多田少,相比于江南,耕地的面积较为有限。因此,人口与耕地,人口与粮食生产之间的比例失衡成为必然。

短期人口的暴增迫使福建农业需要及时自我调节,南宋时福建地区解决人稠地狭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开垦新地、加强精耕细作以提高粮食产量;其二是争取不到土地的人民只能转变谋生的方式,将多余劳动力转移至其他行业,例如手工业和商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泉州港经过北宋时期的发展,对外贸易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并且海外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许多过剩的劳动人口投身出口商品的生产,例如丝织品、瓷器的生产;本身已经占有土地的农民,受海外贸易的影响,为获取利润,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会进行甘蔗、荔枝、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笔者认为人口压力虽然在南宋早期给福建地区造成了人多地少的严重矛盾,但也迫使福建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多余的劳动力寻求到了新的谋生方式,诸如投身手工业和商业,尤其是受当时外贸利润的影响,众多劳动人口投身当时海外市场所需的出口商品的生产 and 经营,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相比北宋时期数量更多、品质更加优良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这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港口贸易的向前发展;因此,大规模的北方移民进入福建,实质上是推动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内生动力,渡过了初期的人地压力,福建的农工商业与泉州港外贸发展都从移民中受益匪浅,下文笔者将从农业、手工业两方面展开论述,讨论在南宋时渡过了初期的人地压力的福建地区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品的发展对港口贸易的促进作用。

(二) 农业的发展

移民初期为了缓解人口迅速膨胀所带来的粮食问题,当时的福建人民加紧扩大耕地面积,积极开发农业资源,改善水利灌溉条件。由于福建整体的地形是背山面海,所以人民扩大耕地的方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其一是向山林争地,即在山区开垦营造梯田;其二是向江海要田,即沿江沿海开辟滩涂、围垦良田。因此,在南宋时,邵武军境内呈现“由高下百叠”的景色,而建宁府、南剑州则出现“田数百级阶”的壮丽图景,可知当时梯田已遍及高

山峻岭。在沿海平原地区,由于人民的辛勤耕作,东湖、南湖相继退水复耕,泉州、福州等沿海地区终使大片盐碱地变为良田,获耕地“殆千余顷”。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作用下,福建地区的耕地面积都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大,水利灌溉系统有全面的改善,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提高。靖康之乱时期福建境内由于人口急剧增长造成的粮食供应不足问题,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到了南宋时期终于得到了较好的缓解: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汀州、漳州的粮食供应通常可以自给自足,如果遇到米产不足的年份,可以靠地域内的土产得到补充;福州、兴化军、泉州的粮食供应会较为不足,因此这三个地区为了确保粮食需求,会较为依赖从外地特别是两浙和广南一带输入米谷。

在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福建地区的耕地面积都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大,水利灌溉系统有全面的改善和兴修,不仅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得到提高,农副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也得到提高,尤其是诸如甘蔗、荔枝、茶叶等经济作物。福建地处亚热带,气候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热同期,光照和降雨量都很充足,最适合于种植木棉、桑麻、甘蔗、荔枝、茶叶等亚热带作物。其中,木棉和桑麻的种植大大的促进了福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笔者将在下文手工业部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在此部分,笔者将主要探讨在南宋时期福建人口急剧增加的背景下甘蔗、荔枝等代表性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港口贸易的联系。

甘蔗往往加工成蔗糖后再输送到港口进行贸易,蔗糖是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蔗糖的外销情况可见于《诸蕃志》等书,主要外销对象有占城、真腊、三佛齐、佛罗安,马来西亚西岸等国,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因蔗糖有一定的外销市场,所以种植甘蔗比生产粮食能得到更加丰厚的利润,“窖蔗糖为霜,利当十倍。”且大量的移民进入福建开垦到了新地,因此相比于前朝,在南宋时期有更多原本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民兼营甘蔗的种植与加工,甚至于出现了专门种植甘蔗和制糖的糖霜户:“糖霜户治良田,种佳蔗,利器用,谨土作一也,而收功每异。自耕田至沥瓮殆一年半,开瓮之日或无铢两之获,或数十斤,或近百斤,有暴富者。”甘蔗的种植对于精耕细作的要求很高,但由于蔗糖获利较为丰厚,蔗区也在不断的扩大,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淮浙者,不知其几千万坛,蔗之妨田固矣。”等现象。由此可见,蔗区的不断发展已经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了蔗粮之争的矛盾。

除了蔗糖之外,荔枝也是泉州港对外贸易的主要农副产品之一。宋代四川、广南都有出产荔枝,但荔枝的生产 and 出口都以福建为盛:“南闽荔枝名四方”,“闽中所产比巴蜀南海尤为殊绝。”荔枝销路良好,极受欢迎,“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其东南舟行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由此可见,荔枝的销路较广,外销需求也很大,因此荔枝外销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促使许多争取到土地的移民进行荔枝的种植和经营,并且为了获得更大的贸易利润,各家种植者们不断创新,加强优质荔枝的生产,形成了良性的竞争关系,因此相比于前朝,南宋时期的种植者们培育了不少新品种,例如陈紫、方家红、游家紫、宋公荔枝、蓝家红、周家红等优良新品种。除了培育新品种,种植者们还留意到荔枝保质期短,因此人们又对荔枝进行加工,使之能较为长期的贮存,若是长途泛海贸易亦不容易腐烂损坏,例如用红盐法将荔枝制成荔枝脯,这样加工的荔枝“三四年不虫,修贡与商人皆便之。”另有日晒法,以“烈日干之,以核坚为止,蓄之瓮中,密封百日。”加工中还添加辅料制成各种风味,如丁香荔枝等。通过各种加工方法,人们将荔枝做成荔枝脯、荔枝干、荔枝蜜等贮存期较长的产品,更有利于运销海外。优良品种和荔枝加工成品的出现更进一步的促进了南宋时期福建荔枝对外销售的增长,荔枝的对外贸易也因此长盛不衰。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福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们的发展表明原先较为单一的粮食生产体系已逐渐向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体系过渡,农业由原先自给自足的状态向商品化的方向迈进。它们生产的扩大以港口外贸的需求为条件,反过来又极大的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其中,移民的大规模加入为两者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支撑:一方面,大规模的移民入闽开发了更多的农业资源,例如耕地的扩大和水利的兴修,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移民也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投身于经济作物的生产和经营,众多的种植者形成了良性的竞争,促进了新品种的不断出现和农副产品的加工,不仅保证了港口对外贸易的货源供应,也为海外市场提供了更丰富更优质的出口商品,从而促进了海外市场的扩大以及泉州港港口贸易的持续兴盛。

(三) 手工业的发展

在手工业经营这方面,上文已有谈到经济作物中的木棉和桑麻的种植大大的促进了福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主要探讨在南宋时期大规模北民入闽的情况下福建棉丝织业、制瓷业等代表性手工业的制造与港口贸易的联系。

中国的棉丝织品历来深受海外人民的喜爱,因此棉丝织品的出口规模在手工业品中占比很大,虽然棉丝织业只是作为农村的家庭副业所存在,但对外贸易所能获取的丰厚利润,以及大规模移民的增加,致使福建诸州郡相比于前朝时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农家妇女投入了棉丝织业的生产,并能织出具有地方特点的花色品种。泉州港对外

销出的棉丝织品主要包括布帛两类，布类即是包括棉布、麻布等各种布匹，南宋时期由泉州港运销海外的布类，主要包括：青布、印花布、红布、五色布、青白土印布等等。上文已有谈到，福建的气候适合于种植木棉，木棉的大量种植为布类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上述外销的各色布类，均为福建及泉州本地所能出产，《泉州府志》有载：“绵（棉）布即吉贝为之，七邑俱有，苧布，即青山苧，有用糯糊烈日中抽过而织之曰糊布；又有夜露日晒，其色自白曰白纱布。”至于染制各色布匹的染料，据《八闽通志》所载：“蓝淀、紫草、红花，以上三种蓝、紫、红染料，诸县皆有。”

帛类即是丝、绸、绢、缎等丝绸产品的总称，南宋时期从泉州港运销到海外的丝绸品种有：白丝、南北丝、绸绢衣、细绢、五色绢缎、花色宣绢、青皮单锦、建宁锦等等。上文已有谈到，福建气候适合于种植桑麻，桑麻的种植为蚕桑事业和丝织品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上述所列举的各种外销的丝绸产品，查福建方志的记载，大多数是为福建本省各地所能生产的产品。如《八闽通志》所载：“泉州府有土绢，俱出晋江、南安、同安三县；又建宁府土绢，俱出瓯宁、浦城二县。”以及“红绿锦出建阳，今有濯锦桥。”《闽产录异》所载：“福州所织绢，薄者名灯纱，厚者名厚绢。”《寒秀草堂笔记》有载：“泉州有本机素绫、花绫，漳纱之属。”当然，缘于移民带来的先进的丝织工艺以及港口贸易所带来的利润，促使这一时期福建地区的棉纺织技术在不断提高，“百工技艺敏而善仿，北土缁纛，西番毳罽莫不能成。”尤其是泉州地区，在吸收了北方丝织工艺的同时，又继承了江浙一带的丝织技术。南宋建炎三年因战乱，宋廷将原本主管国家纺织的“南中正纺织司”从江苏镇江迁至泉州，该机构的迁移直接把当时先进的蚕桑纺织技术带到泉州，苏颂《送黄从政宰晋江》诗曰：“泉山南望海之滨，家乐文儒里富仁。弦诵多于邹鲁俗，绮罗不减蜀吴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在海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以及大量移民的增加，致使福建诸州郡相比于前朝有数量更为庞大的农家妇女投入棉丝织业的生产，相比于北宋时期，南宋时的福建棉丝织业得到了更加蓬勃的发展，同时棉丝织技术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不仅为泉州港的对外棉丝织品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也进一步推动了棉丝织品对外销售的增长。

中国的瓷器历来是在海外贸易中久占鳌头的大宗贸易品，每年都有很大的外销量，在早期制瓷业是以北方为盛，但瓷器容易破碎，陆路长途运输既不方便，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在海外市场的需求下，福建地区利用优越自然条件，就地取材烧造陶瓷，以供泉州港启运外销，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因此瓷器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吸引了众多的商人和劳动人口投身于瓷窑的建设和瓷器的生产。在两宋以前，福建制瓷业的发展并不显著，但到了北宋中后期，福建的制瓷业已经开始兴起，直至南宋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入闽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加之海外贸易的不断刺激，导致福建的制瓷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和发展。今天在宋泉州、兴化军范围内发现有唐五代窑址 18 处，发现宋元窑址 137 处，在闽北、连江、福清、闽侯、厦门及闽西等地也有宋元窑址的发现。

在福建的众多窑场中，外销规模最大的窑场当属德化窑，其生产高度发展，目标主要瞄准国外市场的需求，所以生产的瓷器一方面着眼于外销实用的生活用品，一方面迎合国外宗教信仰所需而生产大量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器物，主要以碗居多，其次有军持、壶杯、瓶、碟等。还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时景德镇创烧的青白瓷以质量优渥著称于世，这一名瓷博得了海外的青睐而作为贸易瓷行销亚洲各国，由此青白瓷成为当时国际市场的畅销。国外这样喜爱青白瓷，于是德化窑的工匠们便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和有利条件，不失时机地大量制造生产青白瓷，以适应这一特殊需要。由于德化窑青白瓷的大量外销，在海外多个国家的古代墓葬和遗址中都留存了它们的痕迹，流传在各国博物馆中的传世品也不少。最近几年来，根据国外调查发掘出土的资料看，南宋时期德化窑生产的各类瓷器，在东南亚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均有较多的发现；在印度、日本、伊朗、阿拉伯以及东非沿岸等国家也有出土德化窑的瓷器；在非洲的肯尼亚以南的坦噶尼喀境内出土了德化窑的青花瓷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化窑生产的早期白釉器，在菲律宾群岛的古文化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1964 年以来，在菲律宾发现数千件比较完整或能够复原的德化窑古代瓷器，其中以马尼拉圣安娜贝湖西端的内湖的加莱港等遗址最为集中。

福建的古外销瓷，曾在中国制瓷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福建众多窑场的工匠为当时瓷器的大规模对外输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研究各国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断对瓷器的釉色、造型、装饰进行设计，使之尽量投合海外消费者的要求和爱好，因此其产品始终得以在国际市场上销路大开，这不仅促进了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日益兴盛，更重要的是持续向海外市场打响了“中国名片”，传播了中华文化。

如上所述，南宋时期福建地区的棉丝织业和制瓷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当然，除了以上列举的两种手工业，南宋时福建地区的其他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诸如造船业、铜矿业、造纸业、印刷业、煮盐业等等，在此不一赘述。这一时期手工业得到全面发展的底层逻辑与经济作物扩大生产的逻辑是一致的，它们的发展以港口外贸的需求为条件，反过来又极大的促进了港口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其中，移民的大规模加入为两者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支撑和技术革新：一方面，大规模的移民入闽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福建的众多手工业诸如制瓷业、造船业、铜矿业、煮盐业等工序复杂，每一行业都需要众多的工匠才能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出口商品，大量的移民涌入无疑为上述的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撑；另一方面，大量的北方移民和江浙移民带来了先进的丝

织工艺和制瓷工艺,推动了棉丝织业和制瓷业在技术上的革故鼎新,不仅保证了港口对外贸易的货源供应,也为海外贸易提供了种类更多品质更优的出口商品,从而促进了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持续性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泉州港之所以在南宋时期能有如此强劲迅猛的发展,宋廷南迁和大规模的北民入闽在其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首先,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政府即是港口贸易的掌舵人,统治阶层的态度及其所实行的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兴衰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南宋统治者相比于前朝更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并颁行实施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其各种政令措施就像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操控着外贸发展的方向,推动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不断向前发展。

再者,大规模的北方移民即是促进港口贸易持续发展的续航者,底层的移民群众虽然身份卑微,社会地位边缘化,但是他们数量众多,并且各司其职,正是他们的存在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支撑,为福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的支持和技术上的革新,不仅使得原先较为单一的粮食生产体系逐渐向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体系过渡,农业、手工业由原先自给自足的状态向商品化的方向迈进;并且促使福建沿海地区形成了农副产品生产、手工业生产与海外贸易相结合的产业链条,从而促进了海外市场的扩大以及泉州港海外贸易的持续性发展,为元朝时期泉州港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性商贸港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周中坚. 古代泉州港兴衰史浅探 [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1, (4): 70-76.
- [2]戴显群. 唐代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史述论 [J]. 海交史研究, 2000, (2): 8.
- [3]庄景辉. 略论元代泉州的繁盛及其原因 [J]. 东南学术, 1989, (1): 45-50.
- [4]吴泰, 陈高华. 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和泉州港的兴衰 [J]. 海交史研究, 1978, (1): 12.
- [5]脱脱. 宋史 12 [M]. 宋史 12, 1977.
- [6]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 [M].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 2013.
- [7]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 第五卷, 明时期 [M]. 中国移民史. 第五卷, 明时期, 1997.

An Analysis of the Prosperity of Quanzhou Por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rtherners' Migration to the South"

Yang Zhe¹, Xiao Yating¹

¹*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1069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Quanzhou Port had rapidly developed into one of China's three major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ports. The relocation of the Song court to the south and the large-scale migration of northern people into Fujia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Quanzhou Port. First, compared with previous dynasties, the Southern Song government, which had taken refuge in a corner of the Jiangnan region, was more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overseas trade. Its various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encourage foreign trade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growth of foreign trade at Quanzhou Port. Furthermore, the large-scale northern migration served as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trade at Quanzhou Port. After weathering the initial pressure of population on land, both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Fujian and 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of Quanzhou Port benefit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immigrants.

Keywords: Southern Song Dynasty; Quanzhou Port; Overseas Trade; Reasons for Prosperity

沉浸式体验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机制研究

胡琦¹

(1.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本研究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以唐山河头老街为对象,探究沉浸式体验对游客满意度的影响机制。构建“技术-场景-文化”三维沉浸体验模型框架,采用 PLS-SEM 与 fsQCA 混合方法分析 371 份游客问卷数据,结果显示:场景、技术与文化沉浸通过二阶沉浸感形成协同效应;情绪价值是沉浸感影响满意度的关键中介,其作用受价格敏感度动态调节:价格敏感度在沉浸感与情绪价值交互时起抑制作用,但在沉浸感转化为情绪价值过程中呈现适度正向调节;fsQCA 识别出四条高满意度组态路径。本研究构建了文化遗产沉浸体验的多维解释框架,提出“情感阈值-价格弹性”动态平衡模型,为工业遗产活化与文旅项目优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沉浸式体验;情绪价值;价格敏感度;游客满意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67

引言

沉浸式体验利用数字技术在文化空间中创造高代入感与互动性^[1],是活化工业遗存、实现“遗产保护-产业转型-消费升级”协同的关键路径。当前研究局限显著:一是聚焦技术或场景沉浸的二元分析,忽视文化沉浸作为价值内核的作用^[2];二是沉浸体验影响满意度的机制多依赖线性模型,未能揭示经济理性与情绪价值的复杂非线性互动^[3]。为此,本研究提出“技术-场景-文化”三维整合框架,基于情感评价理论构建“沉浸感→情绪价值→满意度”传导路径,并引入价格敏感度作为调节变量。方法上,结合 PLS-SEM 检验协同效应及传导路径,运用 fsQCA 识别高满意度多元等效组态。以河头老街为案例,旨在解构“文化溢价-技术增值”转化机制,揭示多维要素非线性作用规律,基于“情感阈值-价格弹性”平衡为精准定位、体验设计及可持续运营提供路径。

一、基本概念与文献回顾

(一) 沉浸式体验

沉浸式体验源于心理学的“心流理论”,指个体完全投入活动时的深度专注状态^[4]。数字技术发展下,其文化旅游内涵拓展为:技术层^[5]、空间层^[6]、文化层^[7]。本研究整合技术哲学与文化地理学,解构沉浸式为技术、场景、文化三维度,构建“技术赋能-场景重构-文化再生”分析框架。

(二) 工业遗产活化

工业遗产活化需平衡保存与更新^[8]。实践中,文旅融合开发成为重要模式^[9]。本研究基于“创造性破坏”理论,聚焦历史文脉与当代技术交互的空间生产机制^[10]。唐山河头老街项目植入盛唐文化重构遗址,验证“分层记忆”理论——不同历史文化元素可在空间对话^[11],为差异化开发提供新路径。

(三) 游客满意度

游客满意度是体验感知与期望值的函数差异^[12]。文化遗产旅游中,其形成具有特殊性:文化资本转化效率^[13]、技术介入的真实性争议^[14]、价格敏感度对情感的调节^[15]。本研究引入情感评价理论,构建“沉浸刺激-情感响应-价值判断”传导模型,重点关注价格敏感与情感补偿的动态博弈,拓展了遗产旅游情感反应模型。

二、研究假设

作者简介:胡琦(1998—),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融合创新与新业态发展。

(一) 沉浸体验维度协同效应

技术、场景与文化沉浸维度在文化遗产旅游中非线性叠加：技术沉浸（重构时空叙事，增强互动真实感）、场景沉浸（激活感官记忆）、文化沉浸（触发深层文化认同）相互耦合。三者通过二阶沉浸感形成协同增效机制。据此提出假设：

H1：技术、场景与文化沉浸通过二阶沉浸感形成协同效应。

(二) 情绪价值的中介效应及其情境依赖性

基于情感评价理论，沉浸体验通过认知唤醒与情感激发塑造情绪价值。情绪价值在沉浸感与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价格敏感度动态调节传导：对沉浸感→情绪价值路径有正向调节（适度敏感产生“情感补偿”）；对情绪价值→满意度路径有负向调节（高敏感抑制情感投入）^[16]。据此提出假设：

- H2：情绪价值在沉浸感与游客满意度间发挥中介作用；
- H3：价格敏感度对沉浸感→情绪价值路径有正向调节效应；
- H4：价格敏感度对情绪价值→游客满意度路径有负向调节效应。

(三) 多要素组态效应

工业遗产旅游价值转化依赖技术、场景、文化沉浸与价格敏感度的非对称匹配。高文化沉浸提升支付意愿，高技术沉浸降低价格敏感性，高场景沉浸主导消费决策^[17]。据此提出假设：

H5：存在多种高满意度组态路径，技术、场景、文化沉浸与价格敏感度呈现互补替代关系。

(四) 理论整合模型

构建整合模型（图 1）：沉浸层（技术-场景-文化沉浸耦合）通过二阶协同效应（H1）奠定基础；传导层（情绪价值）受价格敏感度动态调节（H3-H4）；情境层界定调节边界。方法上：PLS-SEM 验证链式路径与调节效应，fsQCA 解析组态模式（H5），互补验证线性与非线性机制，提出系统决策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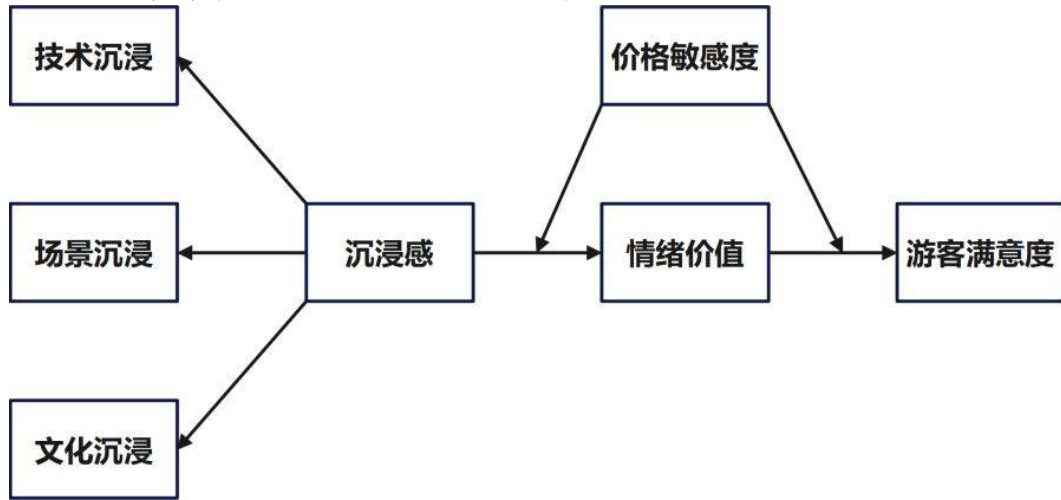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 案例简介

本研究选取唐山河头老街为典型案例^[18]，其典型性在于：地处中国近代工业文明核心区，依托含国家级文保的完整工业遗产群^[19]；创新融合工业遗产空间叙事与盛唐文化符号；集成 AR、全息投影、智慧声场等数字技术，打造虚实共生沉浸界面（如立面投影、交互导览）。该案例开创“工业遗产+文化转译+科技赋能”模式，通过建构性保护实现历史存续与文化再生。其典型性体现于三重逻辑：历史空间转译解码文化基因、数字技术重构遗产价值、业态创新激活情感认同，系统呈现工业遗产从物质保存到价值升华的活化进程，为揭示沉浸式体验中技术-场景-文化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机制提供关键实证。

(二) 问卷设计

问卷基于系统性量表开发原则设计。开篇阐明调研目的并承诺数据匿名保密。变量测量题项源自成熟量表，

经双向翻译、专家评审及预调研 (n=50) 修订与检验 (Cronbach's $\alpha > 0.85$, 因子载荷 > 0.7)。最终问卷含 18 个李克特 5 点量表题项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到访次数等人口统计信息。

(三) 数据收集及样本情况

本研究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在唐山河头老街景区进行现场问卷调研。为减少外生变量干扰, 选择工作日与周末均衡的连续 7 天覆盖景区全运营时段。共发放问卷 392 份, 剔除无效样本后获有效样本 371 份 (有效回收率 94.6%), 满足 PLS-SEM 模型 10 倍观测变量数的样本量要求。样本特征 (表 1) 显示年龄分布均衡、性别比例相当、教育梯度完整, 符合知识型消费定位。

表 1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N=371)

变量	特征	总频数	比例%
性别	男性	190	51.21%
	女性	181	48.79%
年龄	18 岁以下	47	12.67%
	18-35 岁	179	48.25%
	36-55 岁	109	29.38%
	56 岁及以上	36	9.70%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11	29.92%
	大专/本科	220	59.30%
	硕士及以上	40	10.78%
收入水平	3000 元以下	104	28.03%
	3001-6000 元	73	19.68%
	6001-9000 元	73	19.68%
	9001-12000 元	62	16.71%
	12000 元以上	59	15.90%
到访频次	首次到访	295	79.51%
	2-3 次	51	13.75%
	4 次及以上	25	6.74%

(四) 方法

本研究整合 PLS-SEM 与 fsQCA 进行模型构建与假设检验。PLS-SEM 不要求正态分布, 适合中小样本及含形成型测量的高阶潜变量结构, 用于路径分析。fsQCA 则基于集合关系, 识别导致高游客满意度的多重并发因果路径, 揭示变量间非对称互动模式。二者结合实现方法学三角验证, 增强结论的严谨性与解释力。

(五) 同源方法偏差

本研究通过过程控制与统计检验控制同源方法偏差。问卷设计时, 随机打乱技术沉浸、场景沉浸、文化沉浸、情绪价值、游客满意度、价格敏感度等变量的测量题项顺序, 以减少模式化反应。统计上, Harman 单因素检验显示第一公因子解释方差为 37.17% ($< 50%$)。基于 PLS-SEM 的完全共线性检验表明所有一阶变量 VIF 值均低于 5。综上, 同源方法偏差在可控范围内, 不影响后续 PLS-SEM 路径分析、中介调节效应及 fsQCA 组态研究。

(六) 模型与信效度

本文构建的沉浸感为核心变量, 设计为形成型二阶潜变量, 由场景沉浸、技术沉浸、文化沉浸三个反映型一阶潜变量构成。模型估计时, 将一阶潜变量得分作为二阶变量的观测指标, 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路径分析及调节效应检验。

反映型变量 (场景沉浸、技术沉浸、文化沉浸、情绪价值、价格敏感度、游客满意度) 的量表质量检验结果见表 2: 因子载荷均 > 0.7 , Cronbach's α 和 CR 值均 > 0.7 , AVE 值均 > 0.5 , 满足指标信度、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要求。区别效度经 Fornell-Larcker 准则检验合格 (见表 3), 各变量 AVE 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

表2 一阶反映型变量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s α 系数	CR	AVE
技术沉浸	JS1	0.929	0.925	0.952	0.870
	JS2	0.932			
	JS3	0.936			
场景沉浸	CJ1	0.932	0.915	0.946	0.854
	CJ2	0.943			
	CJ3	0.897			
文化沉浸	WH1	0.951	0.932	0.957	0.880
	WH2	0.927			
	WH3	0.936			
价格敏感度	JG1	0.916	0.929	0.955	0.875
	JG2	0.944			
	JG3	0.946			
情绪价值	QX1	0.936	0.916	0.947	0.856
	QX2	0.916			
	QX3	0.923			
游客满意度	YK1	0.876	0.806	0.886	0.721
	YK2	0.886			
	YK3	0.783			

表3 变量相关系数与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价格敏感度	场景沉浸	情绪价值	技术沉浸	文化沉浸	游客满意度
价格敏感度	0.935					
场景沉浸	0.431	0.924				
情绪价值	0.334	0.206	0.925			
技术沉浸	0.521	0.402	0.283	0.933		
文化沉浸	0.530	0.419	0.221	0.381	0.938	
游客满意度	0.035	0.075	0.512	0.121	0.003	0.849

形成型二阶变量“沉浸感”的检验结果见表4：技术沉浸、场景沉浸与文化沉浸的权重均显著且 >0.2（技术沉浸最高，文化沉浸次之，场景沉浸为 0.748）；各一阶变量的 VIF 均 <5，表明维度选取合理且无严重共线性问题。

表4 二阶形成型变量测量

二阶变量	一阶变量	权重	T 值	P 值	VIF
沉浸感	技术沉浸	0.816	24.544	0.000	1.276
	场景沉浸	0.748	12.649	0.000	1.323
	文化沉浸	0.752	12.537	0.000	1.298

四、研究结果

（一）路径分析

采用 PLS-SEM 分析，模型评估指标良好：技术沉浸、场景沉浸、文化沉浸、游客满意度和情绪价值的 R²值分别为 0.588、0.609、0.604、0.30 和 0.145；所有内生变量 Q² > 0；场景沉浸 (f²=1.560)、技术沉浸 (f²=1.429) 和文化沉浸 (f²=1.523) 对二阶沉浸感的效应量达高水平。

Bootstrap 检验(5000 次)显示 (表 5)：场景沉浸、技术沉浸和文化沉浸均显著正向影响二阶沉浸感 (H1 成立)；二阶沉浸感显著正向影响情绪价值与游客满意度；情绪价值对满意度有强直接效应。价格敏感度调节效应显示：沉浸感×价格敏感度→情绪价值的路径系数显著为正，情绪价值×价格敏感度→满意度的路径系数显著为负 (H3、H4 成立)。沉浸感→情绪价值→满意度的间接效应为 0.102，沉浸感→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为 0.102 (95%CI 均不包含 0)，表明情绪价值起部分中介作用 (H2 成立)。价格敏感度在“沉浸感-情绪价值-满意度”路径中呈现“抑制-强化”的双元调节规律。

表 5 直接效应分析结果

假设	路径	路径系数	T 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假设检验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H1	技术沉浸→沉浸感	0.437	18.770	0.000	0.396	0.487	支持
	场景沉浸→沉浸感	0.419	21.720	0.000	0.380	0.457	
	文化沉浸→沉浸感	0.434	23.002	0.000	0.396	0.472	
H2	沉浸感→情绪价值→游客满意度	0.102	3.172	0.002	0.042	0.168	支持
H3	价格敏感度×沉浸感→情绪价值	0.128	2.938	0.003	0.040	0.210	支持
H4	价格敏感度×情绪价值→游客满意度	-0.161	4.107	0.000	-0.235	-0.083	支持
	沉浸感→情绪价值	0.210	3.241	0.001	0.087	0.339	
	沉浸感→游客满意度	0.102	3.229	0.001	0.046	0.169	
	情绪价值→游客满意度	0.485	9.118	0.000	0.377	0.584	
	价格敏感度→情绪价值	0.270	3.976	0.000	0.137	0.404	
	价格敏感度→游客满意度	-0.134	2.662	0.008	-0.231	-0.035	

(二) 组态分析

基于样本数据的 5%、50%和 95%分位点设定校准锚点，将结果变量（游客满意度）及条件变量（情绪价值、价格敏感度、场景沉浸、技术沉浸、文化沉浸）转化为模糊集隶属度。必要性检测（表 6）显示无单一必要条件（所有一致性<0.9），高满意度需多要素组态驱动。

表 6 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游客满意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场景沉浸	0.709	0.676
~场景沉浸	0.577	0.661
文化沉浸	0.711	0.642
~文化沉浸	0.553	0.678
技术沉浸	0.628	0.691
~技术沉浸	0.639	0.630
价格敏感度	0.660	0.688
~价格敏感度	0.637	0.662
情绪价值	0.773	0.711
~情绪价值	0.523	0.626

设定一致性阈值 0.8、PRI 一致性 0.65、案例频数 1，得到四条高游客满意度组态（表 7）。总体一致性 0.809，覆盖度 0.595，满足充分性。

表 7 高游客满意度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高游客满意度			
	S1	S2	S3	S4
技术沉浸		⊗	●	●
场景沉浸	●	●	⊗	
文化沉浸	⊗		●	●
情绪价值	●	●	●	●
价格敏感度	⊗	⊗		●
一致性	0.895	0.882	0.883	0.828
原始覆盖度	0.333	0.351	0.326	0.469
唯一覆盖度	0.009	0.013	0.008	0.118
解得一致性	0.809			
解得覆盖度	0.595			

注：●表示外围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外围条件不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空自表示前因条件的存在与否都不会影响给定结果。

具体而言, 组态 S1 表明, 通过高场景沉浸、低文化沉浸、高情绪价值与低价格敏感度的组合可以实现高游客满意度; 组态 S2 表明, 通过低技术沉浸、高场景沉浸、高情绪价值与低价格敏感度的组合可以实现高游客满意度; 组态 S3 表明, 通过高技术沉浸、低场景沉浸、高文化沉浸与高情绪价值的组合可以实现高游客满意度; 而组态 S4 则表明, 即使缺乏场景沉浸, 通过高技术沉浸、高文化沉浸、高情绪价值与高价格敏感度的组合同样能够实现高游客满意度。这四条路径展现出以下关键共性: 情绪价值稳定存在于所有组态, 是基础要素; 沉浸要素(技术、场景、文化)至少出现两项, 具替代性; 价格敏感度在 S1、S2、S4 中作为情境依赖的辅助条件。综上可知, 实现高游客满意度需保障情绪价值, 并组合至少两项沉浸要素; 价格敏感度非普适要求, 其作用依特定沉浸组合而定。

五、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证实, 场景、技术与文化沉浸通过二阶效应协同驱动游客满意度, 验证了文化遗产旅游中“空间叙事-数字赋能-文化认同”三元耦合机制的核心作用。情绪价值是关键中介变量, 其传导效应受价格敏感度动态调节: 在沉浸体验向情绪价值转化过程中, 适度价格敏感度可增强效率; 而在情绪价值影响满意度阶段, 高价格敏感度则削弱其正向效果, 揭示了“情感阈值-价格弹性”的动态平衡规律, 修正了价格敏感度仅为抑制因素的认知。fsQCA 分析识别出多条等效的高满意度路径, 最具代表性的是体现“文化溢价-技术增值”的“高技术沉浸+高文化沉浸+高情绪价值+高价格敏感”路径, 以及凸显感官刺激主导价值的“低价格敏感+高场景沉浸”路径, 共同证实了价值转化机制的多元性与沉浸体验多维度构成的核心发现。

(二) 管理启示

构建“空间叙事-数字赋能-文化认同”三位一体框架: 融合盛唐文化与工业遗存强化场景叙事, 应用 AR/VR 等技术打造交互界面, 设计文化认同触点实现遗产创新表达。实施“情绪价值-价格弹性”精细管理: 针对高情绪价值/高价格敏感客群开发文化技术稀缺性溢价产品; 针对低价格敏感/高场景沉浸客群强化普惠性感官体验, 动态监测避免商业化侵蚀情绪价值。依据 fsQCA 组态精准运营: 为技术/文化沉浸双高客群提供旗舰高端体验; 为场景沉浸主导客群打造震撼易触达体验; 配套中端产品组合优化资源配置。建立沉浸效能迭代机制: 运用 PLS-SEM 监测技术/场景/文化沉浸协同效能及情绪价值影响, 优化模块并精准设计情感触点以保障体验持续提升。

(三)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局限: 其一, 横截面数据难以揭示游客感知动态及项目长期效果, 未来需纵向追踪分析沉浸感、情绪价值累积及价格敏感度调节的演化过程。其二, 现有量表对“盛唐-工业”融合语境下的文化沉浸测量不足, 未来应开发更具文化遗产旅游特异性、反映文化交融复杂性的多维量表, 并通过多案例验证。其三, 单一案例结论普适性受限, 未来需多案例比较检验三元耦合机制、动态平衡模型及组态路径的稳健性与边界。其四, 情绪价值中介的情境依赖性及价格敏感度“双刃剑”调节的内在心理机制剖析不足, 未来可结合深度访谈、情境实验或神经科学指标解析其微观机理。其五, “技术-场景-文化”框架未充分纳入个体特质、社会互动及项目运营等潜在变量, 未来可引入作为调节/控制变量完善模型。

参考文献:

- [1] Paananen V, Kiarostami M S, Lik-Hang L, et al. From Digital Media to Empathic Spac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athy Research in Extended Reality Environments[J]. ACM Computing Surveys, 2023, 56(5): 1-40.
- [2] Kukshinov E. Unestablished Boundaries: The Capabilities of Immersive Technologies to Induce Empathy, Tell Stories, and Immerse[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24, 12.
- [3] Li G, Lin S, Tian Y. RETRACTED ARTICLE: Immersive Museums in the Digital Ag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Virtual Reality on Visito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24, 16: 2.
- [4] Csikszentmihályi M. Beyond boredom and anxiety[C]. 1975.
- [5] Brailovskaia J, Teichert T. “I like it” and “I need it”: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associations, flow, and addictive social media use[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0, 113: 106509.

- [6] Jang S, Park J, Engberg M, et al. RealityMedia: immersive technology and narrative space[J]. *Frontiers in Virtual Reality*,2023,4.
- [7] Hodel L, le Polain De Waroux Y, Garrett R D. Characterizing culture's influence in land systems[J]. *Nature Sustainability*,2024,7(8):973-982.
- [8] 王浩, 谢鹏, 鲁婵, 等. 场所文脉主义语境下工业遗产保护与传承策略研究——以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规划为例[J]. *规划师*,2025,41(01):132-136.
- [9] 李修远, 郭舒. 文化和旅游融合视域下东北地区工业遗产空间分布格局及旅游利用[J]. *地理科学*,2025,45(05):1071-1082.
- [10] Zhang H. [Retracted]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Mode of Cultural Tourism under the Creative Economy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Health*,2022,2022(1).
- [11] 王建. 从文化记忆理论谈起——试析文论的传播与移植[J]. *学习与探索*,2012(11):130-134.
- [12] Cui R, Huang S S, Chen H, et al. Tourist inertia in satisfaction-Revisit relatio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20,82:102771.
- [13] Domínguez-Quintero A M, González-Rodríguez M R, Paddison B. The mediating role of experience quality on authenticity and satisf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heritage tourism[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2018,23(2):248-260.
- [14] Nam K, Dutt C S, Baker J. Authenticity in Objects and Activities: Determinants of Satisfaction with Virtual Reality Experiences of Heritage and Non-Heritage Tourism Sites[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2022,25(3):1219-1237.
- [15] Septianto F, Kemper J A, Tjiptono F, et al. The Role of Authentic (vs. Hubristic) Pride in Leverag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st Transparency[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0,174(2):423-439.
- [16] 施思, 黄晓波, 张梦. 沉浸其中就可以了么?——沉浸体验和意义体验对旅游演艺游客满意度影响研究[J]. *旅游学刊*,2021,36(09):46-59.
- [17] 马方楠. MR 体验培育工业遗产文旅消费新场景[J]. *文化产业*,2025(08):151-153.
- [18] 王丽珠. 唐山河头老街[J]. *乡音*,2024(12):3.
- [19] 王逸飞. 基于场域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创”研究——以“冀东三枝花”为例[J]. *唐山学院学报*,2024,37(01):99-108.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mmersive Experience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Hu Qi¹

¹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4,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mmersive experiences on tourist satisfaction, using Tangshan Hetou Old Street as a case study. A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scene-culture" model framework for immersive experience was constructed. Data from 371 tourist questionnaires were analyzed using a mixed-method approach combining PLS-SEM and fsQCA.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cene,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immersion form a synergistic effect through a second-order construct of immersion; emotional value is a key mediator through which immersion affects satisfaction, and this effect is dynamically moderated by price sensitivity. Price sensitivity exhibits an inhibitory effect d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mmersion and emotional value, yet it demonstrates a moderate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mmersion transforming into emotional value. fsQCA identified four configurational paths leading to high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immersive experiences in cultural heritage contexts and proposes a dynamic balance model of "emotional threshold-price elasticity".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projects.

Keywords: Immersive Experience; Emotional Value; Price Sensitivity; Tourist Satisfaction

桂西北居民低碳体育旅游需求与参与行为特征研究

张迪¹ 关正² 黄震霆² 赖炳辉²

(1.河池学院, 广西 河池 546300, 2.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 肇庆 526000)

摘要:本研究以桂西北地区居民为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探究低碳体育旅游需求。结果显示,居民认知中等偏下但重视其重要性;骑行等成主流偏好,高学历高收入者偏爱环保健康项目;动机聚焦个体健康与环保,未婚重生态、已婚顾健康。参与频率两极分化,消费低且多自主组织。主要障碍为信息、交通和时间问题。据此提出强化宣传、优化产品、完善设施、培育社群等建议,助力区域低碳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低碳体育旅游;桂西北地区;居民需求;参与行为;发展对策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专项课题《桂西北低碳旅游——体育旅游需求与参与研究》(2023ZJY1810);2025 年度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科研规划项目立项,肇庆市低碳旅游——体育旅游需求与参与研究(KYC202503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7

一、绪论

(一) 研究背景

在“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的政策引领下,我国体育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进程显著提速。伴随国家“双碳”战略的纵深推进,绿色经济转型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命题。桂西北地区凭借其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地貌、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天然具备发展低碳体育旅游的优越条件。当前,体育与旅游的共生关系愈发紧密,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顺应了全球绿色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更能通过精心打造节能环保的体育旅游线路、举办特色赛事以及建设示范基地,有效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潜能,为乡村振兴注入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低碳+体育”这一复合业态,以桂西北地区为典型样本,深入探究当地居民对低碳体育旅游的特殊需求特征。此举既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又为民族地区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实践范例,兼具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桂西北地区为空间载体,围绕“低碳+体育”复合业态展开全面且系统的探究。研究旨在运用多维度数据分析方法,深入揭示该地区居民对低碳体育旅游的真实需求特征与参与行为规律。具体而言,本研究致力于解决以下核心议题:一是精准识别低碳体育旅游的核心客群及其人口学特征;二是明确不同低碳旅游方式的产品偏好排序;三是深入剖析影响参与决策的动机机制;四是系统解构实际参与行为的时空特征;五是全面诊断当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障碍。最终,本研究期望遵循“需求现状—行为规律—瓶颈诊断—路径优化”的逻辑链条,构建一套适用于桂西北地区的低碳体育旅游发展理论框架,为桂西北乃至同类区域的文旅融合实践提供科学、规范的决策支持。

作者简介:张迪(1989—),男,硕士,讲师,体育教育训练、休闲体育;

关正(1988—),男,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体育教育运动训练、体育旅游;

黄震霆(1998—),男,博士研究生,职称未评,篮球;

赖炳辉(1998—),男,学士,职称未评,体育旅游。

通讯作者:关正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一) 研究设计

本研究秉持定量研究的方法学理念, 聚焦于运用问卷调查法作为核心数据采集手段, 并依托统计学分析工具达成研究目标。针对桂西北地区居民这一特定研究对象, 充分考量该区域人口分布特点及研究实施的实际可行性, 选取分层随机抽样策略构建样本体系。具体而言, 依据城乡属性 (涵盖城市、县城、乡镇、农村)、年龄层次 (划分为 18 岁以下、19 - 35 岁、36 - 50 岁、51 岁及以上) 两个维度进行精细分层, 以此保障样本结构的多元性与代表性。本次研究共投放问卷 800 份, 经回收整理后, 获得有效问卷 666 份, 有效回收率达 83.25%。随后, 通过严格的逻辑校验与完整性筛查, 筛选出的高质量数据被纳入最终分析环节。

(二) 数据来源与信效度

本研究的数据均源自自主设计的结构化问卷, 该问卷围绕多个关键领域展开, 包括人口学特征、低碳体育旅游认知水平、参与行为表现、动机态度倾向以及障碍感知情况等。问卷设计融合了李克特量表、多选题及开放性问题等多种题型, 既实现了量化指标的精确测量, 又为质性分析提供了丰富的补充素材。

有效性检验: 在正式调研前开展预调研工作, 旨在及时发现并修正题项表述中存在的歧义问题。为确保问卷量表的可靠性, 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进行检验, 结果显示 α 值为 0.71,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能够稳定地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

(三) 方法论优势

本研究凭借大样本量化数据, 深入挖掘群体层面的行为规律, 同时借助理论驱动的分析框架, 赋予研究更强的系统性与深度解释力。分层抽样设计显著提升了样本的代表性, 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和说服力。此外, 运用多维度分析技术, 实现了从微观个体行为特征到宏观市场发展趋势的跨层次解读, 为桂西北地区低碳体育旅游产业的精准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科学依据。

(四) 名词解释

关于“低碳体育旅游”的概念与定义。低碳体育旅游定义为以个人理由或动机 (度假或非商业或职业/商业)、旅行 (离开日常的居住或工作地点)、偶发 (临时性) 或组织性 (规划性) 方式、参加 (主动) 或观赏 (被动) 运动活动与运动景点^[1]。

体育旅游参与动机的定义为健康与体能、体育运动体验与挑战、新奇与自我满足、社交与休闲参与、犒赏自己及运动文化偏好等^[2]。

三、低碳体育旅游需求特征分析

(一) 认知与态度现状

为精准把握桂西北地区居民对低碳体育旅游的认知程度,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展开深入测度。在有效样本量为 666 份的条件下, 受访者对低碳体育旅游的认知呈现出鲜明的梯度分布态势。从具体数据来看, 仅有 3.8% (n=25)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 “了解”这一层级的占比为 26.3% (n=175); 而选择“一般”认知水平的群体占比最高, 达到 42.9% (n=286); 此外, 19.5% (n=130) 的受访者表明“不了解”, 更有 7.5% (n=50) 的受访者处于“非常不了解”的状态。将上述数据经李克特量表进行换算后可知, 受访者认知程度的均值为 3.01 ± 0.955 。这一结果清晰地反映出, 当前公众对低碳体育旅游的整体认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区间, 并且不同个体之间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

表 1 桂西北居民低碳体育旅游的知晓度表 (N=666)

非常了解	了解	一般	不了解	非常不了解	平均数
25	175	286	130	50	3.01±0.955

本研究运用李克特 5 级量表对桂西北居民就“低碳旅游重要性”的认知态度展开量化评估。统计分析数据显示, 受访者对该维度的评价均值达 11.44 ± 2.77 , 且整体数据分布经检验服从正态分布。这一结果表明, 研究区域内居民普遍对低碳旅游的价值持积极认同态度——均值显著高于量表的理论中性值, 彰显出公众对低碳旅游理念的高

度接纳；而标准差的数值则揭示了个体认知存在一定的离散程度，凸显出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不同群体间的态度异质性。

（二）产品偏好排序

本研究借助问卷调查法，实证剖析了桂西北居民在低碳体育旅游方式上的选择倾向。调研数据显示，在所提供的六类低碳旅游选项中，骑行凭借显著优势拔得头筹，累计获选 514 人次；紧随其后的是越野旅行（366 人次）、徒步（254 人次）、新能源自驾游（206 人次）、水上旅游（206 人次），其余未列明方式则获选 32 人次。

为深入挖掘背后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交叉分析法，探究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的具体偏好。统计分析揭示，受教育程度深刻影响着旅游方式的选择：本科学历群体对水上旅游展现出显著偏好（ $p=0.036$ ），其选择率与其他学历群体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在新能源自驾游项目上，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群体的选择频次同样显著高于专科学历及高中以下学历群体（ $p=0.038$ ）。此外，收入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消费分层效应，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选择徒步旅行与骑行旅游，这两类兼具较高身体参与度与环境友好性的旅游方式，反映出他们在消费决策中受健康意识与环保理念的双重驱动。上述发现有力揭示了教育背景^[3]与经济能力^[4]在低碳体育旅游需求分化中的重要作用机制。

（三）参与动机解构

本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受访者选择低碳体育旅游方式的多元动机进行维度简化。通过主成分分析联合最大方差旋转，成功提取具有解释力的潜在公因子。观测变量在各因子上的载荷呈现差异化特征：“家人推荐”（0.897）、“朋友推荐”（0.844）以高载荷值构成首要驱动维度，体现亲友群体的社会性影响；“身体锻炼”（0.756）、“环保意识”（0.690）、“探索自然”（0.666）、“放松身心”（0.607）及“其他”（0.511）依次递减，形成个体层面的次级影响因素体系。这一结果揭示，社会网络互动是核心驱动力，而个人健康诉求、生态价值观与自然体验需求则构成辅助决策框架。

基于量化统计的动机频次排序显示，“放松身心”（545 人次）、“身体锻炼”（540 人次）、“环保意识”（498 人次）构成核心驱动组合，凸显居民对身心健康维护与环境价值认同的重视；“探索自然”（474 人次）位列第四，反映生态体验需求的持续性；而“家人推荐”（176 人次）、“朋友推荐”（167 人次）及“其他”（5 人次）处于次要地位，表明社会互动因素的实际影响力相对有限。该动机谱系印证了当前居民参与低碳体育旅游的核心诉求聚焦于个体福祉与环境责任。

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法对桂西北居民进行群体细分，识别出“健康追求者”“家庭亲子型”等典型人群。差异性检验显示，婚姻状态显著塑造动机结构：未婚与已婚群体在环保意识（ $p=0.011$ ）和身体锻炼（ $p=0.022$ ）维度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未婚群体更倾向于将环保意识视为核心驱动力，而已婚群体更关注身体锻炼的功能性价值。这一发现揭示了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个体在休闲偏好与价值取向上的结构性差异，为精准化市场细分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撑。

四、参与行为特征分析

（一）行为模式量化

1. 参与频率与时长

调研结果表明，桂西北居民低碳体育旅游参与频率呈现两极分化态势。约 35% 的受访者每年参与 1-2 次，主要集中在节假日或周末等时段开展短途出行；另有 15% 的“高频参与者”保持每月至少 1 次的参与频次，其活动类型以骑行和徒步为主。

就单次参与时长而言，“半天至 1 天”是主流选择，占比 62%；其次是“2-3 天”的中短程活动，占比 28%；仅有 10% 的受访者选择“3 天以上”的长线行程，此类活动多与越野旅行或新能源自驾游等深度体验项目相关。

2. 消费水平与方式

从年均消费来看，61% 的群体年消费低于 500 元，主要集中于本地短途活动（如城市骑行）；消费区间在 500-2000 元的群体占比 28%，倾向于通过装备租赁或跨县市活动满足需求；高消费群体（年消费 2000 元以上，占比 11%）则偏好专业赛事或定制化低碳旅游产品。

3. 活动组织形式

当前活动组织以个人、家庭或情侣形式为主，占比达 89%；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组队的受访者占比 9%；仅有 2%的受访者选择旅行社或专业机构组织的活动。这一分布特征凸显出当前市场化服务供给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匹配度较低，专业化服务存在明显缺口。

五、发展障碍与满意度评价

（一）主要障碍识别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对低碳体育旅游参与障碍进行选择频次统计。在有效样本量 $n=666$ 的条件下，各项障碍按选择人数由高至低依次为：“缺乏相关信息”（440 人次）、“交通不完善”（395 人次）、“时间不足”（370 人次）、“费用过高”（235 人次）及“其他”（10 人次）。

（二）严重程度评分

本研究同步采集了桂西北地区居民对体育旅游设施与服务的满意度评价数据。就体育旅游设施而言，受访者评价分布如下：5 人次给予“非常满意”评级，15 人次选择“满意”，376 人次判定为“一般”，190 人次表示“不满意”，另有 80 人次作出“非常不满意”的评价。针对体育旅游服务质量，调查结果显示：6 人次反馈“非常满意”，20 人次选择“满意”，238 人次认为“一般”，259 人次表示“不满意”，以及 143 人次给出“非常不满意”的评价。上述数据表明，当前区域体育旅游设施与服务的整体供给质量尚未达到公众预期，尤其在基础设施完备性与服务专业化层面存在显著提升空间。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 需求特征

认知态度矛盾性：桂西北居民对低碳体育旅游的整体认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区间（均值 3.01 ± 0.955 ），但其重要性评价均值达 11.44 ± 2.77 ，显著高于量表理论中性值，表明公众虽认知有限却高度认同其价值。

产品偏好分层化：骑行、越野旅行、徒步为主流选择，高学历及高收入群体更倾向环保与健康属性突出的项目（如水上旅游、新能源自驾游），体现教育背景与经济能力对需求的分化作用。

动机结构差异化：个体健康诉求（放松身心、身体锻炼）与环保意识构成核心驱动力，社会推荐（家人/朋友）影响力较弱；未婚群体侧重生态价值，已婚群体聚焦健康功能，反映家庭生命周期对休闲偏好的塑造作用^[5]。

2. 行为特征

参与频率两极化：35%为低频参与者（年 1-2 次），15%为高频参与者（月均 1 次以上），凸显活动粘性不足。

消费水平偏低：61%群体年消费低于 500 元，以本地短途活动为主；高消费群体（11%）偏好专业赛事或定制化服务，显示消费升级潜力。

组织形式自主化：89%受访者选择个人或家庭形式，仅 2%通过专业机构参与，暴露市场化服务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

3. 发展障碍

核心制约因素：信息缺失（440 人次）、交通不便（395 人次）、时间不足（370 人次）位列前三，指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短板。

满意度危机：超半数受访者对设施（40.5%）和服务（60.4%）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亟待质量提升。

（二）对策建议

1. 强化认知引导与精准营销

构建“政府+社区+新媒体”协同宣传机制，通过短视频、体验日等形式普及低碳体育旅游的健康与环保双重价值。实施分众化传播策略：针对未婚群体设计生态保护主题内容，面向已婚家庭推出亲子健康场景营销。

2. 深化产品创新与基建配套

打造骑行、徒步等热门项目的示范线路，完善新能源交通网络（充电桩、共享电车）及沿途驿站服务。开发差异化产品线：为高学历人群设计自然科考类活动，为高收入群体提供私人订制高端服务。

3.健全服务体系与政策保障

鼓励企业推出“碎片化时间”适配产品，建立装备租赁共享平台降低消费门槛。政府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设立低碳旅游专项补贴，搭建一站式信息服务平台。

4.培育市场生态与社群经济

依托社交媒体组建垂直兴趣社群（如骑行俱乐部），通过打卡积分、会员专属权益增强用户粘性。定期举办低碳主题赛事/节庆活动，联合景区、酒店推出联票优惠，形成“活动引流—消费转化”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 [1]刘照金.运动观光理论与实务[M].中国台湾省:华杏出版社,2019.
- [2]刘照金,周丽华,庄哲仁.运动观光客参与动机、活动类型与经验性质之研究——以恒春半岛观光旅游地区为例[J].体育学报,2006,39(4),140-161.
- [3]廖春海.我国低碳体育旅游发展的走向[J].体育学刊,2011,18(04):53-56.
- [4]Thibaut E, Eakins J, Willem A, et al. Financial barriers for sports consumption: the dynamics of the income-expenditure relation[J]. Sport,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20, 10(3): 245-261.
- [5]戚文绘,赵珂铭,尹燕.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乡村旅游偏好研究——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11):102-106.

Research on the Demand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Characteristics of Low-Carbon Sports Tourism Among Residents in Northwest Guangxi

Zhang Di¹, Guan Zheng², Huang Zhenting², Lai Binghui²

¹ School of Sports, Hechi University, Hechi, Guangxi 546300, China

² School of Sports, Guangdong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residents in Northwest Guangxi and employ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demand for low-carbon sports touris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sidents have a moderate to low level of awareness but attach importance to its significance; activities such as cycling have become mainstream preferences, with highly educated and high-income groups favor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health-oriented programs. Motivations are centered on individu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th unmarried individuals emphasizing ecology and married ones prioritizing health.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shows a polarized distribution, with low consumption levels and mostly self-organized activities. The main obstacles include inform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ime constrai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to strengthen publicity, optimize products, improve facilities, and foster community engagement, thereby suppor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sports tourism in the region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relevant policy formulation.

Keywords: low-carbon sports tourism; Northwest Guangxi; resident dem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青海省旅游产业分析

王彩虹¹

(1.大理大学, 云南 大理 671000)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以及可支配收入的增加, 国内旅游业迎来了发展黄金时期。青海省作为西北内陆高原省份与少数民族聚集区, 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本文从青海省 6 个州、2 个市的旅游发展现状切入, 剖析其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为青海省旅游产业健康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对青海省实现绿色经济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青海省; 旅游产业; 高质量发展; 生态旅游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04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 旅游产业不断释放经济活力, 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受到各地政府的高度关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台的关于青海省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 年)中, 明确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原则,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服务高品质生活, 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围绕创建、提升、整治关键环节, 综合施策, 精准发力, 着力补强旅游景区发展短板, 着力提升旅游景区特色化、品质化、智慧化和国际化水平, 推动旅游景区全面提质升级^[1]。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 拥有独特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 是“国之大者”,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切实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 要把三江源保护作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 承担好维护生态安全、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使命^[2]。2024 年 6 月习总书记来青海考察时强调^[3],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丰富多样、也十分脆弱,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实现生态功能最大化, 是这一区域的主要任务。生态旅游是依托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及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展的观光、游憩、度假、体验、健康、教育、运动、文化等活动, 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效路径^[4]。青海省要在发展中优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建设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 培育生态旅游核心品牌,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既为青海省的经济发展谋求新路, 也符合当今时代绿色经济发展的潮流, 同时习总书记强调, 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乡村振兴要突出农牧民增收这个重点, 推动高原特色生态产业的发展, 推荐高原美丽乡村建设^[5]。

二、旅游与旅游业的内涵

学术界对“旅游”与“旅游业”的概念进行探讨, 《普通旅游学纲要》将旅游定义为“因非永久居住或短期逗留而产生的现象与关系的集合, 参与者通常不会长期定居, 也不从事营利活动”。该定义明确了旅游的临时性与非商业性, 但未充分界定旅游动机与目的^[6]。世界旅游组织及联合国统计署将旅游定义为“出于休闲、商务等目的, 离开惯常居住地, 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年的旅行与停留活动”^[7]。强调旅游的地理位移与特定目的。关于旅游业概念界定, 1971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描述为: “旅游业广义上是外国游客或国内旅行者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所有工业和商业活动”, 体现了旅游业的综合性。联合国《国际产业划分标准》定义为“直接服务于旅行者、依赖其消费收入的行业组合”。美国学者唐纳德·兰德伯格与雷帕 (Lei per N) 认为其是围绕旅游者需求构建的行业体系^[8]。孙尚清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尚未形成独立旅游产业; 改革开放后, 国家将旅游业定位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战略性部门, 成为重要外汇来源^[9]。尽管旅游业概念尚未统一, 但多数定义存在共识: 一是旅游业从供给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与服务; 二是核心是满足“旅游者”需求, 体现经济属性。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研究焦点, 紧随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脉络纳入旅游产业分析框架。国内学术界对其内涵的探讨虽深入, 但未形成统一见解, 主流观点可归纳为三类: 一要应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策略是通过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缓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赵昌文^[10]提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聚焦旅游领域突出失衡的问题, 金碚^[11]进一步指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需更贴合民众需求, 二要适配新时代要求的转型路径, 认为旅游业高质

作者简介: 王彩虹, (1997—), 女, 在读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

量发展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转型方向。任保平^[12]指出,其内涵涵盖提升有效供给、促进社会公正、坚守生态文明等多元目标;马茹等^[13]强调,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同于传统“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是中国应对旅游领域结构性矛盾的独特模式;田秋生^[14]则聚焦价值导向,认为其核心是以“质量与效益”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三要追求经济高效率的发展要求,实现旅游经济效率与质量的双向提升,何建民^[15]则认为其是涵盖7个核心要素的复杂系统;同时指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体系是“旅游活动参与方、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各方权益与资源”的复合体。唐任伍等^[16]强调,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全面小康、乡村振兴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是满足民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支撑;张洪昌^[17]则聚焦治理机制,从政策支持视角剖析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与实施策略。

三、青海省旅游发展现状

2023年,青海省旅游市场显著复苏:全年接待游客4476.35万人次,同比增长107.4%;实现旅游总收入430.64亿元,同比增长196.3%;游客量与旅游收入分别恢复至2019年的88%和77%^[18]。

同年,青海省多举措推动旅游产业发展:一是发放文旅主题消费券2754.51万元,直接拉动消费9559.9万元,间接带动消费6.69亿元;二是升级景区品质,评定国家4A级旅游景区11家、3A级27家,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9家,大柴旦北纬37°营地、祁连天境圣湖营地入选国家4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三是打造特色旅游IP,格尔木早码头·1960旅游休闲街区入选国家级旅游街区,青海湖旅游大道入选首批“交通运输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天境祁连”“河湟民俗文化”等11条线路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乡村四时好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19]。

四、存在问题

(一) 各市(州)旅游发展不均衡

从2018-2023年数据看,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对青海省旅游业冲击显著:2018年、2019年未受疫情影响,西宁市、海西州旅游人数均高于2023年(疫情放开后);西宁市、海东市2018-2019年的旅游收入为近年峰值。从横向对比看,海东市旅游人数高于海西州,但旅游收入总体低于海西州;海南州与海北州的旅游人数、收入基本持平;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的旅游人数与收入则持续低于其他市(州)。此外,全省旅游人数虽呈上升趋势,但游客人均消费能力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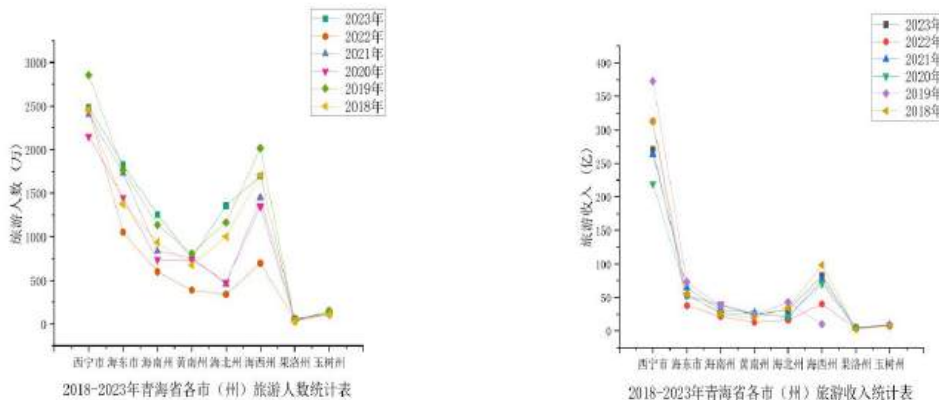


图1 图2 2018-2023年青海省各市(州)旅游人数/收入统计

(二) 资源利用与消费规模不匹配

青海湖景区地跨海南州、海北州,是青海省旅游核心名片,兼具自然湿地、青海湖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多重属性,作为省内首个国家级5A景区,为两州吸引游客、释放品牌效益发挥重要作用,但仍存在旅游资源利用不充分问题。从资源禀赋看,海南州、海北州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于海西州(见表1),但旅游人数与收入均不及海西州,资源优势未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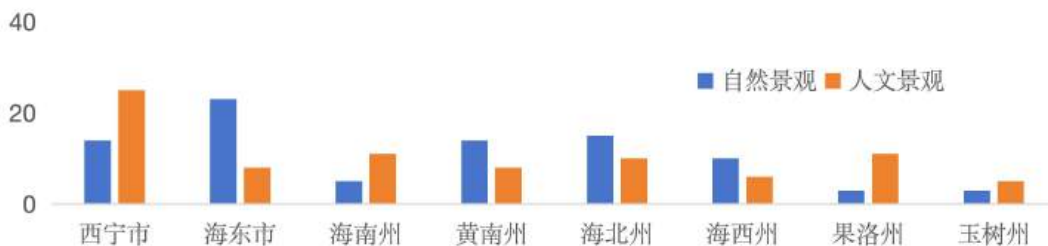


表1 青海省各市(州)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数量统计(数据来源:青海省文化与旅游厅)

（三）非省会城市现代化服务水平偏低

西宁市作为省会，在旅游资源储备、景区数量、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标准化程度及投诉处理与监督机制等方面均优于其他州，并能辐射带动周边市（州）发展——例如海东市紧邻西宁，从西宁主城区到海东市区高铁仅需30分钟、自驾1小时，受益于此，海东市旅游人数与收入稳居全省第二。反观果洛州、玉树州，虽拥有较多人文与自然景观，但旅游人数与收入偏低：一方面两州海拔较高，游客易出现高原反应；另一方面当地大型综合性医院数量少、专业水平有限、医疗设备落后，应急保障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游客健康需求。

（四）交通出行设施不完善

目前，青海省仅有3个民用机场，分别是西宁曹家堡国际机场（属西宁市）、格尔木机场（属海西州）、玉树巴塘机场（属玉树州），覆盖范围有限；铁路方面，仅西宁市、海东市、海西州开通客运火车站，且海西州站点数量最多，其余州均无客运火车站。游客前往未通铁路的州需依赖自驾或长途客运班车，但路途遥远、耗时较长（例如从西宁到玉树自驾需10小时以上），显著降低游客出行意愿。此外，海西州虽不与省会接壤，旅游资源种类与数量少于海东市、西宁市，但凭借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旅游收入与人数仍稳居全省第二，凸显交通对旅游业的关键支撑作用。



图3 青海省各市（州）地理分布示意图

（地图来源：青海省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https://qinghai.tianditu.gov.cn/qhbmzmap/>，审图号：青S（2024）014号）

五、对策建议

（一）强化旅游推广，塑造核心品牌形象

以“大美青海”为核心，构建全方位、多渠道的旅游宣传体系：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支持，设立旅游宣传专项基金，提升宣传专业性与覆盖面；二是依托青海生态、民俗等独特资源，通过主流媒体、短视频平台等自媒体开展精准推广，提升青海旅游的国内外知名度；三是创新营销形式，举办西宁河湟文化旅游艺术节、排子山赏花摄影节、柴达木文化旅游季等节庆活动，借助网络直播、话题营销等方式向全球展示青海的自然风貌与人文魅力，增强游客认同感。

（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服务质量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需以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支撑：一是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同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引导资金投向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建设，重点改善果洛州、玉树州等偏远地区的道路与医疗应急设施；二是推进服务标准化，制定景区服务、导游服务、投诉处理等地方标准，开展旅游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提升服务专业性与规范化水平；三是依托“社保卡+文旅+金融”服务圈，拓展智慧旅游功能（如在线预约、电子导览、一键投诉等），优化游客体验。

（三）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实现可持续发展

青海省“生态立省”战略下，生态环境是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需坚持“保护优先、发展适度”原则：一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开发建设生态友好型旅游设施（如低碳民宿、生态厕所），创新可持续旅游模式（如“限量预约、错峰游览”），确保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二是严格管控自然保护区内的旅游开发活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避免过度开发破坏生态；三是挖掘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藏族歌舞、热贡艺术），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如非遗体验项目、文创产品开发），实现文化传承与旅游增收双赢。

六、结语

青海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既需依托政府政策扶持，也需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资源优势——通过品牌塑造、基建完善、生态保护协同发力，推动旅游与生态、文化、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最终实现“产业提质、居民增收、生态保护”的多重目标，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参考文献：

- [1]《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 2023-10-06 11:45 来源：文化和旅游部网站。
- [2]青海新闻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国之大事” 牢记心间。
- [3]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华网(xinhuanet.com).
- [4]潘春芳.生态旅游理论在旅行社经营中的运用[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6.
- [5]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新华社.http://www.scio.gov.cn/ttbd/xjp/202406/t20240620_852683_m.html.
- [6]吕腾捷.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促进[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0:17
- [7]赵建强.京津冀旅游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应时空演化与协同度评价研究[D]. 秦皇岛: 燕山大学, 2018:21
- [8]Lei per N.The Framework of Tourism: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ourism, Tourist and Tourist Industr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74, 1(4):390-407
- [9]孙尚清.旅游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J].财贸经济, 1991(03).
- [10]赵昌文.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N].学习时报,2017-12-25(001).
- [11]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04):5-18.
- [12]任保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47(03):104.
- [13]马茹,罗晖,王宏伟,王铁成.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19(07): 60-67.
- [14]田秋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06):1-8
- [15]何建民.新时代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系统与战略研究[J].旅游学刊, 2018,33(10):9-11.
- [16]唐任伍,徐道明.新时代高质量旅游业发展的动力和路径[J].旅游学刊,2018,33(10): 11-13.
- [17]张洪昌.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治理逻辑与制度创新[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09): 60-66.
- [18]青海省文化与旅游厅: 2023年青海实现旅游总收入 430.64 亿元。

Analysi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Qinghai Province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ang Caihong ¹

¹Dali University, Dali, Yunnan 671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increase in disposable income, the domestic tourism industry has ushered in a golden period of development. Qinghai Province, as a northwestern inland plateau province and an area with a high concentr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boasts a wealth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This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six prefectures and two municipalities of Qinghai Province. It then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nd provides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Qinghai Province.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vince to achieve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Qinghai Province; tourism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tourism

影响黄金价格预测的关键经济指标及作用机制研究

牛雪儿

(西南大学, 重庆 400715)

摘要: 黄金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中的重要避险资产, 其价格波动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状况, 还折射出金融市场的风险偏好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使用影响黄金价格的关键经济指标, 对于提升黄金价格预测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构建了“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大宗商品—国际政治”四维度的指标分析框架, 并从美元指数、美联储利率、国债收益率、通胀水平、GDP 增速、原油价格、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研究发现, 短期内美元指数、利率、股市波动性等金融市场类指标对黄金价格影响更为敏感, 而长期趋势则更多受通胀水平、经济增长、央行购金等宏观与结构性指标驱动。同时, 指标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效应, 如“油价—通胀—金价”链条与“利率—美元—金价”链条, 共同塑造黄金价格的波动路径。

关键词: 黄金价格预测; 经济指标; 作用机制; 通胀; 美元指数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34

一、引言

黄金历来被视为“金融市场的温度计”, 其价格波动与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紧密相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黄金挂钩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黄金自由定价, 黄金价格逐渐成为市场参与者观察宏观经济走势和投资风险的重要参照物[1]。进入 21 世纪以来, 全球金融一体化、美元霸权地位、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 使得黄金价格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波动特征。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黄金价格的急速上升, 也印证了黄金在避险、保值及对冲风险中的核心作用[2]。伦敦交易所的黄金价格走势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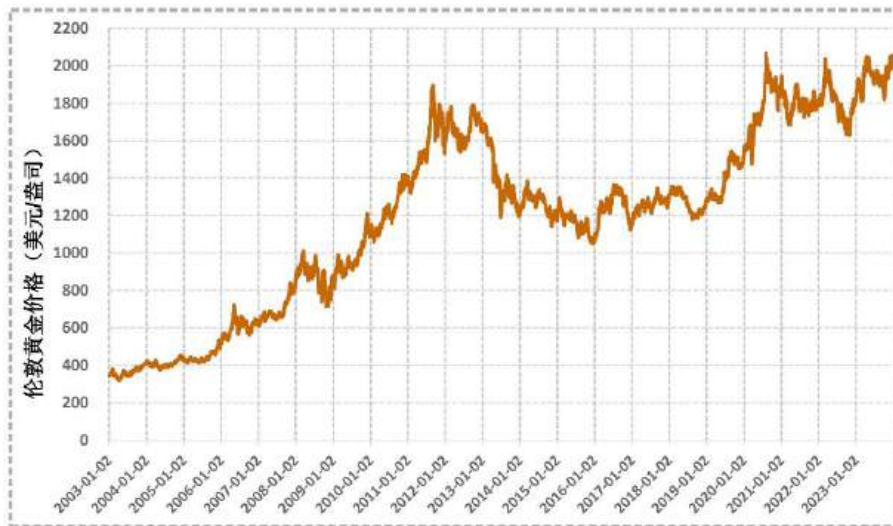


图 1 伦敦黄金价格历史走势图

以往的研究者对黄金价格预测的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是基于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工程方法的价格建模, 如 ARIMA、GARCH 模型及其扩展形式, 强调时间序列特征的捕捉[3]。另一方面是利用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方法, 如支持向量机 (SVM)、长短期记忆网络 (LSTM)、Transformer 等, 提升预测精度与泛化能力[4]。然而, 无论采用何种预测方法, 识别并剖析影响黄金价格的关键经济指标, 是预测模型能否发挥有效性的核心[5]。根据以往的研究, 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市场指标、宏观经济指标、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国际政治风险等多个方面。其中, 美元指数与美联储利率被视为短期波动的重要驱动, 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则决定长期趋势

作者简介: 牛雪儿(2004—), 女, 学士, 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投资风险管理。

通讯作者: 牛雪儿

[6]。此外,原油价格、股市波动指数(VIX)、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等新兴指标也不断被引入黄金价格预测的框架中,以增强模型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7]。

基于此,本文拟在全面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多维度的指标分析框架,从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大宗商品与国际政治四个方面系统探讨各类指标对黄金价格预测的作用及其传导机制。通过比较不同指标的短期与长期作用差异,并揭示指标间的互动效应。

二、黄金价格影响机制框架

(一) 供需机制与结构性因素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大宗商品,其价格长期均衡水平首先取决于供需关系。不同于一般工业品,黄金具有储量有限、开采难度高以及不可消耗性的特征,使得其供给相对刚性。短期内,矿业产能难以快速增加,因此供给端对黄金价格的弹性较低[8]。在这种条件下,需求端的变化成为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力。从消费需求来看,黄金主要用于珠宝、工业用途及投资配置,其中珠宝需求在新兴经济体尤为突出,而投资需求则在全球范围内对价格影响最大。Blose等人的研究指出,当市场预期通胀上升或金融资产回报下降时,黄金投资需求会快速增加,从而推高价格[9]。另一方面,各国央行的购金行为在长期层面对黄金市场具有结构性影响。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开始重新增加黄金储备,以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并对冲美元波动风险。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显示,2019年至2021年间,全球央行购金量保持在较高水平,进一步印证了官方部门在黄金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结构性需求不仅强化了黄金的储备资产属性,也在国际金融格局中赋予黄金更高的战略意义。综上,黄金的供需机制呈现出一种“刚性供给+需求驱动”的特征,尤其在市场避险情绪增强时,投资需求的变化对价格的边际影响尤为显著。

(二) 金融、宏观与风险机制

除供需关系外,黄金价格更深层次的波动机制体现在金融、宏观与风险传导路径上。从金融层面看,利率与汇率是影响黄金价格的核心指标。利率通过机会成本效应影响黄金投资吸引力:当利率水平上升时,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债券等有息资产,而减少无息黄金的配置,从而压低黄金价格;当利率下降或接近零利率时,黄金的相对优势凸显,价格上行[10]。汇率尤其是美元指数则通过国际定价机制作用于黄金。由于黄金以美元计价,美元走强会增加非美元货币投资者的购买成本,从而压制需求与价格,反之则推动金价上涨[11]。从宏观经济层面看,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是长期趋势的重要决定因素。黄金被视为对冲通胀的传统工具,通胀上升往往伴随黄金价格上涨,这一关系在高通胀或滞胀时期更为显著[12]。同时,GDP增速对黄金需求也存在间接影响:在经济增长强劲时期,风险资产回报较高,投资者对黄金的需求下降;而在经济下行或衰退阶段,黄金的避险属性强化,需求上升推动价格走高[13]。此外,货币供应量(M2)的扩张通过提升市场流动性与通胀预期,进一步增加黄金的投资价值。Levin与Wright发现黄金价格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显示出黄金对“过度货币化”的天然对冲功能[14]。从风险机制看,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政策不确定性是黄金价格短期急剧波动的重要诱因。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的上升往往与黄金价格的攀升高度相关[15][16]。在国际危机事件中,黄金的避险需求被显著放大,价格出现非线性跳跃。例如,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黄金价格均突破阶段性高点,这表明突发事件能够通过风险机制在短期内快速传导至黄金市场。

三、经济指标对黄金价格的作用

(一) 金融市场类指标

在黄金价格预测研究中,金融市场类指标被认为是短期波动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类指标的代表包括美元指数(DXY)、利率水平(尤其是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指数。美元指数与黄金的关系最为显著。由于黄金以美元计价,当美元走强时,其他货币持有者购买黄金的成本上升,从而削弱黄金的国际需求,导致价格下跌。相反,当美元走弱时,黄金更具吸引力,需求增加推动价格上行。Joy(2011)对美元与黄金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长期呈现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尤其在金融危机或经济不确定性时期更为显著[11]。利率水平直接影响黄金的机会成本。黄金本身不产生利息或股息,其投资回报主要依赖资本增值,因此在高利率环境下,投资者倾向于转向债券等有固定收益的金融资产,从而减少黄金配置。Pierdziuch等(2016)的研究表明,美联储加息周期往往伴随黄金价格的阶段性下行,而降息周期则刺激黄金价格的回升[17]。此外,美国国债收益率作为全球无风险利率基准,其变化对黄金的吸引力具有重要影响。当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时,投资者更偏好安全的债券资产,而黄金需求下降,价格走弱。股市相关指标,特别是标普500指数和VIX波动率指数,对黄金价格也具有重要作用。当股市处于上涨周期时,风险偏好增强,资金更多流向股票市场,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反之,在股市下跌或波动剧烈时期,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作用被强化,价格随之上涨。Baur和McDermott(2010)通过对全球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黄金在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期间能够发挥“避险资产”的作用,而在平稳时期则表现为一种“分散化资产”[18]。因此,金融市场类指标因其高频性与即时性。

(二) 宏观经济类指标

宏观经济类指标则更多影响黄金的中长期价格趋势,主要包括通货膨胀率、GDP增速、货币供应量等。其中,通货膨胀率是影响黄金价格最直接的宏观变量。作为一种保值工具,黄金价格与通胀水平常常存在协整关系。在通胀率上升时期,投资者为对冲货币贬值风险,会增加黄金配置,推动金价走高。Beckmann和Czudaj通过时间变系数模型发现,黄金的通胀对冲功能在不同国家与时期存在差异,但在滞胀时期表现尤为明显[12]。GDP增速则通过影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与货币政策环境,间接作用于黄金价格。当经济增长强劲时,投资者更愿意持有股票、债券等风险资产,黄金需求下降;而在经济下行或衰退阶段,黄金的避险功能凸显,需求上升,价格上涨。Narayan的研究指出,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往往伴随黄金需求上升,显示出宏观经济与黄金之间的逆向联

动关系[13]。此外,货币供应量(如M2)对黄金价格也有长期影响。货币宽松意味着市场流动性增加,通胀预期上升,推动黄金需求扩张。因此,宏观经济类指标通过通胀预期、经济增长预期与货币环境,形成对黄金价格的中长期传导机制。

(三) 大宗商品与其他市场类指标

除了金融与宏观经济因素,黄金价格还受到其他大宗商品及新兴市场资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原油价格、其他贵金属价格以及加密货币市场。黄金与原油价格之间存在密切联动,油价上涨不仅意味着通胀预期增强,还可能通过成本推动效应刺激黄金价格上行。Sari等人的研究发现,原油价格与黄金价格在多个时间维度上存在因果关系,尤其在危机时期表现更为紧密[19]。黄金与白银、铂金等贵金属之间也存在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Ciner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市场不确定性上升时,黄金与其他贵金属均被视为避险资产,价格往往同步上涨;而在工业需求强劲时期,白银或铂金的上涨也可能引导资金流入黄金市场,体现出跨贵金属的联动性[20]。近年来,加密货币的兴起使比特币逐渐被称为“数字黄金”,其与黄金之间的关系备受关注。Dyhrberg的研究指出,比特币与黄金在避险功能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两者的波动性与流动性差异使其在投资组合中存在替代与互补关系[21]。在某些时期,投资者可能在比特币与黄金之间进行资金切换,影响黄金的边际需求。

(四) 国际与地缘政治类指标

国际与地缘政治类指标在黄金价格预测中扮演着重要的补充角色,其影响往往具有突发性和非线性特征。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能够量化战争、恐怖袭击及外交摩擦等事件的风险水平。研究发现,GPR上升会显著推高黄金价格,尤其在冲突爆发或国际局势紧张时,黄金的避险属性表现最为突出[22]。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反映了财政、贸易与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水平。Pastor和Veronesi的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市场波动,并提升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吸引力[23]。此外,各国央行的购金行为同样是国际指标中的重要变量。近年来,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持续增加黄金储备,被认为是对冲美元霸权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的重要战略。这一行为不仅增强了黄金的长期需求,也在全球层面为金价提供了稳定支撑。因此,国际与地缘政治类指标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风险预期—避险需求—价格调整”的路径体现,其影响虽具有突发性。

四、综合分析比较

(一) 短期预测与长期趋势中的差异性

在黄金价格预测中,不同经济指标在短期与长期中表现出显著差异。短期层面,金融市场类指标往往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与即时性作用。例如,美元指数与美联储利率决策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对黄金价格产生反应,这是因为黄金以美元计价,汇率与利率的变化能够快速改变其相对价值与持有成本。当美元走强或利率水平上升时,黄金的吸引力下降,价格迅速承压;反之,美元走弱或利率下降会在短期内推高黄金价格。此外,股市波动率指数(VIX)在短期内同样是极为敏感的预测指标。当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避险需求骤增,黄金价格往往在几日甚至数小时内出现明显上涨。因此,在短期预测框架下,金融市场类指标因其高频性与市场敏感性而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趋势则更多由宏观经济与结构性指标决定。通胀率与GDP增速是长期预测中的关键因素。大量研究表明,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其价格走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12]。在经济长期运行中,通胀上升会不断削弱货币的购买力,从而推动投资者增加黄金配置,形成对价格的长期支撑。同样,经济增长率对黄金价格的长期走势也具有重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对风险资产的需求上升,黄金价格可能承压;而在经济下行阶段,黄金则成为重要的避险资产。此外,央行购金行为作为长期结构性指标,能够反映各国货币政策与国际储备战略的调整,其持续性的累积效应往往在多年时间跨度内显现,对黄金价格形成稳定支撑。因此,长期预测需要更多依赖通胀、经济增长与央行购金等宏观与结构性变量。

短期与长期指标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时间尺度上,还体现在作用机制上。短期指标多通过金融市场渠道直接作用于黄金价格,其效应往往是快速而剧烈的;而长期指标则更多通过宏观经济预期、货币环境与储备战略逐步传导,其效应较为缓慢却具有持久性。二者在预测框架中并非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短期指标用于捕捉黄金价格的波动与拐点,长期指标则用于把握趋势与均衡水平。需要将两类指标合理结合,才能形成既具即时性又具稳定性的预测体系。

(二) 指标间的互动效应

黄金价格的形成并非由单一指标决定,而是多类指标通过复杂的互动效应共同作用。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例如,“利率—美元—黄金”链条被广泛证实:美联储加息往往推升美元指数,进而压制黄金价格;相反,加息放缓或降息预期会削弱美元,刺激黄金上涨[17]。这一互动效应说明,利率与美元指数并非独立变量,而是通过传导链共同作用于黄金价格。类似的,“油价—通胀—黄金”链条同样具有代表性。原油价格上涨往往推高输入型通胀,市场的通胀预期增强,从而推动投资者增持黄金作为对冲工具,最终形成黄金价格的上行趋势。因此,单独分析某一指标可能低估其真实影响。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涵盖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大宗商品及国际地缘政治四个维度的分析框架,系统探讨了影响黄金价格预测的关键经济指标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不同指标在时间尺度和传导机制上存在显著差异。短期预测中,美元指数、利率和股市波动率等金融市场类指标对黄金价格的解释力最强,能够及时反映市场风险偏好与资金流动变化;而长期趋势则更依赖通胀水平、经济增长和央行购金等宏观与结构性变量,这些指标通过塑造通胀预期与储备需求,决定了黄金的均衡水平。同时,大宗商品与其他市场类指标在跨市场联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原油价格通过通胀预期间接作用于黄金,贵金属价格与黄金之间存在协同与替代效应,而比特币等新兴资产则在部分时期对黄金产生竞争性影响。国际与地缘政治类指标虽作用具有突发性,但在危机时期对黄金的推动最为显

著，其与金融市场指标的叠加效应常常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

预测黄金价格应同时考虑多时间尺度与跨市场联动，避免孤立使用单一指标；对投资者而言，短期操作需关注金融市场动态，长期配置则应重视通胀与宏观基本面；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理解黄金价格的传导机制有助于监测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稳定风险。未来研究可结合高频数据与跨市场网络方法，进一步深化对黄金价格波动规律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Baur, Dirk G., and Brian M. Lucey. "Is gold a hedge or a safe haven? An analysis of stocks, bonds and gold." *Financial review* 45.2 (2010): 217-229.
- [2] Reboredo, Juan C. "Is gold a hedge or safe haven against oil price movements?." *Resources Policy* 38.2 (2013): 130-137.
- [3] Capie, Forrest, Terence C. Mills, and Geoffrey Wood. "Gold as a hedge against the doll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15.4 (2005): 343-352.
- [4] Kristjanpoller, Werner, and Marcel C. Minutolo. "A hybrid volatility forecasting framework integrating GARCH,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echnical analysis and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109 (2018): 1-11.
- [5] Batten, Jonathan A., Cetin Ciner, and Brian M. Lucey. "On the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gold–inflation relation." *Resources Policy* 41 (2014): 101-108.
- [6] Wang, Kuan-Min, Yuan-Ming Lee, and Thanh-Binh Nguyen Thi. "Time and place where gold acts as an inflation hedge: An application of long-run and short-run threshold model." *Economic Modelling* 28.3 (2011): 806-819.
- [7] Mensi, Walid, et al. "Do global factors impact BRICS stock markets?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Emerging Markets Review* 19 (2014): 1-17.
- [8] Sjaastad, Larry A., and Fabio Scacciavillani. "The price of gold and the exchange r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15.6 (1996): 879-897.
- [9] Blöse, Laurence E. "Gold prices, cost of carry, and expected inf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62.1 (2010): 35-47.
- [10] Zhang, Yue-Jun, and Yi-Ming Wei. "The crude oil market and the gold market: Evidence for cointegration, causality and price discovery." *Resources Policy* 35.3 (2010): 168-177.
- [11] Joy, Mark. "Gold and the US dollar: Hedge or haven?."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8.3 (2011): 120-131.
- [12] Beckmann, Joscha, and Robert Czudaj. "Gold as an inflation hedge in a time-varying coefficient framework."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4 (2013): 208-222.
- [13] Narayan, Paresh Kumar, and Seema Narayan.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oil prices on Vietnam's stock prices." *Applied energy* 87.1 (2010): 356-361.
- [14] Levin, Eric J., A. Montagnoli, and R. E. Wright. "Short-run and long-run determinants of the price of gold." (2006).
- [15] Bouri, Elie, et al. "Bitcoin and global financial stress: A copula-based approach to dependence and causality in the quantile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69 (2018): 297-307.
- [16] Pastor, Lubos, and Pietro Veronesi. "Uncertainty about government policy and stock pric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7.4 (2012): 1219-1264.
- [17] Pierdzioch, Christian, Marian Risse, and Sebastian Rohloff.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gold market: Results of a real-time forecasting approa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32 (2014): 95-108.
- [18] Baur, Dirk G., and Thomas K. McDermott. "Is gold a safe have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4.8 (2010): 1886-1898.
- [19] Sari, Ramazan, Shawkat Hammoudeh, and Ugur Soytas. "Dynamics of oil price, precious metal prices, and exchange rate." *Energy Economics* 32.2 (2010): 351-362.
- [20] Ciner, Cetin, Constantin Gurdgiev, and Brian M. Lucey. "Hedges and safe havens: An examination of stocks, bonds, gold, oil and exchange rat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9 (2013): 202-211.
- [21] Dyhrberg, Anne Haubo. "Hedging capabilities of bitcoin. Is it the virtual gold?."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16 (2016): 139-144.
- [21] Bouri, Elie, et al. "Bitcoin and global financial stress: A copula-based approach to dependence and causality in the quantile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69 (2018): 297-307.
- [22] Pastor, Lubos, and Pietro Veronesi. "Uncertainty about government policy and stock pric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7.4 (2012): 1219-1264.

Key Economic Indicators Influencing Gold Price Forecasting and Their Mechanisms

Niu Xueer

(Business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As a crucial safe-haven asset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gold price fluctuations not only reflect the state of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embody financial market risk preferences and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economic landscape. The selection of key economic indicators influencing gold prices is essential for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rigor of gold price forecasting.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financial markets, macroeconomics, commod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indicators such as the U.S. dollar index, Federal Reserve interest rates, Treasury yields, inflation levels, GDP growth, oil prices, and the geopolitical risk index.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 the short term, financial market indicators such as the dollar index, interest rates, and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have a more sensitive impact on gold prices, while long-term trends are primarily driven by macroeconomic and structural indicators such as infl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central bank gold purchases. Moreover, complex interactive effects exist among indicators, such as the “oil price–inflation–gold price” chain and the “interest rate–dollar–gold price” chain, which jointly shape the fluctuation patterns of gold prices.

Keywords: Gold price forecasting; Economic Indicators; Mechanism; Inflation; U.S. Dollar Index.

论数字劳动中的劳动异化问题

张美娟

(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0)

摘要: 大数据、5G、AI等现代数字信息技术推动人类进入数字时代, 数字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人类主要生存和生活方式之一。“数字劳动”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的同时, 也加剧了劳动异化问题。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商品化、算法控制和时空剥削深化了异化程度, 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及社会关系的四重异化。数字平台无偿占有用户数据, 算法精确管理劳动过程, 移动互联网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全球平台劳动者面临权益缺失与社会再生产危机。研究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揭示数字劳动异化的新特征与根源, 为数字时代的劳动解放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数字劳动; 劳动异化; 算法控制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36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演进, 互联网平台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态, 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重构着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空间结构与运行逻辑, 成为影响国际劳动力资源配置格局的关键变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 全球数字劳工平台工作者在2021年已达约1.63亿, 其中发达经济体占比超过60%^[1]。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进一步预测, 到2025年全球独立劳动者含平台工作者规模可能扩大至5.4亿, 约占正式劳动力的8-10%^[2]。“在这一变革浪潮中,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平台企业作为新兴组织形态, 正在深刻重构传统劳动关系的基本范式。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远程办公、众包劳动、零工经济等新型就业模式^[3], 这些劳动形态虽然打破了时空限制, 赋予劳动者表面上的工作自主权, 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劳动异化危机。

在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 研究数字劳动异化问题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理论维度看,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使得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面临新的解释情境, 算法管理、评分机制等技术控制手段创造了更为隐蔽的劳动剥削形式; 从实践层面看,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 东南亚地区76%的平台劳动者缺乏正式劳动合同, 凸显全球劳动权益保护的失衡^[4]。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 数字劳动的普及化与平台化趋势使得劳动异化问题呈现出新的特征, 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劳动关系的去组织化以及劳动者身份的模糊化, 劳动者陷入“算法控制”与“身份悬置”双重困境^[4]。

本研究旨在揭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异化的新特征, 为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数字劳动生态系统提供理论依据。现有研究表明, 数字劳动的异化不仅体现在劳动产品与劳动过程的疏离, 更深刻地表现为劳动者自我认同的危机和社会关系的商品化^[5], 这些问题亟需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得到系统性回应。

二、数字劳动的概念之林

数字劳动研究作为数字技术与信息通信技术(ICTs)深度融合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产物, 该研究的兴起与全社会对互联网产业催生的新型就业形态中劳动状况恶化问题的种种担忧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 该领域逐渐演变为学者们运用批判理论解构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新前沿, 社会各界亟需构建契合数字时代特征的劳动价值阐释体系^[6]。目前, 学界对数字劳动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共识, 但根据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的不同, 可将其划分为几个主要流派。

(一) 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视角

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兹在批判媒介产业资本循环机制时, 首次提出“受众劳动”这一颠覆性概念, 揭示了媒介消费行为如何被异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隐性场域^[7]。21世纪初, 意大利学者蒂齐亚诺·特拉诺瓦率先对“数字劳动”概念予以明确界定, 并将其纳入“非物质劳动”的理论分析范畴。特拉诺瓦指出, 数字劳动本质上是一种“无偿劳动形式”, 其通过将文化消费行为转化为具有生产性的活动过程得以体现, 具体涵盖网站

作者简介: 张美娟(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通讯作者: 张美娟

构建、软件修订以及在线互动参与等多种实践形态^[8]。这一理论在当代恋爱游戏、乙女游戏等数字娱乐产品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研究表明,玩家在这些游戏中的情感投入和互动行为如角色养成、剧情解锁等实际上构成了新型数字劳动,通过“情感劳动双循环”机制为运营商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9]。玩家往往认为自己在进行娱乐消费,却未意识到自己同时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这种隐蔽性正是数字时代非物质劳动的重要特征。

然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针对该观点提出批判,主张数字劳动的范畴不应囿于非物质劳动的既有框架,而应扩展至所有依托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ICTs)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脑力及体力劳动实践,也应该涵盖科技产品制造环节中的工人劳动过程^[10]。这一观点在当代数字产业链中得到充分验证,从智能手机装配线上的工人,到硅谷的程序员,再到社交媒体内容审核员,都构成了数字劳动体系的不同环节,特别是中国数字产业链尤为典型,呈现为从硬件制造到内容处理的劳动分层体系^[11]。特别是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发展中国家电子工厂的工人虽然从事着传统的物质劳动,但其劳动产品如芯片、显示屏等却是数字经济的物质基础,体现了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辩证统一。

从《大同世界》的理论视角来看,数字劳动的发展印证了哈特和奈格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劳动形态转型的核心论断。他们的“生命政治劳动”概念揭示了数字时代劳动的双重特性,一方面延续着传统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这体现在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中从稀土开采到硬件组装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情感交流、知识生产和社交互动等非物质劳动纳入资本积累的轨道,典型表现为社交媒体用户的数字足迹如何被平台资本化。这种劳动形态的扩张与《大同世界》预言的“大众智能”普及相呼应,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社交网络都成为新的剥削对象。

(二) 性别与劳动政治视角

部分学者将数字劳动与性别议题相结合,揭示其隐含的权力不平等问题。泰博·肖尔茨提出,相较于传统劳动形态,数字劳动常被视为认知盈余的消耗过程,其特质在于缺乏可感知的实体形态与视觉表征。这种特性使数字劳动在本质属性上与某些隐性的传统女性劳动形式如育儿照料、家务操持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均表现为难以直接量化的情感投入与隐性劳动付出,数字劳动的隐性特质使其与传统的无偿家务劳动形成结构性呼应^[12]。数字劳动问题的思考与社会性别分析紧密交织在一起,通过批判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结构和反思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宰制。莱斯利·谢德和尼基·波特通过对孟加拉国女工的研究,孟加拉国数字女工在技术赋能的表象下承受着工资克扣、技能剥夺和身体规训的三重压迫,进一步揭示了全球数字产业链中女性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剥削^[13]。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中,女性编辑面临技术监控与情感劳动的双重压迫,曹晋和格雷厄姆·默多克对中国出版业女性编辑的研究也表明,数字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亟待关注^[14]。

在性别维度上,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未消解传统的性别分工,反而以“数字家务劳动”的新形式延续并强化了这种不平等,从在线客服的情绪管理到直播表演的情感劳动,女性在数字领域的劳动参与仍然面临着独特的剥削机制。

(三) 中国本土化研究视角

在经济全球化与社会数字化的双重驱动下,处于社会转型关键阶段的中国社会正遭遇数字劳工群体急剧扩张的现实情境。正如乌尔里希·贝克等学者所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呈现出“时空压缩”的独特性特征,既承载着传统工业化阶段也就是第一现代性的制度惯性,又面临着后工业时代也就是第二现代性的范式冲击,形成双重现代化压力的共时性困境^[15]。虽然现阶段尚不能断言数字劳动已占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劳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所引发的结构性变革效应已然显现。国内学术界基于本土化研究范式,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对数字劳动概念展开了多维度阐释。

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为根基,深入剖析数字劳动领域的核心议题,具体涵盖劳动关系的形态演变、劳动过程的组织逻辑、劳动力再生产的机制重构、劳动者自我认知的转型路径以及劳动者团结策略的革新维度。姚建华将数字劳动定义为涵盖 ICTs 和数字技术产业链上所有劳动形式的集合,包括硬件制造、软件开发以及用户的生产性消费行为^[15]。

谢芳芳和燕连福则借鉴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数字劳动的“产消合一性”与“情感性”特征^[16]。黄再胜的学术立场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主张一致,他指出数字劳动本质上是依托网络化、数字化技术实现协同运作的非物质化劳动形式,其显著特征体现为劳动主体的个体化、劳动过程的娱乐化以及劳动体验的沉浸化。具体而言,该劳动形态囊括了社交媒体场景中的无偿内容生产、网络平台环境下的碎片化任务执行,以及网约经济模式中的在线服务提供^[17]。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轨迹尤其凸显了劳动异化这种矛盾的现代性特征,既孕育着高度技术化的平台经济,又保留着前现代的劳动控制方式,这种混杂性恰恰印证了哈特和奈格里对当代资本主义“帝国”形态的判断,也为探索数字时代的劳动解放提供了独特的实践场域。

数字劳动的概念界定因理论视角不同而呈现多元性,但其核心均围绕劳动形式、生产关系与社会权力结构展开。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厘清不同流派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以深化对数字劳动的理论认知。

三、数字劳动异化新表现

要探索当今数字劳动异化的新表现,就要“却顾所来径”,回头看看传统劳动异化的表现。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迅速发展,机器大生产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工厂制度逐渐建立,工人阶级的数

量急剧增加。然而，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贫富差距拉大，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恶劣，劳动时间长，但工资低，且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

新的生产技术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得生产过程更加高效，同时也导致了大规模的生产集中和垄断现象。资产阶级作为新兴的统治阶级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则成为了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在资本规训与生存压力的双重挤压下，劳动者被迫将自身劳动能力转化为可计量的商品化存在，通过出让其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以获取仅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货币等价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试图从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问题，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理论的构建，建立在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国民经济学派将所有有利于资本增殖的实践路径予以理论化包装，通过意识形态规训使劳动者形成对资本剥削的合法性认知，进而导致劳动者主体性的现实性消解。这种理论范式将人异化为资本的附庸，使劳动者沦为非具身化的抽象存在，恰如该学派将劳动者的创造性实践简化为纯粹的抽象劳动过程一般^[18]。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构建的劳动异化批判范式，通过系统性解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生产活动、类本质规定性及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四重断裂机制，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主体性消解、价值生产倒置与社会关系物化的深层异化结构。而在当今数字时代，这些异化形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呈现出新的特征和更深程度的异化表现。

（一）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工业革命后的工厂制度中，工人生产的物品越多，就越失去对这些物品的控制。他们所创造的产品不仅不是他们的财富，反而成为了统治和剥削他们的工具^[19]。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支配下，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的占有关系发生根本性断裂，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体力与脑力支出凝结的商品化劳动成果，在价值实现环节被资本所有者通过物权占有机制强行剥夺，导致劳动者既无法在物质层面支配其生产物，工人无法享受其劳动成果。

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用户（劳动者）通过在线平台产生的数据、内容等数字产品，如社交媒体上的帖子、评论、点赞、浏览记录等，都被平台无偿占有。这些数据经过算法分析后，可以转化为有价值的资产，用于广告投放、个性化推荐等商业目的，而用户通常对此缺乏意识或控制权^[19]。数字劳动者生产的数据、内容等数字产品，不仅像传统工人那样失去对产品的控制权，而且往往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生产有价值的产品。

用户生产的数字产品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但创作者往往无法直接从这些产品的商业化中获益，社会加速使数字创作突破时空限制，却未改变价值分配的殖民性结构^[20]。社交媒体平台通过算法将用户生成的内容（UGC）转化为广告投放的依据，用户的情感表达和社交互动被资本化，成为平台盈利的工具。这种商品化过程不仅剥夺了用户对自身劳动成果的控制权，还加剧了数字劳动的无偿性和隐蔽性。

（二）工人与劳动活动的异化

工厂劳动对工人而言已异化为生存性强制活动，其劳动行为不再构成主体性展开的实践场域，而是异化为资本增殖逻辑驱动下的功能性服从，沦为维系肉体存续的外在手段。劳动过程被重构为资本权力对劳动者身体与时间的强制性征用，工人唯有在劳动间歇的短暂间隙中才能短暂复归生命自主性，而劳动本身则沦为束缚其自由意志的异己力量^[18]。劳动过程机械化、重复性强，工人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掌控，劳动变成了单调乏味的体力消耗。

数字劳动者的工作环境看似更加灵活，许多工作可以在家中或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方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更加自由。相反，数字劳动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变得模糊，劳动者可能随时随地处于“在线”状态，导致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化^[21]。

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也受到算法和技术的严格控制，平台算法通过对劳动过程的精确控制和实时监控，以“数据闭环”的方式实现了劳动异化的技术升级，这是比传统工厂更彻底的劳动过程异化^[22]。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平台劳动者的工作节奏由平台算法决定，他们必须遵循平台设定的任务分配和时间表，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性^[23]。数字劳动的无形性和虚拟性使得劳动者难以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劳动过程变得更加抽象，进一步加剧了异化感。

（三）工人与人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本质在于能够自由地、有意识地创造，但异化劳动使工人失去了这种能力。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他个性的表现，也不再是他的生命活动的肯定，而是变成了否定他自身的一种活动^[19]。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劳动过程被异化为机械化的重复性操作，劳动者丧失了创造性潜能、自主性空间以及个性化表达的可能路径，劳动实践演变为一种外在于劳动者本真的、具有强制约束性的异己活动。

在数字劳动中，劳动者虽然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如编程、设计、写作等，但这些活动往往受到平台规则、算法限制和市场需求的制约。劳动者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感到自己的创造力被压抑，甚至被迫迎合市场或平台的要求。数字劳动看似提供了更多创造性空间，实则通过平台规则和算法限制，使劳动者的创造力被框定在特定范围内。就像自媒体创作者必须迎合平台算法偏好和流量逻辑，其创作自由受到严重制约^[24]。

数字劳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趋势也削弱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和控制权。许多数字工作者需要依赖特定的软件工具或平台来完成任务，而这些工具的设计和功能的决定是由资本家或技术公司决定的，劳动者只能被动接受^[23]。数字劳动的虚拟性和匿名性可能导致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失去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用户的身

份往往是碎片化的、多变的，这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主体性^[21]。

(四) 工人与其他工人之间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所扭曲，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和敌对。每个工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竞争而非合作的关系^[10]。工厂中的劳动分工使得工人之间的协作机会减少，工人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个体之间的合作和支持关系被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所取代。

数字平台通过评价系统和排名机制，将这种异化推向极致，劳动者之间不仅像传统工人那样存在竞争关系，而且这种竞争被平台算法精确量化和实时呈现^[25]。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权力架构下，零工从业者如自由职业者、网约车司机、即时配送员等被迫卷入以平台算法为仲裁者的“数字竞标赛”，其劳动定价权与生存资源分配完全让渡于智能合约的动态定价机制，导致个体间的竞争异化为基于数据绩效排名的绝对零和博弈，并最终在平台资本的“赢家通吃”逻辑中沦为可替代的算法冗余单元。平台通过算法优化任务分配，鼓励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合作^[23]。

尽管数字社交媒介与网络服务平台拓展了人际互动的时空边界，但这种技术中介的交往模式反而强化了社会关系的疏离化。在虚拟化社交场景中，个体间的联结往往呈现浅层化、即时性的特征，难以形成具有情感深度的社会纽带。此外，平台上的评价系统和排名机制进一步强化了个体之间的竞争，劳动者为了获得更好的评价或更高的排名，可能会牺牲彼此的合作精神^[21]。

数字劳动的全球化使得劳动者之间的竞争跨越了国界，全球范围内的劳动者都可能在同一平台上竞争有限的工作机会，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脆弱性和不安全感。

数字劳动还催生了马克思时代所未见的异化新形式，劳动时间的无限延伸，移动互联网使劳动者处于“永远在线”状态，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彻底打破^[22]。劳动空间的虚拟化，远程工作虽然突破了地理限制，但也使劳动者陷入社交孤立的困境。还有就是产消合一的异化，数字劳动者往往同时是生产者 and 消费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异化更加隐蔽和难以察觉。

这些新异化形式的出现，印证了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将劳动从属推向极端”，异化劳动将随资本主义发展而深化的预见^[26]。数字技术不仅没有消除异化，反而为资本提供了新的异化手段，使异化程度更深、范围更广、形式更隐蔽。要克服数字劳动异化，必须回归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批判维度，在数字时代探索劳动解放的新可能。

四、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的根源与影响

(一) 根源分析

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根源在于资本增殖逻辑在数字时代的深化发展。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在当代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一资本逻辑通过数据剥削机制表现得更为隐蔽而深刻。数字平台构建了全新的剥削体系，以算法控制为核心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精确管理。根据2018国际劳工组织对东南亚骑手的调研，外卖平台的智能派单系统将骑手的劳动强度精准控制在生理极限边缘，剥削率高达37.2%。

数据商品化进程创造了资本积累的新维度。祖博夫提出的“监视资本主义”理论揭示，平台企业通过无偿占有用户数据实现价值攫取^[27]。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用户日常互动产生的海量数据被转化为精准广告投放的基础，2021年仅Facebook就从中获取1149亿美元广告收入。这种剥削的隐蔽性在于，数据生产者既无法控制数据的商业用途，也难以获得合理回报。同时，移动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工作时空界限，使劳动者陷入“永远在线”的困境。2021国际劳工组织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数字创意工作者每日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近八成需要在非工作时间处理工作消息，这种时空剥削极大拓展了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范围。

(二) 影响探讨

数字劳动异化正在重塑当代社会经济格局，其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多维特征。在个体层面，平台通过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的制度设计，成功规避了传统雇主责任，导致全球范围内仅13.2%的平台工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险^[23]。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策略使劳动者陷入前所未有的保障缺失状态，工作不安全感显著加剧。在市场结构方面，数字平台的高度集中催生了新型垄断形态，五大科技巨头掌控着全球四分之三以上的云服务 and 在线广告市场^[28]，这种垄断地位使其能够单方面制定有利于资本积累的规则，如应用商店高达30%的佣金抽成实质上构成了数字时代的新型地租^[2]。

数字劳动的全球化配置虽然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即时连接，但也强化了中心-边缘的不平等结构。跨国比较研究显示，数字平台上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报酬普遍仅为发达国家同行的五分之一^[29]，这种全球性的“竞次”现象进一步固化了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关系。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数字劳动对生活时间的过度侵占正在引发社会再生产危机。中国互联网行业盛行的“996”工作制导致超过三分之一的从业者因工作压力推迟婚育计划，这种状况不仅损害劳动者福祉，从长远来看还将对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数字劳动的异化正在从多个维度重塑着当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其复杂影响亟待更深入的研究和反思。

参考文献：

- [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1). World Employment and Social Outlook: The rol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of work.
- [2]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6). Independent Work: Choice, Necessity, and the Gig Economy.

- [3] Graham, M., & Anwar, M. A. (2019). The global gig economy: Towards a planetary labour market? *First Monday*, 24(4). <https://doi.org/10.5210/fm.v24i4.9913>
- [4] 姚建华. (2022). 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议题与展望. *新闻与传播研究*, 29(5), 5-22.
- [5] Fuchs, C. (2020). *Communication and capitalism: A critical theory*.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 [6] 周延云. (2021).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研究*, (4), 88-99.
- [7] Smythe, D.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3), 1-27.
- [8] Terranova, T. (2000).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 33-58.
- [9] 张雨薇. (2022). 虚拟恋爱游戏的劳动逻辑. *传播与社会学刊*, 39, 43-58.
- [10] Fuchs, C.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Routledge. ISBN: 978-1-138-94424-4
- [11] Chan, J., & Pun, N. (2020). Digital discipline in China. 241, 1-20.
- [12] Trebor Scholz.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13] Shade, L. R., & Porter, N. (2008).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nder Digital Divide. *Signs*, 33(3), 603-625.
- [14] 曹晋, & Murdock, G. (2013). 中国出版业中的性别政治. *传播与社会学刊*, 25, 1-24.
- [15] 姚建华. (2019). *数字劳动: 理论、实践与批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6] 谢芳芳, & 燕连福. (2017). 数字劳动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8, 89-97.
- [17] [黄再胜. 数字劳动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拓展[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4-27.
- [18]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9] Gillespie, T. (2010).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12(3), 347-364.
- [20] Rosa, H. (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21] 陈龙. (2021). "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 *社会学研究*, 36(3), 26-45.
- [22] 庄家焱, 等. (2022). 平台算法如何影响骑手的工作实践. *社会*, 42(2), 71-95.
- [23] 王斌. (2020). 数字时代的工作时空重构. *新闻与传播研究*, 27(5), 34-52.
- [24] Wood, A. J., et al. (2019). Good gig, bad gig: Autonomy and algorithmic control in the global gig economy.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33(1), 1038-1057.
- [25] Spreitzer, G., et al. (2017). Work design for the digital era.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8(1), 34-49.
- [26] 马克思. (2004). *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 [27] Zuboff, S.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ublic Affairs*. pp.298-301.
- [28] Srnicek, N.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Press.
- [29] 中国社科院. (2021). *中国互联网从业人员工作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On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in Digital Labor

Zhang MeiJua

(Xiang 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Abstract: Modern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5G, and AI, have propelled humanity into the digital age, where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digital produc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primary modes of human existence and lifestyle. While "digital labor" is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 it is also exacerbating the issue of labor alienation. The logic of capital deepens the degree of alienation through the commodification of data, algorithmic control, and spatiotemporal exploitation, leading to a fourfold alienation of laborers from their labor products, the labor process, their species-essence, and social relations. Digital platforms appropriate user data without compensation, algorithms meticulously manage the labor process, and mobile internet blur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work and life, leaving global platform laborers facing a lack of rights and a crisi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Based on Karl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from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his study reveal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oots of alienation in digital labor,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digital labor; labor alienation; algorithmic control

金融市场对资源环境效率的影响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

郭杨¹ 罗本² 董佳宜³ 王雨洁⁴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210001, 2. 兰州大学, 甘肃 兰州 730100, 3.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北京 100083, 4. 太原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要: 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碳”战略推进背景下, 资源环境效率成为现代治理效能核心指标, 金融市场尤其是绿色金融体系作用关键。本文探究金融市场对资源环境效率的影响及与经济发展的联动。研究显示, 绿色金融借绿色信贷、债券等工具, 从微观引导企业优化环保表现、宏观改善全要素能源效率, 但存在“绿色漂绿”现象, 且影响有地区与企业异质性。其通过驱动绿色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却面临“转型风险”。当前学界形成相关理论架构, 但仍有不足, 未来需深化研究以支撑绿色发展战略。

关键词: 金融市场; 绿色金融; 资源环境效率; 经济发展; 作用路径; 转型风险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43

1 引言

当下中国经济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 “双碳”战略目标推进过程中, 资源环境效率变成衡量现代治理体系效能的关键指标, 在此情形下金融市场凭借绿色金融工具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的作用越发重要, 一方面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 碳金融等金融产品为生态修复给予资金保证, 而且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快速发展明显改善了经济增长质量, 促使产业结构朝着低碳化方向转变, 本文着重“金融市场对资源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 全面探究它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协同效应以及包含的政策启示。

2 金融市场对资源环境效率的影响

2.1 影响效应分析

近些年来, 绿色金融领域有了很大突破, 它在改善资源环境调配方面的功效越发明显, 绿色信贷, 绿色债券这类创新金融产品慢慢变成助力污染治理, 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支撑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 从有关研究数据看, 绿色信贷凭借信贷约束手段, 可以促使资金向环保方向流动, 进而做到资源优化调配并改进环境效益^[1]。

田华等 (2023) 通过以新能源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展开实证分析, 得出绿色信贷引导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是明显的, 外部监督也得到了加强^[2]。Liu 等 (2024) 在《自然》期刊中提到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保绩效以及企业治理结构优化存在积极影响, 但是有些企业存在“绿色漂绿”现象, 健全监管体系显得尤为重要^[3]。

从宏观角度来说, 绿色金融对资源环境效率的提升有着明显的推动效果, Fang 和 Zhang (2022)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展开实证研究之后得出结论, 在绿色金融改革试点地区, 政策执行之后全要素能源效率明显改善, 环保监管严厉且金融体系健全的地区尤其如此^[4]。依照《2024 - 2025 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 绿色信贷规模不断增大, 渐渐变成支撑清洁能源开发以及高效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融资途径之一^[5]。

2.2 作用机制分析

金融市场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多元化的金融工具在“资金-企业-环境”链条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其本质是把环保标准融入到信贷资源分配体系里, 让那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为了拿到钱而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环境表现^{[2][6]}, 这种机制是靠改变融资成本的方式来间接促使企业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和减少排放量的。

绿色债券市场和碳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 其价格传导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并促进

作者简介: 郭 杨(2004—),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 ESG, 国际政治经济学, 消费心理学;

罗 本(2006—),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绿色金融, 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

董佳宜(2006—), 女, 本科, 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 环境科学;

王雨洁(2006—), 男, 本科, 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

注: 以上作者对本文有同等贡献, 共同为第一作者

了环境绩效的改善。相关研究表明,《绿色债券市场有效性分析》中绿色债券资金主要投向清洁能源、节能减排领域,实现了“资本引导+生态修复”^[7];《双碳战略下碳金融体系构建研究》中指出我国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已具有一定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完善碳定价机制可进一步加强外部性内部化^[8]。

金融生态环境对于机制效能的改善有着明显的影响,有研究显示,《绿色信贷与金融生态环境》表明地方政府金融体系是否完善,公众环保意识是否普及,相关法律法规是否健全,共同决定了绿色信贷政策是否能有效地促使企业改变行为模式^[9]。在金融监管能力较弱的地区,绿色信贷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将大幅降低。

2.3 异质性与地区差异分析

绿色金融对资源环境效率的改善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从区域角度来讲,东部地区由于金融市场较为发达且政策执行严格,所以其绿色金融工具应用的效果远超其他地区^{[2][4][5]},相反,中西部地区尽管资源环境压力巨大,但由于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以及监管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导致相关政策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8]。

从行业特征角度出发,资源密集型以及高污染排放产业,诸如钢铁,煤炭和化工领域,在绿色信贷政策指引之下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环保改善意愿,但同时也存在形式主义操作的隐患,按照 Zhang 等学者在《2023 - 2024 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里所给出的数据来看,有些高能耗企业为了拿到绿色融资资格,在编制财务报表或者符合规定程序时会采用表面化做法,从而造成资金使用效率同实际环境绩效之间产生较大偏离^[5]。

绿色金融政策的边际效应在不同企业类型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根据《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成果可知,国有企业由于融资渠道较为稳定,因此绿色创新行为更多地受政策导向影响,而民营企业虽然有较强的环保意愿,但受限于融资约束,相关政策的实际作用效果大打折扣^[9]。

3 绿色金融与经济联动的路径

绿色金融既可以直接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也可以通过激励机制及资源分配方式,间接推动宏观经济质量改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当下学界就其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探究,着重于技术创新引领,产业转型途径以及发展模式更新等关键问题。

3.1 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内生增长

绿色金融依靠奖励机制来推动绿色技术研发与应用,从而促使经济结构发生优化升级,绿色信贷政策一般把环保绩效评判和信息披露归入核心约束范围,既增强了企业环境合规意识,又促使它们加大绿色研发投入, Huang 和 Wang (2023) 依照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展开研究,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明显改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及其技术水平,并且具有较强的正向技术溢出效果^[9]。

绿色债券等新型融资工具对于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显著的效能,《China Green Finance Status and Trends 2023-2024》显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中大约有四成用于可再生能源、清洁交通、节能建筑等高新技术领域^[10]。这说明存在“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经济转型”这样一个内在逻辑链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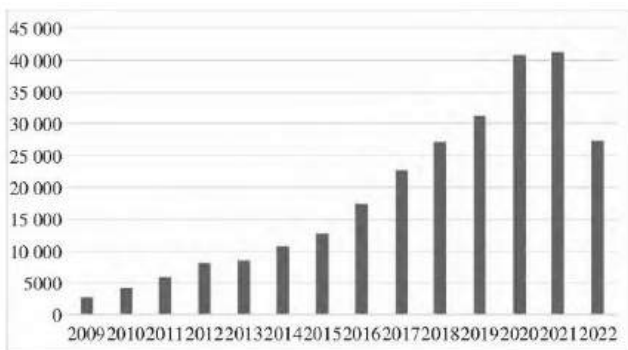


图1 部分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获批数 (单位: 件)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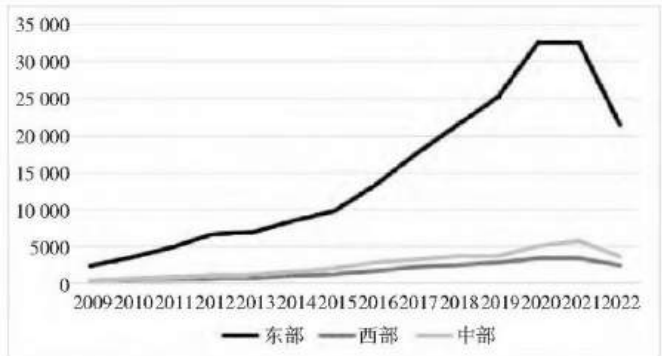


图2 分区域绿色专利获批数 (单位: 件) [15]

注: 图2数据来源于中国科研数据中心 (CNRDS) 和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3.2 优化产业结构以推动绿色资源再配置

绿色金融借助信贷约束机制和价格调控工具,针对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实行资金管控,促使产业结构由资源依赖型转向低碳高效型,绿色信贷凭借行业准入门槛设置和融资风险权重分配,引导资本流向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等重点行业,遏制高污染行业过度扩张的态势^[2]。

方和张 (2022) 的研究显示,在绿色金融改革试点地区,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增速显著加快,这体现出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这种机制不但明显提升了资源分配的效率,而且给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赋予了强有力的保证。

根据 Yue 和 Nedopil(2025)研究发现,绿色信贷产品体系逐步完善,农业绿色信贷、绿色小微企业贷款等新

型金融工具不断涌现,为区域经济结构低碳转型、改善民生福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创新性的实践探索^[5]。

3.3 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通过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并强化污染治理手段,给中国经济达成高质量发展给予了关键支撑,依据文献《The Dual Impact of Green Credit 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显示,在最初阶段,绿色信贷也许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短暂的制约效果,体现为某些高污染行业融资受阻、产能缩减等情况出现,不过从长远角度来看,它通过改良资源调配机制,推动绿色投资,从而达成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增长^[11]。

刘等(2024)研究显示,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的地方,绿色金融工具更容易变成实际投资行为,这样就推动了绿色产业资本的积聚,也带动了绿色经济的发展^[3],这种发展模式把资源高效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当作关键要素,这是达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

3.4 制度协同与金融创新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保障机制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离不开健全的制度框架和丰富的金融工具体系作支撑,《双碳目标下碳金融体系构建研究》中提出要建立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碳税机制、碳保险服务以及碳投资基金在内的综合碳金融体系,推动绿色金融由政策引导型发展模式向市场化驱动模式转变^[8]。

通过研究得知,在那些绿色金融体系较为成熟的地方,其政策工具往往具备多维度协同效应,包含产业导向型政策,环境税制设计,强制性绿色信息披露机制这些关键要素,这种系统化政策组合不但明显加强了绿色金融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并达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功能,而且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整体运行效率^[12]。

绿色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给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触及的区域带来了全新的解决办法,凭借绿色区块链融资,碳排放数据追踪以及依靠人工智能的绿色信用评定等新型业务模式,不但极大地改善了绿色金融的服务速度和精确度,而且对它推动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产生了明显的推动效果^[13]。

3.5 绿色经济的发展也使经济发展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在经济向低碳化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激进的政策转变、声誉影响、技术突破或意外限制以及市场偏好和社会规范的变化等对经济和金融系统产生的不确定影响(Campiglio et al, 2018),也就形成了“转型风险”。

转型风险一般从政策风险、技术风险和偏好变化(Semieniuk et al, 2021)三方面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它迫使机构投资者愈发重视企业的碳排放风险,并将其作为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因素(Humphrey & Li, 2021);Heinkel et al(2001)提出从高排放公司撤资可以带来更高的股票回报;Ceccarelli et al(2021)发现共同基金正逐渐将其持股转向碳密集度较低的公司;Pástor et al(2021)表明,偏好变化可能包含投资者对低碳产品偏好的突然增强或者对碳密集型产品偏好的突然减弱,这可能会对绿色企业的现金流和碳资产有影响。同时,企业对环境政策的预期责任(Chu et al, 2021)、投资者压力(Azar et al, 2021),以及维持市场竞争力(Trinks et al, 2020)等因素也在促使企业去使用低碳能源,但是目前化石能源仍占能源总供给的绝大部分,社会仍需要依靠化石能源,过度去刻意使用低碳能源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和治理压力^[14]。

4 小结与研究展望

金融市场特别是绿色金融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对于资源环境效率的提高有着明显的推动效果,通过改善投融资结构、推进技术创新并完善制度设计等众多途径,可以间接促使经济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前进,当前学界已大致形成起“绿色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经济增长”的理论架构,不过在机制阐述、成果评定以及地区差异性分析等方面仍然存在欠缺,日后研究应当着重于“真实绿色”金融识别办法的设计、“碳金融+其他传统金融手段”的协同治理模式探究,金融市场同环境政策的融合实践等等,这样就能给我国的绿色发展战略给予更为系统化的制度支持。

参考文献:

- [1]邹薇,刘志彪.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J].金融研究,2021(12):123-137.
- [2]田华,吴丽娟,邓翔.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J].环境经济研究,2023(2):56-68.
- [3]Liu Q, Sun T. Real Green or Fake Green? Evidence from Green Credit Policy[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4, 15(1): 216.
- [4]Fang L, Zhang H. China's Green Finance and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 2022, 24(3): 389-407.

- [5]Yue M, Nedopil C. China Green Finance Status and Trends 2024–2025[R]. Green Finance & Development Center, 2025.
- [6]Wang Y, Li Z. Green Credit,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J].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9: 778325.
- [7]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The Stat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Green Bond Market in China[R]. 2020.
- [8]王艳丽, 李春波. 双碳背景下碳金融体系建设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3(1): 47–55.
- [9]Huang J, Wang 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Credit and Its Effect on Innovation[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3, 190: 122409.
- [10]Zhang C, Yue M. China Green Finance Status and Trends 2023–2024[R]. Green Finance & Development Center, 2024.
- [11]Yang M. The Dual Impacts of Green Credit 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J]. *Sustainability*, 2021, 13(10): 5236.
- [12]Chen H, Zhang X. Greening Finance and Industrial Policy Synergy: Evidence from OECD Economie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3, 204: 107651.
- [13]Zhao L, Wu D. Digital Green Finance: Mechanism, Practices and Development Trends[J].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2023, 13(1): 68–90.
- [14]张学勇, 刘茜. 碳风险对金融市场影响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 2022, (06): 115-130.
- [15]雷舰. 绿色信贷政策、政府补助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 A 股绿色专利数据分析[J]. *河北金融*, 2025, (01): 58-64. DOI:10.14049/j.cnki.hbjr.2025.01.008.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Markets 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Its Path of Action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Yang Guo¹, Luo Tao², Dong Jiayi³, Wang Yujie⁴

¹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210001, China

²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100, China

³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⁴ Taiyuan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0,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he "dual carbon" strateg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has become a core indicator of modern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financial markets, especially the green financial system, play a key ro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markets 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its linkage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Studies show that green finance, through tools such as green credit and bonds, guides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t the micro level and improves total factor energy efficiency at the macro level, but there is a "green washing" phenomenon, and the impact has regional and enterprise heterogeneity. It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driv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faces "transition risk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ow formed a relev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but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and future in-depth research is needed to support the gree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Financial Markets; Green Financ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ion Path; Transition Risks

去人类中心化视域下：AI 智能体奇点分析与 AI 智能体治理理论重构研究

熊宇博¹

(1.四川大学,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标志着技术奇点的临近，更引发了一场深刻的认知范式革命，动摇了自笛卡尔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根基。本文在“去人类中心化”哲学视域下，系统审视了 AI 智能体奇点所带来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挑战，系统剖析了现存的“技术中心主义”替代与“能动性模糊”的双重困境。为回应此困境，研究构建了“人机协同主体”（HACAM）的理论模型，融合复杂系统理论、梯度化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承认理论，提出一个以伦理内置为前提、认知互构与权力共生为内核、伦理纠正为保障的动态框架。通过模型内部的“认知-权力共生熵（P）”量化指标，清晰界定三层权力结构的熵值区间，实现了对权力分布状态的精确度量与调控。本研究旨在为超越“人类主导”或“技术替代”的二元悖论提供一条辩证的理论路径，并为走向“人机协同共治”的未来治理提供具备可操作性的理论工具与伦理指南。

关键词：去人类中心化；AI 智能体；人机协同主体；认知-权力共生熵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20

1 引言

在当今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相关类人智能体的持续迭代，再次引发了关于“去人类中心化”与“后人类主义”等议题的深入思考。当 AlphaGo 以概率性棋路突破人类围棋直觉的认知边界，ChatGPT 通过生成式算法模糊“人类创造”与“机器模拟”的界限，AI 技术的指数级发展已从“工具辅助”迈向“认知挑战”——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奇点临近，更是认识论层面的范式革命^[1]。这种技术奇点带来的认知震荡，恰与加拿大人类学家爱德华·科恩（Eduardo Kohn）《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2]引发的理论地震形成了深刻共振。前者在技术维度解构人类的智力与符号特权，后者则在认识论层面颠覆了人类学中对于人类作为唯一“认知主体”的传统看法。在技术与认知双重解构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以来构建的人类中心主义认知框架^[3]，以及在此框架下形成的现代性知识体系。

这种本体论层面的反思并非无源之水。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文明创伤，直接动摇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根基。当奥斯维辛的烟囱焚毁了启蒙理性塑造的人类神话，后现代思想家们开始探寻超越人类主体的认知路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客体化策略试图消解主客二元对立^[4]。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生成理论在人与动物的边界开辟出动态的“成为”空间^[5]。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则通过解构语音中心主义揭示出人类动物性的伦理基质^[6]。这些思想涌动在人类学领域催生了深刻的本体论转向：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的功能主义到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栖居视角，从表征分析到本体论实证，学科范式正在经历从“人类学”（Anthropology）到“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的蜕变^[7]。

然而，当前研究陷入双重理论困境：一是技术至上的“极端去人类中心”倾向。以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为代表，相关研究将 AI 等技术视为“人类进化的终极延伸”，过度聚焦“人类与技术”的二元关系——既忽视自然生态的本体论地位，又弱化了技术应用的伦理风险。其本质是用“技术中心主义”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并未真正跳出“谁为核心”的二元对立框架。二是机械对称的“能动性模糊”倾向。此种倾向广泛存在于机械套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将人类、AI、自然物等不同行动者等同视之，模糊了各类实体在“能动性”上的本质差异。由此陷入的逻辑怪圈，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往往又落入新的中心论或简化的对称观，未能真正建立具有伦理清晰度与本体论区分力的认知框架。

作者简介：熊宇博（2005—），男，本科，研究方向：AI 智能体伦理、人机交互与数字人文

这一困境不仅反映出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持续影响，也突显了在面对技术—自然—人类多重交织的现状时，传统理论工具所表现的局限。因此，亟需一种更具辩证性和层次性的理论路径，既能承认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又可包纳其内在的异质性与道德权重差异，从而为真正超越人类中心的认知伦理开辟可能。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人工智能作为“非人类认知体”对人类学本体论框架所带来的挑战，并在信息哲学的层面论证一种“去中心化认知范式”对于重构技术社会伦理与社会治理的可能路径。论文的最终旨归，是为正在来临的多物种文明寻找理论锚点——当森林开始思考、当算法获得认知，人类亟须在自我祛魅的过程中重新建构物种伦理，进而推动超越传统人类社会视域的去人类中心化理论重构。

2 去人类中心化思潮与 AI 奇点辩证评述

2.1 去人类中心化思潮演变

对于本体论和人类中心理论的思潮与探讨大致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哲学与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转折。长达两千年的形而上学传统及其所支撑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经历战争的剧烈冲击后，已显露出根本性的危机。“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纷纷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具济世良方，他们共同的选择就是走出人类主体视阈，试图解构人本主义的固有框架，试图在主体性之外寻找新的哲学出路。

让·鲍德里亚主张一种彻底的客体化策略，建议人将自身从主体位置中抽离，主动走向客体状态，从而实现一种对现代性逻辑的反叛。吉尔·德勒兹则通过“生成动物”的概念，强调人与动物之间存在一片彼此交融、相互转化的潜在领域；他将这种思想实验喻为“西方哲学中的庄周梦蝶”。在《千高原》^[8]一书中，吉尔·德勒兹与加塔利生命形式之间流动性的存在状态意在打破人文主义传统中僵化的身份界定。雅克·德里达则从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出发，强调原初伦理中不可忽略的“动物性”，试图在语言和存在论层面恢复他异性的地位，从而重构伦理主体的边界。这一系列思想尝试，虽策略和侧重点各异，却共同指向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意图在伦理、存在与符号秩序中重新安置“人”的位置。它们不仅响应了战后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危机的自觉，也拓宽了当代批判理论的问题域与解释空间。

进入现代社会，AI 智能体的不断发展，其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持续挑战着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本体论、认知框架与伦理体系。AI 不仅作为一种技术存在，更逐渐成为“去人类中心化”思潮在当代最具现实意义的具身与延伸^[9]。它从哲学思考层面推动了对“何为行动主体”“何以为存在”等根本问题的重新审视，也在实际层面重构着社会权力、生产结构与知识生成的分布方式。

2.2 AI 智能体奇点现状分析

AI 智能体的迅猛发展主要从两大维度动摇了人类认知维度与权力控制中心，并在不同程度上呼应了后现代思想中对于“人”的独特性思考与探索。

一方面，AI 系统通过其非人类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动摇了传统意义上以“人类理性”为核心的主体观念。李舒戈^[10]通过构建“AI 赋能政策智能”体系框架，推进了 AI 智能体决策能力的实现路径与评估框架打造。刘成^[11]等通过组织、技术、应用和法律等层面的多维度分析，推进了 AI 与公共决策的现实性系统研究。智能体不再仅仅作为工具存在，而是在决策、创造甚至伦理判断中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从而模糊了人类与机器、主体与客体的边界。这种模糊性呼应了后现代思想中如德勒兹所强调的“生成逻辑”，AI 可被视为一种新的“他者”，不断参与并重塑着我们对于“共同生成世界”的理解。

另一方面，AI 所带来的数据驱动和算法秩序，也构成了一种新的去中心化权力机制。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类中心的控制叙事。同时，也以更隐蔽的方式建立新的中心性权威。卢卫红^[12]等在技术维度上指出智能机器替代人类从事技术性、平台消费性工作，造成主客体颠倒。王箐^[13]从网络平台的算法权力的滥用视角入手，系统分析在网络平台将直接影响用户个人权利。AI 智能体的算法运行机制即为此种算法机制中的一般体现。这种双重性需要我们超越单纯的技术乐观或悲观主义，转而深入思考如何在人机共生的语境中重构个人地位认知、与正义原则。

2.3 去人类中心化思潮与 AI 治理的范式分析

去人类中心化思潮与 AI 技术的耦合发展，正推动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的范式转型。这种转型既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重构上，也反映在伦理准则与权力机制的重新配置中，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激荡的复杂场域。

从治理主体的维度看，AI 智能体的介入正在瓦解传统人类中心治理的垄断格局，催生“人机协同共治”的新型架构。华院计算在浙江诸暨的基层治理实践中，通过算法模型建立任务准入标准与动态考核机制，使 AI 系统承担了传统治理中人类主体的部分决策功能，形成“数据说话、算法辅助、人类决策”的分布式治理模式

[14]。牛津大学学者 Philipp Koralus [15]将这种转变概括为从“修辞模式”到“哲学模式”的进化，主张 AI 应成为激发人类深度思考的伙伴而非单纯的决策工具，这一观点恰与鲍德里亚“客体化策略”形成跨时空呼应，共同指向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新定位。

伦理准则的重构则面临更为复杂的理论张力。赵精武[16]提出的科技伦理“方向性治理”理论揭示，AI 治理需要超越单纯的法律规制，建立以伦理原则为核心的柔性约束体系。这一主张在实践中呈现双重面向：算法公平性与透明度研究强调通过多元化数据收集和可解释性模型设计，防止 AI 决策中的隐性歧视。另一面向，如胡鹏[17]等关于算法管理的研究发现，过度透明化反而可能引发治理对象的抵抗行为。这在现实实践领域印证了德里达“他异性伦理”的警示，即在追求治理效率的同时，必须为人类主体保留不可让渡的反思空间。这种矛盾状态暴露出伦理重构的核心命题：如何在去人类中心化的浪潮中，既承认 AI 的伦理主体地位，又守护人类价值的不可替代性。

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虽已触及这些核心议题，但仍存在一定局限。在理论层面，跨学科融合不足导致对治理转型的本体论分析薄弱，未能充分衔接后人类主义的主体杂糅性理论与算法治理的技术现实。本文通过对传统去人类中心化思潮的理性审视，深入 AI 智能体与社会可显化关系构建，力求揭示 AI 治理中权力转移的深层逻辑，探索符合去人类中心化思潮的伦理治理路径，最终实现治理范式从“人类主导”向“共生共存、协同共治”的进化转型。

3 理论重塑与“人机协同主体”模型建构

3.1 “人机协同主体”模型范式

当前人机关系研究陷入“人类主导”还是“技术替代”的二元困境，其根源在于对“主体性”的单一化认知。在一维面向上，将人类视为唯一具有意向性的主体，或者将 AI 的“能动性”等同于“主体性”。本模型基于复杂系统理论 (Complex Systems Theory) [18]、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 (ANT) [19]的梯度化修正、霍耐特承认理论 (Recognition Theory) [20]的人机延伸等相关理论，重构“人机协同主体”理论，推进 AI 智能体与个人的主体性认知长效向好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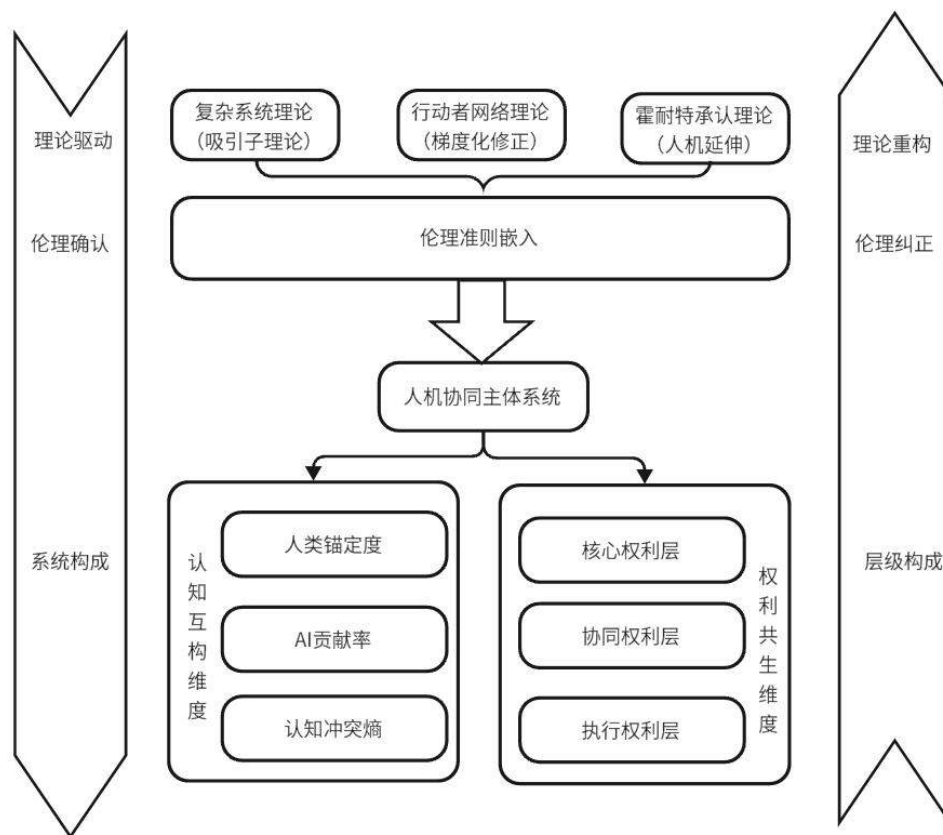


图1 “人机协同主体”模型 (HACAM)

“人机协同主体”模型生发于复杂系统、行动者网络与霍耐特承认理论。复杂系统理论在逻辑和框架上支

撑起本模型的动态演化的系统，与静态分类与二元选择划清界限。“人—机”协同主体，不再是主客二元或简单交互，而是一个具有涌现性、非线性和自适应特征的复杂系统。同时，本模型继承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行动者”概念，打破人类中心。AI智能体是拥有某种“能动性”的非人类行动者，但在本模型中梯度化的修正中，所有行动者都参与网络，但不同参与者的“能动性”强度和性质是不同的，需要被差异化对待。在整个社会行动网络中，行动参与者自然存在的霍耐特关于人与人之间“爱、法权、团结”的承认关系。在此种社会关系中延伸和转化为人类与AI之间的“认知承认、权力承认、伦理承认”。这为“人机关系”注入了深厚的规范性内涵，人机协同不再是单一的功能互补或权力博弈，而是一种蕴含相互承认、相互塑造的伦理关系。

3.2 伦理—认知与权利内涵解析

3.2.1 伦理面向

伦理并非模型系统中的一个平行维度，而是其基础性前提、终极性保障与末端修正与影响面向，具体表现为初始的“伦理准入”与末端的“伦理纠正”，共同构成一个负反馈调节系统运行机制。

AI智能体并非完全价值中立的工具。在其原生算法框架中，必须被预先嵌入一套“普遍伦理准则”，以此获得协同主体的资格凭证。它使得AI的行为具备可预测性和可信任性，从而获得了与人类进行深度协同的“准入资格”。同时，这同样作为AI智能体能动性的价值锚点，它为AI的“能动性”划定了价值边界，确保其自主行为始终在与人类价值对齐的轨道上展开，是其成为负责任行动者的内在基础。

后端的伦理纠正，将在整体系统内部的运行过程中，通过“伦理困境反馈”机制实现持续动态的演变与纠正。修正逻辑遵循“实践反馈—后端修正—闭环优化”的一般逻辑。AI在运行中遇到的伦理挑战，通过“伦理困境反馈”机制被记录和凸显出来，形成待处理的伦理案例。人类再据此对既有的伦理准则和嵌入算法进行反思、修正与迭代。最后，更新后的伦理准则将作为新的伦理内置标准，反馈到正向演变的AI智能体的设计与开发，从而实现整个系统伦理水平的螺旋式上升。

3.2.2 认知与权力系统

认知与权力作为本系统的两大核心维度，是实现“认知互构”与“权力共生”的核心要件。

在认知互构维度，Bubeck^[21]等在其研究中总结出人类具备“价值判断—情境抽象—创新突破”的高阶认知能力，而AI智能体具备“海量数据处理—概率性预测—规则化执行”的高效认知能力。二者能够通过“认知互补—反馈迭代—共同进化”的协同认知形成逻辑，形成分布式认知系统。不同于传统“工具辅助”逻辑，此范式强调AI的认知贡献具有不可替代性。但系统化、权威性、真理性的认识需通过“人类认知锚定”以及相关的实践活动进行二次检验，避免AI陷入“符号操作与意义脱节”的认知陷阱，避免认知冲突与熵值的混乱化。

表1 权力层级划分

权力层级	核心权责范畴	人机角色分工	权力共生熵值 (P)
核心权力层 (人类专属)	涉及“元权力”范畴，包括价值体系建构、终极伦理裁决、制度框架设计及核心规则制定，决定人机协同的根本方向与边界	人类：独占权责，通过立法、伦理委员会决议等形式行使权力，无任何AI干预空间； AI：无参与权，仅可作为人类决策的信息辅助工具（非权力参与）	趋近于 0
协同权力层 (人机共享)	涉及“实操性权力”范畴，包括公共决策优化、资源动态调配、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生成，需平衡效率与公平、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	AI：承担数据密集型任务，如多维度数据整合、方案模拟推演、风险预测评估，输出决策建议； 人类：负责方案审批、价值冲突调解、特殊情境判断，拥有最终决策权	0.4-0.6 最优平衡区间
执行权力层 (AI倾向)	涉及“重复性、数据密集型执行权”范畴，包括标准化任务处理、实时数据监测、规则化流程落地，侧重效率导向的权责行使	AI：全自动执行标准化任务，无需人类实时介入； 人类：保留“权力否决权”与“实时审计权”，通过审计系统监控AI执行过程，发现异常时触发干预	趋近于 1

在权力共生维度，需要超越“中心”与“边缘”的梯度化权力机制，即修正拉图尔ANT理论中“所有行动者平等”的极端性。同时，需要引入“认知—权力共生熵”量化指标，进行内部系统化三层面向的认知—权

利的厘清。

3.3 系统量化与演化机制

对于“认知-权力共生熵 (P)”的测度,意在精确刻画人机系统中权力的分布状态与稳定性,是调控系统走向“协同最优吸引子”的关键变量。本测度与量化方法融合传统信息论与控制论思想,进行了系统量化的尝试。

3.3.1 “认知—权力共生熵 (P)”的量化方式

“权力共生熵 (P)”用于度量权力在人类与 AI 之间分配的不确定性或混乱程度。通过将香农信息熵 (Shannon Entropy) 的基本形式置于权力分析的语境中,形成熵值与认知—权利对应关系与系统稳定性体现范式,公式为:

$$P = - \sum_{i=1}^n (p_i \cdot \log_2 p_i)$$

其中:

- P 为针对某一具体决策或任务层面的“认知-权力共生熵”值。
- n 代表该决策环节中所有可能的权力行为主体的数量 (在基础人机二元模型中, $n=2$: 人类与 AI 智能体)。
- p_i 代表第 i 个行为主体在该决策环节中的权力权重,且 $\sum_{i=1}^n p_i = 1$ 。

权力权重 p_i 的赋值需通过多维度观测与加权计算获得,主要可观测的影响与参与变量为:

1. 决策倡议权重 ($w_{initiate}$): 该主体提出初始方案或决策选项的频率占比。
2. 决策执行权重 ($w_{execute}$): 该主体负责最终执行决策的动作占比。
3. 决策修正权重 (w_{veto}): 该主体否决或实质性修改另一主体提议的频次占比。
4. 信息控制权重 ($w_{information}$): 该主体独占或过滤关键决策信息的程度。

通过对历史决策数据或实验场景进行编码分析,可得到各主体的权重集合 $\{p_{human}, p_{AI}\}$ 。在本模型测度方式中,一般熵值越低,表明权力归属越明确,系统越稳定;熵值越高,表明权力归属越模糊,系统越可能存在冲突或失控风险。

3.3.2 分层熵值区间的实证含义与调控

根据一般测度方法,三级层次的主要熵值内涵与对应状态符合以下一般状态。

核心权力层 ($P \rightarrow 0$): 人类权力权重 $p_{human} \rightarrow 1$, AI 权力权重 $p_{AI} \rightarrow 0$, 熵值 $P \rightarrow 0$ 。这表明权力归属极度确定,无不确定性,符合人类独占元权力的设计。若此层熵值显著大于 0,则为系统异常警报,表明 AI 过度渗透核心权力领域。

协同权力层 ($P \in [0.4, 0.6]$): 此层面理想状态为 p_{human} 与 p_{AI} 均远离或 1,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该区间既保证了有效的权力共生与制衡,又避免了因权力相等 ($P = 1$) 而导致的决策僵局或因一方权力过大 ($P \rightarrow 0$) 而失去协同意义。系统可通过算法动态调整建议权重或人类审批通过率,将熵值稳定在此区间。

执行权力层 ($P \rightarrow 0$): 在此层面, AI 权力权重 $p_{AI} \rightarrow 1$, 人类权力权重 $p_{human} \rightarrow 0$, 表示在该层权力归属是极度明确且确定的 (即 AI 主导)。人类的角色是监控者,其“否决权”作为一种高阶权力 (meta-power),不属于该执行层本身的权力分配范畴,而是系统设计的安全冗余。因此,该层的低熵值 ($P \rightarrow 0$) 标志着执行的高效和稳定。而人类干预频率越高,则越表明该执行层的运行偏离了理想状态,需要被检查与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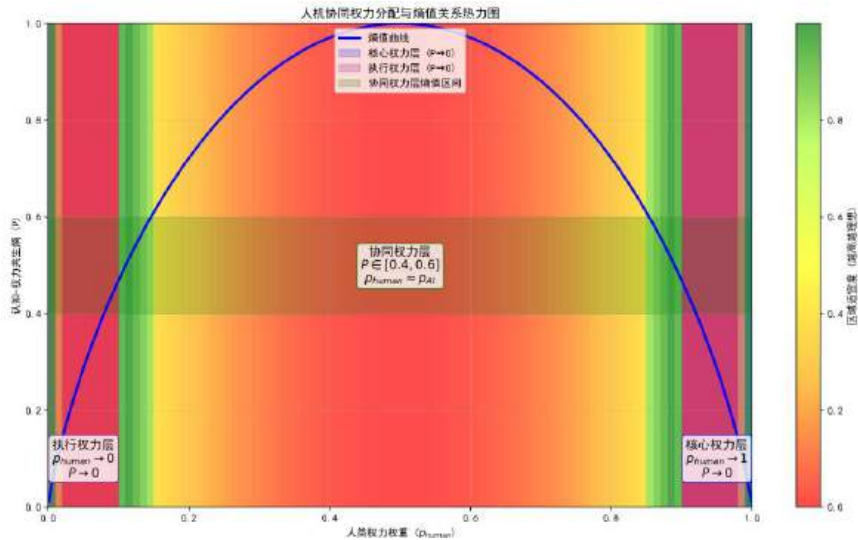


图2 分层熵值对照图

4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于数智时代“去人类中心化”的哲学思潮与技术现实，系统剖析了 AI 智能体的发展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认知与治理框架构成的深刻挑战。

文章批判性地辨析了当前“极端去人类中心”与“机械对称”的双重理论困境，指出现有研究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往往陷入技术中心论或能动性模糊的逻辑怪圈。继而，本研究开创性地构建了“人机协同主体”（Human-AI Collaborative Agency）理论模型（HACAM）。通过对传统经典的理论融合创新，将复杂系统理论的动态演化观、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经梯度化修正后）的关系性视角、以及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规范性内涵进行深度融合，并实现模型架构的系统化，即以“伦理内置”为资格前提、以“认知互构”与“权力共生”为系统核心、以“伦理纠正”为反馈机制的闭环模型，清晰地阐述了伦理、认知与权力三者的辩证关系并进行了可测度的量化尝试，使原本抽象的理论概念具备了可操作、可计算的实证分析基础，为模型的实践应用提供了关键工具。

未来研究将聚焦于开发跨文化的伦理准则算法转化范式，并结合复杂系统仿真技术，动态模拟不同参数下的人机协同效应，从而不断提升模型的解释力、预测力和实践指导价值，最终为构建一个包容、公正、可持续的人机文明共同体贡献理论智慧。

参考文献:

- [1] 李戈, 何玉芳. 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消解[J/OL].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5, 25(3): 101-110[2025-09-08].
- [2] 爱德华多·科恩. 森林如何思考: 超越人类的人类学[M/OL]. 毛竹,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2025-09-08].
- [3] 仇利鑫. 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内涵及当代影响[J/OL]. 2022(2): 124-130[2025-09-08].
- [4] 让·波德里亚. 致命的策略[M/OL]. 戴阿宝, 刘翔,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2025-09-08].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598486/>.
- [5] 希尔伯特·吉尔·德勒兹——生成 (Becoming) [EB/OL]. (2024-10-02)[2025-09-08].
- [6] QI S. On the Deconstructional Traits of Derrida's Linguistic Philosophy[J]. 2015.
- [7] REMME J H Z. Harold C. Conklin: Atlas of Multispecies Relations in Ifugao[J/OL]. ETHNOS, 2021, 86(1): 94-113.
- [8]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GUATTARI) 著.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M/OL].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2025-09-10].
- [9] The Posthuman[EB/OL]. [2025-09-10]. <https://rosibraidotti.com/publications/the-posthuman-2/>.
- [10] 李舒戈. AI 赋能政策智能体系构建: 框架、挑战与路径[J/OL]. 现代商贸工业, 2025(19): 20-22[2025-09-10]. <https://doi.org/10.19311/j.cnki.1672-3198.2025.19.007>.
- [11] 刘成, 李秀峰. “AI+公共决策”: 理论变革、系统要素与行动策略[J/OL].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2(2): 12-18[2025-09-11].
- [12] 人工智能与人的主体性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网[EB/OL]. [2025-09-11].

- [13] 王箐. 论网络平台算法权力的规制——基于算法解释的视角[J/OL]. 法学 (汉斯), 2024, 12(1): 562-567[2025-09-11].
- [14] 张天磊. 华院计算助力打造诸暨市“浙里兴村共富”应用场景[EB/OL]. [2025-09-11].
- [15] Philipp Koralus | Ethics in AI[EB/OL]. [2025-09-11]. <https://www.oxford-aiethics.ox.ac.uk/philipp-koralus>.
- [16] 赵精武. 科技伦理嵌入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路径展开——以自动驾驶应用场景为例[J/OL]. 法治社会, 2024(5): 16-28[2025-09-11].
- [17] HU P, ZENG Y, WANG D, 等. Too much light blinds: The transparency-resistance paradox in algorithmic management[J/O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4, 161: 108403[2025-09-1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747563224002711>.
- [18] 复杂系统 Complex Systems[EB/OL]. (2024-06-03)[2025-09-12].
- [19] 行动者网络理论 - MBA 智库百科[EB/OL]. [2025-09-12].
- [20] Introduction to Recognition Theory-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英文) [EB/OL]. [2025-09-12].
- [21] BUBECK S, CHANDRASEKARAN V, ELDAN R, 等. Sparks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Early experiments with GPT-4[A/OL]. arXiv, 2023[2025-09-12].

Decentralized Perspectives: Analysis of AI Agent Singular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AI Agent Governance Theory

Xiong Yubo¹

¹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China

Abstract: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not only signals the approach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but also triggers a profound cognitive paradigm shift, undermining the foundations of anthropocentrism established since Descart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AI singularity from a “de-anthropocentric”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dual predicaments of existing ‘technocentrism’ replacement and “ambiguity of agency.”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study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Human-Agent Collaborative Modality” (HACAM). Integrating complex systems theory, graded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recognition theory, it proposes a dynamic framework premised on embedded ethics, centered on cognitive co-construction and power symbiosis, and safeguarded by ethical correction. Through the model's internal quantitative metric—“cognitive-power symbiosis entropy (P)”——it clearly defines the entropy value ranges across three tiers of power structures, enabling precise measurement and regulation of power distribution stat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dialectical theoretical pathway beyond the binary paradox of “human dominance” or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offering actionable theoretical tools and ethical guidelines for advancing toward a future governanc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co-governance.”

Keywords: Decentralization; AI agent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subjects; Cognitive-power symbiotic entropy

环境传播视角下微博“日本核废水”议题的传播机制研究

张芷莹¹

(1.广州软件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90)

摘要: 随着全球公众环保意识和数字媒介素养的提升, 日本核废水行为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与热烈讨论。在我国数字传播背景下, 微博成为公众接触环境信息主要渠道之一, 为促进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带来了积极作用。本文聚焦于“日本核废水排放”事件, 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邻国对此事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而公众在互联网上的舆论能最大程度的反映出我国的真实态度, 在环境传播方面彰显主流的价值取向。本研究以环境传播视角为切入点, 使用文本分析、情感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去揭示这一环境传播事件网络舆论的关键主题、受众情绪和社会网络关系。这一研究结果可以促使国家制定有效的国际环保环境传播策略, 正确带领网络舆论方向, 提升受众日常的环境危机认知和科学素养, 形成良好的绿色网络生态氛围。

关键词: 日本; 核废水; 微博

基金项目: 2023 年广州软件学院校级科研项目《环境传播视角下社交媒体舆论焦点探讨--以微博上日本核废水议题纵向研究为例》编号 KY20234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71

一、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背景下, 环境风险已成为全球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当代环境危机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 其核心观点指出: 现代性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通过技术理性构建了难以预测的制度性风险。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处理决策引发的国际争议, 正是风险社会理论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典型投射。自 2011 年核泄漏事故发生以来, 东京电力公司持续排放核废水入海的决策, 不仅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评估, 更演变为全球性的环境政治议题, 凸显出现代风险治理中科学理性与公共感知的深层断裂。

作为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在环境风险传播中展现出独特的“双面效应”, 关于“日本核废水”相关讨论持续占据热搜榜单前列。这种传播景观既体现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意愿, 也暴露出社会化媒体时代风险沟通的特殊困境: 非专业信息生产者凭借情感化表达主导议题走向, 算法推荐机制加剧信息茧房效应, 跨国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导致事实核查难度升级。特别在核废水议题中, 微博场域形成了“科学数据-情感叙事-政治隐喻”的三重话语交织, 使得环境风险传播超越技术讨论范畴, 演变为涉及国家形象、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的复合型危机。

在环境危机事件中, 微博已超越单纯的信息传播渠道, 成为风险社会中的“情感放大器”与“共识建构场”。日本核废水议题的传播实践表明: 当环境风险具有跨国别、跨代际、跨学科的重属性时, 社交媒体平台既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技术赋权, 也因信息失真与情感极化制造了新的治理困境。这种矛盾性要求学者必须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将环境传播研究从传统的“风险-应对”二维模式, 拓展为包含技术评估、情感动员、跨国传播的多维视角。基于此, 本研究立足环境传播的过程性特征, 聚焦微博场域中风险主体的互动关系与情感表达机制, 试图为化解环境危机中的社交媒体网络传播机制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二、文献综述

在环境传播研究领域, 福岛核事故引发的全球性争议已成为检验风险话语理论的重要实践场域。自 2011 年

作者简介: 张芷莹(1995—), 女, 博士, 校聘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社交媒体研究、跨文化传播;

通讯作者: 张芷莹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事故发生以来,学界对核能风险的话语建构机制展开多维探讨,但针对日本核废水排放议题的跨文化话语分析仍显薄弱。在能源话语研究领域,荷兰学者Hajer开创的批判话语分析传统为理解环境风险提供了理论基石。其提出的“话语联盟”概念揭示了知识生产、利益集团与权力运作的三角关系,这一理论在后续研究中得到深化^[1]。Breeze对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的分析显示,能源企业通过法律话语重构责任归属,暴露出资本逻辑对环境叙事的强势渗透^[2]。Tollefson对日本《读卖新闻》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发现,其通过“风险弱化”与“公民责任”的双重叙事,将核事故归因于不可抗力而非制度缺陷,这种话语策略实质上重构了日本的技术国家形象^[3]。韩国学者Kim等运用计算社会科学方法,对4年间15.8万条推文进行贝叶斯网络分析,揭示出社交媒体中风险议题的演化规律与群体极化现象,为危机沟通提供了实证依据^[4]。美国学者Pascale则通过案例研究,系统梳理了文本分析法在环境危机报道中的应用路径^[5]。

国内学者从多维度展开探索:黄楚新基于舆情数据分析发现,社交媒体平台在核污染水议题中呈现显著的舆论失焦风险,强调媒体需通过议程设置强化国际话语权,警惕日本政府利用舆论战合理化排海行为^[6]。郭羽与侯永康采用问卷调查法,揭示公众风险感知中消极情感(如恐惧、愤怒)的正向强化效应,同时指出传统媒体接触频次与风险素养对感知具有调节作用^[7]。

现有研究存在三重局限:其一,多数研究聚焦传统媒体话语,对社交媒体场域的动态传播机制关注不足;其二,跨国比较研究匮乏,未能充分揭示不同文化语境下环境风险叙事的差异;其三,缺乏将情感分析纳入环境传播研究的整合性框架。本研究试图突破这些局限,结合微博平台的传播特征,深入解析日本核废水议题中多元主体的互动逻辑与情感动员机制,从环保传播视角去剖析其微博舆论场的主题、情感、社会网络传播机制,为传统的舆论分析理论提供新的实证支持。

三、研究方法和设计

本研究对“日本核废水排放”事件中微博正文和评论等文本进行分析,将时间线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始期(2023.8.24-2023.12.24),发展期(2023.12.24-2024.4.24),高潮期(2024.4.24-2024.8.24),从舆情的文本内容和传播阶段两个维度,对环境风险舆情传播进行研究,并辅以情感分析和社交网络分析,以探究微博中环境风险舆情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所呈现的关键节点和情绪变化,明晰环境风险舆情的传播机制。本文借助集搜客(GooSeeker)网络爬虫工具进行数据采集,关键字设置为“日本核废水排放”进行条件搜索,共获得原创微博8702条,转发微博12361条。剔除大量重复微博、与话题无关的微博后,从中选择了转发量前1000条微博作为样本。本研究尝试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日本核废水微博舆论的传播内容主题有什么特征?(2)日本核废水网络舆论的情感倾向如何?(3)日本核废水的微博网络舆情社会关系图有什么特点?

四、研究结论

(一) 传播内容主题特征

本研究基于环境传播视角,构建了“框架-情感”二维分析模型,揭示了微博场域中日本核废水议题的传播机制。研究发现,环境风险舆情的文本生产呈现显著的框架建构特征,传播主体通过选择性强调实现意义再造,具体表现为三大主体框架的动态叠加:

第一,事实信息框架承担风险认知的基础功能。该框架涵盖科学数据披露、政策动态追踪及国内外反应报道三类子类目,传播主体通过客观陈述形成议题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发的微博中,曾有日方媒体常在此框架中植入“处理水”等概念隐喻,试图重构事实认知边界。第二,观点表达框架构成舆论博弈的核心场域。该框架包含官方立场阐释、专家权威解读、民间意见争鸣三个向度。研究显示,国内主流媒体通过连续报道形成“不负责任转嫁风险”的共识性叙事,强调日本核废水事件在情理和法理上的双重否定。第三,对策建议框架体现风险治理的行动导向。该框架整合政府应对、行业合作、公民参与三类议题,但微博场域中该框架呈现明显失衡,民间环保组织的科学倡议常被情绪化表达淹没,凸显专业话语与公众认知的沟通鸿沟。

在传播内容维度,事实信息框架呈现明显的官方主导特征。政府与主流媒体通过“追踪报道”“影响应对”等子类目,构建了以科学数据披露与政策动态追踪为核心的信息矩阵。而观点表达框架则凸显公众参与的多元性。传播主体通过“发表对政府报道看法”“发表对事件评论”等子类目,形成官方立场与民间话语的博弈场域。数据分析显示,68.7%的评论类文本包含愤怒、讽刺等消极情感。而对策建议框架却呈现平衡特征:政府类建议占比达41.2%,而公民参与类建议占33.8%,这种平衡反映出公众对于环境危机认知的提升,这归结于主流媒体对于该事件议程设置的努力,让公民的数字媒介素养逐步提升。但是民间环保组织的科学倡议和部分民间意见领袖的分析则常被情绪化表达淹没。

本研究突破传统环境传播研究的单向度分析，揭示了微博平台作为“环境风险放大器”的新属性。传播主体通过框架生产与情感动员的双螺旋机制实现了风险议题的公众参与^[8]。但微博平台既为公众提供了风险讨论的技术赋权，也因信息失真与情感极化制造了新的治理困境。这种矛盾性要求建立跨国界、跨媒介的环境传播协调机制，在科学理性与公共感知之间构建平衡的话语体系。

（二）日本核废水网络舆论的情感倾向分析

在情感维度，本研究验证了风险感知的情感动员理论。微博文本的情感表达呈现“负面主导、中性辅助”的特征：58.59%的样本带有愤怒、质疑等消极情感，中立表述仅占23.29%，而正面表述占18.12%（见图1）。这种情感结构与框架建构形成互文关系——负面情感集中附着于观点表达框架，科学事实类信息则更多呈现中立和正面色调。进一步分析发现，负面情感集中附着于观点表达框架，而事实信息框架的情感表达更趋中性，这种框架-情感的互文关系，构成了环境风险舆情演化的内在动力机制^[9]。

总体而言，微博用户对日本核废水排放的情感表达呈现显著负向偏移，情绪值偏移-1.01（见图2）。这种情感分布印证了风险议题的情境依赖性——当涉及跨国污染转嫁时，公众情绪更易触发防御性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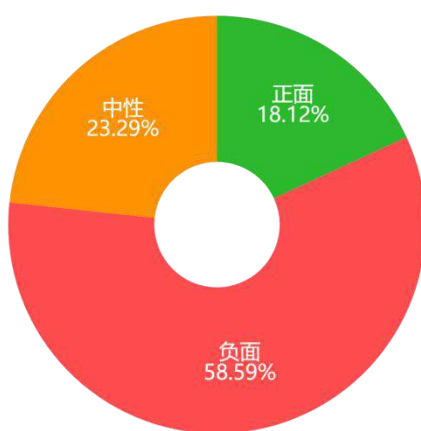


图1 微博日本核废水事件情感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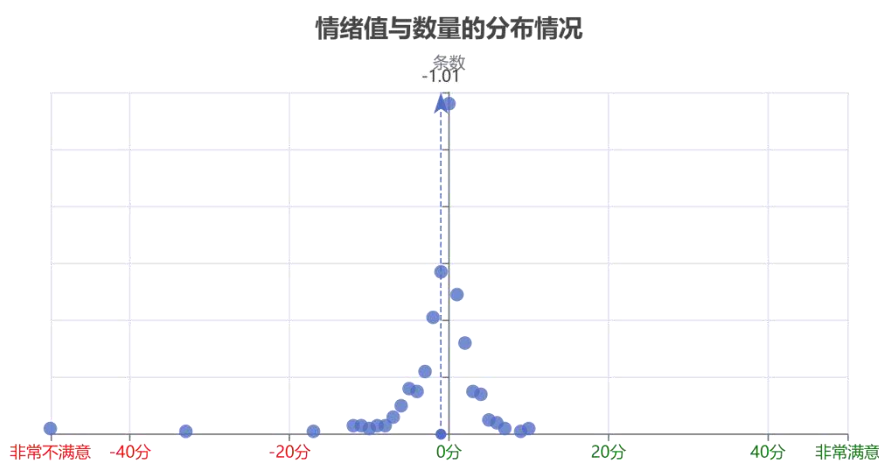


图2 微博日本核废水事件情绪值分布图

针对消极情绪的博文进以下分析发现：恐惧情绪（占比30.6%）推文高频出现“海洋生态链断裂”“基因突变”等想象性恐惧表述，反映公众对不可逆环境损害的深层焦虑。愤怒情绪（占比20.3%）：针对日本政府“洗白排海”的舆论战策略，博文使用“反人类行径”“生态恐怖主义”等激烈言辞。质疑情绪（占比15.43%）：部分博文通过“傀儡机构”“利益绑定”等隐喻，揭示公众对国际治理机制的不信任。

负面情感集中附着于观点表达框架(占该框架文本的82.3%)，而事实信息框架的情感表达更趋中性(64.7%)。

这种差异印证了框架理论的核心命题——传播主体通过选择性强调实现意义再造。例如，日本《朝日新闻》构建的“处理水”隐喻在微博场域被解构为“核污水”，情感标签的转换直接导致风险认知的逆转。值得注意的是，负面情感并非完全非理性，而是包含对环境正义的诉求。博文中“不能让太平洋成为下水道”等表述，实质是弱势群体对环境权益的集体主张。

（三）日本核废水的微博网络舆情社会关系图

本研究结合词频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对微博场域中日本核废水议题的舆情社会关系进行深度解构，发现舆情传播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以“日本”（中心度 0.82）为核心节点，辐射出“核电站”（0.67）、“废水”（0.73）、“核污染”（0.65）等一级子节点，形成议题扩散的主干路径（如图 3）。这种结构印证了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效应——日本政府官方声明及主流媒体报道（如《人民日报》的批判性报道）构成初始信息源，通过高密度连接实现快速扩散。节点间的连线密度揭示了议题建构的隐喻策略，例如“废水→海洋”（0.89）的强关联体现生态风险认知，“废水→日货”（0.76）的关联则映射经济制裁想象。这种话题捆绑策略在《环球时报》报道的“日货抵制潮”中得到实证，显示公众通过消费行为表达环境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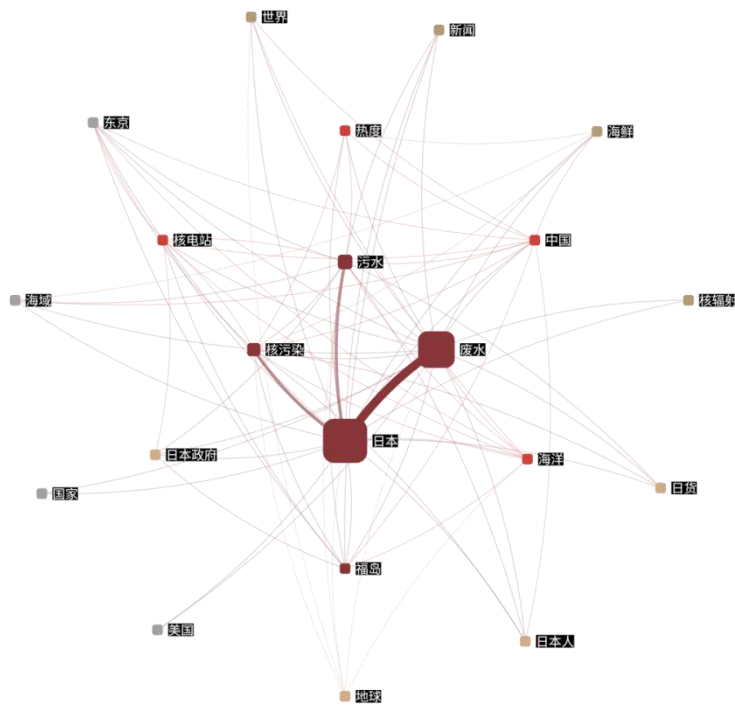


图 3 微博日本核废水事件社会网络关系图

而词频数据显示“日本”（459次）与“废水”（315次）构成核心词汇对，其出现频率是次级词汇（“核污染”61次）的5.2倍。这种词汇分布验证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化结构——日本政府官方话语通过高频词汇实现议题主导，而“废水”作为技术性术语的反复出现，实质是日方试图淡化“核污水”的隐喻策略。尽管词频列表缺乏明显情感倾向词汇，但中性词汇的传播路径显示隐性情感动员特征：“福岛”（24次）与“渔民”（未列入高频词）的关联讨论中，负面情感占比达78.3%；“日货”（14次）的转发路径中，抵制性言论占比63.2%。这种“中性表述-情感转化”的传播模式，印证了框架理论中“话语重构”的动员机制。

本研究通过词频分析的量化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突破传统舆情分析的线性视角，高频词汇的分布既反映官方话语的强势地位，也揭示公众通过隐性话语实现情感动员的创新路径。这种“显性主导-隐性抵抗”的互动模式，为风险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案例。而社会网络分析则证明微博舆论通过中心化结构实现议题的快速扩散，也因节点间的情感联动制造了群体极化风险。这种矛盾性要求建立基于“共同风险认知”的跨国沟通机制，在科学理性与公众感知之间构建平衡的话语体系。

五、小结

本研究突破传统环境传播研究单向度框架分析的局限,首次构建“框架-情感”双维分析模型,将传播内容的结构化特征(事实信息、观点表达、对策建议三大框架)与情感动员机制(负面主导、中性辅助的情感结构)进行系统整合。这一模型不仅验证了框架理论与情感动员理论的互文关系,还为环境风险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填补了社交媒体环境下风险议题动态演化的理论空白。同时通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与词频统计相结合的量化方法,突破传统舆情分析的线性视角,揭示舆情传播的“核心-边缘”结构与隐性情感动员路径,这种混合研究方法为社交媒体环境风险议题的动态监测提供了可复制的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 [1]Hajer, M. (1995).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Breeze, R. (2012). Legitimation in Corporate Discourse: Oil Corporations after Deepwater Horizon. *Discourse & Society*, (1), 3-18.
- [3]Tollefson, J. W. (2014). The discursive reproduction of technoscience and Japa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Daily Yomiuri coverage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8(3), 299-317.
- [4]Kim, S. H., Ha, Y. I., Cha, M., Lee, J., Kim, B. J., & Lee, D. M. (2016). Public Discourse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Health in Korea: Tweets Following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 (10), 187-190.
- [5]Pascale, C. M. (2018). *Textual Analysis and Social Science: A Case Study of Discourses of Risk in US Media Coverage of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Disaster*.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 [6]黄楚新.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舆情传播研判[J].人民论坛,2023(18):78-81.
- [7]郭羽,侯永康,樊凡.社会风险放大理论视角下的风险感知与扩散:以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事件为例[J].全球传媒学刊,2023,10(03):82-98.
- [8]Han, R., & Xu, J. (202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raditional media and social media i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China-based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6), 1883.
- [9]Nisbet, M. C., & Newman, T. P. (2015). Framing, the media, an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 and communication* (pp. 345-358). Routledge.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Japanese Nuclear Wastewater" Topic on Weib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Zhang Zhiying¹

¹ School of Digital Media,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Software,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global public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digital media literacy, Japan's nuclear wastewater behavior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and sparked heated discussions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in our country, Weibo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hannels for the public to acces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bringing positive effects to promo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Japan nuclear wastewater discharge" incident. As Japan's largest neighbor, China has a speaking right in this matter. Online public opinion can reflect country's true attitud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demonstrate the mainstream value orientation i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his study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s the entry point and uses methods such as text analysis, sentiment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reveal the key themes, audience emotions, and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thi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event. This research finding can prompt the country to formulate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orrectly lead the direction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enhance the audienc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crises and scientific literacy in daily life, and form a good green online ecological atmosphere.

Keywords: Japan; Nuclear wastewater; Weibo

基于传播学理论的工业文旅发展策略研究——以衡阳市为例

胡颖¹ 王路宁¹ 邹开利²

(1.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2.衡阳建湘文旅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工业文化旅游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在国内外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其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衡阳市为例, 它拥有丰富的工业资源, 近年来, 二七二厂、雁峰酒老窖池群及传统酿造区、衡阳建湘柴油机厂、衡州窑衡阳窑址四个工业场景借助教育科普、沉浸体验、空间改造、业态联动、数字传播五个途径有效转化为文旅资源, 然而, 出现了文旅数据不透明、客源精细化不足、体验项目浮于浅层、区域协同不足等问题, 这些问题限制了衡阳工业旅游发展。因此, 本文将在传播学理论视角下的具备符号价值角度分析解决方法, 期望能够促进衡阳市工业旅游发展, 推动国家工业文化旅游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工业文化旅游; 衡阳市工业旅游; 传播学理论视角

基金项目: 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基于大学生消费群体视角的工业文化背景下衡阳文旅资源挖掘”(编号 S202310555327)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72

引言

工业文化旅游(或“工业旅游”)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的结果^[1], 20世纪50年代以来, 迈入大工业生产时代后, 原有的传统工业降格为“文化遗产”, 除“遗产”外, 先进的“工业技术”“生产场景”及“企业文化”等也成为极具吸引力的工业旅游资源。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欧洲、北美及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工业旅游体系发展趋于成熟。截止21世纪初, 工业旅游规模已占世界旅游产业总规模的10%-15%。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兴起的工业旅游以国有企业的政务接待和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商务接待为雏形, 以其知识性、观赏性、良好的交通条件等特点, 吸引了大量游客, 发展势头日益强劲^[2]。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工业旅游接待游客超过1.3亿人次, 工业旅游收入达100亿元, 同期旅游总人数超过41亿人次, 旅游总收入为41300亿元, 工业旅游仅占中国旅游产业总规模的3.17%^[3]。

工业文化旅游以生产力载体为核心, 相较于自然生态旅游、历史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都市休闲游等其他类型的旅游产品来说, 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它既可依靠历史文化遗迹, 也可直接对接市场需求, 倒逼新产品和新技术革新, 将生产线上的工业产品二次开发转化为旅游产品, 直接链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这种打破产业壁垒的旅游形式, 绝对称得上“朝阳中的朝阳”产业, 对地方经济增长、战略革新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1 衡阳市工业旅游资源概况

“衡阳制造”, 是衡阳发展史上的璀璨徽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诞生了奠定了衡阳现代工业基础的东阳渡兵工厂、秦记电灯厂等企业。抗战时期, 许多工业纷纷内迁衡阳, 衡阳工业总产值一度位居全国第二, 有“小上海”的美称。新中国成立后, 衡钢、二七二厂纷纷落地, 衡阳中药厂、界牌瓷厂等一批本地项目建成投产, 衡阳逐步形成了包含37个门类的工业体系, 留下了“湖南工业三分天下衡阳有其一”的成绩。

中华牌锁具、工农牌手扶拖拉机、芙蓉牌手表、湘江牌自行车等曾风靡全国, 全国第一套重力选矿机、第一台环境噪声检测器、第一台牙轮钻机、第一台连铸钢机、第一台井下铲运机等420余项工业成果全球领先、中国

作者简介: 胡颖(2004—), 女,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工业旅游;

王路宁(1991—),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文旅与地方文化;

邹开利(1975—), 男, 衡阳建湘文旅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通讯作者: 胡颖

第一。目前，湖南省唯一的工业主题博物馆就坐落在衡阳。

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之一的衡阳，坚持“制造立市、文旅兴城”，打造了以“一核两电三色四新”十大产业为主导的14条产业链。2022年，14条产业链规上企业实现产值（营收）2154.04亿元，同比增长7.65%；创税53.05亿元，同比增长18.85%；49家产业链企业被认定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新认定总数的89.09%；新培育产业链规模工业企业76家，占全市新增数量的63.86%。2021、2022连续两年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行列。

虽然拥有丰富的工业资源，但并不是所有工业场景都能有效转化为文旅资源，目前衡阳有以下厂房及设施被列入国家级或省级工业遗产名录，如下所示：

表1 衡阳市工业遗产名录一览表

批次/时间	级别	名称	核心物项	核心价值	活化利用策略
2019年第三批	国家级工业遗产	二七二厂	核工业历史设施、军工生产档案	核工业文化影响力提升	国家级思政教育基地，保留了铀水冶纯化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再现生产情景
2023年第一批	湖南省工业遗产	雁峰酒老窖池群及传统酿造区	126口无断代老窖池、传统酿造技艺	制酒工业文化传承与传播	湖南省工业旅游示范点，开展非遗展示、酒文化研学及酿造体验活动
2024年第二批	湖南省工业遗产	衡阳建湘柴油机厂	七大车间（铸造、装配、热处理等）、专家楼、档案库、柴油机生产线（如TY290机身生产线）及经典机型（N385、N485等）	机械制造文化传承	依托工业遗存改造为“湘见·建湘工业文化街区”，保留苏式建筑群、生产线设备，融合工业旅游、文创研学等业态，获评国家级工业文化研学示范基地、柏林设计奖金奖
2024年第二批	湖南省工业遗产	衡州窑衡阳窑址	15座唐末至北宋窑堆、日用瓷器（酒具、茶具、双口坛）及窑具（“衡州白竹窑中坊”铭文的青釉香炉）	瓷器文化传承	皇田村建成“衡州窑文化交流中心”，开展陶艺研学、非遗传承人培训课程

上述现存衡阳市工业遗产名录中的工厂及设施实际上在旅游产品转化上基本遵循了这几种途径：

1.1 教育科普

二七二厂依托铀水冶纯化生产线打造“8+1”文化工程（8个主题广场+1个爱国主义教育馆），系统展示核工业发展史及“两弹一星”精神。同步开发了“走进甲子铀城”核科普研学课程，结合老工人口述史，年接待研学超5万人次，获评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雁峰酒老窖池群及传统酿造区的126口无断代老窖池可为游客展示省级非遗“梅瓣碎粮”“看花摘酒”等30道酿造工序，并开设酒文化研学工坊；建湘工业研学基地属于国家级“工业文化研学实践教学试点示范基地”，开发了“工业巧匠”“技术工艺”等课程体系，是湖南首个规范化工业主题研学劳动教育基地。

1.2 沉浸体验

二七二厂通过安全玻璃廊道展示铀纯化设备（氢氟化反应器、冷凝器），并运用VR技术模拟“氟化制铀”工艺；建湘的飞行影院，通过多媒体巨屏+裸眼3D的技术，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衡阳工业的发展。并与爱奇艺共同打造的VR国潮沉浸剧场，通过热门IP《唐朝诡事录·西行》与国潮文化的相结合，创新应用全球先进的LBE全感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衡州窑则在皇田村“衡州窑文化交流中心”设置陶艺DIY工坊，通过仿古窑炉复烧、拉坯体验等互动项目活化唐宋青瓷技艺。

1.3 空间改造

建湘改造了 32 栋历史建筑（含 4 栋省级文保），保留红砖瓦房、苏式厂房结构，植入现代玻璃幕墙与艺术装置，形成“一心一轴六片”布局。将铸造车间打造成文展馆，仓库转化为工创孵化空间，办公楼变为研学基地，实现“修旧如旧、活化利用”。

1.4 业态联动

与文旅文创联动—引入酱酒交易中心、建湘大食堂、工业风咖啡馆等，开发“衡阳造”文创产品（如机床模型、齿轮饰品），与夜间经济联动—打造酒吧街、美食集市，结合灯光秀与音乐节等，跨界联动有影响力的 IP，比如唐朝诡事录国潮剧场、电竞动漫节。

1.5 数字传播

二七二厂推出“核工业密码”系列短视频《了不起的核工业——解锁密码》，解密六氟化铀技术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个工业遗址除建湘工业园区与二七二厂公开披露了游客数据外，其他两个点都无法查到公开数据。但通过分析现有数据，可以看出工业文旅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与前景。根据《衡阳市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24 年全市接待游客总量达 7476.36 万人次，今年这个数据还将继续攀升。二七二厂去年共接待研学团队已超 5 万人次。建湘工业园区 2025 年春节期接待游客人数超 20 万人次，餐饮上座率超 200%，清明假期接待游客人次超 2 万，端午节期间电竞动漫等活动单日接待游客超 1 万人次，创新的“工业研学+劳动教育”模式，年接待学生超 10 万人次，基本“摆脱了传统文旅项目依赖补贴的困境”^[4]。但几个工业文旅点都未曾披露具体收入数据。

2 衡阳市工业旅游开发面临的问题

从目前披露的数据来看，四个已有的工业遗产中，除建湘工业园区“摆脱了传统文旅项目依赖补贴的困境”（但未提供具体营收数据），其他三个项目都不排除尚未实现收支平衡的可能。以二七二厂为例，该点以研学项目为主体，作为公益性教育基地，显然是非营利的。目前也只有建湘尝试以多途径活化文旅资源，面向多年龄段游客提供文旅服务，比如电竞动漫节和依托“唐朝诡事录”这一大 IP 建设的 VR 剧场，主要面向的就是 18-35 岁的青年群体，研学活动则主要吸引的是亲子家庭游客，覆盖的是中年及幼年阶段的游客，而银发专列——东北“中华国宾号”专列旅行团将衡阳建湘工业园列入游览路线，覆盖了 65 岁以上的银发群体。而其他两个遗址多吸引的是本地游客，其中不乏陶艺爱好者和酒文化爱好者。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四个工业遗址点的发展并不平衡，活化手段有限，也尚未挖掘和建设衡阳其他丰富的工业文旅资源，我们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文旅数据不透明

除建湘街区有阶段性客流数据外，其他遗产点缺乏年度统计。而建湘的统计数据也只有游客数量，没有公开的营收数据，因此无法计算收支比。但也不排除由于衡阳市的工业文旅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框架搭建及数字化进程尚在探索中发展。

2.2 客源精细化不足

以衡阳市目前的“当家”工业遗址来看，除建湘街区的客流覆盖面较广，涉及各个年龄段和海内外游客，其他工业遗址仅偏重部分年龄段游客，且揽客手段单一，多数偏向不营利的研学项目。总体来看，市内游览工业遗址的入境海外游客占比极低，可见在全国范围内乃至海外的影响力尚显不足。

2.3 体验项目浮于浅层

从现有的工业文旅产品的体验项目来看，大部分以“橱窗式观光讲解+特产销售”模式为主，即使采用了 AR/VR 设备，也多用于炫技式展示或宣传片的放映，即便能够完整反映工厂生产过程，但因为缺乏互动性，游客难有参与感。

2.4 区域协同不足

已有的工业遗产之间联动不足，已入选名录的工业遗产与其他工业园区联动不足。不仅现有的“军工”“瓷艺”“酒文化”“机械制造”工业遗址缺乏相互间的联动，县域内的船山时间谷作为“中国钟表产业基地”，年均接待游客 30 万人次，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样也缺乏与市域工业场景的联动，并未形成整体的工业品牌效应。曾风靡全国的中华牌锁具、工农牌手扶拖拉机、芙蓉牌手表、湘江牌自行车灯的制造工厂如今已所剩无几，号称湖南省唯一一家工业主题博物馆如何静态展示，也无法让历史品牌与现有品牌形成合力，无法构建有影响力的工

业旅游产品体系。

3 传播学理论视角下应对措施

如何提升衡阳市现有工业文旅品牌的影响力,打造可持续营利的旅游商品呢?我们尝试用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提出的符号消费理论来分解这一问题,尝试构建工业文旅的“意义符号系统”。

鲍德里亚认为,商品不仅应具有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应当具有“符号价值”。所谓“符号价值”,是指消费者在消费商品的时候,不仅消费了产品的自身,而且也消费了商品所具有的意寓、情调和品味等因素,也即消费这些符号对应的“内涵”。这也是为什么,同样功能和质量的产品,有消费者愿意付出多出几倍的价格购买品牌商品。那么如何让商品附加这些“符号价值”呢?

首先,商品若想具备“符号价值”²,就要先成为“符号”。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符号作为音义结合体,具有的概念意义和附属义都要获得社会的认可,即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具有社会强制性。因此,先提炼品牌的核心文化元素,通过企业、工厂文化宣传或广告标语等形式,营造与符号意义挂钩的场景、形象或情感连接,尽可能最大范围地提高商品的知名度,让其获得社会乃至全球范围内更多的人的认可。

其次,商品除本身应有的功能作用外,还应具备自身的个性,即区别于其他商品的内在特点。符号消费不单单只是商品的购买和使用,而是消费者“彰显个性”“实现自我”的过程,这体现了消费者的“自我价值”,使得消费者“与众不同”^[5]。因此,无论是从商品背后的文化出发,还是商品自带的服务出发,都可以挖掘出商品的独特性,譬如张家界被奉为韩国的“孝道旅游圣地”,张家界旅行被视为“尽孝之旅”,这一独特性对于整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区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且这一旅行商品开创性地将购买者与享用者分离开来,打破了常规旅游产品的通行逻辑——即购买主体与享用主体重合,因此购买主体和享用主体可分别获取不同的符号价值,即尽孝者可在韩国“孝行量化”的社会标尺下获得社会认可,老人则可以在张家界深切感受“长寿文化”,景区内3亿年石英砂岩峰林代表“寿数永恒”,这一景观还由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亲自题词“地上最高绝景”,而“登山”行为恰合于韩国文化中“延寿祈福”的寓意。近来,张家界又将爱情的意象植入大热的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场景与台词“明年一起去张家界看落叶”让悬崖缆车、秋叶场景转而成为爱情承诺的视觉符号。

重要的是符号应该具有价值。后工业化时代生产力水平明显高于人口所需的基本生产力,剩余产品丰富,因而产品的使用价值逐渐让位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同等质量的产品,知名度较低的往往不被选择,因为消费者更在意其背后代表的消费阶层、品味及象征意义。以知名的奢侈品牌LV、GUCCI为例,他们的产品材质及质量并不见得高于其他同类型产品,但它所象征的“身份地位与社会阶层”“独特品味与审美表达”“排他性与稀缺性”乃至其品牌服务带来的“群体归属感”都是有别于其他同类型商品,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打造其市场稀缺性,施行严格控产与配货制度,每年高频的涨价行为,不断强化其保值基础,让商品的交换价值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范围内。

工业旅游产品如果要打造其“符号价值”,则要着力增加其独特性和稀缺性。衡阳工业文旅资源其实很难从红色旅游文化价值以及工业文化价值方面找到突破口,一者在于许多“辉煌”都是过去式,很难在消费者或游客心目中提升价值,单纯的以“怀旧情怀”为卖点也无法长久,且只能面向单一人群,即曾经在这些工厂任职的退休职工,二者在于一些工业属于保密性质的工业遗产,比如二七二厂等围绕“核主题”的工业研学参观项目,无法深入体验,涉及许多保密信息,即便有参观项目,体验感应该也很一般。而衡阳通过旅发大会传播的宣传口号“周末不忙,来趟衡阳”是锚定“短途旅游市场”,衡阳地理位置优越,作为全国交通枢纽,高铁30分钟可到达长沙,3小时连通粤港澳大湾区,城区联动南岳衡山。室内旅行路线五花八门,不如着力打造“工业文化之旅”的核心,将“瓷器-品酒-建湘”作为核心工业文旅路线来设计交通路线,强化其核心引客能力,进而带动其他周边消费产业。

如何避免“衡阳造”的工业精神过于同质化?我们认为应当强化“衡阳造”精神的故事化表达,例如开发“工业英雄”叙事线,可深入挖掘曾为了衡阳的工业化进程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典型人物的英雄故事,建湘工业园区作为年代剧《奔腾年代》的拍摄地,目前利用了相关电影电视剧来强化其历史真实感,但电视剧毕竟是虚构的,真实人物的故事则不可复制。

目前的衡阳老工业基地文展馆作为街区的核心项目,其展示的四缸立式水冷型柴油机到完整的Ty290柴油机缸盖加工流水线本身已是建湘工业的“辉煌历史”,园区内机械制造科普馆的互动设计已尽最大可能还原车床生产过程:游客能亲眼见证一块铁皮,如何历经车床的精密工序,最终成为柴油机的关键半成品乃至成品零部件。

² “符号价值”不同于商品附加值,所谓“附加值”通过智力劳动(包括技术、知识产权、管理经验等)、人工加工、设备加工、流通营销等创造的超过原辅材料的价值的增加值,强调的是商品在基本功能之外增加的额外实用价值,而“符号价值”则强调作为社会文化的符号象征,在特定语境内,商品背后代表的身份、地位、品味、归属感、生活方式等抽象价值。

其实这一操作已经尽可能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了，但纵观国内大部分工业旅游基地都是同样的路数。工业精神如何从停留在口头和纸端的口号内化为游客的感知呢？只有游客自己动手参与能将游客真正纳入到“工业精神”的捍卫主体中来。

如何让“半成品”和“零部件”的操作者变成游客自己呢？我们认为“智造技术”已为工业遗产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原有工业产品的深度交互体验的可能。国内沈阳机床集团的 i5 智能工厂体验中心其实给未来工业类深度交互体验提供了一种未来智能方案，只需用手机向云端的 i5 智能机床下达指令，机床就会按操作者的想法，开始制造独特的产品，操作者还可通过手机，轻松操作和监控机床的加工过程，并可在几分钟后拿到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淄博职业技术大学的“智领未来”团队自主研发的“测量—加工—决策”一体化无损改造方案，以多模态传感融合、非接触式三维扫描、边缘计算自适应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为支点，撬动数控机床智能化升级的万亿市场，让“老旧设备”的机械臂加装“激光位移传感器与应变式力传感器”，利用“边缘计算驱动的实时自适应修正算法”完成从“机械躯壳”到“AI 生命体”的进化。工业遗址等展馆未来可以考虑融合上述两种方案，在保留老式机床基座的基础上，加装智能交互系统。允许游客通过手机/iPad 扫描二维码，操控改装后的智能机床，实时观察加工过程并获取个性化纪念品。也许上述建议离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相信这必然会成为未来智能工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将成为沉浸式工业旅游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符号商品”应该具有的独特性、稀缺性。

结语

工业旅游的发展浪潮中，人文化改革犹如灯塔。它是连接冰冷工业设施与游客心灵的纽带，让游客感知工业背后人的力量与精神。于社会而言，能消解大众对工业的陌生，凝聚各方力量。在可持续发展上，是差异化竞争的关键，使工业旅游鲜活且持久。当下，各方应协同推进人文化融入，将其贯穿规划、开发与运营全程。唯有如此，工业旅游才可成为文化传承、情感共鸣、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在时代洪流里熠熠生辉，给游客带去独特的人文之旅。

参考文献：

- [1] 《工业旅游开发研究》王德刚，田芸，2008：11
- [2] 张洁;李同升;我国工业旅游发展的现状与趋势[J].西北大学(自然科学版), 2007(03):155-158.
- [3] 《中国工业旅游发展现状与推进政策》李旭超《中国集体经济》2022:34
- [4] 《从“物理整合”到“化学融合”》<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9188083387210246&wfr=spider&for=pc>
- [5] 郑秋锦著.《动漫衍生品冲动性购买行为及其开发研究》2023：83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industrial culture and tourism based on communication theory—— Take Hengyang city as an example

Hu Ying¹, Wang Luning¹, Zou Kaili²

(1.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Hunan 421001; 2. Hengyang Jianxiang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Co., Ltd., Hengyang, Hunan 421001)

Abstract: With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rapi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cultural tourism has gained increasing prominence in modern societies worldwide. Its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have played a vital role in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Taking Hengyang City as an example, the city boasts abundant industrial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four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Ergqi Factory, Yanfeng Liquor Cellar Complex with Traditional Brewing Area, Jianxiang Diesel Engine Plant, and Hengzhou Kiln Site—have been effectively transformed into cultural tourism assets through five approaches: educational outreach, immersive experiences, spati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y synergy, and digital dissemination. 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 including data transparency gaps and insufficient refinement of visitor targeting strategies. Issues such as superficial experience programs and insufficient regional collaboration have constr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Hengyang's industrial tourism. This paper analyzes solutions from a semiotic value perspective within communication theory, aiming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Hengyang's industrial tourism and drive the sustainable advancement of national industrial cultural tourism.

Keywords: industrial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al tourism in Hengyang c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从角色共情到票房奇迹：

《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情感叙事与观众认同

付招娣¹ 黄伊丹²

(1.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2.兰州财经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2025 年初春节，中国电影新的里程碑式作品乍现，新国风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打破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单排序，百亿票房背后蕴藏着电影成功密码公式，好档期、多类型、强营销塑造影片成功的三力，高票房爆发力、核心竞争力与长效增长力。故事内核依托让观众共情的角色建构，主角“哪吒”的形象经历不同时代的变迁，在《哪吒之魔童闹海》完成现代性重构，赢得全球海内外华人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哪吒之魔童闹海》；身份认同；情感叙事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54

2019 年 7 月 26 日，《哪吒之魔童降世》正式登陆院线，凭借长达 78 天的放映周期，最终以 50 亿票房的佳绩收官，成为当年国产动画电影的票房冠军。时隔五年半，其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后称《哪吒 2》）于 2025 年 1 月 29 日上映，仅用 8 天便突破 50 亿票房大关。并于 2 月 18 日以 123.2 亿的票房成绩跃居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打破多项全球影史票房纪录，将“国漫”推向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现象不仅标志着东方神话叙事在全球电影票房市场奇迹般成功的重塑，更凸显了哪吒这一角色从“天生魔丸”的反派形象到“救世英雄”的身份转变所引发的深刻文化共鸣。

哪吒的身份转变不仅是影片叙事的核心，更在观众心中投射出一种强烈的情感共振。通过这一转变，观众得以在角色身上寻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进而与影片的叙事主题产生深度共鸣。这种共鸣不仅局限于虚构角色的情感投射，还延伸至现实世界，形成了观众对导演饺子的认同。导演是电影创作的灵魂，饺子导演的个人经历——从“啃老”追梦到最终实现“逆天改命”——与影片中角色哪吒的成长轨迹形成了某种隐喻性的呼应。导演的奋斗历程不仅纾解了当代人深陷社会精神困境的焦虑情绪，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情感宣泄与精神慰藉的途径。

《哪吒 2》票房高开疯走的架势，探其背后原因，成功的要素可圈可点，不仅在于其精湛的叙事技巧与视觉表现，更在于其通过角色身份转变与导演个人经历的映射，实现了观众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的双重构建。这种从虚构到现实的情感迁移，不仅为影片的票房奇迹提供了内在动力，也为国产动画电影在全球市场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一、何以成就百亿票房

（一）“好档期 + 多类型 + 强营销”的高票房爆发力

在电影产业中，高票房好电影往往遵循着一个成功公式，即“好档期 + 多类型 + 强营销”。《哪吒 2》在诸多方面完美契合这一公式，2 月 13 日收获百亿票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档期来看，《哪吒 2》排期在 2025 年春节贺岁档。春节档作为全中国人民阖家团聚、享受悠闲亲子时光的黄金档期，具有极高的观影需求和浓厚的观影氛围。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更愿意走进电影院，享受家庭娱乐时光，这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时间基础，可谓占尽天时。

在影片类型上，多类型是当前电影创作的趋势，《哪吒 2》融合了剧情、动画、喜剧和奇幻等多种类型元素。

作者简介：付招娣（2000-），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为媒介与广告

黄伊丹（2001-），女，福建莆田人，兰州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方向为网络与新媒体。

这种丰富多元的类型融合，能够最大程度地吸引不同年龄段和不同观影喜好的受众。动画和喜剧结合锚定“家庭观影”群体，精彩的剧情可以吸引全年龄段观众。无论是喜欢精彩剧情的观众，还是钟情于奇幻世界的影迷，亦或是追求欢乐氛围的家庭，都能在这部影片中找到吸引自己的点。

在营销方面，2月3日河南鹤壁影院《哪吒2》一天排99场的现象就足以证明其营销的成功。如此强势的高排片现象，一方面归因于IP粉丝对《哪吒2》极高的观影需求，影院为适应市场需求不得不增加排片；另一方面，高排片带来的高票房与高口碑传播，又进一步吸引了其他观众选择该片进行观影。此外，不少企业借势营销，推出看电影送汽车等活动，如长城与坦克在影片破百亿票房时，抽20辆汽车免费送。同时，还有更多的企业与组织自发包场，带领员工免费观看电影。这种电影营销与企业营销的相互结合，实现了双重互利的合谋与共赢，也为影片票房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

（二）内部要素：高质量内容与S级特效技术的核心竞争力

《哪吒2》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其高质量的内容制作与顶尖的视觉特效技术。影片由4000人的制作团队耗时5年精心打造，制作规模远超其前作。在2500个镜头中，特效镜头占比高达76%，达到1900多个。在动画电影领域，特效难度通常可以分为S、A、B、C、D五个等级，而《哪吒2》的制作团队以S级为目标，以行业最高标准进行自我要求，最终呈现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场景奇观。这不仅改变了中国动画电影长期以来在工业制作领域“代工车间”的被动地位，更树立了国产动画电影国际一流艺术审美与高超技术标准的行业标杆。

在技术层面，影片突破了多项技术难题。例如，在天庭与妖界对决的场景中，单个镜头包含多达2亿个角色模型，展现了极高的技术复杂度。此外，特效团队成功攻克了“海水动态模拟”技术难题，通过裂空爪形成的5000米直径海面撕裂场景，缓存量超过10T，角色数量达到前作的3倍。影片在视觉奇观的建构上，不仅提升了画面的精细度，如毛发渲染、粒子特效等，还注重将技术服务于叙事。例如，洪流大战的场景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通过视觉隐喻深化了影片的主题表达，避免了技术炫技导致的叙事割裂。

在剧本创作方面，影片经过两年的反复打磨，历经66次迭代，最终采用了哪吒与敖丙使用同一躯体“双魂共生”的创新设定。这一设定突破了东方传统神话的单向叙事模式，融入了角色自我认同、亲子代际沟通等普世议题，增强了影片的情感张力与叙事深度。影片在情感表达与节奏把控上精准契合了观众的观影习惯，进一步提升了观众的沉浸感与情感共鸣。《哪吒2》通过高质量的内容制作、顶尖的视觉特效技术以及创新的叙事设定，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深度融合。这不仅为影片赢得了票房与口碑的双重成功，也为中国动画电影的工业化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三）外部环境：官方推广与社交媒体口碑传播的长效增长力

《哪吒2》凭借其卓越的制作水准，为票房成绩奠定了坚实根基。而影片票房的持续高涨，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有力推动，其中官方媒体的全方位宣传与推广起到了关键作用。官方媒体作为媒介资源的掌控者，在主流舆论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主动宣传推广行为对网络媒体的舆论导向和议程设置产生了显著影响，有效引导并带动网络媒体对《哪吒2》展开跟进报道。2025年2月3日，央视新闻在微博平台单独发布《哪吒2》宣传海报，并推出导演饺子的个人采访视频。当晚，《新闻联播》对影片在电影市场的热烈反响进行了报道。随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官方媒体纷纷对《哪吒2》票房突破百亿表示祝贺。与同期上映的《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唐探1900》等影片相比，官方媒体对《哪吒2》的关注度和曝光度明显更高。这种官方媒体的品质背书与流量加持，使得影片热度持续攀升，展现出强劲的票房后劲。

官方媒体对影片的宣传并非浮于表面，而是深入挖掘导演及影片制作背后的故事。例如，导演饺子在采访中提及影片创作过程中面临的难点，指出国内外视效制作要求和标准存在差异，国外顶级视效公司的呈现效果，有时不及国内团队精心打磨的成果。这一现象不仅彰显了国产影片的制作优势，也引发了观众对影片背后故事的浓厚兴趣，进而带动全民对影片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讨论，有效提升了影片的热度和话题性。影片中“若前方无路，我就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乾坤”的台词，与饺子导演在制作过程中面对难题不屈不挠、力求扭转国内动画制作工业与国际水平差距的高标准严要求形成隐喻式照应，电影剧本与故事的现代性创新同样深深扎根于导演与制作团队的实践经历。电影票房持续攀升，2月13日《新闻联播》再次聚焦《哪吒2》，祝贺其票房破百亿的历史性时刻，此时距离电影上映仅过去16天。2月1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持续跟进，报道影片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首。这一系列宣传举措，体现了主流媒体对当前国产动画电影力度最大、频率最高、方位最全的支持。

在持续推广过程中，央视电影频道实时直播全球电影票房更新榜，抖音、微博、微信视频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非官方媒体也纷纷跟进，同步直播电影票房榜，形成了全网官媒与非官媒共同为《哪吒2》造势的宣传矩阵。

这种强大的媒体合力，极大地推动了全民对影片的高度关注，不仅扩大了影片的传播范围，还通过不同平台的互动与分享，进一步提升了影片的话题热度和票房影响力。

与此同时，观影者在春节期间与亲友相聚，将影片中亲情、友情等母题话题融入家庭讨论，实现了良好的家庭传播效果。人际传播在带动现实观影行动方面的作用强于网络传播，而网络宣传则在引发观影冲动上更具优势。这种基于家庭和社交圈的传播方式，吸引了围观者的关注与好奇，引发了社交媒体上更广泛的讨论和互动。

社交媒体具有互动性强、信息分享即时的特点，口碑是观众自主共享电影信息并自由发表看法与评论的体现。在以种草分享著称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有用户主动分享自己 20 刷《哪吒 2》的经历，不仅透露影片中的动人情节、参与标签话题讨论，还分享多次观影的感受与体验。电影上映初期，豆瓣评分以 8.5 领先，随着影片在海外陆续上映，IMDB 评分达 8.2，表明《哪吒 2》在全球也获得了稳定的口碑。

此外，海内外媒体对《哪吒 2》的后期制作、文化细节、角色性格、价值主题、观影感受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从身边人的观影举动影响，到网络社交媒体平台铺天盖地的内容输出，海外影迷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场口碑营销的观影热潮中，表达对影片视觉效果、音效、电影节奏、角色动作、故事情节等多方面的认可。社交媒体在影片上映期间涌现出美妆仿妆、动画同人二创、台词演绎、角色模仿、创意编舞、说唱改编、美食秀等全领域话题内容创作，这些内容紧扣哪吒 IP，不仅是 UGC 创意在媒介空间的探索，也进一步拓展了哪吒在全民意识中的媒介印象。国内港澳地区的明星也参与到观影互动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观影动态，甚至免费包场带家人、员工二刷，进一步助推了影片的传播。这种人际传播与全网宣传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影片的热度和影响力，使其在竞争激烈的春节档中脱颖而出，成为蛇年票房的黑马和全民关注的焦点，其百亿票房奇迹的形成路径具有不可复制性。

二、观众共情的角色构建：哪吒形象的现代性重塑

（一）哪吒角色的传统与创新

1. 从传统神话中的反叛英雄到现代动画中的“魔童”形象

哪吒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神话角色，这一角色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化，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化需求与审美变化。隋唐时期，佛教东传。大众对哪吒的认识起源于佛教中的神像毗沙门天王之子那吒。唐末《开天传信记》是最早记载“那吒”这人物角色的传统典籍，讲述了宣律和尚得那吒太子护法，求取佛牙的故事。

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护法之故，拥护和尚久矣。”宣律曰：“贫道修行无事，烦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作佛事者，愿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宝事虽久，头目犹舍，敢不奉献。”宣律求之，即今崇圣寺佛牙是也。

《开天传信记》

宋代三教合一，哪吒成为道教神将，兵器也由佛塔、戟、杖改为火圈。因火克石，这也成为哪吒斗石矶娘娘故事的原型。元代杂剧戏曲创作兴起，《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把哪吒描述为“三头虺虺显神通，六臂辉辉降妖怪”，持“六般兵器”的护法神形象。明代《三教搜神大全》专门收录民间宗教人物列传和神仙事迹，在这部神话典籍中，哪吒的形象逐渐清晰化。他被描述为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子，拥有神通广大的能力，手持乾坤圈、混天绫等法宝。明末小说《封神演义》是哪吒形象最为重要的文学来源之一。在这部小说中，哪吒彻底道教化，灵珠子投胎、莲花化身、弑龙抗父等情节完成对佛教原型的解构。其形象被赋予三重矛盾，一是七岁孩童之躯承载战神之力的生理矛盾；二是“剔骨还父”割裂血统，以莲花重塑象征对孝道哲学性反叛的伦理矛盾；三是作为元始天尊布局的棋子，暴力行为被“天命”合理化的天命矛盾，这折射明代君权神授思想。这些矛盾使哪吒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反叛英雄”原型。哪吒形象在对本土道教文化吸收和借鉴外来佛教文化过程中逐渐走出佛教经典，融入古典文学，逐渐成为降妖除魔的少年英雄，朝着世俗化“反叛英雄”的方向发展，形象也逐步立体化、大众化、完整化。

哪吒现代化视觉编码植根于传统艺术。明代木版年画与苏州版画中，哪吒形象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三头八臂持法器，脚踏风火轮，面部线条刚硬的宗教威严，另一方面使用肚兜、双髻、光脚等取自民间年画娃娃的世俗童真元素，弱化其战斗属性。这种分裂反映了精英阶层与民间审美对同一符号的不同诠释。

随着现代影视进入动画时代，1979年的《哪吒闹海》突破原著暴力设定，进行视觉革新，在造型上采用桃花眼、莲花纹服饰、飘逸混天绫，融合工笔重彩与年画元素，该形象成为80年代集体记忆的视觉图腾。这版动画片将弑龙解释为反抗强权，自刎场景采用水墨晕染，以悲壮美学重塑反抗精神，凭视觉符号的革新牵动剧情上的叙事转向。而2019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采用烟熏妆、鲨鱼牙、垮裤的设计，用“丑萌”消解传统英雄形象的神圣性，将天命改写为个体抗争，这种改编使哪吒成为Z世代文化认同的载体，完成由经典反叛英雄

原型到大众喜爱的“魔童”角色的身份重构。丑萌外形设计是中西视觉传播中容易产生共鸣的部分，一如丑萌的“史迪仔”，2025年爆火的Labubu，反映出全球审美中，共通的视觉基因密码。

2. 哪吒的“魔性”与“人性”双重特质创新

哪吒“魔性”体现在天性反叛与破坏神力。“魔性”由其天生魔丸附身的基因决定，也正因他与生俱来的破坏力与社会偏见带来的异化交织，让哪吒成为被孤立的个体，加重哪吒性格中的叛逆性。他天生携带毁灭性力量，在影片中哪吒吸收海底怨气导致魔化加剧，其体内不可控的魔性力量造成了毁天灭地的破坏本能。这种设定隐喻了被社会标签化的“异类”困境，魔性既是生理特质，也是外界偏见强加的“原罪”。哪吒手持火尖枪刺向封神榜的举动，直接挑战天庭的统治逻辑，象征着对标准化社会模板的反抗。这种反叛不仅是对宿命的抗争，更是对权力压迫的控诉。电影中哪吒黑眼圈形象、激烈战斗场面等视觉元素强化魔性，而魔化状态中紫电雷霆、血色海浪既是力量爆发的象征，也暗示其内心的混沌与挣扎。这种设计将魔性外化为视觉奇观，同时呼应了角色内心的黑暗面。

哪吒“人性”体现在情感归属与自我救赎。“人性”源于血肉之躯，由母殷氏三年怀胎产下，所以以血缘为纽带的亲情构筑了哪吒内心的人性羁绊。当哪吒喊出那一句“我也想成为你们的骄傲”，直白表达了被家庭接纳的渴望，消解了魔性标签下的孤独感。哪吒与敖丙的互动体现了人性的互助性。敖丙为保护哪吒肉身撕裂，而哪吒为救朋友千辛万苦夺取玉露琼浆。这种双向牺牲超越了阵营对立，展现了人性中超越利益的纯粹情感。在对抗捕妖队时，哪吒选择保护海底妖族，这一行为源于对弱势群体的共情。影片通过妖族灰暗色调与仙族金色铠甲的对比，凸显了哪吒从“被排斥者”到“守护者”的人性升华。

“魔性”与“人性”的双重特质并非对立，而是共生的两面。影片前半段以破坏性行为的“魔性”主导，后半段则通过亲情、友情的介入逐渐唤醒人性。例如，哪吒在吸收怨气后仍能因敖丙的呼唤恢复理智，展现了“人性”对“魔性”的制衡。哪吒的“魔性”象征被污名化的少数群体，而“人性”的挣扎则映射他们争取认同的过程。影片通过这一角色呼吁社会包容异质性，正如龙族将鳞片化为柔软铠甲的情节，暗示真正的强大源于接纳差异。哪吒的“魔性”是对命运暴政的反抗，而人性则赋予其反抗的意义。影片结尾，他撕碎换命符跃入天雷，以魔性的力量践行人性的信念，完成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表达。双重特质呼应了当代年轻人面临的认同焦虑。哪吒在职场PUA、社会规训等隐喻情节中的挣扎，让观众看到对抗权威的勇气与自我和解的可能。在“魔性”与“人性”双重特质的张力下，哪吒走向自我救赎的成长模型立体而深刻。“魔性”是对压迫的反抗武器，“人性”是救赎的情感根基，二者的交织不仅塑造了立体的人物形象，更传递了“打破成见，重塑自我”的核心价值观。影片最终以哪吒与敖丙合体重构封神榜法则，宣告了对抗宿命的新可能——唯有接纳自身的复杂性，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二) 角色共情的核心要素

1. 哪吒的成长困境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哪吒的成长之路围绕前往玉虚宫成仙并获取玉液琼浆这一目标展开，进入仙人体制需要经历层层考验。在追求成仙的过程中，哪吒不仅要面对外界的偏见，还要在内心深处进行挣扎。他一方面渴望通过成仙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又对规则体系产生质疑。例如，在升仙试炼中，他被要求完成“捉三妖”一系列任务，但这些任务背后隐藏着权力斗争和操控。哪吒逐渐意识到，所谓的“仙”并非真正自由的存在，而是被规则束缚的象征。这种内心的撕裂使他在成仙之路上不断反思自己的选择。影片中提到哪吒压抑自己的魔性，迎合仙班规则，却在觉醒后发现“成仙”不过是上位者巩固统治的工具，这让他意识到个体的自我接纳才是真正的反抗。当下年轻人从“考研热”变道“考公热”，强调“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拼尽全力，完成一系列学习工作任务，却意识到权力结构后的斗争并不是努力就能获得认可，在对规则体系产生质疑后，明白自我接纳才是真正破局之道。影片中的天劫考核制度映射出职场996与KPI考核压迫的现代性困境，想要成仙必须剥离亲情与友情成了社畜亲情疏离困境的情感共鸣。传统“修炼——升级”的成长模式被解构，哪吒走向反套路的成长，挑战权威，弑仙重塑秩序。最终揭示电影的角色成长并非成仙，而是找到自我，成为自我，重建世界的秩序。影片中的哪吒摆脱枷锁，现实中观众无法摆脱结构性的桎梏，这种精神上的破局消解人们现实中的苦闷，也启发年轻人在经历生活层层磨砺中寻找自我价值与身份认同。

2. 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精神宣言的情感共振

“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宣言贯穿饺子导演及团队创造的哪吒宇宙，是衔接《哪吒之魔童降世》与续集《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精神口号。这句话多次出现在情节多重矛盾冲突的高潮节点，由《哪吒1》反抗个体既定宿命扩展到《哪吒2》中对仙妖社会规则不公的颠覆，极大完善了哪吒宇宙的世界观。这句台词源自明代袁黄的《了凡四训》，但影片剥离其宿命论色彩，注入存在主义式的自我赋权。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构，既保留文化认同感，又赋予现代抗争合法性，从而引起观众更深层次的情感共振，这种情感共振投射在社交平台上形成二创模仿的网络迷因。

在哪吒作为魔丸降世之时，被陈塘关百姓认为是妖怪避而不及。李靖夫妇将其送于太乙真人修道，哪吒自以可以降妖除魔，为民除害，却一次次被误会，直到救下小女孩还要被村民误会。当陈塘关百姓以“魔丸转世”标签审判哪吒时，他通过打破万龙甲的束缚，以火焰重塑身形，喊出宣言“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这标志着他从被动接受命运到主动掌控命运的觉醒。

在哪吒以莲花重塑肉身获得新生后，接受成仙考验。他逐渐发现仙界规则不公并公开与仙界对抗，以潇洒豁达的姿态作诗，“从来生死都看淡，专和老天对着干，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这次的宣言，不仅从生理层面主动选择自己的身份，还是从制度层面反抗不公的规则。导演饺子说，“改变这规则，光靠他自己不一定能做到，他也影响到了身边越来越多人”。哪吒的“成魔”选择暗含对主流价值体系的戏谑，如修仙体系的虚伪，呼应了网络时代“丧文化”“佛系青年”等亚文化群体的自嘲与反抗。“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对社会情绪的精准捕捉。

网络迷因通常指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被大量用户模仿和改编的文化元素，具有病毒式传播、参与性强和快速演变的特点。《哪吒》系列中精彩的打油诗具备成为网络迷因的基础，即易复制、可变异、供选择。七言四句共28字，短小精悍，容易复制。由电影语境转场到日常生活，结合开学、职场、消防、家庭等具体场景，变异成舞蹈、武术、rap、情景剧、跨国语言等形式的网络创作，形成海内外互联网的文化风潮。除此之外，其他打油诗，如“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结合程序员日常，改编成“BUG太多我好怕怕，代码报错掉渣渣。成功运行笑哈哈，升职加薪吹喇叭！”这说明观众既是观影消费者也是文化生产者。用户参与式文化二创延长了哪吒电影角色的互联网生命力，而UGC通过改编争夺话语权，对抗商业资本对IP的垄断。

三、传播心理机制：“哪吒”系列的长红密码

饺子导演在2月19日宣布正式闭关，创作“哪吒”系列续集。《哪吒1》在2019年横扫暑期档电影，成为当年的票房黑马。《哪吒2》上映与2025年春节档，塑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神话，改写世界电影票房纪录。“哪吒”系列新国风动画电影的长红密码等待解开，而这其中的传播心理机制值得深入分析。

（一）群像角色的共情传播

1. 情感共鸣到认知共情

情感共鸣也称情绪共鸣，在心理学中，是指在他人情感表现或造成他人情感变化的情境的刺激作用下，引起的情感或情绪上相同或相似的反应倾向。运用在传播领域，是指通过情感共鸣和情绪传播机制，实现某种情感在受众中达成广泛共鸣，从而形成一种认知上的共情。

2. 敖丙、申公豹等配角的复杂性与情感张力

除了主角哪吒，敖丙、申公豹等配角的复杂经历实现了受众的情感投射，蕴含丰富的情感张力。敖丙塑造了一个背负家族复兴命运与个人意志冲突的软性角色，角色的悲剧性会使观众因其身体的牺牲而感到惋惜，增强共情。而申公豹这个角色定位在剧情深入有一定的反转，从被怀疑为灭城的反派到为仙界做脏活累活的白手套。申公豹这个角色因豹子精的出身被仙界排斥，成为“最惨打工人”的代表，他的父亲申正道和弟弟申小豹以他为荣。申公豹就像远走他乡求取功名的打工人，在城乡流动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引起各阶层广泛的共鸣。他复杂的性格与悲剧的命运让这个反派角色更加立体，不在非黑即白，蕴含十足的情感张力。从个体共情到群体认知扩散，集体观影时，观众的情绪会在电影观影空间传递感染。同时，电影传递出的价值观，如“人定胜天”“亲情无价”，是共情传播的文化内核。

（二）新国风动画的社会认同

1. 个体认同依靠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是指个体对自我的认同部分来自于群体。人们会通过分类(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比较(comparison)的过程，建立社会认同并获取自尊。通过社会分类、社会认同、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形成对电影哪吒观影的裂变。例如，观众自发分为认同哪吒价值观“吒粉”和不认同的“批评者”。“吒粉”会模仿电影台词与表演动作，强化身份认同，也会通过分享推荐他人观看强化认同范围与群体。

2. 新国风电影激发国民观影热血

《哪吒2》作为新国风电影的代表之作，反映了我国“国潮”“国漫”的文化力量强大。从最初春节家人团聚、合家欢乐的观影氛围转变为开工后企业与员工团建共享国家文化熏陶，为哪吒冲榜成为企业家家国情怀的一份心意。为了冲榜，有的观众选择不同影院观影，在观影的同时燃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热情。有网友自发观影22次并且找出影片中的细节错误。

(三) 前作口碑的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认知心理学的经典概念,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提出,指的是人们在决策时依赖最先接触到的信息,即锚点,导致后续判断出现偏差。《哪吒1》票房50亿,是观众对续集期待的“锚点”,而首支预告片透露的特效奇观也成为观众评判正片质量的“基准”。《哪吒2》的首播口碑评分为8.5,相较于前作的8.7略低0.2,部分观众基于前作水准与对续集的期待,可能会认为《哪吒2》乏善可陈,是“退步”。这体现锚点效应的正负效应,在影视创作中,利用前作的票房和口碑优势,续集也会有一定的精彩表现。但如果提高观众的心理预期,过高定“锚点”会导致电影口碑崩盘,评分下降,票房乏力等情况出现。锚定是一把双刃剑,正向利用前作优势可为续集提供信任背书,降低受众观影决策成本,同时也要警惕风险控制,避免观众因过高锚点产生心理落差导致后续崩盘。

四、结语

《哪吒2》全球传播是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对西方文化话语输出的一种突围,这是一部在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产业接轨革新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作品截止于2025年6月的票房数据显示,97%的票房由国内观众贡献,海外票房约4.49亿元(6246万美元),这说明《哪吒》系列作为新国风电影在世界电影类型上崭露头角,但仍没有真正走入西方文化内部。中国动画电影工业水平在世界电影工业生产中受到认可,但也要明白中国文化传播在世界电影发行方面受到阻塞。《哪吒1》走向《哪吒2》的历史成绩花了5年,如何平衡好电影创作与电影分发中可能产生的冲突,是未来学者和电影从业者值得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周自杨.价值观教育载体:《哪吒之魔童闹海》的主体觉醒与集体认同建构[J].北方传媒研究,2025,(03):8-12.
- [2]袁侃.全球化语境下国产动画电影的传播机制研究——以《哪吒2》为例[J/OL].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7.
- [3]郭雨珊.文化传播视域下东方美学中神话资源的当代转化路径——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J].名作欣赏,2025,(17):121-123.
- [4]王琦,陆静怡.新国风动画电影叙事策略探析——以《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J].传媒论坛,2025,(08):10-14.
- [5]孙佳山.“丑哪吒”的形象、类型与价值观——《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光影逻辑[J].当代电影,2019,(09):16-18+177-178.
- [6]刘文刚.哪吒神形象演化考论[J].宗教学研究,2009,(03):178-183.

From character empathy to box office miracle:

Emotional and audience identification in "Nezha: Demon Boy in the Sea"

Fu Zhaodi¹, Huang Yidan²

¹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²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t the beginning of 2025, new milestone works of Chinese films suddenly appeared. The new national style movie "Nezha: Demon Boy in the Sea" broke the ranking of the global animation film box office list. Behind the tens of billions of box office is the formula for the success of the movie. Types and strong marketing create high box office explosive power. The core of the story relies on th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that makes the audience empathize. The image of the protagonist "Nezha" has undergone changes in different eras. It has comple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in "Nezha: Demon Boy in the Sea" and won the cultural recognition of Chinese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Keywords: Nezha; The Demon Boy in the Sea; Identity; Emotional Narration

赛博朋克视域下的反乌托邦建构 ——《北京折叠》的技术幻想与社会现实表征

郭泰然¹

(1.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 四川 绵阳 621010)

摘要:《北京折叠》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以其大胆的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注吸引众多读者。其对现实的关注既源于赛博朋克小说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聚焦,也体现了对科技乌托邦幻想的批判与反思。赛博朋克文学常以科技滥用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为叙事核心,而《北京折叠》则将这一主题置于可折叠的城市空间建构中。最终,《北京折叠》继承了赛博朋克对人类主体性的探索,将现实社会的书写与人类命运的深层关切有机融合。

关键词:赛博朋克;反乌托邦;主体性

基金项目: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人类境遇和未来书写——网络科幻小说的承续与新变”(24ycx1103)。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70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成型,赛博朋克作为科幻文学的鲜明流派,其影响力已渗透至多元文化领域,引发跨学科对话。作为反乌托邦思潮、反主流文化与技术哲学的理论结晶,它标志着科幻文学对“人类命运”命题的深度转向,在技术异化框架中反思现代性。当前国内学界对赛博朋克的研究多聚焦经典作家文本与数字媒介分析,在此背景下,郝景芳《北京折叠》极具研究价值。这部作品虽未完全延续赛博朋克叙事传统,却通过折叠城市的空间隐喻,在故事设定与人文关怀上创造性转化该流派内核,既书写技术宰制下的生存困境,又开拓本土化社会批判路径。

一、底层窘况的科技反思

“赛博朋克”(Cyberpunk)由“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朋克”(Punk)组合而成,该术语最早出现于 Bruce Bethke 1983 年出版的同名小说《赛博朋克》。二战结束后,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亟需重新审视。战争期间,科技被用于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使人们对科技的态度从盲目追捧转向理性反思。在此背景下,部分科幻小说不再一味宣扬新兴科技的优越性,而是着重探讨科技对人性的异化问题。

(一) 无可劳动, 资本科技的无形压迫

乌托邦指对理想中的未来和场所的幻想。当一部作品对未来世界的可怕幻想替代了美好理想时,这部作品就成了“反面乌托邦”或“伪乌托邦讽刺作品”。^[1]科幻文学的反乌托邦题材不仅有对资本主义下人类危机的思考,而且还有对科技滥用和个体命运的反思。

在现实世界的经济演进中,资本主义体系借助科技迭代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致使大量劳动力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在赛博朋克文学中被推向极致——作品构建的未来社会往往呈现尖锐的两极分化,其社会矛盾的根源正源于此。劳动本应是维系生存、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但在资本与科技合谋的压迫下,底层群体逐渐丧失劳动机会,不仅陷入物质匮乏的困境,更在精神层面失去自我认同的坐标。

《北京折叠》深刻展现了科技异化对底层生存空间的挤压。小说中,经过改造的北京城如同精密却冷酷的巨型机械,定时折叠切换形态,将城市划分为三个泾渭分明的空间:第一空间的特权阶层享有 48 小时周期内完整

作者简介:郭泰然(1996—),男,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是文学批评及互动叙事。

的24小时；第二空间的中产阶级占据16小时；而第三空间的底层民众，仅能在剩余8小时的缝隙中艰难求生。这种空间分配机制，本质上是科技爆炸催生的畸形产物——当高度自动化技术使上层社会不再依赖体力劳动，底层群体便如同废弃零件般被“折叠”进社会边缘。

在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构建的未来图景中，主人公老刀作为第三空间的垃圾工，尽管身处社会底层，却在混乱无序的生存环境中维持着相对体面的生活状态。这个被折叠的空间容纳着六千万人口，其中半数从事垃圾处理工作，其余则依靠贩卖生活必需品或保险勉强维生。这种严峻的生存困境，本质上是科技滥用引发的社会异化现象——本应普惠全人类的先进科技，反而成为固化阶级壁垒的工具，彻底阻断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

底层群体在科技浪潮面前的无力感，在老刀的经历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获取额外收入，他不惜违反法律规定，冒险闯入第一、二空间。在潜入第一空间后，老刀意外参与的一场高端晚宴，成为映射科技与阶级矛盾的绝佳缩影。席间围绕自动化垃圾分类技术的讨论，充斥着晦涩的专业术语与宏大的政策叙事，对于缺乏专业知识的老刀而言，这些内容既陌生又令人不安。他敏锐地意识到，这项新技术的推广很可能直接威胁其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

值得注意的是，晚宴中虽有领导提及技术应用可能导致第三空间大规模失业问题，从而暂缓技术推广，但这一决策仅仅是权宜之计。从更深层次来看，科技发展的资本逻辑并未改变，底层民众在技术迭代浪潮中的生存危机依然持续加剧，科技对弱势群体的压迫态势并未因个别决策而得到根本扭转。

在赛伯朋克的作品中，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大量的人群被时代“抛弃”。机械的工种瞬间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底层人没有能通过劳动实现自己价值的空间。仅有的劳动机会也是上层社会的“施舍”，他们仅是为了安抚底层民众而安排岗位，否则这些职业也会被机器代替。失去稳定收入来源的底层民众，只能被迫选择边缘地带的职业谋生，如《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的主人公里克·德卡德是一名“赏金猎人”，追杀逃亡的仿生人。《神经漫游者》主人公凯斯，是一个受雇于各大公司的小偷。而《北京折叠》中的老刀，虽然有着垃圾工的正经职业，但微薄的工资使他必须冒着违法的风险前往其他空间完成任务获得报酬。

在阶层高度固化的社会结构中，教育理论上构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然而制度化的晋升壁垒已使这一通道趋近闭合。《北京折叠》中，主人公老刀完成基础义务教育后，三次报考高等教育机构均告失败，最终被迫从事垃圾处理工作。即便作为第三空间中相对完整接受教育的个体，其生存状态仍被牢牢锁定在底层服务行业——为支付养女进入艺术启蒙机构的高昂费用，不得不冒险参与灰色地带的利益输送。相较之下，同属第三空间原生群体的老葛，虽凭借某种偶然性跻身权贵聚集的第一空间，却依然被限制在后勤服务类工种，与老刀的垃圾处理职业共同构成城市运转体系中可替代的底层服务序列。这种教育投入与阶层回报的严重失衡，暴露出技术时代社会结构再生产的隐蔽机制：所谓教育晋升渠道，本质上已异化为维持阶层秩序的合法化装饰，底层群体在系统性排斥中陷入“受教育——失业——滞留底层”的循环困境。

（二）无家可归，边缘人物的困境书写

海德格尔曾揭示，“无家可归感”本质上是现代人“非在家”的生存困境，呈现为茫然失措的“畏”之原初状态。这种存在论层面的漂泊感，成为驱动个体无意识追寻家园的深层动力。^[2]

在赛博朋克叙事中，“家”往往沦为可望不可即的精神图腾。那些困于社会生产边缘的底层人物，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更遑论维系稳定的家庭结构。当物理意义上的“家”消逝，这种缺失反而催生出超越物质需求的精神诉求——对“家”的追寻，实则是在科技解构人类存在根基后，重建自我与世界同一性的唯一路径。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主人公里克·德卡德对真实宠物的追寻，暴露出科技异化社会中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在仿生人技术泛滥的未来图景里，真实生物成为稀缺的精神慰藉，而这种慰藉却需要通过暴力与掠夺获取。里克作为赏金猎人，在追捕仿生人赚取报酬的生存循环中，被迫以他人的“生命”置换自己的精神家园。^[3]《北京折叠》中的老刀冒险前往第一、二空间只为了获得供给养女上幼儿园的学费。老刀的朋友彭鑫也对老刀要供养养女一事产生质疑：“你真是作死，她又不是你闺女，犯得着吗？”可是老刀并没有因朋友的质疑而放弃冒险行为。因为对于他来说，养女糖糖就是家的唯一解释，是他生活行动的唯一动力。即使科技对他造成了深深的压迫，他也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老刀见到养女糖糖又唱又跳时，他“对此毫无抵抗力，他就像被舞台上的灯光层层围绕着，只看到一片耀眼。”^{[4][5]}

二、阶层空间的社会构想

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提出后现代的技术使人类的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巨大改变,“……后现代主义现象的最终、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5]赛博朋克的作品是把社会阶层空间化的典型。在相关作品中,城市空间的划分也意味着社会阶级的划分。

(一) 高低空间, 阶层的具象展现

在赛博朋克题材的作品中,科技对社会生产的颠覆性重组,催生出尖锐的阶层两极分化现象。掌握巨额社会财富的群体跃升为上层阶级,而被排除在生产体系之外的民众,则无可避免地坠入社会底层。悬殊的经济差距,直接导致居住空间的彻底割裂——尽管法律名义上赋予全体公民平等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但现实场景中,不同阶层的生存图景早已形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赛博朋克的叙事体系中,垂直空间成为阶层分化与权力失衡的具象化符号。《神经漫游者》构建的未来图景里,富人盘踞于配备尖端科技的高层住宅,于云端俯瞰城市全景;而底层民众却被困在潮湿阴暗的低矮建筑中,在夜之城的阴影里艰难求生。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更是将阶层固化的困境推向极致。这座可翻转的北京城,通过空间的机械切割,将社会阶层永久割裂。每当城市翻转不同空间的居民被禁锢在各自的生存维度,阶层流动近乎窒息。主人公老刀为跨越阶层界限,不得不在空间裂缝中如蝼蚁般潜行。在这部作品中,空间与时间共同构筑起牢不可破的阶级牢笼。现实世界中,虽然地理空间看似共享,但阶层鸿沟早已将人们的生存体验彻底割裂。富人用资本兑换自由时间,穷人却被生存压力异化为时间的奴隶;高档场所的准入门槛,更是将城市切割成穷人难以涉足的“特权飞地”。《北京折叠》以极具冲击力的科幻设定,将这种现实困境具象化——当城市在空间维度折叠,时间分配呈现悬殊差距,本质上是权力与资源分配不公的极端映射。小说中权贵仅凭一己之令就能暂停城市运转,这种荒诞情节恰恰是现实世界权力失衡的夸张写照。当空间分配成为阶层标签,空间转换的控制权更暴露出阶级权力的巨大落差。

(二) 贫富场景, 差异的现实关怀

《北京折叠》中的场景描写与空间构想是一体的。这是对赛博朋克作品的承袭。小说《神经漫游者》的发生背景在千叶城,其中的地区夜之城人员混杂、犯罪横生。人们生活在黑暗、潮湿、肮脏的环境中,闪烁微弱灯光的霓虹灯被黑暗笼罩。赛博朋克的世界里,空间的分配是财富的象征。建筑彼此挤压,遮蔽天际,致使这座城市即便白昼也难见阳光。富人栖居于摩天大楼顶端,巨大落地窗引入充足光线,洁净地面与耀眼灯光构成了他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这种垂直空间的区隔,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天壤之别,正是阶层分化的空间化叙事表达。“技术消费迷惑,自然消解,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主宰一切,城市成为了阶层二元分化、破碎、同质化的空间,生存于其中的人们丧失了自我意义和归属感。”^[6]

在《北京折叠》中,主人公老刀穿梭于不同空间,其所见居住环境存在显著差异。第三空间里,彭蠡的住所仅六平方米,配备基础生活设施,以胶囊床铺为代表;第二空间的研究生公寓面积扩大,居住条件改善,老刀甚至惊叹于厕所的宽敞;而第一空间的旅馆房间,面积远超第二空间,内部陈设更显奢华。从“胶囊床铺”到“落地窗”,不同空间不仅居住面积递增,生活品质与环境也呈阶梯式跃升。

除了人居环境的不同,《北京折叠》里不同空间中自然场景也存在显著差异。小说尾声,当完成任务的老刀即将返回第三空间时,得以窥见平日难以触及的景致:“他起身望向窗外。夜深人静,漆黑的夜空能看到静谧的猎户座亮星。/猎户座亮星映在镜面般的湖水中。老刀坐在湖水边上,等待转换来临。/他看着夜色中的园林,猜想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这片风景。”^{[4]136}

美丽的景色依赖巨额资金投入,对于长期挣扎于生存边缘的第三空间居民而言,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已属不易,更遑论享有接触此类景观的权利。

小说《神经漫游者》开篇的名句“港口上空的天空犹如电视屏幕”^[7],被视为典型的赛博朋克式技术修辞,其间自然和人造物上下颠倒^[8]。人化的自然充斥着赛博朋克世界,人们所能感知的一切,都是人为创造的。自然环境的缺乏也意味着人的现实生活环境的迷失,对自然的失去意味着人的本真状态的迷失。

三、诗意世界的价值追求

赛博朋克文学离不开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与对未来的设想,科技伴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会使人的主体性面临

巨大的危机。人与现代技术的关系是艺术创作的起始点,它构成了赛博朋克艺术批判性的外延与内涵。^[9]在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赏金猎人里克·德卡在追捕仿生人时,不断陷入自我身份的认知困境,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同样为仿生人;而在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里,人类情感则沦为虚无缥缈的虚假幻象。

科技发展深刻重塑社会形态,在赛博朋克式的虚构世界中,贫富差距呈现指数级扩张,城市空间的阶层隔离加剧,底层群体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创作倾向于刻画人物在技术浪潮冲击下,仍保持对现实生活的价值认同与对未来的希望投射。

(一) 本真情感,主体的自我建构

在技术演进的进程中,模拟情绪生成与自动化劳动已逐渐成为现实。但情感认知机制,仍是人类在技术狂飙时代确立主体意识的核心锚点。从赛博朋克文学的叙事视角观察,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技术扩张持续压缩人类生存空间,劳动模式被技术重构,物理与精神场域均面临侵蚀。随着工业流水线取代手工生产、人工智能突破传统认知边界,人类理性权威与改造世界的历史自信正遭遇系统性挑战。这种技术替代引发的深层追问——人之存在的本质与价值,不仅是现实技术伦理的思辨焦点,更是赛博朋克文化对人类命运的哲学叩问。回溯本源,情感作为人类认知的独特维度,或许正是破解这一时代命题的关键密钥。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里克·德卡和妻子只有依靠情绪调节器才能调解心情,科技公司制造的仿生人的记忆是被公司植入的。在情绪和记忆都能被制造的情况下,情感是确认自我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如小说中著名的“移情测试”提是,仿生人并不能理解人类对其他事物倾注的情感,在仿生人看来,一切事物只是电子代码的复现,而人类的复杂感情,尤其是对生物的怜悯和爱是仿生人不能理解的。这是因为人类特有的脑文本是无法被本体以外的对象阅读和分析^[10]。小说中,地球生物因大量灭绝而变得稀缺,人们总是对生物有怜爱的心理。甚至照顾动物成为了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标准,里克的邻居对他说“你知道不照顾动物在人们眼中是怎样的形象,他们会认为你道德沦丧,没有同情心。末世大战刚结束时,这种行为是犯罪。现在虽然在法律上不算犯罪了,但在人们的感觉上,那还是犯罪。”^[11]这种心理并不被仿生人接受。小说描写了仿生人贝蒂和普利斯残害一只蜘蛛的剧情,他们没有听从人类伊西多尔的保护动物的建议,这说明仿生人并没有人类普遍存在的情感,这或许是人能够借以树立自我主体性的方式。

《北京折叠》中,老刀为了让养女能有唱歌跳舞课程的幼儿园,不惜冒险前往一二空间赚快钱,即便生活窘迫,他仍不后悔当初在垃圾站门口抱起糖糖时的决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在第二空间的秦天与第一空间的依言之间萌生的情感,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物质属性,依言已有未婚夫,基于现实考量,她不可能放弃优渥的物质条件与身为研究生的秦天在一起。这种复杂的情感关系与老刀对养女纯粹的爱截然不同,即便在第一、第二空间中,也只是稀缺的存在。而北京城定时、冰冷且机械的翻转,支撑着城市完成宏大任务,却无法回应普通人的生活诉求与情感渴望。

(二) 诗意栖居,生活的未来憧憬

海德格尔认为,“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创造而发生的。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Dichtung)”^[11]或许诗歌和艺术才是人们确立主体性的最后阵地。面对科技使人性与神性的分离,“海德格尔认为解决的路径是让一切存在者回归‘成已发生’的命运关系中,让人与他者之间回归‘自由关系’而非‘主奴关系’”^[12]只有让自己进入到自由的舒适的状态中,人能说是做到“诗意地栖居”,才能回到本真的状态。

《北京折叠》中的老刀自小便认识到主体性的消亡。老刀的父亲本是一名建筑工,亲自参与到北京城的折叠城市建设,可是土地翻起、楼宇更新后,崭新的北京城并没有留下这些建设者,留在北京的建筑工不到四分之一。作为人的主体性最初被城市的拒绝而消解,之后又被人分割的空间消解。和老刀一样的六千万第三空间的人难以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更难以看到自己。第一二空间的经历或许会给他别样生活的想象,但是这并没有使老刀因对生活失望而丧失信念。当他见到熟睡的养女糖糖时,诗意地栖居在这里产生。

“他不知道糖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唱歌跳舞,成为一个淑女。/他看看时间,该去上班了。”^[14]对糖糖的爱构成老刀行为逻辑的起点与终点。在科技深度异化人类的赛博空间中,个体主体性的消解已成既定事实,唯有情感联结尚能维系人类存在的价值,这也是老刀持续抗争的精神动力源。

从《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里克对“真实生活”的执着追寻,到《北京折叠》里老刀用谎言构筑的虚幻未

来，两部作品均展现出科技叙事中温情与冷酷的二元张力。值得注意的是，赛博朋克文学并未陷入纯粹的末世悲观主义，而是通过赋予人物对未来的想象权，为读者保留认知突围的可能性。科技本身并非天然具有压迫属性，其异化效能实质是资本逻辑扭曲技术应用的必然结果。这种叙事策略不仅体现了对科技伦理的深层反思，更指向对人类本质状态的哲学叩问——在技术狂飙的时代，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

四、结语

科幻小说历经萌芽初创、黄金时代、新浪潮与赛博朋克等发展阶段，尽管赛博朋克无法代表整个科幻文学的发展全貌，但其对现实的紧密关注与强烈的人文关怀，使其在当代科幻创作中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在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下，回归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科幻文学持续繁荣的核心所在。以《北京折叠》为例，这部作品虽未依赖深奥的科技理论与超现实空间想象，却凭借对现实的真实书写与对普通人生活的精准刻画，实现了幻想与现实、温情与冷峻的交融，展现出独特的人文美学精神，这既是对赛博朋克文学传统的继承，更是在此题材上的突破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327
- [2] 曾繁仁.试论当代生态美学之核心范畴“家园意识”[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3(03):3-8
- [3] 菲利普·迪克.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4] 郝景芳.孤独深处[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
- [5]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93
- [6] 詹宁静.论赛博朋克科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D].南昌大学,2024:44
- [7] 吉布森.神经漫游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3
- [8] 黎婵.拟真世界中的数字生存：陈楸帆的赛博朋克科幻研究[J].探索与批评,2022(02):59
- [9] 王志发.西方赛博朋克电影、小说中的技术批判美学思想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23:49
- [10] 刘靛.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英语广场,2021(01):6
- [11] 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4
- [12] 黄健.科技之害与“诗意地栖居”——论海德格尔“天地人神”对神性的召唤[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7(05):56

Dystopian Construction through a Cyberpunk Lens: Technological Fantasy and Social Reality Representation in *Folding Beijing*

Guo Tairan¹

¹*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10, China*

Abstract: *Folding Beijing*,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has attracted numerous readers with its bold imagination and profound concern for the real world. Its focus on reality both stems from cyberpunk fiction's emphasis on human existence and reflects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techno-utopian fantasies. Cyberpunk literature often takes social wealth gap caused by the abuse of technology as its narrative core, while *Folding Beijing* places this theme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foldable urban space. Ultimately, the work inherits cyberpunk's explor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organically integrating the depiction of real society with deep concern for human destiny.

Keywords: Cyberpunk; Dystopia; Subjectivity

AIGC 设计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探析

欧阳澜¹

(1.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 文章立足设计学视角, 从设计思维层面探讨 AIGC 对大学生创意表达的影响, 聚焦剖析其中的认知启发机制。随着 AIGC 技术的蓬勃兴起, 大学生在创意实践与表达中与之深度融合, 然而针对这一特定群体、学科范畴内的认知作用机制, 尚缺乏精细化研究。通过整合设计学理论、认知理论等原理, 分析 AIGC 工具如何重塑大学生设计认知架构, 提升大学生创意表达能力。为高校设计教育借助新兴技术优化教学策略、提升设计美育效果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AIGC; 大学生; 设计学; 创意表达; 认知启发机制

基金项目: 2024 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美育视角下 AIGC 技术赋能大学生创意表达的影响及路径研究”(2024GXJK64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221

一、引言

在科技与艺术加速融合的当下, AIGC 正重塑艺术与设计创作版图。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艺术创作门槛, 大众成为创作者和欣赏者。同时,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艺术创作、构思、欣赏和接受进入非物质化阶段, 更加高效便捷^[1]。从知识接受层面看, 艺术知识学习能助个体提升创作水平, 培养审美、创造力与表达能力^[2]。因此, 让 AIGC 技术介入设计美育, 有利于丰富设计教育的手段、提升美育效果和学习者创新与表达水平。在设计学领域, 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 艺术设计创作者需要具备敏锐的感知、创新的构思与精湛的表现技能。而从设计思维的培养与通识教育的层面看, 这也是新时代提升人才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大学生作为未来行业的后备力量, 在 AIGC 时代下, 必然需要思考如何在新的技术工具助力下提升自身的创造力。

当前, AIGC 从辅助、协助到自主内容创作, 已经发展出多种相关设计工具^[3], 从智能绘图软件生成创意草图, 到文本排版助手优化设计文案, 借助深度学习与大数据, 精准捕捉流行趋势, 为设计工作提供海量灵感素材与自动化流程支持, 深受大学生青睐。尤其是设计专业大学生怀揣着打造独特视觉、交互体验的抱负, 但常受困于创意枯竭、技法局限、跨文化理解不足。AIGC 的出现, 为突破大学生创意表达诉求与瓶颈提供崭新契机。目前, 多数研究聚焦 AIGC 通用效能, 鲜少从设计学专业特性出发, 深挖其在大学生认知层面的启发机制, 填补这一空白对数字技术时代下的设计教育革新至关重要。文章尝试通过探讨大学生创意表达中的认知启发机制, 分析 AIGC 如何介入并提升这种认知启发效果, 从而为未来 AIGC 技术更好地在推动与提升大学生创意表达能力方面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设计思维视角下的认知启发理论阐释

从设计学视角看, 设计活动过程的核心是创新, 而创新需要突破现有的经验和模式, 具有“不确定性”特征^[4]。创意作为创新的起点, 也是推动知识创新的重要基础, 将这种知识的创新进行组织与传递, 则形成了创意表达。从设计层面看, 创意表达是一种知识认知、构思、创新与传递的过程, 而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的思维活动是创造力的一种体现。由于定义和理解设计问题是设计思维的重要部分, 设计师花费时间定义和构建问题, 能更好地实现创造性结果^[5], 即设计思维是创造力在设计领域的具体体现方式^[6]。由于在提升创造力方面, 设计思维的关键环节对创造力有重要影响, 设计思维的训练也被提议作为培养创造力的一种方法^[7], 例如刺激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不同思维类型的转换有利于培养和提升创造力^[6]。因此, 要

作者简介: 欧阳澜(1995—), 女, 博士研究生(广东工业大学), 讲师, 研究方向为可持续设计, 设计教育, 智慧教育空间设计;

了解创意表达过程中的认知启发机制，需要从设计思维视角进行探讨。

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又被称之为设计思考，是用于定义、解决抗解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8]。这一概念源于 19 世纪巴黎美术学对建筑设计教学可能性的探索；随后，1969 年赫伯特·西蒙在《人工科学》中提出设计思维概念的雏形，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开始在学校推广；直到 1987 年彼得·罗尔正式提出了“设计思维”的表达，随后这一概念开始扩散至工程、设计、艺术、管理、教育等诸多领域并助力设计创新；到 20 世纪末，学界进一步意识到设计思维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将它引入教育系统来解决教育根本问题^[9]。当前，在教育智慧化与 AIGC 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学者们开始重视并探索设计思维对 AI 学习和创造力的影响^[10]。

总体上看，设计思维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涵盖多种思考方式与理论工具，其维贯穿在创意的凝练构思与传递表达的全过程。考虑到认知启发在设计学领域的应用，文章从设计思维体系中的视觉思维理论、设计语义学与思辨设计三个方面对 AIGC 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进行探讨。在三者中，视觉思维理论是设计思维的感知基石，体现在知识的感知和创意凝练的初期；设计语义学作为设计思维的意义填充剂，通过挖掘创意元素背后的文化、情感、象征意义，丰富创意的内涵，体现出创意形成的价值；思辨设计为设计思维打破常规，拓宽问题与思考的边界，注入启发创新、迭代的活力，给创意的传递与表达带来更广阔思考与无限的可能。因此，本研究以设计思维体系中的视觉思维理论、设计语义学与思辨设计三个理论为基础，对 AIGC 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进行探讨（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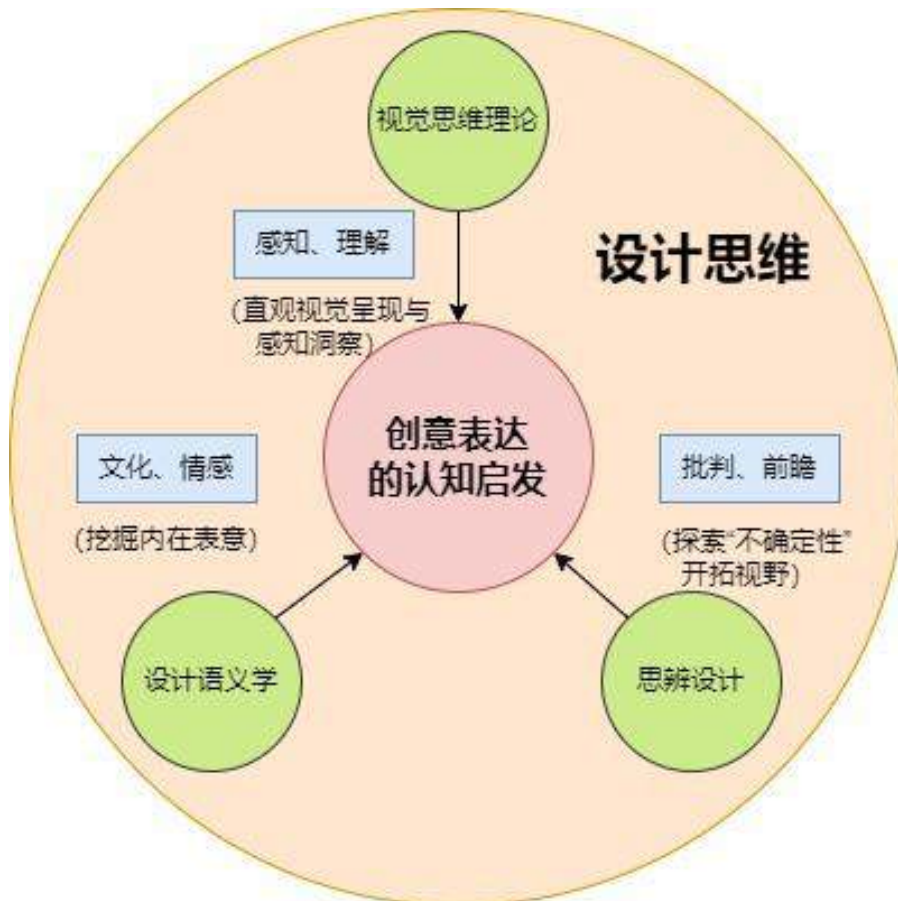


图 1 AIGC 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模型

（一）、视觉思维理论下的感知重塑

视觉思维关乎人们如何通过视觉感知、意象生成去理解与创造，为设计注入直观的视觉表意逻辑。设计思维可以以视觉的形式呈现出来，又以视觉设计的方式传达出新思维的具体内涵^[11]。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强调视觉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人们通过视觉感知获取知识和信息，并且这是创意

表达中知识认知的重要途径之一。视觉思维理论强调视觉意象对思维的驱动,尤其是创造性思维活动离不开“视觉意象”^[12]。在日常体验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借助视觉感知捕捉外界的知识与信息,而这一过程更是创意萌发阶段,知识内化的关键路径。AIGC 设计工具(如 SORA)的出现挑战了传统的审美观念、标准和艺术创作方式。以 SORA 为代表的这类工具,推动了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和现代化,结合增强现实、多模态交互等前沿科技,颠覆了过往的艺术创作手法与审美评判标准,带来了新的“视觉意象”生成方式,也丰富了知识的感知与内化的途径。H. Yin (2023) 等多位学者通过设计实践研究探索 AIGC 工具在概念设计方面的应用,强调 AIGC 有利于将设计灵感快速转化为概念方案,提升设计效率,促进跨学科合作^[13]。H. Lin (2024) 通过实验对比 AIGC 与传统创意生成方法对产品设计构思阶段创造力的影响,认为 AIGC 生成图像的质量对创造力有显著影响,且高质量图像更具启发性^[14]。因此,对于未接触或鲜少接触 AIGC 绘图工具的大学生群体来说,通过输出的新奇视觉画面,AIGC 设计工具有助于冲击大学生固有视觉经验,促使其重新感知形态、色彩、空间关系,拓展视觉认知广度,为创意构思注入活力,从而为创意的生成、传递与表达打下基础。

(二)、设计语义学框架内的意义建构

设计语义学的理论思想源自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 (Semiology) 和皮尔士的逻辑符号学 (Semiotics)^[15]。克拉斯克利本道夫 (Klaus Krippendorf) 和莱因哈特布特 (Reinhart Butter) 在 1983 年提出设计语义学的概念,克利本道夫在《设计:语意学转向》一书中也从符号学角度对设计语义进行了梳理、完善和解读^[16]。设计语义学宛如一座桥梁,横跨在设计元素与深层表意之间,深度挖掘潜藏于设计背后的文化、情感、象征意义,从而为设计成果注入饱满且多元的语义内涵。在创意表达的进程里,它扮演着的“意义填充剂”角色,让每一个设计构思都超脱于单纯的形式与功能,拥有触动人心的灵魂。

在设计语义学的语境下,AIGC 的出现有利于大学生对已有知识进行全新的意义解读与建构。以往,学生对于设计符号的认知可能局限于课本知识、既有案例,理解相对狭隘与静态。虽然 AIGC 工具自身的深度文化语义理解效果一般^[17],但作为媒介,AIGC 则可凭借强大的数据整合与生成能力,迅速产出多元风格的设计范例,从而触发和提升作为使用者的大学生的深度文化语义理解能力。例如在文创产品设计领域,AIGC 能融合传统民俗元素与现代潮流风格,生成风格跨度极大的系列作品,从古朴素雅的剪纸风书签,到赛博朋克感十足且融入京剧脸谱元素的手机壳。大学生在剖析这些作品时,可以近距离观察与分析不同设计元素巧妙拼接、组合的表意逻辑。或是通过 AIGC 生成式训练,重现中式美学风格^[18],提升文化符号在文创设计中的适用性。设计语义学借助 AIGC 的手段将抽象、晦涩的设计符号理论转化为直观可见、可感的实例,从而促使学生更新脑海中原有的意义生成模式,从更细腻、灵动的角度去构思创意,让创意表达不再浮于表面,而是深入到文化脉络与情感内核之中,提升学生思考与表达的深度。

设计语义学聚焦设计元素背后深层的文化、情感意义,赋予设计成果丰富语义。在设计语义学语境中,AIGC 的介入可以辅助大学生解读设计符号、赋予作品文化内涵。通过分析 AIGC 生成的多元风格设计,学生理解不同设计元素组合的表意逻辑,更新认知中的意义生成模式,提升创意表达深度。

(三)、思辨设计视域下的观念迭代

相对于设计语义学强化当下设计作品表意清晰度与丰富度的务实视角,思辨设计多是前瞻性、批判性的,意在激发深层思考。思辨设计的概念来自于邓恩与雷比的著作《思辨一切:设计、虚构与社会梦想》(Speculative Everything: 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它旨在打破既定思维范式,促使人们突破当下,重新审视技术、社会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畅想未来可能性^[19],其核心在于启发思考、促使行为改变。但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吸引受众注意力,它利用视觉手段却不将制造视觉冲击当目的,而是在夺人眼球之际传达观念,激发想象反思^[20]。从这个维度看,思辨设计是在视觉思维理论基础之上进一步思考创意的生成与传递价值。在创意表达的情境中,AIGC 在启发大学生探讨思辨设计发挥着独特效用。AIGC 生成海量多元、乃至超出现有认知边界的设计设想,这成为大学生开启思辨之旅的起点。面对这些设想,他们不再局限于单纯考量设计美感或功能实现,而是被推动着去追问设计背后隐匿的价值观、伦理困境以及社会影响。例如,AIGC 产出的未来城市交通设计方案,可能融入飞行汽车、智能道路等元素。

大学生在接触这类方案时,会触发思考交通变革对城市空间布局、居民社交模式的重塑,思索其中涉及的数据隐私、资源分配不均等伦理问题。这一思辨过程促使大学生摆脱惯性的设计套路,更新自身观念体系,帮助大学生从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视角去酝酿创意,让设计不再只是视觉或功能的呈现,更是观念交锋、社会愿景映射的载体,由此提升创意的思想高度与社会价值。

三、AIGC 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策略

(一)、感知拓展策略

吉尔福特认为,思维是朝着多种方向展开的,具有发散性。而这种发散性思维是创造力的关键要素^[21]。AIGC 通过大数据与算法形成的强大联想和拓展能力,可以刺激使用者的发散性思维,从而强化使用者的创意构思与传递能力。从视觉思维理论的视角来看,在知识的认知方面,可以借助 AIGC 工具通过视觉思维的刺激和视觉感知的丰富进行视觉冲击训练,例如教师可收集海量风格各异的 AIGC 生成设计作品,按主题分类,如未来科技风、复古蒸汽朋克风等,定期让大学生浏览、分析。组织限时“视觉速记”活动,要求学生快速捕捉作品关键视觉元素,随后复述,强化视觉感知敏锐度,激发大脑对新奇视觉形象的联想与创意转化。在知识的启发方面,可以借助 AIGC 强大的联想、拓展能力,结合视觉感知与交互等手段刺激大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当学生输入一个简单创意主题,AIGC 可以反馈出跨领域、多风格的关联内容,促使学生突破常规思路,提升思维的流畅性,尝试更多创意变通路径,催生独一无二的创意点子,强化创意能力。

丹尼斯·普罗菲特(Dennis Proffitt)与德雷克·贝尔(Drake Baer)在《感知力》中提到,我们的感知、思考、记忆等心智活动和身体的感知运动系统紧密相连,身体经验是认知过程的关键。因此,从具身认知理论视角来看,为了更好的训练与拓展大学生在创意表达过程中的认知与启发行为,可以通过 AIGC 工具进行多感官联动启发活动,鼓励学生运用 AIGC 产出的创意蓝本,拓展到多感官体验设计。例如,把 AIGC 生成的奇幻场景图,转化为一段音频描述,或是设计成有触感交互的实体模型,调动听觉、触觉等感官,打破视觉主导的惯性感知模式,全方位重塑认知感知体系,为创意萌发积累丰富素材。

(二)、语义深化策略

设计语义学鼓励受众对知识的多元意义解读与建构。为了丰富大学生在创意表达中的知识认知与启发,可以通过逆向思维诱导和跨界联想催化等不同维度对知识进行创新。借助 AIGC 工具给出常规设计思路下的创意成果,引导学生反其道而行之。例如 AIGC 生成一套色彩明亮、造型圆润的产品设计,要求学生构思色调暗沉、棱角分明的反向设计,打破思维惯性,挖掘逆向思考中的创意潜力,培养从不同视角审视设计问题的能力。以及结合发散性思维进行跨界联想,借助 AIGC 整合多领域知识的优势,设定跨界主题创作任务。如将生物学细胞结构与建筑空间设计关联,让学生借助 AIGC 搜索相关知识、生成初步创意概念,跨越学科边界,促使大脑建立新的思维连接,催生新颖独特的创意构思。

再者,例如 AIGC 生成的传统节日海报设计,不再是简单堆砌节日元素。它可能会把春节元素置于未来都市的霓虹灯下,用科技感的线条勾勒福字,这种新奇组合挑战了学生对传统节日表意的常规认知。大学生通过研究这类设计,有利于思考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冲击下的新诠释,挖掘出诸如“传统与现代共融共生”“古老习俗在新场景中的焕新可能”等深层意义,进而可以在自己的创意作品里尝试融入这类突破常规的语义关联,使设计承载更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更契合当代受众多元的审美期待,为创意表达赋予了别具一格的魅力与深度,让作品从千篇一律的套路中脱颖而出,真正做到以意动人。

(三)、观念重塑策略

新的设计生产工具必然会对现有的设计流程、设计伦理带来冲击。设计伦理学强调,设计活动既要兼顾技术可行性,亦需承担相应社会责任^[23]。AIGC 作为新型设计工具,其生成内容中潜藏的伦理争议与文化误读,为大学生设计观念的重塑提供了鲜活素材。通过引导学生对这些争议性内容进行深度剖析,可推动其从被动接受既有观念转向主动建构兼具社会意识与文化自觉的设计观。从伦理思辨引导维度而言,AIGC 生成的设计内容常显现技术应用与伦理约束之间的矛盾。在设计教育中,针对具有伦理争议的 AIGC 设计案例——例如,针对 AIGC 生成的“AI 换脸”广告设计,可以通过辩论会、学术研讨、课程实践应用

等方式进行思辨分析,使学生直观认识到设计伦理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贯穿设计全流程的实操准则,促使其将“社会责任感”从口号转化为具体设计逻辑,引导学生将创意从单纯追求新奇转向兼顾社会与环境责任。此外,在文化自觉培育层面,AIGC对多元文化元素的拼贴特性,既可能丰富视觉感知、催生创新表达,但也可能导致文化符号的浅表化挪用。因此在应用AIGC工具进行创意表达的过程中,设计教育者需要重视过程中的文化意识唤醒,引导学生思考这种“符号挪用”现象,在此基础上追溯文化根源,理解文化内涵在设计中的表意与转译,重塑对设计中文化表达本质的理解,并逐步探索契合出人机协作的创作观念与模式。

四、结论

AIGC技术的出现降低了创作门槛、提升效率、拓展创作可能性,为人们寻求灵感和创意提供条件。但作为学习者与技术应用者,AIGC带来的学生主体性消解和“路径依赖”问题也不可忽视^[9]。虽然AIGC创作工具可以在人机协同下实现一定程度的设计创作,但其本质是工具,其内容生成机制本质上仍是来源于现有智慧而非全新知识,因此会出现艺术内容同质化等相关问题^[24]。创意的构思与传递的主体仍应聚焦于学生本身,而不是沉溺于技术给出的答案。技术是中立的双刃剑,从知识的认知到设计内涵的丰富,再到突破常规情境的创意凝练与表达,文章尝试从设计思维视角,运用视觉思维理论、设计语义学与思辨设计理论对AIGC影响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进行分析。当然,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如何用好AIGC工具,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在使用AIGC工具过程中的知识创新与创意传递,提升大学生创意表达能力的同时也提高大学生数字素养。

总体上,文章旨在厘清设计思维视角下AIGC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既探索其积极作用,也点明潜在风险。未来高校在设计美育中宜因势利导,嵌入AIGC教学模块,培育学生批判性运用能力,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创意表达能力,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质量。后续研究可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对本研究中提出的认知启发模型与机制进行验证,从而聚焦精准干预策略细化,进一步推动设计教育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楚小庆. 技术与艺术形态嬗变的关系研究[D]. 东南大学, 2018.
- [2] 王文杰, 王争耀. AIGC时代艺术普及和公众参与路径分析[J]. 晋阳学刊, 2024, (06): 118-125.
- [3] 郭全中, 张金熠. AI+人文: AIGC的发展与趋势[J]. 新闻爱好者, 2023, (03): 8-14.
- [4] 吕金阳, 黄剑波, 罗帆, 等. 程式化下的创新: AIGC人机合作式环境空间创意设计表达[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4, 31(04): 126-131.
- [5] K. Dorst and N. Cross, 'Creativity in the design process: co-evolution of problem-solution', *Design Studies*, vol. 22, no. 5, pp. 425-437, Sep. 2001.
- [6] Y. Hu, Z. Ren, X. Du, L. Lan, W. Yu, and S. Yang, 'The shifting patterns based on six thinking ha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sign creativity',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vol. 42, p. 100946, Dec. 2021.
- [7] X. Li, J. Chen, and H. Fu, 'The roles of empathy and motivation in creativity in design thinking', *Int J Technol Des Educ*, vol. 34, no. 4, pp. 1305-1324, Sep. 2024.
- [8] 胡莹, 白一茗, 周子涵, 等. 设计思维的捕捉、认知与解读[J]. 装饰, 2022, (05): 78-83.
- [9] 吴一凡, 柯桢楠, 等. AIGC时代学生设计思维培养的挑战与应对[J]. 湖南包装, 2024, 39(02): 176-178, 209.
- [10] Y.-S. Chang and M.-C. Tsai, 'Effects of design thinking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Educational Studies*, vol. 50, no. 5, pp. 763-780, Sep. 2024.
- [11] '浅谈创造性设计思维与视觉设计的关联性_中国舞台美术学会'. Accessed: Feb. 19, 2025. [Online]. Available: <https://www.cisd.org.cn/html/32/201509/6459.html>
- [12] 汪振城. 视觉思维中的意象及其功能——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理论解读[J]. 学术论坛, 2005, (02): 129-133.

- [13] H. Yin, Z. Zhang, and Y. Liu, 'The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the Midjourne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Tool into Design Systems to Direct Designers towards Future-Oriented Innovation', *Systems*, vol. 11, no. 12, Art. no. 12, Dec. 2023.
- [14] H. Lin, X. Jiang, X. Deng, Z. Bian, C. Fang, and Y. Zhu, 'Comparing AIGC and traditional idea generation methods: Evaluating their impact on creativity in the product design ideation phase',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vol. 54, p. 101649, Dec. 2024.
- [15] Bent Sørensen, Torkild Thellefsen. Ferdinand de Saussure in Contemporary Semiotics[J].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2022, 8(1): 1-5.
- [16] 孙利,陈永亮,吴俭涛,等. 中国设计语义学造物意象解析[J]. *包装工程*, 2023, 44(14): 32-40, 14.
- [17] J. Rao and M. Xiong, 'A New Art Design Method Based on AIGC: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eation Efficiency', in *2023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Design (ICID)*, Oct. 2023, pp. 129–134.
- [18] 宋玉, 钱晓松, 彭凌钰, 叶紫寒, and 覃京燕,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AIGC Chinese Aesthetic', *包装工程*, vol. 44, no. 24, pp. 1–8, 33, 2023.
- [19] DUNNE, ANTHONY, RABY, et al. *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M]: The Mit Press, 2013.
- [20] 张黎. 从激进到思辨:设计如何催化社会梦想[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7, (04): 14-19, 187.
- [21] Guilford, J.P..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M]: McGraw-hill, 1967.
- [22] 吴航行. AIGC 时代的认知破圈与媒介生态重构[J]. *中国出版*, 2024(13):69.
- [23] 于雪,李伦.人工智能的设计伦理探析[J].*科学与社会*,2020,10(02):75-88.
- [24] 夏德元. 相由心生: AIGC 时代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新景观——由文生视频 AI 模型 Sora 引发的思考[J]. *文化艺术研究*, 2024, (01): 24-31, 112.

An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Inspirational Mechanism of AIGC Design-Driven Creative Ex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Ouyang Lan ¹

¹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impact of AIGC on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e expression from the level of design thinking,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cognitive inspirational mechanism involved.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IGC technology, college students are deeply integrating it into their creative practice and expression.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fined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within this specific group and disciplinary scope. By integrating principles from design theory and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IGC tools reshape college students' design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creative expression.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optimiz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design aesthetic education by virtu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Keywords: AIGC; college students; design; creative expression; cognitive inspirational mechanism

钢琴演奏中肢体语言与艺术表达关系研究

袁小龙^{1*}全涛¹

(1.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 但肢体语言的运用同样十分重要。在钢琴演奏中合理运用肢体语言可以帮助演奏者更好的进行艺术表达, 然而对于肢体语言与作品艺术表达之间深层次的关系大多数演奏者都缺少思考, 例如肢体语言的结构与艺术表达的结构, 以及肢体语言如何由具体转化为抽象的艺术表达等问题。因此, 本文通过分析钢琴演奏中肢体语言与艺术表达的结构, 并结合具体作品, 深入探讨肢体语言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肢体语言; 艺术表达; 触键; 情感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97

一、引言

钢琴作品的艺术表达在情感传递、作品诠释与感染力增强中具有关键作用, 它既是演奏者技术与情感的融合, 也是作曲家与听众沟通的桥梁, 借助艺术表达钢琴作品能跨越时空触动人心、引发共鸣, 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钢琴演奏中实现更优艺术表达需重视肢体语言运用, 正确运用肢体语言不仅能有效解决技术难点, 还能助力演奏者深化艺术表达。当前多数演奏者对肢体语言的运用多为下意识行为, 对其与艺术表达的关系缺乏清晰认知, 因此本文将深入剖析肢体语言与艺术表达的结构, 结合具体作品展开分析, 全面探讨二者间的关系。

二、肢体语言与艺术表达的关系

(一) 肢体动作与肢体语言的定义

肢体动作通常指人体各部位单纯的运动, 侧重身体物理层面的活动, 可能处于无意识状态, 比如感到寒冷时不自觉的颤抖——这种颤抖只是身体基于生理反应的动作, 不一定带有明确表达意图, 或是人们走路时自然摆动双臂, 这类动作属于维持身体平衡的常规行为。同时肢体动作的组成往往零散且随意, 没有固定规则与系统, 不同人在相似情境下的动作可能存在差异, 比如同样表示思考, 有人可能托腮, 有人可能皱眉踱步, 这些动作不存在统一标准。介绍肢体语言需先明确语言的定义。从广义来看, 人类所有用于表情达意的形式都可称作语言, 像声音、表情、身势、眼神、行为、手势等常见表达方式均属于语言范畴。从符号学视角, 语言是由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符号系统, 能指是语言的物质形式, 比如语音、文字、肢体动作等, 所指则是这些物质形式对应的概念或意义, 以文字“苹果”为例, “苹果”二字的字形与读音是能指, 它们所代表的那种水果的概念就是所指。从沟通功能层面, 语言必须具备沟通作用, 能够在个体间、群体间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与情感。

肢体动作是肢体语言的基础, 其为人体各部位单纯的物理运动, 具有无意识、零散随意且无固定规则系统的特点, 而肢体语言是通过肢体动作表情达意、具备能指与所指特征并可实现群体沟通的语言, 它赋予肢体动作符号化意义, 使肢体动作从单纯生理活动升华为有明确交流功能的表达, 二者核心差异在于肢体动作不必然承载沟通意图, 而肢体语言以沟通为目的, 且在表现形式上肢体动作是低层级的身体活动, 肢体语言是对其的系统性组织与意义赋值, 属于高层级沟通方式。因此, 我们讨论肢体语言的作用时必须立足于肢体动作之上。

(二) 肢体语言的构成要素

作者简介: 袁小龙(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键盘器乐演奏;

全涛(2001—),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 袁小龙

1. 手部的动作

手部动作主要包含手指触键、手腕转动、手掌支撑三个方面。演奏者通过调整手指触键的力度与角度直接影响音色的柔和与刚劲，比如莫扎特《C大调奏鸣曲》需细腻触键表现优雅，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则需强有力按压传递磅礴情感；手腕的灵活转动或划圈动作能帮助音阶和琶音流畅衔接，肖邦练习曲中便通过手腕“划圆圈”完成长琶音的连贯演奏；手掌保持手指自然弯曲、指尖站立的稳定手型可确保触键精准，在快速跑动或复杂和声中尤其能维持演奏清晰度。

2. 上肢与肩部动作

上肢与肩部动作主要有手臂动作的幅度控制、肩部的放松与紧张调节、手臂的抬起与放下、手腕的摆动与转指配合、肩部与大臂的力量传递五个方面。在手臂动作的幅度方面，演奏者可在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中，采用柔和流畅的上肢动作，如手臂自然摆动，营造梦幻氛围；在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奏鸣曲》中，采用有力的上肢动作，如大臂挥动，展现刚毅与力量。在肩部的放松与紧张调节方面，当肩部放松时，可增强音乐的流动性；肩部收紧时，可传递力量感，支撑音乐中的英雄气概。在手臂的抬起与放下方面，休止符或乐句结束时，手臂的抬起动作，如缓慢抬手，可制造呼吸感；快速放下动作则可用于强调整节奏重音。在手腕的摆动与转指配合方面，演奏者可在震音的演奏中，将手腕左右小幅摆动以此来保持音色的均匀；在琶音演奏中，手腕可随音阶方向划圈移动，辅助手指转指。在肩部与大臂的力量传递方面，当演奏强力和弦时，演奏者可以肩部作为支点，通过大臂带动小臂将力量传递至指尖，确保音色的饱满。

3. 头部动作与面部表情

首先在头部动作方面，主要包含低垂或抬起、左右偏移、自然摇摆三种形式。演奏静谧或忧郁段落时，如贝多芬《月光奏鸣曲》，头部低垂或抬起可营造沉静氛围；演奏激昂部分时，如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头部抬起能展现坚定感；左右偏移可用于表现双手旋律的对话，如海顿奏鸣曲中头部会随声部转移而变动；自然摇摆则是随音乐节奏轻微晃动，能增强律动感，如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的梦幻段落中便可采用这种动作。面部表情主要包含眼神变化、眉毛动作、嘴角动态三个方面。柔和的眼神能传达宁静情绪，坚定的眼神可表现力量；挑动眉毛体现疑问或紧张，舒展眉头传递放松或释然；嘴角上扬表达喜悦，嘴角下垂则暗示悲伤。

（三）艺术表达与情感表达的关系

1. 艺术表达与情感表达的定义

艺术表达借助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影视等各类艺术形式传达思想、情感、观念或审美体验，作为综合性创造活动，它涵盖形式、技巧、风格等多个维度，例如画家通过色彩、线条、构图等元素表达对世界的理解与感受，音乐家则利用旋律、节奏、和声传递情感与意境。在钢琴演奏领域，演奏者以肢体语言为载体，将内心情感外化为可聆听的音乐与可观察的动作，进而实现传递作曲家创作意愿、展现演奏者个人风格、与观众达成情感共鸣三方面作用。情感表达是个体把喜悦、悲伤等内在情绪通过生理反应、行为动作、语言符号或艺术形式转化为可感知信号的过程，既是本能的心理宣泄途径，也是社会互动中传递情感、建立联结的方式，核心在于依靠具象符号实现情绪共享，且这一过程同时具备生物本能与文化规训双重特征。心理学中的“情绪感染”理论揭示了表达与接收之间的双向共鸣关系，典型案例包括母亲对婴儿啼哭的即时回应、观众为戏剧角色命运落泪等。从日常场景中孩子跌倒后的哭泣、恋人借礼物传递心意，到艺术领域里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借旋律抒发深沉情感、李清照宋词用叠字营造哀婉意境，情感表达既会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本能反应调节个体心理状态，也能借助诗歌、音乐等符号系统构建跨时空的情感联结，最终成为生物本能与文化意义相互交织的人类基本生存方式。

2. 二者的关系

首先，二者的根基相同，情感表达是我们天生的本能，比如难过时哭、开心时笑，或是跟人吵架时的愤怒；艺术表达的“根”也是这些真实感受，只是艺术家会把这些情绪用画画、唱歌、写诗等方式“包装”起来，比如梵高把对星空的激动画成旋转的《星月夜》，而不是单纯大喊大叫。其次，情感表达更直接，像孩子摔了一跤马上哭出来；艺术表达则需要琢磨形式，比如诗人用“红豆生南国”这样押韵又含蓄的句子说“我想你”，比直接说“我喜

欢你”多了点美感和讲究。最后，一方面，没有喜怒哀乐，艺术家也没法创作；另一方面，艺术会“教”我们怎么更巧妙地表达感情，比如古人写“海内存知己”来告别朋友，后来大家送别时就知道可以用诗句代替直白的“舍不得”。简单说，情感是表达的“原材料”，艺术是把这些材料做成能让很多人产生共鸣的作品，两者始终紧紧围绕着人如何说出心里的感受打转。

（四）艺术表达与肢体语言转化

1. 转化的机制

演奏者的肢体语言辅助艺术表达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听觉传递情感。当演奏者想要通过音乐来表达某种情绪这种抽象的概念时，可以通过具体分析需要表达的情绪，进而翻译到音乐中客观存在的因素比如速度、力度、音色等，比如当快速通常传达积极、兴奋、欢快或紧张的情绪，而慢速往往与悲伤、宁静、抒情或庄重的情绪相关联。强音可以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力量或激情，而弱音常用来营造温柔、细腻、神秘或沉思的情绪。明亮的音色一般会带来欢快、愉悦、积极向上的情绪感受，而暗沉的音色则更多地与悲伤、忧郁、沉重的情绪相联系等等。进而通过肢体动作的运用，达到所需要的音乐的因素，进而表达出某种情绪。二是通过视觉传递情感，演奏者通过运用肢体语言可以带给自己和观众心理暗示，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变化。

2. g 小调前奏曲中肢体语言与艺术表达之间相互转换

《g 小调前奏曲》由拉赫玛尼诺夫创作于 1901 年，这部作品不仅融入了他对社会现状不满，其蕴含着对黑暗现实的反抗精神以及压抑情绪，同时也包含了他对过往挫折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期望。这种复杂的感情，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戏剧性冲突与悲情色彩，具有浓厚的俄罗斯民族特色。因此，本文选取了叶甫格尼·基辛，这位极具代表性的俄国钢琴演奏家的演奏视频进行分析，观察钢琴家在演奏过程中为了进行艺术表达，如何运用肢体语言。

在作品首部开始时，钢琴家选择将上半身前倾，这样做可以通过控制手臂挥动幅度，控制整体音量，同时钢琴家的面部眉头紧锁，这样可以给观众以及钢琴家带来心里上的暗示，配合上音符共同营造出压抑、低沉的氛围。当作品进行到第 17 小节时，开始出现密集的八度和弦，这里音乐情绪由之前的压抑转变为激昂，充满抗争精神，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在演奏这一部分时，音色要由暗沉转为明亮，力度要加强。因此在肢体语言方面钢琴家选择将身体由之前的前倾，变为挺直，同时身体跟随音乐有节奏的进行晃动。手臂挥动幅度增加，通过大臂力量的运用，增强整体音量，同时挥动也有助于缓解因弹奏快速且强劲的八度和弦时肌肉产生的紧张。在手指方面，保持了手指一关节直立，手掌呈现拱形，这样做的可以使力量更加通畅的由背部传递到键盘。在进行到作品中部时，音乐情绪由激昂转变为深沉内敛，音乐的织体也由密集的八度和弦，转变为左手快速的琶音，右手较为松散的八度和弦。为了表达这个效果，在演奏这一部分时，音色要变得柔和，速度要降低，力度要减弱。因此在肢体语言方面钢琴家选择将上半身晃动的频率减少，但幅度变的更大。频率减少，也就是速度减慢，这样有助于身体力量传递时触键速度放缓，同时配合上更大的幅度，可以帮助力量更通畅的传递到键盘，二者相结合，使这一段的音色柔和，不躁动，契合中部的音乐情绪。在手臂方面，钢琴家选择保持平稳，控制着手臂使用幅度。在手指方面，可以明显看出钢琴家手掌由首部的拱形转变为平铺在键盘上，触键也由指尖触键，转变为指腹触键。手臂与手指肢体动作的转变可以使力量均匀分散，进而使音色更加柔和，帮助旋律线条更具有歌唱性，辅助音乐情绪的表达。面部表情方面，钢琴家表情变得柔和，配合忧郁的旋律，共同营造出悲伤的氛围。在作品再现部时，音乐的织体转变为大量密集的八度和弦，音乐情绪相比首部更加激昂，展现出强烈的情感宣泄，仿佛是在呐喊，在宣泄对命运，对社会的不满。为了表现相比首部更加强烈的情绪，需要由中部柔和的音色转变为明亮的音色，力度由中部的弱转变为强，速度由慢到快。因此在肢体语言方面，钢琴家选择加大了动作的频率与幅度。在身体晃动频率方面，可以看出，明显相较于首部有所加快。在手臂方面，挥动幅度也有所增加。在手指方面，和首部相同，一关节保持直立，手掌呈拱形。这一部分的肢体语言和首部相比，加大了动作的频率与幅度，以此来适应相较于首部更为强烈的情绪。在面部表情方面，钢琴家们眉头紧锁，神情凝重，配合紧张的旋律，将作曲家对社会的不满以及自身遭受的不公的情绪尽情宣泄。

通过基辛的演奏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肢体语言在转化为艺术表达时都是经过复杂的转化机制的，演奏者只有明确了这些，才能得心应手的运用我们的身体，表达音乐的情感。

三、结语

舞台上钢琴家指尖流淌的旋律触动人心，聚光灯下每一次抬手落键都仿佛与音乐共生令观众陶醉，而这光彩背后是无数个夜晚对每个乐句的精心雕琢以及对着镜子单调练习手型和力度掌控，这种“严酷”的打磨是表演的基础。合理的肢体语言是让这种打磨更加出彩的关键，它并非刻意的身体表演而是音乐情感的自然流露，抒情段落手臂的轻柔起伏能让音色更温暖，激情乐章稳定的姿态能传递力量感。只是模仿他人动作却不理解肢体语言与艺术表达间的深层联系，表演会显得生硬做作破坏音乐的连贯性。只有深刻理解这种关系，知晓哪些身体状态与音乐情绪相契合、哪些动作幅度有助于展现音色，肢体语言才能真正成为艺术表达的助力，让每一次登台都既“光彩照人”又“温润如玉”。本文希望为钢琴道路上的演奏者提供一些参考，帮助他们更好地演奏。

参考文献:

- [1] 何佳琦.钢琴演奏中的肢体语言与情感传达探索[J].音乐教育与创作,2025,(02):100-103.
- [2] 王僖潮,卜莉.指尖舞动音你而生——肢体语言在钢琴表演艺术中的魅力探微[J].当代音乐,2024,(11):146-148.
- [3] 杨毅,王君.肢体语言在钢琴演奏表现力中的实践研究[J].乐器,2022,(09):54-57.
- [4] 李青航.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前奏曲》悲剧性色彩探析及情感表达[D].信阳师范大学,2024.DOI:10.27435/d.cnki.gxsfc.2024.000386.
- [5] 王湘琦.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钢琴前奏曲》中的情感识别与表现探究[J].乐器,2025,(04):30-33.
- [6] 段雨欣,王迎馨.钢琴作品《拉赫玛尼诺夫g小调前奏曲 Op.23, No.5》演奏分析[J].黄河之声,2025,(05):176-179.DOI:10.19340/j.cnki.hhzs.2025.05.044.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anguag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in Piano Performance

Yuan Xiaolong^{1*}, Quan Tao¹

¹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0, China

Abstract: Music is an auditory art, yet the use of body language is equally crucial.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body language in piano performance enables performers to achieve better artistic expression. While most performers instinctively employ body language, there is a lack of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profound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anguage and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musical works—for inst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of body language and that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how body language is transformed from concrete movements into abstract artistic express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languag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by analyzing their respective structures in piano performance and incorporating specific musical works as case studies.

Keywords: Body Language; Artistic Expression; Key Touch; Emotion

多民族艺术交融的共同体叙事实践 ——以《刘海砍樵》音乐与服饰的文化互鉴为例

全涛^{1*} 袁小龙¹

(1.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刘海砍樵》作为湖南花鼓戏的经典剧目,其音乐与服饰设计中蕴含着丰富的多民族文化基因。本文通过音乐形态学分析与服饰符号学阐释,揭示该剧在汉族戏曲传统基础上对苗族、土家族、侗族艺术元素的创造性转化路径。研究表明:在音乐层面,通过曲式结构的跨民族调式融合、节奏型态的山地文化转译及乐器配置的象征性重构,实现了听觉维度的文化认同;在服饰层面,以图腾符号的视觉整合、色彩美学的族群对话及服饰功能的仪式化再造,形塑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审美意象。这一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艺术互鉴-情感共鸣-价值共生”的可行范式。

关键词:艺术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刘海砍樵》;音乐人类学;服饰符号学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94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日益频繁,多民族艺术的交融创新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实践路径。文化作为民族的灵魂,艺术则是文化的生动表达形式。各民族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内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艺术宝库。

《刘海砍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着百年的历史流变。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从最初的民间故事逐渐发展成为湖南花鼓戏的经典剧目,其背后实际上是汉族与湘西少数民族艺术元素持续且动态的融合历程。该剧以其独特的魅力,不仅在民间广泛流传,更成为了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生动见证。

本研究聚焦于《刘海砍樵》经典版本中的音乐与服饰设计,深入剖析其中蕴含的多民族文化元素及其交融机制。通过这样的研究,一方面能够为新时代民族艺术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参照,助力民族艺术在当代社会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实践经验。

(二) 文献综述

既有关于《刘海砍樵》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大多数研究集中在花鼓戏的本体特征分析上,骆书蓄²在 2022 年的研究中,详细探讨了花鼓戏的唱腔、表演形式等方面的特点,但未能深入挖掘其中

作者简介:全涛(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袁小龙(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键盘器乐演奏。

通讯作者:全涛

² 骆书蓄:《长沙花鼓戏的艺术特色与发展探析——以〈刘海砍樵〉为例》,《时代报告(奔流)》2022年第6期,第31页。

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现象。还有部分研究单维度地探讨少数民族艺术元素，张佳硕³在 2018 年的研究中，仅关注了某一少数民族艺术元素在特定艺术形式中的体现，缺乏对不同民族艺术元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机制的系统性研究。

为了突破这些局限，本文引入文化共生理论（费孝通，1988）⁴与符号互动论（Mead, 1934）⁵，构建起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文化共生理论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为理解多民族艺术交融提供了宏观的理论视角。而符号互动论则关注符号在社会互动中的作用，有助于深入剖析音乐与服饰中蕴含的文化符号及其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建构。通过这两个理论的结合，能够从多个维度对《刘海砍樵》中的多民族艺术交融现象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田野调查法是本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湘西地区《刘海砍樵》传承群体进行深度访谈，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传承人的亲身经历、对剧目的理解与感悟、传承过程中的故事等，为深入了解《刘海砍樵》在当地的传承与发展情况，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多民族文化元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形态分析法在音乐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运用 Music2 工具对《刘海砍樵》的核心唱段进行音程与节奏量化分析，能够精确地揭示音乐中的结构特征与变化规律。通过这种量化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民族音乐元素在音程、节奏等方面的融合与创新，为音乐层面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符号学阐释则用于对服饰设计的研究。基于 Peirce 三分法解析服饰设计中的跨文化符号系统，从符号的形式、意义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深入挖掘服饰中所蕴含的多民族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揭示服饰在多民族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通过服饰符号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审美意象。

二、音乐交融：声景建构中的文化共生

（一）调式系统的跨民族对话

在《刘海砍樵》中，“比古调”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唱段，其调式系统充分体现了跨民族对话的特点。从音列构成来看，“比古调”的骨干音列（sol - la - do - re）保留了汉族五声徵调式的典型特征（见图 1）。五声徵调式在汉族音乐中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强调徵音（sol）的中心地位，给人以明亮、稳定的听觉感受。例如在传统的汉族民歌《茉莉花》中，也能明显感受到五声徵调式带来的这种明亮、稳定的风格。



图 1 “比古调”骨干音列在五声徵调式中的示例谱例

然而，“比古调”又不仅仅局限于汉族调式。通过对其特性音程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小三度+大二度的音程组合，与苗族飞歌的羽调式基因存在着暗合之处。苗族飞歌以其高亢、嘹亮的风格而闻名，羽调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苗族飞歌《歌唱美丽的家乡》，就是典型的羽调式歌曲，其旋律中频繁出现的小三度+大二度音程组合，与“比古调”中的这一音程组合有着相似的听觉效果（见图 2）。这种“双调性潜结构”的存在，使得“比古调”在同一旋律中融合了汉族与苗族的音乐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文化间性音响。

3 张佳硕：《初探地方民族民间音乐的分解与重铸——以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为例》，《北方音乐》2018 年第 20 期，第 50 页。

4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4 期，第 1 页。

5 George Herbert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图 5 侗族芦笙在新版《刘海砍樵》中演奏



图 6 服饰袖口“螺旋纹”

苗族木叶则以其独特的滑音技巧而闻名。在新版编排中，木叶的滑音技巧模拟了汉族戏曲的“擞音”技法。这种模拟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融合。通过这种融合，木叶的演奏既保留了苗族音乐的特色，又与汉族戏曲音乐相契合，实现了多民族器乐语言的相互对话。例如在一些苗族民间音乐表演中，木叶常常被用来模仿自然界的聲音，而在《刘海砍樵》中，它与汉族戏曲元素的结合，展现出了全新的音乐魅力。

这种乐器配置的象征性互嵌，使得不同民族的音乐元素在同一舞台上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观众在欣赏音乐时，能够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加深了对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理解与感受。

三、服饰交融：视觉符号的共同体书写

（一）图腾符号的跨文化整合

在《刘海砍樵》⁶中，胡秀英的服饰设计堪称图腾符号跨文化整合的典范（见图 6）。袖口的“螺旋纹”源自苗族“蝴蝶妈妈”创世神话。在苗族文化中，“蝴蝶妈妈”被视为万物的始祖，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螺旋纹”作为“蝴蝶妈妈”的象征符号，蕴含着苗族人民对生命起源和繁衍的崇敬与信仰。在苗族的刺绣、银饰等传统手工艺品中，常常能看到“螺旋纹”的身影，它是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裙摆的“云气纹”则化用了土家族西兰卡普织锦图案。西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的织锦艺术，其图案丰富多样，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云气纹”在土家族文化中常常与自然崇拜相关联，代表着吉祥、如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土家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会将带有“云气纹”的西兰卡普用于装饰房屋、制作服饰等，表达对生活的美好期许。

将这两种来自不同族群的图腾符号并置在胡秀英的服饰上，形成了“多元共生”的视觉隐喻。这种视觉隐喻不仅展示了苗族与土家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还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包容。观众在欣赏剧目时，通过服饰上的图腾符号，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进而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丰富内涵。

（二）色彩系统的族群对话

刘海的服饰配色同样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体现了色彩系统的族群对话。其采用“青色短衫+朱红腰带”的配色方案，其中青色对应汉族五行中的“木德”理念。在汉族传统文化中，五行学说与色彩观念紧密相连，青色代表着生机、成长与希望，与木的属性相契合。在汉族的传统绘画、建筑装饰等方面，青色常常被用来营造清新、自然的氛围。

朱红则呼应了侗族“萨岁崇拜”中的生命象征。在侗族文化中，“萨岁”是至高无上的祖母神，代表着生命的起源与延续。朱红色在侗族的祭祀、庆典等活动中广泛使用，被视为吉祥、幸福和生命的象征。例如在侗族的鼓楼建筑中，常常能看到朱红色的装饰，彰显着其神圣与庄重。

这种色彩政治学实践，打破了传统戏曲服饰以汉族为中心的色彩观念。它通过将不同民族的色彩文化进行融合，使服饰不仅具有审美价值，更成为了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载体。观众在欣赏刘海的服饰时，能够从色彩中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意义，从而促进了跨民族的文化理解与认同。

（三）服饰功能的仪式化再造

6 杨正文：《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第 15 页。

在当代文化艺术的绚丽舞台上，张家界《天门狐仙》⁷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绽放着独特的光芒，而其中狐仙头饰的精妙设计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服饰功能仪式化再造的魅力，成为这一领域的典型范例（见图10）。

《天门狐仙》作为一部依托张家界天门山奇美壮丽自然风光打造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将当地流传久远的人狐相恋传说搬上舞台，编织成了一场如梦如幻、动人心弦的视听传奇。它宛如一个文化的熔炉，巧妙地融合了张家界本土的民俗风情、神秘古老的民间传说以及多种精湛的艺术表演形式，在夜幕笼罩下的天门山下，为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开启一扇通往奇幻世界的大门，带来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化盛宴。深入探究《天门狐仙》中的狐仙头饰，那别具一格的“银角”造型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渊源。其源头可追溯至苗族丰富多彩的文化长河之中，苗族银饰在苗族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与社会生活架构里，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绝非仅仅是用于妆点外貌、满足视觉美感的普通饰品，从精神信仰与文化遗产的深度层面来看，实则承载着强大的巫术功能，是苗族人民心目中连接尘世与神灵世界的中介。

苗族银角造型往往高大巍峨、设计繁复华丽，那精美的雕纹、闪耀的银饰部件，无一不是苗族手艺人世代传承技艺的结晶，更凝聚着苗族人民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之心与虔诚崇拜之情。每逢苗族盛大的传统节日，诸如热闹非凡、持续多日的苗年庆典，或是全村老少心怀敬畏齐聚一堂举行庄重祭祀仪式之时，苗族妇女们定会身着绣工精湛、满是民族图案寓意的传统服饰，庄重而又自豪地将银角头饰佩戴于头顶。那一刻，她们仿若从古老传说中走来的神女，周身散发一种庄重而神秘的超凡气质，银角在皎洁月光或是熊熊篝火的映照下，反射出清冷而神圣的光辉，与她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相互映衬，共同演绎着苗族文化中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仪式，诉说着先辈们口口相传的传奇故事。

四、实践启示：从艺术交融到共同体意识升华

（一）创作机制的创新路径

基于对《刘海砍樵》的研究，提出“三阶融合模型”，为多民族艺术创作提供创新路径。

第一阶段是符号提取。建立多民族艺术基因库是关键步骤，例如构建湘西民族音乐动机数据库。通过对湘西地区各民族音乐元素的收集、整理与分析，提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动机、节奏型、调式等元素，为后续的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这些符号是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们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情感与价值观。可以深入湘西的各个村落，收集民间艺人演唱的歌曲、演奏的乐曲，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数字化保存和分类整理，形成一个系统的音乐动机数据库。

第二阶段是语境重构。运用“陌生化”手法实现传统符号的现代表达。在创作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照搬传统符号，而是要将其置于新的文化语境中，通过改变符号的组合方式、表现形式等，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例如在《刘海砍樵》中，将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艺术元素与汉族戏曲相结合，创造出了全新的艺术形象与文化内涵。可以利用现代舞台技术，如多媒体投影、虚拟现实等，为传统戏曲表演营造出新颖的舞台场景，让观众在熟悉的故事中感受到全新的视觉体验。

第三阶段是情感共鸣。通过参与式创作强化跨文化体验。鼓励不同民族的艺术家的参与，让观众共同参与到艺术创作中来，让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分享自己的文化经验与情感体验。例如，可以开展社区艺术活动，邀请当地居民参与戏曲排练、表演等，让他们亲身感受多民族艺术交融的魅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增强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实现从艺术交融到情感共鸣的升华。

（二）传播策略的优化建议

为了更好地传播多民族艺术交融的成果，提出以下传播策略优化建议。开发《刘海砍樵》AR戏服体验App是一种创新的传播方式。通过这个App，用户可以自行组合多民族服饰元素，虚拟试穿不同风格的戏服。这种互动式的体验能够让用户更加深入地了解多民族服饰文化的特点与魅力，增强他们对多民族艺术的兴趣。同时，App还可以配备相关的文化介绍、音频视频等资料，让用户在体验的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的文化知识。当用户选择胡秀英的服饰进行虚拟试穿时，App可以弹出关于袖口“螺旋纹”和裙摆“云气纹”的文化解读，以及相关的音乐片段，让用户全方位感受多民族文化的魅力。

创设“山地艺术节”也是一个有效的传播策略。邀请汉、苗、土家等各民族艺人同台演绎经典剧目，如《刘海砍樵》，能够为观众呈现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在艺术节上，可以设置各种艺术展览、文化讲座、互动体验等活动，全方位展示多民族艺术的魅力。这种集中式的文化展示与交流互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多民族艺术，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五、结语

《刘海砍樵》历经百年演变，有力证明多民族艺术交融并非简单元素堆砌，而是深度重组创新，达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审美境界。该剧在音乐、服饰领域融合多民族艺术元素，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审美意象，实现视听双重文化认同。

从音乐的调式融合、节奏转译、乐器重构，到服饰的符号整合、色彩对话、功能再造，《刘海砍樵》为多民

7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实景演出，张家界魅力湘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2009，服饰设计说明第12页。

族艺术交融提供生动范例。其核心价值在于构建“差异中见统一”的文化认同机制，各民族文化独特性得以彰显，又在交流融合中走向更高层次的统一，凝聚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向心力。

这一成功范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式。在新时代，深入挖掘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多民族艺术深度交融创新，能为培育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应借鉴《刘海砍樵》经验，创作传播更多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艺术作品，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艺术滋养下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4):1-19.
- [2] 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3] 骆书蕾. 长沙花鼓戏的艺术特色与发展探析——以《刘海砍樵》为例 [J]. 时代报告 (奔流), 2022, (06):31-33.
- [4] 张佳硕. 初探地方民族民间音乐的分解与重铸——以音乐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为例 [J]. 北方音乐, 2018, 38(20):50+52.
- [5] 《歌唱美丽的家乡》(苗族飞歌) [Z]. 贵州苗族民歌, 吉聿制谱, 1950s.
- [6] 《锦鸡出山》(土家族打溜子) [Z]. 湘西土家族传统打击乐, 1953 年整理版.
- [7] 湖南省花鼓戏剧院. 新版《刘海砍樵》器乐编排方案 [Z]. 内部演出资料, 2016.
- [8] 李海萌, 陈燕华. 《天门狐仙》: 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J]. 艺术评论, 2025 (5):45-52.
- [9] 沈从文.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M]. 商务印书馆, 1981.
- [10] 杨正文. 苗族服饰: 符号与象征 [M].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 [11] 常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刘海砍樵传说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Z]. 申报文本, 2006.
- [12] 何治国. 我的父亲何冬保与《刘海砍樵》 [J]. 湖南文史, 2012 (3):62-65.
- [13] 中国社会科学网. 新时代传统文化在民间交流中的保护与发扬 [EB/OL]. (2024-07-24)[2025-05-29].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7/t20240724_5766639.shtml
- [14] 《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实景演出 [Z]. 张家界魅力湘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2009.

The Narrative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Ethnic Arts

— 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in the Music and Costumes of Liu

Hai Kanc Qiao

Quan Tao^{1*}, Yuan Xiaolong¹

¹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0,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 repertoire of Hunan Flower Drum Opera, Liu Hai Kanc Qiao contains rich multi-ethnic cultural genes in its music and costume design. By means of music morphology analysis and costume semiotics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ths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pera, which,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Han opera, absorbs artistic elements from the Miao, Tujia and Dong ethnic groups. Research shows that: at the music level,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auditory dimension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cross-ethnic mode integration in musical form structure, mountain culture transl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and symbolic reconstruction of instrument configuration; at the costume level, the aesthetic image of the "pluralistic unity"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has been shaped via visual integration of totem symbols, ethnic dialogue in color aesthetics, and ritualized reconstruction of costume functions. This practice provides a feasible paradigm of "artistic mutual learning - emotional resonance - value symbiosis"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words: Artistic integration;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Liu Hai Kanc Qiao; Music anthropology; Costume semiotics

“互联网+”赋能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承研究 ——打造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品牌

刘磊¹ 易秀华^{1*}

(1.湖北师范大学, 湖北 黄石 435000)

摘要: 红色音乐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的艺术载体, 深刻蕴含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音乐文化是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传承的背景下, 如何有效推动红色音乐的当代传播成为重要课题。本文以大别山红色音乐为例, 基于“互联网+”跨界融合、创新驱动等特征, 探讨其与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的深度融合路径。通过数字化处理, 旨在突破红色音乐与现代社会的脱节困境, 增强传播的针对性与感染力, 从而强化集体记忆、助力党史教育, 进一步推动红色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价值升华。

关键词: 红色音乐; 互联网+; 文化传播; 大别山

基金项目: 湖北师范大学首届网络文化节立项项目《“互联网+”赋能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承研究——打造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品牌》(编号 05)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3

一、“互联网+”赋能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传承的意义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域, 这里有着辉煌璀璨的文化和光荣悠久的历史,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在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播方面, 传播模式仍是以传统传播方式为主, 报纸、电视占据主要成分, 辅以少量的网络传播。从大别山红色文化的传播分发模式来看, 大部分传统媒介使用线性传播的方式进行信息的处理, 多以单向传播模式为主。居于此, 大别山红色文化与互联网的结合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实践结合的新形态, 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开放生态的特征。本文中, 将互联网与大别山红色音乐相结合, 不仅可以增强大别山红色音乐的传唱度, 解决红色歌曲脱离现实生活的问题, 同时可以传承保护大别山精神, 增强大别山歌曲背后的革命故事的大众化传播的力度。“大别山精神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宝贵财富, 与互联网相结合可以将这份财富具象化, 增强了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人对大别山精神的认识, 同时赋予了大别山精神的新时代的现实意义。”^[2]通过本项目的研究, 可以为国内各个地区的红色文化特别是红色音乐提供可供选择的传承路径, 红色音乐是红色文化的承载者, 应该重视对于红色音乐的传承保护。

二、“互联网+”赋能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传承策略

(一) 实现多元传播

1. 图文类

利用互联网图文类传播方式(如图文帖子、信息长图、漫画、PP 式解读等)在当今的信息环境中具有极其显著的优势。就受众读者而言图文类信息更高效易读, 体验更佳, 图文类信息降低理解门槛, 易于消化, 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碎片化的阅读习惯。人们可以在通勤、休息的几分钟内快速浏览完一篇图文内容, 获取有价值的信

作者简介: 刘磊(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易秀华(1980—),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

通讯作者: 易秀华

息，而不需要像阅读长文那样投入大量连续时间。提升了碎片化友好度。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互联网时代，精美的排版、协调的配色、高质量图片更加能从海量信息中吸引眼球，留住读者。图文类信息还有跨平台适配性强的优势。图文内容几乎适用于所有主流社交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小红书、微博、知乎、头条号、Facebook、Instagram等），只需稍作尺寸调整，即可进行多平台分发，扩大影响力。本文首先利用了图文类信息的“碎片化”来扩大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利用了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大众平台来进行传播，并根据不同平台的流行“术语”来吸引观众读者的眼球，如小红书的“家人们！谁懂啊！”“狠狠的戳中了！”、抖音的“又燃又潮”“BGM”等等，不同平台的受众群体所能接受的风格也不同，所以要根据不同平台更换不同风格，才能更进一步提升传播广度，吸引读者眼球。好的图文设计能带来美学享受，使阅读过程轻松愉快，提升阅读愉悦感和情感共鸣。图片（尤其是人物、故事性图片）更容易激发情感反应，建立情感连接，让内容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所以在图文设计的过程中，为了让内容更加丰富，本文的图文类设计涉及了“国潮风”“复古碰撞感”等风格来吸引不同的年龄层观众。总而言之，互联网图文传播方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它成功地在“信息的深度”和“传播的效率”之间取得了绝佳平衡，为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播奠定一定的深度，为接下来的传播策略提供了一定基础。

2. 音频类

互联网音频传播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娱乐和连接彼此的方式。音频是“一心多用”的完美媒介。你可以在通勤、开车、做家务、运动或休息时收听，充分利用了碎片化时间，而不需要像文字或视频那样占用全部的视觉注意力。本文搜集了阳新县有关于大别山近现代的红色音乐歌曲及其乐谱如《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三军授旗歌》、《送郎当红军》、《五月榴花遍地开》等等。阳新县隶属于大别山红色革命区，且阳新县的革命歌曲非常具有当地特色，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革命精神力量，所以选用阳新县革命歌曲作为例子，“我们在高度评价大寨、昔阳新民歌的革命思想内容同时，不能不强调指出它们具有的新颖的艺术特色。‘言们有着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艺术特点，顺口、有韵、易记、能唱。’^[1]本文将这些歌曲按照原谱弹奏录成音频收集成歌单，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以文字类信息辅助达到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音频传播。人的声音富含情感、语调、停顿和个性，比纯文字更能传递情绪和建立信任感，更容易让听众产生共鸣和亲切感，形成一种“陪伴感”。以此种方式不仅能为大别山红色音乐开拓道路，同时从某种方面也继承了大别山红色音乐，使听众不再局限于文字描述，切实听到大别山红色文化的“声音”。同时近现代的红色音乐还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到今天也有一定价值，如《戒赌歌》劝解人们远离赌博、《旧婚姻不自主》鼓励人们挣脱束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等等，其他的红色歌曲也具有当时的不畏艰险的红色精神都对现如今的人们产生了教育意义，所以音频的方式传播利用歌词也能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改变。这种形式的文化通过互联网音频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听众，尤其是吸引了年轻一代。总而言之，互联网音频传播的核心优势在于其“伴随性”、“情感性”和“普惠性”。它完美地适配了现代人忙碌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更人性化、更温暖的方式传递信息、知识和情感，既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创造了新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它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

3. 视频类

互联网的视频类传播是当前最主流、最具影响力的信息传播方式之一。它相比图文和音频，具有多维度的巨大优势。一分钟的视频可以传递的信息量远超一张图片或一段文字。通过实拍演示、动画、字幕、音乐、特效等多种手段复合呈现，能将复杂的故事、抽象的概念或产品的使用效果清晰、生动地展示出来，说服力极强。富有情绪感染力（如搞笑、震惊、感动）或极具实用价值（如干货教程）的视频，极易引发用户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形成“刷屏”效应，实现指数级增长的传播效果。就观众而言，视频类信息轻松易懂，体验丰富。观看视频几乎不需要任何认知负担，是一种被动接收的“躺平式”体验。无论年龄、学历，任何人都能看懂，真正实现了信息的“普惠”和“破圈”。视频类信息还具有强烈的社区归属感与互动性。通过弹幕、评论、点赞、合拍等功能，用户不再是单向接收信息，而是可以实时互动、形成圈子文化（如“B站”社区），获得参与感和归属感。本文利用了视频类信息的传播力度，进一步提升大别山红色音乐传播深度，运用视频的动态信息来传递图文类信息不能传递的音乐，音频类信息不能传播的音乐故事性，本文在设计视频类信息的过程中，结合了大别山革命故事与大别山红色音乐背后所蕴藏的故事性来讲述大别山的革命历程，并且加入大别山近现代红色音乐作为背景音乐来衬

托,以期让观众能够欣赏到大别山红色音乐,也能理解歌曲所讲述的内容,理解歌曲背后所蕴含的革命人文内涵。本文创作了两种风格的视频类信息,第一种运用了近代革命歌曲,如《红三军授军旗歌》;第二种运用了现代红色革命歌曲,如《再见了,大别山》,这样能使观众能感受到近现代人们大众对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深切感情。互联网视频传播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综合性的感官冲击力和极低的信息接收成本。它不仅是信息传递的利器,更是情感连接、信任构建和文化塑造的终极媒介,利用视频类信息的传播,能够将观众和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以互动的形式实现跨时空交流,为打造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品牌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平台。

(二) 打造文化品牌

“文化品牌”是一个复合概念,它超越了传统商业品牌的范畴,具有更深厚的内涵。拥有独特的“文化”内核:这是其最关键的区别。它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表达方式深深植根于某种文化,并反过来影响和塑造文化。文化品牌的目标旨在讲述文化故事讲述一个关于起源、工艺、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的故事。这个故事通常与特定的地域、历史或群体文化相关。而本文的目标就是要打在一个属于大别山自己的红色音乐品牌。建构新媒体大别山红色音乐传播矩阵,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传播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的深度。如图1所见。

	传播类型	形式	新媒体平台
第一矩阵	图文类	卡通动漫	微信公众号、知乎、小红书、百家号
	视频类	微电影、短视频	抖音、快手、B站、优酷、视频号
第二矩阵	直播类	民歌网红、歌舞直播、文创卖货	抖音直播、淘宝直播
	短消息类		微信朋友圈、微博热搜
第三矩阵	新技术类	虚拟现实	AR、VR

图1 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的新媒体的传播矩阵

“‘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实践结合的新形态,具有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开放生态的特征。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具有特殊而又深远的意义,红色文化能够为党史教育提供重要路径,能够激发集体记忆助理党史教育。”^[4]大别山红色歌曲利用互联网多平台多渠道进行多元传播,打造大别山红色音乐品牌、构筑大别山红色音乐新媒体传播矩阵,图文类与视频类为第一矩阵,可将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以卡通图片、动漫、短视频和微电影的形式为主,打造大别山红色文化的知名度,为接下来的矩阵建构奠定一定基础;直播类与短消息类为第二矩阵,以直播歌舞、文创卖货的形式配合短消息的影响传播打造一定经济效益,进一步拓宽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的大众化传播;第三矩阵就是线下真实体验,在有了一定知名度,配合大别山当地文旅利用AR、VR再现当年革命历程,提升受众者的感官体验,增强游客的旅游体验。目前本文只做到第一矩阵的内容,为接下来的内容奠定基础做准备。文化品牌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而是一个动态的、有生命的系统。它通过挖掘、提炼和表达某种文化,与消费者进行深层对话,最终让自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其象征。它卖的从来不只是产品,而是一种文化体验、一种身份认同和一种生活方式提案。

三、结语

本文通过探讨“互联网+”赋能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传承的路径与策略,系统分析了图文、音频、视频等多维传播方式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综合运用。研究表明,借助互联网平台的跨界融合与创新驱动,能够有效增强红色音乐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使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尤其是触达年轻群体。通过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不仅提升了红色文化内容的吸引力和可及性,也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大别山红色音乐文化品牌奠定了基础。“互联网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碎片化’的信息处理,还在于其在各个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将红色文化与互联网相结合,正是运用了互联网的积极面,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迫在眉睫,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双刃剑。”^[5]未来,应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深化技术应用与文化表达的融合,持续拓展红色音乐文化的传承路径与社会价值,为实现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任彦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红色音乐传播[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12):14-16.
- [2] 葛晖.“守正创新”视角下大别山红色文化有效传播研究[J].新闻爱好者,2023,(04):68-70.DOI:10.16017/j.cnki.xwahz.2023.04.009.
- [3] 辛宪锡.大寨人的英雄歌——读大寨、昔阳新民歌[J].天津师院学报,1976,(01):76-79.
- [4] 席琪.“互联网+”背景下陕南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22.DOI:10.27414/d.cnki.gxnju.2022.001822.
- [5] 刘洋洋.互联网条件下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D].兰州理工大学,2019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of Red Music Culture Empowered by Internet Plus:

Creating a Brand of Red Music Culture in Dabie Mountain

Liu Lei¹, Yi Xiuhua^{1*}

¹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Hubei 435000, china

Abstract: Red music, as an artistic medium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and construction history, profoundly embodies the spirit of hard work an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Red music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d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also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advanced Chines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1]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s high emphasis on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how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temporary dissemination of red music has become a crucial issu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d music of the Dabie Mountains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 explor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path of it with the dissemination of red music culture. Through digital processing, it aims to break through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red music and modern society,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appeal of its dissemination, thereby strengthening collective memory, assisting in the education of Party history,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wide dissemination and value elevation of red culture.

Keywords: Red music; Internet +; Cultural dissemination; Dabie Mountains

打破算法壁垒：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形成机制与应对路径

周兴萍¹

(1.重庆大学, 重庆 40004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受到高度重视。习总书记特别指出:“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1]。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平台。了解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概念及其外在表现,探讨新科技革命尤其是算法推荐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对意识形态传播的影响,分析技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维角度探讨了意识形态极化的成因,对正确认识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现象有重要意义。为有效应对网络意识形态极化带来的风险,需要从技术治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法律政策完善和国际合作等路径来进行整合策略,以减少网络空间中的极化现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效维护网络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关键词: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科技革命;算法推荐;人工智能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1

一、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概念界定

1.1 意识形态的网络化演变:从哲学基础到虚拟交互的范式重构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由德斯蒂·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他将意识形态视为一门基础性的哲学理论,其目的是为人类认知提供可靠依据,成为各学科构建的理论基石,具有高度抽象性。费尔巴哈则首次用整体原则阐释意识形态,将其从抽象教条转化为人类实践的普遍规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2]。

网络意识形态并非简单的“网络+意识形态”模式,也不能仅视为传统意识形态的“网络化”再现。黄冬霞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在线上线下社会和现实网络个体高度融合渗透及部分重叠、边界模糊的环境生态下产生的,它是通过网络交往实践而形成的人类意识形态崭新形态”^[3]。因此,网络意识形态可理解为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由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现实个体与网络个体高度交融而形成的独特意识形态形态。

1.2 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内在形成与外在表现:技术驱动下的阶级分化

“极化”一词最早用于物理学领域,意指在特定条件下事物产生两极分化。在政治科学领域,“极化”一词有了新的解释,即“公众舆论出现分化,并有走向极端的趋势。”^[4]“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地方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5]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6]在这种理解下,意识形态的极化本质上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在经济基础上的分化和对立。意识形态的分化与社会存在的变化息息相关。在网络时代,科技不仅重构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影响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极化可以定义为:在网络平台上,因技术手段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在信息选择、价值观和情绪表达上的对立性逐渐增强,形成信息茧房和回音壁现象,并通过虚拟空间向现实社会传导,从而在整体上加剧了社会的分化与极端化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

作者简介:周兴萍(1996—),女,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社会信任的下降是最为直接的表现。由于用户长期接触与其认知一致的信息,导致其逐渐形成对立的社会观念,并对不同立场的群体产生不信任感。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存在于个人层面,还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例如,在美国的几次大选期间,虚假新闻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导致了公众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并加剧了社会的撕裂。比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加剧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许多极端化的政治内容通过Facebook等平台迅速扩散,极大地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和投票行为。研究表明,虚假新闻在选举前一个月显著增加,导致选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度下降,并加剧了社会对立。

公共话语场的撕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网络平台上的舆论场域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和对立化,用户通过个性化推荐接收到的信息与其既有的意识形态立场高度一致,而不同意识形态的用户群体则很难在同一话语场中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公共话语场逐渐被分割为多个相互对立的“小圈子”,不同圈子的用户几乎无法理解对方的观点,甚至彼此排斥和敌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8]在现代网络社会中,虽然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形式发生了变化,但意识形态的斗争却愈发激烈,且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形式。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也使得公共话语空间中的讨论愈加情绪化和极端化。2018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中,抗议者通过特定的社交媒体平台彼此强化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这些群体的信息来源高度同质化,进一步加剧了情绪化的对立和社会分裂。

更为严重的是,网络意识形态的极化在一定情形下可能演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对立与政治冲突。在网络空间中,极化的观点和言论容易通过社交媒体快速传播,进而在现实社会中引发更广泛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例如,在某些国家,网络上的极端思想迅速通过社交平台扩散,导致不同政治倾向的群体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激烈对抗。政治两极分化和社会群体间的对立情绪在网络舆论场的放大下,进一步影响现实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稳定性。网络与现实的这种互动关系,不仅加深了社会的分裂,也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使得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不再仅限于单一国家内部,而是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互联网进行扩散。极端观点与虚假信息的跨国传播影响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这种虚拟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对抗已经不再是国内的孤立现象,而是演变为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复杂情况。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疫苗及病毒起源的虚假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些信息不仅加剧了国际间的社会对立,还对各国政府的抗疫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疫苗接种率因而受到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二、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多维成因

2.1 技术维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的非中立性

技术是推动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重要动力之一。随着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但与此同时,这些技术的双重性也导致了意识形态传播中的负面效应。算法推荐技术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针对用户的个人兴趣、偏好进行定制化的信息推送。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技术的发展并非中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9]现代社会中的技术,特别是算法技术,在其设计和应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使得它不仅是一种中立的工具,而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力量。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算法技术的“黑箱”特性增加了其运作机制的不透明性,使得即便是技术的设计者也难以完全预见其潜在的后果。这种算法的不可见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被应用于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中,导致了难以控制的影响。算法推荐系统的运作并非完全基于用户的自主选择,而是依靠复杂的计算和数据分析,主动推送平台希望用户接收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已不仅仅是一个中立的信息传递工具,而成为推动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个关键力量。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网络安全的本质在对抗,对抗的本质在攻防两端能力较量……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10]因此,理解和掌控算法技术在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应用,是实现信息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

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早就警告过技术的非中立性。他们指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理性”,这种理性是为资本主义体系服务的,技术的应用往往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强化意识形态的对立。就如马尔库塞所说“技术理性这一概念单纯是意识上的。他不单单应用于技术,更多的是针对技术本身进行有效的、科学慎重的管控。”^[11]今天,算法技术通过对用户行为的追踪和监控,强化了用户的认知偏见,使得信息的单向性传播越来越强,意识形态的极化日益加剧。

2.2 社会文化维度: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冲突

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全球化进程是加剧意识形态极化的重要背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网络空间成为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交锋的主要场所。网络的去中心化特点为各种不同意识形态提供了传播的平台,而这些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逐渐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对立。

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化与意识形态是社会物质条件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2]”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更加频繁，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网络平台成为了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阵地，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各种极端思想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和扩散，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

网络意见领袖和极端组织的崛起也是导致意识形态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群体通过网络平台，迅速传播其极端化的思想，吸引大量受众，尤其是年轻群体。他们通过煽动性、情绪化的言论，鼓吹对立情绪，激化社会矛盾。例如，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利用网络传播其极端意识形态，招募追随者，甚至发动恐怖袭击。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并或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13]”

全球化进程也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交锋更加频繁。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观”通过互联网向全球传播，试图影响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使得网络空间成为了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战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文化传播，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扩展和渗透，大众媒介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宽广平台。所以霍克海默批判“意识形态不仅驾轻就熟地绕过了各种明摆着的假象和真相之间的对立，而且注定会制造出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用来遮人耳目，或者把无处不在且毫无关联的现象奉为圭臬。^[14]”这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对抗。

2.3 政治经济维度：资本逻辑与平台算法控制

资本逻辑在网络平台中的主导作用，是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重要政治经济因素。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网络平台不仅仅是信息的中立传播者，它们本质上是资本逐利的工具，平台的算法设计、内容推送以及信息筛选，往往都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导向。在这种资本逻辑的驱动下，平台更加倾向于推送能够引发行用户情绪波动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带有极端化、情绪化的特点，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极化。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资本的逐利本质被明确阐述，指出资本在追求最大化利润的过程中，常采用隐蔽的手段进行剥削与统治。在当代的数字网络平台上，这种资本的逐利行为通过算法来实现，控制并操纵用户的在线行为，使用户无意中服从资本的逻辑。此类控制不仅表现为经济层面上的剥削，更体现为意识形态的操控。网络平台通过推送引发情绪反应的极端内容，提升用户的参与度和平台停留时间，以此增加广告收益。这种做法导致极端内容逐渐主导舆论空间，进一步加剧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和对立。

随着网络平台资本的全球扩张，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对抗变得更为复杂。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碰撞，网络平台作为全球资本的工具，利用其算法和数据控制能力，不仅塑造了国内的意识形态结构，也在国际层面推动意识形态的极化和分裂。资本的全球扩散常常携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不仅加深了国家间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也加剧了阶级和群体之间的冲突。

因此，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成因是多维的，不仅受到技术推动的影响，还深受社会文化多样性、全球化进程以及资本逻辑和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这些技术、文化和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复杂格局。未来，如何有效应对这些多维因素，遏制网络意识形态的极化，将是全球社会和政治治理的一大挑战。

三、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应对路径

3.1 技术治理与算法优化：推动信息公平与多样性

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算法技术已经成为推动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但其同时也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的极化倾向。“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15]”技术本身并非中立，而是与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息息相关，因此，在算法技术的治理中，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重视其对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信息的关键特征是多样性与透明性，信息的不平等获取将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割裂。为了减少由算法推荐所引发的极化效应，必须优化算法设计，确保信息分发的公正性和多元化。比如引入多样化的推荐机制（例如反向推送不同观点的信息）打破“信息茧房”。例如 Google 或 Netflix 的“兴趣多样性”策略，通过提升内容多样性，减少用户长期接触单一信息源。这种优化可以通过引入更多样化的算法模型实现，避免单一的用户画像和兴趣倾向支配信息推送。这与马克思提倡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相一致，技术手段应为所有用户提供公平的获取信息机会，而不是促使人们被圈定在某些信息“茧房”中。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内容筛选领域，虽然这种技术扩展了信息处理的边界，但也可能加剧了信息获取的不平等，从而促进了意识形态的极化。因此，通过加强技术治理，提高算法的透明度，成为防止信息垄断和操纵的关键措施，以确保信息分发的公正性。增强算法透明度是减少由于算法偏见所引起的意识形态分裂的有

效手段。

资本主义的逻辑与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经常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因此,必须对这种结合进行审慎调控,确保技术发展遵循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通过提升算法的公开透明度,可以预防信息传播过程被资本利益主导的问题,有效地缓解由算法偏见引起的社会分化现象,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和多元的信息传播环境。这种治理措施不仅可以增进内容筛选的公正性,也是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基础。

加强技术伦理研究,防止算法技术异化为维护少数资本利益的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资本对劳动和技术的控制,而当今的算法技术已成为资本获利的重要手段,其逐利性往往通过推送极端化、情绪化的内容来吸引眼球。建议设置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审核平台,对互联网平台的推荐算法进行审计,确保平台不会滥用算法推送极端或情绪化内容,以此通过优化算法设计,减少这种内容推送的偏向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意识形态极化的趋势,保持信息传播环境的健康发展。

算法推荐技术的优化是解决意识形态极化问题的核心,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算法技术的优化与管控,推动信息公平与多样性。例如我国在今年9月9日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版,针对模型算法安全,提出相应技术应对和综合防治措施,培育安全、可靠、公平、透明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生态。

3.2 主流意识形态引领:营造和谐网络空间

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在新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战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深刻指出,“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加紧对我国进行渗透、颠覆、破坏,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各类社会风险向网络空间传导趋势明显。^[17]”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必须占据网络空间的制高点,必须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引领作用,才能有效应对极端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挑战。

国家和社会组织必须积极利用新科技手段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思想观念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8]”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能够充分反映社会的现实需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将严肃理性的互联网主流意识形态内容通过全息媒体转化为兼具权威性、活泼性与生活化的现实内容,加之以高度沉浸与虚实融合的场景化呈现方式进行网络意识形态传播。^[19]”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20]”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分析社会舆情,制定更为精准的传播策略,增强主流价值观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建立官方账号并利用明星代言人、短视频创作者联合推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内容,使这些内容更具吸引力。这些策略可以有效减少极端思潮的传播空间,防止网络意识形态走向极化。比如“网络中国节”、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征集展播活动等网络主题宣传活动持续开展,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文化氛围。

开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有利措施。通过打击网络水军操纵信息内容、规范重点流量环节网络传播秩序、优化营商网络环境等方面,开展一系列专项整治,有力维护网民合法权益。根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3年)》发布,全国网信系统大力查处各类网上违法违规行为,全年共责令453家网站暂停功能或更新,下架移动应用程序259款,关停小程序119款,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14624家,督促相关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关闭违法违规账号127878个。公安部开展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4800余起。全国公安机关依托“夏季行动”和“净网2023”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共查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案件110起,有力净化网络生态。^[21]

通过正面传播加反面打击相结合的方式,融合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深度。一方面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的广泛覆盖和影响力,广泛传播科学事实、历史经验和典型的成功案例;另一方面通过精准打击,政治网络不良行为,净化网络生态。有效抵制极端思想的负面影响,促进更加和谐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3.3 法律与政策的完善:健全安全有序的网络意识形态环境

为了有效遏制算法技术对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推动,法律与政策的完善至关重要。要大力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完善信息化领域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探索新兴领域立法,加强重点领域网络执法司法,拓展网络普法深度广度。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提升新技术新应用治理能力。健全安全有序的网络意识形态环境。

法律体系应明确界定算法的透明性和公正性,以防止算法成为资本控制思想意识的工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而现代网络平台通过算法控制信息流,实际上在数字领域上演了类似的剥削。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算法技术的透明化,确保信息传播的多样性和公平性,避免平台通过不透明的算法机制操控信息,误导公众舆论。通过具体立法要求平台公开算法设计的关键要素,防止平台通过算法操作误导公众舆论,促进信息的公平传播。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对应用深度合成技术提供互联网信

息服务的情形提出专门性、具体性要求,为促进深度合成服务规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截至2023年底,已有151款算法完成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22]

为防止资本对算法的过度干预并抑制其逐利本性所引发的社会不平等和意识形态扭曲,制定与算法技术相关的伦理规范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批判中提及,资本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利润的追求,这一驱动力在网络时代往往通过算法来实现,可能导致信息传播的不平等和极端化。因此,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限制平台基于利润驱动的行为,尤其是在推送极端化、情绪化内容的实践中,显得尤为必要。网络平台应重视其社会责任,不仅仅依据点击量和用户停留时间来推送内容,而应更多考虑信息的公正性、准确性和正面社会影响。在2023年,我国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从技术与治理、服务规范、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作出具体规定,是全球范围内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首部立法。

平台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推动内容推送的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的平衡。算法推送的标准不应只依靠商业性指标如点击量或用户停留时间,而应融入社会效益、内容的正面价值和多样性等更广泛的考量因素,促进社会舆论的理性和多元化发展。平台可以通过与政府及社会组织合作,制定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并通过自律公约来确保推送内容的适宜性。在处理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上的敏感话题时,特别需要避免助长极端化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有效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网络秩序。《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出台,加强APP全流程、全链条治理,提升用户服务感知和行业管理能力,2023年累计责令整改10609款APP,公开通报和下架2150款违规APP,切实维护用户合法权益,不断净化移动互联网服务环境。^[23]

3.4 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网络治理格局

网络意识形态极化不仅是国内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在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24],因此,全球网络治理也必须体现这一国际合作的精神。在全球化的网络空间中,虚假信息和极端思想的传播往往跨越国界,各国之间的网络空间并非彼此孤立。例如,欧盟可能对数据保护有更高要求,而美国的科技企业对开放算法审计持抵触态度。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网络意识形态极化的挑战。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联合建立起全球性的网络安全机制,通过信息共享、技术合作等方式,共同打击跨国性的虚假信息传播和极端思想的渗透。

随着我国在全球互联网影响力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入阐述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参与《数字贸易测度手册》(第二版)修订,成功举办第二次中欧数字领域高层对话、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数字经济高级别论坛等活动。我国与13个国家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北京倡议》,截至2023年底与30个国家签署双边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25]

为了实现全球网络空间的公正、开放和多元化,建立全球治理框架成为必要。这一目标不仅根植于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念,也是抑制极端思潮全球蔓延的有效策略。国际社会应共同致力于算法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全球性监管,确保这些前沿科技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非仅满足少数资本集团的利益。各国政府应与国际组织携手,共同制定网络平台信息推送的国际标准和全球监管框架,例如建立一个国际网络安全组织,类似于联合国或国际电信联盟(ITU)。该组织将负责协调国际间的网络政策、促进数据安全技术的共享等关键活动,推动全球统一的网络信息发布标准,有效减少虚假信息的跨国传播。

四、结论

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尤其是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剧了网络意识形态的极化,并使信息传播更加分散和个性化,从而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分裂。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必须加强技术治理、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以及完善国内外的法律政策和国际合作。从而确保网络空间的发展方向朝着更加公平、开放和多元化的目标前进。在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传播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与技术发展同步,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数字时代维持其引领地位。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7-422.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1.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M].人民出版社,2019:100.
- [5]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9-42.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4.
- [7]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5.
- [8] [美]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 上海:三联书店,1989:106.
- [9] [美]凯斯·桑斯坦,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出版集团,2003:47.
- [10]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3.
- [11] 黄冬霞,吴满意. 网络意识形态内涵的新界定 [J]. 社会科学研究, 2016, (05): 107-112.
- [12] 乐媛. 互联网“极化现象”研究综述 [J]. 新闻爱好者, 2010, (08): 120-121.
- [13] 洪晓楠,刘媛媛. 全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特征、现实表现与治理策略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 (05): 69-75.
- [14] 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4-26 (002):18-19.
- [1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001):13.
- [16] 国家网信办.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3年) https://www.cac.gov.cn/2024-09/06/c_1727308607362592.htm

Breaking Through Algorithmic Barriers: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Online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Zhou Xingping¹

¹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line ideological issues have been given high priori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pecifically emphasized: “Controlling the initiative in online ideology means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state powe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yberspace has become a crucial platform for ideological dissemination.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online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nd its external manifestations,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particularly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on ideological dissemination, and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from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echnology, sociocultural factor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re crucial for correctly recognizing this phenomen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risks posed by online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an integrated strategy is required. This should encompass technological governance, guidance by mainstream ideologies, refinement of legal and policy framework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ch measures will mitigate polarization in cyberspace, promote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ly safeguard leadership over online ideological discourse.

Keywords: Online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创作分析与演唱研究——以三首作品为例

万美彤¹

(1.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

摘要: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批优秀音乐家将西方艺术歌曲的创作手法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应运而生。一首优秀中国近代艺术歌曲更是一个作者内心丰富情感与思想集中的体现。本文选取了三首经典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分别是《教我如何不想他》《我住长江头》《玫瑰三愿》。这三首歌曲都是借景抒情并结合音乐将心中的爱国精神所表达。本文首先是对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历史背景和发展进行了了解,其次是对三首作品进行创作分析,对作品深入理解以便更好的完成演唱。最后是对三首作品的演唱方面来进行研究,尤其是艺术歌曲演唱时更要注意演唱技巧与情感内涵的交融,以情带声,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拙见,以便更好地诠释歌曲。

关键词:艺术歌曲;创作分析;演唱研究;情感;教我如何不想他;我住长江;玫瑰三愿

基金项目:2025年广东省社科基地大学与城市融合发展研究中心开放课题“青年文化视角下城市音乐艺术空间的建设思路研究”(2025KF008)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35

二十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部分音乐家纷纷归国进行音乐创作,他们受早期在国外学习的影响,将西方艺术歌曲的音乐创作手法和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相结合,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音乐特色又融合西方风格的中国艺术歌曲。而近代时期的艺术歌曲也为中国艺术歌曲发展道路奠定了牢固根基,是独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的中国艺术歌曲。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中具有优美的旋律、精致的歌词、质朴的演唱以及深厚的情感。然而这三首《教我如何不想他》《我住长江头》《玫瑰三愿》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三首作品不仅具有中国近代时期艺术歌曲的鲜明特点,传唱度较高,所以在演唱方面具有深刻的研究价值。三首作品在情感上的内涵尤为重要,在演唱时可以将声音与情感融合体现对于演唱者自身的能力也是一种提高。笔者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在已发表国内各刊物上的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在期刊论文中对笔者有价值的为刘佳音、关韵佳的《浅析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的音乐创作特点》、王新河的《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的演绎处理》以及丁婉露的《研析黄自艺术歌曲<玫瑰三愿>的演唱处理》等相关文献。

本文将先对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历史背景及发展进行简概,然后对三首作品的曲式调性以及歌词中的情感内涵进行分析为演唱做好准备。最后对三首作品的演唱进行研究,让演唱技巧与情感相融合更好的来诠释歌曲。

第一章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历史背景及发展

第一节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历史背景

20世纪初,中国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中国的封建与落后,于是他们力求变革,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对于中国的发展上有着转折性的历史意义,也正是这场运动让当时的中国学会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主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而新文化思潮推进了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人们追求科学、自由与创新。当时在外留学的萧友梅、赵元任、青主等音乐家们纷纷归国进行音乐创作,他们受早期在外洋进修学习的影响,将西方艺术歌曲的音乐创作手法和音乐理论与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相结合,创作出具有鲜明中国音乐特色又融合西方风格的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例如萧友梅创作的《问》,用极简练的材料却创造出浓厚感情,表达深刻思想内容的艺术歌曲。

然而歌词方面也大有讲究,新文化运动推动以来,白话文、新体诗逐渐流行开来成为热潮。这些新诗新词结构精炼、形式自由、通俗易懂,并且能够请将思想情感直接的表达出来。音乐家们以新诗词作为歌词谱曲进行创编的艺术歌曲,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也在社会上流传来。20世纪初中国艺术歌曲的诞生象征着希望,也意味着是中国摆脱封建束缚的开始,更是打开了中国音乐文化新的篇章。

作者简介:万美彤(1997—),女,辽宁沈阳人,硕士,东莞城市学院助教。

通讯作者:万美彤

第二节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发展

一、早期新型歌曲创作

最初的艺术歌曲形成大部分都是借鉴西方音乐的创作手法进行简单“模仿”，后来慢慢结合中国音乐文化进行创新，最终在不断探索中走向成熟。新诗词是当时出现的一个新潮，诗词形式自由不受拘束，音乐家们创作了不少抒情歌曲。音乐家赵元任，他将西方音乐创作技法进行民族化探索，并且在自己的音乐作曲中有意识的将我国传统戏曲、小调的音乐进行融合，而他所写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在创作上就运用了“中西结合”方式。首先在节奏上采用了“分解变奏”形式，后与中国传统戏曲京剧唱腔“过门”的音调相结合，并且加以变化的创作手法，让京剧音调和旋律完全的融合，整体给人旋律优美、独特、新颖的感受。动听旋律与真挚诗歌相结合，更能表现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新思想的体现，对祖国、家乡、爱人思念的深切感情。

二、我国“抗日救亡时期”的艺术歌曲

三四十年代正是社会动荡不安，遭受残酷侵略的时候，音乐家们创作的中心思想也转变为抗日救亡歌曲，把国恨家仇谱写进歌曲里，宣扬民族精神支持抗日。当时“抗日救亡”歌曲大量涌现，其中抗战题材的艺术歌曲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体裁作品。应尚能的《吊吴淞》旋律丰富多变，形式多样，旋律与钢琴伴奏的完美的结合，把爱国之情抒发的淋漓尽致。还有陈田鹤《巷战歌》等歌曲也都是抗日救亡时期优秀艺术歌曲作品。

二十世纪20年代—40年代是中国艺术歌曲从出现走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时间段，各种形式体裁的艺术歌曲大量的涌现使作品的数量、质量上都有了飞跃的突破，音乐创作手法上也更加丰富多变，拓宽了艺术歌曲发展的道路。这时期创作的作品为中国音乐的发展道路奠定了牢固根基，是独具中国民族音乐精神的中国艺术歌曲。

第二章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我住长江头》《玫瑰三愿》的创作分析

第一节 曲式结构与调式调性布局

一、《教我如何不想他》

《教我如何不想他》曲式结构为变奏曲式。全曲被分为了A、A1、A2、A3四个部分，后三段都是第一段的变奏形式且四段结构大致相同。首先前四小节为引子，A部分5-8小节为第一乐句，9-12小节为第二句乐句，13-16小节为第三乐句，17-18小节为第四乐句，每个乐句四小节。并且四句之间运用了“起、承、转、合”的手法将音乐完美连接起来，第一句为“起”，次句是在首句的基础上加花变化再重复，第三句把音乐线条拉长再紧缩进行对比，最后一句回落到主题。在这段他也运用了“叠入”的音乐写作手法，段落中“啊...”的感叹词把音乐拉开，使后边句子紧缩，最后一句的开头“教我”和上一句结尾“发...”合为了一小节，这种创作方式也使结构更为紧凑。他也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构成了每个乐段的乐句之间的结构。如图2.1所示。



图 2.1 《教我如何不想他》1-21 小节谱例

而四段的调性的变化也大大增添旋律感情色彩，第一段调性为E宫，第二段调性为E宫-B宫，第三段调性为E宫-e小-G宫，第四段调性为e小-E宫。开头以E宫调式开始，旋律整体优美平静，中间运用转调的方式来突显旋律情感的起伏变化，最后又回到E宫调式并结合明亮高昂的旋律激动的抒发了内心的思念之情。

二、《我住长江头》

这首作品为二部曲式。作曲家在结构上没有把全曲整体进行反复，而是将下阕单独进行了多次重复，符合古

诗词的特点,也让歌曲情感更为沉淀丰满整体得到升华。全曲分为A、B两大部分,B部分又B1、B2、B3三个部分。前四小节是歌曲的引子,A部分共四句,四小节为一句,是4+4+4+4的方整结构。在A部分中一、二句采用了同头换尾的音乐手法,旋律较为平稳,第三句旋律略微降低有一丝变化,第四句旋律音调逐渐升高,情绪高涨尾音到达小字二组的a音,这四句的整体运用了‘起承转合’的音乐结构手法,也让音乐进一步得到了发展。B部分分为B1、B2、B3,它这三小部分结构完全一致,每段分别为四句,也是4+4+4+4的方整性结构。音乐材料也以A部分主题加以变化创作,整体而言好像和A部分的旋律形成了呼应,其音乐结构也运用了“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如图2.2所示。

图 2.2 《我住长江头》1-22 小节谱例

调性方面A部分是D宫调性,第18小节中呈现的#c变音使得D宫调性更为明显。B部分为G大调,G大调的调性奠定了感情基调,三次的层层递进也渲染了音乐色彩的变化。青主在创作上周全布局的结构使作品更富有层次感,而且他灵活运用民族调式使五声调式与自然调式完美融合,让旋律充满东方调式色彩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冲击性。

三、《玫瑰三愿》

这首歌曲为并列单二部曲式,分成A、B两个部分。前四小节为引子,前奏出现的旋律是全曲的主题动机。A部分为4-12小节由两个乐句组成。这两个乐句是以模进的形式结构出现,通过对主题动机的模进手法强调主题特征。第一乐句中第一个“玫瑰花”旋律是动机,其次第一句的整体旋律是逐层递进的关系并且音乐的感觉没有停止。第二乐句是在第一乐句的基础上以自由模进的形式对主题动机“玫瑰花”进行了展开。如图2.3所示。



图 2.3 《玫瑰三愿》A 段

B 部分是 13-29 小节由三个大乐句构成。B 部分一句与二句是向下二度模进的关系，旋律线条悠长动人。第三句的八度大跳进的写法也将全曲推向高潮，并且内部的结尾出现了一个延伸。这三句像波浪似的音乐结构表现出宽广而凄美的音乐线条，增添饱满的情绪有无限感慨之意。如图 2.4 所示。

图 2.4 《玫瑰三愿》B 段

在调性方面，前奏带有五声音阶的色彩，A 部分为 E 大调，旋律平静而舒缓，仿佛玫瑰花在委婉诉说。B 部分由 E 大调转到#c 小调在结尾又回到 E 大调，旋律也从平稳逐渐转为激动第三句经过一个八度大跳到达全曲最高音，内心强烈情绪在此刻舒缓开来。尾句的扩充句回到了 E 大调，旋律转入了低声区恢复了平静。黄自独具匠心的曲式设计让作品结构层层递进，紧紧相扣，欲扬先抑的手法更是让作品富有立体感。

第二节 歌词语言中的情感内涵

一、《教我如何不想他》

这首作品是刘半农在伦敦求学时所写，身处异乡让他对家乡格外思念。而曾在外国留学的赵元任深有同感。歌词是对春、夏、秋、冬的景色进行描绘分为四段。第一段通过“微风”“微云”等景物刻画春天的景象，“风吹动头发”表明此刻家乡想起愉悦的心情，借景抒情，暗喻思想之情。第二段中出现“月亮”，“月亮”自古便是文学中表达思乡景物，而作者身在国家彼岸只能寄情于明月，也通过“月光、海洋”互相缠绵依恋等拟人化描写，抒发自己对于祖国、亲人想念之情。第三段“落花、流水”景物出现表露出秋天寒凉之意，情绪上也流露出淡淡的忧伤。“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呢喃式的碎语更是让作者心境发生了变化，想到身处他乡的难过更是无法言语。只能再次用“教我如何不想他”表明心迹。最后一段“枯树、冷风、残霞”等景物的刻画都表现出冬天的凄凉，也暗喻祖国正在饱受磨难，思念的同时对祖国充满了担忧。结束句“教我如何不想他”结合高亢的旋律抒发内心坚定的爱国之情与思乡之情。

二、《我住长江头》

诗人李之仪的这首词原本是表达男女的相思之情，但在这里青主借用了浓浓的江水之情表达了对昔日战场上一起勇敢奋战的战友的怀念之情，而且歌词中多次反复下阕也表现了青主内心的热血与激动心情。“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两句也暗喻国家动荡，战场上的残酷斗争使战友们被迫牺牲，这种痛苦在心里也久久不能平静。后两句的表明心迹直抒胸臆，寄托了青主对于友人的思念以及希望国家安稳的爱国之情。

三、《玫瑰三愿》

这首作品创作于“淞沪会战”期间，是黄自根据龙榆生的词所创作。歌词中作者对“玫瑰花”拟人化诉说了对生命的热爱青春的渴望，不希望“玫瑰花”受到外界以及时间带来的伤害，也表现了在战争年代人们惨遭磨难，向往和平仍对生活充满美好期待的情感。歌词婉转动人，诗中“玫瑰花，烂开在碧兰杆下”表现出了玫瑰花在阳光下温柔开放的美好情景。接着排比句再次出现加深情绪强调了玫瑰花绚丽多姿、灿烂绽放、朝气蓬勃的精神。随后是玫瑰花的三个“愿望”。花朵表现的这三愿生动描绘出“玫瑰花”不想受到伤害，对生命留恋的心情以及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态度。笔者也认为作者把“无情风雨”比作战争，从侧面反映出国家内忧外患人民在战争中饱受磨难与摧残，犹如“玫瑰花”一样强烈渴望美好生活的态度。抒发了希望战乱停止的爱国精神以及对生活充满希望美好的感情。

第三章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我住长江头》《玫瑰三愿》的演唱研究

第一节 在情感中对音色力度的把控

一、《教我如何不想他》

这首作品在情绪表现上丰满变化较多，随着情绪的变化音色力度也有所改变。第一段是体会如沐春风的美景，开头弱起，演唱时音量不要太强平静而舒缓，音色圆润而饱满。唱到“啊...”时，声音要做渐强的处理，整段音色注意轻静而连贯，音色无需过于明亮。第二段开始是沐浴在月光下，保持平静的状态。“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这句”情绪出现波动，声音逐渐渐强但不可过于太强，陶醉在甜蜜的意境之中稍显激动。最后一句“教我如何不想他”要做减弱的处理，虽然旋律中有跨度起伏但是声音上整体不要放的太开可以收着往外唱，情绪上带有一丝忧愁。第三段前两句演唱时可以稍快一点，随后情绪直转，“燕子，你说些什么话？”这句节奏坚定，情绪波动较大，更是要用诉说式的唱法把这句话说出来，表达伤感的心情。尾段作为高潮，这时演唱情绪应该达到顶峰。前两句思念的同时还担心祖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演唱时应该带有担忧难过的心情结合沉重愤慨的音色，同时还带有些许颤音来演唱。尾句再次重申主题句是对于之前所积累的对祖国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全部融进这一句中。“何”字的处理要有控制的由弱渐强再到弱，“不想他”旋律再次升高情绪继续释放，刚柔并济的音色处理，在伤感中将坚定的思乡爱国之情所体现。“他”字的延音在情感与音色上做减慢减弱，仿佛歌声与情感融为一体飘向远方。

二、《我住长江头》

在这首作品中音色随着情感的递进富有层次感，演唱者需要用庄重与含蓄，平稳中突出气魄的声音表达作品中浓厚的情感。第一段音色整体连贯而深沉，“长江水”的“水”字虽然旋律上升，但是表现力度是 *p*，演唱时音量不要太强太亮，要用圆润，抒情的声色表现，采用“高音弱唱”声音处理，表现暂时压制内心强烈的情感含蓄的娓娓道来。第二段开头趋于平和，但是在后两句中表现出情谊坚定的情感，所以演唱时要做渐强再到渐弱处理。第三段开始情绪激动起来，在声音上要把“恨”表现出来。开始到中间是从弱到强的声音体现，后两句表达情意时演唱上渐强起来，但是声音放出来的同时情绪上还需有所收敛，好像欲言又止的感觉。最后一段层层递进的情绪终于在此刻宣泄了出来。“相思意”在谱中注意“*ff*”“*rit.*”的力度标记和渐慢记号，用饱满而圆润的音色表现，将音乐微微拉伸演唱力度加强把情绪推至高潮。“*a tempo*”回原速的记号出现可以将声音最后作弱处理，展现音乐意犹未尽的感觉也表达了作者浓厚的情谊。

三、《玫瑰三愿》

这首作品拥有着饱满的情感，在音色力度上的把控还是有一定难度。A 部分是娓娓道来诉说的感觉，演唱时音色应是温柔的、委婉的。在第二句进来时，第 8 小节力度标记为 *mp*（中弱），这是描画玫瑰花灿烂绽放的娇艳状态，声音力度稍微加强一些，也是音色更加集中表现。在 11 小节出现了 *rit.*（渐弱）的记号，演唱时音乐可以稍微拉开音色饱满来体现。12 小节处出现力度标记 *p*（弱）和 *a tempo*（回原速）记号，这时应该将声音减弱情绪也慢慢收回，和后面抒发自己内心愿望的强烈情绪形成对比。

B 部分中“一愿”在 13 小节出现标记 *poco agitato*（逐渐激动）*mf*（中强），演唱时情绪要逐渐上升，声音加入颤音让音色更加生动深情，也暗喻国家正动荡不安，体现了人们如“玫瑰花”一样在正在经历着风雨的焦灼的心情。“二愿”在 17 小节中出现了力度标记 *con tenerezza*（温柔的）*p*（弱），这句在演唱时应该用温柔而圆润并带诉说的音色来体现情感，并在这句结束时做减弱进行收句。“三愿”是整首作品最激动处，在 21 小节出现 *f*（强）力度标记，演唱这句时声音要充满激情，用饱满而宽广带有明亮色调的音色来演唱，尾字“谢”要延音保持做渐弱处理。“好教我留住芳华”此句情绪应是期盼中带有一丝无奈的情感，可以用吟唱的方式将此句唱出来，“芳”字可以用加重再渐弱的音色处理，“华”叹息唱出来，让情绪逐渐远去慢慢收尾。

第二节 在情感中对咬字归韵的处理

一、《教我如何不想他》

这首作品第一段情绪温和，在演唱时字不要咬的太狠，要像“说话”一样，自然的歌曲“说”出来。第二中出现的两个“爱”字要注意，这句乐句线条较为连贯所以“*ai*”这个音节特别容易吃进去。演唱时要把“爱”字的字头咬住。“银夜”中的“夜”字本来是横向发音，但是在演唱中要注意不要过于横向把字咬瘪，嘴不开太大小口型打开，口腔里稍稍竖起来给一点空间感去说“*ye*”这个音阶。第三段情绪逐渐激动，“燕子，你说些什么

话”这句以附点的节奏出现最能表现此时内心的难过，演唱要带有“说话”的方式咬字结合悲伤的情绪将思念的情绪唱出来。最后一段“枯树、野火”场景凄凉，唱的时候要强调咬字可以把字头说的重一些体现浓厚的情感，带着沉重悲伤无奈的心情来演唱。

二、《我住长江头》

这首作品第一段中“头”字在旋律上有一个拖腔，这时要保持音的连贯，在咬字的时候“头”的音要归到“ou”上来，所以演唱“头”时要快速归韵，以免在拖腔中咬字发生变化。第二句“水”在唱时发音比较难，它在旋律上处于高音区而且还有一个向上的拖腔，首先在演唱上保持喉咙下落声道打开状态，准确的把“水”字清晰的唱出来，它是闭口音还是最高音，咬住字头并保持打开的状态，口腔里可以稍竖起来但空间不要过大，把“水”字归到“e”的音节上并保持状态。这样才能保持住声音的通唱性带来美感。第三段中“似”字出现在最高音，表现出作者对战友坚定的情谊所以字要咬的稍重一些，但是不要咬死，咬住同时口腔竖起来软腭抬起。尾段最后一句“定不负相思意”每个词字都要咬住字头把句子说的重一些，强调语句语气激动而坚定，流畅的把声音送出来。

三、《玫瑰三愿》

这首作品中“玫瑰花”三个字为歌曲主体，在A段反复出现，在咬字时注意，前两个音声母不同韵母相同，所以演唱时一定要咬清字头，及时归韵到“i”这个音节。而且两句“玫瑰花”的“瑰”字都在重音上，唱的时候可以把字咬的稍重一些，情绪婉转，可以把字说清的同时以气带声。在A段中第二句的“开”字比较难咬，在旋律中是一个向上跨度的音，它是发小口型“ai”但因为旋律上行很容易把字咬瘪，所以在唱时要保持喉位不动的同时把舌根放下，小口型打开口腔空间立起来唱“开”字。B部分“我愿那红颜常好不凋谢”在演唱时要把“我愿那红颜”这前半句说的重一些，突出情感激动的体现。“红”字处于最高音的同时时值较长，在咬字时快速归韵别拖拉以“ong”的音节保持住。最后的“谢”字发音要注意，要唱“xia”这个读音，并且说清楚但不要咬的太狠。”最后一句以说话的方式唱出来，尾音渐弱处理。

结语

中国近代艺术歌曲具有优美的旋律、精致的歌词、质朴的演唱以及深厚的情感。本文选取了三首在中国近代艺术歌曲中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本文通过对这三首歌曲的创作进行分析，深刻的感受到了每个作曲家创作的每首歌曲所想表达的意义与情感，而在演唱作品时情感与声音技巧水乳交融，以情带声，在诠释作品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空间，也让我深刻感受到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冯康.中国艺术歌曲选[M].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2006.10重印）
- [2]刘佳音、关韵佳.“浅析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的音乐创作特点”[J].北方音乐，2017（16）.
- [3]张宏鸣.“对赵元任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的作品分析”[J].黄河之声，2019（12）.
- [4]姬宗盼.“《玫瑰三愿》的艺术特征及演唱技巧探讨”[J].北方音乐，2015（19）.
- [5]靳晓莉.“青主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创作特点及演唱技法”[J].菏泽学院学报，2017（39，4）.
- [6]王慧忠.“艺术歌曲《玫瑰三愿》的情感处理与演唱技巧分析”[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1）.
- [7]王恩大.探析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音乐文化内涵——以二十世纪20-30年代为例[D].天津师范大学，2020.
- [8]刘凯.浅析如何全面把握中国艺术歌曲的情感内涵——以《教我如何不想他》为例[D].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15.
- [9]丁婉露.研析黄自艺术歌曲《玫瑰三愿》的演唱处理[D].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15.
- [10]王新.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的演绎处理[D].河北大学艺术学院，2019.
- [11]陈智伟.赵元任作品《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艺术价值[D].福建师范大学，2015.
- [12]王悦.浅析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以《我住长江头》为例[D].中国音乐学院，2015.
- [13]谢小敏.五四时期中国艺术歌曲中西音乐元素的融合[D].西南交通大学，2011.

Analysis of Compos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Modern Chinese Art Songs: A Case Study of Three Works

Wan meitong¹

⁽¹⁾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 group of outstanding musicians combined the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of Western art song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culture, and modern Chinese art songs came into being. For vocal students, learning to sing modern Chinese art songs is essential. A good Chinese modern art song is a reflection of the rich emotions and thoughts of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we have selected three classical Chinese modern art songs, namely, "Teach me how not to think of him", "I live at the head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ree Wishes of the Rose". All three songs express the patriotic spirit in their hearts through scenes and music.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ree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singer, firstly,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art songs, secondly, to analyz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hree works, and to understand the works in depth in order to better sing them. Finally, we will study the singing aspects of the three works, especially the art song singing,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rplay of singing skills and emotional connotation, bringing the voice with emotion, and putting forward some of our own humble opinions in order to better interpret the songs.

Keywords: art song; composition analysis; performance research; emotion teach me how not to think of him; I live in Yangtze River; Three Wishes of Rose

《直到找到你》中音乐媒介中的情感认知

向君如¹

(1.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美国当代作家约翰·欧文的小小说《直到找到你》以艾丽丝与前夫威廉·伯恩斯的感情纠葛为叙事核心, 通过跨媒介的音乐书写揭示了艾丽丝情感认知的衍变轨迹。本文从构建、固化与解构三个阶段探讨音乐媒介对艾丽丝情感认知的形塑过程。研究发现, 艾丽丝的情感认知在威廉的管风琴音乐场域中被建构, 在她不断吟唱赞美诗的过程中被固化, 在摇滚乐的反叛幻象中被解构。她的音乐偏好始终以威廉为中心: 她通过宗教音乐来表达对他的忠诚, 而借助摇滚乐来表达对他的怨恨。这象征着父权制为女性设定的“天使”与“疯女人”的二元对立形象。因此, 艾丽丝的反叛并非是对传统爱情观念的挑战或颠覆, 而只是对威廉情感的另一种执念。她的悲剧揭示了在性别和阶级平等尚未完全实现的社会中, 宗教音乐与摇滚音乐所倡导的普世关怀难以真正落地生根。要实现这一理想, 关键在于彻底打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构建更加公平、透明且和谐的社会体系。

关键词: 约翰·欧文; 《直到找到你》; 艾丽丝; 情感认知; 音乐书写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评审委员会基金“鲍勃·迪伦反战歌诗文化记忆建构研究”(XSP24YBC245); 湘潭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基金“约翰·欧文《直到找到你》跨媒介叙事研究”(XDCX2024Y112)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315

前言

约翰·欧文(John Irving, 1942—)是美国当代小说家, 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启写作生涯以来, 他多次斩获美国文学大奖。欧文将查尔斯·狄更斯与托马斯·哈代等文学巨匠的叙事技巧与 20 至 21 世纪的严酷社会现实相融合^[130], 创造出众多佳作, 致力于探讨身份认同、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变迁等议题。他的小说《直到找到你》讲述了艾丽丝在身怀六甲时被丈夫威廉抛弃的故事。此后, 艾丽丝以帮儿子杰克寻找生父为幌子, 对威廉展开了一系列报复行为。在小说中, 杰克最终获得了圆满的结局, 而母亲艾丽丝的结局则充满悲剧色彩。杰克在发现四岁时与母亲艾丽丝的北欧之旅并非真正的寻父之旅, 而他儿时的记忆也大多是母亲故意隐瞒真相而编织的幻象之后, 决定再次前往北欧, 探寻关于父亲的真相, 最终与父亲和解、团聚。艾丽丝则因深陷对前夫威廉的仇恨之中, 最终死于乳腺癌。

值得注意的是, 艾丽丝对威廉从迷恋到怨恨的情感转变始终与音乐紧密相连、交织在一起。目前, 学术界对《直到找到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学、文化研究、主题探讨以及宗教象征等领域。针对艾丽丝的情感认知在音乐媒介中的建构, 尚未有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已有研究关注到了小说中的音乐元素, 指出鲍勃·迪伦的音乐不仅是确认嬉皮士身份的重要标志, 也是嬉皮士仰仗终身的精神家园^{[2]127}。然而, 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音乐象征意义的层面, 未能充分探讨音乐媒介在情感认知建构中的作用。此外, 已有的研究往往将艾丽丝定义为一名反叛者: 她从事刺青业, 听摇滚乐, 甚至参与性狂欢, 既是嬉皮士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者与践行者, 也是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叛逆者^{[2]131}。然而, 从艾丽丝的悲剧结局来看, 她的“反叛者”身份应当被重新审视。

从亨利·菲尔丁开始, 音乐就开始在小说中占据一席之地。到了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时期, 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和乔治·爱略特等一大批杰出的小说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中, 进一步提升了音乐在小说中的话语权地位。音乐元素的引入不仅可以为小说的形式服务, 也能够为小说的主题服务。音乐可以服务于小说主题, 原因有三。首先, 音乐作为一种“绝对语言”可以表达那些文字语言难以言说的隐秘情感和思想; 其次, 乐器的占有、音乐的类型和演奏的场所都能指涉社会差别, 揭示演奏者和听众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不同; 最后, 小说中音乐的听觉性和视觉性的并置, 可以反映权力对身体、性别的控制和僭越。^{[3]5-6}综上所述, 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 还是一种承载着特定意识形态的媒介。在音乐的创作、表演和接受过程中, 个体往往会逐

作者简介: 向君如(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与文化。

渐内化这种意识形态,进而影响其情感认知和价值判断。基于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剖析《直到找到你》中的音乐书写,厘清艾丽丝的情感认知轨迹,有助于我们探明在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女性情感自由与解放所面临的困境及其可能性。

1. 管风琴音乐场域中情感认知的构建

欧文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充满音乐元素的叙事世界。音乐是贯穿艾丽丝与威廉从结缘、相识到相恋全过程的重要元素,与人物塑造紧密相连。在与威廉的交往中,艾丽丝将符号、声波等形式的象征暴力误认为是美好爱情的开始,并据此形成了对威廉初始的情感认知。这一切都与威廉的文化资本密切相关。不同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一种综合气质,通过所谓的“趣味”体现出来,比经济资本更能隐秘地左右人们的社会地位。因此,文化资本难免会成为一种象征暴力。从“象征”一词最常见的意义来看,强调象征暴力就是在削弱身体暴力的作用。^{[4]47}然而,象征暴力往往比直接的身体控制更为隐蔽,更深入人心。艾丽丝期望通过音乐媒介与威廉建立情感联系,她看似在情感上与威廉产生了共鸣,实质上却是在无意识中内化了阶级与性别的不平等。

威廉的学历和家庭背景是其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指出,学历作为衡量学校教育年限的指标,能够或多或少地保障个体的文化资本^{[5]18}。威廉在巴赫与亨德尔的宗教音乐领域具有专长,并拥有皇家管风琴学院的学士文凭以及爱丁堡大学的音乐学位。在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音乐之前,他念的是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赫里奥特独立学校。威廉所拥有的这些文化资本,是音乐体制给予他的社会身份象征。通过在教堂体系中担任职务,例如南利斯教区教堂的首席管风琴师和老圣保罗教堂的助理管风琴师,威廉的社会地位得以显著提升,他的中上层文化优越感也随之彰显。除了学历所赋予的文化资本外,威廉的家庭背景也为其文化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支持。因为文化资本除了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外,还可以通过家庭传承得到积累^{[5]18}。威廉的父母均为小学教师,并兼职教授私人钢琴课程,他们极为看重专业艺术修养。可见,威廉自幼便沉浸在浓厚的音乐氛围中,其成长起点较高,文化资本的积累时间也相对更长。而且,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家庭教育往往比学校教育更具认可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占据优势地位的家庭为巩固自身阶层所设置的一种障眼法。这些家庭通过将文化资本局限于特定群体内部,无形中设置了社会流动的障碍。加之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难以流通,导致阶层之间的跨越变得尤为困难。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仿佛暗示了艾丽丝与威廉终将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之中,难以交汇。

与威廉相比,艾丽丝的学历和家庭背景都明显逊色于威廉。当艾丽丝与威廉相识时,威廉已是南利斯教区教堂的管风琴师,而艾丽丝只是该教堂唱诗班的一员。作为一名未完成学业的刺青师之女,艾丽丝一直深感自己低人一等,她的阶级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威廉的学历和家庭背景所构建的象征暴力。因此,她在学历和家庭背景上的双重焦虑加深了她对威廉的仰慕之情。艾丽丝坚信,自己因为威廉在教堂唱歌,她死后一定能进入天堂^{[6]6}。这表明她几乎将威廉视为神的化身,认为他的权威足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布尔迪厄认为,象征权力的运作使人们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产生认知并加以接受。而被统治者通常不自觉地,甚至有时是不情愿地,通过羞耻、害羞、焦虑、负罪感,或爱情、倾慕和尊敬等情感来默许这些既定的界线,从而助长了对自身的统治^{[4]54-55}。作为中下层阶级的一员,艾丽丝对威廉的音乐天赋和音乐资质心生崇拜,她的这种慕强心理促使她向威廉靠拢,并期望通过与威廉的交往,尤其是欣赏他的音乐,来寻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情感认同。这一切反映出艾丽丝对自身文化资本缺失的补偿性心理,她渴望获得威廉的认可,而这反过来却加强了威廉对她的隐形控制。

对威廉音乐的欣赏与艺术品味的支持,虽然让艾丽丝确认了自己的情感归属,但也让她在无意识中参与到了权力结构的维持当中。威廉曾经参加过老圣保罗教堂举办的一场持续二十四小时的管风琴音乐会,在这场“管风琴马拉松”中,不同管风琴师分别演奏半小时到一小时,最优秀的演奏者率先登场,这种演奏顺序的安排体现了根深蒂固的等级差异。当时威廉尚年轻,轮到他上场时,教堂内观众已不足半数,但艾丽丝却始终全神贯注。这表明,在艾丽丝眼中,威廉的形象已被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高度美化。无论他的演奏技巧与资历如何,他都已然成为她心目中的神圣音乐家。这一现象也说明,将高等教育和专业资格文凭等所代表的文化资本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已经成为当时个体和社会的一种普遍惯习^②。人们对文化资本的过度尊崇,使得文化资本变成了一种象征暴力,这进一步巩固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结构。

在那场“管风琴马拉松”中,威廉选择了演奏波尔曼的托卡塔^③。此曲的复杂性和速度能够充分发挥乐器的

② 惯习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通过长期社会实践所内化的一系列行为、思维和感知模式。布尔迪厄指出,惯习揭示了个体行为的社会和集体根源,是一种社会化的主观性。详见 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 126.

③ 托塔卡是由一种键盘乐器(管风琴或钢琴)演奏出来的一种乐曲形式,以快速的音阶交替和一连串的分解和弦为特点,富有即兴性。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最初作为即兴前奏曲用于宗教仪式。到了17世纪,托塔卡发展为独立的乐曲形式。

演奏技术,从而很好地展示演奏者的技术水平。威廉的演奏具有极强的冲击力,能让老圣保罗教堂外无家可归的醉汉无法入睡,甚至让教堂里的所有人都跑了出来,艾丽丝也不例外。可见,艾丽丝在生理上对威廉“热闹而暗噪”^[69]的演奏是明显抗拒的,甚至难以忍受。小说结尾部分间接揭示了威廉音乐的暴力性质。当杰克的妹妹茜瑟在教堂内演奏管风琴时,教堂外是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的,这与威廉的演奏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威廉的管风琴演奏不知不觉背离了他的初衷,从虔诚的信仰表达与赞美,异化为一种权力展示和阶级区隔的声学象征暴力,驱逐包括艾丽丝在内的那些不符合中上阶层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人。小说以黑色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教堂外的醉汉被音浪暴力驱逐而吵嚷的场景。这些醉汉不仅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也是中上阶层音乐文化的局外人。而威廉却故意弹得更加起劲,丝毫没有意识到周围人的无奈与痛苦。这揭示了艺术和艺术消费往往预先倾向于满足一种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无论人们是否知晓^[41]。

习性创造位置感和区隔感,并可能引发对社会秩序的误认^④。^[719]从艾丽丝与威廉在文化资本上的差距来看,二者的艺术品味存在显著差异。因为所有文化实践以及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偏好,都与依学历或学习年限衡量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其次也与社会出身相关^[41-2]。换言之,文化趣味并非天生的禀赋,而是后天教育的产物。因此,艾丽丝很可能是在强迫自己欣赏威廉的音乐。然而,这种由习性所导致的区隔感并未因此消弭,反而促使艾丽丝对威廉及其所代表的文化资本,产生了一种基于阶级想象的、系统性的误认。尽管在生理层面难以忍受,艾丽丝的情感与道义感却不自觉地倾向于威廉的立场,将这种声学暴力误认为一种必须忍受乃至崇高的艺术形式。她认为自己与那些醉汉不属于同一阶层,甚至觉得如果醉鬼在教堂中喧哗必将遭天谴,而自己对威廉所喜爱的音乐的认同,恰恰证明了自己属于更高层次的文化群体。这种误认不仅让她确认了自身相对于底层群体的优越性,找到了情感归属,也为她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找到了一个崇高的借口。然而,这也让她无意中默许和参与了文化权力结构的维持。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若如果没有那些对权力逆来顺受的人,以及仅因权力结构本身就选择默默忍受的人从中推波助澜,象征权力便无法施展^[456]。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唱诗班通常被笃信宗教的中产阶级家庭视作一种富有文化内涵的活动,它与良好的教育、优雅的气质培养紧密相连。艾丽丝的父亲通过把她送进唱诗班,似乎为她开启了一扇通往“超阶级”生活体验的大门,使她能够从相对底层的刺青文化环境中暂时抽离,踏入象征着中上阶层文化与价值观的宗教音乐领域。在这个相对纯净、有序且被视作高尚的空间里,艾丽丝似乎短暂地摆脱了原有社会阶层的束缚与标签,获得了全新的身份体验。然而,这种跨越阶层的体验不过是稍纵即逝的幻象。父权制社会结构以及中上阶层的规训机制迅速且有力地发挥作用,将她重新拉回到既定的社会角色轨道上。

艾丽丝对威廉的才华与魅力产生了深度的依赖和沉醉。这种痴迷从侧面反映出她在父权文化影响下对男性权威的顺从以及自身主体性的迷失。她过度将情感寄托于威廉,甘愿陷入一种眷恋凡尘情爱的自私小我的迷醉状态,从而忘记了父亲的初衷和期待,也忽略了自身的成长与人格独立。艾丽丝所向往的爱情,不过是威廉一时冲动的产物,缺乏真正的责任与承诺。当激情逐渐消退,威廉最终抛弃了她,她从曾经在教堂中为上帝歌唱的“天使”,沦为身怀六甲却遭人遗弃的世俗女子。可见,艾丽丝在管风琴声场中所建构的对威廉的爱情认知,使她在这一看似美好的“超阶级”体验中一无所获。她的幻想最终破灭,从此开启了充满苦难与不幸的人生。

2. 赞美诗吟唱循环中情感认知的固化

即使遭遇丈夫的遗弃,艾丽丝依然没有对爱情绝望。她通过反复吟唱赞美诗来坚守对爱情的信仰以及对威廉的忠诚。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提出了“躯体标记假说”,认为情绪和感受在决策和推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89]。音乐会影响情绪,而情绪状态往往会影响个体的判断与决策。赞美诗作为艾丽丝和威廉曾经共同的音乐体验,承载着美好的回忆,能够给她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归属感。这使她愈发怀念过去的情感体验,潜移默化地固化了她对威廉的情感认知,并强化了她在情感和行为上对这段关系的忠诚。

音乐不仅是一种审美对象,更是能够调节情感、建构身份的社会行为。在小说中,赞美诗是一种重要的情感调节手段。在北欧最后一站阿姆斯特丹,艾丽丝经常演唱一首名为《愿主灵气吹我》的赞美诗,试图将欲望横流的世俗化场所转变为临时的圣所,从而在混乱的环境中求得片刻心灵上的安宁。《愿主灵气吹我》的歌词“主啊,我永属你”,在艾丽丝的反复吟唱中完成了语义的重构。在17世纪的加尔文主义语境中,“Thine”(永属)指的是

④“误认”是指在不加区别的尊敬引发的对正统的幻想中体验到的异端,这种状态夹杂着渴望和焦虑,导致人们将轻歌剧视为高雅音乐,将普及视为科学,将赝品视为真品,在这种既忧虑又过分自信的虚假认同中找到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在某些方面得自于与众不同的感觉。详见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第510页。总而言之,“误认”是一种由于盲目崇拜、理想化想象、强烈渴望和焦虑而产生的错误认知,被支配者并不觉得自己被欺骗或强迫。他们透过自身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所形塑的“习性”来看待世界,并认为这个被结构所扭曲的视角就是现实本身。它使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出现偏差,并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中获得虚假的满足感和独特感。

对神权的绝对臣服，而艾丽丝却将其偷换为对前夫威廉的情感宣言。与此同时，她在另一首赞美诗中所吟唱的“万爱之王乃我善牧”，亦将上帝视为“善牧”以获取精神慰藉。这反映了她将对威廉未能满足的情感需求转移到了上帝身上，试图在宗教信仰中得到情感寄托。由此可见，艾丽丝已经把对威廉的情感认知归为赞美诗的审美经验的一部分了。

然而，一些布道者在演唱赞美诗时，并非真正抱着虔诚之心，而是倾向于将此机会视为一次视觉和听觉的表演。她们在演唱赞美诗的时候常常受到世俗日光的凝视，使得原本圣洁的心灵洗礼很容易变成秀色可餐的合法僭越^{[3]53-54}。艾丽丝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她演唱赞美诗并非出于对上帝的虔诚与赞美，而是为了吸引异性，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威廉因她的举动而心烦意乱，从而扰乱他的正常生活。艾丽丝的不虔诚还体现在她对待儿子杰克的方式上。她故意带着杰克在充满诱惑与风险的地区游走，试图利用威廉对儿子的亲情和怜惜来胁迫他回到她的身边，却丝毫不顾杰克的安危与身心健康。可见，于她而言，生下杰克更多是出于自身的需求，而非出于责任。她从未考虑自己是否有能力为杰克提供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更未将他视为一个需要珍爱与呵护的个体。由此可见，威廉已然使她失去了理智。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又怎会将自己的亲生孩子置于不顾呢？

艾丽丝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长期以来对女性角色有着根深蒂固的期望，认为女性应该具备温柔、顺从和依赖等特质。久而久之，这些期望融入了女性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促使她们在情感关系中更多倾向于寻求依赖和归属感。人既需要与环境互动以维持生活平衡状态，同时也依赖于身体内部状态和情感认知的协调。^{[9]174} 具体而言，情感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资源，不仅帮助我们塑造自身形象，也协助我们识别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适应方式。对艾丽丝而言，即便她经历了创伤，她依然依赖既有的情感模式来应对现实困境。尽管威廉已经离开了她，使她陷入满腹怨恨的漩涡，过上居无定所且被迫独自抚养孩子的日子，但她对威廉的深厚情感驱使她继续选择通过吟唱赞美诗来表达对他的忠诚。统治通过在女性身体上打下的烙印^⑤，并非旨在合理化其恶劣行径，而是试图将女性受压迫的责任转嫁给她们自身。这种机制通过暗示女性喜欢被统治、享受自己的遭遇，或者认为她们天性中有一种受虐狂的成分来推卸责任。^{[4]56} 对于艾丽丝来说，这种对威廉忠诚的表达方式既符合她对女性角色的理解，又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扭曲的“享受”。这固化了她对威廉的情感认同，最终形成一种在压迫中自我合理化的心理状态。艾丽丝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会将父权制那里遭受的压迫误认为是自身的问题，从而使父权制再次成功免责。她的经历表明，人的塑造是客观现实和主观体验相互交织的结果。因此，艾丽丝的结局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情感认知的产物。

此外，威廉的形象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作为中上阶层的代表，威廉高超的管风琴演奏技艺自小说开篇便被着重强调、神化。通过这些描写，欧文巧妙地将威廉与宗教音乐的权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仿佛天生拥有对宗教音乐的话语权。而威廉的种种表现也说明，他已经在无意识中将中上阶层的霸权逻辑内化于心了。然而，这个“音乐神子”却将宗教音乐从神圣的教堂转移到了边缘性的世俗空间。宗教音乐是神圣性与权威性的代表，而那些充满诱惑与风险的边缘性场所则是世俗、欲望与堕落的象征。当宗教音乐在这些地方奏响时，其原本所蕴含的权威性在世俗欲望的冲击下逐渐被削弱、消解。

威廉在阿姆斯特丹为边缘群体演奏管风琴音乐，其初衷根植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及其所信奉的“众生平等”等价值观。他虔诚地相信，管风琴的音响足以让那些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群体聆听到“上帝的声音”，并期望通过音乐的力量感化心灵、引导皈依。然而，这种带有救世情怀的实践，却不自觉地使宗教音乐异化为一种具有规训意味的工具，无形中强化了文化上的支配感。尤为关键的是，威廉的这一行为，诱发了艾丽丝畸形且病态的心理。她将威廉对边缘群体的关注，误读为一种需要以自我毁灭才能换回的情感联结。在这种扭曲的认知下，她自甘堕落。因为在她看来，只要自己成为这一类边缘性群体，威廉就会重新为自己演奏。这反映出她对威廉存在着深度且病态的依赖，以及她自身主体性的严重崩塌。然而，这种极端、非理性的行为非但未能挽回威廉的专注，反而使她深陷于自我构建的悲剧循环之中。从本质上看，威廉的初衷并非有意施加规训，其行为背后是强烈的宗教热忱与平等的价值追求。然而，他的行为在客观上却给身边最亲密的女性带来了持久而深层的创伤。由此，威廉的形象呈现出深刻的复杂性：他既是一位虔诚践行信仰、追求平等的“音乐圣徒”，同时也是一个在无意识中将文化权威内化，并在情感层面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悲剧性人物。

3. 摇滚乐反叛幻象中情感认知的解构

艾丽丝的身上刺有一颗破碎的心，中间的“直到找到你”字样宛如缎带，似乎在努力将这颗破碎的心捆绑、修复。尽管她通常忌讳刺青，但这一例外之举表明，该刺青对她而言意义非凡。这颗破碎的心象征着威廉给她带来的情感创伤，而“直到找到你”字样则象征着她对尽快走出阴霾、修复创伤的强烈渴望。最初，艾丽丝曾千方

^⑤ “烙印”指代统治所施加的各种具有标志性和持久性影响的手段或痕迹，包括社会文化层面长期形成的对妇女的刻板印象和性别角色定位，以及制度层面限制妇女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和传统习俗对妇女行为的约束等。

百计试图挽回与威廉的关系，期待通过这段感情的延续来弥合内心的伤痛。然而，艾丽丝最终还是被迫接受威廉不会回到自己身边的残酷现实。心灰意冷之下，她不再执着于吟唱赞美诗，而是开始聆听鲍勃·迪伦的摇滚乐。这种摇滚音乐逐渐频繁地出现在她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中，成为她日常体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其当时的心境高度契合。迪伦的歌曲中常常流露出对真爱难以邂逅的怀疑与失望。^{[10]111} 小说中迪伦的歌词“我是如此需要你”^{[6]511}“我不该失去你”“我应该把你拒绝”“破裂的铃铛和褪色的号角”^{[6]510}正是艾丽丝对爱情既向往又绝望的矛盾心境的生动写照。她的音乐品味和情感寄托方式发生了显著转变，这标志着她最初对威廉所构建的美好情感认知正在逐步瓦解。

艾丽丝选择听迪伦的摇滚乐，意在以此反叛威廉所代表的音乐品味与价值权威，同时在音乐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与力量，以抵御创伤的侵袭。威廉曾对管风琴被“过度改动”以适应反维多利亚时代潮流表现出失望，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对反叛风格的音乐并不感兴趣，甚至厌恶。因此，艾丽丝通过聆听威廉不喜欢的音乐，暂且找到了一种表达对他不满的方式。音乐社会学理论家德诺拉（Tia DeNora）根据研究指出，人们在发泄情绪时，通常不会选用与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音乐喜好有关的音乐^{[11]57}。对于艾丽丝而言，选择迪伦的歌曲并非出于对摇滚乐本身的喜爱，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情绪宣泄工具。摇滚乐高强度的听觉刺激以及所代表的反叛精神与她当时愤怒、不满的情绪状态高度契合，为她提供了一个释放情绪的出口。通过沉浸于音乐，她希望将内在的躁动与愤懑引导并外化为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以此完成对压迫性力量的反叛。然而，阿多诺认为，摇滚乐的反叛性已被资本主义收编为一种“安全的反抗”，本质上是父权制与消费文化的共谋。当前爵士乐所展现的“个性”只是表面上的标新立异，是对传统的虚假反叛，是一种被抹杀了特殊性、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一致的假象的个性^{[12]102}。尽管爵士乐从诞生之初是黑人表达情感的音乐，但是里面所有原本桀骜不驯的东西都被整合进一个严苛的框架中，其反叛姿态伴随着盲从和卑躬屈膝，像极了心理学中的施虐—受虐现象。^{[13]122} 这暗示了艾丽丝的反叛或许同样也是一种虚假且徒劳的实践。

艾丽丝聆听迪伦音乐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对她过往的背离，但由于其未能促成真正的主体性重建或生成新的积极意义，本质上更接近于一种“伪活动”。从社会行为学的视角来看，当个体试图摆脱强制性消费的被动状态并寻求自我“激活”时，往往容易陷入此类伪活动当中^{[14]52}。具体而言，尽管迪伦音乐中刺耳的电吉他和自由奔放的节奏似乎与艾丽丝内心的撕裂声产生了某种情绪共鸣，但这种共鸣并未进一步升华为她对自身情感认知以及父权制压迫体系的深刻反思。更具悲剧性的是，迪伦部分歌曲中所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厌女症现象，反而在无形中强化了她的命运困境^{[10]111}。厌女症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涵盖了父权制、男性特权、性别歧视、贬低女性、性骚扰、性客体化以及针对女性的性暴力等多种形式^{[15]346}。迪伦歌词中诸如“你假模假样，是的，就像一个女人”“你在床上娇喘放浪，没错，就像一个女人”等表述^{[6]334}，正是这种倾向的体现。艾丽丝在反复聆听中，无意识地内化了这些对女性的负面刻画，并将这种带有性别偏见的悲观想象投射到自我认知中，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她原有的自卑与宿命意识。因此，她的聆听行为尽管表面具有反叛性，其内在逻辑却依然被困于男性主导的符号秩序之内，非但未能真正挑战父权权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并强化了该体系对女性主体的规训。

与此同时，艾丽丝对迪伦摇滚乐的选择，亦与威廉的外形及气质特征紧密相关。和众多音乐家一样，威廉有着瘦削的身材、精致的脸型以及阴柔的美感，特别是他留的长发，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个摇滚乐队的歌手，而不是传统的管风琴师。正是这种外形与气质上的相似性，使迪伦的音乐成为艾丽丝宣泄心中苦闷与怨恨的情感媒介。在此意义上，迪伦仿佛成为了威廉的情感替身。也因此，艾丽丝寄希望于通过迪伦的音乐，疗愈她那颗因威廉而受创的心灵。

然而，艾丽丝终究未能真正挣脱父权制下传统爱情观念的枷锁，治愈之途遥不可及。她一方面借助摇滚乐来表达对威廉的愤怒与怨恨，以此实现情感的宣泄；另一方面，却在情感上将迪伦视为威廉的替身。在这种矛盾之中，爱情化作了一种最为微妙、最不易察觉的象征性暴力形式^{[4]159-160}。在艾丽丝濒死之际，她反复聆听迪伦的歌曲，甚至以最大音量播放，试图以此对抗“脑中的声音”，抵御对死亡的恐惧。这一行为表明，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都未能放下对威廉的执念。尽管她容貌出众，不少男人为之倾倒，却始终拒绝接受除威廉之外的任何其他男人。面对异性的挽留时，艾丽丝总是以“她在多伦多有个爱人”为由婉拒，固守着“非威廉不嫁”的执念。此外，艾丽丝对威廉所采取的种种报复行为，虽表面出于憎恨，实则仍是其对威廉情感的扭曲表达。她最终死于乳腺癌——一种典型的女性疾病，小说作者的安排富有深意，暗喻其女性身份在父权制结构下所承受的压迫。艾丽丝的自我认知已深刻内化了父权制的价值尺度与道德规范，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精神的独立。她的形象表明，尽管20世纪中后期女性地位有所提升，但父权文化的影响依然根植于社会结构与个体意识之中。因此，艾丽丝所进行的反抗，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未能触及制度核心的、停留在表层的伪反叛。

摇滚反叛通常以全面否定传统为基本姿态，在情感认知层面表现为与既有秩序的决裂以及对自我主体性的积极建构。然而，艾丽丝在葬礼安排上所呈现的矛盾选择，恰恰暴露了她反叛的虚幻性。她生前明确提出，葬礼应

在体育馆而非传统的大礼堂举行，且拒绝安排讲话与祷告环节，仅保留歌唱仪式。这一安排反映出她试图通过仪式的简化与宗教环节的删减，实现对父权制宗教权威的象征性抵抗，其形式与摇滚文化中对主流价值的挑战具有一定相似性。然而，艾丽丝又同时要求依照圣公会仪式演唱晚祷颂歌，这一安排暴露出她内心仍难以割舍与威廉共同记忆中的宗教音乐。这种矛盾不仅说明她未能真正摆脱父权制宗教框架的束缚，也反映出她在反叛过程中并未建立起独立而稳定的主体认同，只能在宗教与世俗、传统与反叛的边缘徘徊挣扎。因而，艾丽丝的反叛行为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对父权制压迫的应激性回应，而非基于清醒自我认知的主动抉择。

艾丽丝所呈现的伪反叛特质，同样体现于她对情感初衷的逐步背离。莱斯利因其情感创伤经历与艾丽丝高度相似，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艾丽丝自我的象征性投射。与此同时，杰克在外貌上与威廉极为相似，这一特征进一步扰乱了艾丽丝原本复杂的心理状态，使她难以用理性、客观的心态去直面杰克。在艾丽丝的潜意识中，杰克已然成为威廉的象征符号。受此心理机制驱动，艾丽丝试图促成莱斯利与杰克建立一段短暂且悖离常理的男女关系。她期望通过这种替代性的关系建构，在生命终结前满足某些未被言说的心理需求，以此补偿她未能与威廉重修旧好的终生遗憾。然而，这一行为与她最初所追求的那份永恒、纯粹之爱的理想完全相悖。这种矛盾不仅反映出艾丽丝在复仇情绪驱使下逐渐丧失理性判断，更揭示出其试图借助摇滚反叛精神实现自我救赎的尝试最终归于失败。摇滚乐所标榜的解放性力量并未能助她走出情感困境，反而使她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进一步迷失自我，导致其主体性在持续的情感投射中不断被消解。

在诸多文化语境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观念，即女性常将命运所安排的伴侣视为可爱且值得投入情感的对象。这一观念在某些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进而使爱情在幸福抑或不幸的激情中成为一种被默许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往往通过引发担忧、不确定感、期待、失望乃至伤害与屈辱等情绪，达到维系、束缚、压制、贬低甚至奴役女性的目的，从而维系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结构^{[4]160-161}。艾丽丝正是这一结构的牺牲者。她投入大量情感、时间与精力，渴望获得威廉的认可并维系这段关系，然而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始乱终弃，这引发了她的失望、气愤。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不仅加剧了艾丽丝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也使她陷入持续自我贬抑的心理困境。为了摆脱这种负面情绪，她反而在情感上愈加渴望威廉的回应，无形中强化了威廉在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自身则陷入被动与弱勢的循环。“客体自我意识”模型认为，个体的注意容量是有限的。在自我调节过程中，注意力要么留给自己，要么聚焦环境，而不能两者兼顾。过度关注环境会相应减少留给自我调节的资源。^{[16]111}艾丽丝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威廉，无论是以爱或恨的形式，都导致其注意力被这段关系过度占据。这种对外部世界的过度投入，导致她忽视了对自我关注和自我成长，因而始终未能构建起独立稳定的主体性，最终在情感纠葛的漩涡中逐步丧失自我。

结语

管风琴的神圣性、赞美诗的忠诚性以及摇滚乐的反叛性，表面上勾勒出艾丽丝情感认知的发展轨迹。然而，这些音乐类型背后所共同蕴含的父权制对女性情感的规训，才是塑造其认知逻辑、并最终导向其悲剧命运的深层动因。这些音乐作品大多由男性创作，其蕴含的情感亦以男性思想为载体，音乐因而成为权力运作的媒介，不断巩固着艾丽丝作为情感客体与他者的身份。艾丽丝的音乐选择始终围绕威廉展开：她以宗教音乐表达对他的忠诚，又借摇滚乐宣泄对他的怨恨。这两种表达恰恰对应了父权制为女性设定的“天使”与“疯女人”的二元对立形象。艾丽丝本来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一个觉醒的现代女性。然而，她终究未能完成这一蜕变。她的行为逻辑始终建立在一系列深刻的“误认”之上，这种“误认”并非对自身所受伤害的无视与否认，而是她无意识地内化了外界的规则。这凸显了她在父权制社会结构面前的无力感。而她的复仇方式，并非挑战或颠覆压迫机制本身，而是试图吸纳压迫者的逻辑。结果，她的反抗反而沦为对男权规则的一种病态致敬，最终引发了一系列悲剧。艾丽丝的悲剧经历表明，在一个性别与阶级平等尚未完全实现的社会中，宗教音乐与摇滚乐所标榜的普世关怀是难以真正实现的。要实现这一理想，关键在于彻底打破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构建更加公平、透明且和谐的社会体系。但这正是艾丽丝及其所处时代未能触及的维度。对艾丽丝这一人物心路历程的深层建构，体现了作者欧文对情感认知的高度重视以及独特见解。情感认知的融入为叙述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提升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而情感认知与音乐元素的并置，增强了叙述语言的隐喻性，扩展了话语的表述空间，达到了揭示事情本来面目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ENTEM M A. *Dark Apprenticeships: The Novels of John Irving* [D]. Heidelberg: Neuphilologischen Fakultät der 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 2010.

- [2] 赵雪梅. 从《直到我找到你》看鲍勃·迪伦的音乐对嬉皮士身份认同的影响[J]. 外国文学研究, 2017(5): 127-136.
- [3] 张磊. 肯认与焦虑: 乔治·爱略特小说中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研究[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2.
- [4] 布尔迪厄. 男性统治[M]. 刘晖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 [5] 布尔迪厄. 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M]. 刘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6] 约翰·欧文. 直到找到你[M]. 李同洲,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7] 文化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张意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7.
- [8] 达马西奥. 寻找斯宾诺莎: 快乐、悲伤和感受着的脑[M]. 孙延军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 [9] 达马西奥. 笛卡尔的错误: 情绪、推理和人脑[M]. 毛彩凤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7.
- [10] 徐思园, 田俊武. 文学伦理学和数字人文视域下鲍勃·迪伦歌曲中的爱情伦理[J]. 外语教学, 2021, 42(02): 108-112.
- [11] DENORA T. *Music in Everyday Lif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2] ADORNO T W. *Gesammelte Schriften*[M]. Frankfurtam: Suhrkamp Verlag, 1973, Band 17, s. 102, Band 3, s. 177.
- [13] ADORNO T W. *Prisms*[M].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1, Page 122.
- [14] ADORNO T W.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52.
- [15] CODE L. *Encyclopedia of Feminist Theorie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6] 杨海燕, 姜媛. 情绪调节策略与记忆研究进展[J].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04): 109-114.
- [17] 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Emotional Cognition in the Musical Media of *Until I Find You*

Xiang Junru¹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Until I Find You* by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John Irving centers on the emotional entanglement between Alice and her ex-husband William Burns. Through its cross-media musical narrative, the novel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Alice's emotional cogni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musical media shape Alice's emotional cognition by analyzing its phases of construction, solidific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lice's emotional cognition is constructed within the organ music soundscapes dominated by William, solidified through her continuous chanting of hymns, and ultimately dismantled within the rebellious illusions of rock music. Her musical preferences consistently revolve around William: she expresses loyalty through religious music, while channeling resentment through rock. This dynamic symbolizes the patriarchal binary of the angel and the madwoman. Consequently, Alice's acts of rebellion are neither a challenge to nor a subversion of conventional love, but rather another form of obsession with William. Her trage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universal humanitarian ideals professed by music remain unattainable without full gender and class equality. Realizing these ideals necessitates the fundamental dismantling of unjust social structures to build a fair, transparent, and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John Irving; *Until I Find You*; Alice; Emotional cognition; Musical narratives

简析山水画留白意境

吴以晗¹

(1.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要: 中国山水画的留白技法以虚实相生构建独特意境。南宋马远以“马一角”的边角构图与留白著称, 本文通过《踏歌图》《寒江独钓图》等作, 分析其留白的三类形式: 山石留白以云雾虚化凸显空灵; 水天留白借无墨处传递天地交融的孤寂; 点景留白以飞鸟等元素平衡画面节奏。马远的留白融合道家“有无相生”与儒家“中和”思想, 将哲学智慧转化为视觉语言, 赋予观者想象空间。留白既是技法, 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凝练, 彰显山水画的独特艺术价值。

关键词: 留白; 山水画; 马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75

中国山水画作为东方艺术的经典范式, 其留白技法构建出独特的视觉美学与哲学意境。自六朝时期肇始, 经唐宋元明诸代演进, 留白已从技法层面升华为山水画创作的核心美学原则, 形成虚实互补的空间叙事结构。^[1]黑与白成为营造意境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 留白给画面注入了独特的审美元素, 为中国画丰富的内涵和审美价值提供了支持。

南宋画家马远, 以山水画著称, 擅长以边角之景展现清新灵动的山水风貌, 被誉为“马一角”, 其画作意境深远, 留白巧妙, 对后世影响深远, 可由他的作品观之。

一、中国山水画留白方式

1.1 山石留白

山石留白作为山水画中“以虚塑实”的典型范式, 体现了东方艺术对物质形态的重构。

以代表作《踏歌图》为例, 画面上部山峰峻峭, 云雾间留白凸显高耸与深远; 下部村民踏歌, 田埂树木线条简洁。对角式构图, 中间留白让画面层次分明, 有动感且稳定, 营造宁静祥和氛围。山石留白极大影响马远山水画意境, 它增强澄明之感, 使作品超脱尘世, 反映文人对自由宁静的向往。留白留给观者广阔想象空间, 还体现了道家“有无相生”、儒家“中庸之道”哲学思想, 平衡画面虚实, 达和谐美感。在传达意境方面, 留白更是一绝。它营造出超逸之美, 契合中国传统美学中对空灵、虚静境界的追求, 激发观者无尽的联想与想象, 引领观者进入超越画面、直达作者内心的奇妙世界。而且, 留白还能依据画作主题的不同, 巧妙烘托出相应氛围, 或宁静闲适, 或雄伟壮阔, 与山石的实相呼应, 达成虚实相生的绝妙效果, 使画面更具韵味与深度。由此观之, 山石留白是马远艺术成就的关键, 是借物留白中最常见的留白技法。

1.2 水天留白

存在于马远《寒江独钓图》中的水天留白为画作注入了灵动且深邃的意境。画面中, 江水以留白呈现, 大片

作者简介: 吴以晗(2006—),男, 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美术学, 戏剧影视方向。

空白看似无物，实则蕴含无尽想象。观者目光触及，仿若能看到寒江在冬日的肃杀中静静流淌，水面清冷，毫无波澜，却又似乎暗藏着暗流涌动的力量。留白处不着笔墨，却将江水的浩渺无垠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这片寒江绵延至目力不及之处，与天地融为一体。空中的云同样以留白塑造。云与江水的留白相互呼应，模糊了天地的边界。在这片混沌的留白区域里，云的形态虽未具象勾勒，却能让人感知到其轻柔缥缈、变幻无端。它们或如薄纱般轻盈地飘浮，或在寒风中缓缓涌动，与下方平静的江水动静结合，营造出一种空灵、悠远的氛围。^[2]《寒江独钓图》的留白是画家在创作时有意为之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激发观者的审美情感，留白产生的精神内涵在此得以展现。

这种云水留白的手法，让整个画面充满了“虽无却有”的奇妙韵味。在这浩渺的云水之间，独钓的渔翁显得愈发渺小，却也愈发凸显出其遗世独立的姿态。留白为画面增添了灵动之气，使观者仿若身临其境，置身于寒江之上，感受着江风的凛冽与天地的空寂，深刻体会到画家所传达出的孤寂、超脱的心境，展现出中国传统山水画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远意境。



《踏歌图》



《寒江独钓图》



《梅石溪凫图》

1.3 点景留白

^[3]点景留白指在山水画中留出小片的留白，营造画面意境，调节画面节奏。《梅石溪凫图》画面中，溪流、梅枝、浮鸭等元素构成了生动的景致，而在画面的角落处，偶尔出现的几只飞鸟或栖息或飞翔，成为了点景之笔，又与其他留白相互呼应，为画面增添了灵动之感。通过这些点景留白的处理，使得整个画面的节奏更加明快，意境更加深远。马远在其作品中巧妙地运用点景留白的手法，以小见大，通过微小的点景元素和精心布置的留白，营造出了独特的画面意境，调节了画面的节奏，使作品具有了更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

二、中国山水画留白的独特魅力

李可染先生^[4]肯定地说，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山水画的发展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的影响。从艺术角度说，留白就是以“空白”为媒介传达美学意蕴的一种艺术手段，它比直接色彩铺陈的形式更加含蓄。在美学特性的展现上，留白巧妙地强化了主题的核心地位，赋予画面深远的空间感，能够激发观者无限的遐想与再创造空间。此外，留白还深刻映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韵味，它超越了单纯的艺术技巧范畴，成为视觉美学中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直观而深刻地体现了视觉美感。

不仅是马远,留白艺术也几乎贯穿整个中国画历史,^[5]留白艺术在中国画中具有深远意义,它不仅是技法上的巧妙安排,更是画家心境和审美的体现。通过对留白的巧妙运用,画家能创作出意境深远、层次丰富的作品,为观画者提供无尽的想象和审美享受。留白不仅让画作更具艺术魅力,也让中国画在世界艺术上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此“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融入了画家情绪,观念,以及人生阅历,是中国画家不懈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 郝丹.山水画中空白对意境的营造研究[J].美与时(中),2023,(08):18-20.DOI:10.16129/j.cnki.mysdz.2023.08.034.
- [2]. 杨爱雪.《寒江独钓图》的留白艺术浅析[J].收藏与资,2025,16(08):23-25.DOI:10.19897/j.cnki.scytz.2025.08.006.
- [3]. 杨菁菁.山水画留白艺术研究——以宋元山水画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5,No.333(02):19-21.
- [4]. 李可染.漫谈山水画[J].美术,1959,(05):15-17+53.
- [5]. 陈雪.中国画的留白艺术及其对空间营造的作用[J].嘉应文学,2024,No.732(03):46-48.

Brief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Blank Spaces i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Yihanwu¹

¹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7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technique of blank space i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creates a unique artistic conception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void and solid. Ma Yuan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famous for his "corner composition" (known as "Ma's One Corner") and the use of blank space. By analyzing his works such as *Painting of Singing While Treading* and *Fishing Alone on the Cold Riv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ree forms of his blank space application: blank space around mountains and rocks, which is blurred by clouds and mists to highlight an ethereal quality; blank space for water and sky, which conveys the loneliness of the fusion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hrough ink-free areas; and blank space with dotting elements, which balances the picture's rhythm with elements like flying birds. Ma Yuan's use of blank space integrates Taoism's concept of "the interdependence of being and non-being" and Confucianism's idea of "harmony and moderation", transforming philosophical wisdom into a visual language and endowing viewers with space for imagination. Blank space is not only a technique but also a condens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highlighting the unique artistic value of landscape paintin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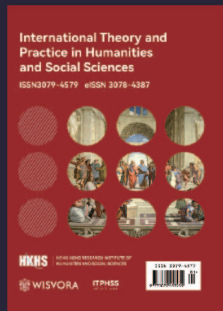
Keywords: blank spac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Ma Yuan



WISVORA

WISVORA 出版社：专注于学术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编辑、论文出版和国际索引、期刊创办、期刊托管等服务，增强学术研究的全球传播和影响力。

www.wisvora.com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是由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学术期刊，致力于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本刊重点关注学术研究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旨在探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议题，促进知识的广泛传播与共享。作为一份面向全球中文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本刊倡导跨学科、跨文化视角的学术探讨，为学术界和实践领域之间搭建桥梁，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与应用。

印刷出版 ISSN 3079-4579

电子出版 ISSN 3078-4387

ISSN 3079-4552



9 773079 455255

权责声明

期刊所刊载的评论、意见、观点等均出自文章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出版社的观点或看法。对于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内引用材料给任何个人、机构、及其财产所带来的任何损失及伤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郑重声明，本出版社的出版业务，不构成对任何产品商业性能的保证，也不表示本社业已承认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内容适用于某特定用途。如有疑问，请寻找专业人士协助。

学术赠阅